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躍進 1958-1960年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 著

全譯本



三十年寫就宏篇巨著 系統闡述文革起源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作者的文革前史三部曲，開創了西方研究文革的新領域。完整的中譯本終於問世，必將推動對文革更深入的研究。

——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学社會科學部教授）

麥克法夸爾先生是美國知名的漢學家，五十年前就開始研究毛澤東和當代中國歷史。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他在哈佛大學主持費正清中心工作時，曾兩次邀請我到美國講學、座談毛澤東和當代中國的問題，可說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了。他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巨著內容非常詳細。現在，他的中國為什麼會出現文化大革命的有關歷史巨著又要在香港出版了。我們真要向他致敬和致謝！

真實的歷史不僅可以鑒往知來，而且能弄清理論和主義的基礎。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規律，同弄清楚歷史事實是分不開的。對歷史要有忠誠的態度。任何理論都不能離開真實的歷史。

——李銳（中共黨史專家；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據我的觀察，到目前為止，在國際學界（包括中國）關於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及其起源的研究中，麥克法夸爾教授的這套書是最優秀的著作。無論是從史料的梳理，史實的把握，還是從邏輯的分析，它都顯示出一位熟知中國歷史的外國史學家的功力。相信這套書會給中國讀者帶來一個全新的視野，並有助於他們瞭解和研究自己的歷史。

——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麥克法夸爾的這套書，稱得上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的開山之作，也是今人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必讀書之一。

——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麥克法夸爾教授的文革史是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少有的傑出著作。它從毛澤東時代政治精英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來解釋文革的政治起源。由於麥克法夸爾教授對史料的嚴謹的研究和細膩與深刻的分析，這部文革三卷史已成為中國學的經典作品之一。

——裴敏欣（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封面照片：
1960年5月北京石景山鋼鐵公司工人「五一」遊行。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ISBN 978-988-15570-9-4



HK $ 128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躍進 1958-1960年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著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躍進 1958-1960 年
作者：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
初稿：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見全譯版前言）
全譯稿：	王笑歌 譯校；莫懷遠 統校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www.newcenturymc.com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5570-9-4
定價：	港幣 128 圓

香港印刷，2012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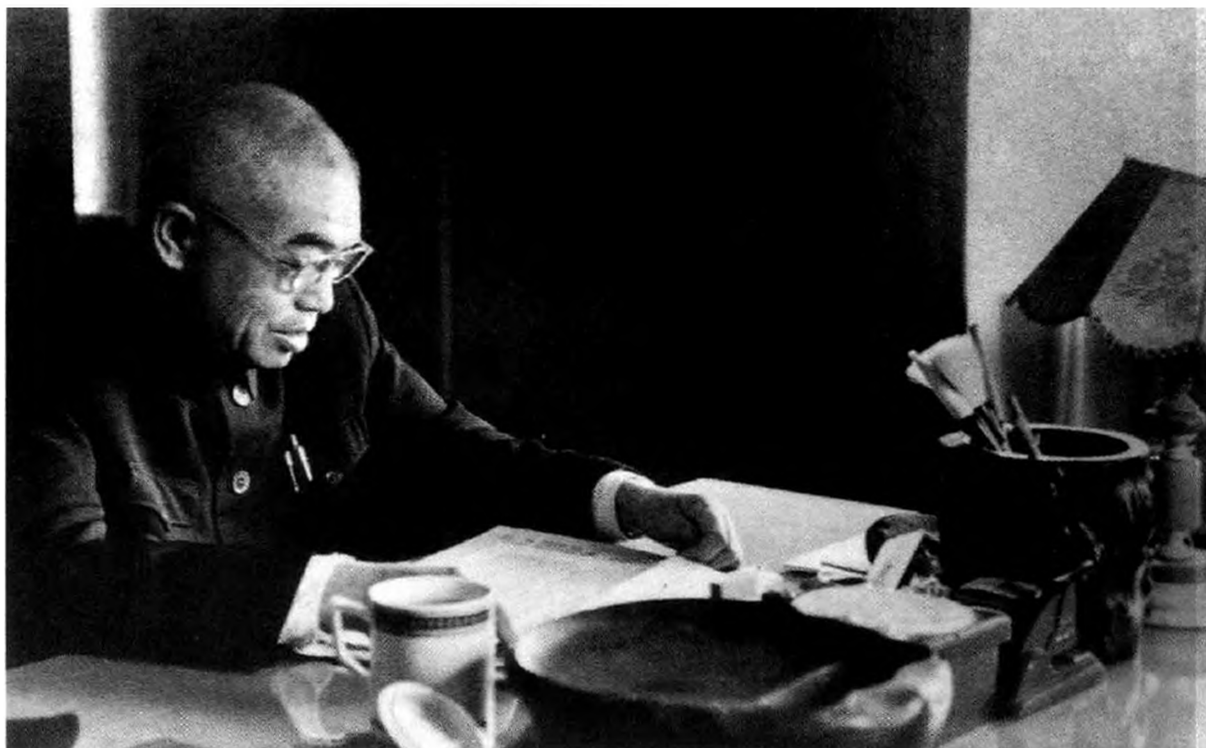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Author:	Roderick MacFarquhar
Translation Draft: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lation Group
Translation Editor:	Wang Xiaoge
Chief Editor:	Mo Huaiyuan
Design,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www.newcenturymc.com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5570-9-4
Price:	HK $128

First printed in Hong Kong, October 2012.

©2012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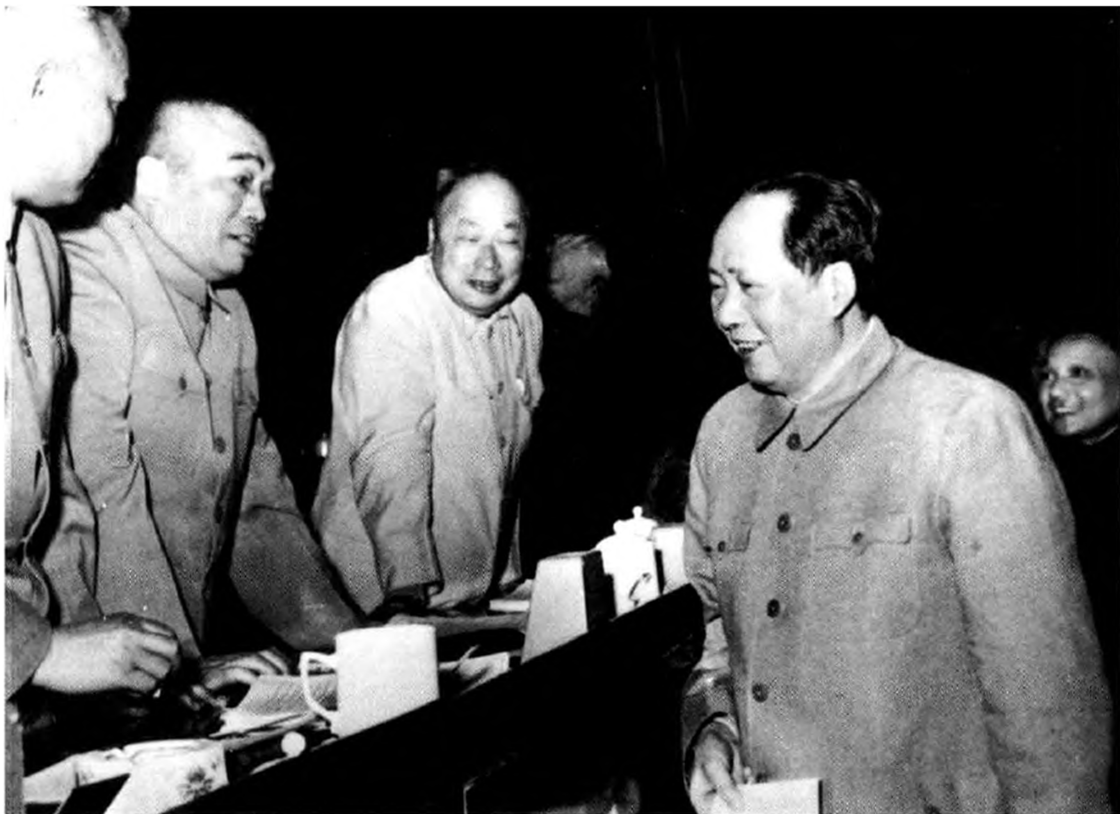
Original English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3



1956年，當蘇聯領導人米高揚率領蘇聯共產黨代表團來中國參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時，彭德懷當面問他，為什麼直到現在蘇聯黨才開始批評斯大林。米高揚毫不掩飾地回答：「當時我們不敢提出意見，假如那時向斯大林提意見，就要掉腦袋。」對此，彭德懷反駁道：「怕死還當什麼共產黨員？」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面前，毛表示，中國將致力於15年內趕上英國的經濟水平，這大概只是他的個人意願。圖為1957年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不能忽視毛對彭德懷的反感。他一定認為，在 1956-1957 年間所發生的事件中，彭始終扮演與他對抗的角色。而毛反擊的時候也不留任何情面。圖為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



大躍進產生了新的社會組織——人民公社。它的作用在幾年內就衰微了。但是，直到 1981 年，中國的經濟改革者才開始談論對它徹底加以取消。



為了追求農業產量，不得不打破農業合作社甚至縣、鄉之間的界限，導致組織和活動的軍事化、日常生活集中化和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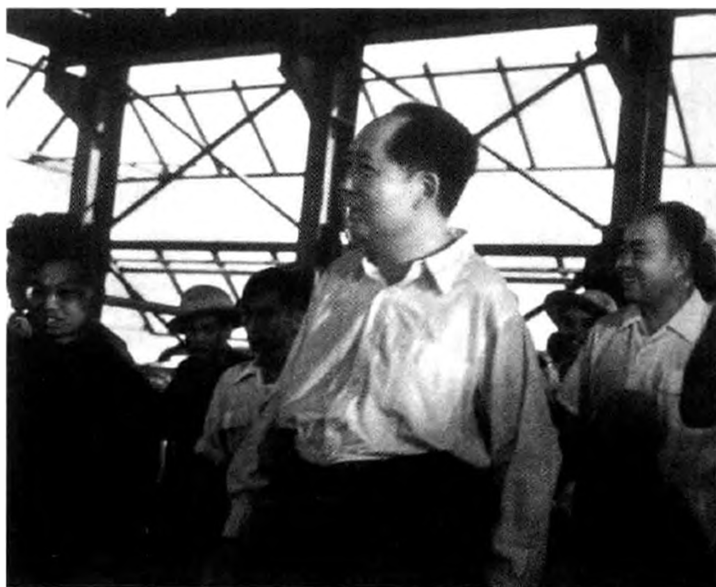
1958年4月28日，毛在幾位第一書記的陪同下——四川省（李井泉）、湖北省（王任重）、上海市（柯慶施）——從重慶乘船遊覽了壯觀的長江三峽，為時三天。右為王任重；中為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李達身後為柯慶施。



1956年冒進的前夕，毛還預計趕超美國需要50年－70年。到1958年這個樂觀的夏天，他已經大大縮短了這個時間。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些工程都在1959年10月1日之前竣工，在10個月內就建成了！



毛澤東 1958 年 8 月 13 日視察天津時，一些高等學校經營工廠的方式給他留下了印象。就在北戴河會議上，他發言讚揚這樣做法，同時他還奚落把農業大學建在城裏。



1958 年下半年毛被鋼鐵生產迷住了。之前，毛戰人，戰天，這二者都是不確定的。毫無疑問，到了 8 月，他一心投入了鋼鐵生產的戰鬥。他認為這個是確定可控的。圖為毛澤東在 9 月訪問武漢，參觀武鋼第一爐鐵水出爐。



為了響應政府全國努力推動鋼鐵生產的號召，我們也在自己的院子裏開始煉鋼。每人貢獻一臂之力。幾個小時之內，一座中國式的高爐建成，一天內便投入生產。在我們的爐子投入使用之前，我們這夥人中如果說有誰掌握一些技術知識，那就只有一個曾經參觀過幾個轉爐的年輕人。



1959 年廬山會議上，毛拒絕接受彭德懷的同志間的合理批評，並報復性地決定將他排斥到權力圈子之外。毛公開說：「我少年中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肚子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到現在也不放棄。」



1959 年，陳毅、賀龍、聶榮臻、羅榮桓、葉劍英和徐向前。



1960 年 10 月 1 日，陳毅、林彪和陳云在天安門。



鑒於與劉少奇的一系列分歧，毛可能在內心深處認為林彪和鄧小平是更合適的繼承人候選人。圖為 1960 年。

獻給拉里沙和羅里

For Larissa and Rory

自由不是在於想像中的對於自然法則的獨立，而是在於認識這些法則，並根據這些知識來能夠有計劃地運用它們，以達到一定的目的；對於外部自然的法則，以及對那些支配人本身肉體存在與精神存在的法則，都可以如此的說——這兩類法則，我們最多只能在思維上分別開來。

所以意志的自由，只是人們以事實知識做出決定的能力，因此，人對於某一問題的判斷，愈是自由，這個判斷內容的決定，將帶著同樣的愈大的必然性，相反的，猶豫不決是以無知為基礎，在許多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決定中，表面上似乎隨意地任擇其一，可是實際上它正是證明自己的不自由，自己對於自己所應該支配的對象之屈服。所以，自由是在於支配自己及支配外部自然，是根據於認識自然必然性之上的支配。

最初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基本的方面，都和動物一樣的不自由，可是每一文化的進步，都是向著自由的進步。

——恩格斯《反杜林論》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www.newcenturym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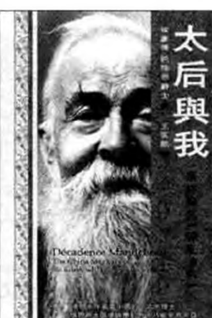












總經銷：田園書屋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56號2樓
電話：852-2385-8031
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

目錄

全譯版前言……1

前言……3
導言……7

第一編 衝鋒

第一章 毛澤東在莫斯科……13
第二章 政治局委員巡視全國……25
第三章 成都會議……39
第四章 大躍進的發動……53
第五章 人民公社的興起……77
第六章 高潮……90

第二篇 撤退

第七章 武漢退卻……115
第八章 毛澤東轉右……131
第九章 劉主席……153
附錄一：正名：人民公社名稱的混亂……172

第三編 搏鬥

第十章 廬山的激烈交鋒……177

第四編 戰敗

第十一章 中蘇分裂的出現……239
第十二章 大躍進的終止……275

結論……306

註釋……319
關於書目的說明……403
書目……405

全譯版前言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英文原版全書共三卷。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 1956-1957 年》、第二卷《大躍進 1958-1960 年》以及第三卷《浩劫的來臨 1961-1966 年》分別於 1974 年、1983 年和 1997 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文版第三卷譯文 2005 年成稿以後在中國大陸未能發表。2011 年，作者麥克法夸爾（馬若德）教授本人將全部三冊中文譯文初稿及版權購回並授予本社發表。

初稿第一卷的譯者是：王紅續（第七章、附錄一、結語、第十六章註釋、索引的一部分）、趙麗江（第十二至十三章、第一至四章註釋）、宮力（前言、第二章第二節、第八章、第五至九章註釋、附錄一註釋）、馬陶（第二章第一節、第十九章、索引的一部分）、張沱生（第十六章第一至三節、第十四至十五章註釋）、李捷（第一章第一節、附錄二至附錄六、對書目和方法的說明、書目）、鄭謙（附錄七至附錄八、附錄七至附錄八註釋、第十七至十九章註釋、結語部分的註釋）、張霞（第十七至十八章）、招嘉熾（第四章第一節、第十至十三章註釋、附錄二至附錄六註釋）、呂虹（第十四章）、徐邦明（第十五章）、霍海丹（第十六章第四至五節）、譚一青（第一章第二節、第六章）、馬文倉（第五章）、黎青平（第九章）、謝偉民（第十章）、王雙梅（第十一章）、陳子光（導言）、傅鵬鵬（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節）、楊先文（第四章第二至五節）。校譯者是：何祚康、王澤槐。最後的中文統稿工作，由宮力、王紅續、馬陶、鄭謙四人合作完成。

初稿第二卷的譯者是：王紅續（第三章，導言、附錄 1 和第十章的註釋）、宮力（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七至第九章的註釋）、李捷（第

九章、關於書目的說明、書目，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註釋）、趙麗江（第十章13—15節，第一至四章的註釋）、招嘉熾（第一章，第五、第六章的註釋）、呂虹（第六章第1節、索引）、馬文倉（第二章、第四章1—3節）、姚建平（第十章1—4節）、霍海丹（第十章5—8節）、譚一青（前言、導言、結語）、馬陶（第四章4—7節）、張平曄（第十章9—12節）、黎青平（第十一章6—9節）、傅鵬鵬（第五章）、邸文玉（第十二章1—3節、）苗彤（第十二章4—7節）、鄭謙（第十一章第10節、）孫建益（第六章2—4節）、張琦（第六章5—6節、附錄1）、馬京波（第十一章1—2節）、李強（第十一章3—5節）、張霞（第十二章8—10節）。校譯者是：戴漢笠。最後的中文統稿工作，由鄭謙、霍海丹、李捷、姚建平四人合作完成。

初稿第三卷的譯者是：何祚康、章宏遠、陸晉璋、江元譯；何祚康統校 。

本社的全譯稿補充了初稿中刪節的所有內容，並且對譯文進行了又一次校對。由殷钟睿以及王笑歌校譯；莫懷遠統校。

另外，全譯稿的最終出版得到了夏曉東先生不可或缺的幫助。

至此，完整的三卷中文全譯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終於和大家見面了。

新世紀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 1 日

前言

我計劃中寫的研究文化大革命起源三卷書中，第二卷在第一卷完成後很久才出版。或許值得重申一下我的目的：考察 1956 年—1965 年期間發生的重要事件，對於中國領導人思想、行動的影響以及中國領導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以便理解毛澤東為什麼決定推翻並重建他曾花了那麼多精力建立起來的政權。

對我來說，拖延一直是一種煩惱，但也是幸運的。1974 年—1979 年，我當下院議員的 5 年中，曾設法繼續一些研究和寫作。這部分地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並且一度使用了我在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大學舊辦公室。但是，政治活動的緊迫實際上不允許我有閒情逸致對中國 20 年的歷史事件進行研究思索。另一方面，在議會的幾年使我有了一連串政治問題和政治過程的親身經歷：領導的作用；領袖和同事的關係；政治家與職業文官的相互影響；政策的醞釀制定到實施的曲折道路；散佈在全國各地的黨的活動分子對於首都政治家的重要影響；當事情涉及緊迫的國家利益時政治家的行為；良心和現實、個人信念和黨的團結、自製和雄心之間的不斷衝突；還有時機、偶發事件和運氣常起到了關鍵作用。英國不是中國，國會不是全國人大，英國工黨不是中國共產黨，20 世紀 70 年代的低調英國社會主義遠非 50 年代中國大躍進時代的空想共產主義。由於我自己也從事政治，我希望，我能以實踐中掌握的更加深遠的眼光和理解力，來研究北京政治家的行動。

拖延寫作這本書的第二個好處是，在我離開議會前幾個月，即 1979 年初，許多新材料開始由中國湧來。這極大地豐富了我對大躍進的認識。參見「關於書目的說明」。1980 年初，在利弗霍姆信託組織的

慷慨資助下，我開始全力投人新材料的研究工作。這個信託組織的主任羅納德·特里斯 (Ronald Tress) 為我安排了款項，允許我利用機會到國外從事研究工作。

在富布賴特旅行獎金的資助下，我移居美國首都華盛頓，以研究員的身份在伍德羅·威爾森國際研究中心的令人振奮的氣氛中度過了一學年 (1980-1981)。與詹姆斯·比靈頓 (James Billington)、副主任普魯斯·吉佛德 (Prosser Gifford) 以及他們的友好而能幹的同伴在中午、下午以及晚上的交談與討論，給人以極大的知識享受。而當我需要著手寫書時，這些口頭交流便不能繼續進行，他們也能諒解。在那兒，我寫完了本書的最後一章。威爾森中心的另一些人也給過我幫助，我必須特別提出東亞規劃基金的首任幹事哈里·哈丁 (Harry Harding) 和他的助手莉莎·華爾森 (Lisa Wilson)；澤德里克·戴維 (Zdenek David) 和他的全體職員是我在華盛頓地區查找圖書資料的密切紐帶；艾洛斯·鄧恩 (Eloise Doane) 教會我使用一種文字信息處理機，並且照看機器的運轉情況；弗朗西斯·亨特 (Frances Hunter) 在必要的時候坐在門外以阻止外界的干擾。我的研究助理邦尼·格拉斯 (Bonnie Glaser) 和杰弗里·王 (Jeffrey Wang) 花費了很多自己的研究時間考查和回報了大量資料。我的第三卷書也將得益於他們的工作。

我將本書第十章的草稿作為威爾森中心學術討論會的論文，從與會主要討論者的深刻評論獲得了極大的收益。他們是：鮑大可 (Doak Barnett)、白芝 (Cyril Birch)、享利·布拉德林 (Henry Bradsher)、菲利普·布里漢姆 (Philip Bridgham)、馬里克·麥斯勒 (Maurice Meisner)、萊曼·米勒 (Lyman Miller)、查爾斯·紐哈斯 (Charles Neuhauser) 和姚偉；以及哈里·哈丁、湯姆斯·羅賓遜 (Thomas Robinson)。此外，湯姆·伯恩斯坦 (Tom Bernstein)、曳根· 道姆斯 (Jürgen Domes)、菲利普· 艾姆森 (Philip Emerson)、湯姆·費遜 (Tom Fisher)、戈德曼 (Merle Goldman) 以及戴維·貝克曼 (David Bachman) 也給我許多有益的啟示。約翰·費正清曾要求

我提交本書第一卷作博士論文，他閱讀了本書的許多章節，一直給我源源不斷的鼓勵和幫助。

我在華盛頓的時候，王啟（音譯）引導我瀏覽了國會圖書館的中文藏書；菲利普·艾姆森借給我許多資料，節省了我許多時間；在P·K·余(Yu)主持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來倫·周(Nailene Chou)和庫克森·魯克(Kwok-sun Luk)慇勤地向我提供了他們最新的出版物，其中包括令人心碎而有價值的、直到那時尚未公開的8本紅衛兵資料集。我還得益於與下列一些人的交談：羅伯特·巴蘭德生(Robert Barendsen)、羅伯特·馬歇爾·弗爾德(Robert Michael Field)、查爾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詹姆斯·格雷厄姆(James Graham)、卡羅爾·哈姆林(Carol Hamrin)、謝春牡(Chün-tu Hsueh)、保羅·克賴斯拜格(Paul Kreisberg)、尼古拉斯·拉德(Nicholas Lardy)、肯尼思·伯梭(Kenneth Lieberthal)、雷·奧林斯(Leo Orleans)、羅伯特·奧克斯耐姆(Robert Oxnam)、白魯恂(Lucian Pye)、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和理查德·維克(Richard Wich)。米歇爾·奧克森布格(Michel Oksenberg)對最初寫的幾章初稿提出過中肯的批評，他是一位經常為本書提供精闢見解和建議的人。

回到英國後，我根據新的材料修改了前面的章節。巴茲爾·克拉克(Basil Clarke)主持的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中國小組與我詳細討論了一些觀點。沃納·克拉特(Werner Klatt)曾對前幾章作過評論，現在，他以他慣有的嚴密作風查看了後面的大部分章節；早在大躍進年代，那時我正在為倫敦的《每日電訊》編年史，克拉特的忠告就曾使我從未相信那些被誇大了的產量。並且，在那幾年，亞非研究院的施拉姆(Stuart Schram)、肯尼思·沃克(Kenneth Walker)和克里斯托弗·豪(Christopher Howe)通過討論和他們所寫的文章幫助我理解了大躍進這一時期。

在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伊恩·斯瑪特(Ian Smart)和他的繼任者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一直對那些對我的書稿能否最後完成持懷疑態度的人表示他們的堅定信心。當書稿完成時，伯林·維

克漢姆 (Pauline Wickham) 以負責的態度迅即讓很有經驗而細緻的朱迪思 · 萊旺斯克羅特 (Judith Ravenscroft) 當了本書的編輯，她早些時候曾在《中國季刊》工作。當要解答編輯上的疑問時，我正有幸與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一道在哈佛大學教學。學生的提問和評論以及與他和其他同事的交談幫助我推敲一些問題，哈佛——燕京研究所和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圖書館又使我能夠迅速地解決這些問題的細節。然而，最後定稿付印的過程推遲了，因為兩位慷慨的英國學者給了我他們不久前得到的一些主要的中國「內部」刊物。很幸運，這些刊物的材料加強而不是動搖了我的論點。不必說，我在這裏熱情感謝的人中沒有一位對本書任何錯誤和遺漏有責任。

在多年的醞釀過程中，我的妻子艾米莉 (Emily) 一直對本書的問世保持信心。她一直不斷地對本書內容提出富有見識的批評。並且還試圖阻止我過分在詞句上下功夫。我們的孩子拉里沙 (Larissa) 和羅里 (Rory) 寬容了我長期在打字機旁不和全家共樂。並且，更令人欣慰的是，他們已經學會了如何裝訂《人民日報》。這本書獻給他們。

羅德里克 · 麥克法夸爾 (馬若德)
1982 年 3 月於馬薩諸塞州，劍橋市

導言

自從大躍進席捲中國以來，四分之一世紀已經過去了。但是，它的餘波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躍進是產生中蘇爭端的催化劑；莫斯科和北京的分裂又決定了中國的外交格局。大躍進意味著經濟平衡發展原則的放棄；今天，中國人仍將他們的經濟問題追溯到那個決策。大躍進的前提是動員大量的人力資源，於是，又導致了計劃生育的廢棄；當計劃生育在 13 年以後恢復時，中國已經增加了 2 億人口。大躍進激起了黨的領導人毛澤東主席和國家高級軍事領導人、國防部長彭德懷之間的對抗；黨和軍隊之間關係緊張的痕跡依舊存在於中國的政界。大躍進產生了新的社會組織——人民公社。它的作用在幾年內就衰微了。但是，直到 1981 年，中國的經濟改革者才開始談論對它徹底加以取消。[1]

大躍進是逐漸開始的。中國領導人到 1957 年秋醒悟過來。毛澤東曾試圖在非斯大林化的浪潮和匈牙利暴動之後使黨的統治方法「自由化」，但是，「百花齊放」的實驗在他面前破滅了。由他的講話而引起的意想不到的對黨嚴厲批評的洪流使許多黨的負責官員丟了臉，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他當時負責黨的組織建設，選拔黨員。黨的反擊是一場聲勢強勁的反右運動，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指派的五人小組領導，這場運動嚇倒了知識分子。五年計劃 (1953-1957 年) 的顯著成果不足以抵消日益增長的對蘇聯模式的不滿。在許多中國領導人中間有這樣一種感覺，即如果中國要打破經濟落後的局面，就必須採用新方法。關鍵問題是落後的農業不能滿足工業和迅速增長的人口的需要。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新問題[2]。

從 1368 年明王朝建立到 1949 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的 6 個世紀中，中國的人口從大約 0.8 億人上升到 5.8 億人。從 14 世紀到 18 世紀，儘管在 1588 年和 1642 年有嚴重的時疫，而每年人口平均增長率為 0.4%-0.5%，其中 18 世紀的穩定時期，每年增長高達 1%。19 世紀的太平天國起義和其它政治動亂引起人口的大幅度下降，但是，到 20 世紀，就又以每年 1% 的比率繼續膨脹。

在那 600 年中，中國的糧食產量粗略地跟上了人口的增長。中國的農民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和增加畝產提高了產量。生產增長的絕大部分原因是勞力和有機肥料投入的增加（人口增加提供了這些條件）。技術改善，如從美國引進甘薯，僅僅是產量上升的極小部分原因。

儘管在這 6 個世紀中缺少主要的技術改良，並且在 20 世紀上半葉人口還在增長，但是，中國的農業一直提供著足夠維持人口生存的糧食。到 20 世紀 50 年代，中國的水稻產量是同時期印度產量的兩倍，而且比處於國家工業化開端的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產量也要稍高一些。這個相對有利的情況能夠使中國人利用農業的少量剩餘來償付第一個五年工業計劃所需的費用。

但是，對中國人來說，追趕的目標不是日本或印度，而是蘇聯。他們正試圖與蘇聯的經濟發展方式競爭。在這個較量下，中國明顯處於劣勢。在兩國各自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夕，蘇聯的人均糧食產量是中國的兩倍。1932 年，斯大林的集體化衝擊以後，蘇聯的糧食產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產量減少了 25%，但是，由於使用高壓手段，蘇聯農民被迫向國家上繳同樣的數量。即使這樣，1932 年，當這場充滿創傷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人均糧食產量也比中國 1957 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高 60%。在那幾年，蘇聯政府對農民的態度相對說來小心而巧妙。總之，蘇聯的人口與糧食生產的平衡使斯大林能夠實施對農業的搾取方針，徵收大量糧食，用以購買機器和供應城市工人數增長的需要，而與此同時基本上完全不顧農業的發展。然而，

中國的情況是，被迫在發展工業的同時發展農業，卻只能得到比蘇聯少得多的剩餘農產品。

1949 年，國家的和平、統一以及隨後在土改中沒收地主的土地，給了中國農業一個良好的起點。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農業總產量增加了 3%，糧食產量每年增長比率約在 0.92%(有能力的外國分析家的最低估計) 到 3.78%(由中國統計員推導出的最高數字) 之間。農業投資每年增加 5%(主要是肥料和殺蟲劑) 以追求更高的增長率。但是，產量的增加主要依靠傳統技術：更多地使用勞力、通過雙季耕種更緊張地使用土地和擴大灌溉面積。

根據官方數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1957 年，糧食產量僅增長了 1.3%。工業增長率對農業增長的依賴性比蘇聯更大，1957 年的工業產量是共產黨取得政權以來第二個最低點。而且，和平、統一和公共保健措施帶來的人口增長率由上個世紀的每年 1% 增長到 20 世紀 50 年代的 2%。在人口成倍增長和大規模工業化規劃的雙重負擔下，中國農業喪失了滿足全國需要的能力。中國的領導者幾乎肯定缺乏信息，不能夠理解他們所面臨的困境的歷史本質。但是，1957 年秋末的糧食短缺是一個明確信號，意味著他們必須從根本上重新評價他們的發展戰略。[3]

在他們面前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他們可以實施一個大規模農業現代化的規劃，把資源轉移到與促進農業發展直接有關的工業，這個戰略在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被採用了；另一條是，試圖利用傳統方法，特別是增加水利設施，把農業產量擴張到極限。正是採納後一種戰略的災難性決策才導致了大躍進的出現。

中國領導人的希望是爭取達到一個經濟上的突破以使中國走上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面對自然和經濟客觀規律的輕率態度以及他們急躁冒險的行為導致了災難。但是，躍進戰略的基本構想是正確的。廣泛動員農民群眾被經濟學家看作是把剩餘勞動力轉化為資本的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方案。實行小規模具有「鄉土」

特色的工業規劃（大躍進的另一個特徵）被稱為土洋雙重技術的合理開發。[4]

或許，在 1957 年秋天的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並未提出上述精細的分析，其實，也沒有制訂總體戰略。當時，高層領導的情緒顯然是不滿意和不耐煩交織一起，重新評價 1956 年生產「高潮」的構想就是標誌。毛澤東在三中全會上的講話號召加快發展速度，農業進一步精耕細作，增加鋼鐵產量。但是，有意義的是，在這個階段，他僅僅設想到 1967 年或更晚些時候，中國年產 2 千萬噸鋼。而在一年內，他又把 3 千萬噸鋼作為 1959 年最低限度的產量。還在 1957 年，毛澤東還堅決提倡計劃生育，而大躍進期間，中國的宣傳口號就變成了「勞動力短缺」。毛的雄心和失敗在他提出的一個問題上得到了具體的反映，他說：「難道我們不能避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把事情辦得更好，更快嗎？」不過，當時，這還僅僅是一個問題，到那時為止，還沒有立即提出產量的躍進數字。也沒有提出號召動員全民行動起來。[5]

奇怪的是，毛澤東日益反對的俄國人給他提供了這樣一個挑戰的建議，在莫斯科而不是北京，毛澤東宣佈了導致大躍進災難的第一個不可能實現的設想。

第一編

衝鋒

第一章 毛澤東在莫斯科

1957 年 11 月，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人雲集莫斯科，慶祝布爾什維革命 40 週年[1]。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起的混亂以及匈牙利事件之後，再次強調團結，重申原則，這是一個機會。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到會並在會議上支持蘇聯的國際共產主義的領導地位，以鞏固團結，反對帝國主義。除南斯拉夫外，所有執政的共產黨發表聯合聲明，一致闡明了世界形勢的狀況，和平與戰爭問題，共產黨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準則。但是在統一陣線的背後，中蘇在關於如何估計國際陣營間力量的對比，以及共產主義革命應該採用和平還是暴力方式等問題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根據這個分歧，毛早就警告他的中國同事，不要他們與蘇聯人維持「不正確」的關係[2]。不過，毛對共產黨團結的承諾，以及蘇聯保證與中國進行軍事和科學方面的合作，使得毛澤東支持赫魯曉夫，並允許達成妥協。

奇怪的是，曾經在 1956 年[3]使中國感到困擾的斯大林問題，似乎沒有在莫斯科首腦會議期間中蘇代表團的會晤中出現。隨後，中國對此次會議的披露沒有提到毛關於這個問題對蘇聯的再次責備[4]。確實，10 月 6 日，在最高蘇維埃的講話中，毛認為，蘇聯共產黨克服個人崇拜的方法是「明智的」。[5]也許，當毛在莫斯科時，蘇聯人說服了毛：在秘密報告中攻擊斯大林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毛回國後不久，據說赫魯曉夫告訴中國的國防部長彭德懷，毛澤東對蘇聯攻擊個人崇拜表示理解，並給予徹底的支持[6]。也許，毛認為損失已經造成了，再因為赫魯曉夫自己正在扭轉非斯大林化運動[7]，因此沒有必要進一步進行責備。首要的問題是要表現團結，防止進一步出現災難。

根據後來北京的報道，中國代表團和蘇聯代表團之間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共產黨如何奪取政權，這是一個從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問題[8]。在 1956 年 2 月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的正式報告中，他爭辯道，共產黨人也可以通過議會方式奪取政權[9]。隨後，中國私下通知蘇聯，他們不同意赫魯曉夫的觀點。回顧歷史，他們聲稱，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八大的講話中談論到中國革命時指出，使用類推的方法，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是錯誤的，也是行不通的。[10]

在莫斯科，毛和他的同事「做了大量的工作」，與俄國人既協商又鬥爭，並與其它代表團建立聯繫。據中國方面說，蘇聯最初的聲明草案中僅僅提到了和平過渡[11]。因而，在 11 月 10 日，中國代表團向蘇聯提交了「關於和平過渡的意見概要」。其中，他們接受了關於使用和平過渡這個詞在策略上的意義。但是堅持暴力革命也必須被提到，因為，「世界上仍然不止一個國家，在那裏這種可能性〔和平過渡〕具有明顯的實際意義」。[12] 在「反覆討論」這個問題的過程中，俄國人準備了兩份聲明草案，中國準備了一個修正草案。然後，由兩黨產生一個聯合聲明草案提交給其它黨[13]。最後的聲明無疑地使和平過渡佔據了重要地位，但是由於中國的堅持，加上了一句，「非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應該牢牢地記在心中」[14]。顯然，毛認為聲明雖經修改，卻仍不能令人滿意。後來，中國有關這件事的報道指出，正是出於同志友情，不願令蘇聯難堪，毛才沒有迫切要求拒絕考慮赫魯曉夫在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論點。[15]

但是，無論中國對「和平過渡」有多強烈的意見，這畢竟不是那麼密切影響他們的問題。非共產主義國家中的革命過程取決於這些國家中的共產黨。但是另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會議上提出的關係到戰爭與和平的新理論，卻直接關係到中國。這就是如何對付美帝國主義的問題，這將是 1960 年中蘇第一次公開爭論的焦點，它已經使中國領導人激動不安。看起來似乎有些奇怪的是中國在莫斯科並沒有強調就這個問題進行辯論。

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中，赫魯曉夫承認，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16]但是他又爭辯道，自從那理論形成後，形勢發生了變化。共產主義集團，中立國家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工運動已經形成了建立和平的強大力量，正因為如此，雖然帝國主義存在，戰爭的經濟基礎仍然存在，但「戰爭並不是注定的不可避免」。[17]

在蘇共二十大會議的同時，《人民日報》支持這個「深刻的」分析，並稱之為「對那些重視和平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18]。赫魯曉夫的理論適應了當前中國關於和平共處的思想，以及他們以為緩和緊張將是國際形勢中的關鍵因素的觀點[19]。但是，到 1957 年秋天，中國對美國和國民黨所作的和平姿態沒有得到對等的反應，毛對西方所有的友好希望被破壞了[20]。此外，蘇聯 8 月份發射的洲際彈道導彈所顯示的軍事優勢以及 10 月份和 11 月份發射的頭兩顆蘇聯人造地球衛星——使他確信，對美國採取強硬路線，不僅僅是意願上的，而且從軍事力量上也成為可能[21]。11 月 18 日[22]，毛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導者的聚會上發表了他對全球兩個陣營間的實力對比的樂觀估計：

> 現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23]

除了引證蘇聯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據一個參加者說[24]，毛嘲笑美國至今甚至不能把一個土豆送進太空軌道——毛列舉了十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蒙受的主要失敗以證明他的關於國際形勢已經到達「一個新的轉折點」的觀點的正確性[25]。中國方面認為，毛所進行的爭辯，關於共產主義集團力量增強的意思是，有更多的機會去制止世界戰爭的爆發[26]。但是，真正使他的許多聽眾感到震驚

的是，他已經準備想像那種不可想像的，並冷酷地估計一旦發生核戰爭，後果將是如何。11 月 6 日在最高蘇維埃，他公開宣稱，結果只能是，西方將會被毀滅，而共產主義集團將會生存下來：

> 如果帝國主義好漢們決心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除了促使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根本滅亡以外，不會得到什麼別的結果。[27]

他私下裏用具體數字說明了他的觀點：

> 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 27 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 27 億……[28]

12 年以後，在莫斯科的另一次國際共產主義會議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談到：「這裏的許多同志也許記得毛澤東在 1957 年的會議中在這個大廳裏的講話。在令人吃驚的輕率和譏誚中，他談到了在一次原子戰爭中二分之一人類被毀滅的可能性」[29]。那時，使俄國人感到焦慮不安的並不是毛澤東的所謂譏誚，而是他的輕率。因為，他們認為毛斷言的共產主義集團的優勢並不真實。俄國人並沒有宣稱，他們在火箭方面的成就使得東方處於全面的「優勢地位」，僅僅是東方比過去「強壯」而西方比過去衰弱而已。俄國也沒有聲稱他們據有完全的軍事上的優勢。他們承認，在一場核戰爭中，蘇聯將承受「巨大損失」。[30] 因此，對毛的關於把擁有核武器裝備的美國描述成「紙老虎」特別感到震驚[31]。赫魯曉夫也許開始感到困惑，取得毛的支持是否花了太高的代價。

秘密的中蘇防衛協議

毛之所以在莫斯科能忍住沒有批評赫魯曉夫對美國的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領導確實願意幫助中國裝備核武器。10 月 15 日，簽訂了一個關於「國防新技術」協議[32]，這個協議在 8 年後才被披

露。至今，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它的細節以及它是怎樣簽訂的仍然是個謎。當中國後來攻擊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時，他們並沒有說明是哪一方提出要這項協議，什麼樣的談判導致了它的締結，以及誰代表雙方簽的字。當蘇聯人回答對它的指控時，他們唯一的辯解是，「事實」已經被「帶有傾向性地歪曲了」。他們坦率地承認了確有這樣一個協議存在，並譴責中國「無視它作為盟友的義務，並濫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相互信任的關係，已經著手公開那些有關社會主義集團國家防衛的秘密文件和情報……」[33] 由於有這樣的考慮，蘇聯明顯地不像中國那樣傾向於揭露協議的任何細節。

看起來可以肯定的是，協議包括了對中國核武器計劃提供一定程度的幫助。這也許包括轉讓有關領域裏的科學技術，而不是直接參與製造武器。提供導彈技術也許包括在內。中國使用「新」這個字眼來形容技術，這也許說明他們在有關核武器和導彈的領域內缺少專門知識。從 1955 年，蘇聯一直在核物理領域內幫助中國，並在 1958 年實現了建立一個研究反應堆的諾言[34]。秘密協議可能把合作擴展到武器領域。

毛長期以來就希望中國擁有原子彈[35]。1957 年秋天，在蘇聯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後，中國方面的急切心情使得它向莫斯科施加壓力以求分享部分的蘇聯新技術。就赫魯曉夫本人而言，他急於得到毛的支持。因為在他清除「反黨集團」之後，以及蘇聯在即將召開的共產黨首腦會議上反對波蘭和南斯拉夫，他需要支持。但他不能用經濟援助來取得這種支持。蘇聯的經濟已經過度緊張，很難應付東歐騷亂所產生的後果[36]。但是，他確實清楚毛想擁有核武器的決心。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議也許是確保中國支持的適當的辦法，同時還能進行監督，有可能多少控制中國核武器的發展。

協議簽訂後 3 天，一個大型的、高級科技代表團到達蘇聯，進行為期 3 個月的談判。在 1958 年 1 月 18 日，最終簽訂了協議。這個代表團的公開目標是要取得蘇聯對中國 12 年科技規劃的全面援助[37]。但

是在後來的報告中指出，代表團所設想的，需要進行合作研究的關鍵領域是物理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38]。也許，這次訪問是早就計劃好了的，但在事先，中國也許希望能向蘇聯施加壓力以簽訂一項包括先進武器的防衛協議。

許多分析認為，秘密協議的簽訂不僅與中國科技代表團的訪問有關，而且和 11 月 6 日到達莫斯科的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也有關係。但後者為何會在週年慶祝會前夕最後一分鐘到達，卻是不得而知。當國防部長彭德懷作為毛代表團的一個成員於 11 月 2 日離開北京去莫斯科時，並沒有跡象表明，在幾天內，他將開始扮演中國軍事代表團首腦的角色。秘密防衛協議已簽訂了兩個星期，中國科技代表團的名單也早已宣佈了。並沒有事先預示將軍們需要到莫斯科去。當然，短期內把將領組成一個負有重要使命的代表團也顯得不正常。

此外，中國軍事代表團在即將開始他們的使命前的聲明中，並沒有暗示他們的使命的目的。在 10 月 30 日的廣播中，葉劍英元帥聲明，蘇聯成功地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以及蘇聯人造地球衛星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39]。10 月 31 日，劉伯承元帥寫道：

> 今天，蘇聯武裝力量已經高度現代化，擄有最現代的戰爭武器，包括洲際彈道導彈……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軍隊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將學習所有蘇聯的先進經驗。[40]

11 月 4 日，彭德懷元帥寫道：

> 自從二次大戰以來，蘇聯武裝力量在軍事科學和技術領域不斷取得成功，而這震驚了世界。洲際彈道導彈的試驗成功表明蘇聯武裝力量在科學技術方面無可爭議的優勢地位。……蘇聯是中國武裝力量現代化的最大的榜樣。……通過向蘇聯以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力量學習，加之正確的學習方法，我們軍隊現代化的完成將少走彎路。[41]

這三段聲明的特點並不在於強調向蘇聯學習，甚至也不在於特別強調蘇聯的導彈技術，它使中國感到興奮並向毛證明了中國所在的集團在世界對陣中的軍事優勢。真正使人感到奇怪的是，3 位元帥沒有在他們的聲明中指出，自二次大戰以來蘇聯軍事力量發展的更為重要的成就——打破美國對核武器領域的壟斷。

這種遺漏看起來使人特別驚奇，因為顯然中國相信，甚至在核武器領域，蘇聯也在某些方面領先於美國，。這一點在另一篇週年慶祝的頌文中出現，但是，文章的作者是一個科學家而不是一個軍人。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核物理專家錢三強於 10 月 31 日在一個科學家的聚會上說，蘇聯是第一個生產氫彈的國家[42]，一個著名的中國科學家把蘇聯氫彈的發展列入蘇聯科技成就的第一項也許反映了北京科學界的興奮情緒，期望在新的協議下與蘇聯同行在這個領域內進行合作。而三位元帥都沒有提到這一點，意味著在簽訂協議後兩個星期，他們並沒有預見到它與他們自己有任何直接關係。

也許可以肯定，派遣軍事代表團是在毛和彭德懷到達莫斯科以後決定的，也是他們在那裏進行談判的結果。我們從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以及中方的記錄得知，在某個時候，蘇聯領導人同意給中國原子彈樣品[43]。中方的說法是，提供原子彈樣品與秘密協議有關，但不是協議中的一部分[44]。似乎是這樣，因為在莫斯科毛和赫魯曉夫第一次會談時，蘇聯領導人同意除了在協議中已經規定的技術合作外，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

用一件對方不會拒絕的可觀禮物來歡迎國家領導人的訪問，以保證一系列接踵而來的談判的成功，當然是一種為人熟悉的外交「手段」，赫魯曉夫在即將召開的首腦會議上需要毛的支持，這是不言自明的。此外，在簽訂秘密協議與毛到達莫斯科之間，赫魯曉夫解除了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的職務。朱可夫是他在夏季反對反黨集團鬥爭中的重要同盟者。這個變動在北京再次引起了疑慮，如果赫魯曉夫經常清

洗他的同伴，他的領導能持續多久。主動提供原子彈樣品，也許對毛是一種強烈的誘惑，使他暫時擱置對赫魯曉夫及其政策的疑慮。

但是，當中國最高當局沉醉於「掌握核武器」的前景之中時，毛與彭德懷之間關於中國應擁有什麼類型的武裝力量產生了不同意見。赫魯曉夫的寬宏大量也許加劇了二人的分歧。分歧基本上來自兩個方面：對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有不同看法，以及中國的國防建設缺少經費。毛的觀點似乎是，中國應該擁有核武器，有了它，中國可以在世界上扮演更加矚目的角色，同時也可以削減常規武器現代化的支出。彭如果被迫選擇的話，明顯地，他寧願擁有現代化的常規力量，並依靠蘇聯的核保護，並相信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的角色是蘇聯集團中的一員[45]。

11 月 27 日，中國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在莫斯科宴請蘇聯領導人的宴會上，在他的軍事代表團起程回國的前夕，再次強調了擁有現代化武器的重要意義：

> 在 20 多天的訪問中，英雄的蘇聯軍隊給了我們極其深刻的印象。蘇聯軍隊是擁有最新現代技術的裝備、有著良好的軍事訓練和高度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的軍隊……蘇聯軍隊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良好榜樣。我們一定把這次訪問所學到的東西帶回國去，認真研究，根據中國軍隊的實際情況加以運用。[46]

在答詞中，朱可夫的繼任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強調，共產主義軍隊的力量更多地取決於它和黨以及人民之間的聯繫，而不是現代武器。朱可夫事件發生後，採取這樣的路線並不奇怪，它重新確定了蘇聯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47]。總之，馬利諾夫斯基擁有這個職位大部分是由於他公開表示在這個政策上與赫魯曉夫合作。也許更耐人尋味的是，馬利諾夫斯基表明蘇聯願意將他們的隊伍建設經驗傳給中國。這也許表明蘇聯將不會向中國提供大量的現代常規武器。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原因可能是出於毛的反對。

對莫斯科的訪問也許是毛與彭德懷之間關係的轉折點。赫魯曉夫如此輕易而舉撤換朱可夫，使得毛彭二人本來已經微妙的關係更加複雜化。[48] 蘇聯既已承諾提供毛澤東所需要的援助，他可以全力按照他自己的意願重新制定解放軍的建軍路線，彭德懷不支持就得離開。

赫魯曉夫對毛的鼓勵

不管他們兩位在外交政策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有多麼深，毛和赫魯曉夫發現他們對經濟的看法令人滿意地相似。甚至在他去莫斯科前，毛曾為赫魯曉夫在蘇聯大規模實行經濟權力下放感到鼓舞，他也試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在中國進行同樣的變革[49]。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對經濟發展的進程的看法是相似的，而不僅僅是在對共產主義經濟的理想結構上具有一致的意見。

從性格上看毛和赫魯曉夫都是大無畏的樂觀主義者。在 1957 年 5 月，赫魯曉夫聲稱，「在最近的將來」，在肉類、黃油和牛奶的人均產量上超過美國，最遲不超過 1961 年。他嘲笑那些謹慎的蘇聯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懷疑這個目標能否達到。他指出，有許多集體農莊在這幾方面的產量大大增加了。赫魯曉夫雖然未使用毛澤東的語言，但口氣如出一轍，「這些怎麼能用數字計算？這是個政治奇跡。」[50]

在毛 11 月到達莫斯科時，赫魯曉夫已經堅信肉、黃油、牛奶的目標一定能達到[51]，並準備提出更雄心勃勃的目標以便和美國進行經濟競賽[52]。11 月 6 日在最高蘇維埃所作的施政方針發言中，赫魯曉夫宣稱：

> 同志們，我們計劃設計者的計算表明，在以後的 15 年中，蘇聯不僅能夠趕上，並且能夠超過美國目前的重要產品的產出量。[53]

赫魯曉夫講話中提到的「重要產品」指的是是鐵礦石、生鐵、鋼、煤、石油、電力、水泥以及消費品如糖、羊毛紡織和皮鞋。[54] 在他私

下與毛的談話中，赫魯曉夫也許早已提出，根據不久前宣佈的七年計劃，到 1970 年，蘇聯將在主要工業的人均產出和總產出趕上美國[55]。

甚至在他聽到赫魯曉夫 10 月 6 日講話之前，毛已說服了他的同事們發動一場新的經濟運動，在短期內恢復不現實的十二年農業規劃，提出「多、快、好、省」的口號[56]。9 月至 10 月，在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上，毛闡明了，有兩種做事的方法，「一種產生較慢和較窮的結果，另一種則產生較快和較好的結果」[57]。他明顯傾向於後者，而劉少奇則在次年 5 月，在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上詳細闡明了這個主題。那時，大躍進運動已經發動了。面對毛和劉聯合下決心要把中國從蕭條的經濟形勢下解救出來，向前發展，許多謹慎的政治局委員如總理周恩來，負責經濟的副總理——商業部長陳雲，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和財政部長李先念——都不再反對「冒險主義」了。[58]

毛訪問莫斯科對 1958 年發動的「大躍進」的重要意義在於，毛回到了國內，不僅個人受到赫魯曉夫雄偉的計劃的鼓舞——這些計劃在 1964 年蘇聯領導人下台後被稱之為「輕率的計劃」——而且帶回來一些信息，蘇聯經濟計劃制定者正準備發動一場工業和農業的運動，而這種運動在中國幾年前由於他們的中國追隨者對毛施加壓力而被放棄。[59] 赫魯曉夫的冒險主義破壞了周恩來以及他的同事們原先準備對新「高潮」加以節制的任何希望。所倡議的經濟運動依然沿襲 1956 年採用的「高潮」說法[60]。還在莫斯科的時候，毛修訂了《人民日報》一篇社論上關於 1956 年「躍進」的口號——「多、快、好、省」，[61] 並致信北京，警告財政部的謹慎的幹部：中央領導不支持他們。[62] 更重要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面前，他表示，中國將致力於 15 年內趕上英國的經濟水平，這大概也只是他的個人意願。[63] 12 月 2 日，毛從莫斯科回國不到兩週，劉少奇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大會上公開闡明了毛的新的經濟目標：

> 在 15 年內，蘇聯能夠在許多重要的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上趕上或者超過美國，在同樣的時間內，我們應該在鋼鐵以及其它重要工業產品上趕上或者超過英國。[64]

5 天以後，毛的新目標得到國家計劃的主要制定者李富春的贊同。當他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會議上講到五年計劃時，李預計，在 15 年結束的時候，中國的鋼產量將達到 4000 萬噸，英國目前生產 2000 多萬噸鋼，將不可能達到那個指標。他表示了他的信心，中國在 15 年內將在煤、金屬切割機床、水泥及化肥等方面的產量超過英國。[65]

李雖然也承認，計劃的制定者對執行「多、快、好、省」的政策不夠重視，並保證他們在將來會更加注意，[66] 但他宣佈的新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業指標與一年前中共八大會議上確立的指標相比並無太大飛躍——除了一個例外。鋼——1200 萬噸 (李的新指標)，1050 萬噸至 1200 萬噸 (八大指標)；煤——2.3 億噸 (李的新指標)，1.9 億噸至 2.1 億噸 (八大指標)；電力——440 億千瓦 (李的新指標)，400 億至 430 億千瓦 (八大指標)；水泥——1250 萬噸 (李的新指標)，1250 萬噸至 1450 萬噸 (一年以前的指標)。石油的產量比 1956 年計劃要低一些，這是由於開採的困難。指標增長的幅度都不大，除了化肥。可能那是因為它對十二年農業計劃的重要性，李把 1962 年的指標從八大確立的 300 萬至 320 萬噸提到 700 萬噸[67]，達到修訂的十二年計劃中指標的最高水平 (500 至 700 萬噸)。[68]

比李富春制定的 1962 年的工業目標更使人感到驚訝的是他的農業目標。在八大會議時，「經濟保守主義」盛行，「急躁和冒險主義」受到攻擊。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包括：2.5 億噸的糧食，240 萬噸的棉花以及 2.5 億頭豬。[69] 14 個月以後，中共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標誌著「經濟保守主義」的失敗，恢復十二年農業計劃，重提「多、快、好、省」的口號，之後，李富春提出了新的五年計劃目標，低於上一次制定的目標：2.4 億噸的糧食，215 萬噸的棉花以及 2 億頭豬。[70]

顯然，無論毛和劉少奇在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態度和看法如何變化，他們並沒有把這些變化變成計劃委員會的硬指標。毛在晚些時候指出，全會只對有關水利和積肥作出了具體的決定。[71]計劃制定者大概很憂慮，沒有足夠的、新的蘇聯援助，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很難達到。而蘇聯的援助將很難再得到，因為蘇聯已經決定把東歐各國的經濟負擔包下來，以防止那裏進一步發生騷亂。[72]如果要達到一個生產高潮的話，就使得動員勞力成為不可避免的了，中國唯一富裕的資源是勞力。如果要制定一個與生產高潮相適應的全面指標，毛本人也許得做很多工作。這需要時間和對全國的巡視。這也許就是八大二次會議悄悄延期的原因。這次會議兩個月前原定在 1957 年年底召開[73]。

第二章 政治局委員巡視全國

毛一向相信到基層視察的重要性，他認為這是避免官僚主義的手段。這一次他主張高級官員一年應該花 4 個月時間離開首都去收集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因為中央僅僅是個加工廠而已。他說：「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覺得腦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東西。」[1]

到 12 月中旬，離開北京的有毛、陳雲、鄧小平（黨的總書記）、彭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中央書記處鄧的副手）和薄一波（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2]。事實上，到這個月月底，政治局的大部分其他重要成員離開了北京[3]。在 1958 年的前 4 個月，他們忙於在全國視察，主要在各地而不在北京互相協商，雖然他們之中大多數不時回到首都。協商的目的顯然是評價基層的政治經濟形勢，在他們瞭解情況的基礎上制訂大躍進的計劃。大躍進是 2 月初在人大年度會上初步提出而在 5 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加以完善並正式發動的。

毛本人巡察的地方不比任何領導人少，從他在這個期間的活動可以瞭解政治局視察的情況。他在杭州——他很喜歡的城市，位於浙江省中部沿海——呆了大約一個月，或許是從 1957 年 12 月初到 1958 年 1 月初[4]。在這裏，1 月初，毛召開了一系列最高層和地方領導人會議中的第一次會議[5]。1 月 6 日，毛乘飛機到達國家最南端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首府——南寧。在那裏，他召集了另一次會議。1 月 11 日和 12 日，他在會上作了講話。儘管工作緊張，水溫也只有零上 17℃，他還是兩次在邕江中游了泳[6]。1 月 23 日，他到達廣州[7]。到 28 日，他已回到北京，召開了第 14 次最高國務會議和一年一度的人代會[8]。毛出席了 2 月 11 日人代會最後一次會議，而在 13 日他在東北訪問了

遼寧省省會瀋陽附近的煤礦業中心——撫順[9]。毛很可能在東北度過了 2 月剩餘的大部分時間，因為那裏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區。但是到 3 月 5 日，毛已到達西南——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3 月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那裏度過的[10]。其中，他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花在在該省省會成都召開的另一次最高層會議上。這次會議至少從 10 日開到 22 日。但是在會議期間或會後，他仍抽時間進行了視察[11]。28 日，他在幾位第一書記的陪同下——四川省（李井泉）、湖北省（王任重）、上海市（柯慶施）——從重慶乘船遊覽了壯觀的長江三峽，為時三天。[12]。他在湖北省會武漢結束了這次水上旅行，在那裏一直呆到 4 月 11 日[13]。在這期間，4 月 6 日，他在漢口——武漢三鎮中最重要的一個——的一次會議上講了話[14]。12 日，毛到了他的故鄉湖南的省會長沙。[15] 4 月 15 日，他在廣州。4 月 30 日在該市做了我們已知的本次視察的最後一次講話。[16] 大約在 5 月初，共產黨中央在北京舉行了第四次全體會議，為 5 月 5 日開幕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作準備。[17]

杭州會議和除四害運動

關於 1958 年 1 月上旬舉行的杭州會議，實際上沒有什麼東西透露出來[18]。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毛用他的個人聲望支持了全國公共衛生運動。這個運動是以消滅四害為中心的。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是在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一項專門條目中確定的。[19]

毛很長時間以來就強調公共衛生的重要性。早在 1944 年 12 月他就寫道：

> 統治者利用人民的無知，而我們則利用人民的才智。我們必須使人民從無知和不衛生的狀態下解脫出來。各地的政府和黨的組織應當把文化教育工作的四個項目放到議事日程上——報紙、學校、文藝和衛生。

遲至 1957 年 10 月，他還告訴最高國務會議他對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中除害條文有特別的興趣[20]。的確，這個綱要的再度提出鼓勵了

省級當局發動除四害運動。例如在四川，省報在 11 月 30 日就這個問題發了一篇社論，接著在 12 月 25 日登出了一個省級黨政機關聯合發出的正式通知[21]。在 1 月初，毛參觀了杭州的一條小巷，這是著名的衛生示範單位，詢問了四害的流行情況[22]。然後在 1 月中旬的南寧會議幕後，毛發出了一個指示：

> 應該開展一個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今年，應該實行逐月檢查，這樣才能打好必要的基礎。各地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把除四害以外的其他目標也合併到運動中去進行。[23]

幾天之內北京市就掀起了一場旨在推進除四害運動的競賽熱潮，[24] 而在 1 月 27 日，四川日報就公佈了它的第一張對照表，載明全省各地消滅四害的數字。早些時候，新華社的一篇來自重慶的通訊宣佈，該市 200 萬人口中平均每天有一半人從事對四害進行的鬥爭。從 12 月 24 日開始，他們已殺死 23 萬多隻老鼠，掘出差不多兩噸蒼蠅蛹，清除了 600 多噸垃圾。[25]

> 關於這一運動，新華社一篇描寫人民解放軍部隊如何有創意的通訊很有趣：許多部隊的官兵熱心研究老鼠和麻雀的活動規律。掌握了這些資料，他們就制定了具體辦法和實施計劃。駐在上海的某部官兵發現麻雀晚上藏在樹林裏，因此很難捕獲。於是他們想出一個新辦法。他們搖動樹枝，麻雀被從窩裏驚動出來，用手電筒迷惑麻雀的視覺，然後用竹竿去打它們。這個辦法被認為很有效。副排長王樹華一竹竿就打死了 4 個麻雀。[26]

一位地位相當於中國顧問的蘇聯科學家目睹了另一種捕獲這些倒霉麻雀的技巧。他後來是這樣回憶的：

> 一大早，我就被一位婦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吵醒了。我衝向窗戶，看到一個年輕婦女正在臨近的房頂上來回跑，她手裏拿著一根竹竿，竹竿上拴著一個布條，一邊跑一邊拚命地

揮舞竹竿。突然，那婦女停止了叫喊，顯然是為了喘息一下。下面的街上響起了鼓聲，她重又開始那可怕的尖叫，瘋狂地舞動起她那特別的旗幟……我注意到，在這個旅館的高層樓上，穿著白衣服的婦女們正揮舞著床單和毛巾，這是阻止麻雀落在這棟房子屋頂上。[27]

當然，從取得政權以後，政府一直集中精力抓公共衛生。成績斐然，一位前來訪問的英國記者[28]甚至寫了一本書，名為《中國沒有蒼蠅》。1958 年運動的特點是規模大，群眾熱情高。一位加拿大科學家親眼看見了下面的事件：

我們穿過一條鐵路線，據說是一通往一座煤礦的支線——看到了一幅令人震驚的場面：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正在鐵路邊忽東忽西地發瘋般狂奔。顯然在用一塊布拍打著地面。

「噢，她正在追打一隻蒼蠅」，田先生說。這件事最生動地說明了中國如何萬眾一心消滅蒼蠅、臭蟲、麻雀。我在中國近一個月期間，沒有看見一隻麻雀，我堅持數蒼蠅，看見一兩隻蒼蠅只有 15 次。那只不幸的蒼蠅還正在被飛奔著的一個中國人追趕著。只有一次，我在西安附近的一個小火車站台上看到一群蒼蠅。它們圍著幾隻竹籃嗡嗡著，每隻竹籃裏裝有 4 只小豬，等待著上船載運。[29]

雖然這些活動在來訪的外國人看來是怪誕的，但是在 1957 年末和 1958 年初，正是人們這種消滅害蟲的真誠努力鼓勵中國領導人去發動一場全國規模的公共衛生運動。他們深信，必定成就非凡。1 月 29 日，《人民日報》公佈了毛在杭州進行衛生視察的消息，強調了主席個人對除四害鬥爭的關心。接著，在 2 月 12 日，公佈了共產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的開展除四害運動的官方指示。這個後來證明出於毛之手的指示透露，有 11 個省和 6 個大城市計劃 5 年內消滅四害。在這些城市中，南京計劃 1958 年完成，北京計劃 1959 年完成[30]。在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運動的同時，意在同所有的主要疾病作鬥爭。這些最

頑固的疾病當中有一種就是血吸蟲病或叫作肝蛭病（埃及血吸蟲病），而 1958 年 6 月宣佈[31]，江西省有一個縣已經根絕了這一種可怕的病。這使毛興奮異常，以至夜不成寢，寫下了大躍進第一年中唯一的一首詩：[32]

綠水青山枉自多，
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
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
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
一樣悲歡逐逝波。[33]

在文化大革命中，1958 年被說成是毛在衛生戰線取得成績的一年。除了除四害群眾運動以外，還提出加強中醫研究，改革醫學教育。[34]事實有力地證明：這場改革本身遠不是那樣壯觀，而其政治意義，回想起來卻比人們所能想像的複雜得多。[35]

南寧會議和對財政部的批評

1 月 11 日和 1 月 12 日，毛在南寧會議上兩次講話，雖然他發出了關於公共衛生的指示，但那不是他講話的主旨。從這些講話和毛 31 日簽署的《工作方法六十條》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大躍進第一年的開頭，毛的目標在於改變黨和政府內部的作風，發動幹部投入計劃中的生產高潮，為此，首先要重新強調國家機構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正是在南寧，毛第一次提出了這樣一種想法：經過 3 年全力以赴的努力取得經濟上的突破。「苦戰三年改變中國面貌」的口號首先由安徽省提了出來。最初，毛對此有保留，但是該省領導人給他看他們的蓄水計劃，從而說服了他。不過，出於文字上的謹慎，他把人們熟悉的「基本上」

這個副詞加上，來修飾「改變」這個動詞。[36] 毛自己評論南寧和隨後的成都會議時說：

> 我們堅持了自己的觀點，批評了那些對敢於前進的反對意見。我們決定不允許對敢於前進作進一步的反對。我們提出了一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如果沒有南寧會議，就不會形成這條總路線。[37]

毛成功地擊退了反對意見。後來有人認為，南寧會議以及此前的三中全會標誌著那些警告要反對冒險主義的人的失敗。[38] 被毛批評的人中有周恩來總理、商業部長、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和國成立之初的主要經濟決策者陳雲以及財政部長李先念。[39] 按照毛的說法，商業部「剝削和欺騙人民」。[40] 但是他的主要火力對準經濟保守主義的堡壘——財政部。

世界各國的財政部大都倡導謹慎的經濟政策，在中國，更有充分的理由採取這種態度。僅僅十年以前，在國民黨政權的末期，中國經歷了現代歷史上最糟糕的通貨膨脹[41]。國民黨對物價的失控疏遠了一直是他們忠實支持者的城市資產階級。共產黨人恢復了物價的穩定，是他們最初的最重要的成就。[42] 財政部官員們不願意看到這個成績被冒險主義者的經濟政策葬送掉。而正是他們，至少在毛看來，是阻止1956年早期躍進的主要責任者。[43]

財政部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在杭州討論過了，在周恩來的建議下，部裏一些高級官員應召出席了南寧會議[44]。在那裏，他們受到毛口頭的申斥，顯然是殺雞儆猴。其間，他稱，自從1956年的躍進剎車以來，他一直抵制他們的文件。他解釋說，《人民日報》一篇重要社論引用他的語錄，「用毛澤東的話去反對毛澤東」，以此論證剎車是必要，他認為這是濫用，對此他感到特別憤怒[45]。毛之所以失了常態，顯然是因為憤怒，但是還有一個更為含義深刻的理由。毛普遍批評了國家機構呈送過多的冗長、咬文嚼字、高度技術性的文件給政治局，而財政部遞送的文件不但有上述種種缺點，且總是拖沓到最後一分鐘[46]。

結果，按毛的話來說，政治局就變成了一個橡皮圖章，就像「杜勒斯的聯合國」[47]。

就此問題，毛提出的解決辦法部分體現在一個月以後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在該條例32條和33條中，他談到信息和文件的呈交：

> 把材料和觀點割斷，講材料的時候沒有觀點，講觀點的時候沒有材料……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觀點，不說明贊成什麼，反對什麼，這種方法更壞……，材料不要多，能夠說明問題就行。解剖一個或幾個麻雀就夠了，不需要很多……在會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材料。……開會同寫大著作是有區別的。
>
> 一般說來，不要在幾小時內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觀點，而這些材料和觀點又是人們平素不大接觸的……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幾小時內下幾百厘米的傾盆大雨。[48]

文件要及早呈送，語言精練。其實這只部分解決了毛提出的問題。他的話外之意是——怎樣確保對國家機構的政治控制。《六十條》或許有這樣一點暗示：毛對國家機關幹部的譴責比對政治局成員——例如財政部長李先念，也是財政部的發言人——的譴責更嚴格些。第33條規定，「一年要找幾次機會，讓那些平素不大接觸本行業務的人們，接觸本行業務。」[49]這種說法有些含糊，但這可能適用於李先念。人們都知道，李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他的國務院辦公室[50]，在那裏監管食品、商業、對外貿易部、中國人民銀行和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以及財政部的事務[51]。他不在的時候，財政部的工作是由副部長吳波負責的，[52]吳從建國伊始一直是部內一名高級官員，在3任相繼的部長領導之下工作[53]。對李先念來說，把政治局觀點強加在吳波和他的財政部的頭上是可能的嗎！或者，李作為國家機關幹部在政治局的代言人，相信其主流觀點的旗手不可避免地會發揮很大的權力，這才更正常？

對有著龐大機構的政府都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則差不多是同樣困難的，即使那些政府有更為充足的理由。對毛來說，重要的是應該通過正確的途徑向政治領導提供信息，以便就經濟如何發展達成共識，然後在政府機構中推行。1956 年 11 月，在共產黨中央的二次全會上，他建議預算應該進行三輪討論，這樣，非專家也可以對財政問題有足夠的瞭解，並對專家們提出的建議進行有根有據的判斷[54]。而在南寧，毛明確表示，為了取得對經濟機構必要的政治領導，他準備利用他的個人聲譽，推動大躍進。

參閱他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毛使讀者認識到這個序言在 1956 年躍進的發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他表示，可能有人會認為序言是對他個人崇拜的一部分，這也絲毫奈何不了他，重要的是它的影響[55]。這些話的意思就是，如果有必要，1958 年他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在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試圖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支持被他稱之為向自然開戰的號召[56]。前一年的「大鳴大放」使各地都煥發出積極的精神。「過去不能做的事現在能做了，過去無法辦到的事現在有辦法了」。「中國是一窮二白」，毛補充道，這個短語幾個月後發表，成為很有名的一句話，但是窮，就要求革命，一張白紙，好寫漂亮的文章。[57]

毛對非共產黨的聽眾採取懷柔態度。毛說他很高興，因為在民主黨派的高級幹部中不是很多人成了右派分子，而在出席最高國務會議的人中只有 10 個。中共在路線上犯過錯誤，民主黨派也不例外。無論中共還是民主黨派，都是舊社會的產物，所以中共產生了高崗、饒漱石，民主黨派也有類似人物，這顯然指右派分子。[58]

毛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改造的一貫要求，用了一個短語「又紅又專」，幾個月間變得流行起來，他強調其必要性：

> 紅是政治，專是業務。不紅只專是白色專家，搞政治的，如只紅不專，不熟悉業務，不懂得實際，紅是假紅，是空頭政治家。搞政治的要鑽業務，搞科技的，要紅起來。十五年趕上英國，要有成百萬、上千萬，忠於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59]

這勸勉中有一層意思值得注意：毛似乎已經決定再次利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專業知識。6 個月以前，他一直在講，迫切需要培養一大批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不僅是忠實於無產階級事業的知識分子[60]。很可能，在 1958 年 1 月大躍進的開始階段，由於赫魯曉夫自己對躍進的愛好，毛暫時恢復了對蘇聯模式的興趣，加之 1 月中旬中蘇科學合作協定又簽訂了。這位主席想重新實施 1956 年躍進的策略，給國家幹部和資產階級專家施加壓力，以便從傳統的斯大林的發展模式中得到更大的啟發和幫助。在杭州會議期間，毛用飛機把 3 位上海的知識分子接來，就中國科學發展的前景進行了深入的討論[61]。直到同年晚些時候，毛才認識到通過大力加強小型、本土的，不需要多少專業知識的技術有可能縮短這一條發展道路。

當 1956 年躍進的失敗仍記憶猶新的時候，為了贏得知識分子接受使經濟迅速增長的思想，毛向他們強調不斷革命的必要性，他把這叫作趁熱打鐵。毛把自己的觀點同托洛茨基的觀點作了區別，提出托洛茨基企圖提前歷史的步伐，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就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62] 他斷言：

> 勁，可鼓而不可洩。有了缺點、錯誤，用大鳴大放的方法來糾正，不要潑冷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63]

《工作方法六十條》

沒有跡象表明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公開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而且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即《六十條》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黨內文件。[64] 有一點也是清楚的，《六十條》第一次是在某次會議上出

台的[65]，估計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之類，這次會議可能舉行於 1 月末，也可能是 2 月初。[66]

《六十條》的大部分條文都是毛根據他在杭州和南寧會議上聽到的情況寫成的。在一些情況下，他只是簡單地記錄了別人的觀點。關於規章制度的「重要的一條」是由劉少奇根據同地方幹部商量的結果寫成的。並不是所有的條目都涉及工作方法問題。毛自己指出，一些條目涉及工作任務，一些條目體現了理論和原則。文件被發下傳閱，徵求意見，以便在政治局批准以前進行修改。[67]

《六十條》是毛試圖在新的「生產高潮」[68] 或「大躍進」中給幹部提供一種工作手冊。大躍進這個名詞是第十六條中第一次提出的。原來它只是用於水利運動的一個名詞[69]。沒有《六十條》的指導，廣大幹部在新的躍進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困難面前就會再度陷人猶豫不決。[70] 第十三條根據安徽的經驗，總結出毛希望廣大幹部掌握的態度和方法。該條還確定了一張大躍進的時間表。

> 十年決於三年，爭取在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其他地區的時間可以略為延長。口號是：苦戰三年。方法是：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71]

大躍進真的從 1958 年持續到 1960 年。

在最長的兩條（21、22）中，毛精心地表達了大躍進哲學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不斷革命和又紅又專的觀點[72]，第三個組成部分——衝破一切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清規戒律——在一條「重要的」條目內加以詳述，很明顯出自劉少奇[73]。有趣的是，這一條存在內在的矛盾，聽起來似乎在鼓勵土法上馬，實際上還是嚴密監控。[74] 這或許反映了劉的態度中互相矛盾的兩種情緒——向前躍進的熱情和對組織紀律的偏愛——但是條文中所暗示的「一般規律」還表明，贊成躍進的領導人們還不準備或不能夠完全無視周恩來和他的同道的警告，因為決策者在「多快……」的大躍進口號之後，加了他們喜歡的詞修飾:「按比例發展」。[75]

在多快好省地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提下，在群眾的覺悟提高的基礎上，允許並且鼓勵群眾的那些打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的創舉。[76]

但是隨著這一年時間的進展，這種小心的、平衡不同意見以達到增長目的的做法讓位於毛澤東語錄，也同時是在《十六條》中的說法，「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77]

至於政府在大躍進的作用與黨有何區別，僅在劉的第二十三條中保留了一點有實質性的闡釋：即附和黨中央批准新的規章制度。但是在地方一級，正是黨才有權調查和廢除舊的制度；其他條文還表示以後黨應該在管理經濟方面起干預作用。或許意義最重大是第二條，列舉了黨委應當抓的十四項工業方面的工作，聲明這些項目可以為《工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提供一個基礎[78]。很清楚，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草擬一個工業發展的四十條綱要來與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相匹配。如果這樣一個綱要制定出來，那麼必然導致精心編製出來的政府各部的五年計劃的廢棄，即使在那階段，《六十條》還是根據這些計劃擬定的。[79]

甚至在五年計劃沒有被推翻的情況下，《六十條》的第九條就已暗暗埋下了動搖精密計劃的基礎——統計制度的種子。到那時為止，中央當局的做法始終是在某個既定的年度為各省確定統一的國家指標。[80] 在第九條毛介紹了一個新制度，即三套生產計劃，事實證明是有害的。中央當局有兩套：第一套必須完成的，也是要公佈的；第二套是爭取完成的，但不公佈。中央的第二套計劃作為地方的第一套計劃必須完成。然後地方也有自己的第二套計劃（加起來一共三套），這個計劃是要爭取完成的。[81] 事實上，這種雙重的計劃制度不僅限於中央和省兩級，它還被延伸到縣一級。這樣實際上就出現了第四套生產計劃。這種制度的直接結果是指標的不斷加碼。首先國家指標下達的過程中，就已層層加碼；在接到基層樂觀的預測數字以後，中央當局再次把指標調高。這就產生了另一次加碼高潮，或者如一位學者所

指出的，在指標上的大躍進[82]。這種擁有兩種指標——公開的是最小值，私下的是最大值——的制度，持續了整個大躍進期間。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即使公佈了的生產預測夠高了，但在背後，毛本人正在確定更鼓舞人的目標——從而直接導致 1959 年的統計工作失敗。

大躍進的許多主要內容都在《六十條》中有所闡述：高積累（第 16 條）、大集體主義（第 17 條）、試驗田（第 18 條）[83]、廣泛推廣先進經驗（第 19 ～ 20 條）、中學和大學都辦農場和工廠（第 48 ～ 50 條）、在地方一級建立化肥廠和農具研究所（第 52 ～ 53 條）、推廣高產良種（第 54 條）、鼓勵種植薯類（第 56 條）。但是大躍進時期意義最為重大的兩個產物——人民公社和土法煉鋼卻沒有預料到。

在沒有預料人民公社和土法煉鋼的情況下，《六十條》真正使不明真相的人感到驚訝的事同大躍進本身沒有關係，這就是毛在最後一條正式發佈一條私人聲明，即他想辭掉兩個主席職務中的一個——國家主席職務。他解釋說，這樣他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可以獲得更多的時間集中到黨的工作上，這對他的健康也有好處。這個建議已得到政治局、中央和地方許多幹部的同意，認為是個好主意。現在各級幹部都應該瞭解這件事並提出他們的意見；那些不贊成的人可以放心，在國家出現緊急情況的時候，毛還可以再次擔任國家主席這一職務。[84]

在本書第一卷中我已闡述過，毛曾說，要在政治局常委中退居二線，決定辭掉一項職務是第一步[85]。毛一直震驚於蘇聯近期的權力鬥爭，他把這種鬥爭部分地歸結到斯大林的繼任者缺乏聲望，顯然指的是他挑選的法定繼承人馬林科夫。為了防止同樣的事情在中國發生，毛希望把他的同事們樹立成可信賴的理所當然的國家領導人。這樣在他死後，他們就有資格領導國家了。他這樣做就是要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逐漸把權柄移交過去，讓政治局常委第一線的成員——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越來越多地決定事情。如果作進一步探討的話，還可以斷定：毛的這個精明的願望，是為了樹立他比斯大林高明的形象。

早在 1956 年，毛便有此打算。因此，宣佈他將辭掉國家主席一職，並不表示是對 1957 年整風運動出了問題的一種自我批評。然而，有些幹部可能還是有此懷疑，尤其是在毛簽署《六十條》不到兩週之後舉行的人代會上，另一位領導人周恩來也辭去了他的職務之一——外交部長，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攻擊黨的政策，周負有責任。[86]。我將研究周辭職的深意，並說明，毛是如何考慮到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從而保護他的。

1958 年的人代會

1958 年的人代會是一個分水嶺，這是中國領導層最後一次在重要的公開場合上，顯示出依然致力於相對保守的經濟目標，儘管他們口頭上擁護躍進。兩位主要的經濟發言人，財政部長李先念，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都對自己的部門在 1956-1957 冬的保守主義表示歉意[87]。但是對新的預算，李所能做的讚頌僅僅是說它「反對任何保守主義傾向」[88]，而由薄宣佈的產量指標也是不過分的：糧食——1.96 億噸，比 1957 年增長 5.9%；棉花 175 萬噸，比 1957 年增長 6.7%；薄對兩者的增長率都只能以「相當高」來形容[89]。1958 年的工業指標也不比農業指標更令人興奮：鋼——624.8 萬噸，比 1957 年增長 19.2%，1957 年比 1956 年增長 17%；煤——15072.4 萬噸，比 1957 年增長 17.2%，1957 年比 1956 年增長 16.6%；電力 224.5 億千瓦／小時，比 1957 年增長 18%，1957 年比 1956 年增長 14%[90]。此外，鋼和電力較高的增長率僅僅是根據前一年新建成的工廠的數目測算出來的數字，而不是通過額外的努力來達到。[91]

不過，在向 1958 年的人代會提交的經濟報告中出現了兩個意義重大的數字。李先念宣佈，國家對農業的資助 1958 年將有顯著的增加，特別是國家在農業上的支出（主要是基本建設）將比 1957 年增長 40.78%[92]。幾乎一年以前，毛說過，「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

80%以上的農業大國，因此，它的工業和農業必須同時發展」。[93] 增加農業支出是執行這個政策的第一步。

1958 年人代會之後，對發展進程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的，是關於大修水利的報道。這場水利運動是自從 1957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這個問題的指示之後掀起的。1957 年 10 月到 1958 年 9 月，最初的灌溉計劃是 4390 萬畝[94]，到 1957 年 10 月，增加到 6180 萬畝[95]，然後增加到 9200 萬畝[96]。薄一波宣佈，1 億男女勞力日以繼夜的辛勤勞動使得最新指標在4個月之內輕而易舉地超額完成，到 1958 年 1 月 31 日，已灌溉的土地已達 11700 萬畝[97]。後來透露，1958 年和 1959 年過分強調蓄水造成河北、河南、山東鹽鹼地大面積地增加，給農業生產造成嚴重損失[98]。但是在 1958 年初，用紀律武裝起來的農民勞動大軍取得了驚人的成績，充分說明 1958 年的大躍進——這個口號是周恩來提出來的，全國人大會議結束的時候在公開場合使用，成為全國的戰鬥口號[99]——可以按照同 1956 年的躍進完全不同的原則組織。毛倍受鼓舞，開始了他的又一輪視察。到了 3 月初，當他為成都會議到達四川時，已經做好準備排除殘餘障礙，發動全面的生產高潮。

第三章 成都會議

成都，四川省的省會，位於一個廣大的平原的中部，由於縱橫交錯的灌溉系統，很早以前就以「陸上水鄉」著稱。兩千多年前，一位蜀郡太守修建的水利工程使它變成世界上土地最肥沃，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1]。這個城市反映了週邊農村的繁榮。半個世紀以前，這個西南的名城那「寬闊的，清潔的街道，飾金的商店招牌，無數的飯店、酒店、藥店，或者那充滿著貴重的川絲和舶來品的大商店」，曾經激發了年輕的朱德的豐富的想像。[2]

50 年代末期，成都剛超過 100 萬人口，按照中國的標準不算多。[3]但是作為中國人口第一大省的省會——當時四川人口已達 7200 萬——和重要的餘糧產區之一的中心，成都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可小視的[4]。四川人在中央委員會所佔名額較多，在政治局正式成員中有：朱德、鄧小平、陳毅、劉伯承，形成了以省劃分的第二個人數最多的集團，這使得成都的政治意義更為重要。[5]。劉和鄧作為共產黨的第二野戰軍的司令員和政委，在從國民黨手中奪取四川時起了主要作用，雖然成都本身事實上是由湖南人賀龍解放的[6]。這三個人在共產主義政權的初期繼續留下來管理整個西南地區——四川、貴州、雲南。鄧和賀龍離開以後仍和四川保持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後來被毛澤東主義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斥之為陰謀。

1958 年四川的關鍵人物是該省黨的第一書記李井泉。他是江西人，在賀龍和劉伯承的部隊裏打過仗。四川解放後一直留在那裏[7]。有證據表明，在 1956-1957 年間，李井泉並不是毛的放寬限制開明實驗的支持者之一[8]，但是他顯然熱情支持毛發動 1956 年的躍進。在國家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公佈之後，四川制定了自己的十二年農業綱

要。[9] 李同樣是 1958 年大躍進的熱情支持者，儘管文化大革命期間作了相反的論斷[10]。毛在成都會議上讚揚李井泉在生產高潮中能夠保持冷靜[11]，似乎已經確定地選中了李和上海黨委書記柯慶施，對他二人青眼有加。柯是毛在以前開展整風運動的忠實支持者[12]。在訪問四川期間，毛多次視察城市和農村，一般情況下是由李陪同的，最少有一次還加上了柯[13]。3 月 18 日會議結束之後，主席從重慶坐船作了 3 天水上旅行，穿過長江幾個峽谷去武漢。這 3 天，毛是由李、柯和毛的另一名親信湖北省黨委書記王任重陪同的[14]。顯然，一場躍進如果要在地方分權的前提下取得成功的話，那麼省委書記的銳意支持是關鍵。因此，大躍進初期的大部分黨的會議都是在中國最重要的省份之一舉行的，而毛對該省領導人也表現出異乎尋常地信任，這也可想而知。

毛反對向蘇聯鸚鵡學舌

在成都會議上已知的三篇講話中[15]，毛轉而對束縛中國幹部思想的枷鎖進行了批判。這樣他們就能在計劃好的躍進中解放思想，大膽工作。他的批判集中在兩條戰線：反對奴隸般地依附蘇聯模式和反對對專家的過分崇拜。在他 3 月 10 日的第一次講話中，毛的矛頭直接指向第一點：

> 規章制度是一個問題。借此為例，講一講思想方法問題：堅持原則和獨創精神。國際方面，要和蘇聯、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和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友好……。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獨創精神。學習應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16]

毛簡短地用中國革命中的一段不幸的歷史提醒他的聽眾，這段歷史就是革命被受莫斯科訓練或受其影響的教條主義者領導的時候[17]。革命勝利以後，在經濟、文化、教育、軍事上一直都存在著蘇聯的有害的影響。經濟上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和計劃領域，還有銀

行和統計工作。較少受蘇聯影響的有商業、輕工業、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由於黨中央的關注和對這些領域的控制。[18]

毛解釋說，蘇聯的這種占支配地位的影響得以發揮，是「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沒有人能分清正確與錯誤。我們只能照抄別人」。他回憶自己在 3 年的時間裏怎樣被迫不吃雞蛋和雞湯的。「因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後來又說能吃了。不管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了都奉行。」甚至在教育方面，中國共產黨人在 1949 年以前有「解放區」的經驗可循，但蘇聯的模式仍然照搬[19]。毛本來應該附加一句，他的許多觀點只是重複前一年「資產階級右派」的批評而已。[20]

由此產生的另一個問題是，雖然中國的確有一些自己的經濟專家，但是他們屬於資產階級，他們的影響只得用蘇聯的那一套加以抵消。加之，「對全面的經濟形勢都沒有認識。而認識中國同蘇聯經濟形勢的區別，更談不到。」[21] 不過，毛斷定，「蘇聯的設計，用到中國大部分正確……大企業的設計、施工，一般說來，可以自己搞了……對蘇聯，對中國的情況，都有些瞭解了」。[22]

如果毛當初只想抵消對蘇聯模式的過分屈從，那麼他提供一系列類似於雞蛋和雞湯或更嚴重的例子，以說明盲目照抄的危險就行了。例如，周恩來幾年前即已警告外交部，在外交事務上不要太密切地仿照蘇聯[23]。但是毛走得更遠一些，他的講話的一大部分用來分析 1949 年以來中蘇政策的不同。他有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幾點有趣的評論：「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無論什麼時候畫我和斯大林的像，我總是比斯大林矮一些。」[24] 毛對正確的個人崇拜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作了區分，正確的個人崇拜就是要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提出的真理，而不正確的崇拜則是簡單盲目的服從。[25]

> 1956 年，斯大林受批評，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像，我們掛像。[26]

毛攻擊赫魯曉夫以突然詆毀斯大林的方法向中國施加壓力，雖然他斷定中國大多數黨員對此感到憤怒，但又補充道，有些人屈服於蘇聯的壓力，想推翻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27]，這裏，人們感到毛的憤恨：他的一些同事，利用非斯大林化來削弱他這位主席的地位。[28]

毛討論赫魯曉夫粗暴進行非斯大林化，說明其在中國內部的反響是很敏感的，但是事實上他只舉出解放後中蘇論爭的一個事例。毛提醒他的聽眾，「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違背斯大林意願的」[29]。他告訴他們，他在解放後立即訪問莫斯科和斯大林，爭論了兩個月。他承認，在雙邊防務條約和其他一些問題上，他作了重大讓步：

> 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30]

結果是中國被迫接受東北（前滿洲）和新疆（中國的土耳其斯坦）的「殖民地」地位。只有中國人和俄國人才允許在那裏居住[31]。毛直言不諱地承認他在蘇聯的壓力下不得不讓步。當劉少奇等人被指控在 1960 年莫斯科世界共產黨會議上同赫魯曉夫勾結時，不應該忘記這一點。[32]

儘管莫斯科條約締結了，但斯大林仍然認為中國革命是假的。直到朝鮮戰爭中，中國人表現了他們的勇氣，斯大林才改變了他的看法。[33] 毛暗示，即使那以後，斯大林仍拉攏高崗，而高在斯大林死後一年內即受到譴責[34]。接著而來的是對非斯大林化的分歧，而當毛在 1957 年 2 月作關於內部矛盾的講話的時候，俄國人顯然在私下斥之為「鼓動自由主義」，並拒絕接受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內，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存在著矛盾的概念。[35]

毛有喜歡談說歷史的傾向，從成都會議長篇論述中蘇關係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毛認為讓中共高級成員記住某些事實是必要的。這並不是說毛已預見到60年代中蘇之間的尖銳爭端。但是根據莫斯科和北京前兩年的關係，毛可能順理成章地感到，進一步的衝突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想像的。幹部們應該為此作好精神準備。在這期間，同蘇聯的文化合作在成都會議結束後幾週內也因而大幅度縮減了。[36]

但是，首要的任務是把中國從蘇聯經濟模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毛說明了這一過程開始於 1956 年 4 月他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37]。大躍進時期分管農業的譚震林，在 1958 年底的一次講話中直接證實了這一點。他說，赫魯曉夫（於 1956 年 2 月）使斯大林的神話破滅了，這也就使人們從蘇聯經濟發展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來[38]。思想解放的進程隨著毛 1957 年 2 月關於矛盾的講話而繼續。在這個講話中，他提出「工業和農業應同時發展，工業化的道路，合作化和控制生育」的建議[39]。毛贊成控制生育的論述——這種論述在官方出版的文本中刪去了——[40]是令人吃驚的，因為這意味著他還是贊成這個新政策，而大躍進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龐大的人口造就輝煌，這基於一個普遍認識，即人多力量大。直到 3 月，毛似乎還在探索躍進的戰略。但是他對蘇聯模式的批評表明，經過 3 個月在國內的視察，他對赫魯曉夫經驗的熱情已經減退。無論赫魯曉夫對經濟發展的觀點和毛有多麼類似。中國的經濟情況完全不同於蘇聯，毛無時無地不記得這一點。他必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

毛指責專家

毛澤東對第二個目標的批評對大躍進戰略的形成關係重大。他對專家日漸失去尊重，轉而完全依靠群眾的勞動。直到 1 月底，毛還在表示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好感。他甚至在成都會議上還表明，更多的知識分子支持中國共產黨是整風的結果[41]。在 4 月杭州會議上，他

提倡「冷卻」對知識分子的階級鬥爭[42]。甚至到了 7 日，還派其他高級領導人——鄧小平、彭真、陳毅、柯慶施——一再向知識分子保證開創新的政治氣氛，在政府的領導下充分發揮作用[43]。知識分子反過來也向黨「表忠心」，也進一步交了心[44]。

但是，儘管有這樣持續的矛盾心理，從成都會議產生的主要思想傾向來看，是對有效地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起著完全相反的作用。在 3 月 22 日成都會議上的最後一次講話中，毛澤東對過分尊重「教授」的行為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 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麼都不行。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龍恩」的殘餘。我看再不能忍耐了。[45]

毛澤東指出，世界上大多數作出重大貢獻、創立新學派新思想的人，都是尚未學富五車的青年人，如孔子、耶穌、釋迦牟尼、路德、馬克思、達爾文、孫中山等。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鬧革命時，也都是 20 多歲的青年人。「講學問，他們多，講真理，我們多。」[46]

毛的意思是說，真理比知識更重要，紅重於專。他並非說真理或者紅本身就足夠了。他作為受過辯證法教育的領導人，總是能夠掌握潛在或實在矛盾的兩個方面。但大多數中共黨員短於知識，長於「真理」。根據最高領導的旨意，他們在躍進期間漠視專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尤其是成都會議對統計工作中教條主義的批評，損害了國家統計局（經濟機制的監督機構）的信譽，並為後來 3 年光怪陸離的浮誇鋪平了道路。[47]

為了壓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毛澤東提倡的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大量出版黨辦刊物。他透露說，陳伯達（毛以前的政治秘書，他多年的知交）最近忙於向科學家宣傳「厚今薄古」，[48] 並且改變了對編輯工作的厭惡，同意辦一個黨的理論性雜誌。他鼓勵各省都辦自己的理

論刊物[49]。毛讓各省主辦省級理論雜誌，只要他們每年給中央雜誌送五六篇文章。他確實別出心裁，提出：「搞點民歌好不好？」[50]現代詩歌沒有人讀，結合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新詩，只能在民歌傳統的基礎上創作。

> 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勞動人民不能寫的找人代寫……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成千萬首的民歌，這不費很多的勞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詩舒服一些。[51]

顯然，毛澤東作為一位詩人，對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名義創作的詩歌是大歎不行的。但在同時，他又希望現代詩人不要像他那樣常常大作古體詩[52]。毛可能也想壓倒那些在百花齊放時期令他失望的專業詩人和作家。當然，這種願望正如他們所預料到的那樣，在大躍進期間實現了，在此期間收集或寫出了千千萬萬首不知其數的民歌。[53]

河南指明了方向

除了詩歌以外，毛在成都會議上並沒有發動大躍進；大躍進是兩個月以後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的產物。但是，他在 3 月 20 日發表的講話確立了大躍進的總路線最終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54]——並且透露，河南省已經制定出了一個宏偉的規則，別的省都覺得必須向河南看齊。

河南的規劃就是，保證十二年農業規劃的主要目標——把糧食產量提高 100%或者更多，建立完整的水利系統，消滅四害和文盲[55]——在一年內完成。僅僅是除四害的指標，就可以表明河南的領導人特別是新來的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他曾經是毛 20 年代中期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的學生）[56]在不斷升溫的躍進熱情中達到了何種程度。就在一個月之前，在下令展開全民除四害運動的指示後，河南只保證 1958 年在 5 個市縣裏消滅四害[57]。而現在，省委領導人準備完成自己省內 100 多個縣市除四害的指標。河南的所有提議都顯然難以實現，這就使毛陷於兩難的窘境之中。他倒不會指責河南領導人「急躁冒進」，因為

那樣做就會冒抵制躍進熱情的風險，特別會犯他所譴責的計劃者犯過的錯誤，那個錯誤中斷了 1956 年的躍進進程[58]。另一方面，他顯然不太願意把全權委託給省委領導人。他不讓公佈指標，並告誡其他省不要制定像河南省那麼高的指標[59]。如果在下一個 8 年或 10 年才完成十二年農業規劃，那也不會冒被開除黨籍的危險。毛澤東預見到，這種水平的指標在工作中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缺點」，在人民中也會造成「過度的緊張」。[60]

> 建設的速度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 10 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它，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根、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有些指標高，沒有措施，那就不好。總之，要有具體措施，要務實。務虛也要，革命浪漫主義是好的，沒有措施不好。[61]

毛澤東這番告誡顯然起了作用。河南的方案意味著 1958 年達到糧食增加 100%的目標。但成都會議似乎規定了增產 10%～20%的指導性目標，而 18%～27%的增產建議明顯地被看作「左傾」。3 個月以後，後一種建議已開始被視為中間路線，甚至是「右傾」了[62]。況且，儘管毛提出了公開的謹慎告誡，但由於他建議秋收後比較各省產量增加的數量，這又明顯地鼓勵省委第一書記們互相進行激烈的競爭。[63]

農業機械化問題

即使成都會議之後對會議提出的指標的合理性一直存在懷疑，但農業生產的大幅度增長則已進入議事日程，所以會議顯然又討論起完成增產目標的方法問題了。機械化是主要議題，為此，會議制定了題為《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的文件，接著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64] 這個問題後來導致了毛和他的一些同事之間的分歧。因此，不妨概略地說一下問題的背景。

按一位學者的說法，從 15 世紀到 20 世紀之間，中國的農業工具技術普遍處於停滯狀態。「在華北平原上，20 世紀使用的大多數工具，早在北魏時期（公元 5 世紀），可能是漢代（公元 3 世紀滅亡）就被普遍應用了[65]。這種技術的停滯不前，不可能是由於農民保守。人們一般認為，沒有內燃機和電動機，就不可能有進步。[66]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時存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他們認為機械化之所以值得進行，僅僅是因為美國和蘇聯已經廣泛地走上了機械化道路。[67]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唯一分歧是，機械化必須像蘇聯那樣在合作化之前實行呢，還是在合作化之後實行。劉贊成蘇聯的模式；毛持否定意見，並且用 1955 年合作化運動成功的事實來證明他的觀點。[68] 毛澤東並不是看不起機械化；相反，他是重視它的。1955 年 7 月 31 日他在關於合作化的講話中說：

> 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在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遭到極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69]

顯然，毛澤東也犯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錯誤，即相信農業生產率是同經營規模大小緊密相連的[70]，因而他就看重機械化。但到了 50 年代中期，有些中國領導人開始意識到中蘇兩國之間土地和勞力兩個生產要素之間比例的差別。1956 年，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明確地說，「中國農村擁有如此巨大的人力資源，具有如此複雜的耕作制度，因而推行機械化不大可能……如果實行了機械化，農村勞動力的剩餘問題就會非常尖銳，以致於無法解決。」[71]

1957 年春，一份似乎基於實地調查的報告送到了毛和其他領導人手中。這個報告認為：

> 依照任何國家的情況來看，發展農業機械常常是人力匱乏的結果。農業機械的重要作用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就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來講，農業機械的作用是無足輕重的……因此，由於我國人力和物質資源十分豐富，農業機械化的技術政策是否正確就值得研究了。[72]

這個論點得到了農業部部長廖魯言的贊同。[73]

雖然上述觀點看來具有表面上的說服力，然而這個觀點是有缺陷的。在農村最繁忙的季節，勞動力短缺是一個普遍的現象。[74] 毛澤東青年時期在農村家鄉無疑記得這個事實[75]。況且，中國共產黨在十二年農業規劃中提倡通過種雙季作物來增加產量，並鼓勵人們從 1956 年起實行這種耕作制度。這樣一來，就促使了勞動力供給的緊張[76]。1955 年，毛澤東含糊其詞地說明他的信念，機械化不會使幾百萬農民失業。但是，面對不熱心於機械化的人提出的論點，他也許感到有必要委託康生（政治局候補委員，文化大革命中是毛的最親密顧問之一）這位堅決支持機械化的人為他作些研究。[77]

在毛澤東的觀點和威望之間權衡，似乎出現一種妥協。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黃敬 1957 年末寫道，外國的農業機械常常不適合於中國農田的地形，並且總要消耗掉中國稀少的石油。但他又批評了認為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目標與機械化直接相矛盾的「偏見」。他補充說：

> 最近，我們組織了一批幹部和技術員，派他們到農村作土地考察。我們還同農業和水利部門的人交談。我們開始認識到農村的真實情況，與我們過去所認為的大不一樣。毛主席關於農業機械化的指示使我們對這個問題理解得更清楚了，認識到我們過去的想法是錯誤的。[78]

在這篇文章以及 1958 年初的另一篇文章中，黃敬說，他清楚地意識到，機械化可以幫助解決多季作物種植和農忙季節中的問題。[79]

成都會議《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的文件體現了妥協的觀點，其要旨就是，農業工具的改進是刻不容緩的任務[80]。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談到機械化問題時說：

> 改良農具的群眾運動，應該推廣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義很大，是技術革命的萌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因為幾億農民在動手動腳，否定肩挑的反面……。以機械化代替肩挑，就會大大增加勞動效力，由此而進一步機械化。中國這麼大的國家，不可能完全機械化。[81]（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成都會議的文件完全接受了毛澤東的上述指示[82]。有必要指出：這個指示並不設想在機械化方面搞任何躍進。8 月，在毛澤東發出的一項指示中只包含一個具體的命令，即要求討論哪些工具可以適用滾珠軸承[83]。文化大革命期間確實發表了一篇擁護毛主義的文章，此文在論述機械化問題時透露說，1962 年 9 月和 1966 年 2 月，毛主席號召在 25 年內「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84]。如果在這前後相距三年半的時間裏沒有使毛改變他的發展規劃的時間長度的話，那麼人們就會設想，在規劃中所提的 25 年不過是粗略的估計。

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沒有對機械化發表任何更具體的評論，因而可以猜想，後來被說成是毛主義的機械化戰略的其他要點，只是在會議的文件中大致勾畫了出來。這些要點，包括依靠農業生產合作社來發展和管理機械化，分散製造和研究農業機械。

顯然是早在 1956 年夏天，康生就開始調查依靠農業生產合作社來掌握機械化的可能性[85]。1956 年，拖拉機的使用數量幾乎上升了 150%[86]。在那一年，全國只有大約 11%的拖拉機歸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有，國營農場擁有的數量接近 37%，倣傚蘇聯拖拉機站建立的農機站擁有的數量則超過 50%[87]。對斯大林來說，拖拉機站是保證黨控制農民和向國家提交公糧的關鍵因素[88]。但是，可能康生並不像文化大革命材料所暗示的那樣，敢於提出擺脫蘇聯模式的創造性想法。蘇聯

領導人在康生 1956 年春訪問東歐時，很可能已經私下裏爭論起拖拉機站的作用問題了。

康生的研究促使黑龍江省和北京地區 1957 年開始了試驗。離北京不遠的南苑農機站把它的機器交給農業生產合作社管理，但保留所有權（「國家所有，集體管理」），而黑龍江省的百泉農機站則把它的機器徹底地移交給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社所有和管理」）[89]。1958 年 1 月[90]，赫魯曉夫宣佈將要取消拖拉機站。中國的農業部這時召開了農機站負責人會議[91]，並在關於農機站的報告中肯定了上述試驗。劉少奇也贊成這個政策，顯然是由於他感到拖拉機站經濟上不太合算[92]。但中國人遠比俄國人謹慎。報告再次宣稱，「目前，我國的國有拖拉機站仍然是農業機械化的主要形式」，並反對拖拉機站放棄職能或者用包袱的傾向。[93] 3 月，成都會議提出，「農業合作社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農業機械化」[94]。國務院第七辦公室（監督農業部及有關的部）於 5 月提到 1 月會議的報告時主張，「把農業機械交給農業生產合作社管理，將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95]。但是，第七辦公室的說法是非常自相矛盾的，因為它一方面指示農業部就將農業機械轉交農業生產合作社而出現的新問題作調查和報告，另一方面，它又同意農業部關於 1 月會議的報告，這個報告如同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樣強調繼續發揮農機站的作用。因此，雖然 1958 年農業生產合作社（後來為人民公社）擁有的拖拉機數量擴大 7 倍，但顯然主要是把大量增加進口的拖拉機輸送給農業合作社所致；因為在同一年中，農機站擁有的拖拉機數量的下降不到 10%[96]。中國的這種形式同蘇聯恰成鮮明的對照。在蘇聯，到了 1958 年末，「大多數」拖拉機站的機器轉交給了集體農莊[97]。赫魯曉夫比中國人大膽得多。

中國人在成都會議上作的關於委託地方工業製造農業工具和機械的決定，在用語上也是十分謹慎的：

> 農業機械的製造（包括機引農具、新式畜力農具和改良農具），除了大型的和技術要求較高的農業機器以外，一般的應該

以地方工業為主。由各個地方或者經過各個協作區，根據當地的條件和需要，自行安排；中央有關部門在技術和經驗交流方面予以幫助。對於地方工業基礎較差的地方，在協作區內省間調劑仍然不能解決的，中央有關部門應當組織調劑[98]。（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前一年蘇聯的赫魯曉夫對幾十年來由斯大林建立的龐大經濟結構進行全面分權改革，與之相比，中國人在農業機械生產領域的措施（文化大革命中回顧歷史時曾大肆吹捧這些措施）看來幾乎是猶豫不決的[99]。

毛澤東對機械化新戰略的其他兩個方面，也已經表了態。1958 年 1 月，他提議省政府應當建立研究所，負起「不可推卸的責任」來研究怎樣改進農業工具、農業手段以及小農機[100]。他沒有建議由省一級指導對先進農業機械的研究，這是比較明智的。在同一個月裏，毛還率先恢復了 1956 年躍進時當作沉重負擔的雙輪雙鏵犁的名譽[101]。他視察了浙江農業研究所，1 月 28 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別人向他演示雙輪雙鏵犁作用的照片。意味深長的是，正是照片所拍攝的這個南方省份，1956 年提出這些犁難於在泥漿田里使用。3 天後，這個省的報紙發表了一篇讚頌雙輪雙鏵犁的社論[102]。在 2 月底召開的一個會議上（可能也在浙江[103]），交流了在南方使用這些犁的經驗，農業部長廖魯言[104]在這個會議上作了報告。據說在一年前，廖魯言是竭力反對使用雙輪雙鏵犁的部長之一，他認為那種犁好比是「豬鼻子上插大蔥——裝象」[105]。

這種言論並沒有使廖像後來所說的那樣變為一個反毛主義者。1957 年 10 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原先規劃草案中 600 萬雙輪雙鏵犁的指標是純粹的「主觀主義」，必須取消[106]。但不管怎麼說，廖魯言在 1958 年 2 月考慮為這種犁「恢復名譽」[107]。毛澤東可能堅持主張把它作為給 1956 年躍進恢復名聲的一個象徵。據說，他在成都會議上講，研究問題時，應該注意意識形態，因為有些問題屬於意識形態

領域。曾經注定要成為廢鋼爛鐵的雙輪雙鏵犁現在是供不應求了，這就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108]

但也有這樣一種可能，即中國的領導人都認為，如果農業戰線要有一個大發展，國家就不會丟棄 1957 年積壓在倉庫中的 80 萬個雙輪雙鏵犁[109]，特別是如果加以改進這些工具甚至也可以在水田中使用。3 月 10 日幾個部的聯合指示正是這麼說的[110]。但是，不管有多少領導人準備促進雙輪雙鏵犁的使用，勸阻的人也是不少的。1956 年 1 月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中提到了這種犁，但 1957 年 10 月中央三中全會提出的十二年農業綱要修改稿中就沒有提。有材料證明，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對這個綱要的第 2 次修改稿中仍然沒有提[111]。

然而，即使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對待機械化像對待生產指標那樣謹慎，成都會議的氣氛卻不意味著要束縛那些與會的省級領導人。[112] 毛澤東通過批評蘇聯模式和資產階級專家，削弱了制定經濟政策過程中的的兩大保守因素。通過在成都會議上再次批評周恩來和陳雲，他又減少了對經濟決策持保守態度的兩位主要人物的影響[113]。另外，他還暗示，歡迎提出與他相左的意見，說明他甚至願意緩和自己之前的警戒言語[114]。鄧小平在會議上也表現出同樣的態度。這樣一來，成都會議在解放中國高級幹部思想方面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意味深長的是，鄧小平在會上說，毛自從蘇共二十大以來一直在解放思想[115] ——為他們在大躍進期間制定宏偉計劃和目標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四章 大躍進的發動

5月5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標誌著由劉少奇公開號召15年超過英國開始、歷時5個月的大動員達到了頂點。[1] 在這一時期裏，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視察全國，召開會議，聽取匯報，發出告誡等。現在，看來著手這樁事業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於是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莊嚴地公開發動大躍進。

1958年召開的代表大會表明，在發展政策上毛劉的聯盟達到了高潮。兩人都投人到主要基於動員中國5億農民群眾的全面經濟躍進中去。劉少奇公開地這樣做了，而毛澤東則是不公開的。然而，甚至在他們的聯盟最鞏固的這個時刻，兩人在思路上仍有明顯的差異暴露出來，這很能解釋兩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最後分裂的原因。

劉：有組織的動員

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了主要報告。這是不足為奇的，18個月前他在八大一次會議上曾起了同樣的作用。但是，在1958年的背景下，劉的作用在政治上顯得更加重要。

雖然劉少奇1956年的講話暴露出他和毛之間的重要分歧，但那一次的講話實際上是環顧時局，是對前景的一個展望，是一個論述11年革命和統治的情況報告。[2] 然而，劉少奇1958年的講話目的在於發動一場新的運動。把這次運動同1957年的整風運動相對照是令人深思的。

在1957年，毛澤東不得不擔任主角，他利用自己作為國家主席的地位在兩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定基調的講話。劉顯然沒有在這兩次會議上講話，他也沒有在黨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而毛在這次會議

上則作了另一次重要講話。劉局限於向省委組織講話，並且論述了有些不同於毛的方針。這就表明，他顯然並不完全贊同這個運動。[3]

在 1958 年，劉緊跟在毛的後面，並且大躍進運動可以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公開提出，而不是在低一級的政府工作會議上秘密地下達。[4] 這位主席從而可以有把握地說，他這一次將得到絕大多數黨的高中級幹部對這個政策的支持，而不會像前一年那樣了。[5] 儘管毛澤東喜歡勇敢地直接把個人的意志下達基層，他可能也樂於「利用正常渠道」貫徹他的意圖。

而且，劉少奇說明大會通過的政策時，表現了對毛澤東的一種新態度，這種態度同他在八大一次會議報告中的調子恰成鮮明對照。在 1956 年的那次講話中，劉只在幾處提到毛的名字，他的目的似乎是要貶低這位主席的作用。[6] 而在 1958 年八大二次會議上，劉講到毛時又回復到他 1945 年向黨的七大作報告時採取的高唱讚歌的調子。[7] 他以讚許的口吻回顧了過去 3 年毛澤東所有政策的創造性，當然他仔細地區分了當時得到和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支持的政策[8]。他特別稱讚毛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進經濟發展的想法：毛為《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寫的序言[9]、「多、快、好、省」的口號[10]、十二年農業綱要[11] 和《論十大關係》(在劉少奇的講話中第一次公開了它的基本內容)[12]。劉總結他的講話時說，「由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上述方針和政策，在實際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13] 在論述經濟發展的速度問題時，劉宣稱，從 1949 年以來，中央和毛澤東的觀點都是一致的；他們「歷來的主張同樣是很明確的，即應該採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絕慢些差些的方法。」[14]

按劉少奇的說法，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的勝利，帶來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革命運動」，毛關於要更快地發展經濟的號召已經「迅速地深入億萬勞動人民的心中，並且已經轉變為無窮的物質力量」[15]。

結果，在 1958 年春天，大躍進已經在各條戰線上發動起來。1958 年前 4 個月的工業產值比 1957 年同期高 26%；4 月份增長 42%。1958

年鋼產量將達到710萬噸，煤將達到1.8億噸。增長率遠遠高於原先計劃規定的指標，並且會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任何一年的增長速度。[16]在農業戰線上，最引人注目的躍進是在水利方面，它證明群眾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17]。

在概述了其他領域中的巨大進步之後，劉少奇用一段表達大躍進基本精神的話作了總結：

> 事實是這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社會主義革命，要求人們精神的解放；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人們精神的解放，又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躍進；這種生產力的躍進，又繼續刺激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改進和人的思想的前進。人們在不斷地改造自然界的鬥爭中，不斷地改造社會和改造人們自己。[18]
>
> 馬克思預言過，無產階級革命將使我們進入「會有1天等於20年」的偉大時期。如果說我們過去在革命中經歷過這樣的偉大時期，那末，我們現在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不又是在經歷著這樣的偉大時期嗎？在這裏，人們看到了：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怎樣湧現出自己創造歷史的無窮無盡的力量和智慧。[19]

人們可以從這段話中看到，劉將大躍進看成黨的領導和群眾力量相結合的成就。在另一段話中，他強調了經濟發展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

> 要知道，機器是要人來創造和發動的，物質資料生產是要經過人的努力才能實現的。事在人為，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是一個偉大的動力。[20]

毛澤東自己恐怕也不會表達得比這更加透徹了。

但是，比較一下兩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就會看出他們在躍進的方式上存在著重要的差別。不過，他們都相信人比機器更重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個差別。

對劉少奇來說，關鍵問題是對群眾的能量加以駕馭和組織。黨的領導是至關重要的，事實上，他用一整段話來論述這個問題。[21] 在其他地方，他還談到「動員」世界上最大的勞動隊伍的必要性，談到為了發展經濟而「組織」中國的革命農民的重要性[22]。即使在強調敢想、敢說、敢做的革新者的意義時，他繼續說道，只有依靠人民，「我們才能領導全中國人民開展一個又一個大躍進」[23]。（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毛：解放力量

毛澤東並不曾否定過黨的領導，但意味深長的是，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所作的5篇著名講話中都沒有提到黨的領導。除了這一否定性證據以外，還有肯定他自己觀點的證據，即在他看來，大躍進的實質是解放群眾的力量，而不是去組織群眾。5月8日，毛澤東在第一次向大會作講話時說了一段關鍵性的話：

> 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來就是很豐富……過去是在舊制度壓抑下，現在開始發揮創造了。辦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爆發出來。[24]（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在5月17日和20日的第二和第三次講話中，毛批評了斯大林的概念：「幹部決定一切」。他問，如果那樣的話，那麼「群眾呢？」[25] 毛澤東在5月23日即大會最後一天的第四次講話中，更清楚地表述了這一觀點：

> 先跟什麼人？後跟什麼人？我們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幹勁，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許多發明創造……所以說，先要跟人民，以後人民才跟我們……先是理論來源於實踐，以後理論又為實踐服務。[26]

在另一段相關的講話中，毛討論了一位大會代表的建議。這位代表說，跟著毛主席走，就不會犯錯誤。毛針對這個建議說：

> 我看這個說法不全面，我說是又跟又不跟。這要看對不對？對就跟，不對就不跟，不要糊里糊塗地跟……不管是領導人還是擔大糞的，要看真理在誰手裏。我們要跟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正確部分。[2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毛澤東的態度確實比較謙虛。但在這個聲明中明顯缺少的是，他沒有提到是黨而不是任何個人掌握真理這一正統觀點！（劉少奇贊同這個觀點[28]）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不論在成都會議上還是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都竭力動員幹部們破除「迷信」，讓他們相信，只要敢想、敢說、敢幹，任何成就都可以取得。然而，他援引的前例幾乎全是獲得成就的個人[29]。總而言之，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毛把大躍進的成功看做是6億中國人不畏艱難萬眾一心的結果，而不是共產黨的勝利。

當然，假如有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質疑毛澤東的話，毫無疑問他會表示堅信黨的領導作用；他肯定會引用自己多年來說的類似意義的許多話[30]。毛明顯是推崇黨動員和組織群眾的能力，但從上面所引用的話無疑看出，這位主席把大躍進視為覺悟分子能量的爆發，而不是群眾動員的傑出例證。

顯然，如果黨的作用是解放而不是領導群眾，那毫無疑問黨便不是不可替代的了。但是，毛到60年代中期以後才真正認識到這一點。當時他同劉的分歧是在哲學方面，而且也不明顯，可能兩人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分歧。兩人都認為中國共產黨應當在大躍進中發揮主要的作用。

毛澤東保護計劃制定者

毛和劉可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對大躍進的反對者採取的不同態度，當然還沒有跡象表明這些分歧引起了兩人之間重大的摩擦。

早在 1957 年 11 月，黨中央三中全會在批准了恢復 1956 年初高潮政策以後，劉就提出了並發揮了毛在三中全會上關於兩種不同經濟政策的論述，但強調指出，這兩種政策代表著人們的分歧：

> 完成這個任務（經濟建設）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做事情快一些、好一些，另一種方法是做事情慢一些、標準低一些。我們應當採取哪一種方法呢？黨中央認為，我們應當採用前一種方法，拒絕後一種方法……過去兩年的事實已經證明，有些人抱有模糊的懷疑態度和反對態度，妨礙了我們事業的前進，損傷了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並壓抑了潛力的發揮。結果，不僅沒有取得高的數量和速度，也沒有做到好和省，只造成了人力、財力和資源的巨大浪費。【31】

在八大二次會議的講話中，劉少奇重提上述觀點，支持了毛澤東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有兩條道路的觀點。他特別引用了兩年前發表的毛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在這個序言裏，毛澤東主席指責那些反對更快發展經濟的人為右傾保守主義【32】。在這一點上，劉研究了毛前兩年關於加速經濟發展的各種提法的某些細節，並完全贊成這些提法。【33】劉在結束這一段話時提到了那些不太贊成大躍進政策的人：

> 曾經對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表示懷疑的同志，許多人已經從這樣一次反覆中得到了教訓；有些人卻還沒有得到教訓，他們說：「到秋後再同你們算賬。」讓他們等著算賬吧，他們總是要輸的。【34】

提到秋後是不難理解的。秋後的收成如何將表明農業躍進是否成功。顯然，大躍進的反對者預測大躍進會把農業搞得混亂不堪，造成糧食減產。

劉少奇對爭論系統而詳盡的描述，無疑地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們看到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來黨在「最重要問題」上的基本分歧。【35】可以想見，劉的目的是聯合毛澤東，對付國務院中試圖指責

黨的躍進政策的人，更要鞏固他的地位，對抗他認為對他成為毛的接班人威脅最大的人——周恩來。

毛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到了「秋後算賬派」，但他又增加了「觀潮派」的概念。「觀潮派」顯然是指對大躍進既不贊成也不反對的騎牆派，他們在秋後「算賬」以後就會站到贏的一方的行列中去。[36]並且，當劉預言算賬派會失敗時，毛認為，必須同算賬派進行鬥爭，以便「團結他們，而不能把他們排斥在革命之外」[37]。

毛的態度同鄧小平在成都會議上的態度一樣，似乎始終認為，反對迅速發展經濟的人是錯誤的，劉少奇在大會上引用他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其中將這些人稱為「右傾保守主義」。但並不是政治路線方面的根本錯誤。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路線的分歧會導致黨內的嚴重鬥爭，例如文化大革命就被說成是一場兩條路線的鬥爭。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認為「觀潮派」和「算賬派」的錯誤不那麼嚴重。毛認為他們在大多數場合犯的錯誤只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其餘都是正確的。[38]必須通過對國內經濟發展的道路進行反覆說明，以便把他們爭取過來。[39]

毛的窘境就在於，他希望制止對大躍進可能持反對態度的政府官員，但又要保護他們的政治領導人物，其中包括他最老的和最忠誠的革命夥伴。1956 年，反對那年躍進的人中包括總理周恩來、第一副總理陳雲、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毛認為財政部尤其該受責備）、副總理兼負責農業口的國務院辦公室主任鄧子恢以及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40]。

到了 1958 年，他們中大多數人認識到不能再抵制一場新的躍進了。周恩來已經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在反對 1956 年躍進問題上負主要責任。[41]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八大二次會議後被安排進中央書記處。薄一波作為劉少奇的長期合作者，順理成章地承接了周恩來移交給他的經濟決策權力。[42]如果在上述人中還有什麼「算賬派」或「觀潮派」的話，那麼最有可能的就是鄧子恢了（在大躍進期間他被剝奪

了對農業的有效管轄權，1955 年合作化運動中為了類似的理由遭到同樣的厄運[43])。而且通過以往的行為判斷，陳雲也是「觀潮派」或者「算賬派」。值得回味的是，八大二次會議後《人民日報》登用的照片包括了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唯獨沒有陳雲[44]。

對於毛澤東來說最重要的是，這批人中沒有誰（可能薄一波例外）會由於政策分歧而與他發生重大的政治對抗，他的同盟者劉少奇在前一年曾表示，如果出現分歧，他和他的合作者（如彭真）準備用對待整風運動的態度對待大躍進[45]。要拋棄他忠誠的支持者，轉而依賴那些並不全心全意的盟友，是毛澤東無法接受的。所以，當劉暗示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上升為「路線」性質的不同時（沒有毛的支持他不可能明確地這麼講），毛卻竭力降低分歧的嚴重性。（在這一點上鄧小平支持毛，文化大革命中卻有人抨擊他當時的態度[46]！）

最有意義的是，毛一反常態為周恩來辯護，讚揚他 1957 年 6 月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反右講話，並清楚地暗示，周是在這時放棄了反對躍進政策的立場[47]。周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他在 1957 年 9 月，八屆三中全會（可能是他作自我批評的時機）之前就改變了反對的立場。[48]他在這一重要的政策問題上已然落敗，於是轉變形象，不再帶頭製造摩擦。然而，劉在三中全會之前，沒有提到任何思想上的變化。甚至毛也認為，三中全會政策發生公開轉變的時刻[49]。

毛還阻止對周恩來和他的親密同事的批判，著重指出這樣做會導致黨的分裂。他在兩次講話中認為這樣做會引起不亞於一場世界戰爭的災難：

> 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出現黨內分裂，就要亂一陣子。（如×××、高崗那樣不顧全局，黨就要分裂，就會出現不平衡，雖然最後還可以平衡）……中央委員都要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摔跟斗……不顧大局鬧分裂有什麼好處？[50]

我是講要防止大的、不利於人民的大災難，如世界大戰，黨的大分裂。[51]

不論劉少奇有多麼大的反對意見，毛都可能用類似上面的言談期望他動心。[52]

黨堅持自己對政府的領導

如果說毛澤東能夠保護國務院的領導成員，他並不希望維護他們的下屬。他在南寧會議上對財政部的抨擊表明了這樣一種信念：中央的官員過於保守，必須由更激進的黨來領導。毛澤東自 1956 年 4 月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以來，曾提倡分權[53]，他希望通過同樣手段來達到上述目的。經過一些鼓勵和 18 個月的醞釀，1957 年 11 月國務院終於制定了三項法令，決定把工業、商業和金融方面的大量權力下放給省級機關，實際上就是給省委。[54] 這三個主要法令後來在稅收、價格控制、糧食管理、計劃和物資分配管理領域經過詳細修訂，其結果是到 1959 年 6 月，80%的中央政府企業移交給省裏管理。[55] 省裏的權力增大以後，效果之一，就是省和省以下機關領導的企業創造的工業生產總值份額，從 1957 年的 54%增加到 1958 年的大約 73%，而在財政領域裏，中央政府的開支 1958 年下降了 14%，省裏的開支增加了幾乎 150%，佔了整個政府開支的一半以上。[56]

根據最近披露的材料，在 3 年中轉給地方的資金不超過 30 億元至 36 億元，外加 4500 萬至 5000 萬美元的外匯，似乎進一步證明早先已作出的分析：儘管毛極為反感的財政部將權力進行全盤公開的轉移，[57] 然而，它很精明地在極大程度上保住以前的影響。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設計權力下放方案的陳雲（在財政方面得到了李先念的幫助），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指責為歪曲了毛的意思，大搞形「左」實右，因為新的分權制度使得中央財政收入大量流失，因此一年後不得不改變政策。事實上，陳雲在 1957 年 9 月中共中央第三次全會上就說，權力下放的措施一年之後視發展情況再做調整。陳雲預見到權力

下放可能帶來的不利後果，並在全會上提出，與分權相應，必須作出進一步的努力以實現全國的平衡[58]。所以，雖然國務院及所屬部委確實失去了不少權力，部委的數量 1957 年最多達 41 個，1958 年縮減到 33 個，1959 年為 30 個——可是中央對全盤的經濟管理沒有放棄。中央的意圖似乎是把監督權力轉移到與各省省委有聯繫的黨的書記處，使其在行使監督作用中處於關鍵地位。

在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中央書記處的這個監督任務就顯示了出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和財政部長李先念均被安排進了書記處，其目的估計是使他們能通過黨的這個組織來實施領導。陳雲當時正全面負責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和從蘇聯進口工業設備的工作，故未被安排進入書記處[59]。否則就要出現規格地位問題，因為陳雲比總書記鄧小平地位高。按照毛的觀點，這是一件好事，因為他有足夠理由擔心陳雲熱衷於統管，很可能破壞權力下放的實施。這也可能是陳雲在三中全會上的報告沒有公開的原因。同時，位居第四的書記處成員譚震林從前一年秋天以後一直主抓農業政策，成了政治局正式委員，這樣他比副總理鄧子恢的地位還高，並在大躍進中，合情合理地擔負起主管農業的職責。[60]

這些變動不僅使書記處在經濟中發揮出重要作用，而且提高了它在整個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以前僅有兩位書記，即總書記鄧小平和彭真進入政治局[61]。而現在 9 位書記中有 5 位政治局委員，他們是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和譚震林。

然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書記處與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共產黨的書記處存在著重要的區別。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把他自己的支持者安排進入書記處，並且在赫魯曉夫 1957 年夏天擊敗反黨集團之後，便直接提升書記處成員進入主席團，以便替換那些被清洗的人。身處中國共產黨書記處的五名政治局成員，有著各自的政治盟友，不能指望他們立即變成在鄧小平總書記領導下的一個「政治上團結一致，牢不可破的組織」[62]。鄧小平和譚震林都與毛有直接的聯繫[63]。彭真和劉少

奇的關係更為密切。[64]李富春和李先念既在書記處任職，又是國務院的重要領導成員，雖然同時在鄧小平的手下，他們大概仍然忠實於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則採取謹慎措施，經常列席書記處會議，親自瞭解書記處的情況。[65]

如果說，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國政治格局中不像會佔有多大優勢，可在 1958 年卻有許多跡象表明它發揮了巨大的新作用。在 1957 年底以前，國務院與中共中央共同頒布的指示一直較少。1955 年有 1 個，1956 年有 4 個，1957 年有 7 個，到 1958 年該數字一躍到 17 個，其主要內容大多與農業和商業有關。這個數字在 1959 年降到 12 個，然後，又突然降到 1960 年的 5 個，1961 年降到零，1962 年為 2 個，1963 年又降到零。此時國務院恢復了在經濟指導中的主要地位[66]。

政府機構作用降低的另一個跡像是，國務院全體會議次數的下降。1957 年有 26 次，1958 年卻僅有 16 次，到 1959 年只有 9 次。[67]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會議次數同樣下降，從 1957 年的 37 次降到 1958 年的 13 次。[68]在相當程度上，這些數字也反映在大躍進中實行的是「游擊作風」的領導。黨的高級官員花費更多的時間巡視全國，在現場進行鼓勵和指導。他們沒有時間和興趣返回首都召開正式會議，然後逐級按部就班地下達指示。

在中共八大後的全會上，另外兩位人物的提升，進一步證明了權力下放後黨的機構作用增強。提升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鄧小平在四川時的老下屬李井泉進入政治局，說明了省級黨委的重要性。可以推斷，這些地方領導人被選中，大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所在地點重要，上海是中央政府經費的主要來源：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占經費的 17.6%，在 1958 年占 33.2%。[69]四川是全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最大的糧倉之一。毛的干預對柯慶施的提升也許很有必要。正是因為在 1957 年柯慶施支持毛的整風政策[70]，使他疏遠了許多同事。全會結束時有張照片頗為不尋常，把他們兩位和內蒙古

自治區第一書記烏蘭夫（政治局候補委員）放在一起，這便說明了他們兩位的擢升富有深意[71]。

但是，如果大躍進表明省級黨組織幹部權力的擴大達到了高潮的話，那麼全會也提醒他們在幾個月後如果工作不力將受到懲罰。在會議上審議並同意撤換 11 個省黨的高級領導人。他們中大多數被指責不為其他，主要是在農村提倡保守政策，傷害了大躍進的積極分子[72]。看來毛自己相信一些幹部撤銷職務無非是省級黨組織權力鬥爭達到高峰的反映[73]。可是，由於這是他在 10 個月前青島會議上批評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結果[74]，毛本人便也無話可說了。事實上，到全會開會時他已接受了例行的決定，並指責那些被清洗的人是分裂分子[75]。他所能做的只是為倒霉者中的一些人降低一點調子而已[76]。

黨對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權

如果這次會議及後來的中央全會表明黨組織對政府機構控制權力增強的話，那麼，緊接其後召開的歷時兩個月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便重申黨指揮槍的原則。更具體地講，這標誌著毛力圖使人民解放軍拋棄蘇聯模式，恢復它的延安游擊傳統的鬥爭已經開始。

毛在這樣的鬥爭中本來可以輕易取得勝利。早在兩年前，毛通過赫魯曉夫爭取到蘇聯在核武器技術領域給予中國援助、從而中國將擁有核武器的承諾，使毛能夠徵得大多數同僚的同意，削減現代常規武器的經費，把資金轉到經濟發展投資上去。[77] 這個承諾似乎能因為獲得蘇聯的援助而更快地變為現實。將領們對常規武器的任何要求他可以很容易不予理睬。結果，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過去主張中國應該集中力量使常規武裝現代化，讓蘇聯承擔發展核武器的任務，[78] 到 1958 年早些時候，似乎只好向毛認輸了。在 1 月 22 日的講話中，彭同意毛的主張，「我們的軍隊的現代化必須在國民工業的現代化的基礎上來實現。」因此，這就含蓄地拋棄了通過向蘇聯全部採購的辦法，來達到軍事現代化的一線希望。[79]

與此同時，彭德懷看來是集中了所有力量，阻止在人民解放軍中加強政治工作，阻止政治對軍隊的控制。一個帶有妥協味道的新的部隊訓練計劃在 1 月下達了。彭德懷看來是沒有重視另一方面，未來的訓練目標應該是「為了部隊隨時準備應付任何事變，繼續提高現代軍事技術，掌握在現代條件下諸兵種協同作戰的本領」[80]。

但是，在訓練的基本任務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全體人員的政治覺悟，學習毛澤東的有關軍事方面的著作。」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也要學習，換句話說，延安的經驗仍然是適用的，不能以蘇聯關於現代戰爭的理論代替它。[81] 這些讓步和妥協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個訓練計劃似乎再也沒有人提起了。[82]

2 月 22 日，彭德懷在蘇聯紅軍建軍 40 週年時發表了長篇講話，在講話中他論述了蘇聯紅軍正確處理三個非常重要的關係——軍隊和黨、軍隊和老百姓、軍官和士兵，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將這個經驗應用於中國國情。主張向蘇聯學習[83]，並為人民解放軍在政治工作方面的落後而辯護開脫。為了表示進一步的和解，他建議解放軍應用整風的辦法來改善那些關係。在前年的整風運動中他卻沒有對此表態[84]。然而，他顯然沒有強調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必要性。

從後來的發展情況來判斷，這個講話也沒有達到它明顯的目的。但有一點值得提一下，在論及戰略問題時，彭德懷元帥提到具有現代化武器的帝國主義武裝力量就在中國的門口，台灣必須解放，中蘇兩國軍隊有充分理由聯合起來保衛遠東和世界的和平[85]。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以它慣常的空泛語氣發表社論，大意是兩國人民和軍隊為保衛社會主義集團和世界和平必須聯合鬥爭[86]作了空泛的表態。彭德懷是不是在對中蘇共同防禦協定進行試探呢？如果確實是這樣的話，馬利諾夫斯基是在彭訪問莫斯科期間向他提出這個建議的嗎？我們後來知道俄國人在 1958 年下半年正式提出某種聯合防禦協定，而正是這點引起了毛的強烈反對。如果中國國防部準備支持蘇聯的建議，這勢必要加深彭德懷與黨的主席之間的裂痕。

因為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多年愈來愈大的隔閡，也由於軍隊本身的特點，毛無疑知道他要加強對人民解放軍的政治控制的意圖會遭到反對。況且，一旦出現了抗拒，毛必定會意識到這種抗拒將是有力的，因為在政治局中有7位元帥（軍人的顯赫地位正是由於人民解放軍在中共的勝利中起過重大作用，這是蘇聯軍隊無法比擬的）。儘管彭和其他將領對毛澤東的領導從未有過疑問，但毛仍會記得，他們有時就不服從他。[87]

所以，毛的第一個行動便是提升彭德懷的潛在的對手，從其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看，選擇林彪元帥出任政治局常委是八屆五中全會上最重要的人事變動。這位比較年輕（51歲），而一般不拋頭露面的元帥（據傳身體有病），就這樣成為中國7位最高領導人之一。從1954年開始，他的政治地位逐漸上升，現在明顯超過彭德懷。林彪與彭德懷之間長期存在的嫌忌雖不明顯，但是對中國領導人來講是清楚的。[88] 毛雖然不能預見到大躍進失敗的後果，以及彭德懷利用這個失敗對他進攻，但是他很可能把他的助手林彪安插在能控制住國防部部長的位置上。[89]

要確認對他的控制唯一可行的組織方法，就是通過毛自從1935年便一直領導的軍事委員會。顯然，自從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後，可能是因為毛忙於新政權的建設[90]，軍事委員會基本上沒有什麼活動，看來彭德懷從朝鮮戰爭前線回來、擔任國防部長之後，實際上負責軍委的工作，有可能是以最高副主席的身份。雖然彭德懷和他總參謀部的舊同事有能力控制軍委，但據說彭德懷不喜歡黨的監督，他寧願軍委被撤銷或用一個不直接對中央負責的、名聲較低的機構代替。[91] 林彪的提升意味著軍委有了另一位副主席，在政治地位上比彭德懷高、革命聲望和專業知識與其相匹敵、並有時間獻身於毛澤東無暇或不願處理的部隊日常事務。

然而，看來毛沒有採取挑釁的方式，安排林彪事無鉅細從彭德懷手裏接過軍委的日常工作[92]。毛的做法是，從5月27日到7月22日

召集了軍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 1000 多名高級官員聆聽了中國 10 大元帥中的 9 位元帥的講話，其中彭德懷排在最後作總結發言。兩位文官也講了話，即毛澤東和鄧小平。所有發言人中主席和總書記是唯一不帶軍銜的黨領導，這也許是毛的一個高明策略；重申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最好由到會軍官的老首長來講更容易被接受。令人注目的是，自從 1935 年以來，軍委幾乎一直是由軍人組成的，僅有毛自己是例外。軍委這個機構成立之初，就是為了保證作為文官的黨領導人對軍隊的控制。按毛經常引用的信條「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觀點，有理由假設主席採取了步驟以保證他的高級文官同事中沒有另外人能直接指揮這個控制政權的機構。[93]

軍委會議的焦點在於如何使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同時繼續忠實於延安傳統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湊巧的是，在會議開始前 4 天，林彪的最親密的戰友之一、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在《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認真學習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的文章。劉領導著解放軍最現代化的一支部隊。在文章中，他不僅讚頌了主席的著作，而且還稱讚工農出身的飛行員，批評了蘇聯顧問（特別有意義的是，劉正是一個曾在蘇聯學習過的人），批評外國的那種通過過分的安全保衛措施把官兵隔開的作法，並再次肯定在一個現代化軍隊中黨委和政委的作用[94]。也許，最重要的是，這位司令員領導著一支人民解放軍中用先進武器裝備的隊伍，他贊同毛的理論，即在戰爭中起決定因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在軍事上同樣可以運用人定勝天的大躍進精神。

對照這篇文章，毛在軍委會議期間指名表揚劉亞樓就不足為奇了。儘管筆者手頭沒有毛談話的完整文本，但從掌握的資料來看，是有一點是清楚的，毛希望這次會議的結果是對蘇聯軍事模式採取更加批判的態度。[95] 劉亞樓的文章和其它重要的證據表明黨和軍隊之間進一步緊張的關係，以及毛在軍委會議上勢必堅持採取的措施。[96] 首先是圍繞政委作用的問題而展開的爭論。中國的司令員們企圖像蘇聯那樣削弱政委的作用，降低黨委的地位，他們認為，在現代化武裝力量

中和現代化戰爭條件下，政治控制會影響軍事效率。軍委擴大會議盡力扭轉這個方向，尤其強調學習毛澤東的軍事著作，有些將領認為過了時。[97] 在蘇聯，朱可夫下台之後重新對紅軍進行政治控制的主張，為毛的決定提供了道義支持。

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官兵之間的關係。1949 年之後，人民解放軍正規化，建立起更嚴格的等級制度，也就是蘇聯式的軍官組織體系，使游擊隊司令員和他的戰士那種同志式的關係蕩然無存。徵兵制度以及那些在經驗與出身經歷方面和高級軍官類同的老游擊隊員的復員同時實施。而且，新型的「資產階級軍官」不是從連隊提升上來的，而是通過 1949 年以後的軍事院校培養出來的。他們的等級觀念往往比較強，並且輕視農民出身的士兵。[98]

估計前來參加會議的軍官們聽取並討論了黨的建議，以改善這種情況。無論怎樣，9 月 20 日，即會議結束兩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指示，要求除年老的、身體虛弱的、有病的之外，全體軍官以一個普通士兵的身份，每年下連隊當一個月兵；沒有經連隊鍛煉而提升的年輕軍官必須像所有老兵那樣，在第一年下連當兵6個月。到 1959 年 2 月，大約 15 萬名軍官，其中包括 160 名將官，執行了這個指示，無論他們軍銜如何。[99]

軍委後來採取的措施說明了毛對等級制度、官僚主義和不公平待遇如此深惡痛絕，這個態度觸發了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這些措施表明了使人民解放軍繼承延安傳統的真誠願望。不過很明顯，毛也一定想要阻止一個團結緊密的中國軍官階層的形成。由於解放軍在中國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旦形成軍官階層，可能對黨構成長遠的威脅。同樣也不能忽視毛對彭德懷的反感。他一定認為，在 1956-1957 年間所發生的事件中，彭始終扮演與他對抗的角色。[100] 二人本身就有嫌隙，在防禦政策及中國如何裝備武裝部隊方面又有激烈的分歧，無怪乎次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就軍隊中的分裂情況抨擊毛澤東，而毛反擊的時候也不留任何情面。

在與彭鬥爭的同時，毛澤東也在考慮中蘇軍事關係的積極作用和負面效應。赫魯曉夫關於幫助製造核武器的承諾的重要性已經在前面敘述過了。但是，從 1958 年早些時候開始，蘇聯的行動使毛懷疑赫魯曉夫的承諾究竟有幾分誠意。

3 月 14 日，赫魯曉夫在加里寧暗示蘇聯要聲明單方面廢除核試驗。[101] 兩週之後，3 月 31 日，最高蘇維埃通過一個決議，停止全部核試驗。[102] 赫魯曉夫緊接著於 4 月 4 日寫信給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和世界其他領導人，其中包括周恩來總理。

信中有一節，即便是出現在寫給周的信中，也必然會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思索：

> 迄今只有 3 個大國——蘇聯、美國和英國擁有核武器，所以關於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協議是比較容易簽訂的。可是，如果現在試驗不停止，那麼一段時間以後，其他國家可以成為核武器的擁有者。在這樣的條件下要達成停止核試驗的協議當然就將成為更複雜的事情了。[103]

如果蘇聯總理——赫魯曉夫這時在最高蘇維埃代替了波德戈爾內，成為黨政兩方面的領導人——希望在中國研製出自己的核武器之前達成禁止核試驗的協議，他要幫助中國人發展這類武器的誠意有多大呢？赫魯曉夫的創議會失敗嗎？在那種情況下，按照蘇聯總理的信，他們可以隨意恢復他們的核試驗。[104]

西方最初的反應是冷淡的，部分原因是美國人將要開始新的一系列試驗。杜勒斯清楚地意識到蘇聯的行動是打算阻止這些試驗或令其無法名正言順。[105] 但是，美國人無法立即拒絕這個提議，在艾森豪威爾 4 月 8 日的覆信中，他建議美國和蘇聯的技術人員應共同研究監視試驗的辦法。[106] 4 月 22 日赫魯曉夫起初覆信拒絕了這個建議。其後，在 5 月 9 日的信中又出人意料地同意了。[107]

中國人對赫魯曉夫最初的創議的回答必然是肯定的。周恩來 4 月 13 日給蘇聯總理的信中，答應中國政府全力支持這一創議。儘管就像

一位西方學者指出的那樣，周恩來還沒有提到更多國家擁有核武器的危險。[108]到這個時候，中國人很可能已經研究了美國人的反應，也許會清楚地推論出赫魯曉夫的建議將由於東西方在試驗監督方面的分歧而告吹。但是赫魯曉夫在5月9日的信中對這個問題作出讓步，成為一個意料不到的突破，呈現在中國面前一個新的形勢。中國人不得不承認禁止核試驗的協議也許能達成，那將把中國排除在核俱樂部之外。[109]

我們不知道莫斯科是否就赫魯曉夫在5月9日信中的讓步事先通知了北京。但在5月初，中國人可能開始懷疑，他的主動創議不單是想取得宣傳上的勝利，而是真的想要禁止核試驗。幾乎可以肯定，這樣的疑慮導致中國人第一次公開表示要製造核武器的決心。不管怎麼說，在5月10日上午，外交部長陳毅元帥接見兩位西德記者時，告訴他們中國可能在「將來」或「不久的將來」，擁有自己的核武器。[110]兩週之後，空軍總司令劉亞樓在軍委會議前夕發表文章，告訴蘇聯，中國將利用自己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在「不遠的將來」製造出自己的核武器。[111]科學技術委員會主席、副總理聶榮臻元帥在當年晚些時候證實了這件事情。[112]在這個事件之後，毛提出十年時間足夠製造中國的核武器（這一次主席過低地估計了中國的發展速度），這也表明他不再指望蘇聯的幫助。[113]

劉亞樓的信息不只是對赫魯曉夫發出警告；它也從根本上證明了毛澤東的計劃的可行性。毛計劃建立一支以核武器裝備起來的具有延安作風的軍隊，它可避免在現代常規武器上進行巨額投資。對毛來說，雖然赫魯曉夫近來的外交手段，暗中損害了他給中國原子彈樣品的承諾，但在這一系列變化中，彭德懷卻不善於好好利用。他設想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正確地位，建立在與蘇聯軍隊之間的功能分工的基礎上，而這種分工必須以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親密合作和信任為基礎。仔細研究赫魯曉夫禁止核試驗的建議，就能發現俄國人對幫助中國獲得核武器不是誠心的。同時還證明所謂的秘密協議是一場騙局，

這只能導致中國軍方對同蘇聯合作喪失信心。的確，雖然當初毛對赫魯曉夫的提議肯定感到失望，但毛不像彭德懷那樣，他能借此啟發人們，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走自己的路，依靠中國自己的資源，自力更生。

軍委會議結束後不久，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時發表的文章表明，無論彭德懷態度怎樣，至少，其他幾位元帥準備跟隨毛。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元老、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朱德肯定了中國革命經驗和毛澤東思想的現實意義，並主張在這個基礎上有選擇地學習蘇聯的經驗。[114]賀龍元帥在論述南昌起義時，迴避蘇聯的軍事理論和實踐，只是強調 30 多年來「我們的武裝力量是遵循毛澤東同志的建軍路線和軍事行動原則的」[115]，雖然沒有宣傳毛的觀點，但是，在 8 月 1 日《人民日報》頭版上刊登的他在劉亞樓陪同下視察一個空軍基地的照片，表明了他的共鳴。[116]

黨維護在外交活動中的地位

赫魯曉夫的關於禁止核試驗的建議，除了引發中國領導層內部對於中國軍隊地位和軍事理論的爭論外，同樣引起毛對蘇聯外交政策動向的憂慮。[117]在 2 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在外交方面的態度比 1955 年夏季以後的任何時候都更強硬。他重申了毛關於全球權力中心從西方移向東方的分析，強調資本主義世界各國間相互經濟紛爭，並譴責美國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行動，最重要的是，他拒絕了外交界鼓吹的「兩個中國」的主張，重申了中國要解放台灣的決心，一反在前兩年裏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常態。[118]

但是，對於一個重要問題——南斯拉夫，周恩來的談話中卻顯示了一種溫和的態度。蘇聯人已經發動了反對修正主義的運動，以表示他們對鐵托拒絕參加前一年 11 月莫斯科會議並重新加入這個集團的不滿，對他在意識形態方面繼續獨樹一幟也表示不滿。但是，周恩來在談到匈牙利事件時，只曖昧地提到「各種形式」的修正主義。[119]並

且，他提到南斯拉夫時也是友好的。他把它稱為社會主義國家，並列舉了南斯拉夫副總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如匈牙利的卡達爾和保加利亞的尤高夫先後對中國的訪問。[120]

也許是赫魯曉夫的禁止核試驗的建議導致了後幾個月中中國對南斯拉夫態度的突然改變。該協議意味著毛的武力不妥協姿態遭到拒絕，而中國人又沒有直接的辦法強迫赫魯曉夫接受他們的觀點。南斯拉夫問題也許是一個迂迴但有效的辦法，藉以影響蘇聯政策。

4 月 5 日，蘇聯人聲明他們將不派代表團參加即將召開的南斯拉夫的黨代表大會，4 月 19 日，在大會召開的前 3 天，蘇聯共產黨的刊物《共產黨人》攻擊南斯拉夫新制定的黨綱是修正主義的綱領——它倡議共產黨國家不結盟、保持中立，主張非共產黨黨派能代表非共產主義世界的進步，並強調了所有共產黨是平等和自治的。但是，雖然蘇聯的攻擊是嚴厲的，但它承認在國與國的基礎上南斯拉夫還是朋友，在黨與黨的基礎上是同志。[121]

5 月 5 日，在南斯拉夫黨代表大會結束之後，中國人對南斯拉夫提出批判，言語就沒有那麼客氣了，而是簡單把鐵托和他的同事稱作為南斯拉夫黨的「領導集團」，並含蓄地指出，他們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綱領是按照美帝國主義的要求出台的。蘇聯的攻擊尚且保留著相互妥協的可能性，中國人似乎只想佔上風。[122]不過，他們也意識到不可能，或許由此下決心剷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毒瘤，因為他們深信，「社會主義國家內部……越團結，我們的力量就越強大」。[123]更重要的是，集團內部對於南斯拉夫的負面輿論，很有可能影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實施，從而削弱赫魯曉夫的對美政策。

但是，雖然中國的姿態旨在推動赫魯曉夫對南斯拉夫採取一條強硬路線，蘇聯領導人卻不贊成中國的所有論點和行動。[124]而且，在這之後召開的蘇聯、東歐集團領導人第一次會議上——5 月晚些時候召開了華沙條約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赫魯曉夫指出，他將不改變對美國的政策。中國觀察團團長陳雲重申毛和周的觀點，強調世界力量的

均衡出現了顯著變化。他斷定過高地估計西方國家的力量是「極端錯誤和有害的」。並提出，佔有優勢的社會主義陣營沒有理由懼怕帝國主義。形成對照的是，赫魯曉夫描繪了一場新的毀滅性的世界戰爭帶來的淒涼圖景。他充滿希望地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這個危險，因此需要一個處理國際事務的新方案。當陳雲極力主張華沙條約組織應當加強的同時，華約宣言卻強調減少條約國家軍事力量，並從羅馬尼亞撤出蘇聯軍隊。[125]

中國人在一點上確實取得了勝利，即，南斯拉夫要想妥協就更加困難。6月15日，鐵托激烈地回擊了對他的批判，尤其是中國的批判，但結果是導致中國方面發動更為強烈的譴責，他們將鐵托稱為「叛徒」，必須把他趕到帝國主義陣營去。[126]分裂上升為兩國關係的惡化。6月末，中國拒絕出席南斯拉夫大使的告別宴會，9月，他們從貝爾格萊德召回了自己的大使。

事情的進展表明了一個預兆，在後來的歲月中，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外交政策越來越交合一體。與此同時，中國尋求軍事陣營的團結，以圖與帝國主義陣營相對抗。在2月人大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放棄了外交部長的兼職由陳毅元帥接任。這一舉動固然說明，在1956-1957年關於兩大重要政策的辯論中，周被擊敗[127]，它也標誌著「萬隆時期」告一段落，在此期間，以迷人、隨和的總理為代表的中國，看來能保持與意識形態不同的大多數國家的友好關係。

隨著意識形態開始占主導地位，影響外交政策的重要觀點不僅來自總理和新的外交部長，從其他方面也發出了聲音。例如，在批判南斯拉夫的幾篇重要文章中，其中一篇發表於1958年夏天黨的新雜誌《紅旗》第一期上，由陳伯達撰寫，時任《紅旗》主編。[128]由于兆力簽署的關於外交事務的重要評論，都是由一個三人小組擬定的，其中兩名是黨的宣傳工作者，只有一名是外交部官員。[129]這說明，除了周恩來在國務院和外交部的核心人員之外，其他領導人在制定外交政策

中也起著愈來愈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門（負責與其他共產黨保持聯繫的）則越來越介入對外政策的制定。

然而，如果就此進一步推論，認為黨的機構剝奪了國務院職能，或者說周恩來在外交事務中的影響變得無足輕重，這是一個錯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剛結束，周恩來同陳毅前往朝鮮，就朝鮮戰爭結束後仍留在朝鮮的中國軍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撤軍問題進行談判。周丟了面子，但威信仍在。

然而，即使周恩來不得不遵循毛在外交事務上更加強硬的路線，正如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講話所表明的那樣，他。此時，這種強硬並沒有影響對南亞和東南亞中立國家的基本政策，但是，一些中立國家在 1958 年已經感到，中國的態度從親切變成好戰。[130] 正是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盟友——日本第一個受到這好戰政策的衝擊。

1957 年至 1958 年的秋天和冬天，日本代表團在北京與中國進行實質性貿易談判。中國曾堅持說，他們在日本建立的每一處貿易區內都要插上中國國旗，但遭到日本強硬拒絕，於是退讓，1958 年 3 月 5 日便得以簽署了一個貿易協議。然而，5 月 2 日，一個日本青年從長崎一座進行中國郵票展覽的的房屋頂上摘下中國小旗，並把它撕碎，引起中國人的強烈反應，外交部長陳毅發表聲明，指出這一事件表明日本岸信介政府對中國的敵視態度已經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131] 5 月 10 日，在東京的中國貿易代表團通知日本，所有業務都將被終止。

中國人對「紅旗事件」反應如此強烈，可能出於以下一些原因：對於岸信介的憤怒——他提出貿易往來不能改變日本不承認北京政府的政策；日本政府對蔣介石的再度保證；日本有可能與美國締結共同防禦條約；在即將來臨的選舉中，為岸信介造成一點挫折，哪怕只是可能性。[132] 據一位學者說，「消息靈通的日本人士一般認為，中國的這個決策完全是政治性的；它是由陳毅自己制定，提交到政治局批准的。」[133]

我們不能肯定「消息靈通的日本人」的判斷是否正確。但是，完全有理由說，從氣質上看，中國新的外交部長令人欽佩，非常適合中國新部署的外交政策。根據一個權威的傳記評論，「大部分報道表明陳毅是一個具有相當機智、並且生性直率的知識分子……」[134] 在其後的年代裏，作為國內戰爭中功績顯著的將軍兼詩人的陳毅，在處理國內外事務中有許多直率事例：1959 年 10 月威嚇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135]；1960 年 4 月在加德滿都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就中印邊境爭端問題表達的憤慨[136]；1961 年在日內瓦會議就老撾問題談判的乾脆風格[137]；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審問他時，他所表現出坦率的自我辯護[138]。

為什麼選擇陳毅元帥任外交部長，而沒有選其他類似能幹的人，箇中原因並不清楚。他早些時候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 4 位中國主要領導人有親密的關係，似乎缺少大的政治野心[139]。假設他是所有人的朋友，沒有一個敵人，他可以被當作一個比較中立的候選人，被安排到一個可以讓他充分發揮個人積極性的職位。事實上陳毅似乎滿足於繼續在外交事務方面接受周恩來的領導。但是，由於大躍進時期周恩來忙於到各地視察，留在北京的陳毅，以他處理事務的風格和他的言論，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樹立了一個必要的、更為強硬的形象。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恢復了他在聯合國的席位，從此進入一個新時期，與一般西方國家特別是與美國保持更友好的關係。陳毅的不幸是，政治上的逆境及多病的身體使他不能以他性格中歡樂形象顯露在外交場面上。

在十三陵水庫

5 月 23 日，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結束，接著就是 25 日召開的中共五中全會。會上，林彪和其他人正式接受任命。[140] 同一天，毛帶領他的大部分高級同僚到首都附近的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其後一個月，周恩來率領著一個包括 500 名中央委員和政府官員的隊伍，在那呆了 5 天，住在附近的學校裏，每天從下午 3 時幹到 11 時。[141] 他的

好友、助手葉劍英元帥抽出時間去寫詩。[142]更重要的是，這支安營紮寨的勞動大軍所提供的景象，標誌著毛決心恢復延安時期領導和群眾們發揚的艱苦奮鬥的作風[143]，並象徵著其後幾個月把體力勞動置於一個重要的地位。動員更多人參加勞動的任務將賦予一個嶄新的地方組織：人民公社。

第五章 人民公社的興起

直至今天，1958 年夏季人民公社在中國農村出現的原因，仍然使人感到撲朔迷離。可能因為政治上風雲迭起，造成有關記錄缺失。出現這個新生事物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毛迫不及待地推動，而當時甚至尚未獲得政治局的正式批准。此外，在一段時間，強調人民公社的倉促出現，似乎可以用來解釋產生困難的原因，而到後來已經不得不提醞釀階段，以抵擋所謂成立人民公社缺乏客觀基礎的批評。[1]

似乎無可懷疑，公社是在 1957 年底至 1958 年初興修水利運動中自動萌發的。當時毛仍然認為合作社將為國營農場所取代。[2] 興修水利需要投入大量勞動力，要求以更大規模組織人力，這就超過了合作社所能提供的人力。況且，1957 年合作社的平均規模已縮小到 164 戶。[3] 儘管中央委員會在 1957 年 9 月還發佈指示，讚揚小而權力分散的合作社[4]，而當年冬季就為興修水利開始合併合作社了[5]。過後，1958 年 3 月召開的成都會議肯定了那些合作社的合併，從而促使更多的合作社合併。[6] 然而，毛在成都會議上做的長篇講話中卻隻字未提這一問題。以此判斷，合作社合併在當時並未受到重視。的確，河南 27 個合作社合併成一個擁有 9369 戶的大社，雖然後來被提出為突破的典型，但在當年 4 月才完成這一合併。[7]

再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並由誰做出決定，擴大了的合作社要達到何種新的規模，才能稱之為人民公社，從而成為中國社會中囊括一切的基層單位，兼管農業、工業、文化、商業和軍事。在一年後黨內出現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危機中，有一種批評意見認為公社是少數人憑主觀願望搞的，並且成立得「太早太快……」。[8]

陳伯達的作用

「人民公社」這一名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和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任何文件中都不曾出現。顯然，無論毛還是劉當時都不認為合作社合併的意義十分重要，否則就會在那次會議的講話中提及。尤其毛的講話未提及合作社合併，這一點格外重要，因為他的講話不供發表，他如果想談這個問題，不必有任何顧慮。人們不得不由此得出結論，將擴大的合作社改成人民公社的問題在 5 月時仍未列入政治局的議事日程。

後來的材料說明，擴大的合作社起初名稱各式各樣，但到 6 月，中央委員會和毛澤東同志確定「人民公社」最好地體現了這一組織形式的實質，最受群眾歡迎。[9]

實際上是陳伯達在 7 月 1 日刊登在《紅旗》第 3 期的一篇文章中首先使用這一名稱的。陳在那篇文章中介紹了另外兩篇報道湖北省一個優秀合作社的通訊。他引述這個合作社變成為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成為名符其實的「人民公社」。[10]

在文章發表的當天，陳伯達在北京大學做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 38 週年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援引毛的話說，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織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11]

這一證據表明，將擴大的合作社稱為「人民公社」是陳伯達想出來的主意，然後被毛加以完善，使之包羅萬象，並在 6 月最後一週某個時候樹立為全國的典範。當然，毛後來否認人民公社是他的發明，但沒有否認曾表示過贊同。[12] 後來，有人頗令人信服地提出，人民公社的設想（並非名稱本身，因為名稱可能源於 1871 年的巴黎公社[13]；而設想卻重點在於「一大二公」的性質）可以追溯到毛年輕時期對學者兼政治家康有為 (1858-1927 年) 在《大同書》中所闡述的政治和社會思想的崇拜。[14]

疑問仍然存在。為什麼陳伯達以及後來譚震林援引毛的講話時，不直截了當地用「公社」一詞，卻要示意毛曾用過。是否因為毛用「大公社」這一名稱時，想到的僅僅是「大」而「公」的合作社(即大農業生產合作社)，而非大人民公社？是否因為毛澤東使用的詞是「大公社」，而非「人民公社」？是否因為毛在正式與同事們交換意見之前不願公開贊成人民公社？或者是否因為陳、譚所援引的講話，顯然是毛 6 月下旬與一位生產合作社(譯按：指河南省封丘縣應舉農業社)社長的談話。毛在《紅旗》雜誌第一期[15]讚揚那位社長的精神，因為毛只不過在考慮這一新設想，鼓勵其發明者進行試驗？[16]

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公社的構想、發展和被採納，其過程僅僅根據有限的試驗，時間短促得驚人。尤其是考慮到毛、陳從一開始就明白，這個事物將引起意識形態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時更是如此。啟發陳伯達將那個合作社稱之為人民公社的文章，發表於 1958 年 5 月 25 日[17]。這就是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一個縣委起草的報告，經過層層機構的審閱，終於送到陳伯達手裏。同時，不知道由什麼人作出決定，把這份報告視為一種新的農村組織形式問世的信號，並為貫徹這一決定撰寫了一篇文章(不知是否經過批准)。

成功地將工農業結合在一起，並啟發陳伯達命名為人民公社的那個合作社，不過在此方面才有兩個月的經驗，羽毛未豐，承受不起意識形態上如此有份量的桂冠。[18]然而，陳的文章發表不過兩週，由譚震林主持的華北六省市(包括河南)農業協作會議提出，由於合作社的管理和分配制度不夠完善，必須研究並準備建立尚在試點的「比較高級的公社性的形式」。[19]

雖然毛經常到各地巡視，而且一向重視的調查研究，但在對成立人民公社的設想初步贊同時，卻並未親臨現場。雖然在毛巡視中，各地可能會向他介紹擴大的合作社，但在運動走上正軌並取得政治局同意之前[20]，沒有跡象表明他視察過開展人民公社運動最熱烈的河南省。

最後，還有一點必須考慮：在6月的大部分時間裏，估計毛的注意力一定集中在軍事問題上，因為他所主持的重要的軍委擴大會議當月召開。毛在對成立公社的設想表示初步贊同之前，能有多少成熟的考慮呢？

直到會期很長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於7月22日閉會、赫魯曉夫7月31日至8月3日訪問北京以後，毛才得以繼續進行巡視，對人民公社做現場調查。8月4日至13日，他視察了河北、河南、山東、天津和首都郊區的兩個合作社。[21] 正是這次視察中，沒等政治局正式同意，他就批准成立人民公社。8月4日晚，毛剛視察過的河北省徐水縣大寺各莊農業社就正式宣佈成立人民公社了，當時還是臨時意義上。在毛巡視了河南4天後，《人民日報》報道了他在那裏視察七里營人民公社的消息，並說該公社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從合作社轉變成公社。這篇報道的措詞或許是刻意含糊，但估計指的是陳伯達在《紅旗》中所援引的毛的那段話。

毛在七里營與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交談中說，他希望七里營的生產成果能在全省推廣。吳答道，有這麼一個公社就不愁有更多這樣的社。毛聽罷說：「對！有這樣一個社，就會有好多社。」這裏的用詞又不準確。「社」這個字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中都出現。而且，即使在毛明確的是人民公社的段落中，他仍然可以說他是在推廣七里營的生產成果，並非新的組織結構。[22]

然而，毛於8月9日在山東公開表示他支持人民公社。當省委書記譚啟龍透露某個地區提出要辦大農場時，毛告訴他：「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23] 一年後，毛明白他當時說得早了，便用責怪報界的方法為自己開脫——西方政客常用的辦法。[24] 我們將會看到，毛並非是唯一不願意記者積極報道他在大躍進高潮期間講話的中國領導人。

8月17日，即《人民日報》報道毛贊成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4天以後，政治局在河北海濱勝地北戴河召開了擴大會議。次日，《人民日

報》在態度鮮明的大字標題「人民公社好」下，宣佈河南省信陽地區全部成立公社。報紙沒有點明那句話是毛講的，但當時所有感覺敏銳的幹部一定已經清楚毛的態度。可以說是大局已定。[25]

據推測，雖然政治局在 8 月 29 日之前一直未就人民公社問題做出正式決議，但毛這時已爭取到主要同事們的支持。顯然劉少奇在 7 月中旬就在談論將工業、商業、教育和軍事與農業結合起來的必要性了。在公開場合，他仍然用「合作社」這個詞[26]，但私下卻已開始使用「人民公社」這個名稱。劉在石景山說，工人和農民每年應該換工兩個月；這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要用 5 至 10 年時間，這有助於實行共產主義。劉接著說：「工廠是農村，農村也是工廠，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農村的年輕人可以去工廠，工人的子女可以去農村組織共產公社。」[27]

這一跡象表明，毛澤東和陳伯達在前期建立農村綜合組織的問題上得到了劉少奇的贊同。它還表明，儘管劉少奇本人小心謹慎，不願在召開北戴河政治局會議以前公開使用「人民公社」這個名稱，但他太想搞建設，不願在這個問題上與毛的所作所為唱反調。只有在回首往事的時候，只有當向彭德懷等人作爭辯的時候，毛才會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為自己積極搶先表態尋找借口。

北戴河會議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大躍進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躍進還只是在生產競賽的基礎上進行。夏收比 1957 年同期增長 69%[28]。公社和土高爐已經出現，這本來是可以不過分張揚的。雄心勃勃的生產指標本來也可以冷靜地加以控制。因此，北戴河會議本來可以是一次調整經濟使大躍進走上正軌的機會。相反，這次會議卻被看作是進一步提高生產指標，向共產主義又躍進的一次嘗試。北戴河會議之前，中國似已通過有組織的千百萬民眾取得更大的經濟成就而使全世界感到驚奇。北戴河會議的結果

卻使 1958 年全國取得的真正的經濟成就，被中國領導人的狂熱自負掩蓋了。

譚震林發表了兩篇文章，對農業前景作了美好描繪，文章的時機把握得恰到好處，整個會議洋溢在高度的樂觀主義氣氛中。譚從夏季的大豐收推斷了當年的人均產量，照此推算，他認為該年的糧食總產量至少可達 2.4 億噸，也許可達 3 億噸[29]。即使按照較低的估計，也意味著比本年早些時候在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上宣佈的指標高將近 25%，是在 1957 年 12 月確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時所要達到的指標；較高的估計則要比這個指標超過 50%。

譚震林與毛澤東的親密交往始於 20 世紀 20 年代後幾年，他一直引以為豪。[30] 早在前一年秋天就從他的老戰友鄧子恢手中接管了農業。[31] 從 1957 年 10 月到 12 月，譚在河南進行了一系列視察，鼓勵和指導了這個省的熱火朝天的水利運動，並和當地升起的新星吳芝圃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並一起首倡了公社這一事物。[32]

令人尋味的是，這個 56 歲的湖南人，早先的一個印刷和裝訂工人，是中國共產黨內少有的真正的城市工人階級的典型代表之一[33]。當年他追隨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和井岡山積累了游擊戰爭經驗，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表現出卓越的軍事和政治才能。1949 年共產黨人勝利後，他在華東工作了一段時間，到 1952 年擔任該大區的第三書記。在他的上級（饒漱石、陳毅）缺席期間主持日常工作。在這期間，他作為江蘇省省長與江蘇省黨委書記柯慶施一道工作。柯和他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都被提拔為政治局委員[34]。大躍進期間，兩人關係變得富有象徵意義。譚鼓勵農民取得更大的成就，柯則如我們所知，促使毛熱心於鋼鐵戰線。

很少有西方人與譚震林接觸，甚至 50 年代中期他調到北京中央書記處以後也如此。但研究中共上層軍事人物的權威把他描述（大概根據國民黨將軍和共產黨背叛者提出的事實）為性格頑強、有超強的組織能力的人，一個「頑固、狡猾、善於諷刺、冷靜分析、、目標明確、

不留情面的人」[35]。大躍進期間，譚確實顯示出自己是一個「目標明確」的人。但在大躍進以後，毛也不得不指出，他可能不夠冷靜：

> 譚老闆，你那兒大炮也相當多，放的不准，心血來潮，不謹慎，共產共的快。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不謹慎，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長處是一股幹勁，肯負責任，比那些淒淒慘慘要好。[36]

譚震林之所以號召全國人民大干快上，和他對共產主義的理解有關，同時也解釋了大躍進期間他為什麼總充滿了幹勁。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希望看到他們的人民早日富裕，但很少有人能像譚一樣形象地描繪他們心目中富饒的共產主義：

> 那麼，共產主義到底意味著什麼？……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僅僅是填飽肚子，每頓飯都有肉、雞、魚和蛋……，還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頭、燕窩、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給……
>
> 第二，衣服穿著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滿足，有各種花色和品種的服裝，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藍色。將來，普通服裝僅作為工作服使用，下班後，人們就換上皮服、呢絨和羊毛制服……，狐皮服也會增多，當人民公社都養了狐狸，那時的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
> 第三，住房方面，房屋都達到現代城市的標準。現代化是什麼？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廂有供暖設備，南廂有空調設備，人們都住在高樓裏，不用說，裏面有電燈、電話、自來水、無線電和電視……
>
> 第四，通訊方面，除了跑步的選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往各個方向，每個省都有機場……每個地方都有飛機製造廠的日子也不遠了。
>
> 第五，每個人都受到高等教育，教育已經普及。總之，共產主義含義是：食物、衣服、房子、交通、文化娛樂、科學院和體育活動，這些意味著共產主義。[37]

這就是典型的「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但沒有跡象表明譚與時代和毛脫節。根據譚的說法，毛描繪了一幅消費方面的幸福圖景：短期目標為，每人每年的生活標準是 750 公斤糧食、50 公斤肉、10 公斤菜油和 10 公斤皮棉[38]。確實，毛 8 月 4 日視察河北時，建議如果徐水縣的糧食有剩餘，賣不出去，這樣合作社的成員就可吃得更多，如果願意，他們一天可以吃 5 餐。[39] 文化大革命期間，譚因允許農民歡宴 1958 年的豐收而受到批判，但毛在同一期間也准許這種慶祝。[40]

文革期間，鄧小平也因提倡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而受到批判。他的共產主義標準低一些：每人每年 30 公斤肉、每天 0.25 公斤蘋果及 2 兩白酒。一般說來，鄧的遠景比譚的也更有節制，譚侈談航空交通的普及，鄧則建議中國成為一個自行車王國。鄧預言將來可能會允許穿高跟鞋和擦口紅，說這話時，禁慾主義代替鋪張，已開始成為大躍進的基調，對這樣的言論，有人提出異議。[41]

事實上，在中國和外國，大躍進的形象是很矛盾的。一方面，糧食增產報告的逐漸加碼，以致於宣傳者描繪中國已進入一個極大豐富的時期，每個人都吃得很好——也許免費供應——他們的物質要求全部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勞動軍事化管理，批判對物質的追求，斷言中國已接近真正的共產主義時期，這些給人以意識形態至上和禁慾主義的印象。而這種矛盾現象是由於在擴大生產的枝葉上嫁接上人民公社這棵新苗引起的。這種嫁接就是在北戴河會議上進行的。

為了與大躍進的精神取得一致，北戴河會議的果實纍纍，一系列政策被制定——公社、農業、工業、教育、商業、軍事以及幹部參加體力勞動。有關這些問題的大部分決議和指示，在隨後的幾週內都公佈了出來[42]。最重要的決定是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公社和將 1958 年的鋼產量指標提高到 1070 萬噸，比 1957 年總產量增加了一倍。在 1958 年的頭 8 個月裏，中國生產了相當於 1957 年全年產量的鋼鐵[43]；而新指標意味著要在後 4 個月裏再生產相當於 1957 年產量的鋼材。北戴

河的另一個主要預言是糧食產量將達到 3 億至 3.5 億噸，比 3 個星期前譚震林的估計又上升了 25%。[44]

單純作為一個規劃，關於公社的決議像所有類似中央文件一樣，最初階段比較保守。公社這一事物被描繪為一個「自然趨勢」，當形成全國範圍的高潮時也未被誇大，形容為「完全可能的」，實際上當時已經是「勢不可擋」的，公社的發展是躍進成功的基礎，它已激發起農民的政治覺悟。這時候已經出現了浮誇的跡象：農業總產已增加百分之百、百分之幾百、百分之一千甚至百分之幾千——有的農村幹部懷疑實際增長低於或者遠遠低於百分之一百，這些數字在他們聽來高得嚇人。

為了追求農業產量，不得不打破農業合作社甚至縣、鄉之間的界限，導致組織和活動的軍事化、日常生活集中化和農民的「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這個時候，想像代替了現實。農業合作社已不適應了，公社的發展是「一項基本政策，必須立即執行，以引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45]

公社的典型模式是，每鄉一個公社（鄉——農村的基層組織，最初包括一個村莊，集體化時擴大了，包括兩個以至更多的村莊）[46]，每個公社包括 2000 戶，大約 1 萬人。只要條件許可，有 6000 戶的公社也可以。就是有 2 萬戶的公社也不加反對。然而，比較可行的發展途徑是以縣為單位通過公社聯合。鄉的黨政組織必須和公社一致，使公社成為農村權力機構的基層單位。這種公社形成的進程分兩步：先由小農業合作社合併為大農業合作社，然後進入人民公社。如果這個過程能縮短為一個，那也好，但不得搞強迫命令，而且這種過渡不得影響生產。[47] 在過渡當中，原先的小型農業社將變成耕作區或生產隊。[48]

在公社範圍內所推廣的集體生活的模式是：有集體食堂、幼兒園、托兒所、裁縫店、理髮店、澡堂、敬老院、農業中學和紅專學校。[49] 私人的小塊土地也由集體耕種，但一些樹木可歸私人所有。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決定，因為雖然讓私人保留使用的土地，其面積不

超過全部公有土地的5%，但這點土地對個體農家來說非常重要，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那樣，它的作用是：

(1) 提供一般生活所需的各種食物如青菜、水果、豬肉、家禽；

(2) 使許多家庭的生活標準從起碼水平提高到維持溫飽；

(3) 通過農產品出售提供現款；

(4) 與不穩定的集體收入相比，這點經濟收入可提供某種安全感。[50]

關於老合作社的私人財產問題，應該擱置一到兩年後，隨著生產的發展和收入的增加以及公眾覺悟的提高，自然地轉變為公有。大概政府不想使剛出世的公社為購買其成員的入社財產需負的債務所壓倒，因而勸說農民贈送他們的財產給公社。當時還是集體所有制，多數地方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估計需要3至6年，現存的分配製度應當保留，但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可以實行工資制[51]。決議的最後一段看來是謹慎的。目前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但是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52]

經驗表明，中共習慣將指標定得低一些，便於超額完成。這種作法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再次得到支持。[53]以此推論，在此引用的決議中關於公社的幾段話，可以看作是一種煽動，且是刻意為之。雖然基層對過渡有非凡的熱情，決議本身卻清楚地預示著一夜之間似乎就能跨越到共產主義。毛宣稱，從集體所有制向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可能需要10至25年。這只是他的大略估計，對待這個問題他還是相當謹慎的；但他沒有試圖暗示，北戴河決議規定的時間表是違背他的心意的[54]。劉少奇(後來像毛一樣，對記者在大躍進期間對他的過分報道表示不滿[55])的話被《人民日報》引用來鼓動人民馬上實現共產主義：現在不要認為共產主義是很慢的啊！只要我們好好幹，實現共產主義就很快了。[56]

不幸的是，劉少奇(毛也如此)北戴河的所有講話都沒有公開，但報道了他在北戴河之後所作的評論，其中沒有跡象表明他對自己的預

言有所改口。確實，從 1958 年劉少奇在一些省的視察來看，劉的興趣主要在「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出現」，並鼓勵其發展。[57]令人驚奇的是，儘管毛在公社模式的形成和鼓勵中的作用很大，這位黨的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之後卻沒有集中精神在這些問題上，而是轉移到了大煉鋼鐵的熱潮之中。

鋼鐵狂熱

1958 年下半年毛被鋼鐵生產迷住了，這有點不可思議。他承認自己的工業知識是微薄的。[58]他很早就意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起著壓倒性的作用，他在中國共產黨中脫穎而出成為領袖，與這一點密切相關。同時，他很早就意識到農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因而帶領中國共產黨探求一個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到 1958 年 8 月，毛相信公社運動的發展是一項有組織的工作，要成功就必須基於 1955-1956 年的合作化經驗；他還認為，要取得秋收躍進式的增長，必須基於 1958 年夏季創紀錄的收成基礎上[59]。此時人們已經原諒他了，畢竟，他的政治風格就是在取得成績之前提前宣佈勝利，他不甘平靜的個性注定，總是在下屬們還在為上一場戰役掃尾時，他已經開始準備打下一場戰爭。[60]9 月 9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他簡短提到公社，透露說，希望公社化運動在那個月基本完成，其他剩餘問題可安排在同年冬及第二年春解決。[61]

之前，毛戰人，戰天，這二者都是不確定的。毫無疑問，到了 8 月，他一心投入了鋼鐵生產的戰鬥。他認為這個是確定可控的——正是他的無知所在。北戴河公報反映了毛在這方面的新觀點：

> 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要求工業戰線迅速地趕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級黨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轉移到工業方面來。因此，會議決定，全國的省和自治區黨委的第一書記，從現在起，就必須首先注意工業的領導，但是同時不應當放鬆農業的領導。……工業的中心問題是鋼鐵的生產和機械的生產，而機

械生產的發展又決定於鋼鐵生產的發展。根據當前全國人民對於鋼鐵的巨大需要和對於鋼鐵生產的巨大努力，根據鋼鐵冶煉設備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產的情況，鋼鐵生產的飛躍發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62]（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1957 年鋼產量為 535 萬噸。在 1958 年 2 月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將 1958 年的鋼產量指標有節制地定為 620 萬噸，5 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則增加到 800 ～ 850 萬噸[63]。7 月 17 日，也許是在審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時[64]，毛決定鋼產量比 1957 年增加一倍，達到 1070 萬噸[65]。這個指標在政治局通過[66]。

毛去世後，中國經濟學家指出，把鋼鐵指標翻一番，是大躍進所犯的一個重要錯誤，使得中國經濟徹底失衡。[67] 毛曾承認他是這一指標的主要制定者，也承認上海市第一書記柯慶施是這個指標的建議人。[68] 毛在一年後解釋說，他沒有考慮到席捲全國的煉鋼運動中，缺乏鐵和煤的地區將需要大量的原料運輸，而這又將大大加重中國鐵路的運輸負荷。[69] 毛責備以李富春為首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說該部門在北戴河會議後放棄了責任，沒有妥善地對待這個問題。[70] 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起初在北戴河討論中反對群眾煉鋼運動，但後來又表示贊同，以致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指責為過度狂熱！[71]

事實上，北戴河會議後不久，毛自己在私下又流露出增大指標的想法。9 月 5、8、9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 3 次講話中，他想像 1958 年的實際鋼產量將達 1100 萬至 1200 萬噸。在一次講話中，他提出這兩個數字是有可能達到的。這數字意味著在北戴河會議已經通過的增產 100% 的基礎上再增加 24%，由此可見，主席在指標加碼時是多麼隨心所欲。[72]

這種不切實際的氣氛隨著毛對未來的設想而越來越嚴重，即使善良的編輯費盡心機將數字削減，還是不能挽回大局。毛期望 1959 年鋼產量達到 3000 萬噸[73]，這一估計在北戴河會議上也得到認可[74]。他還建議在 1960 年趕上蘇聯，生產 6000 萬噸鋼，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

大鋼鐵國家。毛還做了進一步的錯誤預測，認為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即 1962 年，中國將趕上甚至超過美國，生產 8000 萬至 1 億噸鋼[75]。後來他私下承認，他個人對 1962 年的估計更高，達 1 億至 1.2 億噸[76]。那時美國由於經濟制度的局限性而使鋼產量徘徊於 1 億噸左右，中國則脫穎而出，不要幾年將達到 1.5 億噸。[77]在 15 年或稍長一些時間裏，即 70 年代中期，中國將生產 7 億噸鋼，兩倍於英國的人均產量。[78]

早在兩年前，即 1956 年冒進的前夕，毛還預計趕超美國需要 50 年～ 70 年[79]。到 1958 年這個樂觀的夏天[80]，他已經大大縮短了這個時間。

第六章 高潮

1958 年 8 月北戴河會議後的兩個月是大躍進的高潮。在這段時期內，生產領域內的勞動者像超人一樣努力，人們在公社的基礎上熱情開展新社會的各項試驗。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巡視各地，大唱讚歌。此後，在 1958 年 11 月，人們開始冷靜下來，12 月的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下達了一個收縮的命令。

在那情緒高漲的兩個月裏，人們的熱情大部分是由國內的幹部激發起來的，因為毛澤東使後者相信，中國將很快進入極樂盛世。但是，如果不考慮當時的國際形勢，也不可能完全瞭解在那些秋季的日子裏出現的高漲情緒。

對 1958 年夏季出現的國際危機，中國領導人是沒有責任的。事實上，在危機開始時，總書記鄧小平就私下裏向包括許多非黨人士在內的聽眾擔保，近期內不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一般說來可以避免。中國的戰略是經濟競爭，通過發展經濟增強力量，以警告美國人、日本人和鐵托。確實，美國人繼續藐視一個沒有原子武器，而且鋼產量不足掛齒的國家。中國只有依靠中立國家的經濟發展，指望其拒絕與西方做生意，並在美國和英國引發革命。[1] 不過，這種冷靜而又長遠的考慮為後來鬧哄哄的幾週攪亂了，中國人的行動加劇了東西方之間的緊張形勢，中國自己也提高了戰備等級。也正在此時，北京與莫斯科之間出現裂痕，在中蘇分裂的道路上樹立起又一個里程碑。

台灣海峽危機

7 月 13 日伊拉克發生政變，親西方的費薩爾國王和努里 賽義德首相被推翻，國際形勢驟然出現危機。[2] 西方的反應是迅速向另一些

政局尚穩、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派遣部隊，以防止發生類似的政變。7月15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命令美國軍隊進入黎巴嫩。7月17日，英國軍隊到達約旦。

西方關心的不只是約旦和黎巴嫩的近期命運。伊拉克政變削弱了美國對蘇聯南翼的遏制，奪走了巴格達條約同盟(後來的中央條約組織)的一個重要成員。它也導致了溫和的伊拉克和約旦阿拉伯聯盟的突然解體。這個聯盟是在5個月之前建立的，以抗衡1958年2月1日建立的激進的埃及和敘利亞(後來還有也門)組成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所以蘇聯領導人(也許他們聯想起自己的早年歷史)的憂慮並不奇怪，他們擔心英美登陸是伊拉克反革命東山再起的前奏，無論是直接動用英美部隊，還是伊拉克原先的夥伴約旦作代理人，都可能使這一地區陷入更大的衝突，使蘇聯也被拖進來，最後導致蘇美直接核對抗。

為此，7月19日，赫魯曉夫提議召開一個首腦會議，包括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印度和聯合國秘書長(雖然會議不在聯合國舉行)參加，「以便立即採取可能採取的步驟，結束已經發生的衝突。最重要的是先避免事態拖延」。[3] 儘管發出如此敦促，英美的反應仍然是冷淡的，只是在7月22日(這一天正是赫魯曉夫希望舉行首腦會議的日子)作出一個答覆，表示只願意在聯合國舉行會議。赫魯曉夫第二天答覆說，為了會議的舉行，建議7月28日召開聯合國安理會。他重申要印度參加。這一次，英國歡迎蘇聯的讓步，但美國保持冷淡，聲稱28日太早了。事實上，28日和29日，國務卿杜勒斯要在倫敦參加巴格達條約國會議。但到7月28日，赫魯曉夫採用了完全不同的腔調，在一封註明是當天的信中指責美國從前同意在安理會開會，但現在背棄原來的立場，並聲稱他現在願意採納法國關於在歐洲舉行會議的建議。這種改變無疑是因為莫斯科略感欣慰地看到西方勢力並不打算推翻伊拉克新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赫魯曉夫大概感到需要注意主要盟國對危機的看法以及它們的處理意見。

自從毛澤東宣佈東風壓倒西風、共產主義陣營應該借此機會增強軍事力量之後，中東危機是爆發的第一個危機。赫魯曉夫關於首腦會議的匆忙建議，在北京看來是一種膽怯。當《真理報》社論因為美蘇都擁有核武器而呼籲冷靜克制時，《人民日報》反對對美國侵略作任何讓步，聲稱要從共產黨國家派遣志願部隊到中東去。北京的社論表示對訴諸聯合國機構持懷疑態度。這種態度並不令人奇怪，因為在安理會佔有席位的不是北京，而是台灣。在背後，還可能隱藏著北京對赫魯曉夫建議印度出席首腦會議的怨恨。直到 7 月 22 日，《人民日報》才最後贊同赫魯曉夫召開緊急首腦會議的建議。[4] 9 天以後，即 7 月 31 日下午，赫魯曉夫秘密到達北京，陪同他的有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5]。

赫魯曉夫之行最後發表的公報表明，中東危機是雙方討論的主題。毛澤東正式贊同蘇領導人關於首腦會議的建議，雖然公報並沒有詳細說明首腦會議在什麼情況下舉行。[6] 毛後來說，會談中沒有提到是否應舉行一個四強首腦會議。[7] 這可能意味著毛並不想因為赫魯曉夫提出傷害中國感情的建議而責備他，或者意味著赫魯曉夫已決定採取新的行動步驟，並將此向毛作了介紹，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總之，赫魯曉夫回莫斯科後不久再次致函艾森豪威爾，按照毛已贊成的方案，不再提首腦會議的建議，因為美國拒絕考慮「在安理會之外召開政府首腦會議的可能性」。「眾所週知，在安理會的多數成員屬於侵略集團，並且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代表參加的情況下，這個機構不可能解決外國武裝干涉阿拉伯東部國家的問題」[8]。赫魯曉夫建議召開聯合國特別會議。

即使蘇聯和中國在中東的外交行動完全一致，毛還是覺得赫魯曉夫在對抗西方方面缺乏堅定性。赫魯曉夫離開後，在《人民日報》的一篇關於首腦會議的社論中，措辭激烈地重申毛澤東式的軍事戰略，反對讓步，駁斥了「靠討好妥協侵略者就能獲得和平的謬論」，好心的和平鼓吹者遭到無情的嘲笑，他們天真地認為為了緩和緊張局勢必

須不觸動敵人。而在莫斯科，《真理報》關於首腦會議的社論強調，「兩國偉大的人民決定竭盡全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防止新的戰爭災難」。[9]

但是，毛對赫魯曉夫懷疑和不滿加劇，顯然是因為後者提出的關於聯合軍事協議的建議。此建議是兩位領導人本次會見的主要議題。[10]根據赫魯曉夫的意見，中國應允許蘇聯在中國領土上建立一個無線電台，以便和蘇聯在太平洋的核動力潛水艇進行通訊聯繫。[11]使蘇聯人驚奇的是，毛對此強烈反對，宣稱這是對中國主權的一種侮辱。[12]蘇聯駐北京大使尤金報告說，他與毛的會見「像一個晴天霹靂，他（尤金）是第一波，之後，我們和中國關係惡化的信息潮水般湧來。」[13]這個警告使蘇聯領導人感到，赫魯曉夫和馬利諾夫斯基應當秘密飛往北京。[14]

毛與赫魯曉夫的會談大多在一個游泳池旁舉行。兩位領導人在各自的浴巾上曬太陽，就像「熱沙灘上的海豹」。據說赫魯曉夫就建立無線電台一事向中國表示道歉，但堅持說絕沒有侵犯中國主權的意圖。毛提出一個相應的建議：蘇聯提供貸款，由中國建立一座無線電台。赫魯曉夫接受了這一建議，但他聲稱，雖然這事定下了，但中國人並未建立這種設施。[15]

隨著無線電台問題表面解決，赫魯曉夫又提出要求，允許為蘇聯潛艇加油。允許海員在中國沿海港口短期度假。根據赫的解釋，他的建議實際上是在謀求一個全面的基地。毛當即拒絕了這個要求，認為這是侵犯中國主權。同時提出，作為交換，中國潛艇應當可以進入蘇聯北冰洋港口。[16]

毛對會談的簡短概括把赫魯曉夫的要求視為一種企圖：封鎖中國海岸，派一支聯合艦隊控制中國沿海地區[17]。同時，中國方面的另外報道還證實了蘇聯要求在大陸重建遠程導航基地。[18]

也許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不夠坦率和全面，也許他為艦隊聯合行動確曾提出過具體的要求。2 月 22 日，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講話包含了

一個暗示：他將歡迎聯合軍事行動[19]。但是重要的是，雙方都認為，不管聯合行動的目的是什麼，這個建議對中蘇關係將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

中蘇首腦會談發表的公報沒有提到台灣。據毛說，他和赫魯曉夫沒有討論其後對國民黨沿海島嶼的炮擊[20]。赫魯曉夫沒有具體證實這一點，但 1958 年他與中國會談的回憶中間提到了它。[21]他確實說了，在那年的某個時候，中國「曾要求從我們這裏獲得相當的軍事援助，說是為了對蔣介石採取軍事行動，他們需要飛機、遠程大炮和空軍顧問。」赫魯曉夫表示滿足中國的要求，並不企圖限制北京，因為「我們認為他們試圖統一中國領土是完全正確的」。蘇聯慷慨解囊多少不清楚。西方消息靈通人士認為，1957-1958 年，中國空軍狀況沒有多少改善，它主要由米格—15 和一些米格—17 戰鬥機及伊爾—28 輕型轟炸機組成。米格—15 在朝鮮戰爭期間曾是中國空軍的主要武器，但到那時「幾乎過時了」。米格—17 在蘇聯也在逐漸過時[22]。金門危機時期，中國空軍變化的唯一象徵，是在正對沿海島嶼的前沿基地上，以米格—17 更換米格—15。無論如何，米格—17 比台灣的 F-84 佩刀式飛機是處於優勢的。[23]

赫表示蘇聯還提出在中國駐紮殲擊機中隊，並為中國對這個建議的冷淡反應表示驚奇。這個建議體現了中蘇「兄弟般的團結」[24]。儘管赫魯曉夫不承認，但很有可能的是，在海峽兩邊的敵視狀態中，蘇聯提出在中國大陸駐紮殲擊機，在中國海岸建立通訊設備及海軍設施的計劃，是為了對中國這一盟國施加影響，該國主席對核戰爭後果的分析，在他看來單純得可怕。[25]因此，蘇聯向中國提出的三項軍事要求時引起中國的疑慮，這也不奇怪，就是因為懷疑，毛沒有預先通知赫：在他離開北京後 3 週，中國將發起對海峽對岸國民黨的炮擊。

毛赫會晤之前，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之後不久，中國內部發出非常強烈的解放台灣的號召，其中包括因為中東問題的群眾集會。但在赫魯曉夫訪華期間消失了[26]。我們假設，最高會晤之後，毛決定單獨

行動以證明他對蘇聯的綏靖政策的批評是正確的，只有通過對抗，美國才會退卻。他能採取對抗行動的地方就是台灣海峽。據毛自己的描述，炮轟金門是他在北戴河會議上精心研究的3件事之一（另兩件是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27]。這表明舉行軍事行動的建議也在會上討論過。

8月23日，當會議還在進行的時候，猛烈的炮擊就開始了。[28]魚雷艇負責阻止對金門的任何增援。跡象表明，中國的目的是逼迫國民黨退卻，而不是通過一次炮攻軟化台灣。[29]不過，自8月27日起，中國大陸沿海的無線電廣播向金門施加壓力，威脅說將馬上登陸，敦促其投降。[30]富有深意的是，這些警告從未向全國廣播，因此大多數中國人還蒙在鼓裏，不知道危機有多麼嚴重，因此也意識不到毛澤東這場賭博冒了多大的風險，遭到多大的重創。

毛澤東的這一賭之所以敗北，是因為他低估了美國的決心。中國炮擊的同一天，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一篇關於中國海岸地區有軍隊集結的評論中警告說，美國對中共對沿海島嶼的攻擊將不單純看作是有限的軍事行動。[31]由於中國的有效封鎖，美國要為國民黨的供給船隻護航。[32]可能是為了阻止美國的支持，9月4日，中國發表了關於十二海里領海主權的聲明。這個聲明被美國斷然拒絕。同一天，杜勒斯聲稱，美國將不受任何約束，以保護沿岸海島[33]。當時看來，中美衝突的危險正在迫近。

但是，在第二天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向會議成員保證，政府將試圖緩和危機，因為這對世界人民更有好處。[34]他沒有預料到炮轟金門之後會引起世界性的震動，但他稱只有南朝鮮和菲律賓支持美國。然而，危機對那些落後的人並不是一件壞事。[35]不久後，他表示中國像蘇聯一樣，不希望戰爭，而且確實反對戰爭。理由是核武器會造成巨大的破壞，中國沒有核武器，而且他的聽眾也會想到，中國不可能依賴蘇聯的核武器。中國不會首先發動戰爭。不過中國不怕戰爭。他暗示，用手榴彈武裝起來的中國不會無視原子彈襲擊造成的損失。但

是，他試圖像前年在莫斯科會議上那樣使他的聽眾相信，即使全世界有一半人被消滅了，也不是全面災難。他告訴他們，他就這個問題同尼赫魯進行了討論。不管中國人是否害怕，敵人都可能用原子武器進攻，不過為了保持士氣，他們最好不要害怕。這就是為什麼有必要在人民公社裏大規模訓練民兵的理由。[36]

毛 9 月 5 日的講話直到現在還沒有正式發表，而且不清楚當時俄國人是否知道這個講話。不過，當時他們十分關切，因此派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秘密前往北京。[37] 據說，葛羅米柯 9 月 6 日參加了中國的政治局會議。他的短暫訪問顯然是為了弄清中國的目的。由於中國人事先沒有就金門行動和俄國人進行磋商，因此他們擔心他們在這個軍事行動中將擔什麼義務。關於這個問題，他們的宣傳態度一直十分猶豫。這表明，他們因中蘇條約而捲入一場不斷升級的危機是非常勉強的。[38] 很可能這位俄國特使聽到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泰然自若地談起蘇聯和美國的核交鋒，而中國能經得起這種核交鋒時，大為震驚，便堅決表示，莫斯科拒絕冒這個風險。毛後來形容赫魯曉夫過度謹慎[39]，大概正因為此，以及杜勒斯的拒不妥協，迫使中國人果斷地採取行動，終止這場危機。9 月 6 日，周恩來總理發表一項聲明，同意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直到 9 月 7 日，赫魯曉夫才敢冒險寫信給艾森豪威爾，保證全力支持北京，並宣佈對中國的打擊就是對蘇聯的打擊。[40]

第二天，9 月 8 日，毛再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此時已經明顯處於防衛的情緒。他暗示，在美國政府內部，對金門危機的做法存在不同意見。他還提到美國人正在考慮，撤離沿海島嶼 11 萬國民黨軍隊也許是明智的選擇。即使這些軍隊不撤離，中國也會繼續進行大躍進。他承認，在與會者中有些人並不認為發動金門危機對己有利。他再次談到他先前的分析，危機的結果使美國遭到全世界普遍的指責，就連英國也動搖了對它的支持，而中國只是在華盛頓、台北和漢城受到譴責。最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毛講話時，距離收到赫魯曉夫的支持信不過 24 小時，但他還是自信地稱，蘇聯同中國人「始終」保

持團結，並說：「他同意台灣應該歸還我們，但是希望能夠採用和平方式。」[41] 顯然，毛認為，最高國務會議成員不會被赫魯曉夫的恐嚇所欺騙，但是盡力充分利用這種形勢。當時，他還違心地簽署了中共中央的一封覆信，這封信對蘇聯就中國不受到攻擊這件事所作的保證表示「由衷感謝」[42]。但是，幾年後，中國人公開否認蘇聯在 1958 年的金門事件中同他們肩並肩站在一起的說法：

> 蘇聯領導人分別在 9 月 7 日和 19 日表示支持中國。當時，台灣海峽的形勢雖然是緊張的，但是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也不需要蘇聯用核武器來支持中國。當蘇聯領導人認清這種形勢時，只有表示支持中國……。[43]

其後，隨著金門危機的發展，出現了某些戲劇性的時刻，不過正像上面一段引文所強調的，主要決定已經由中蘇領導人在 9 月的第一週末做出了[44]。中蘇關係埋下了進一步惡化的種子。本文所關注的是中國人化挫折為動力的態度，甚至將危機作為推動國內政策的機會。

10 月份，北京發表了題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毛的語錄，潛在的目的是要使中國人相信，無論在國際事務中可能經歷什麼樣的暫時挫折，他們終將獲得勝利。[45] 儘管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肯定了蘇聯的支持，語錄還是譴責了那些過高估計敵人力量的共產黨人，這顯然指的是蘇聯在危機中的態度。但是在私下，毛並不像他提出的紙老虎理論那樣樂觀自信。顯然中國駐倫敦的臨時代辦於 1958 年秋天向北京發出了認為西方盟國已分崩離析的樂觀的信件。毛就此作了評論：

> 宦鄉的論點是正確的。四分五裂，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勢。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當中，還沒有最後破裂，但是向著最後破裂前進，最後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過程時間，可能有相當長，非一朝一夕。[46]（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10 月 25 日，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宣佈，中國軍隊從此只會隔日炮轟台灣。這種特別安排，加之前些時候對美國侵犯中國領空和領海而

發佈一系列的「嚴重警告」(最後也未付諸行動)——不久就看得出，這些警告絕不會演化為報復行動——對於政治敏感的中國人來說，一定弱化了他們的挫折感。危機同樣激起中國內部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之間的劇烈分歧。據說，彭德懷不同意毛澤東關於炮擊的決定，拒絕合作，周恩來不得不出來負責。10月12日參謀長粟裕被解職，可能是毛澤東的還擊，但一年之後粟裕將軍又重受重用，說明金門炮擊以失敗告終，沒有怪罪於他身上。【47】

9月5日，毛曾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過，美國和中國都害怕戰爭。問題是誰更怕誰。他請與會者客觀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過一兩年後再作回答。他自己的看法是，杜勒斯更害怕中國而不是相反。【48】然而，在看到1958年初秋中國的行動之後，大多數的與會者是否信服他的觀點，卻值得考問。

「全民皆兵」

毛從這次失敗的行動(譯按：指金門事件)中所能得到的直接好處是，迅速地組建了民兵。從表面上看，這是為了保持士氣，減少對核打擊的恐懼。【49】他終於使那些持不同意見的將軍們接受他的觀點，即有必要組建民兵。事實上，「全民皆兵」運動是周恩來促使國際危機趨於緩和以後，才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但運動的影響，以及大規模的反美集會及宣傳，都是為了掩飾中國態度上的退卻，因為這一切暗示著戰爭的危險不是弱化而是增強了。【50】

民兵運動促進了公社內部的「勞動軍事化」。這樣有助於幹部激發起群眾愛國主義的熱情，動員農民在大躍進的高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一個月內，成千上百萬的中國人正式成為民兵。僅這個國家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省就有3000萬民兵。四川省成都市一家工廠的工人晚飯後用兩小時的業餘時間進行民兵訓練，而在一個鄉村每天規定要訓練3小時。在民兵訓練中，要養成「統一起床、統一吃飯、統一睡覺、統一出工和統一收工」的習慣。「這大大地加強了集體主義的生活

和組織原則，在生產工作中培養鬥爭精神」[51]。同樣，山東省的2500萬民兵除了加速民兵訓練，「還在大煉鋼鐵和糧食生產戰線上積極發揮主力軍的作用」[52]。北京民兵有句格言：「生產不忙多訓練，生產忙時少訓練，生產緊張不訓練」。《人民日報》發表這句格言可能是為了抑制過熱的業餘民兵訓練[53]。被樹為榜樣的河南省，在步槍實彈訓練中取得了好成績，放了民兵訓練的第一顆「衛星」[54]。每個公社都有自己的軍事部門和自己唱的民兵歌曲：

左手拿鎬，右手拿槍，
我們把田野當戰場。
用鋤能打千斤糧，
用槍苦練保國防。
美帝膽敢來侵犯，
堅決把它消滅光。[55]

儘管這一切都很活躍，印度的一名學者於1958年11-12月訪問了4個公社以後，發現北京附近的一個公社仍在計劃組建自己的民兵。據報道，雖然他向公社主任和瞭解其他方面情況的翻譯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決定使這些公社軍事化的理由他還是沒有弄清：

我在田間漫步，看到地裏到處立著一堆堆步槍。我看到一隊隊農民背著老式步槍在操練軍事隊形。我問，農民在參加實戰以前需要經過多長時間的學習。這位主任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但是他告訴我，這個偉大的公社運動正處在第一階段。我來的時候，正值全國形成公社熱，而且這個公社熱正是盛行的時期。[56]

這位主任躲躲閃閃、含糊其詞，是可以理解的。1959年1月，2.2億名男女被吸收參加民兵。儘管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呼籲發數百萬支、實際上達到數千萬支的槍，呼籲每個省都製造輕型武器[57]，但要想讓這些民兵都接受實彈打靶訓練還是難以實現的。普通民兵是由所有15歲至50歲的健康公民組成的，同時還吸收15歲至30歲的人組成

一支「基幹」民兵，他們不僅在軍事方面起帶頭作用，而且在生產上也是標兵。河南省有 2000 萬民兵，到 1959 年夏季只有 20 萬基幹民兵受過訓練，其中僅有一半人經過「實彈」訓練。[58] 其實，數百萬沒有受過實彈訓練的人，被新使用的同生產任務相聯繫的軍事術語從心理上動員起來了。這些術語把農民說成是「農業戰線」上的「戰士」，把農村地區說成是「戰場」，把自然力當作要去戰勝的「敵人」。[59]

正像一名學者曾經指出的那樣，1958 年的群眾性民兵組織在軍事上是對常規技術和機構的否定。這類否定正是大躍進的機構特徵。[60] 毛在 9 月底號召大辦民兵師，這表明他所傾向的針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防禦政策取得了勝利，即，使敵人淹沒在「由數萬萬民兵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61]。這是「任何現代化武器所不能摧毀的」。這還重申了他的原則：「武器是戰爭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62]。但是，毫無疑問，毛的勝利使許多職業軍官感到不滿。[63]

集體主義生活

由勞動軍事化迅速形成的集體生活方式，成為幹部們宣傳的企圖向共產主義躍進的基礎。一首流行的順口溜（源出康生）頌揚道：

> 共產主義是天堂；
> 人民公社是（通向天堂的）橋樑。

這首順口溜說明，為完成大躍進的艱巨任務，需要通過解放婦女參加生產來滿足不斷增長的勞動力的需求。

公社食堂是使婦女擺脫家務勞動的一種辦法。《人民日報》10 月 25 日在其《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中引用了列寧的論述，並援引了河南省的範例：全省興辦食堂意味著每個公社社員有 3 個小時的額外時間用於工作和學習，勞動生產率提高 30%，意味著 600 萬個婦女勞力從家務負擔中解放出來。這家報紙承認，集體吃飯「涉及到全體農民幾千年來生活習慣的改變」。但是這家報紙說，如果食堂辦得好，那

麼最初的那種不習慣和不方便的感覺就會消除。[64]但是，僅兩個星期後，這家報紙不得不專門就食堂問題發表社論，因為相當數量的食堂辦得不好，其中有許多食堂只有米飯沒有蔬菜。這篇社論透露說，食堂運動的必然結果之一是收回農民的自留地，由公社統一耕作。[65]

為勞動者供餐的集體食堂有一個現實意義，就是它代表意識形態領域的先進方向。10月1日，《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指出，許多公社正在實行免費供應糧食或免費吃飯制度，甚至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免費提供：

> 有的〔人民公社〕實行「七包」或者「十包」：即包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髮、看戲、烤火費和結婚費等等。這種供給制當然還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衝破了「按勞取酬」的法權限制，適合於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在「公」的方面向前發展了，因此它應該屬於共產主義的範圍，是共產主義的萌芽。[66]

據報道，農民感到高興的是，保證下頓有飯吃的老問題已經解決。毛在視察安徽的時候表示：「既然一個公社能夠實施吃飯不要錢的原則，其他公社同樣能這樣做。既然吃飯能不要錢，將來穿衣也可以不收錢。」[67]

在政治局關於公社問題的決議裏，這些都沒有提倡，不過上海市第一書記柯慶施在北戴河會議上明確提出吃飯不要錢的建議。[68]確實，劉少奇後來也承認，食堂制僅僅是10月1日由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強行實施的。[69]除了意識形態的崇高理想外，實行「免費供給」制顯然是為了解決如下問題：即因把較富的和較窮的農業合作社並在一個公社裏造成的問題，停止實施舊的工分制度帶來的問題，收回自留地帶來的問題和大躍進期間長時間體力勞動帶來的問題。那些吃閒飯的人少勞動力多的家庭反對這個辦法，說它會降低勞動熱情，使「懶骨頭」的數量增多。在這些「落後」思想遭到批判的同時，有人想要建立起一種半供給半工資的制度。試圖滿足某些公社的這種要求[70]。劉

少奇9月在視察江蘇時承認，只有到了共產主義才能徹底消滅懶漢，但是他支持這種新出現的供給制度：

> 列寧曾經說過：共產主義的勞動是自願的勞動，是無定額的勞動，是不指望報酬、沒有報酬條件的勞動。人們不管報酬多少，不管有沒有定額，他們總是做得更多更好。[71]

毛本人最喜歡完全免費供給制。他由陳伯達和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陪同訪問了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調查怎樣建立這種制度。張春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快上升到黨的高位[72]。連因職務的制約而比較謹慎的財政部部長李先念[73]，也認為供給制是一件「史無前例的偉大事件」。[74]

解放婦女參加生產的另一個辦法，是發展寄宿小學甚至寄宿托兒所。而且，這樣做也被看成是一項促進形成集體主義生活方式的措施。是早期培養「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世界觀的一種方法。青年人的報紙《中國青年報》刊登的一篇文章描述社會主義化進程如下：

> 托兒所建立起來以後，孩子們從小就在托兒所、學校裏長大，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什麼玩具、糖果、教室、阿姨、老師，以至院子裏的向日葵和其它勞動成果都是大家的。這樣，孩子們的頭腦中就只有「我們大家的」集體觀念，而不容易產生「我的」私有觀念。集體生活要有規律要互相幫助，這就有助於培養孩子們的組織性、紀律性和互助友愛精神。[75]

寄宿學校運動顯然受到了劉少奇的鼓勵，表明他對培養共產主義幼苗有興趣。他在9月視察河南省的公社時曾說過（大意）：

> 全托比日托好。小學應該把住校作為發展方向。兒童的社會教育應該加快，重點不應該放在家庭教育，儘管家庭教育是必要的。黨組織應該加速對社會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的管理……。[76]

一位印度來賓曾問過一名在公社托兒所工作的教師，孩子們是否想他們的父母。有人對他說：「我認為不會，因為我們向他們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他們在這裏有生活必需品，甚至很舒適。我看他們在自己的家裏也從沒有這麼舒適。我是指過去。」雖然允許哺乳的母親和生病孩子的母親到保育院和托兒所裏來看望，不過後一種情況認為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孩子們得到訓練有素的保育員和教師照顧。父母們必須摒棄資產階級的「母愛」，不要擔心自己的孩子，集中精力做好工作。[77] 為了減輕他們的思想負擔，在托兒所裏的孩子必須得到最高質量的照顧。鄧小平總書記表示：

> 照顧嬰兒將是未來最重要的一種工作。在全國需要有 2000 萬人做這項工作……這項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教育人民和訓練孩子關心大家……。
>
> 支付給他們的薪水應該高於大學教授。[78]

這種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新的生活設施。老人不再需要照管孩子了。如果他們自己需要照顧，家裏也不會有人來照顧他們。隨之幸福院建立了起來[79]。這就是說，現在最需要的是解決供一對夫婦使用的宿舍。一位外賓看到田里堆放著一堆堆的磚頭。有人對他說，農民們已經在為建造一排排公寓打地基了。這將代替他們老式分散的住宅。每個家庭都會有一居室或兩居室不帶廚房的公寓[80]。另一位來賓碰到過一位公社主任。這位主任顯然被譚震林的所有農民住多高層樓房的想法所迷住了：

> 「你們已經見過農民的小屋，既小又不舒適，而且雜亂無章地分散在整個村子裏。但是隨著這種公社的逐步建立，所有這種小屋將會被推倒。實際上，我們已經開始拆毀這種小屋了。而且我們將會有公寓大樓。事實上，這裏和鄰近村子所有農民在這個公社的領導下，都將住進這個村子的一幢摩天大樓裏。用不了幾年，我們的農村摩天大樓星羅棋布，樓內設備齊全，配有廚房、餐廳、裁縫店、學校、體育館等等」。話說到這兒他

停了一下，好讓我能憧憬一下中國農村公社摩天大樓密佈的美好未來。

他問：「他們對我說，你常去美國訪問。他們的農村有摩天大樓嗎？」我回答說：「沒有」。他滿懷信心地說：「毫無疑問，在這方面我們將超過他們。」[81]

發揚共產主義道德風尚

集體主義生活方式必須有相應的一心想著別人的共產主義覺悟相配合。評論員王力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說，毛把大躍進的成績歸功於偉大的群眾運動，歸功於共產主義的勞動精神。王力在列舉了群眾性的興修水利和大煉鋼鐵運動後，明確表示共產主義勞動是「自覺的勞動，沒有定額，沒有額外報酬」。這種自覺勞動本身就形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82]。到這時，在毛個人的鼓動下，物質刺激問題已經成為群眾辯論的主題。[83]

上海的宣傳家張春橋大概受到陪同毛視察徐水的鼓舞，並得到這位主席的鼓勵，挑起了一場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辯論。他把「資產階級法權」說成是工資制的基礎。他不贊同工資制，他將其與 1949 年前解放區的「供給制」相比。「供給制」是免費供應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必需品：

雖然因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別，但相差不多……因為，工農學商，團結一致，親如家人，艱苦奮鬥，英勇殺敵。大家還記得解放戰爭時期大兵團作戰的情景嗎？為了支援人民解放軍，成千、成萬的民兵跟隨大軍南下，他們同軍隊一樣地過著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一不為陞官，二不為發財，甚至也沒有想到要發工資，更沒有想到實行什麼「計件工資制」。[84]

這種對延安生活方式的懷念，在大躍進時期出現的大量文章中是很典型的。許多作家像張一樣，明確把大躍進看成是重新點燃黨在艱

苦時期壯麗而純真的革命火焰的機會。張列舉了長征精神，並以藐視的態度批判那種只能靠工資制來刺激生產熱情的思想。他認為這種思想是「金錢掛帥而不是政治掛帥」。他承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勞分配」的原則必須堅持。但又申辯說，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資產階級法權體制及其不平等的等級制度應該系統化，並加以發展。[85]毫無疑問，所有這一切，都是張在附和毛的看法。毛認為工資制是對資產階級的讓步，要靠提倡革命精神，不要靠物質刺激。[86]

張春橋的文章重新在《人民日報》上刊登，毛為其寫了一篇簡短導言，沒有署名，大意是肯定的，但多少有點含糊其辭。[87]當時，報界正在報道上海的其他地方的許多工廠取消計件工資。[88]一個原因無疑是在產品迅速增長的時候，要設定一個滿意的計量標準，不但困難而且繁瑣。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希望避免成本的提高和通貨膨脹的壓力。這種壓力是大幅度增加工資的必然結果。除了這些現實的原因外，還想在大躍進的熱潮中盡可能地把物質刺激限制到最低限度。無論怎麼說，1958 年計件工資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已不存在，不過，有人對張春橋提出謹慎的批評，他們認為計時工資仍是合適的，因而得以保留。[89]

新時期的教育

教育體制的改革是灌輸新的共產主義道德風尚的基本條件。最重要的改革是把生產勞動同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

毛澤東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強調了這種新體制，但跟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相比，實驗性的意味更強一點。在第 48 至 50 條，毛提出一切中等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凡有可能的」，一律「試」辦工廠或者農場。只有對這類學校的學生他提倡半工半讀。高等技術學校的實驗室和車間凡有條件的就應該從事生產，但必須保證教學和研究的需要。農業學校可以讓教師和學生到附近的農業合作社參加勞動。[90]郊區的中小學的教師和學生則應該到附近的農業合作社參加勞動。但

在城市，大學和中學「在可能的條件下」可以建立工廠和車間，或到鄰近的工廠去工作。凡有土地的教育單位應該創辦農場；沒有土地而又鄰近郊區的教育單位可以到農業合作社去參加勞動。[91]

毛想讓學生更多地參加體力勞動，而劉少奇對這個問題另有考慮，他想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以滿足他們對教育的極大渴求。他在 1957 年下省視察時就已指出這一點。[92] 劉發現，山東和江蘇省農民家庭的學齡兒童有一半沒有上學。一則沒有學校，二則其父母供不起他們上學。[93] 在全國範圍內，情況最嚴重的可能是該上中學的適齡青少年（13-16 歲）。他們有 3700 萬人，但正常學制的中學只能容納大約 700 萬人。[94] 劉早在 1957 年 11 月就提議，「共產主義青年團應該調查美國大學的經驗，在美國有三分之二的學生半工半讀。中國是否可個別試辦？請研究」[95]。而且，1958 年 5 月 7 日，他再次同共產主義青年團談話。30 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專門召集討論半工半讀問題[96]。劉指出，學生們希望能繼續升學[97]；初中生畢業後在工廠工作，發現自己沒有希望繼續學習，產生強烈的挫折感。[98] 唯一的解決辦法是鼓勵地方加快創辦半工半讀學校。這樣既滿足了求學的要求，又不會給國家增加財政負擔，而且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裏培養出一大批受過教育的技術員和大學畢業生。[99] 劉強調，除了使失學者能受教育外，開辦半工半讀學校的另一理由是，還需要培養有技術的青年人。1957 年中學畢業生有 130 萬之多，其中 80 萬學生不能繼續學習，而且因他們沒有技術也不能勝任工作。他認為創辦半工半讀學校的第三個理由是，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100]

到 5 月劉少奇批准半工半讀勞動學校時，已經有幾千個半工半讀學校成立。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治局候補委員陸定一，可能在 3 月 7 日黨的書記處會議討論的基礎上，於 3 月中旬為此類學校開放了綠燈。[101] 這些「民辦學校」的主要形式是農業中學。這些農業中學不僅給不宜整天在田里勞動、尚未成年的青年講授語文和數學，而且還給他們講授一些科學的耕作方法，使他們瞭解政府試圖逐步引進和推

廣的現代化農具和機械。[102]學生們的勞動課和生產勞動時間各佔一半。學生的勞動所得用於支持辦學費用，儘管一些人可能掙到點零花錢。[103]到 1960 年，有 3 萬個農業中學，300 萬學生。[104]

發展以全日制學校和半日制學校並存的「雙軌制」教育制度由劉少奇負責，因為這位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同陸定一一起負責主管整個文化界。[105]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沒有考慮到半工半讀學校，但他顯然也很重視這個他們設法解決的問題。他提議，只要不增加國家的開支，凡有條件的地方，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可以招收額外學生。農業學校應該接收一些合適的農業合作社社員。[106]對於解決失學問題，這些建議遠不如劉少奇的方法有效，與其無法相比。意識到這一點，以及意識到劉開創性的作用，就能理解為什麼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如此激烈的抨擊。[107]

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家以自己的標準譴責「雙軌制」，當然是沒有道理的。他們顯然是贊成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的。這個指示是北戴河會議之前起草的，會上進行了討論，並於 9 月 19 日正式公佈。這個指示中特別稱讚開辦全日制和半日制學校是辦學形式多樣性的有效措施。[108]如果劉少奇和陸定一反對把體力勞動引進全日制學校的全部課程，才有理由說成是 1958 年關於教育戰線的「兩條道路鬥爭」。這個指控證據不足。[109]更確切地說，劉的觀點似乎比毛更激進、更週密。此外，劉注重政治問題——群眾對教育的需求；毛注重意識形態——人人參加體力勞動。

1958 年初，毛、劉和其他領導人對提倡生產勞動的做法很謹慎，希望保證全日制學校的教學質量。[110]從春到夏，半工半讀學校開始推行，而且明確承認這類學校在教學質量上不如全日制學校。[111]北戴河會議後，毛、劉和陸定一全都鼓勵在全日制學校加進生產勞動，劉提的意見比毛更具體。

毛 8 月 13 日視察天津時，一些高等學校經營工廠的方式給他留下了印象。就在北戴河會議上，他發言讚揚這樣做法，同時他還奚落把

農業大學建在城裏。[112]9月9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說教育的中心問題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問題。在指出俄國人對這個問題也想改革以後，他接著說：

> 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辦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這是一大改革。[113]

這個月底，毛在湖北視察時，支持學生提出半工半讀的要求以及學校普遍辦工廠的做法。[114]

劉少奇9月在視察時，公開闡述他7月初在石景山一次未報道的講話中所表示的看法。[115]9月16日到18日視察河南時，他在普通學校和大學推行半工半讀：

> 新的工廠能夠建立學校，招收初中生到那裏學習。一家工廠就是一所高級中學，那裏的學生每天可以有學習時間和工作時間。這樣工廠就成了學校，學校就成了工廠。半工半讀方法能夠為高級中學採用，也能為大學所採用。學生一天工作6小時學習3小時，或者一天工作4小時學習4小時的制度必須建立起來。這樣的安排必須相對穩定，持續8年或10年，直到學生從大學畢業。這樣，學生和工人的數量都會增加。這個階段結束時，他們既是大學畢業生又是有技術的工人。<u>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u>[116]（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9月19日至28日訪問江蘇時，劉進一步說，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最好辦法之一，就是把工廠和學校合併。過去，工廠和學校一直是分開辦的，將來逐步把工廠和學校合在一起辦。一家新工廠是一所新學校，工人也是學生，他們將為勞動和教育部門共同錄取。他們在經過初步訓練後，將參加半工半讀的學習，選修從初中到大學的課程。這樣就能比較快地消除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培養出真正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117]當時，劉的思想似乎向前邁了一大步，從提倡「雙軌制」教育制度發展到設想不僅把兩種教育制度合併，

而且也把教育和工業合併。有意思的是，1958 年 9 月劉對教育問題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成為非議或批判的目標。

到這時，劉少奇的觀點明顯地超過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指示制定的路線。陸定一作為相對次要的幹部，為 9 月 1 日出版的《紅旗》雜誌撰文，只是在指示的思想基礎上加以發揮。文化大革命中試圖從該文中抓到反毛的把柄，但如果把兩者作一比較，他們的攻擊是站不住腳的。[118] 對陸和其他人最嚴肅的指責是，他們一意孤行在所謂削弱無產階級政治的情況下，保證質量。[119] 不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指示同樣強調了保證「全日制」學校教育質量的重要性。[120] 可以說的是，中共中央指示和陸的文章草擬的時間可能在 7 月或 8 月初之前。就毛和劉當時的思想發展而論，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陸的文章一出台就顯得落後過時了。

在教學單位，對新政策公開的反應正如預料的那樣，是相當熱情的。但是在背後，許多老師擔心這將是教育界的災難。[121] 據武漢大學校長說，該校哲學系的師生下鄉 10 個月，結果校長和農民對此都很失望。[122] 福建農學院停課 8 個月，以便學生進行生產勞動。[123] 昆明一所小學辦在一座舊廟裏，一位訪問過這所學校的英國人看見，在陳舊的木門框上方刷著這樣一條標語：「我們是學生，同時又是工人；這裏是我們的教室，同時又是我們的車間。」[124] 在重慶的一所小學裏，他發現體力勞動包括割草、剷除路上的雜草及打掃教室。

> 好一點的是到當地一家汽水廠去，工廠讓他們幹一些零活，使他們習慣工廠的環境。我提到在英國，7 歲小童在工廠裏幹活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這位女校長聽後不以為然，對違背總路線的任何事情她都冷然處之，不感興趣。她說：「教育的原則是教孩子們工作，而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去幹活。」[125]

這位參觀者談到低齡兒童興致勃勃收集廢鐵，成了普遍現象。[126] 官方對這一情況作了詳細報道。他們在中學和大學讀書的哥哥姐姐們

則把廢鐵煉成生鐵和鋼。到 8 月底，11 個城市中的 18 所高等院校，號稱有能力煉出近 70 萬噸鋼。在南京和廣州，有 34 所中學擁有各式各樣的高爐。在濟南的一些中學裏，7 月份一週就安裝了 77 座高爐。[127]到 10 月份，河南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宣佈洛陽 12 所中學聯合建造了一座鋼鐵廠。該廠開工第一個月就生產了 130 噸「高質量」的鋼，現在每天產量達 40 噸。7 歲至 9 歲的孩子在這裏主要是收集材料，一天 2 小時，老師和年長一點的青少年負責鋼廠的許多實際操作。「由於適當地安排了學習、工作和休息的節奏，學生的身體健康了，體重增加了」[128]。洛陽的作法甚至受到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的表揚。這很可能使低齡兒童的體力勞動強度增加。自然，到第二年，當劉少奇的 9 歲兒子經過 8 小時的勞動筋疲力盡地回到家裏時，連他本人也躊躇起來了。[129]

土法煉鋼運動

當然，中國的學齡兒童和學生僅僅是學習他們的長者。北戴河會議後，全中國投入一場全民煉鋼的運動，努力實現 1070 萬噸鋼的新目標。據說，周恩來在會上表現積極[130]，他被毛分配負責煉鋼運動[131]。這項決定很有諷刺性，因為周早先和他的親密同事反對「盲目冒進」，不過從周的精力和組織能力看，這種安排又是合適的。周成了鋼鐵大躍進領導小組的負責人，經常主持國務院的煉鋼會議，並親自組織部長之間的協作會議。他和 8 位副總理把國家分成地區，每人管理和視察一個地區的煉鋼運動。周還從專業部門調來隊伍充實「第一線」，幫助群眾煉鋼。[132]

9 月 5 日，一位《人民日報》評論員指示省報，宣傳的中心必須從農業轉向工業，特別是轉向大煉鋼運動。[133]《人民日報》社論要求人民做出更大努力。[134]儘管毛本人繼續講需要保持農業與工業的正確平衡[135]，但是大力宣傳的後果還是勢不可擋的。到 9 月中旬，2000 萬以上的群眾從事鋼鐵的生產[136]，據毛說，在煉鋼運動的高潮中，參加

人數增加到9000萬[137]。彭德懷後來宣稱1958年最後4個月煉鋼運動耗費了900億個工作日。[138]

作為中國傳統煉鋼工業核心的遼寧省，分到的生產任務占總目標的44%以上[139]，煉鋼運動開始時，擔負實現北戴河提出的指標的主要責任是中國的18個主要鋼鐵聯合企業。鐵的生產主要靠土法進行。但是到10月4日，大概意識到鋼的指標不可能按常規方法實現，《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掀起群眾煉鋼運動與煉鐵運動的競賽。結果，9月土高爐的產量僅佔月鋼產量的14%，而到了10月就佔了49%。[140]全國上下，農民、工人、職員、家庭婦女、學生——周恩來親自到北京大學動員[141]——甚至作家都響應了新的號召。《北京週報》編者對此作了以下報道：

> 為了響應政府全國努力推動鋼鐵生產的號召，我們也在自己的院子裏開始煉鋼。每人貢獻一臂之力。沒多久，有些人帶來破爛的鍋碗瓢盤，有人貢獻出回磚和石灰石，還有些人上交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幾個小時之內，一座中國式的高爐建成，一天內便投入生產。在我們的爐子投入使用之前，我們這夥人中如果說有誰掌握一些技術知識，那就只有一個曾經參觀過幾個轉爐的年輕人。第一次我用坩堝型爐煉沒有成功，但我們用我們的高爐冶煉卻成功了。

社論說第一批鋼已在實驗室經過測試證明達到標準。[142]

在遠離首都、最南端少數民族地區之一的雲南省，煉鋼運動也同樣如火如荼，一位英國旅遊者報道：

> 我們穿過稻田來到另一個村莊，這裏已草草建成4個奇形怪狀的土製鼓風爐，到處是熱烈沸騰、狂呼喧叫的場面。人們有的用筐抬礦石，有的給爐子添火，有的驅趕著牛車，有的傾倒白色熱金屬的大鍋，有的踩在搖搖欲墜的梯子上觀察爐子，有的用手推車運原料——不過在我看來，從爐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和從爐頂倒進去的原料完全一個樣子，沒有變化。

這位公社主任在回答問題時說，農民「從報紙上」學會了建造高爐和煉礦。然後他突然連珠炮似地用多少帶有憤怒的口氣控訴起來。他強調 1958 年早秋中國的幹部既要考慮生產運動，又要考慮台灣海峽危機：

> 我們從報紙上除了學會新的煉鋼技術以外，還看到了美國侵略的消息。當你們帝國主義襲擊中東阿拉伯國家時，我們中國正在進行和平建設。我們熱愛和平……但是，如果美國人進攻我們，我們將同他們作戰。我們這個公社有 1200 名民兵整裝待發，隨時準備上前線與美國人較量。[143]

那天晚上，在昆明劇院的幕布上貼有一句口號：「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144]

陳毅在 5 年後承認，在這種好戰的和民族主義的過激氣氛中，沒有人敢對煉鋼運動表示懷疑。[145] 甚至像彭真這樣實事求是的領導人，也讚揚在大煉鋼鐵運動中使用的土法。[146] 不過鄧小平至少已經意識到土法大煉鋼鐵所帶來的問題。[147] 然而，直到 1958 年，張春橋雖然在大力宣傳，熱情還嫌不高。據彭德懷後來統計，長時間的額外勞動必須由中央政府支付 20 億元的額外工分，省市也要支付 20 億元補貼，這就使購買力突然增加，從而形成對市場的「巨大衝擊」[148]。但這些作法畢竟產生了效果。由於成百上千萬中國人在高爐旁拚命勞動，鋼的日產量迅速增長，並於 12 月中旬達到 1070 萬噸的目標。[149] 然而在農村，糧食、棉花和其他農作物豐收在望，等待收割。一場巨大的災難正在醞釀之中。

第二篇

撤退

第七章 武漢退卻

少中取多

問題在早春季節就很明顯了，1958 年 3 月，兩名援助中國科學院的蘇聯科學家乘火車在中國中部作了一次旅行。他們談到，雖然正值春播季節，但稻田里的農民卻很少。他們得出的結論，找到了原因：「我們每天看到數以千計的煙囪在冒煙，每天晚上火光沖天，農民們正在貫徹黨的指示，在礦山，在土高爐前夜以繼日地工作，以便完成『發展地方鋼鐵生產』的任務。」[1] 甚至在農民捲入大煉鋼鐵運動之前，那種試圖在工農業戰線同時搞大躍進的趨勢，就已經導致了「城市和農村互相競爭勞動力的緊張局面」[2]。到 1958 年底，工業職工的數量已由 1957 年的 900 多萬增加到 2500 多萬[3]。顯然，其中大多數是缺乏勞動保險和免費醫療的臨時工和合同工。[4] 僅四川省就增加了 200 多萬，河南省增加了 100 萬。[5] 其後果是，100 億個農業工作日——大約為正常年景用於農業生產的 1/3 時間，在 1958 年白白喪失了，雖然有人聲稱損失時間的一半，由於生產工具的改進而得到了補償。[6]

為了解決工農業戰線之間競爭勞動力的問題，採取了一個權宜之計，在公社裏組織後備勞力，需要時便調到工業戰線。[7] 在農閒時，全國大約有 40% 的農業勞力在為完成工業任務，特別是煉鐵任務而苦幹。[8] 在河南——這個其他省份要趕超的省[9]，這個數字看起來超過了 50%[10]。當躍進之年進入狂熱的尾聲時，需要「突擊隊」返回田間，以便盡量收割豐產的莊稼，並完成其他農活。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了緊急通知，指示突擊搶收莊稼和搶運農產品。[11] 學

校停課，機關幹部和商店營業員應徵參加勞動，非重點基建工程也停了下來，以便提供更多的勞力。[12] 根據官方的記載，農民們：

> 勞動不計報酬，不計時間，哪裏需要，他們就到哪裏，需要干多久，他們就干多久，不分白天黑夜，干在哪裏就吃住在哪裏，其中既有青年人，也有老年人；既有婦女也有兒童。[13]

那些理智一點的突擊隊只工作到午夜，而那些傻乎乎過分積極的突擊隊往往連續干四五天都不休息[14]。1958 年 7 月初，劉少奇在一次談話中，倡導要勞逸結合，以免人們因疲勞過度而「長眠不起」。但根據當時談話的具體場合判斷，這個勸告更像是泛泛的警告，性質遠沒有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指控的那樣嚴重[15] 直到 11 月 9 日，《人民日報》才發表社論《要注意保證農民的休息》。社論贊成每個月突擊性的勞動時間不超過一星期，正常的勞動時間應有 20 天，其餘 3 天為政治、文娛以及社員個人活動時間。而突擊性的生產活動時間，每次以不超過 48 小時為宜，這時一般也要做到每天有 6 小時的睡眠時間。此外，對青少年和孕婦還規定了更多的休息時間。[16] 如果用這樣的時間安排來保證農民的休息，那麼，可以想像這場竭盡全力的突擊運動是多麼嚴酷。然而毛澤東還在繼續堅持突擊勞動的做法。[17]

即使搞了突擊勞動，很多地方的莊稼還是沒有全部收穫上來，這一點後來被承認了。在山東，穀物收穫量「低於原來的計劃，原因是草率的秋收以及其後的損失和浪費」。[18] 在安徽，第一書記曾希聖承認：「由於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大煉鋼鐵方面，沒有徹底、仔細地做好收割工作。結果，我們浪費了一些糧食。」[19] 在四川，出現了大豐產，但「由於思想工作和組織管理工作沒有迅速跟上去，結果造成了糧食的嚴重浪費。」[20] 據說，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曾在私下抱怨：「雖然工業產量增長了 66%，但與派成千上萬的人上山而造成的農業方面的損失相比，我們得到了多少？而我們的損失又是多少呢？」[21]

這些當事人的評論，為彭德懷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對大躍進的抨擊，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即使在今天，當獲准可以坦率地、公開地

批評中國的大躍進的時候[22]，要想對 1958 年的糧食損失作出準確的估計也是不可能的。在一些地區，那些擔心不能給集體食堂提供足夠糧食的幹部們隱瞞了糧食，因而，向農民提供的「免費」糧食遠比他們預計的要多得多。[23] 這種既有浪費，再加上靠不住的產量報告，使得判斷實際收穫量變得非常困難，同時，統計部門受到壓力和衝擊，也給這一工作帶來困難。[24] 由於氣候條件無疑是非常有利的，產量也確實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真實信息的欠缺，使政治上冒進、相互攀比的黨的幹部們提出大大誇大了的產量數字，並要求他們忘乎所以的上級去相信。[25] 甚至像鄧小平這樣堅定的現實主義者也衝動地宣稱，1958 年人均分配的口糧將是 625 公斤，1959 年將達到 1050 公斤，而到 1962 年將是 2500 公斤，他還說：「我們想要多少，就能生產多少。」[26]

1958 年 11 月至 12 月間，中國領導人舉行了 3 次較重要的會議，它們分別是，11 月 2 日至 10 日在河南召開的鄭州會議；11 月 21 日至 27 日在湖北召開的武昌會議；以及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仍是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由於武昌是武漢三鎮的一部分，這次會議常被稱為武漢會議）[27]。在這些會議上，甚至在私下的談話中，毛看起來對 1958 年糧食產量的情況並沒有表示過分的疑慮。他在 30 日提到「不真實的報告」是一個主要的、普遍問題，但緊接著，他宣稱 1958 年的糧食產量是 3.75 億噸，比在北戴河估計的最高數字還多了 2500 萬噸[28]，並且是 1957 年產量的兩倍多。為了保險起見，毛主張只公佈 90% 的增長率——總產量 3.5 億噸——這意味著比估計的產量少算了 6%。12 月 9 日，毛在六中全會的講話中，再次提到幹部撒謊假報數字，但他在這時贊成公佈 3.75 億噸的數字（已經這麼做了），因為 10 天以後，又有更高的數字出現了。新數字是 4.3 億噸（其中包括一部分薯類作物的產量）。要在新數字上打將近 12% 的折扣才是原來的數字。[29] 如果這樣的折扣對於與會者來說，似乎還算是冷靜和明智的話，這僅僅是因為他們準備把這個降低了的產量作為現實來接受，而實際上，這個數字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都是違背農業常識的。

他們持這種態度的理由是，在各地農村中的一些實驗田里，極大地提高產量的目標已經實現了。他們錯誤地相信，這種成功能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有些持懷疑態度的人爭辯說，這樣高的產量在小塊田里能夠做到，但不能在所有的大田里做到。然而，《人民日報》卻以社論的形式駁回了這種反面論調。社論認為，小大之間並沒有隔著一條不可逾越的「天河」;「既然在小面積上可以這樣做(實現高產——作者注)，為什麼不可以在大面積上這樣做?」[30]

使報紙充滿信心的理由是，在大躍進期間，農業當局已經找到了取得成功的妙方。在大躍進前夕1957年10月修訂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有12條規劃被列為決定農業成敗的關鍵。[31] 1958年1月底定稿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把這12條擴充修改為14條。[32] 1958年5月，當譚震林把《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交到黨代表會議時，他強調了其中的6條[33]，但在6月份，他提到7條[34]。也是在6月，農業部長廖魯言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一處提的是6條，而在另一處提到8條[35]。北戴河會議前幾週，在由高級農業幹部主持的各省農業會議上，在提出的條數上也顯出同樣的差別。[36]

北戴河會議前夕，譚震林在8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試圖總結歸納各種不同的「妙方」，他列舉了保證夏季豐收的8條「土辦法」即：水利、肥料、土壤改良、推廣良種、合理密植、防治病蟲害、田間管理和工具改革。[37] 這些是形成最終條文的基本內容，但在排列順序和強調重點上還有出入，而且還有所變更。

在北戴河會議上，譚震林列舉的8項減至5項——「水、肥、土、種、密」。土壤改良有了新的含義——深耕，並被認為是提高產量的中心技術環節。關於深耕的特別指示是北戴河會議後發出的5個有關農業問題的文件之中的一個(其他幾個文件涉及社會主義教育、水利、肥料和除四害運動)。[38] 10月1日，《人民日報》國慶社論按照同樣的順序列出了上述5項。但在一週之後，該報登載了甘肅省委第一

書記張仲良的一篇文章，張提出的5項略有不同：「水、肥、土、密、管。」[39]

10月中旬，召開了另一輪有許多省參加的農業會議。開始時，譚再次提出8項措施，此時以毛的意見為基礎，確定了最後順序，即：水、肥、土（即深耕）、種、密，除治病蟲害、改良工具和加強田間管理[40]。這個有華北和東北9省市負責人參加的西安會議，可能是1958年大躍進期間譚的聲譽的最高點，因為隨後的報道把他列在政治局資歷較深的李先念之前。[41]後來，在10月18日到27日期間的某一時候，這8條措施被最後簡化為8字公式——水、肥、土、種、密、保（植物保護，即防治病蟲害）、工、管——並由西安會議所稱的「農業生產的根本法」，改稱為「農業憲法」。[42]

這個經過艱難醞釀，最後受到推崇的八字憲法，極好地闡明了大躍進的提倡者們為取得農業上的成功而摸索到的一個明確、簡潔的公式，而這個公式能夠很容易地被全國各地有效率、有幹勁的幹部們作為農業發展的動力來理解、推廣和應用。但是，方法上的千篇一律和硬性推行，可能適用於工業生產，而如果把它們應用到農業方面，特別像在中國這樣各地環境差異很大、幅員遼闊的國家裏，則會出現相反的效果。八字憲法僅僅提出了八項農業生產的總的原則，沒有具體地回答諸如方法、程度、時間、地點等一系列緊要的問題[43]。所以，「八字憲法」是沒有錯誤的，但也是沒用的。鑒於這個籠統的指南的弱點，當毛澤東、譚震林以及他們的同事試圖把它具體化並普遍加以應用時，危險就來臨了。

毛澤東在讀了河南省長葛縣縣委書記的一篇發言之後，對深耕的問題熱心起來。5月17日，他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詳細闡述了深耕和密植問題。他認為，如果長葛縣能夠用這種方法取得優異的成果，那麼其他縣就沒有理由不照樣去做。[44]顯然主席是認為先進經驗可以無限推廣的提議者之一。[45]當會議結束時，毛與譚震林就這個問題長談了兩次，並要譚予以推廣；毛還發出了一個指示，要求每個省都要

樹立 3 個深耕的典型地區。[46] 其結果是，在北戴河會議前多省參加的農業會議上，討論了深耕的問題並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後來還正式發佈了一個與密植有緊密關係的中共中央指示。[47]

大規模地實行深耕和密植使地力趨於枯竭，在中國，這樣做也需要增加勞力和資金。結果，很快就表明，這不可能在全國所有農田普遍推行。[48]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稱做「三三制」的耕作制度。根據這一制度，總耕地面積的 1/3 用於精耕細作生產糧食，1/3 用於造林，1/3 休閒。[49] 毛可能是從被稱為「基本農田制」的發展中得到了啟發。在山西，這個「基本農田制」年初時就作為彌補勞動力短缺的一個辦法提了出來。[50] 北戴河會議後，在北方和東北諸省（包括山西省）負責人參加的農業會議上，這個問題的細節方面顯然得到了研究解決，因為其後一星期，《人民日報》登載了這些省份的一些縣和地區取得高產的報道和社論。[51] 在這次會議上，儘管有山西參加，一個稱做「衛星田」運動的新方針，已被另一個北方省河北提了出來，這個新方針的主要內容是用耕地的 10% 從事精耕細作。[52] 幾天後，《人民日報》又提到「高產地」、「豐產田」和「基本田」；《人民日報》強調，這些革新表明，在落實毛的「三三制」方面，已經向前邁出了一大步。[53] 接著東部諸省的會議決定，把 10% 到 20% 的耕地（福建 50%）劃出來作為衛星試驗田和高產田，以便帶動其他的普通田。[54] 這個決定開闢了依據各地具體條件落實「少種、高產、多收」方針的道路。[55] 西北各省在他們召開的會議上提到，依據基本農田制，劃出 10% ～ 15%的土地作為衛星田，推廣少種高產的方針。[56] 南方和西南部諸省同意劃出 10% 的土地作衛星田。他們像其他省一樣，將這一措施看作貫徹「少種、高產、多收」方針的一個步驟。[57]

後來的報道說明了各省是怎樣籌劃執行會議決議的。先行的省份山西，1958 年的播種面積已經比 1957 年的數字有了減少，現在又打算在 1959 年進一步大幅度削減實際 1/3 的耕地面積，數字達到 210 萬公頃。[58] 其他一些人口相對稀少，而且農業不佔主要地位的北方和西北

的一些省份，像內蒙、青海計劃減少 21% 的可耕地面積。[59] 另一方面，人口稠密的「米倉」四川省，僅打算減少 8% 多一點。這個省計劃用 15% 的穀物耕地作為高產田，指望 1959 年高產田的糧食產量能達到 1958 年普通田每公頃產糧 7.5 噸的 10 倍，甚至普通田的產量也要達到每公頃 22.5 ～ 37.5 噸 [60]。東北的吉林省也確立了相似的目標，但由於吉林省的地形有利於大面積耕作，因而沒有計劃減少耕地。[61]

由於統計數字零散，因此要比較各省減少耕地面積的計劃和它的執行情況是不可能的。但根據四川省的計劃數字可以猜測，像它這樣人口稠密、地處中心地帶的省份，沒有冒險完全採用毛的「三三制」，即企圖以 1/3 的耕地來養活全省人民。後來的報道證實了這一點。在安徽，1959 年小麥播種面積減少了大約 16%，廣東只減少 7%，遼寧減少 8%。黑龍江——那是大面積耕作的典範，耕地面積實際上增加了 10%。河北、湖南的數字表明，這兩省 1958 年的耕地面積已有少量的減少，在這樣一些省份中，1958-1959 年這兩年來連續減少耕地的影響也許是值得重視的。例如，河北 1959 年耕地面積只減少了 7%，但這只是 1956 年以後連續減少耕地中的最後一次。在此 3 年期間全省已削減耕地 130 萬公頃，大約占總耕地的 14.5%。即便如此，這個數字遠遠低於毛要求的 1/3。況且人們知道，如果推廣雙季作物的話，減少耕地面積並不一定意味著減少播種面積。1957-1959 年間，山東耕種面積減少 10% 以上，但小麥的播種 1958 年減少 9%，1959 年卻上升 13%，從而小麥播種面積的增長超過了 1957 年的數字。同樣，安徽省 1958 年耕地面積縮小，播種面積卻增加了。[62]

儘管有一些省委書記在貫徹「少種、高產、多收」方針的過程中顯得非常謹慎，1958 年穀物播種面積還是減少了 600 萬公頃，1959 年又減少了 1160 萬公頃，兩年累計減少 13% [63]。顯然，參加 1958 年 11 月至 12 月幾個會議的中國高級幹部中，幾乎沒有人對重大統計錯誤有絲毫的覺察，而這些統計數字又是盲目樂觀的躍進計劃的基礎。在六中全會上，毛重申他所倡導的「三三制」。這說明，他確信沒有必要去

束縛農業方面的躍進，雖然他承認，「農業憲法」不能控制太陽和氣候。[64] 的確，這種對糧食產量的盲目自信，能夠解釋為什麼全會在面臨著其他戰線的退卻時表現出相對的從容鎮定。正如一位外國觀察家後來指出的那樣，黨的幹部們

> 傾向於認為，考慮諸如灌溉、排水、滲漏、地下水位、濕度保持能力、鹽鹼度、河流水量、水污染、排洪等問題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情緒的反映。在1958年和1959年那些輕率的日子裏，黨很容易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大自然是變化無常而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黨動員了成千上萬的人，匆忙地修建了數量驚人的水利工程。這能給其他國家和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卻影響不了大自然。[65]

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前一年的水利成就仍有深刻的印象，這就解釋了他之所以對農業躍進繼續保持樂觀態度的原因。[66]

要想瞭解1958年下半年那種席捲全中國的狂熱的起因，純理論但不切合實際的設想是一個方面，但主要還是國家領導人對虛假的報告深信不疑。據劉少奇原先的秘書在最近的一次講話（這個講話太敏感，目前很難公開發表），鄧小平也被一個農業勞動模範所蒙騙，使他相信，這個農民在1畝田里能生產7萬斤水稻[67]。即使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國家公佈的平均畝產量也只有400斤。[68] 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位有過科技訓練的幹部說服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元帥帶他去見毛澤東，送上一份報告，說是如果把一個蘋果植入南瓜裏，這個蘋果就會長得和南瓜一樣大。[69] 沒有記載毛對此有何反應，但是，如果事先估計自己不會受到鼓勵和歡迎，這位一般幹部看來是不大有膽量爭取這樣一次接見的。

毛澤東的態度使譚震林有理由進一步敦促黨的省委書記們在農村使用新工具，爭取更高的產量。後來，當文化大革命的鼓動者試圖為毛主席在大躍進中的過火行為開脫時，譚的這些做法被不公正地指責為「左傾」。[70] 毛澤東所做的，不過是溫和地批評了西安會議（這裏

間接地批評譚震林，他主持了這次會議）把注意力過分集中在糧食生產上，卻疏忽了經濟作物。[71] 十年之後，劉少奇，有時還有鄧小平，也一起受到譴責，要他們少種高產的方針負責。其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毛澤東在推動這個方針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領導的角色。如果說大躍進的倡導者們要因1958年下半年的過火行為而受到責備的話，那時的「責任者」肯定包括劉少奇、譚震林以及其他好多人，但毛得首先承擔責任。[72]

對大煉鋼鐵的反思

毛澤東在對估計過高的1958年糧食產量充滿信心的同時，又在八屆六中全會上含蓄地承認，大煉鋼鐵運動缺乏現實主義基礎，他要求同事們不要讓外國人的吹牛作風鑽進自己的頭腦！在已生產的1070萬噸鋼中僅有900萬噸質量是合格的[73]，在隨後到來的秋季，這個數字又進一步減少到800萬噸。在發動土法煉鋼運動之後的兩個多月，毛澤東準備在私下裏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在修正對今後產量的估計方面，他的退卻程度顯得更為突出。在9月，他曾認為，根據中國的生產能力，1959年能生產出3000萬噸鋼，1960年將達到6000萬噸，1962年能達到8000萬噸至1.2億噸。[74] 而這時，他覺得這樣的指標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完成，他講到要把1959年的指標改為1800萬噸至2300萬噸，1960-1961年改為3000萬噸至4000萬噸，而1962年的指標則是5000萬噸至6000萬噸。[75] 他仍然處在幻想之中。但是，很明顯，他是試圖把幻想同現實結合起來。早些時候，他曾經承認，在為1959年制定的3000萬噸指標中，有1000萬噸是「主觀主義」的想法。他又表示，一個人如果沒有經歷過一件事情，那他就不知道這件事的困難。[76]

毛澤東在鋼鐵問題上的覺醒，似乎是在11月上旬召開的鄭州會議以後。他到達武昌以後（即11月21日以後）曾透露，他對於鋼鐵指標已有了另一個想法。[77] 在12月9日的八屆六中全會上，他宣佈，

鄭州會議搞的十五年綱要，這次擱下沒有談，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據。大概至少到 1962 年可以作一個長期計劃。顯然，這番話在那些熱情高漲的幹部中引起了一些驚愕，他們不明白擱置這一計劃的內情。[78] 從毛的談話來看，不清楚的是，為什麼在去武漢的路上，他對鋼鐵問題的看法發生了急劇的轉變。也許他到達武漢時，對於土法煉鋼的意義有了現實的估價。也許在武漢——這個國家主要的鋼鐵生產中心之一，工廠的幹部們鼓起勇氣講出了實情。毛澤東肯定會醒悟到，引起交通運輸危機的原因在於要向全國各地運輸煤炭，以便為大煉鋼鐵提供燃料。[79]

在鄭州，毛澤東可能仍處在開路先鋒式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影響之下，加之周恩來又沒有在那裏向他陳述現實情況。[80] 但自那以後，總理 (曾在 8 月初指定搞了一個關於大躍進進展情況的高層調查[81]) 和他的富於經驗的經濟部長們大概能夠把事實提供主席參考。後來據說王稼祥 (中共中央委員，曾擔任過一屆政治局委員，並同毛有特殊關係[82]) 在武漢對毛的想法產生了影響[83]。不管怎樣，毛在那裏承認了他的錯誤，並且當那些仍然過分熱衷於大躍進的人們攻擊計劃制定者是機會主義時，他為他們辯護。對於最近免職的商務部長楊一辰，毛澤東特別提出指責，說他想趁此機會打倒周恩來和另一位商務部長、副總理陳雲。毛澤東還抵制了在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的現實主義計劃上潑冷水的企圖。[84] 反過來，周恩來維護了毛澤東的過火熱情[85]，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一段著名的講話中不得不承認：

> 北戴河會議，我犯了一個錯誤，想了一千零七十萬噸鋼、人民公社、金門打炮三件事，別的事情沒有想。北戴河決議現在要改，那時是熱心，沒有把革命熱情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武昌會議把兩者結合起來了。決議要改，兩條腿——俄國的革命精神與美國的實際精神。[86]

最重要的是，毛現在開始強調計劃制定者們遵循的原則——可靠、穩定的基礎，協調、全局的觀點，並提出全國一盤棋的主張，這

句話在以後的幾個月內被反覆強調。[87] 此外，計劃制定者請蘇聯對大煉鋼鐵問題表示意見，毛顯然隱忍接受。[88] 周恩來也覺得有了勇氣去指示一個模範公社（他陪同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參觀了它）停止煉鋼，因為這個公社既缺少鐵礦石和燃料，又沒有掌握煉鋼技術。他就當著一位外國領導人的面做出決定，因此更不尋常，顯得這次參觀可能非常尷尬。不過，周恩來的指示在那時沒有公開。[89]

關於人民公社的理論反省

早在鄭州會議時，毛就已認識到，需要抑制那些過分狂熱的幹部們，這些幹部曾為劉少奇和毛澤東本人的講話所鼓舞，相信中國或許能夠在 3 至 5 年的短時間內，通過人民公社躍進到共產主義。[90] 毛警告說：「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即農業生產合作社），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即人民公社）走向全民所有制（即國營農場），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這個過程……」。[91]（譯按：括號內的話是著者加的）

毛在鄭州的講話中詳盡地闡述了這個問題，他承認：有一些同志反對在兩種所有制之間劃分明確的界線[92]，認為社會主義建設就意味著實現完全的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其中包括在人民公社中實現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轉變[93]。毛澤東反對這種把人民公社看成是類似於鞍山鋼鐵公司那樣的全民所有制單位的觀點，並且認為，如果忽視兩種所有制之間的差別，那麼社會主義建設就會失去意義，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產品供應，並以此來促進所有制向更高的階段過渡（即，通過證明制度是成功的）。他還認為，人民公社是我國農村由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再由此而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將來，當這兩個過渡完成時，人民公社將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94]

陳伯達是毛澤東在鄭州指責過的那些過度熱情的人中的一個，他曾提議要取消商品生產，廢除貨幣。這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揭露

出來的，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在大躍進期間，一直在思想上與毛澤東保持一致的陳伯達，在鄭州會議上會提出超越毛的。[95] 至少有這樣的可能性：陳伯達出於毛澤東的默許提出了他的想法，但毛澤東不得不否定它們，因為鄭州會議的討論表明，那些想法將引起反對並產生混亂。

毛澤東向狂熱的思想觀點潑冷水的舉動可能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劉少奇最初曾是熱情推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人之一，而且在夏天，他還讓子女們到北京附近的人民公社去勞動。[96]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不切實際的產量被宣佈出來，他評論說：「我們受騙了。」當徐水的人民公社宣稱已經進入共產主義時，劉少奇也親自前往調查。出於那個特定時代的考慮，雖然劉少奇發現徐水的宣稱純粹是胡扯，但他沒有明說，這顯然是為了不使幹部們沮喪。[97] 只有當毛澤東已經表態，他的同事們才開始跟著轉向。

毛澤東在鄭州的講話肯定會發到隨後武漢全會的參加者手中，因為他覺得在講話中已經沒有必要過多論述，只簡稱為共產主義過程中的兩個過渡。[98] 全會作出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闡明這兩個過渡是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在農村），以及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兩個過渡以及更早些時候的從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轉變，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將意味著要普遍地成立縣聯社。像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那樣，這一過程需要3至6年的時間。但即便在這樣一個階段，也仍然要以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只有當社會產品極大豐富時才有可能實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宣佈人民公社立即進入共產主義是把共產主義庸俗化，助長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99] 毛在私下裏曾非常大膽地提出了一個進入共產主義的時間表，即：15 年～ 20 年或許更長一點的時間。[100] 而這個決議則更為保守得多，它提出，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工業國需要 15 年～ 20 年，甚至更多一些的時間。[101] 毛澤東去世

以後，所有這些論點都被嘲笑為「窮過渡」，並且把責任推到陳伯達身上。[102]

同莫斯科緩和

全會決議中保守的觀點幾乎可以肯定是為了試圖同莫斯科緩和。毛澤東本人承認，全會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主要鋒芒是直接針對國際上那種雖尊重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熱情，但反對它的操之過急和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的觀點。[103]顯然，前幾個月，蘇聯在這一問題上施加了壓力，其頂點是赫魯曉夫決定要召開一個黨的特別代表大會，在這個會上他要把中國的思想意識納入正軌。這種壓力終於有了結果，蘇聯的胡蘿蔔是表示願意提供經濟援助。中國人迄今已認識到，他們的工業發展速度是否能保持得住，蘇聯的經濟援助是至關重要的。[104]

儘管中共中央在公開退卻，但是對於赫魯曉夫來說，由於人民公社化運動在政治、外交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所引起的問題是太重要了，這使得他不能放棄他的抨擊。不過，儘管他肯定知道毛澤東在私下裏對人民公社的要求遠遠超出官方的宣傳界限，他在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還是採取了明智的調和態度。在許多言論中，他實際上是接受了中國人的主張，即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之間是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雖然他仍堅持社會主義階段是不能隨心所欲地超越過去的。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速度問題上，他堅持說，在勝利面前不能止步，但切不能操之過急、過分匆忙地推廣尚未成熟的經驗。

在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問題上，赫魯曉夫一反由蘇聯最主要的哲學家T·A·斯坦波尼揚提出的一個主張。那是在蘇聯對人民公社極為惱火時提出的。斯坦波尼揚曾試圖撲滅中國的熱情，宣稱歐洲的共產黨國家將作為一個集體一起首先進入共產主義，將遠遠早於亞洲的共產黨國家作為一個集體進入共產主義(因此，中國要等待朝鮮和北越)。大概是在八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在闡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時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即使在將來我們具備了進入共產主義

社會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時，也應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應當由蘇聯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因為這樣做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利。而且要看到，蘇聯現有的物質基礎比我們雄厚得多，他們有比我們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105] 但一個月之後，赫魯曉夫推翻了斯坦波尼揚所主張的觀點，宣稱所有共產黨國家將差不多同時地完成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在赫魯曉夫的講話中，這是唯一在後來被中國稱之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貢獻的觀點。不過還有一點，正如當時的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在他向蘇共二十一大的發言中明確提到：「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越是相互配合，發達的國家越是幫助尚不發達的國家，那麼，所有國家也就將更快地一起向共產主義邁進。」尤金肯定比大多數蘇聯公民清楚，這個把中國經濟和蘇聯及東歐經濟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的呼籲，對中國是不起作用的。

赫魯曉夫無疑能夠在諸如向共產主義過渡這樣的問題上採取和解的態度，因為它們是理論上的而不是現實的問題，而且要實現時日尚早，特別是當中國在武漢會議對這個問題表示退卻之後更是如此。此外，毛決定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最終在武漢會議上得到批准，並在隨後公佈，赫魯曉夫可能希望，這將預示著毛澤東本人的下降，那麼他與蘇聯格格不入的觀點，也將不佔主導地位。[106] 但是人民公社仍然存在著，並且代表著對傳統的蘇聯集體農莊的具體挑戰，它們必然受到譴責，就算是不點名的譴責。赫魯曉夫認為，集體農莊能夠「在一個長時期內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繼續發揮作用」。過早地採用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就是拉平差距，並不意味著向共產主義轉變，相反將有損於共產主義的形象，沒有物質刺激，就談不上領導億萬人民向共產主義邁進的問題。[107]

中國不同意蘇聯的看法。他們暗示赫魯曉夫關於集體農莊的主張僅僅適用於蘇聯。[108] 中國並不準備刪去《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驕傲的開場白。這個決議充滿激情地宣佈：「1958 年，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像初升的太陽一樣，在亞洲東部的廣闊的地平線上出現

了。」[109] 並且接著規定：「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同時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組織的基層單位。」[110] 決議中所體現出的唯一一點讓步，就是認為有必要在 1958 年 12 月至 1959 年 4 月的 5 個月時間裏「對本地區人民公社進行一次教育、整頓和鞏固工作，即整社工作」[111]。

此外，儘管毛在關於人民公社的理論上對蘇聯採取了妥協的態度，但他在鄭州會議上卻採取了進一步的行動，以動搖中國的幹部們對蘇聯的總體經濟模式、特別是對斯大林經濟觀點的尊重。毛澤東的講話之一，主要是針對斯大林在經濟學方面的最後一部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毛曾提議中央省和地區、縣一級的黨委應該學習這本書。毛指出這本書前三章的許多觀點都是正確的，但同時又補充說：「有些地方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沒有搞清楚。」斯大林沒有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很好地結合起來；主要是「一條腿走路」，對輕工業和農業不很重視，並且過分強調技術和技術幹部，毛說，斯大林「只要幹部，不要政治，不要群眾，這也是一條腿」[112]。斯大林在這本書主要章節之後的「答阿·弗·薩寧娜和弗·格·文熱爾兩同志」部分，拒絕了這兩位經濟學家提出的，把集中在農業機器站的基本生產工具出售給集體農莊，作為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辦法。對此毛批評道：「這基本上是錯誤的」，這表明斯大林「不相信農民」，「對農業機器啃住不放」。斯大林的觀點只能是自欺欺人，而且他沒有解決在農村中實現兩個過渡的問題。[113] 幾天以後，彭真對北京的幹部們說，赫魯曉夫在把拖拉機交給集體農莊方面，比斯大林更進步一些。[114]

毛澤東的那些評論是他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以及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的合乎邏輯的發展。[115] 但是，在此之前毛澤東對蘇聯經濟政策的批評對事不對人，此時對斯大林經濟理論的這種既直接又廣泛的抨擊，無疑是說這位前蘇聯領導人是主要錯誤的責任者，他對中國政策的錯誤尚可以由於不瞭解情況而被原諒，但他對這樣重要的國內政策

也同樣犯了錯誤。的確，毛澤東曾作《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體現了中國公眾一直維護斯大林，而他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則代表了某種反向轉變。在那篇文章中，這位前蘇聯領導人受到讚揚，說他維護了「列寧的關於蘇維埃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路線」，並且「使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取得了勝利，並且造成了蘇聯在反希特勒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條件」[116]。路線的轉變大概反映了毛當時對斯大林觀點有了新的掌握和理解。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肯定會使人大吃一驚：不久前他才認真地讀了 6 年前被譽為對當代經濟情況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高明論著。如果真是如此，就使人饒有興味地感覺到，毛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有了變化。但是，即便如此，毛澤東至少在黨內還是願意更多地褒貶斯大林，而且準備出版一本體現毛澤東觀點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些可能更多的是由於莫斯科和北京之間關係緊張的結果。[117]

1958 年底到 1959 年初，莫斯科和北京之間達成和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由副總理賀龍元帥提出的一項中蘇聯合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提議為周恩來所否決，這也不奇怪。[118] 這表明，達成和解經歷了一系列由一方提出建議、由另一方作出讓步的過程，不像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會議那樣，在幕後經歷了艱難的談判。毫無疑問，中國非常惱火赫魯曉夫的不友好的舉動，他向一個「帝國主義」的首要分子——美國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表露他對人民公社的嘲笑。[119] 1959 年 1 月至 2 月間，在周恩來參加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時，蘇聯允諾為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提供一大筆新的較大數額的援助，但這並沒有消除怨恨。但是，至少周恩來與赫魯曉夫達成了一個價值 50 億盧布的關於建設 78 個新企業的經濟協定，協定中規定中國將以出口償付債務，這似乎意味著雙方共同努力恢復關係。[120] 1959 年初，蘇聯第一枚宇宙火箭發射成功，增強了毛澤東聯合的意識，因為聯合標誌著東風的強勁。這個事件在中國引起了興高采烈的歡呼。[121] 但其後不到 8 個月，這種聯合關係開始崩潰。

第八章 毛澤東轉右

人民公社的調整

人民公社理論上的退卻，部分原因是由於黨內出現的爭論，同時也是中國當時面臨的許多具體問題的反映。武漢會議決定對人民公社進行「整頓」[1]即整社[2]（這個專門用語將在附錄一中得到確定，見第 181 ～ 184 頁）。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黨的一系列重要會議都強調決定從 1958 年 11 月至 1959 年 4 月進行為期 5 個月的整社工作，這些會議是：1959 年 1 月 27 日召開的北京會議[3]；2 月初召開的全國省委書記會議；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在上海舉行的另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緊隨這次會議，4 月 2 日至 5 日仍是在上海召開了八屆七中全會。武漢八屆六中全會和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各省召開的黨的幹部會議以及全國農業幹部會議，使基層中的尖銳矛盾明顯地暴露出來。[4]這些矛盾在黨的領導人之間的討論中也有反應，這使得毛澤東站在他所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上。[5]

早在武漢會議文件公佈之前，整社工作即已開始並得到加強，因為官方鼓勵廣大群眾利用能夠「自由和坦率地」發表他們意見的大字報來進行「大鳴大放」。[6]不過有一個重要的改變，在沒有同廣大農民進一步協商的情況下，就在武漢會議上決定了放鬆在人民公社化早期曾被推廣的軍事化訓練。在 9 月份，由《紅旗》雜誌倡導的「三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被擴展為「四化」，即加上了一條「管理民主化」。《紅旗》雜誌在介紹「三化」的時候，曾經否認這「三化」將會導致命令主義。[7]但是武漢會議的決議認為，在人

民公社中推行民兵制度，有可能會削弱民主生活。[8] 出於對這一點的擔憂而加上的第 4 條「管理民主化」，意在鼓勵農民敢於反對這種傾向。[9]

儘管武漢會議贊成群眾參加整社工作，但這次會議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在語言方面的措辭過於審慎中庸，因而不能激起群眾更大的熱情。廣大的基層黨委都採取了類似的方法，即以官方能夠接受的形式來動員群眾參加整社，首先強調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而將解決其不足之處放在次要地位。

在武漢會議結束後的一週之內，各省黨組織先後召開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決議。山東省在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的領導下，用 9 天時間舉行了有 3000 名幹部參加的會議，建議之一是組織 3 萬人的整社隊伍。[10] 其他省份也隨之效仿。[11] 為了與毛澤東關於煉鋼的新設想一致，山東省禁止再建立任何「土高爐」；而其他省則下令用國外的或先進的鋼鐵生產方法來代替土法生產。[12] 各省會議報道的共同特徵，是對 1959 年的成就將會超過 1958 年，抱著堅信不疑的樂觀情緒。[13]

然而，在一向幹勁十足的河南省，會議的新聞報道中卻對農村形勢進行更為現實的評價。根據河南省委的計劃，要對人民公社進行徹底整頓。

> 對人民公社的看法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是多種多樣的。一些政策出現重複，而且某些荒謬的主張依然存在。雖然有關產量的指令已經發出，但始終缺乏基本的、組織良好的管理系統去執行。雖然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受到重視，但多種經營的發展卻一直有些被忽視。雖然是一種大躍進的形勢，但對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關心不夠，同時對生產和生活條件的安排也不適當。[14]

廣東省的「本位主義」

中國南方人民公社更加嚴峻的情況傳到東南亞的華僑那裏，他們從廣東和福建兩省的親屬那裏不斷得到消息。例如，他們痛苦地抱怨財產被沒收充公，「隨著人民公社的建立，所有的財產都變成了國家所有；所有的房屋、傢俱都變成政府的財產。公社可以為所欲為，個人沒有任何權利。」[15]「現在所有的東西都屬於人民公社，任何人都沒有私人財產或物品」[16]。「你知道嗎？縫紉機必須歸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經同五叔爺，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了，最後我們決定盡快地把縫紉機賣掉，但縫紉機的價格太低了，因為賣縫紉機的人太多了」[17]。「現在，每個人都必須變賣個人財產去『投資』，看起來，沒有一個人能準確地、真正地瞭解『投資』的含義。我們被告知，必須把東西交給政府，這就是『投資』。」[18]「所有銀行存款或是用來投資，或是被官方沒收。從南洋（即從東南亞的親戚）寄來的匯款，只有一小部分給我們自己，其餘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19]。後來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重新談到這類問題。

另一個引起省裏和中央關切的較大困難是食品問題，這也是中央內部激烈爭論的焦點之一。一位居住在福建廈門的教師早在 10 月 23 日發出的一封信裏，就預言道城市食物供應危急將在明年出現。他抱怨說：「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吃到一斤肉或一塊魚了。每個人的處境都是相同的，任何能食用的物品都得不到。」[20] 人民公社的食堂提供人們的基本食物只有米飯[21] 或白薯[22]，但每天 1 斤 8 兩稻米對一個每天工作 18 小時的人來說是不夠的[23]。另一封信的作者寫道：「人們為了接近飯桶而爭先恐後，而米飯永遠也不夠。」[24] 此外，沒人買得起副食品，有時候甚至根本找不到地方買。「豬肉 1 元錢 1 斤。在公家的市場上根本就沒有魚，而黑市上每斤魚的價格是 1 元 3 角到 1 元 4 角。」[25]「有工作的人可以得到兩份配給的副食品。實際上要想買到副食品是不可能的……蝦醬和其他類似的食品都沒有賣的」[26]。「買不到蔬菜，更不要說魚和肉，這些東西只有持診斷證明的病人才准許買。

雞蛋黑市價格賣到1角8分到2角錢一個，小雞賣到3至4元一隻」。[27]「就拿豬肉來說吧，上個月，我甚至連一小塊豬肉都沒有能買到」。[28]「蔬菜價格太貴不說，還很難買到」。[29] 在眾多呈現一派失望情緒的信中，有一封信總結得比較好：「現在到處都沒有東西可買，形勢是可怕的，我們飢餓時沒有東西可吃。人們害怕死亡，因為他們感到如果死了，他們也不能瞑目。人們在生與死之間躊躇，每個人都在受罪，一切東西都沒有了」。[30] 雖然這一年是共產黨掌權後收成最好的一年，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出了「一日三餐」[31] 的口號，這一口號後來招致了災難。

這些來信在海外華僑中可能引起震動，顯然又驚動了廣東省當局。華僑們如果相信他們的匯款到達後被沒收或被集體分掉，或者是得到他們的親屬受到嚴厲對待的消息，那麼來自東南亞的僑匯，這個中國主要的外匯來源，就會枯竭。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感到有必要向來訪的港、澳工商界人士和傾向共產黨的港澳中國新聞記者談一談有關人民公社的問題。陶鑄的這篇公開講話的摘要，被中國主要的國際宣傳機構主辦的刊物《北京週報》轉載，顯示當局對此公共關係事件的處理很重視。

陶鑄的講話主要涉及對家庭解體的憂慮、公社的軍事化、喪失自由，以及超負荷工作等問題。對所有這些問題，陶鑄都堅定地為政策辯護，並且經常提出反駁。雖然他談到了武漢中央全會增加的人民公社的領導要實行「民主管理」的原則，但他並沒有暗示這是由於擔心軍事化過了頭的結果。雖然他也提到最近強調在農村實行8小時工作制的問題，但在這裏他並不是承認，這一做法表明了中國領導人在武漢會議上已認識到他們對農民的體力消耗太不顧惜了。更意味深長的是，在這裏陶鑄沒有提及業已開始嚴重地困擾他及其同事們的食品缺短問題，而這一問題已使上面提到過的那些僑眷憂心忡忡。不過，陶鑄宣稱，銀行存款和華僑匯款是神聖不可侵犯的。[32]

雖然陶鑄提出的保證態度溫和，但在武漢會議決議之前，廣東省委已經開始就這些問題對大躍進的偏激做法進行了糾正。陶的妻子曾志，在11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強調人們要有足夠地休息。[33]在12月3日的電話會議上，廣東省委一位最活躍的書記，陶的可靠副手，40歲的趙紫陽命令安排工作日程表要考慮休息和娛樂，改善食堂伙食，尊重個人財產，例如房屋、衣物、傢俱和存款等。[34]

從武漢歸來的一個月裏，陶鑄帶領一個調查組對東莞縣虎門人民公社的情況進行了為期一週的分析，該公社位於珠江入海口。在2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的調查報告。[35]大約與此同時，1月中旬，趙紫陽率領另外一支高級工作組到雷州半島最南端的徐聞縣調查研究，他的調查報告似乎由毛澤東看過，並被廣泛傳閱。[36]

陶鑄關於虎門人民公社的詳細調查報告佔據了《人民日報》的整版篇幅。文章基調是樂觀的，這是肯定的，但他還是指出了普遍存在於虎門及廣東各地人民公社亟待解決的6個主要問題。[37]所有這6個問題中，首要的是集中統一與本位主義這兩方面的衝突。本位主義在廣大幹部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比較突出」，實際上有一些幹部已經墮落，如果不糾正本位主義，那就很有把人民公社變成一個空架子的危險。

本位主義指的是公社的下屬單位即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例如，虎門寨生產隊在農業合作社時，農民相對地富一些，但自從併入人民公社以來，有些家庭的收入下降。這個生產隊的幹部為了彌補，企圖隱瞞指定要交到公社的糧食、資金和副食品。[38]在長達一週的會議以後，大約有5588噸的糧食和12000元錢被揭露出來。另一個隱瞞糧食的生產隊解釋說，貯存糧食是確保生產隊的口糧供應，以防公社的免費供給制中斷時有糧食儲備。[39]隱瞞的資金幾乎佔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到11月資本投資的1/4。由於12

月份公社的投資比前 2 個月的投資增加了 25 倍，所以隱瞞現金也許是一種保留措施，以防生產隊的全部資金被吞併到公社的無底洞裏。[40]

趙紫陽在徐聞縣的詳細活動情況，只能從文化大革命期間發表的一份攻擊他的文章中得到。[41] 但陶鑄當時的報告以及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對這兩個人的批評，使人們能大致瞭解實際發生的情況。趙紫陽在他的視察中想弄清楚的是：「前一年秋天農作物是大豐收嗎？如果是大豐收，為什麼當時出現糧食短缺？」[42] 在徐聞縣的地裏視察以後，他相信了前一年確實是大豐收，還足足有幾千斤餘糧[43]。很多縣幹部報告說他們發現了很多隱藏的餘糧。在 1 月 23 日，他召集了有 4000 名幹部參加的會議，發動反瞞糧運動。自動坦白的幹部將允許保留糧食，改善食堂伙食，不交待的不允許回家。會上沒有一個人說話，會議不得不很快中斷。[44]

縣裏的幹部進行個別調查時，揭露出 7 個生產大隊或生產隊的幹部供認有隱瞞糧食的行為（根據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章揭露，這些情況是不真實的，幹部們是被迫供認的）。[45] 趙紫陽得到鼓舞，展開另一場更大規模的召集。在反瞞糧的運動中，曾用過威脅的方法，壓力不斷增加。有一個隊的幹部自殺，另一個幹部自殺未遂，6 人被捕，其中 2 人被監禁，並死在獄中；109 人被解除職務，總共約 50% 的基層幹部受到了某種形式的批評。[46] 揭露出 38000 噸隱瞞的糧食。[47]

在徐聞縣的時候，趙紫陽還召開了一個全省電話會議，宣佈他的發現，並號召在各地開展揭露隱瞞糧食的運動。他估計在整個廣東省約有 300 萬噸隱瞞的囤糧，幾乎是 1958 年公佈的糧食產量的 10%[48]。在 1 月 25 日，他發出了一個指示，簡要地說明了他認為全省多數的基層幹部都捲入了隱瞞糧食的活動，他認為糧食問題是「現階段農村中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簡而言之，這是意義極為重大的政治鬥爭。[49]

3 週以後，在廣東省黨代會上，陶鑄根據武漢會議毛澤東確定的「全國一盤棋」的方針，宣佈要堅決地進行反對本位主義的鬥爭。陶又

說，將全省看作一盤棋也是必要的，並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原則」，特別是人民公社應該更嚴格地為全國統一計劃盡責，言下之意是強調把糧食交給國家的重要性。他否定了那種認為本位主義只不過是革命積極性的一種表現的觀點。[50]

廣東省委的態度得到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贊同，他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51]，這篇文章不容置疑地表明，陶魯笳在思想上也認為本位主義不符合全國一盤棋方針，應該糾正。他舉了一個實例。嚴厲地批評了一個公社，該公社隱瞞了1958年生產的許多糧食、棉花和油料作物。在進行反覆調查和廣泛辯論之後才上交——這是影射徐聞縣，他強調了人民公社對工業和城市居民應盡的義務，列出了國家、集體和個人這樣的利益優先的次序。[52]陶魯笳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來支持他對本位主義的嚴厲指責（這段話的出處他沒有說）:「不顧大局，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就是這種本位主義者的特點。」[53]

一盤棋的概念

省級幹部發表的一盤棋的觀點同中央闡明的概念是否一致？在《人民日報》題為《全國一盤棋》的社論中，指出一定要反對本位主義和分散主義。小局必須服從大局，下級服從上級，公社服從縣，縣服從省。按輕重緩急來安排先後次序，眉毛鬍子一把抓是不可能的。好像一個人不能用十個手指頭同時捉十只跳虱一樣，那可能1只也捉不住。在選定建設項目、重要資料的生產原材料的分配以及採購和分配生產資料及人民生活資料方面，國家要做統一規劃。[54]

毫無疑問，《人民日報》描述的全國一盤棋的方針，即是說要由生產隊向人民公社繳納餘糧和其他農產品，公社則向縣繳納，縣向省繳納，省再向中央政府繳納。否則，城市居民還有其他辦法得到糧食嗎？食品加工廠和紡織廠還有其他辦法得到原材料嗎？社論的主要論點是強調集中領導和統一計劃的重要性，並且要使各省及下級行政部

門抑制 1958 年大躍進中在各地區全力以赴匆匆建立起來的分散的工業，以便緩和原材料普遍緊張的困難，使大型國營企業，特別是重工業中的大型國營企業，不至於遭到原材料短缺的困難。為了強調這樣的信息，這份報紙還在頭版登出了描述安徽、福建、浙江、江西和河南等省是怎樣在全國一盤棋方針鼓舞下，將最好的鐵全部送到上海的報道。[55] 有意思的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論一盤棋方針的重要文章[56]，他在文章中強調，上海這個全國主要工業基地和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要依靠全國各地輸送原材料和糧食。[57]

然而，不管一盤棋方針的最初動機怎樣，到了柯慶施和《人民日報》勾畫出它的要旨時，隱瞞糧食的問題已使這一方針又增加了一層意思。在全國一盤棋的概念下，隨之而來的對本位主義的批評就顯得正是時機：

1 月 27 日　關於整頓人民公社的北京（政治局？）會議。
1 月 28 日　陶鑄簽虎門調查報告，批評本位主義。
2 月 16 日　《紅旗》雜誌發表柯慶施論一盤棋方針的文章。
2 月 17 日　陶鑄在廣東省黨代會上發表講話，根據一盤棋的方針，批評了本位主義。
2 月 21 日　在河南的一次會議上，當談到一盤棋方針時，毛澤東為本位主義辯護。
2 月 24 日　《人民日報》發表論一盤棋方針的社論。
2 月 25 日　《人民日報》發表陶鑄的虎門調查報告。
2 月 27 日　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首次講話中，為本位主義和隱瞞糧食辯護。
3 月 1 日　《紅旗》雜誌發表陶魯笳的文章，在談到一盤棋方針時，批評了本位主義。
3 月 2 日　《南方日報》發表陶鑄在廣東省黨代會上的報告。
3 月 5 日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批評性地談到陶鑄和趙紫陽。

總之，到 2 月 27 日鄭州會議召開時[58]，廣東省的領導者們堅定地反對基層幹部的本位主義，並且認為隱瞞糧食是由於本位主義作怪，號召要在一盤棋方針精神下，消除本位主義。在鄭州會議的早些

時候，《紅旗》雜誌發表了山西省抨擊本位主義的文章，措辭同廣東大致相同，毛對這些省——或許還有其他省——的態度非常不贊同。他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裏帶有同樣的情緒。我們現在必須分析一下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想法。

毛澤東的重新思考

武漢會議忽略了食品問題，直到11月下半月毛澤東和其他中央及省的領導才越來越震驚地認識到，儘管1958年是大豐收之年，但國家糧食收購指標沒有完成，而且城市糧食出現短缺。[59] 據毛澤東說：直到北京市民每人只有1兩蔬菜時，才引起注意。[60]

毛澤東對這一問題以及人民公社的有關考慮，是在他從武漢返回北京之後才發展起來的。他為解決這些問題冥思苦想，甚至不睡覺。[61] 1月27日毛澤東召開了一次研究解決人民公社內部管理問題的會議。[62] 2月2日，毛澤東在全國省委書記會議上發表講話[63]，在這之後，他開始了路線曲折的巡視，終點是鄭州。在天津，他同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子厚進行了討論。然後到山東，接見了山東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並參觀了由全國農民模範呂鴻賓領導的愛國人民公社。[64] 2月21日，他在河南省四地區黨委座談會上發表講話。[65]

在2月2日省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主要關心的是勉勵與會者再鼓幹勁。他認為兩個月來的「壓縮空氣」造成了一些鬆懈，這不足為奇，但現在我們必須「再鼓幹勁」[66]。農村工作動得晚了一點。毛很關心積肥活動[67]。總路線不能改變，可能每年都有大躍進。[68] 必須保護擴大幹部和勞動人民的熱情，當整社期間，有些錯誤被揭露時，應該記住它這不過是1個指頭和9個指頭的問題。[69]

然而，毛澤東告誡有主觀主義傾向的人，不要去做辦不到的事，毛號召人們進一步研究有計劃和按比例發展的問題。[70] 他列舉了普遍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如：「抓了一面，忽視了一面，引起了勞動力浪費，副食品緊張，輕工業原料未解決（多種經營），運輸失調，基本

建設上馬太多。」接著，他這樣形容大躍進期間中國的領導特徵：「像小孩抓火一樣，沒有經驗，摸了以後才知痛。我們搞經濟建設還是小孩，無經驗，向地球開戰，戰略戰術我們還不熟。」[71] 毛澤東似乎準備對大躍進期間過分的工作速度承擔責任，有人善意地為他開脫，指出他在成都會議曾提出要勞逸結合，但這善意被他拒絕了；他在會議上是提出過，但當時沒有制定出一個具體的工作時間表。[72] 但是他再次強調，全黨永遠要鼓足幹勁建設社會主義，並且要做到多、快、好、省。[73]

在不到 3 週的時間裏，當毛澤東 2 月 21 日對河南幹部們講話時，他對人民公社問題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很明顯，引發他重新思考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他在河北所收到的匯報，正如他對河南省的幹部所指出的，黨已經開始實行一個重大轉變。[74] 可能他也已經收到了趙紫陽從廣東寫的調查報告的副本，這份報告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幾天以後傳閱開來。[75] 鄭州會議上已經看得很明確：他寧願選擇河北的辦法。

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發表了 6 次講話，開始兩次是在 2 月 27 日。[76] 毛的這些講話是重複的，這表明至少有些內容是在分組會上講的。[77] 在這些講話中，毛重申了他在 21 日對河南省幹部講話的主要思想，並有所發揮，而所有這 7 次講話的精神是一致的。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仍然強調成績是主要的——10 個指頭中的 9 個指頭——而且要反駁算賬派，他還稱讚了各級黨委的整社中採取了這一立場。[78] 毛澤東逝世後，薄一波說，主席避免給積極分子潑冷水的願望妨礙了糾正左傾錯誤。[79] 但至少毛澤東已認識到，武漢會議決議未能解決一系列與人民公社有關的重大問題，如：積累與分配，所有制的級別，[80] 及管理級別[81]。而頭 3 個月整社的效果並不明顯：雖然公共食堂伙食有所改善，人們可以多睡一些覺，但沒有根本性的變化。[82] 儘管毛在口頭上說成績是主要的，但在他的講話中更多的篇幅是講缺點和批

評。在鄭州會議上缺乏武漢會議的謹慎。毛澤東大概估計到，他只能用激烈的言論才能使方針得到修正。

毛澤東用一句短語概括了黨在執行農村政策時採取的錯誤方式：「一平、二調、三提款」[83]。據毛澤東說，這一政策在農村中引起了「很大恐慌」[84]，而且將導致人民公社的「垮台」[85]。這種政策是對價值規律等價交換和按勞分配的否定[86]。如果繼續堅持這一政策，不可能消除公社幹部的恐懼惶惑心理，戰勝觀潮派、地主分子和壞分子。[87]這一政策表明我們高層領導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88]

毛澤東認為平均主義（包括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和「共」各種「產」）是去年秋季「共產風」中的內容之一[89]，並且強調了同平均主義作鬥爭的重要性。[90]當基層幹部指責上級搞平均主義時，後者則以「本位主義」的指責進行報復。毛澤東提倡繼續反「左」，就等於在決定性的關頭向全黨表明他的同情是在「本位主義」一邊。[91]在公社內部不能隨意地將富隊的財產轉到窮隊去，這是無償佔有——甚至是土匪、海盜行為[92]——我們對在華外資也許可以採取剝奪的辦法，而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我們沒有採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是實行贖買政策[93]。目前的這種無償佔有行為是對多勞多得這一社會主義原則的否定[94]。窮隊應當有同富隊競賽的志氣，像王國藩農業合作社那樣，自力更生擺脫困難的境地。王國藩農業合作社是在1955-1956年合作化運動中被毛發現而聞名的[95]。據毛說，生產隊的平均主義是「窮富拉平」[96]，現在大部分已糾正了，但還有「餘波」存在。[97]

實際上，北戴河會議決議已經認識到在人民公社中，窮、富農業合作社合併在一起將會出現一些問題，並告誡要反對平均主義。但決議流露出一種樂觀情緒，認為這是小事一樁，它將在1～2年內隨著「人民覺悟的提高」而被消除[98]。可惜，這種覺悟的提高並沒有出現。一對在中國居住的富有同情心的英國夫婦，在河北南部觀察了實際發生的事情。楊儀人民公社的領導說，人民公社成立以後，他們注意到勞動進度很快就減慢下來。在山區的窮隊社員鬆弛下來，是因為他們

感到現在有更多的機會依賴富隊了。據他們的黨支部書記說：「我們百分之百贊成合作社合併成人民公社，我們這裏每人只有一畝多石頭地，現在可以得到下邊山谷地區生產隊的幫助。」然而，這種態度並沒有得到山谷地區生產隊農民們的讚賞。他們也開始懈怠，很明顯，他們要麼怨恨窮隊將踩著他們的脊背攀向富裕，要麼擔心窮隊將他們的生活水平拉到一般水準的谷底。這種形勢對於一個公社的黨委書記和他的同事來說很嚴重，他們得出結論，人民公社中的主要矛盾是窮隊和富隊之間的矛盾。他們發動了教育運動，想讓窮隊和富隊相信，人民公社對所有的人都是有利的，每個人都應為公社和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奮鬥。[99] 可是，行動勝於說教。領導人繼續把公社作為基本核算單位，並在這一基礎上平均分配收入，免費提供食物，這就意味著「自動提高了窮隊的收入，而降低了狀況較好的富隊的收入，不管工作效率和生產條件如何。這在窮隊和富隊中，都不能激發最大的工作熱情」。[100] 直到武漢全體會議和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這一政策才有了改變。楊儀人民公社也犯了毛所列出的第二種錯誤：毫無區別地調撥財產。據一個公社黨委成員描述，這第二種錯誤是：

> 無償地將生產隊的財產「調到」公社或從某一生產隊「調到」另一生產隊，這就是社委會接收生產隊沿著公路送來的 71 輛馬車和 118 輛毛驢車的方法；這也是平原地區生產隊接受山區送來的綿羊和山羊的方法，即全都沒有任何報酬。這類錯誤也大大地挫傷了群眾的熱情。[101]

楊儀公社的有關報道是有意義的，它不僅僅是一個實際例子，而且也是因為幹部所犯錯誤完全符合毛的分類：一平，二調。因此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席的干預無疑是至關重要的。毛列舉了「調」的兩個類型：物和人[102]。「物」不僅包括徵調生產隊的資產[103]，也包括自留地、豬、家禽、房屋和屋內的傢俱——桌、椅、板凳、刀、鍋、碗和筷子，這些主要是拿到公共食堂去了。毛認為自留地收歸公社是物歸原主，並且承認房屋和傢俱是不得不借用的。但他批評了不

給一分錢就收走家畜家禽的做法[104]，他稱這是「公開搶」[105]。毛的這一做法必然會贏得廣東和福建那些僑眷的雙倍喝彩。

毛澤東認為，農民們並不害怕調土地，因為土地是搬不動的，也許正是出於這種想法他認為自留地收歸公社所有是理所當然的。但產品和勞動力能被調走，這一點是農民所害怕的。[106]他援引河北省一個人民公社的例子。這個社有七八萬人口，勞動力有兩三萬，由於豬和家禽收歸公社所有，有一萬多勞動力離開公社，有些可能盲目流入城市。[107]他認為，即使在人民公社所有制代替生產隊所有制作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後。家禽和家畜，房屋旁的樹木，小的農具、小工具，甚至──在大規模建設公共住房之前──連房屋也仍屬於個人所有。[108]

毛澤東的主要責難是針對工業和服務業的膨脹，導致了勞動力的轉移。與此相聯繫的還有行政人員數量增加，毛澤東認為這是以犧牲農業做為代價的[109]。從中央政府到人民公社有 5 種級別的工業在運轉，工業辦得太多了，需要對辦工業的熱情潑點冷水[110]──這可能包括毛澤東在其他場合描述過的「大煉鋼鐵」的熱情[111]。毛提到，從清王朝政治家張之洞（1837-1909 年，一位卓越的早期工業化倡導者）辦工業之日起[112]，到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工業職工人數已增加到 400 萬。從 1949 年到 1957 年底，又以平均每年增加 100 萬的速度共增加了約 800 萬人。而大躍進的結果，又有 2600 萬人湧入工業──毛澤東扣除了官方統計數字中約 1000 萬人的水份。這個數字再加上從行政和其他部門調轉到工業的 400 萬人，使得在一年內新進入工業的人員總數達到約 3000 萬人。[113]

毛澤東估計，工業、行政和服務業這 3 個部門中的勞動力的浪費，大約在 20% ～ 40% 左右，他提出堅決壓縮這些部門中的人數，20% 的工人應該回到農村，要回到農村的 5 個主要行業中──即農、林、牧、副、漁[114]。山西省的一個人民公社一次就削減工業勞動力 30%[115]。服務業職工要大量縮減，因為有的地方平均一個炊事員只

負擔 10 個人的飯菜[116]。公社不允許成立文工團和體育隊，因為這些團隊要吸收年輕勞力（可能還是精力充沛的），並且脫離生產[117]。行政人員要按公社人口的比例計算，定員不能超出全社總人口的千分之一[118]。有些大的公社有幾千個行政人員，光吃飯不幹活。[119] 毛特別舉了晉南一個人民公社的例子，該公社約有 3000 人全脫產或半脫產，其中有 180 多人是文工團成員——全部脫產。[120] 如果這種狀態持續下去，人民公社勢必崩潰，雖然這只是可能，但若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必將貽笑四方。毛澤東沉著地表示，這也不要緊，對公社重新改造就是了。[121]

毛澤東還批評了為修建大型水庫及公路、鐵路工程而過量使用「義務勞動」[122]。「義務勞動」應該減少[123]，沒有任何報酬的義務勞動量「太大」了。[124] 毛澤東還熱情地提到了 11 世紀的政治家王安石，讚揚他始創免役法，把服勞役改為徵稅，由政府僱人，出工資，作各種服役的事業。[125]

毛澤東的第三個主要擔心的問題是，財政部正向公社收回貸款。此舉是應工業需要，但使公社難以維持，而毛主張要把這種情況扭轉過來。[126] 他提議，現在還沒有向農業投資的國家銀行系統，在今後的十年內，應逐年擴大長期無息貸款的數量，最終達到 10 億元，主要貸給貧窮的生產隊[127]。貧窮的農民們已經接受了為期 4 年的貸款，要到 1960 年才到期限；如果現在收回貸款，這意味著人民銀行要搞垮農業生產和人民公社。即使已到期應該償還的貸款，也要延期。[128]

6 週以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財政部長李先念表示，毛主席的要對公社增大投資的建設已被接受，他當時講到：

> 1959 年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經濟建設支出中增加了對人民公社的投資 10 億元，作為國家對人民公社的補助。這筆資金主要地將分配給經濟條件較差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幫助他們發展生產，使他們能在不長的時間內，趕上比較富裕的公社的水平。（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但李先念同毛澤東一樣，堅持認為大部分落後的單位要依靠他們自己的勞動和資源，像王國藩農業合作社那樣自力更生。[129] 撥給楊儀人民公社「國家專用的貸款約有 41000 元，1/3 左右貸給了最窮的生產隊」。同時，這個貧窮的生產隊被告誡要「主動熱情地工作」以趕上富隊，富隊反過來要幫助窮隊。[130]

10 億元貸款是否足以彌補尚未償還的貸款，從毛澤東和李先念的講話以及楊儀公社的報道中都不清楚，而李先念關心的是保護他的部門，不受「一些好心人」的批評：1958 年大量增加國家稅收，已經意味著將過重的負擔加到群眾頭上[131]。李先念在毛澤東不久前對財政部的批評下作了讓步，但仍然堅持原則。毛的意圖是清楚的：把富隊援助窮隊的負擔，轉嫁到國家身上，以安撫窮隊、富隊及其幹部。

毛澤東在嚴厲批評公社內部政策以及針對公社的政策的時候，經常引用斯大林的下場強調局勢的嚴重性。斯大林的頭腦過分發熱，完全剝奪了農民，但這是非常不明智的。毛澤東引用一句生動的成語，形容斯大林的作法是「竭澤而漁」[132]。顯而易見，如果自 9 月份以來的「冒進主義」的大錯誤不能制止，就有重犯斯大林的錯誤的危險（這也包括高積累在內），農業就不可能發展[133]。30 年代間，斯大林未能真正實現集體所有制；他採用的方式是一種比地主還過分的剝奪方式，包括沒收農民的 70% 的產品[134]。不過，毛未能指出，在那段蘇聯農村政策出現錯誤的關鍵時期，是斯大林自己下令停止這些錯誤政策的，他責備他的官員們「被勝利沖昏了頭腦」[135]。這些正是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所做的！

局外人可能會認為毛澤東把 1959 年初中國的形勢同蘇聯 30 年代初的形勢進行比較，是言過其實。但是，很顯然他的目的是要大家記住蘇聯或中國歷史上的教訓，看到當時形勢的緊迫性，所以在鄭州會議上，他用反詰的語氣提出了問題：誰能料到，大豐收竟會產生大糧荒？[136]

在中國，每年秋收以後到來年夏收之前這段時間裏，糧食供應經常緊張，特別是春節以後，而 1959 年的春節是在 2 月份第一週的週末。1959 年同 1958 年一樣也是個豐收年，糧食問題應該是很小的，但是，毛澤東指出，抱怨食品短缺的聲音比 1953 年和 1955 年歉收以後的同期要大得多，短缺的食品包括穀物、油料作物、豬肉和蔬菜。國家收購穀物、棉花和油料作物的指標，直到當年年底仍未完成。[137]毛承認，去年的大豐收麻痺了我們。[138]浪費也是糧食短缺的一個原因，毛澤東要求他的聽眾們反對那種認為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了的自滿思想，因為當原來的需要滿足以後，新的需要又會出現。[139]

當然，大範圍內的食品短缺的主要原因不是浪費，而是農民「瞞產、私分」[140]。毛用一句誇張的措辭說農民們「深藏密窖，站崗放哨」。[141]為了擺脫上級領導尋找漏報的糧食，農民們白天只吃蘿蔔纓，晚上天黑以後才吃米飯。[142]當時，隱瞞糧食的現象很普遍，這是一種和平的反抗[143]。毛澤東估計隱瞞的部分大約是總產量的 15%，這就意味著農民掌握著糧食總額[144]的 45%[145]。有時候，一些老太太們封鎖了道路，就像她們在 1956 年剛開始合作化的頭一年曾經做過的那樣，不讓把糧食運走。[146]

毛對隱瞞糧食問題的態度，明顯地取決於這一問題的大小。試想一個人怎麼能同聯合起來的 5 億農民以及分佈在各地的 1000 萬—3000 萬的生產大隊、小隊幹部們作對？[147]反對他們和責備他們「本位主義」的只是那些從中央到公社和管理區的 6 級幹部。[148]況且，如果廣大群眾有意見，就會影響到軍隊[149]，因為軍隊是由應徵入伍的農民所組成的。這是大事。[150]毛還批評某些公社沒收了家在農村的軍隊幹部寄給家裏的匯款。[151]在一篇講話中，他承認：「我們的領導沒有得到群眾的支持。」[152]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警告說，盤剝農民的令人寒心的作法，有步秦、隋兩個短命王朝後塵的危險。這兩個王朝曾成功地統一了國家，但因為統治者的鎮壓措施而迅速滅亡。[153]

這些強硬的措辭，清楚地說明了毛在鄭州會議上，經常表現出了坦率的「右」傾態度。[154] 他聲稱他反對「左」傾、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155]，他支持「保守主義」和「本位主義」[156]。他熱忱地贊同生產隊和生產大隊隱藏糧食並站崗的行動，認為這是合理合法的。[157] 他拒絕承認他的這一立場代表了對農民階級的遷就。[158] 以前的優先次序必須倒轉過來，即要把個人的生活放在公社積累和國家稅收之上優先考慮。[159] 他還用挖苦的口吻說：

> 他產的嘛，馬克思百年前講過多勞多得嘛，他懂得點馬克思主義，他們就是按照這個原則辦事的。[160]

在某次會上，毛告訴與會者，如果他們想「左」傾，他就「右」傾。[161] 在這次講話中他宣稱：

> 我代表 1000 萬隊長級幹部、5 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162]

毛澤東的解決辦法

毛的全部指示同他在 2 月初在全國省委書記會議上的告誡形成鮮明的對照。這時，他主張當年有些事情的速度應當放得更慢一些，人民應該獲得更多的休息。在體育界、銀行或詩歌寫作方面要少放「衛星」。實際上，當他指出寫詩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時候，就等於動搖了群眾詩歌運動的基礎。[163]

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問題上的更多的具體的糾正方法，是包含在他的批評之中。為了防止平均主義和平調財產，他號召要堅定地執行兩個政策：三級所有制，以生產隊（以前的高級農業合作社）所有制為基礎[164]；三級管理與核算制，以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165]

毛認為，如果從互助組到高級農業合作社的轉變曾經用了 4 年時間，那麼，從生產隊基本所有制到人民公社基本所有制的轉變則需要 4 ～ 7 年的時間[166]，這是可以理解的。毛認為這一轉變的時間決不會

超過7年，但他有時把這一時間的上限和下限減去1～2年，認為這種轉變可以在少則三年，多則五六年完成[167]。據推測，他希望盡可能不挫傷幹部們的熱情。出於這個目的，他還計劃了由公社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到公社的共產主義所有制的進一步轉變（實際上是全體中國人進入共產主義時代），將在15～20年內完成。[168]這樣，儘管他看到了公社問題的實質，但他沒有從武漢會議上所作的樂觀預言中退縮。[169]而且，和武漢會議決議一樣，毛斷言，這兩種所有制的轉變的主要前提條件是通過擴大社辦企業來增加公社的財富。[170]

談到三級管理和核算，毛指出，公社行使的支配權太多，至少有10項之多[171]。公社應當把某些權力下放[172]，最大的爭執點，是公社是否應該集中掌握勞動力。[173]公社積累過多，刮共產風[174]，這是造成瞞產私分的主要原因。[175]應該減少這種現象。[176]在楊儀人民公社，一些農民說：「我們打了更多的糧食，但是糧食都到哪裏去了？我們種得越多，他們拿的越多。」[177]顯然，廣東、福建的僑眷所反映的情況，並不僅僅限於中國南方。毛澤東批評了河南的做法，說他們佔用了農業收入的70%，其中包括：農業稅（7%），公社積累（26%），生產費用（20%），管理費和福利費（17%），只剩下30%用於消費。[178]這就是農民們為什麼要瞞產約15%，以便把生活消費的實際比例提高到45%的原因。為了制止這種行為，同時安撫農民，毛澤東提議印發公開聲明，在所有制問題[179]以及作為消費和公社積累之間的產品分配問題上公開作出保證，把公社積累的比例從26%減少到18%。[180]

毛澤東在一篇講話中用了14個短語概括了他的指示，即：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181]

毛澤東想通過各省六級幹部會議傳達他的指示，要求在會議上講清政策，避免罵人，統一思想。[182]

毛制止陶鑄

在很多場合，毛澤東借助於一盤棋的概念來支持自己的主張。他堅持說，5 億農民在全國一盤棋中佔有首要位置，是主要的成分。[183]現階段，只有半盤棋，因為分配所得太少，生產隊所有制並沒有實行。[184]全國一盤棋的觀點，實際上意味著統一安排人民生活、公社積累和國家需要。[185]過去，一盤棋理論只是由上級掌握，到這時，必須由上下兩級一起掌握。[186]

毛澤東的一盤棋概念和本位主義的主張和陶鑄、趙紫陽及及廣東省委提倡的思想正好相反。為了亮明觀點，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他最後一個重要講話中，嚴厲批評了陶鑄和趙紫陽。他抓到了兩人的「小辮子」。他不相信珠江流域（廣東省省會廣州所在地）和長江流域有什麼馬克思主義。[187]毛澤東提到的長江流域可能是指安徽，該省的領導人顯然認為農民犯了本位主義的錯誤，不過，他們採取了阻力最小的對付措施，並且決定，反對把它看成是一個錯誤。同樣，河南也決定不對本位主義採取約束措施。[188]

奇怪的是毛澤東沒有提到陶魯笳，他在山西實行的反對本位主義的政策同陶鑄是一樣的。但毛詳細描述了山東省農民模範呂鴻賓所在公社社員的對立情緒，那裏的群眾抗拒徵收糧食，社領導下令搜查農民的屋子，這些幹部發動了一場心理戰，但以失敗告終。[189]毛以非常讚賞的語調談到了劉子厚，他所在的河北省委在武漢會議後實行了「共產主義」（即左傾）路線，但是 5 週以後即 2 月 13 日，當他們認清了所面臨的問題時，就將政策完全改變過來了。然而，即使是河北也沒有解決所有制的問題。[190]

毛澤東關於陶鑄的評論，其影響是決定性的。4-5 月在汕頭召開的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陶以《總路線與工作方法》為題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並承認他自己在很多問題上頭腦發熱，其中之一就是反瞞產。顯然他還承認了一些與此有關的錯誤，如：過高地估計了糧食產量，並為國家徵購的糧食定額制定了過高的指標（高徵購）。他還承

認，他曾過分地強調「密植」，過分熱衷於群眾性的大煉鋼鐵運動；而且在廣東「共產風」盛行。根據趙紫陽 20 年以後的敘述，在所有問題上，陶帶頭承擔了責任。[191]

毛澤東對反對本位主義的猛烈攻擊已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一向走在前面的廣東再次放慢了腳步。第二次鄭州會議曾想要發動一場全國性的反瞞糧運動，但終於在萌芽狀態的時候就被毛制止了。

但是，據鄭州會議多數參加者回顧，他們確實感到毛澤東和陶鑄的矛盾中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氣氛。應當尊重陶鑄、趙紫陽、陶魯笳以及可能還有其他省的高級官員在現場調查時的所見所聞，糧食是被隱瞞了，但毛澤東根據手頭零星的證據就推斷出瞞報是普遍存在的現象，這是否合理？毛澤東和陶鑄工作的前提都是假設 1958 年公佈的糧食數字是真實的。趙紫陽在徐聞縣調查的第一個問題——「去年秋天是大豐收嗎？」——的答案不是「是」；正確的答案是:「是的，但」——「是的，但不如想像得那樣好」。趙紫陽、陶鑄和毛澤東仍然陷在大躍進的邏輯中，至今未有反思：如果糧產增加了百分之百，那就得有地方存放這些大量的過剩餘糧。他們都認為生產隊和個人的貯藏室就是存這些餘糧的地方，他們之間不同的意見僅僅在於如何對待這一「事實」。幾個月後，毛澤東才準備承認，由於我們吃飯不要錢，就使我們自己陷入糧食和副食品的危機之中。[192]

陶鑄和他的同事們承認了毛澤東指示的正確性，而且，如果說抓生產隊瞞產的糧食是不明智的，那麼，批判農民私藏他們實際並未到手的糧食，也算是犯了斯大林式的錯誤。之後陶鑄在 1959 年 5 月中旬寫了一篇題為《太陽的光輝》的文章，發表在同年 6 月 3 日的《人民日報》上。他是想批評毛澤東，進行報復嗎？這個問題到今天也沒有答案。[193]一種說法認為，與毛相比，陶鑄更多地強調大躍進的缺點。毛澤東把大躍進的缺點比作 10 個指頭中，1 個指頭和 9 個指頭的關係；陶鑄則認為，這種說法固然正確，但這並不是說，一個感染的手指就不會帶來巨大傷害。[194]根據毛澤東當時的行為來看，這種分析站不住

腳；更確切地說，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所作的講話，實際上是對「9個指頭和1個指頭」比喻的諷刺，因為這些講話除了批評沒有其他內容。同年晚些時候的廬山會議上，受到彭德懷的指責的影響，毛澤東的立場有所改變。但在5月看來，陶鑄不過是進一步闡明了毛在鄭州會議上所持的觀點。此外，根據1959年初廣東省發生的事情，認為陶鑄在大躍進問題上醒悟得比毛澤東要快，這是錯誤的。[195]

後來，趙紫陽在為陶鑄的文章辯解時說，這表現了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對待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態度。陶曾引用孟子的一段話：「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蝕，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196]趙紫陽強調，陶鑄曾指出：「如果一個『古之君子』能做到這樣，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革命者就更能做到這樣了，因為我們為群眾工作之心，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不知比『古之君子』要高多少倍。」[197]

也許，值得注意的是，趙紫陽沒有試圖去反駁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陶鑄文章的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攻擊。姚文元說陶鑄：

> 他一面說人民以「東方紅，太陽升」「來形容我們偉大事業的朝氣勃勃」，「以太陽來歌頌我們的黨和領袖」；一面公然借攻擊「太陽」的「過失」，指桑罵槐地說：「當大暑天驕陽似火，曬得人們流汗的時候，人們就會埋怨，說太陽的光和熱射得過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並且也都指出過，太陽本身還有黑點」……這不是赤裸裸地咒罵我們的黨和偉大領袖嗎？[198]

另一方面，根據毛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斷言陶鑄對黨進行了集中的攻擊，也是站不住腳的。同毛比起來，陶鑄是含蓄而溫和的。不過，陶鑄暗示毛澤東也犯了錯誤的說法，更符合實際情況，特別是1965年陶鑄的文章再次發表時，曾謹慎地把涉及「領袖」的言論刪去，此刻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對毛的個人崇拜正在建立起來。[199]根據早先毛要陶鑄及早收兵退卻的事實，陶鑄不可能要把大躍進的所有錯誤都歸諸於主席[200]，更有可能的是，他受到毛要求全黨幹部講真話的號

召的鼓舞[201]，也為了減輕自己的責任，才指出毛對無節制的大躍進應當負有一定的責任，不能把責任簡單地歸到左傾的黨員幹部身上。

如果是這樣，陶鑄的意見可以撥動其他省級領導人的同情心弦，他們對毛強令他們服從其政策的做法感到不滿。對陶鑄本人的譴責，可以使一部分不像他那樣冒進和熱衷於宣傳的省委書記們鬆了一口氣。[202]當時，他們也受到批評，而作為毛的大躍進的忠實執行者，當毛突然轉到反對他們的立場上時，他們肯定心有怨氣。即使是開玩笑，他們誰也不會去威脅說要退黨，這將使他們冒著被指責為反黨分子的巨大風險，而毛本人則可以隨意說開除黨籍、末日，以達到他的目的。1958 年的大躍進時期，毛澤東經歷了 1957 年整風運動的分歧之後[203]，又重新建立起同黨的幹部的聯繫。然而，毛在鄭州右轉彎，又使各省黨的幹部出現「離心」，儘管他們支持毛的政策。彭德懷是否受到陶鑄這篇文章中的不滿情緒的影響，使他在廬山會議上利用這篇文章發難，即使是事後去看，也還是不能肯定。[204]這篇文章發表時，彭德懷正在國外。

第九章 劉主席

從鄭州開始退卻

3月9日凌晨，鄭州會議閉會4天以後，毛簽署指示，要求省委第一書記們首先迅速召集省、地、縣、公社、管理區和生產隊六級會議，這類會議是他在鄭州會議的講話中倡議的。[1] 這些會議計劃開10天，討論公社管理體制和具體政策。一向打頭炮的河南已經召開了六級會議，會議定於3月10日結束。這個會議產生的文件迅即在14日以前送往其他省份以供參考。然而，毛表示他不願意讓第一書記們坐等這些文件的到來，並建議像湖北省那樣在11日開始開會。這樣，六級會議將會及時結束，好讓第一書記們在預定於25日召開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匯報情況。

就在各省負責人出席這次擴大會議的同時，各縣負責人將召開縣、公社、區、隊四級會議，共有一兩千人參加，為期7至10天，到3月底結束。隨後，公社、區、隊將召開各自的會議，至遲在4月10日結束。有人提議說這樣一個日程安排得太緊，毛不以為然。為了堵住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人即那些「觀潮派」和「算賬派」的嘴，速度是須臾不可缺少的。這一系列會議結束後，每個人都會重新鼓足生產幹勁，確保在1959年出現第二次躍進。[2]

這類多種多樣的會議顯然是為了澄清在人民公社問題上的大量糊塗認識[3]，為幹部們規定一條新路線，並使農民放心。但是，儘管毛喜歡召開大型會議，討論解決問題，他還是很快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他要開的會太多了。3月17日，他在另一個指示裏告訴第一書記們，縣一級會議應當包括五級，再加上生產隊（小隊，生產隊或作業組），

參加者可達到1萬人。這樣，公社和下級單位可以不必召開各自的會議，隨後根據具體需要再舉行會議就行了。[4]

不過儘管在鄭州經過長時間醞釀，並且產生了題為《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的草案，中央對於公社問題的政策仍然是不明確的。毛從河南鄭州南下到了湖北武漢。在這裏，他仔細研究了各省關於六級會議的情況匯報。他很快發現，在應當以公社的哪一級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上，有不同看法。河南選擇了生產大隊，湖北則是生產隊。毛把鄰省湖南的第一書記周小舟找來，同他及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一起討論這個問題。周贊成河南的辦法，但在這次討論以後，毛又接到報告說，廣東採用的辦法和湖北的類似。這已經不僅僅是辯論；在湖北六級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爭執，會上，上一級幹部傾向於以上一級為核算單位（如生產大隊），而生產隊幹部們則想把它放在生產隊。

毛在這個問題上的指示表明，第二次鄭州會議記錄的提法是含混的。記錄只是簡單地說「隊為基礎」，而鑒於用詞的混亂（在附錄一里還要討論）。記錄上本應該詳細說明「隊」的含意。不過，會議記錄很可能是按照毛對這個詞的最初用法寫成的[5]，主席在講話時用辭顯然很不精確，根本不考慮如何保證會議記錄在事後能夠準確地把每件事情表述清楚的問題。毛現在強調有爭議的「隊」應當是指生產隊，即原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不是生產大隊，亦即管理區。

這個基本問題在鄭州會議的爭論中已經盡人皆知：農村中平均主義傾向日益嚴重。實行核算的基本單位層次越高，平均主義的範圍也越廣；在同一地區，富隊必須補貼窮隊。按照毛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他的意思是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以減少平均主義，這並不奇怪。非同尋常的是，他已經費了許多力氣和口舌，勸說各地選擇他所傾向的那種體制，然而按照他的指示，他卻打算放手允許各省自行選擇適於本省情況的體制。

人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這個階段，即大多數省份的六級會議剛開了一半的時候，毛已經感覺到，他在鄭州會議上短距離（當面）解釋工作尚未能取得成績，現在企圖通過遠距離說服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進一步說，毛通過同周小舟和王任重談話，通過看了廣東的報告，自信已瞭解到（初次瞭解到？），區和隊在面積上有很大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區比隊更接近過去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對一個省適合的體制對別的省就未必適合。最後，毛再次強調這個問題對農民及 3000 萬基層幹部來說多麼至關重要，同時也指出，他準備贊同河南的辦法，只要河南，也許還有其他省份，在縣的四級或五級會議確定它能被廣大農民所接受。[6]

鄭州會議記錄裏另一個引起與會者混亂的問題是，公社是否要因徵用生產隊的財產而付給補償。山西省似乎已在縣的五級會議上作出否定的決議，但當毛讀了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對這個問題的報告以後，當即指出，一個公社既然可以將原高級社的現金收入 400 多萬元退還原主，為什麼別的社不可以退還呢？（原文是：既然一個公社可以補償，所有公社都應該可以補償。）[7] 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贊同了毛的意見。[8]

就在毛通過對第一書記們發指示貫徹鄭州會議思想的時候，鄧小平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上作出指示要新華社收集有關公社問題的材料。鄧感到有必要以此補充黨瞭解農村情況的信息渠道，這個很有意思的跡象表明，高層領導對得到的報告有所懷疑。從這次書記處會議收到的不多的材料表明，黨的領導人對生產問題和虛報產量問題開始感到憂慮了。[9]

陳雲出山，理所當然

1959 年頭幾個月，在憂慮氣氛與日俱增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轉向陳雲，聽取這位最為審慎的同事的意見。陳在黨內居第五位，他是黨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並且是資歷較深的一位副總理。直到大躍

進時期，他一直負責經濟工作，但在 1958 年他似乎降居次要地位而未發任何怨言。他盡心地到十三陵水庫工地推手推車[10]，但對大政方針的決策上顯然很少影響。他從不俯首貼耳順從蘇聯模式，因此贏得了毛的敬重[11]，不過在大躍進的全盛時期，毛並沒有聽取他那頭腦冷靜的勸戒。

到 1958 年底，毛也許感到需要一種強有力的理論，向左右為難的黨的幹部說明他新發動的糾左的正確性。[12] 毛知道陳能夠擔當這個任務。更為重要的是，需要陳幫助制定一套辦法，使國家經濟從毛及順從於他的同事們所造成的困境中擺脫出來。

《紅旗》雜誌 3 月 1 日發表了陳雲的一篇文章《當前基本建設工作中的幾個重大問題》，這是他在 1959 年參與經濟決策的最主要、也是唯一公開的一次亮相。[13] 在這篇文章裏，他再次強調在制定工業發展政策時，全國的利益高於各省的利益。他一直反對在每個省都建立大而全的獨立工業體系，而這之前是為他的權力下放計劃所允許，並受到毛的自力更生原則鼓勵的。[14] 這時，他想彌補損失，用棋盤作譬喻，堅持認為，只要中國有限的資源不從全國角度配置利用，為發展而作的努力就會付之東流，發展速度也會降低（這裏語氣的緩和是為了撫慰那些大躍進中的唯速度論者）。[15]

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是工業佈局。陳雲重申並發展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的觀點。1956 年，李富春曾與毛進行爭論，並說服了他。他認為：在已經過度發展的大城市裏新建企業是不經濟的，最好是把這些新建企業分佈在中小城市，距離原材料和市場更近一些。毛的方針，正如他在《論十大關係》講話裏詳細闡明的那樣，有利於發揮如上海那樣的沿海大城市的作用。這個方針的支持者很可能就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據所有人的說法（也包括主席的），他是個天才，不過大躍進中沒起好作用。[16] 1958 年初，上海透露該市共有 698 家在建或重建的工業企業，這是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要求不可想像的規劃。[17] 難怪陳雲不能不舊話重提。

從戰略問題談到他所說的戰術問題時，陳雲強調在建設計劃上實行並堅持優先原則的重要性，這個原則可以避免重點工程遲遲不能竣工。在談到設計新工廠時，陳雲說，由於自然資源極為缺乏，中國必須量布裁衣，在可能的條件下，優先安排中小型企業，而不是大企業。他強調在一切問題上保證質量都是必須的。[18] 他要求同事們「實事求是」，這個口號是毛在延安時期反覆強調，並由陳雲經常嚴肅認真地提起的。[19] 他還援引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重申恩格斯從黑格爾那裏借用來的名言：「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與毛對共產主義創始人的敬重相比，此刻毛倒更願意傾聽陳雲的意見。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毛採納了上述概念，並修改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這個修改使中譯文更切合原意，也更明確。兩個月之後這句話被用來鼓勵農村幹部中的求實精神。[20]

陳雲的下一步是給中央財經小組寫了一封信，這個小組是制定經濟政策的主體，陳雲曾經是小組負責人，但是此刻顯然沒有參與小組的工作。這封信的主題是關於消費市場的緊張狀態問題。這個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呢？「去年夏收和秋收後，估產高了，吃用多了。」這一年度（譯按：指 1959 年度）的糧食銷售量增加（需要增加 180 億斤）而庫存下降。無論 1959 年糧食增產多少，節約措施都是至關緊要的。與大躍進的宣傳者們樂觀的說法相反，陳斷言，中國的糧食問題還沒有過關。

副食品如豬肉、雞肉、鴨肉、魚和蛋類的市場供應和生產也同樣緊張；用貨幣計算，缺口約有四五十億元。[21]（這年晚些時候，周恩來說，在某地方，這種緊張不是因為農民減產，而是由於他們消費得多了。[22] 陳雲估計，為了部分地彌補市場上的緊缺，起碼需要增加 10 億元的物資供應，這就要增加 1000 萬頭豬，2 億隻雞鴨，2 億斤蛋類和數萬噸魚。作為第一步，他建議國營、集體、個人「三條腿走路」，指出只有農戶（在 1958 年被公社集體化了）才有足夠的經驗分散餵養畜禽，才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辦法。[23] 陳還說明，應當鼓勵那種在

手工業合作社名義下的個體手工業，以增加消費品生產。[24] 接著，他轉而談到供求等式的需求方面，建議將多招收的工業工人送回農村去。這將減輕城市市場的壓力，同時也就增加了農村副食生產的勞動力。[25] 按照兩個月以後毛在廬山會議前夕的黨內通信，主席同意了陳對市場問題的建議。[26] 他甚至還更迅速地採納了陳雲的勸告，削減了鋼鐵生產指標。

陳雲和 1959 年鋼鐵生產指標

據毛事後回憶，他的 1959 年年產 3000 萬噸鋼的建議，是在 1959 年（譯按：原文有誤，應為 1958 年）8 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在 1958 年晚些時候召開的武漢八屆六中全會上，壓縮到 2000 萬噸；隨後，在 1959 年 3 月上海會議上，再次降低到 1650 萬噸。[27] 問題是，武漢全會以後公佈的鋼產指標為 1800 萬噸[28]，而這個數字又為上海八屆七中全會[29] 及此後的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一再確認。[30] 據說，對於年度計劃負責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曾在上海全會上大力提倡鋼產高指標是為了破壞大躍進。[31] 如果文化大革命中的這種說法有點根據的話，那意味著薄一波很可能在會上公開堅持 1800 萬噸鋼的指標，以免造成混亂，挫傷群眾的積極性。這時，他的意見受到冶金工業部的有力支持，後文另述。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這個意見未能再站得住腳。在 4 月 29-30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與會者普遍感到必須把這年第二季度的鋼材指標削減 20%，而這個指標僅僅是一個月以前才制定的；確實，書記處很可能已經意識到，在 1959 年的前 4 個月裏只能生產 336 萬噸鋼（包括 227 萬噸軋制鋼材），剩下的 8 個月必須生產出近 1500 萬噸鋼。[32] 隨著這個危機出現了三個問題。一、1959 年的鋼產指標是否應當分成兩個，一個是切實可行的，另一個是爭取達到的？二、鋼材的分配，是否應該按照可行的指標來安排？三、如果鋼材分配的數目減少了，是否必須縮減某些建設項目？

在書記處的一項提議裏（書記處在大躍進期間指導經濟工作中起著關鍵性作用），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責成中央財經小組作出回答。[33]

此時，陳雲已經對鋼鐵工業的問題做了近 3 個月的調查研究，顯然這種工作是獨立進行的。[34] 也許由於上面提到的原因，他重新成為財經小組的成員，李富春、薄一波及地位不太高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參加了工作。趙爾陸參加進來，肯定是為了照顧他所負責的國防工業的利益。4 個人召集了 6 次座談會，冶金工業部在會上匯報了鋼鐵工業（包括鐵礦石、焦炭、耐火材料、煉鋼以及鋼材品種）的總的情況。經過充分討論以後，在 5 月間由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陳雲作了 1 小時的發言，詳細匯報了財經小組的研究結果。[35]

陳在性格上謹慎小心，分析問題邏輯謹嚴，這與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裏所制定的簡單條文形成鮮明對照。[36] 要是政治局熟悉鋼鐵工業運行情況的話，他的詳細分析有一大半將會是多餘的。人們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北戴河會議上，毛發動大煉鋼鐵運動之前，肯定沒有作過如此詳細的分析。陳的講話提供了鐵的事實，證實大煉鋼鐵運動已經使整個鋼鐵工業體制超負荷運轉，有關部門陷入混亂。財經小組面臨的選擇見表 1 所示：[37]

表 1

<table>
<tr><th>單位：萬噸</th><th>可靠的鋼產指標</th><th>力爭的鋼產指標</th></tr>
<tr><td>上海全會</td><td>1650
（未公佈）</td><td>1800
（公佈）</td></tr>
<tr><td>冶金工業部〔1〕</td><td colspan="2">1600〔2〕
1500
1400
1300</td></tr>
<tr><td>國家計委重工業局</td><td>1250—1300</td><td>1400</td></tr>
<tr><td>國家經委冶金局</td><td>1300</td><td>1500</td></tr>
</table>

〔1〕沒有詳細說明，哪些指標是可行的，哪些是爭取達到的。
〔2〕「冶金部還提出過 1600 萬噸鋼的數字，但是沒有詳加說明」！

不清楚為什麼那些可能提出過意見（上海全會的指標就是依據這些意見制定的）的幹部們，原來對鋼產的估計會出那麼大的錯，以致

後來不得不迅速地削減指標。人們不得不認為，在時隔短短的幾週，他們開始感受到一陣現實主義的風氣。

財經小組提出鋼的可行性指標可以初步定為 1300 萬噸（包括 900 萬噸鋼材），並且在同煤炭工業部、機械工業部及鐵道部協商以前，不急於確定爭取達到的指標。年產 1300 萬噸鋼，要求壓縮基本建設項目，財經小組還要求特別注意確保石油、化工工業的發展。陳雲提出警告說，既便如此，這個指標也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的【38】。鐵礦石的緊張是一個原因，陳雲提出這個問題，表明在財經小組提出建議之前作過苦心的分析。

生產 1300 萬噸鋼，需要 2000 萬噸生鐵，生產這麼多生鐵又需要 7000 萬噸礦石。中國有 14 個擁有機械裝備和鐵路運輸設備的大型採礦企業，前一年採礦 3460 萬噸，本年可望達到 5300 萬噸。此外，還有 19 個中型採礦企業，其中 6 個有半機械裝備和鐵路運輸，其餘 13 個既缺乏機械裝備，又沒有鐵路；上年這些企業共開採 680 萬噸鐵礦，本年可以達到 800 萬噸。最後，還有 214 個小型採礦點，全部是用鎬、鏟等工具土法開採，當年產量可望由前一年的 606 萬噸增至 1000 萬噸。以上合計可達 7100 萬噸鐵礦石，其中可以運出礦山的只有 7000 萬噸。即便如此，為保證這 7000 萬噸礦石的開採，還必須增加空氣壓縮機、電鏟、爆破材料等等的供應。【39】

假定鐵礦石能夠得到保證，下一步的問題就轉到生鐵的質量要求上來了。所需要的 2000 萬噸生鐵中，有 900 萬噸要靠小高爐，但是小高爐生產的生鐵有 40% ～ 50% 因使用不純的焦炭而造成含硫量太高不合要求。這些雜質是由於煤沒有洗淨造成的，煉焦炭所需要的煤有一半需要由土法洗煤來解決，這一過程需要使用 60 萬個勞動力生產 200 天才能完成（洗煤 2000 萬噸），在理想的條件下還要新增加粉碎設備和其他工具。陳雲列舉的數字充分表明，要給預計不到的不利因素留有餘地。如果焦炭的雜質不能除去的話，將有 500 萬噸鋼不符合軋制標準。【40】不過，如果陳的上述困難以及其他一些障礙得到克服，倒是

有充足的設備以完成提出的指標。[41]但是，他告誡說，財經小組的框算，只限於以鋼鐵工業內部的各種條件為依據。這個提議還要通過對鋼鐵以外的整個工業情況作進一步調查研究來落實。陳雲無疑十分清楚，在大躍進期間，各工業部門的負責人往往樂觀地、一廂情願地對本部門的要求作出種種許諾，根本不考慮他們是否能保證得到其他部門的必要合作。[42]陳雲說，將向主席、政治局和書記處提交進一步的報告，但是不向國務院提出，國務院在這一時期經濟決策上的次要功能再次被證實。

儘管有了陳雲令人信服的分析和中央財經小組的第一流的報告，政治局會議仍未就採納1300萬噸鋼和900噸鋼材的建議指標作出決定。當薄一波顯然已經放棄了過高指示的時候，冶金工業部依然堅持認為低指標會造成懷疑和降低士氣，這一看法得到北京和各省不少人的贊同。在毛缺席情況下主持這次會議的劉少奇不同意上述判斷，認為指標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更會洩氣。由於大躍進期間陳雲被排斥在毛的決策圈之外，這使他的威望受到削弱。也許由於這個原因，冶金部仍然堅持1500萬噸的指標，並且可能料到毛會支持這個高指標。[43]

即使政治局會議一致同意採納1300萬噸指標的建議，毛的最後表態都是必須的，因為這位主席同大煉鋼鐵運動的關係畢竟是太密切了。然而由於出現僵局，政治局無法向毛提出建議，取而代之的是陳雲將財經小組報告呈遞主席作決定。在一封簡短的附信裏[44]，陳強調指出要達到指標，小高爐煉鐵是個薄弱環節，洗煤是關鍵因素。他坦率地承認，對這個指標有不同的看法，並且提議請持有不同意見的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同財經小組一起去見毛，使他能夠聽取雙方的不同意見。[45]

毛是否要他們在他面前爭辯一番，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此後不久他說，1300萬噸的指標在6月確定了下來，他顯然採納了財經小組的建議。[46]周恩來和鄧小平派出5個調查小組去糾正鋼鐵工作中的問題：

有必要裝備和發展前途的小高爐應保留，其餘的應關閉停產，勞動力應調回農業生產戰線。[47]

使得毛容易地作出關於鋼產量決定的一個因素是陳雲的報告只作技術性分析，絕口不談政治問題。它沒有任何批評的口氣（陳完全有理由提出批評），即使在論及小土高爐時也是如此。主席接受它，完全不意味著要作自我批評。只要把 1959 年頭半年陳雲的報告和同年 7 月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的分析比較一下[48]，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毛對前者欣然接受，而對後者斷然拒絕了。

農村的現實

北戴河會議以後不到 10 個月，毛同意把預定的 1959 年鋼產指標削減 56%，陳雲的 1300 萬噸鋼的指標實際上達到了，儘管付出了很大代價。[49] 顯然，主席贊同陳雲的判斷，現在需要的是「穩住陣地再前進」[50]，而且甚至在他默認鋼產指標的不現實以前，他已經充分認識到來自農村的報告和預測存在著普遍的浮誇。4 月 29 日，就在書記處開始重新考慮鋼產指標的同一天，毛寫了一封「黨內通信」，盡可能擴大傳達的範圍，直到生產隊一級。在這封信裏，他堅持說：

> 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 300 斤的，今年能增產 100 斤、200 斤，也就很好了。吹上 800 斤、1000 斤、1200 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51]

接下去，毛談及由譚震林和他的同事們提出的迅速增產的幾項具體措施。他認為那種「種得愈密愈好」的說法「不對」，並且要求在技術方面應當仔細同老農商量。少種、高產、多收的遠景計劃是對的，但在十年內不可能全部實行。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機械化也至少需要十年時間；改良農具和

半機械化農具是不遠的將來的主要依靠。[52] 毛還強調節約糧食的重要性，最後呼籲大家講真話：

> ……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必須老老實實……[53]

毛承認他是在唱低調，甚至是保守主義者（此刻，他引用了陳雲關於自由是必然的認識的那段話），但是如果實現了高指標，他將謝天謝地。[54]

在此前後，毛還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的口號，不過直到1960年才被採用。[55] 周恩來建議加進了「以工業為主導」。陳雲贊同這兩句話，但是感到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如何制定一項政策，以便更好地落實。他到農村去調查研究，調查範圍自然也包括開路先鋒河南。在這裏，他發現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仍然傲慢地相信河南小麥產量翻了一番；本省再也不必返銷糧食了，事實上還將會調出糧食。陳雲顯然不為所動，接連向他提出一連串問題：可耕地有多少？可以生產多少糧食？農村人口多少？按照河南當前的水平，農村每個人至少需要多少糧食才可以維持生活？需要多少種子？需要多少飼料？把以上這些部分相加，農村至少還剩下多少糧食？依據這些問題，再加上與城市糧食需求有關的類似一系列問題，陳希望對該省的糧食收支平衡狀況有一個大概的瞭解。如果河南的幹部們手頭上沒有這些數字的話（很可能是這樣。據說陳反覆提出這些問題，這表明他沒有得到回答），正說明該省的管理混亂。

由於不能提供真實情況，吳芝圃和他的同事們只好說謊。他們向陳誇口和保證說，城市得到了充分的供應，而實際上極為有限的糧食配給是通過強迫命令的辦法從農村榨出來的，借口是那裏的糧食不是被藏了起來，就是被私分了（如同早些時候廣東省的情況一樣）。[56] 毛在鄭州會議上的批評顯然被當作耳邊風，在廬山會議開始時，他似乎準備再度敲打一下左傾空想分子。

上海工作會議和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自春天以後開始的許多次調查的結果到 3 月底，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和 4 月 2 日至 5 日舉行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時，還沒有全部送到。毛可能認為，這些會議標誌著對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宣告結束，這個工作是他在 2 月鄭州會議上重新發動的。然而，即便如此，要使中國的幹部充分瞭解國家經濟狀況也還需要更長的時間，而這些會議僅僅決定了《關於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以及將鋼產指標暫定為 1650 萬噸。[57] 毛只對他畢生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工作方法談了若干想法。而這次和 1958 年 1 月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條》不同，他只談了 16 條，主要是鼓勵幹部們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及時、靈活地制定政策。[58]

一個異乎尋常的情況是，沒有任何記錄表明這兩次會議討論了 3 月中旬西藏發生的叛亂，這個問題在 4 月中旬全國人代會鄭重提出。也許是因為有關材料還是太敏感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不宜披露；也可能是因為此類問題僅限於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裏討論。無論怎樣，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文化大革命的幹將們無意於利用這一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這一嚴重國內事件作為打倒其政治對手的武器。[59] 可以肯定，對中印關係以及因此給中蘇關係產生嚴重影響的西藏叛亂事件，實際上並沒有在中國領導層裏引起分歧。進一步的結論是，在西藏發生的事件對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沒有直接影響。總之，1949 年以後中國與邊境及亞洲內陸邊疆的非漢族民族進行了曠日持久的鬥爭，其中西藏叛亂是最重要的一個事件[60]，但在本書中只能一帶而過。

根據此後及當時發生的事件來看，七中全會作出的重要決定是在即將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議劉少奇為毛的國家主席的繼承人。經過兩年半的醞釀，毛退居領導層「二線」的計劃就要實現。[61] 儘管此時他還保留著更重要的黨中央主席職務，但是從此毛更傾向於讓他的資深同事們，尤其是劉，在國務方面承擔起與日俱增的責任。毛提出這一計劃的目的，是要培養一個健康發展、具有信心的

領導集團，以便在他去世後接班，防止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發生的那種有損國力的權位鬥爭。[62]

可以理解，不能指望毛在整社過程中即刻中途退出，這是不現實的，因為他在其中起著巨大的作用；隨後在夏季，正如下文所述，在廬山會議上面對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批評，毛不能不維護他的地位。不過，毛對當時國內政策問題的批示和講話在篇幅和數量上的逐漸減少，表明在幾年之間他的確退居二線了。1959 年以後鄧小平很少向他匯報，就是他退居二線的明顯證明，而不是像毛後來說的那樣犯了失敬之罪。[63]

隨著劉上升為國家主席，他的家庭成員也發生某種情緒變化，孩子們被告誡不要打擾他們的父親，父親現在連歇息一下的時間也沒有了。[64] 實際上，劉的子女們太瞭解這一切了，新任主席已經（確切地說，總是如此）成了一個「工作狂」，在辦公室桌邊一坐就是 10 個小時，不哼一聲[65]；妻子王光美曾經抱怨說，坐這麼久，屁股都坐壞了！[66] 劉一天的全部工作時間，包括開會，聽匯報，進行調查，正逐漸延長，據他的秘書們回憶，在他成為國家主席以後，工作時間達到一天十七八個小時[67]。通常在他上床後，還要讀上個把小時的報。[68] 他曾經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沒有比不能工作更難忍受的事情了」，[69] 而他正是按照這個準則生活的。1956 年，為了準備在中共八大上的報告，劉連續工作三天三夜，每天只睡兩個小時的覺。[70] 每逢重要會議，他的秘書起床時，總是看到他剛剛上床。[71] 在非常確切的意義上說，除了為黨工作，劉對一切都不感興趣。[72] 對照他後來深受毛及文化大革命幹將的折磨，最終的命運更具有悲劇色彩。

在劉的書架上放著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73]，照西方學者看來，小說的主人翁是「一位缺少人情味的完人，他的經歷體現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冷酷的道德原則，以及他對共產主義個人信仰的政治價值觀念」[74]。儘管劉性格倔強[75]，缺少幽默感，但他並非沒有人情味，他似乎很像斯大林時代小說裏的英雄，畢生追求克己奉公的

準則。[76] 1959 年，劉所在的黨支部[77] 發現，在扣除房租、水電費和子女的保姆費以後，劉少奇夫婦的工資所剩無幾。他們決定每天給他 1 元錢補助，按照規定他有權得到這筆補助，因為他總是工作到深夜。3 年過去了，劉少奇發覺此事，便堅持從工資中扣錢，以償還領取的 1000 多元補助[78]。外出視察期間，他從不接受禮品，甚至堅持帶上自己的低檔煙和茶。[79] 出國訪問時，他總是把節餘的外匯開支上繳當地中國使館。[80]

劉非常注意絕不讓家屬享受特權。1959 年國慶節前後，他在自己屋子裏的一個小房間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自從他主持政治局工作以來，這幢屋子就成了政治局碰頭的地方。他從繁忙的工作安排中擠出這點時間，是要打消子女和親戚們的錯覺，不要以為他升任國家主席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實惠，諸如農轉工的就業機會，從農村移居城市的機會，等等。劉只幫助過一個侄女，她的先父曾經為革命工作過，這在國家主席的家裏被視為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現象。[81] 劉堅決執行政治局的規定，公車只能用於公事，對此絕不通融。劉的子女們走路或騎車上學，要走很長一段路程，後來他花錢專門為他們定做了一輛三輪車。王光美分娩出院，也是坐出租汽車回家的（譯按：這段話與所據材料略有出入。是用公車去接，但按規定付了車費）。劉還步行去劇場看戲，從而樹立了一個榜樣。[82]

劉還採取措施，防止別人給他的子女提供特權。在學校，劉的孩子們都用化名（譯按：應為提到父親都用化名）[83]。他們的父親還針對快要成年的子女們的優越感指出，他們必須像其他人那樣受到平等對待。[84] 當一個女兒分配到省裏工作時，她的北京朋友們擔起心來：她都能下放，她們又怎能逃得掉呢！[85] 儘管劉很嚴厲，但他很少發脾氣；據秘書回憶，只有兩次他例外地發火了，那是因為一個孩子想改變專業。[86] 據他的女兒劉愛琴（他的前妻所生）寫的回憶，他的子女為了遵循他所期望的盡善盡美的準則，承受了莫大的壓力。[87]

這些準則之一是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劉的伙食很簡單，經常吃剩飯剩菜。[88]孩子們的衣服是舊的[89]；一個孩子買了件價錢很貴的上衣，也被退了回去。[90]夏季，劉本人穿著布衣布褲，而在冬季或更為正式的場合，他則靠兩套舊西服度過，一件是毛的，另一件是呢料的。他的衣服多次補過；他的一雙經常穿的舊布鞋，曾被送去修補過，結果引起保育員的取笑，還以為那是衛士的。[91]手下人都覺得他神情嚴肅，不過據說，他還是對他們照顧的。這有部分原因是夫人王光美在一邊提醒他。[92]

劉並非唯一的以生活儉樸、工作刻苦而著稱的中國領導人；通常，周恩來也以同樣的品德而孚眾望。但是，劉的好靜的性格以及書生氣息往往給人們以嚴厲刻板的印象。正如劉恢復名譽以後的文章指出的那樣，儘管劉有廣泛的工作關係，但在私人關係方面，他可以說沒有朋友——或許彭真是個例外。沒有發現劉有如周的國務院內部或元帥之間的那種親密情誼[93]；劉與同事們維持正常的工作關係，談不上親密。劉保證周恩來能夠得到有關外交問題的全部文件。[95]周曾在一個氣氛比較融洽的場合稱讚劉，稱他在全部重大歷史問題上總是正確的，[94]讓人好奇的是羅瑞卿將軍後來的回憶。他從公安部設立直到1959年，一直任該部部長，這個職務使他能夠廣泛地接觸各方面的情報。他暗示劉曾散佈謠言，說過對周不利的話。[96]

劉與毛的關係似乎更清楚些。使毛從繁瑣的事務中解脫出來，保證主席集中精力考慮重大問題，劉把這視為自己的職責。[97]劉曾告訴秘書，只要主席找他，無論白天還是晚上，都得立即叫他，這一點更說明他所處的地位。由於毛在長期的革命年代養成夜間工作的習慣，這便意味著還要經常攪亂劉本已很少的睡眠。[98]同樣說明劉接受了一種從屬關係的事實是，即使毛澤東偶然提到或者引用一句什麼話，劉也必須趕緊查找原文，以弄清主席的完整意思。[99]毛是一位非常自信的領導，很少作自我批評；劉即使是當了國家主席以後也仍然把自己視為黨的工具，他經常作自我批評。[100]顯然，當毛考慮最重要的方針

政策時，是劉給他以某種啟發，尤其是 1956 年對「十大關係」所作的分析。[101]

到 1959 年，長年在最高領導身邊吃苦耐勞地工作終於帶來了報償。這位埋頭苦幹的 60 歲的第一副手終於可以坐上自己應得的位置，在官方的報紙上，他的照片和毛澤東並列排在一起，大小也相同。文化大革命期間透露，新的圖片安排的指示來自中共中央宣傳部，並由新華社負責人吳冷西具體實施。周恩來後來的說法是，新華社問過劉的意見，劉沒有反對，這使毛也不便反對。周說，當劉第一次看見兩幅照片並排的時候，他應當明白這是越了界的，但他沒有謙遜到發出指示改變這種安排的程度。[102]

無論毛對他隱退以後的媒體宣傳後果感到多麼不滿，根據文化大革命中關於劉的一份負面材料，他本人和中共中央還是一致決定由劉繼任國家主席。[103] 劉作為黨內第二把手、指定的接班人，這已經是很明顯的事，但卻有證據表明彭德懷元帥，這位革命時期的資深將領，曾經暗示過他可能從他目前的副主席職務上得到擢升。據說，劉在公開場合以少見的諷刺語氣說，這不是什麼十萬火急的事，反正只要超過 36 歲的人都夠資格（他這話與憲法略有出入）。[104] 不過，1958 年 12 月首次公開宣佈毛澤東引退之後的數週內，根據駐京外交官們收到的報告，朱德很有可能成為國家主席候選人，這已經是街頭巷議的話題。

朱德的雄心後來被挫敗，這個事實有助於理解另一個多少有些曖昧不明的插曲，即國防部長彭德懷在上海會議上批評了毛。據說，彭元帥批評毛「親自掛帥」[105]，從 1942 年第一次延安整風時他就是如此[106]。後來，毛將上海會議上對他的批評意見形容為不過「嘰嘰咕咕」[107]，而據彭本人說，毛用更嚴厲的措辭——例如「挑撥」——相回敬。[108]

這一事件的費解之處是，當主席打算放棄其兩項任職之一，並退居「二線」的時候，彭對毛提出了批評。我們知道，在彭毛共事的 30

年間，彭與毛發生過多次衝突，而且正是彭在 1956 年提議應當從新黨章裏刪去毛澤東思想的提法。[109] 這時彭是否懷疑毛的隱退是出於真心呢？或者彭聲言反對個人專制，是否由於它不僅損害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權力[110]，而且還因為他反對毛選擇劉作為自己的繼任人，尤其是劉可能同樣專權呢？[111]

有跡象表明，在 1956 年劉少奇與彭德懷有工作上的聯繫[112]。不過從根本來說，他們分別屬於黨的不同方面，即政治組織系統和軍事系統，二者在毛領導之下的融合，對取得 1949 年革命勝利是強有力的因素。50 年代初，高崗曾企圖利用一個系統對另一個系統的歷史遺留下來的相互不滿情緒來達到其個人目的，當時他設法得到軍隊將領的支持，企圖取代劉和周恩來成為毛的繼任人。[113] 在清算高崗的時候，彭德懷也就他與高崗的關係作了自我批評。1959 年夏季廬山衝突之後，重新調查的結果確認，兩個人之間的聯繫遠比他當時承認的更為緊密。[114]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可以由此推知，彭不滿意於這樣的事實，即解放軍贏得了天下，而黨務人員卻坐天下[115]。根據周恩來回憶，當時在廬山，彭德懷一番話顯然引起劉少奇勃然大怒，他說：「黨要換領導人，也是我更合適，不是你。」[116] 彭德懷自己後來稱，他在廬山會議的批評是針對劉，而不是針對毛[117]。總之，這些零星的跡象表明，在上海會議上，彭德懷對繼任人選的安排表示不滿，或許覺得朱德實際上適合作國家主席。[118]

確實，劉的當選和繼任預示著中國建設道路的變化，即由充分發揮個人能力的「游擊」作風向講求組織秩序的正常方式轉變，這種轉變已經通過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和劉論及大躍進的講話清楚地顯示出來。[119] 對那些對 1957 年整風運動中毛的處置感到委屈，並對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就大躍進中的問題所作的嚴厲批評感到不滿的黨的幹部來說，這次人事變動預示著一個可以預測捉摸的領導將要出現。湖南毛家鄉的一位縣委書記似乎對前景也頗為樂觀，他說：「毛主席如今

年事已高，退居二線以後，少奇同志顯然將是法定繼承人，劉少奇年輕有為。作為一個著名理論家，他的水平很高……」[120]

由於劉長期致力於組織工作，這也許使他的工作關係比毛更為廣泛。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總喜歡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毛的對手——無論是真實的還是他們假想的對手——統統歸屬「劉少奇集團」[121]。這些材料中提到的一批人的確從 30 年代以來與劉有密切的聯繫，最初都在華北局，到 1959 年的時候，這些人已是黨的重要人物[122]：彭真——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第二號人物，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市長；薄一波——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劉瀾濤——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安子文——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楊獻珍——中共中央委員，中央高級黨校校長；廖魯言——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農業部部長。

其中一些人又各有一批部下[123]，要是劉少奇想用鐵一般堅固的組織網把毛包圍起來的話，他無疑會拉攏他們。但是，劉不是陰謀家，也不是斯大林。他已經建立起領導威信，只希望繼續維持這個威信。

經過 1958 年大躍進的過左行為以後，穩健已成為普遍的口號，劉正是在這種時刻接任國家主席的。毛率先對人民公社問題進行新的探討，首先是在武漢會議上，隨後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又深入一步。不過，這個新的方針貫徹的範圍還得超越農村進入城市。一盤棋口號標誌著經濟發展回歸穩健政策，這意味著黨必須重新尊重專業知識，擺正紅專關係。早在 1958 年 9 月，毛視察武漢大學時，就重新強調了知識的重要性。[124] 武漢全會不久，周恩來在同一些演員座談時，向他們建議說，他們戲裏的黨的書記應當又紅又專。[125] 1958 年以前的教育指導思想在 1959 年初開始得到恢復。[126] 3 月，在向北京市中學生致詞時，外交部長陳毅強調讀書的重要性，對當前重視生產勞動，輕視學習的偏向發出警歎；並認為必須對兩者給予同樣的重視。[127] 在更廣泛的文化領域裏，周恩來鼓勵作家和藝術家們要使創作題材多樣化，

既要有現實題材，也要有歷史題材。[128]而就在此刻，陳伯達的步調顯得不那麼一致，他依然提倡厚今薄古[129]。

與當時經濟問題更有直接關係的是中共中央重新強調原工商業資本家的技術和經驗的重要性。此刻主管統一戰線工作的彭真[130]稱讚資本家積極響應大躍進運動，並說應當允許他們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131]這條新的路線很好地配合了劉少奇對中國前景的估計。這年晚些時候，在寫給受人尊敬的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的信中，劉透露過他的目標。民建會是非共產主義的政黨，成員主要來自工商界，並作為中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而存在。劉對黃表示，在前十年間，中國領導人的精力主要放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即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國有化問題上。在扼要地正式揭露經濟上的浮誇，並宣佈削減指標之後，劉承認，社會主義優越性「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他繼續寫道：

> 至於說到今後十年，情形就會不同了。現在我們已經積累一些必要的經驗，基本上為建設掃清了道路。在今後的建設道路上，雖然還要清除一些舊的和新的障礙，但是我們已經造成一種條件，使我們和廣大的人民群眾能夠以主要的精力去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會加快建設的速度，使今後十年的建設成就大大超過以往十年，……[132]。

對中國來說不幸的是，這個預言並沒有實現。否則，在下一個十年即將結束之時，在中共九大上升為接班人的就不會是林彪，而是劉少奇。

附錄一：正名：人民公社名稱的混亂

《論語》記載孔子的一段著名論述。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1] 有的學者懷疑孔子是否有過其言[2]，但他們對儒家重視理論與實際的統一沒有異議。因此，「正名」成了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3]

本書的其他章節多次表明中共領導人重視準確使用術語。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能發生在 1959 年夏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4] 不過，中國領導人從未像糾正公社名稱那樣下大力氣「正名」，而且從未遇到過比那時更嚴重的名稱含義上的混亂。倘若歷史上的儒家學者們得知這次連毛澤東本人也牽涉在內的混亂是由於實際情況發生了變化，他們是不會為之驚訝的。具體地說，問題是由於公社內部所有權和管理權歸屬層次的變動而造成的。由於所有權和管理權上移或下放，公社各層機構的名稱隨之變更，由此造成名稱混亂。對於外國人來說，還多一層混亂，就是中文名稱變了之後，中國官方的外文譯名沒能相應改變。[5]

人民公社的名稱混亂始於北戴河會議決議。該決議提出，在合作社合併成公社後，原合作社應改為「耕作區」或「生產隊」。[6] 決議沒有為第三級所有權或行政機構命名。這一空缺在人民公社化過程中得到彌補，但由於公社化過程的混亂，全國沒有統一的標準。有的公社分為「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有的分為「大隊」和「小隊」；或大隊和「中隊」；或「工作指導站」和生產隊；或「耕作區」和生產隊。[7]

武漢中央全會開始統一各地的人民公社組織結構。公社以下的兩級行政機構稱為「管理區」或「生產大隊」和「生產隊」[8]。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官方外文譯名分別是「production brigade」和「production team」。此後，這兩個譯名便經常出現於中國有關人民公社的英文出版物和西方國家翻譯中文資料的譯文中。[9] 但名稱剛統一兩個月，中文又混亂了。毛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沒有被官方譯成外文）提

出公社有三級所有、四級管理。四級管理即公社、「生產大隊」或「管理區」[10]、「生產隊」和「生產小隊」。[11]

其實，毛的所謂四級管理並非口誤。有的大公社的確在公社和原合作社之間增加了一級管理[12]。但對於毛的聽眾不幸的是，毛強調「生產隊」的重要性時[13]，正如他向聽眾們說明的那樣，他指的是武漢會議決議所規定的「生產大隊」，即原合作社[14]。毛一定瞭解，儘管他作了解釋，混亂依然存在。1959 年 3 月 15 日，即第二次鄭州會議閉會不久，毛向各省市第一書記發出一封黨內通信，說會議紀要中「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生產隊」或原合作社，而非「生產大隊」或「管理區」[15]。這封信中關於原合作社的說明，本應澄清原合作社在公社中的位置，而沒有澄清公社（或許大多數公社）中存在的名稱混亂。原合作社被稱為「生產大隊」。[16]

毛所謂的四級制沒有被公開採用，但武漢會議提出的三級制，在 1959 年夏末的廬山全會後作了修改。第二級改成「生產隊」，第三級改成「生產小隊」。最後，武漢會議提出的三級，在 1961 年 4 月又重新使用。[17] 茲將自 1958 年至 1961 年中國官方有關人民公社各級組織的名稱變化排列如下：

			原合作社	
1958 年 8 月	北戴河會議		生產隊（耕作區）	
1958 年 12 月	武漢中央全會		生產大隊（管理區）	生產隊
1959 年 2-3 月	第二次鄭州會議（毛）	生產大隊（管理區）	生產隊	生產小隊
1959 年 8 月	廬山中央全會		生產隊	生產小隊
1961 年 4 月			生產大隊	生產隊

以上排列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沒有冠以「大」或「小」限制詞的「生產隊」在哪級。「生產隊」似乎是中國政府對公社以下最重要一級單位的命名（武漢中央全會的命名可能是例外[18]）。在北戴河，由於當時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公社一級，這一名稱用於唯一的基層行政單位原合作社。在武漢，這一名稱用在第三級，大概表明中共領導人希望將公社的部分管理權在「統一領導，分級管理」[19]的體制下分散下

去。這時，第二級即現改稱「生產大隊」，將自成一級核算單位，在公社裏各負盈虧。它管理「本地的工、農、商、學、工」。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在公社領導下都有必要的權力，組織生產建設和管理財務、福利，但生產隊被指定為勞動力組織的基層單位。[20]這一措施的意義在於，考慮到農民對於早先公社抽調農村勞動力進行浩大的水利建設(「大兵團作戰」)[21]、工業和非農業工程的作法的不滿。過多的徭役性公差妨礙了農民耕種，並且由於公差是無償的，這對於農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毛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對於農民的抱怨給予了同情和支持[22]。但說武漢會議使用無定語的「生產隊」表明生產小隊已成為公社行政管理中最重要一級，似乎也不一定。

然而，毛支持四級制和以生產大隊為基礎，無疑導致了廬山中央全會對公社分級制的公開修改，使「生產大隊」成了「生產隊」。的確，可能就是因為毛在第二次鄭州會議後不得不解釋他所謂的「隊為基礎」，中國當局為簡便起見，才決定使用無定語的生產隊命名這關鍵一級的單位。因此，當 1961 年以「小隊」取代「大隊」作為生產隊的正式英文譯名時，沒有定語的「生產隊」一詞不得不下降一級，使「隊為基礎」仍不失為一句恰當的話，儘管其英文譯文必須改成「小隊為基礎」。

第三編

搏鬥

第十章 廬山的激烈交鋒

一次引發舊情的返鄉之行

1959年6月25日下午5時44分，毛澤東回到他的故鄉韶山，這是他32年來第一次返回故鄉。[1] 他從湖南省省會長沙驅車而來。[2] 一如往常，陪同他的是新近提升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3] 隨行人員包括湖南省委書記徐啟文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4] 而中國主要的馬克思主義小說家之一周立波也在場，似乎是為了保證這一歷史性時刻載入史冊。[5]

當天傍晚，鄉親們趕來迎接毛澤東，歡呼、鼓掌和笑聲洋溢在韶山招待所的門口[6]。毛澤東走進屋裏，聽取了有關當地人民公社的水利管理、糧食生產及各方面形勢的匯報。[7] 他被引入他的寢室，那裏的一切全都特地準備妥當，他說他自己隨身帶來了臥具。[8]

這一天晚上，毛澤東批閱文件直到深夜。黎明時，他走出房門呼吸新鮮空氣，和年輕的警衛人員楊明聊起天來。毛詢問他受教育的情況，當楊明告訴毛，他從9歲至15歲接受過學校教育時，毛高聲地追述說他自己也有著相同的經歷。楊的回答飽含著辛酸，儘管在語氣上沒有表現出來。他顯然知道毛的父親很富裕，足以僱傭勞動力，所以他回答道：「不，主席，這是不一樣的！我家裏沒有勞動力，我只能在冬天和春天空閒的時候才可以學習，我沒有學到多少知識。」毛解釋說，他自己年輕時也幹過體力勞動。

接著毛問楊明對人民公社的看法，對此，據說楊明盡可能忠實、完整地作出了回答。顯然他的一些意見肯定是批評性的，因為聽說儘

管毛對楊的談話表示滿意，他仍覺得有必要使楊確信，在一些困難被消除之後，人民公社還會是很好的。[9]

次日天剛破曉，毛就穿上「雪白的」襯衫和一雙棕色皮鞋，在羅瑞卿和徐啟文及其他人的陪同下，動身攀上了一條山路。他首先順路走訪了幾戶農民，喝了些茶水，詢問起在他 20 年代中初次舉起革命旗幟時曾跟隨他的那些人[10]。在第二戶，戶主毛霞生一身泥濘讓人從地裏叫了回來，他對主席——他的本家人——在重返小池塘對面的故居之前首先來到他家感到高興[11]，毛霞生不久後回憶說，主席嘲笑他自報的畝產量 800 斤為數太高，並估計實際產量只接近 500 斤。根據這個說法，毛澤東當時曾利用機會向毛霞生宣講需要避免浮誇風和其他「五風」[12]。根據關於此事的報道判斷，主席在命運攸關的廬山會議前夕持「右傾」立場。

毛的故居在被國民黨沒收期間遭到相當大的破壞，1949 年後，它的修復工作一直是地位正在上升的年輕的省委領導華國鋒所特別關注的事情。[13] 當毛環視著故居堂屋時，他對一個向他提問的人笑了笑，一再說「原來就是這個樣子」。毛步入他自己的房間，凝視著他父母的像片說，要是在今天，即使生了病也不致使雙親那麼早就離開人世。[14] 在故鄉參觀期間，他沒有在任何時候對自己的故居成為聖地這一點感到尷尬和不快。他似乎覺得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也許這並不奇怪。對他的個人崇拜從 1945 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起就一直在不斷地滋長。地位較高的同僚如劉少奇、周恩來（他們兩人對任何想使他們自己的故居成為旅遊勝地的企圖都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彭德懷，都認為把毛的出生地變成一個供參觀的場所是合適的。[15]

毛接著參觀了學校。學校設在一塊地裏，毛曾在這裏放過牛。村裏的學校最初曾是毛氏私塾。在那裏，毛澤東的第一個妻子楊開慧 1925 年開辦了農民夜校。1952 年，建起了一座新學校，毛親筆題詞「韶山小學」。開始僅有 100 名左右的學生接受小學教育，而在 1958 年增加了初級中學，到那時有 700 多名學生和 30 多名教師。[16]

上午 10 點鐘，毛離開學校去吃了點早飯。後來到田野裏聽取公社書記的匯報。毛依然持穩健態度。他小心地從匯報中篩選出事實，一再向當地幹部提出，一年裏每畝增加 100 至 200 斤糧食就很好了。他說，考慮到缺乏拖拉機這種情況，需要注意養牛，並強調了發展林業的重要性。在匯報會上，對水利管理工作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那天下午，毛決定去看一下當地不久前建成的水庫。[17]

毛即將來參觀的消息顯然傳播得很快。當他用完午餐小睡片刻，下午 3 點鐘到達水庫的時候[18]，歡迎他的農民已經聚集在水庫邊。毛通過實地下水游泳的方式進行了他的視察。他在水裏呆了兩三個小時，但是不清楚他實際游了多少次，水上活動量有多大。他對護衛他的年輕的游泳運動員們說，他不會蛙泳、蝶泳或自由式。圍在一起的群眾謝絕了毛發出的跟他一塊兒游泳的邀請，因為他們不會游，但他們被毛靜止地漂浮在水面上的能力印象頗深。[19]

大概是在去水庫的途中，毛走訪了革命烈士毛福軒（曾是長沙第一個黨支部的支部書記）的遺孀。那天晚上，她和另一位姓毛的烈士的遺孀及毛氏家族的 4 個男性成員[20]，以及其他老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幹部的親戚，一起參加了主席舉行的宴請。灰色磚質平房的週圍都是松樹和竹子，毛澤東向來客打招呼並一一握手，請他們坐到準備好的木製長凳上。下午 7 時客人到齊了，毛請他們進入室內，圍坐在 4 張大圓桌邊，桌上擺好了酒席。主席繞著桌子向每一個人敬酒。一位 70 歲的老人大聲說：「主席向我敬酒，我實在不敢當。」對此，毛回答道：「向老人們敬酒是應該的，向德高者表示尊重。」[21] 主席在敬酒時請求客人們講出他們對黨委和幹部的意見與批評，如果他們害怕公開講出來的話，那麼可以給他寫信。據報道，一場熱烈的討論接著就出現了。[22]

當人們散去的時候，毛澤東回到他的住處。對往事的回憶使他興奮不已，難以入眠。於是，他提筆賦詩一首：

七律·到韶山

別夢依稀咒逝川，
故園三十二年前。
紅旗捲起農奴戟，
黑手高懸霸主鞭。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煙。[23]

在家鄉逗留的第二天早上，毛澤東沒有向羅瑞卿及其他幾個隨行人員打招呼，便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登去（羅等人隨後趕到）。在山頂，有人發現他們已經到了毛父母的墳墓前。一位機靈的年輕隨從即時用一些松枝和野草捆紮出一個花圈，送到毛的手中。毛澤東默默地把花圈放到墳上，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的同伴也都跟著鞠了躬。[24]

這件事打動了毛的心弦。在即將結束韶山之行要返回長沙的那天，中午午休之後，羅瑞卿去叫毛澤東時，毛一邊穿著衣服一邊對羅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什麼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還得承認。」接著，毛又補充道，當他再來韶山時，準備再度到父母的墳上祭奠。[25]

那天下午，人們成群結隊來為毛主席送行。在返回長沙的路上，毛澤東兩次要汽車停在他青少年時就記得的地方。這兩次耽擱使他直至深夜才到達長沙渡口碼頭。可是這裏仍聚集著興奮激動的人群向他歡呼。他讓警衛站到一邊以便與人們握手。[26]

登廬山

毛澤東怎樣從湖南長沙來到鄰省江西海拔5000尺的夏季避暑勝地——廬山（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隨後在這裏召開），這一點不清楚。但

是，他顯然是在心情興奮的韶山一遊之後情緒高昂地來到這裏的。廬山秀麗的風光使他不由得又賦詩一首：

一山飛峙大江邊，
躍上蔥籠四百旋……[27]

若干年後，一位西方記者遊覽了廬山。他稱廬山是一個「極美麗的地方，在那裏，山巒、岩石和常青的樹木從平坦開闊的長江平原拔地而起……」：

> 這是一個喚起對過去無數世代的聯想的地方。許多世紀以前，詩人和畫家就開始來到這裏尋求創作靈感。他們站在建造在懸崖邊上的小亭子裏，凝視著他們來到的叫做五老峰的峰頂，他們坐在仙人洞裏，其情其景，正如今天的觀光者所感受到的一樣。他們品嚐著「一滴春」，複述著那個傳說：喝足了這種仙水就能變成長生不老的精靈[28]。

據這位記者的記述，避暑勝地廬山有一個「龐大的別墅」（可能是蔣介石 30 年代的夏季休養居所），還有若隱若現於山坡林蔭之中的「許多用石頭建造的夏季休養別墅」。在有兩套臥室的別墅裏配備著一些女服務員，它們似乎是「為一些比其他人更平等的中國人」設計的。

當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這個優美的環境舉行時，溫暖的氣氛籠罩著會場，毛澤東出席了三次會議，他和各省黨的書記們談笑風生。毛針對由大躍進導致的左傾冒進草擬了一個包括十九個問題的一覽表，這些問題需要得到解決。但毛和他的助手們顯然認為解決這些問題只需要掃尾措施，不像 4 個月前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那樣，需要大動干戈。[29]

廬山會議開幕時，毛澤東發佈了幾項指示。他號召每一個縣和公社編纂一本「好人好事」的書，這樣的書將以軼事的形式記述那些在 1958 年堅持真理，做好了工作，沒有隨風行事，沒有作錯誤的或言過其實的報告的人。另外，再編纂一本「壞人壞事」的書，這種書將記述那些說假話、違法亂紀或者犯了嚴重錯誤的人。[30] 一些無疑要列入

黑名單的幹部可能意識到主席欺騙了他們，因為他們的錯誤不過是那時過分熱情地貫徹了主席的指示。但是毛澤東不再支持浮誇的做法，冒進和保守都是不可取的，這時的問題是冒進。為了制止出於基層幹部的冒進而產生的「半無政府主義」，毛也提倡重新實行中央集權制，收回 1958 年下放的某些中央權力，批評和反對平均主義。[31]

毛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對他來說並不少見）的最明顯的根據是他接受了經濟規劃者們提出的口號和論點，以及他們謹慎的建議。當時他們也採取這種態度試圖制止 1956 年的冒進，使毛感到很惱火。[32]綜合平衡是制定經濟計劃的前提。「大躍進的主要經驗教訓之一就是缺乏平衡」。曾經出現以犧牲其他生產形式為代價的過分集中的土高爐生產；這種狀況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數量和速度（實際上是大躍進的口號）將不再像以往那樣提倡。「我們的產品寧可少些，但要質量好些、品種多些。」[33]

此外，傳統的蘇聯模式的排列順序——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將不得不顛倒位置，改換為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毛澤東在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中稱讚了那位他幾個月來一再認真聽取其意見的人：

> 陳雲同志說：「在我們開始進行基本建設之前，要先安排好市場。」許多同志不贊成。但是我們現在認識到，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我們要先把衣、食、住、行、用五個字安排好，這是關係到六億五千萬人安定不安定的問題……這樣有利於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34]

難怪各省書記向毛建議再次委託沒有來廬山的陳雲[35]指導金融和計劃工作。他們感到廬山會議將是一次神仙會，是一次智囊會議，在會上將以一種理智的和合作的態度解決問題。[36]正如毛所說，前景似乎光明了。[37]

黃瓜敲鑼

廬山會議剛開始時，毛和他的工作人員大概認為，如果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不出現爭論，國防部長彭德懷是最不可能挑起麻煩的人。彭德懷不負責經濟事務，關於終止 1956 年的冒進和發動 1958 年的大躍進的爭論他都沒有參與。有人特別是陳雲或者李富春可能會乘機說：「我早告訴過你」，——李作為國家計劃委員會成員忠心耿耿地貫徹大躍進路線，雖然心存懷疑，卻隱忍不言。[38] 但是，彭德懷不是這樣的人。

彭德懷沒有擔任有關部門職務，這使他攻擊大躍進政策的行為順理成章，另外，考慮到歷史和個人品質的因素，他的發難也不出人意外。

其中一些歷史因素已經提到：抗日戰爭和朝鮮戰爭期間關於戰略問題有過嚴重分歧。此後，毛澤東和彭德懷在國防政策和武裝部隊現代化問題方面意見也不相同。林彪元帥在政治局裏的地位逐漸上升對彭也是不祥的預兆。[39]彭德懷也許覺得自己有理由感到不平或疑慮，，但無論怎樣他不是一個逆來順受的人，這對理解在廬山所發生的一切是有決定性意義的。

據彭德懷最早期的一位戰友講，彭有一副強有力的體格，「兼有粗壯的身軀和桀傲不馴的面孔」。「他具有中國農民穩健和樸實的傳統美德。他工作勤奮，能夠與他的戰士們一起忍受苦難」。[40] 的確，彭德懷的吃穿像戰士們一樣儉樸。甚至在北京，他也堅持住在樸素的住宅裏[41] ——他苦行僧的形象由於他那和尚一樣的光頭而更加顯著。

彭德懷的吃苦耐勞源於他的家庭出身。他降生的那個農民家庭很不幸，日甚一日地陷入貧窮的境地。彭德懷生於 1898 年，勉強上了兩年學堂，便做了放牛娃，十三四歲時是一名煤礦工人，之後回家種地。在 1912 年的一次饑荒中，他幫助組織了反抗當地地主催租逼債的鬥爭；反抗鬥爭徹底失敗後，彭德懷逃到湘陰縣屬的西林圍，在那裏作為一名普通的勞動者做了兩年堤工。以後當了兵。[42]

彭德懷是最早歸屬於毛旗幟下的士兵之一，1928 年他率領數千人加入了在井岡山的朱毛紅軍[43]。也許毛被他這個湖南老鄉的勇敢和忠誠所感動，儘管彭德懷從來沒有以他的將才而出名，但不久他便在他的戰友中成為地位僅次於朱德的軍人。在長征時，毛澤東曾賦詩一首贈給彭德懷：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44]

彭德懷更多地酬答了毛澤東對他的讚賞。他謹慎小心地把他的成績歸功於主席，關心他的生活。當主席召喚他時，立刻放下一切事務，隨傳隨到。[45] 毛彭之間也出現過矛盾，有關係緊張的時候，但相互尊重畢竟起著主導作用。

作為指揮官，彭德懷毫不客氣地斥責他下級的秉性是眾所週知的。正如他自己所承認的：「我喜歡批評人。」但是，據他的老戰友黃克誠（他也受過彭的訓斥）講，從來沒有人對彭的批評怨恨不滿。因為這些批評總是公正的，並且總是為了改進工作。[46] 此外，彭德懷的部下都瞭解，他不怕與上級對陣，他在廬山會議上的行動也證明了這一點。1956 年，當蘇聯領導人米高揚率領蘇聯共產黨代表團來中國參加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時，彭德懷當面問他，為什麼直到現在蘇聯黨才開始批評斯大林。米高揚毫不掩飾地回答：「當時我們不敢提出意見，假如那時向斯大林提意見，就要掉腦袋。」對此，彭德懷反駁道：「怕死還當什麼共產黨員？」

還有個更為典型的例子。在朝鮮戰爭期間，當時，彭德懷顯然是為接到了什麼命令而感到憤怒。他匆忙回國。他來到毛的住所，不顧主席的警衛的勸阻，闖進正在休息的毛的臥室，迫不及待地開始向毛進行激昂的申訴。結果毛不但在具體問題上讓了步，而且還讚賞他

說：「只有你彭德懷才會在人家睡覺的時候闖進來提意見。」[47] 當然，毛實際上的意思是沒有其他人敢闖進「他」的臥室。

根據以上的歷史背景，彭德懷竟然在 1959 年春在上海批評毛澤東的領導方法，這是非常能夠令人理解的。至於彭為什麼要把批評集中到這個話題上，則仍是一個問題，因為彭在廬山會議前沒有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發表一點意見，因此毛感到忿怒是有道理的。[48] 再者，原先促使彭提意見的現場調查資料到廬山會議召開時已擱置了 6 個多月。

1958 年 10 月，彭德懷再次視察甘肅省，大約十年前他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將其解放出來。[49] 據彭德懷的一位警衛員講，到達那裏時，元帥對土高爐很感興趣，他由車窗裏指著那些土高爐，詳細地述說它們的特性。顯然彭德懷接受了官方的路線，用這樣的方法能夠使農民用本地的材料解決農用鋼材短缺的問題。展望未來，彭德懷預見將來農民都能夠生產簡易的炸彈和地雷這樣一些軍事武器。[50]

當彭德懷來到一大片莊稼地前，看到成熟的莊稼躺在地上，似乎沒有人收割時，他原有的那種得意情緒一下子降低了。經過長時間的尋找，最後找到了一位年老的農民。他說，所有壯勞力都忙著發射鋼鐵衛星（即試圖創造煉鋼紀錄）去了。沒有足夠的人力完成上級指派的各項任務，下達的命令是一切為「鋼鐵元帥」讓路。

彭德懷憤怒地喊道：「你們難道不想想，莊稼收不回去，來年大家吃什麼？總不能吃鋼鐵嘛！」那位老農用力點點頭表示同意，並且一針見血地補充道：「是呵，誰不這樣說，這樣想？可誰頂得住這個風？除非中央派個大幹部來像你一樣，有權提點意見！」

當彭德懷視察一所步兵學校時，發現學校的教員在土高爐前賣力地幹活，他們的衣服像煤煙一樣黑，由於缺少睡眠眼睛通紅。學校的課程和訓練因此而停頓。這時，彭德懷大概真正感到震驚了。彭一進學校，教員和學員抬著他們剛煉出來的「鋼鐵」跑來歡迎他。他告訴他們：「我為你們的熱情感動。但對你們的領導這樣不珍惜你們的熱情

和幹勁，我要打他們的屁股！……假若我們軍隊，我們的軍事學校都來搞這個，敵人就會高興得跳！因為我們不待他們來打，我們自己就垮了！」[51]

學校招待所的兩個工作人員，也許是彭德懷的陳述給他們壯了膽，開始向彭抱怨當地家庭出現的情形。一些房子被拆掉、果樹被砍掉，當成柴火燒高爐，烹調用的鐵鍋被收去當作原料。那天晚上，彭德懷與許多幹部進行了誠懇坦率的談話，這次談話給了他很多思考的材料。那些幹部離開之後，他提筆一直寫到深夜。[52]

從甘肅回來的路上，夜間通過開路先鋒河南省，彭德懷看到農村上空到處閃爍著土高爐的火焰。長時間的沉思之後，彭轉頭問他的警衛員：「你說這個辦法能叫我們國家從此不受窮？」當那個戰士謹慎地保持沉默時，彭德懷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問題：「不行！這一把把火會把我們的家底燒光！完全不是我們腦子裏想的那個東西了！」[53]

為什麼彭德懷不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或武昌會議和 1958 年 11 月至 12 月的全會上對土法煉鋼計劃提出疑問呢？根據彭德懷後來的敘述，他接到鄭州會議的通知時已經太晚了，只在最後一天出席了在一列（大概開往武昌的）火車上召開的一次晚間會議。毛澤東講了話，批評了「共產風」，因為大家都沒什麼異議，會議很快就結束了。考慮到主席講了話，彭德懷覺得他沒有干預的必要。在（彭斷斷續續參加的）武昌會議上，彭在小組會中對狂熱的產量預測提出了懷疑。誇大的預測把 1958 年的糧食產量定為 5 億噸。當毛選定公佈 3.75 億噸的數字時，彭德懷是贊同的，儘管還帶有一些懷疑。[54]

彭德懷在武昌會議後到湖南作了一次視察。他訪問了自己的家鄉湘潭縣烏石公社，訪問了在同一個縣的毛澤東的家鄉韶山沖，還訪問了平江縣，30 年前他曾在這裏領導了一次起義（在革命史上曾有過詳盡的描寫），最後訪問了株洲。彭德懷的這次視察，肯定比 1958 年間在甘肅和其他地方的視察更使他感到震撼。如毛澤東一樣，這也是彭德

懷 30 年來第一次回老家探望。[55]像毛一樣，彭受到了隆重的歡迎。[56]但與主席相反，彭並不是帶著玫瑰色的眼鏡去察看他的故鄉。

在一個生產隊的鋼鐵廠裏，彭德懷再次看到被砸壞的烹調用鐵器被當做原料，只不過是為了生產更多的鐵。成堆無用的生了銹的鐵錠擺在地上。彭德懷把負責土高爐生產的幹部叫到一邊，耐心地向他解釋：這樣做完全沒有意義，就好像用黃瓜敲鑼。[57]

彭德懷還瞭解到，個人所有的鐵鍋被沒收還有另外的目的，——強迫農民在新的集體食堂就餐。在烏石的敬老院——上了歲數的農民在其中過著集體生活，彭德懷找到了許多老朋友。[58]人們告訴他，一開始，集體食堂很快被大家接受了，因為共產黨曾說這種制度將保證他們的食物供應。隨後他們拿出一盤蔬菜和一丁點米飯給他看，那就是他們的下一頓飯。彭德懷從他們的身體狀況可以看出他們所說的話是真實的，對所處的困難境地他們沒有說假話，因為事先他們不知道彭要來。[59]

一位抱著小孩的老人告訴彭：「年輕人可以勒勒肚子，老人們可以咬咬牙，娃娃們咧？他們要叫喚呀！」[60]敬老院的情形使彭感到吃驚，他諷刺性地評論它的名稱[61]，指出它至多只能叫做餓不死院[62]。他捐贈 100 元錢給院裏每個老人買了一條毛毯，權且補充臥具的不足。[63]

老人們向彭德懷說，他們能夠對付自然災害，但是人為的災害則是另外一回事。彭清楚地意識到關鍵的問題是浮誇，尤其是誇大糧食產量。他在敬老院裏平心靜氣地指出，如果虛報的產量——畝產 1 萬斤！——在烏石來說是假的，那就不能指望附近一些報了更高產量的村莊來幫助解決烏石的吃飯問題。問題都出在昏憤上。一些人聽了彭德懷的話後歎息不止，另一些人則擦眼淚。[64]其他的人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補充彭的論點說，在養雞、養鴨都沒有足夠的地方時，有人建議建造一個能養 1 萬頭豬的養豬場，那簡直是熱昏了頭。[65]

彭德懷進行了多次會見。一次，他會見了一位縣委書記。這位書記公開承認高產田數量很少，最大限度只能畝產 800 斤。彭德懷讚

揚了他的誠實，並說他不相信其他地方畝產8000斤或以上的虛報的產量。那位幹部解釋說，上面施加壓力才造成虛報，如果你不放衛星——糧食產量衛星、鋼鐵產量衛星或吃飯不要錢方面的衛星，就會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危險。彭德懷嚴厲責罵了這樣的做法，並且斷言：「共產主義是幹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66]

不久，彭德懷會見了一位好誇口的大隊幹部，他聲稱每畝產量3000斤，讓婦女和孩子去收割莊稼，年輕男人去參加鋼鐵生產。當彭德懷問站在週圍的農民這是不是真實的時，他們都笑了，但大概是緊張的笑，因為他們不敢得罪那個幹部。彭德懷在這些農民面前斥責了這個幹部，指責他浮誇，並斷言根據自己對田地的觀察，如果他們能達到每畝300斤，就不錯了。這一下子激發了農民批評「吹牛皮衛星」和幹部的虛報作風的情緒。令人擔憂的是下一年人們將挨餓。彭德懷把那位幹部帶到一邊，向他解釋實事求是的重要性，人們嚮往大躍進，但不是錯誤虛假的躍進。如果使用命令主義，群眾就會造反[67]——彭德懷已把老戰友們的這個告誡牢記在心。[68]

但是，幹部的浮誇並不是農民不滿意的唯一根源。生活在敬老院的老人們對大鍋飯和帶有軍事性質的生活方式感到厭煩。[69]那天晚上，彭德懷與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他一路陪彭視察）在一個月光普照的院落裏散步，彭提出了自己對軍事化、集體化、村社化、水資源保護區化、電氣化等的懷疑。這些將如何去實現呢？[70]如果某個人反對這些「化」中的任何一「化」，他自然會被戴上一頂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71]

癥結就在這裏，人們擔心受到懲罰，1957年的反右運動加深了這種恐懼心理。這就意味著向上級報告真相是非常困難的，這是彭德懷在敬老院裏承認的。[72]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周小舟本人也有這樣恐懼心理。彭德懷問他大煉鋼鐵運動是否正確，儘管彭已表示不贊成這個運動所產生的後果，周仍然感到不能批評毛的創議，僅僅說了一句模稜兩可的話：「這很難說。」只是在大躍進政策的實施方面，周才同意

過去存在現在依然存在過熱現象、缺乏客觀性和浮誇傾向等問題。[73]一個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候補委員在一個和藹可親的政治局委員面前還感到如此緊張，試想一個基層幹部要對他的上級匯報不合胃口的實情，不知該怎樣叫人害怕呢。

不管怎樣，周小舟確實承諾要針對大躍進的過火行為向全省發出批評性指示。作為回應，彭德懷像此前向農民作保證那樣對周小舟保證，他要向毛匯報事實真相。[74]在做出這個保證時，彭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原則，因為他曾經間接地同意農民的看法：毛的政策正在受到曲解，主席本人不可能知道實際情況。[75]

當然，對彭德懷來說，要做到暗示基層群眾：毛不僅知道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產生的問題，而且肯定對這些問題負有大部分責任——這在政治上是難以想像的。如果這樣做的話，彭不僅違反了黨的紀律，而且還要面臨實際上不可逾越的障礙：對毛的個人崇拜。甚至彭在家鄉偶爾與他青少年時期的朋友談話時，他也發現，以他一己之力不可能消除毛的無所不曉的神聖形象。這個形象是劉少奇在 1945 年黨的七大上頌揚「毛澤東思想」以後樹立起來的。

這是彭德懷在其後幾個月遇到的困難，實際上也是所有對毛可能提出批評的人的困境：怎樣把人和神分開？怎樣把領導和傳奇人物分開？也許這就是彭德懷去廬山前還感到躊躇的原因。當然，當彭德懷耳邊迴響著他的老戰友給他的如果引起農民不滿，就會造反的告誡離開湖南時，他決心講出他要講的心裏話，這些話體現在他在返鄉之行的最後一個難以入眠的夜晚所吟的一首詩中：

谷撒地，
薯葉枯。
青壯煉鐵去，
牧禾童與姑。
來年日子怎麼過？
請為人民鼓嚨胡[76]。

然而，儘管他隨後就視察了江西和安徽[77]，但 6 個月來彭德懷沒有真正地代表人民毫無顧慮地說出自己的意見。在湖南視察訪問的最後一天，彭在株洲偶爾遇到了薄一波。他對薄講他對 6000 萬噸的糧食徵購指標感到擔心，他堅信，根據產量，能徵購上來的糧食不可能超過 4500 萬噸。薄建議彭給北京發封電報講明這個意思。應薄的請求，彭以自己的名字簽發了電報，但電報裏絲毫未提他對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運動的失望情緒。後來，上海會議時，正值西藏叛亂，彭將主要精力放在制定平定這次叛亂的軍事行動計劃上，因此沒有更多地參加會議的活動，這是他後來講的。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並沒有妨礙他大膽地說出他對領導方法的意見。4 月 24 日至 6 月 13 日他對蘇聯、東歐和蒙古進行了友好訪問，訪問回來時，他曾要他的秘書向廬山會議請假，因為他感到精疲力竭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來了一個電話勸說他去參加會議。[78]

彭德懷嘗試發表意見

公平地說，彭在廬山會議之前，可能是由於對經濟問題不熟悉，彭德懷感到有某種受局限的情緒。而且，前一年 12 月在武昌會議上下達了部分降低高指標的命令，使一些領導幹部思想上不再存在真正的挫敗意識，甚至彭在前一年的 12 月份視察湖南之後，他也只能承認對基層的實際僅是走馬觀花，作膚淺的瞭解。但是，在他訪問東歐期間，形勢迅速地發生了變化。

彭德懷離開北京不到一個星期，毛就第一批被嚴格修訂過的 1958 年的產量數字發佈了指示。當彭回到北京時，進一步的檢查核對工作實際上已經結束。在最高層領導內部，也未能掩飾住這種思想：1958 年的生產的發展是事實，但被驚人地誇大了。

到了廬山會議的論題之一大概是：面對已經瞭解到的實際情況，下一步應當做些什麼。假如預測 1959 年的收成是好的，即便不像 1958 年那麼好，領導層也可以決定不公佈 1958 年修訂過的數字，而故意少

算 1959 年超過 1958 年的增產數字，經過幾年的過程，逐漸使實際產量數字和官方公佈的產量數字一致起來。

但是，早在 6 月底，就有跡象表明，1959 年將不會是一個獲得好收成的年份。在東北，持續的長期乾旱（自 1958 年底在許多地區開始，一直到 1959 年 6 月還沒有結束），已經造成了早期作物減產的局面，而且還意味著晚期作物的播種要受到影響。[79] 從 5 月開始，水災已經影響到大多數省份，尤其是廣東省，第一書記陶鑄面色蒼白，忍受著發燒的痛苦，指揮著抵抗百年來最兇猛洪水。[80] 但是，儘管發生了水災，在 6 月份，一些省份仍然傳出了夏季小麥豐收的消息。[81] 然而，產量增加超過 1958 年 10% ～ 30%的上報數字，對中國的領導人來說似乎是不可確信的，他們這時已經意識到 1958 年的浮誇了。[82] 總之，到廬山會議召開時，豐收的前景已經十分黯淡——況且影響秋收的乾旱才剛剛開始[83] ——這就加強了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不滿意的人大膽地講出自己意見的決心。

一般說來，彭德懷看不到所有關於農業形勢的報告，這些報告大概每天都送到農業部和糧食部。不過，他自己的國防部給他提供了瞭解基層群眾意見的獨特機會。部隊領導機關關切地注意戰士們收到的抱怨他們農民家庭艱苦生活的來信。[84] 不清楚國防部從地方官員那裏收集到什麼具體細節。不過彭德懷從國外一回來，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就告訴他，國內一些省區的形勢是嚴峻的，尤其是彭德懷去年秋天視察過的甘肅省，在 4 月份還宣佈自己是餘糧省，現在卻承認是一個缺糧省。黃表示如果再抽調軍事運輸力量運輸糧食，就要影響西藏的軍運和全國的備戰。但是，彭堅持說為了支援缺糧地區，還是應當做更大的努力，想辦法抽出一點運輸力量來幫助缺糧地區。[85]

海外中國人收到的寄自中國南方的親人信件，也表明了農村存在的值得憂慮的貧困現象。彭德懷根據他自己的信息來源，知道了這些現象。口糧被減少[86]；糧食實行配給，糧食的分配據說每個老年人每

天定量 2 ～ 4 兩[87]，在農村，每個壯年勞力每月定量最多 35 斤[88]。連紅薯都很昂貴[89]。食用油供應缺乏。[90]

彭德懷一到廬山就及時地提出食用油短缺的情況[91]。在會議的開始幾天，與會者分成幾個地區小組進行討論。彭德懷參加了西北小組，這大概是因為直到 1954 年中央政府改組前他至少一直是這個地區名義上的領導人。7 月 9 日，他在小組會上講：

> 停止供應農村食用油 4 個月，這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這純粹是主觀主義。我一回國，看到那封電報，馬上就通過電話提出了我的意見。

其他的會議代表解釋說中央已經取消了這項指示，但是彭反問他們當初是否抵制了這項指示。[92] 當他後幾個星期在與毛的抗衡中需要同盟者時，這種典型的對同事直言不諱的直爽態度可能早使他失去了支持者。

在 7 月 3 日至 10 日期間，彭德懷在西北小組的討論中至少有 7 次發言。他的意見反映了他 1958 年最後幾個月裏實地視察所瞭解到的情況。彭德懷斷言，打破農民的飯鍋違背了他們的利益，並說，黨能夠不受到抵制僅僅是因為黨還享有崇高的威信。[93] 他質疑土法煉鋼運動的價值何在，但有趣的是，他只質疑——號召全國人民煉鋼正確嗎？[94]——並沒有譴責大煉鋼運動；也許他從周小舟那裏學到了謹慎。他批評未經試驗就創辦人民公社和吃飯不要錢的制度。他指出，一些公社，包括大加宣傳的徐水人民公社已經解散了。[95] 彭還批評左傾主義和浮誇的繼續存在，用他經常使用的短語來概括，就是「頭腦發熱」。[96]

在小組會上很早的一次顯得有些突然的發言中，彭德懷詳細地敘述了在他的軍事生涯中犯過的四個主要錯誤。[97] 他可能是希望通過搶先開展自我批評來減少他的幾次坦率批評所遭致的不滿。特別是他可能在期待毛的反應，因為彭在自我批評的發言中提到了毛對 1958 年

的錯誤應負的責任。[98]可是事實上彭德懷已經犯了大得多的「欺君之罪」。

在彭德懷7月3日的公開發言中，他實際上指責了毛在撒謊。在他視察韶山的報告裏，他說儘管那裏的人民公社提高了產量，但增加的數字並沒有吹噓的那樣高：

> 我去那裏發現了事實真相，事實上僅增加了16%。我還問了周小舟同志。他告訴我這個公社的產量只增加了14%，需要國家的很多補助和大量貸款。主席也視察了這個公社。我問主席他的調查結果如何。他說他沒有談論生產問題。依照我的看法，他談到了那個問題。[99]

因為就在來廬山之前毛才視察了韶山，這種評論意味著他們兩人到達會議地點後不久，彭德懷肯定找主席談過。彭的辛辣的評論表明，主席曾毫不留情地對待他，這種傲慢態度可能恰好觸發了國防部長出名的暴躁脾氣，並引起他在西北小組會上對大躍進的一連串批評。

在彭最後一次提出批評的第二天，7月10日，毛認為不得不回應了，不過不清楚具體在哪次會議上。毛承認，缺乏統一認識正在逐漸損害黨內的團結，他認為根本問題是一些同志不能用全面的觀點去分析形勢，但是在他的陳述中沒有辯解的意思，他堅決駁斥了認為總路線基本錯誤的批評者，——看來不是指彭，起碼在這個時候。缺點和錯誤是必須承認的，毛用了一個他最喜歡的比喻，但是它們只不過是十指當中的一指。[100]

奇特的一對

在會議開始的日子裏，儘管有工作上的壓力，彭還是顯得非常振奮。這大概是因為在經過幾個月的有違個性的克制之後，他為終於能行動起來，說出自己的心裏話而高興。他每天黎明時分起床，觀雲海、看日出；黃昏的時候，散步或時而造訪歷史遺跡。每碰到一個元帥同僚時，他們總免不了談笑一番。

但是，情況很快有了變化。彭變得抑鬱起來，顯得思慮重重。晚間，警衛員照例為他備好洗澡水後，他無心入浴。他不再按習慣服用安眠藥，老是乍一躺下又起來，焦慮地來回踱步。午夜以前，他總是不能入睡。[101]

大概是同事之間進行的一些討論，攪亂了彭的心緒。他曾在兩個場合同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見過面。第一次見面是在進餐的時候，周熱情地描繪了湖南的工業和水利事業由於躍進而得到發展的情景；但僅僅兩天以後他們第二次見面時，周的情緒卻變得截然不同，他表示湖南省的糧食統計數字被人誇大了，並激烈批評了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由於周僅有過一個短暫的機會得以向毛轉達自己的不安，所以他希望彭能夠親自出面去和主席談談。

更為重要的是，彭當時經常和住在自己隔壁的政治局同事張聞天見面商談。[102]他們是奇特的一對：彭生性直率，是一個地道的軍人；而張卻是一個通曉數種語言的文人，一度的文學翻譯者、黨的宣傳家和歷史學家[103]。20 來歲的時候，張曾在美國做工，在日本短暫地學習，隨後較長時間地居住在蘇聯。1930 年，他作為受過蘇聯人訓練的一個年輕人團體的領導成員之一，由莫斯科回國。這個團體被國內那些缺乏正規訓練但更富於實際經驗的同事們戲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些由蘇聯回國的人，在莫斯科的倡議下接過了中國共產黨的指揮權。不過，張與這個精英團體的大多數成員有所不同，他時常是站在毛的一邊。在長征途中於 1935 年 1 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他的一票對於實現領導層的決定性改組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隨之，張作為資深者接任了總書記職務，毛亦暫且滿足於領導一個負責軍事行動的三人「小組」。此後張以總書記身份主管政治局工作，直到被莫斯科指控與托洛茨基主義者有聯繫為止。這一指控，給了毛一個解除他實際職權的機會（隨後他的職務變得無足輕重了，儘管還繼續佔有一個突出的位置）。當共產黨人於 1949 年取得勝利後，張開始專注於外交事務，做過駐蘇聯大使，隨後成為周恩來在外交部的主要副手。到這

時為止，他仍保留著自己政治局委員的職位，這一職位，他是在 1931 年獲得，後來在 1945 年毛主持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又得到確認的。然而，1956 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在沒有明顯原因的情況下，他終於被降級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且，1958 年當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放棄其外交部長的兼職時，他也未能接任這一職務。在失去臉面的情況下，張甘居下位，與新上任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商定不再負責日常事務，以有利於專心做好對世界形勢的分析工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一份關於西方陣營內部矛盾的分析報告曾受到毛的讚揚，並獲准在廬山印發。張同毛的關係始終是不明確的。因工作而結合，自 1955 年張不再任駐蘇大使以後，這一關係的基礎多半已經喪失。像彭德懷一樣，張聞天也不難看出自己正被逐漸地撇在一邊。很可能是兩人共有的一種對毛的辛酸感，促成了他們短暫的、注定要倒霉的聯盟。[104]

根據彭自己的敘述，1959年春以前，他和張很少有交往。4月下旬，出於巧合，他們在肩負不同使命的情況下在 24 小時內先後飛往東歐，在此之前剛發生過彭在上海全會上抨擊個人專斷的事情。當時，張對大躍進所曾抱有的熱情也已經消失，因為在一次南方之行中他看到了食物短缺所造成的後果。在上海他曾提出過這個問題，儘管不是在全體會議上。[105]4 月 24 日，張和彭一道由莫斯科飛往華沙。27 日至 28 日，他們再度在波蘭首都相會。[106]這些短暫的交往能夠為他們就國內形勢問題簡單地交換意見和看法提供條件，但可能更為重要的是，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兩人會切身體驗到蘇聯人對於中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的非難情緒在明顯地增強。

當彭於 6 月 13 日回國後，張去看望他，並特別提起了毛 4 月 29 日的指示。張認為這個指示非常有益，但也體現了個人作風。換句話說就是：毛對大躍進理論的修正是值得歡迎的，但這種由個人發佈指示的方式又是專橫的，它使人聯想到彭在上海抨擊過的個人專斷。可以想見，彭接受了張的看法。[107]

根據彭對他和張的關係的敘述，可以得出這樣的必然結論：國防部長被政治上比他更精明的前總書記所借重。張聞天沒有政治基礎，實際上，他之所以能在黨的第七和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中倖存，是因為他較早地脫離了自己往日唯一的一批贊同者——由蘇聯教育出來的「布爾什維克」[108]。在和彭德懷的交往中，張聞天想必會意識到自己有了一個理想的夥伴：一個軍人，受到高度尊重的首要的革命將軍，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的司令員，他禁慾主義的生活作風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在人民解放軍和元帥當中，他擁有一批顯而易見的支持者。

到達廬山以後，比鄰而居的環境使張聞天、彭德懷二人能夠經常見面。他們認為，經過削減的鋼和煤的生產指標（鋼 1300 萬噸，煤 3.4 億噸），甚至也是無法完成的。張還向彭灌輸了這樣的思想：土法煉鋼運動得不償失。對於廬山上那種不利於指出缺點和錯誤的相互間只說正面話的氣氛，他們都表示不滿。政治局會議沒有進行真正的討論，實際上只是毛和其他最高層的領導人向大家作了簡要的情況介紹。張批評毛雖然英明，但在使人民服從方面卻過於粗暴。彭似乎認為對於一個新政權的締造者來說，這樣的情況本不少見，他把毛比作中國歷史上大王朝的第一個帝王。[109]

海瑞——轉移注意力的人物？

如果說張試圖通過與彭的交談來鼓動這位國防部長採取更激烈的行動，那麼他成功了。但張並不是唯一鼓動者，毛無意之中大概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這裏，我們有必要贅述一二。

在廬山的時候，彭時常在居室裏自言自語地念叨毛在前一年成都會議上關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幹的倡導。[110] 那次會議以後，在 1959 年 3 月末的上海工作會議上，毛要求自己的同事們向唐代的魏征（公元 580-643 年）和明代的海瑞（公元 1515-1587 年）學習，這兩個封建王朝時代的儒家官吏是長期被中國史學家譽為剛直的

勸諫者。同時，他像往常那樣批評了怕講真話的有害的工作作風。[111]接著，在4月初的中央第七次全體會議上，他又提出了這個問題：

> 黨內要造成敢於講話和批評缺點的空氣。批評缺點往往是很痛苦的，但批評之後改了，就好了。不敢講話無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級、怕沒有面子、怕開除黨籍、怕殺頭、怕離婚……要言者無罪，按照黨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112]

毛還再次引用中國歷史上的人物來充分說明自己的觀點。這一次，他引用了宋朝的將軍岳飛（公元1103-1141年）。由於岳飛在獄中被殺是出於皇帝的旨意。所以這個榜樣在毛的一些同事看來似乎有多種含義，特別是毛強調岳飛之有名望，恰恰是因為他被殺了頭。[113]

隨後，顯然是根據毛的意見，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發出了關於編印魏征和海瑞文選的指示。此外，分管文藝界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還鼓勵著名京劇演員周信芳創作一個關於海瑞的劇本，並就提供有關素材一事做了安排。這個委託創作的劇本，由周信芳和他的兩個協作者完成，於建國十週年慶祝日——1959年10月1日——到來前夕在上海演出。劇本名為《海瑞上疏》，取材於這個明代官吏對皇帝進行直率批評的非常有名的事件。[114]一個關於岳飛的劇本這時也寫了出來。[115]

在此期間，還有一個「領導同志」曾鼓勵傑出的明史專家吳晗響應毛的號召。[116]吳晗當時是北京市副市長，但早在30年代，他就已躋身於中國最卓越的年輕學者的行列。他20來歲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助教時，發表了大量關於明史的文章，這些文章，後來都成了權威性的參考材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北京各大學的教職員工遷往中國西南地區，吳晗作為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在昆明度過了戰時歲月。他在那裏寫出的一本明朝創立者的傳記，被許多人視為「當代中國人撰寫的最好的傳記」。

這個時期，吳晗開始對政治問題發生興趣。在寫給媒體的文章中，他以暗喻的方式來微妙地諷刺國民黨，——「指桑罵槐」，誠如他自己所言。抗戰結束後，在清華大學教授任上，他成為自由知識分子

的政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的一個積極成員。這個黨派力圖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尋求中間立場。但是內戰爆發後國民黨的迫害終於逼使他逃往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在那裏，他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年，他 39 歲。在一份早期的自我檢查中，他曾談到自己是怎樣在思想鬥爭中逐漸接受了對毛的個人崇拜。[117]

1949 年以後，作為身居北京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成員」，[118] 吳晗發現自己陷入了大量的禮儀活動之中，負有太多的代表職責，相對而言，幾乎沒有時間從事歷史研究。[119] 他的政治地位，使他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資深的政治局委員彭真更加接近。在吳晗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1957 年，當最高領導層圍繞「鳴放和辯論」以及反右派運動問題發生爭論時，彭真似乎曾利用這位歷史學家對毛發起過一次隱蔽的攻擊。[120] 1959 年，吳晗有大量的歷史短文問世，從而結束了自己學術上的休閒時期。這些文章主要是寫給人民大眾看的。他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對「進步的」歷史人物做出評價，比如曹操（卒於公元 220 年），唐朝女皇武則天（公元 626-705 年）[121]，以及——更為重要的——海瑞。

在一篇抨擊浮誇詞句的文章裏，吳晗初次談到了海瑞，文章發表在 1959 年 6 月 15 日——彭德懷自東歐歸來兩天以後——的《人民日報》上。[122] 第二天，他又用一個並無特別含義的筆名，在該報發表了他第一篇專論海瑞的文章——《海瑞罵皇帝》，文章論述了這個明代官吏著名的上疏。如果聯繫吳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的攻擊來做事後的分析，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在對毛進行含而不露的譴責。[123]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

確實，文化大革命中對吳晗的指控，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他提出海瑞問題的時間和論述這個問題的恰當性而來的。歷史上的海瑞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僅是因為他上疏批評了皇帝，還因為他被解除了官職。下面我們很快會看到，彭德懷在廬山通過他的「意見書」間接地批評了毛，並且被罷了官。這個事件發生在 1959 年夏末秋初，這一時

期，吳晗正好開始認真寫作關於海瑞的文章。這樣，當毛後來斷言海瑞是暗指彭德懷的時候，[124]他的判斷似乎是恰當的。出現巧合似乎本來就是難以使人相信的。

但是，毛和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們實際上從來不提這樣一個關鍵性的事實：是主席本人首先提出了海瑞的名字，並促使大家對他和其他一些歷史人物加以注意。而且，人們根據毛去世後的有關報道還得知，毛曾要大家特別注意海瑞這一類人，因為他們有勇敢的意志，甘願冒因批評上級——對他們來說就是當年的皇帝——而失寵甚至被處死的危險。[125]

文化大革命中幾乎無人提及的另一個事實是：吳晗寫作有關海瑞的文章，並非是在獲悉了毛的意見後自發決定的，實際上當時有一位「領導同志」在找他並特別鼓勵他這麼做。[126]於是問題出來了：這位「領導同志」是誰？他的身份為什麼迄今沒有披露？他可能是某一個希望利用吳晗來攻擊毛的人嗎？

顯然，這個人有可能是彭真。作為北京市黨的第一書記和市長，他是吳晗最主要的直接上級，也是最有可能向吳晗透露關於上海工作會議的情況的人。[127]而且，在僅僅 18 個月以前，他畢竟還和毛發生過正面衝突。

另一種可能是：一個像周揚這樣級別較高的中央宣傳部幹部曾受命出面，來促使毛關於向歷史人物學習的意見得到貫徹。也可以想像這是一個張聞天類型的黨的領導人，有知識分子的背景，因而完全懂得海瑞的故事能夠被用來達到政治目的。最使人驚異，但也最不可能的一種判斷是：這個人是彭德懷自己。

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所有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沒有被指控與此事有關。在當時眾目睽睽的氣氛下，這種指控本身具有致命一擊的效力，——這一點，無論對他們還是對其他任何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的中國領導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這位神秘的「領導同志」——從 1979 年年中公佈的材料來看，似乎也不可能是那些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不好的作用而受到譴責或失寵的人。這樣又可以把陳伯達、康生一類曾經涉足知識分子工作的人排除在外。因為，這個人要是出在他們中間的話，他要麼在 1959 年被指責為煽動犯，要麼文革中被譴責為偽君子，要麼兩者皆有。

因此，從邏輯上推論，這位「領導同志」必定是這樣一個人：他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但幾乎沒有受到衝擊，由於某種原因，他的聲望在 1979 年因為某些原因仍然受到保護。顯而易見，在這樣的範圍內，涉足文化工作到了相當的深度以致可能接近吳晗並鼓勵他撰寫海瑞文章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周恩來，另一個是毛澤東自己。

周的可能性較大，他與知識分子有特殊的聯繫，常在必要的時候代表毛制定文化領域的政策。[128] 而且，有一點是明確的，周至少部分明白自己在扮演毛內閣的領班角色，負有貫徹主席意圖的任務。在這方面，一個有代表性的事例發生在 1958 年初。當時，在赴成都參加會議的途中，他曾帶領一些高級領導人巡遊長江，考察如何把毛兩年前在《游泳》一詩中提出的建造水壩的設想付諸實施。[129] 不過毛也樂於和知識分子交往，也許他在卓越的文人們表現出的忠順中感到了一種遲來的安慰，因為他青年時代曾經受過學者的冷漠。[130] 此外，眾所週知，毛曾經給一些知識分子以特殊待遇。這種特殊待遇，或者是友好的——，比如他同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交流詩作之舉[131]；或者是帶有敵意的——，比如他帶頭譴責作家胡風[132]。吳晗確曾被主席召見過一次，為的是就他撰寫的那部明朝創立者的傳記進行私人交談。[133]

如果這位鼓勵吳晗從事海瑞研究的「領導同志」是毛或者周，那就很容易理解此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不曾洩露，並且至今難以披露的原因。可能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1965 年的時候，「他」為什麼不為保護吳晗而出來說話呢？而且，對主席來說，人們還可能提出這樣一種猜疑：當年由於在大躍進問題上受到責難，所以毛故意提倡描寫歷

史人物——這些人物與當代事物的聯繫是不難被人領會的，以查明是否有人會利用這種方式來批評自己。

如果假設吳晗撰寫海瑞題材的文章是出於毛或者周的鼓勵，那我們將有充足的理由來解釋這個歷史學家的另外一些超乎情理的莽撞舉動。比如，他的一篇容易被人認為是在對毛進行嚴厲批評的[134]關於海瑞的文章，甚至敢在彭德懷為他做出示範之前發表。廬山全會以後，當彭實質上被孤立，劉少奇、周恩來肩並肩地和毛站在一起的時候，吳晗發表了他的另一篇海瑞文章。這一次，他的鼓動者顯然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高級別的宣傳官員胡喬木。胡告訴吳晗，當海瑞的名字在廬山被彭德懷提起的時候，不少與會者對這個人物還不甚瞭解，因此，需要有一篇起說明介紹作用的文章。吳晗在 9 月 17 日即彭德懷被解職的當天完成了這篇文章，4 天以後，它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文章裏，作者申明，右傾機會主義者不得以海瑞自居。人們都記得，大約在這段時間裏，周信芳的劇本《海瑞上疏》也開始上演。然而，無論是周信芳還是吳晗，都未受到攻擊，儘管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這時正進入高潮。此後，吳晗仍堅持進行海瑞研究，在不幾年的時間寫出了關於這個明代官吏的大量文章，為他的海瑞研究文集得以在 1962 年問世做了準備（這部文集是根據中央宣傳部 1959 年的組稿計劃出版的）[135]。

看來，在 1956 年 6 月，吳晗根本不可能決心作為黨內唯一的仗義執言者，在大躍進問題上獨自與主席較量。無論吳晗學術上的造詣有多高，在政治上，他終歸是北京市黨組織屬下的一個成員，沒有第一書記彭真的支持，他不可能自作主張地採取行動。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並沒有人提出彭真當年曾給吳晗以這種支持，任何這類說法都難以使人相信。事實上，到 1959 年 6 月為止，黨的高級幹部和毛一樣熱衷於大幅度的躍進，在大躍進問題上黨內分裂的發生，要晚於這個時候。[136]

當然，還有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是：60 年代初期，黨內曾普遍存在著一種同情彭德懷的強烈情緒，因此，吳晗《海瑞罷官》的劇本於 1961 年 2 月在北京搬上舞台一事，當具有替前國防部長進行辯白的含義。這個問題，本書的最後一卷將加以論述。但無論如何，毛樹立海瑞這個典範，一位神秘的「領導同志」明確地給吳晗以鼓勵。這位歷史學家在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運動中毫不擔心地從事海瑞問題的研究以及寫海瑞題材的任何一位作者當時都沒有受到懲罰【137】，所有這些事情如果聯繫起來看，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海瑞「事件」絕沒有中傷當時領導人的含義，並且，在毛看來也是這樣。

彭德懷的炸彈

當吳晗關於海瑞的第一篇比較重要的文章發表的時候，彭德懷是否讀過它，我們難以斷定。但彭的警衛員證實，毛關於大家要敢於說話的倡導，曾使彭「異常興奮」。並且，因為他參加了上海會議，他大概早已聽到毛提起海瑞這個名字。此後不久，正像我們知道的那樣，有人——或許就是彭——在廬山也提起了海瑞。彭後來談到，在廬山開會的時候，他很清楚，儘管已採取了措施，但計劃委員會仍未能控制住盲目發展的勢頭。7 月 12 日晚上，他考慮好了要說的話，但次日清晨他去見毛的時候，發現毛還沒有起床。【138】7 月 13 日深夜【139】，元帥要警衛員給他沏上濃茶後先去睡覺，當警衛員建議他也好好休息，以便精力充沛地參加第二天的會議時，彭解釋說：小組會議幫助他理清了思路，現在他要把在基層瞭解到的情況彙集起來，寫信向毛報告。當時他面前擺著一張紙，上面已經寫下了「主席」二字。就這樣，彭德懷開始了他那封與個人命運攸關的「意見書」的寫作。當晚，在彭寫信的過程中，張聞天曾登門拜訪，並閱讀了部分信稿。【140】

第二天一早，在練完太極拳——中國傳統的健身操——後，彭叫來隨從參謀，把擬出的信稿交給了他，要他做文字上的訂正並另紙謄

清，然後送交毛的辦公室。彭的激動姿態向人表明，這時他如釋重負，並且，當他從隨從參謀那裏確知信件已經順利送到的時候，他原有的緊張感進一步得到消除。彭自己說：「有些話會上我不好說，也說不準，都寫在這裏頭了。我有話就要說，說出來就像去掉一塊病。」[141]他那封表述自己意見的信的開頭一段，基本上也就是這樣說的。[142]但毛並不像彭的參謀那樣體諒他、接受他的解釋。

彭信的開頭部分，用大量的篇幅肯定大躍進所取得的成就，即便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削減了的數字，依然是值得肯定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8.4%，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66.1%，農業總產值增長25%。糧食和棉花的產量至少增長了30%。「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143]

一些基本建設工程中過多過快的投資，阻礙了生產的正常發展，並且1959年未能立即採取足夠的措施來糾正這種狀況。但即便如此，這些建設工程還是必要的，它們會逐步產生效益。只是在那些因原材料短缺進一步使生產受到影響的部門，基本建設工程應當暫時下馬。

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具有重大意義，它有助於使農民擺脫貧困，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速度。由於召開了武昌會議、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在所有制問題上出現的混亂現象已大部分得到糾正。失業現象已經消除。[144]

至此，大概是得益於張聞天的教誨，彭德懷說話甚為得體。儘管他認為自己性格粗率、不謹慎，實際上他這封信前一部分的行文是圓滑和細心的。正像毛後來承認的那樣[145]，這是一種巧妙的描述，特別是論及土法煉鋼運動的（前一部分的）最後一節：

>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20億元），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146]。

有失有得這種提法，顛倒了通常的語序，毛認為這是話裏帶刺，意在強調土法煉鋼運動在財政上造成了巨大損失，產出卻是不切實際、無法量化的。幾年以後，彭聲稱他本來用的是通常的語序，然而打印的時候被人弄錯了。他沒有推測這裏面是否有預謀。不過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他當年並沒有為此做公開辯解。而且，當這封信附在他的《自述》（譯按：指《彭德懷自述》）中於 1981 年出版的時候——《自述》的出版，是為彭恢復名譽的措施之一——，「有失有得」的語序仍然沒有變更。[147]

彭信的後一部分談的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這種提法本身又是一種對領導的不敬，因為在政治局，做總結是主席的特權。接下來，彭的評論真正擊中了要害，儘管他以一個貧窮的國家需要通過躍進來解決大量的經濟問題這樣的話來作為開頭。他承認，經驗的缺乏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失誤，但接著又寫道：「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那樣得心應手」，這似乎是在暗示黨和政府都不如人民解放軍高明。[148]

在彭看來，首要的嚴重問題是普遍存在的浮誇風氣——對此他追溯到 1958 年 8 月的北戴河會議，和對糧食產量的過高估計。這導致了一種錯覺，認為糧食問題已經解決，注意力可以轉向工業建設了（這是直接由毛提出的重點轉移，儘管彭沒有詳加說明）。無論如何，大煉鋼鐵運動是出自一種膚淺的認識：

> 我們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149]

這段話的重要之處，不僅僅在於其作者具有一定的眼光，指出了土法煉鋼運動造成的全國性混亂。人們應當記得，彭的閱歷、經驗和所負的職責都不足以使他有資格來做這種權威性的分析。他的描述所能夠依據的，僅僅是兩次在廬山出席國務院會議時收集的資料，以及

在此之前陳雲對鋼鐵工業的分析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與新華社共同彙編的資料。這些彙編資料，是毛本人當年早些時候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對大躍進的有關評論的直接產物，曾為這次廬山會議的召開而在領導人中散發，為的是事先向他們做扼要的情況介紹。[150]換言之，在廬山，對毛和其他按要求看過會議材料的人來說，彭的評論並沒有什麼獨到之處或能夠令人吃驚的東西。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彭的其它一些敘述，如胡亂對待秋收，一些幹部頭腦發昏，認為共產主義即將來臨等。[151]上一年秋天在武昌，毛曾親自敦促要克服烏托邦思想。[152]

想必在毛的心目中，彭的真正罪行是詳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帶來的所有災難，然後含蓄而又明白無誤地把責任歸在它最終應當歸屬的地方——主席身上。彭提到了毛的號召——把衝天的幹勁同科學的分析結合起來，兩條腿走路（如現代化煉鋼和土法煉鋼並舉），少種、高產、多收，15 年趕上英國，等等——，認為這些號召被曲解和濫用了。廬山的與會者都知道，這些號召不過是扳機，扣動扳機放號令槍的是毛自己。彭應當能夠意識到，他的信無異於一份對主席的起訴書，儘管他後來否認這一點[153]。難怪他寫這封信時感到緊張。

此外，彭使用了一種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毛只許自己用於他人而他人還未曾施諸於毛的方法來攻擊毛澤東。元帥把過去 12 個月來的「左」傾錯誤歸因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154]——這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式的譴責，大概更帶有張聞天那樣的知識分子氣味而不能反映彭德懷的質樸品格。這樣的用語顯然出自列寧的論述：「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帶有無政府主義的氣味」。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這位蘇維埃領導人曾用這樣的話來譴責背叛者。[155]這本書很可能是彭讀過的有限幾本馬列經典著作當中的一本。具有諷刺性的是，在革命的早期歲月，最先向彭贈送這本書的人就是毛自己，書的封面還附有毛的題詞：「欲使中國革命獲得勝利，此書非讀不可。」[156]

總之，不管是誰啟發了彭在廬山使用這種形容詞，對於這位毛澤東思想的創始人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者而言，沒有什麼比被人冠以「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的帽子更令他惱怒了，何況對方根本是個理論新手。[157] 正像彭很快發現的那樣，這一時期的毛已經處於這樣一種狀況：自我批評尚能做到，但別人的批評難以接受，對於嘲弄更無法容忍。

毛的反擊

彭的信送出以後，隨即發生的一系列事是至關重要但又忙亂不清的。根據彭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交代，在 7 月 17 日毛認真讀信之前，這封信（的複製件）已經被分發給與會者了。如果情況確實如此，主席當然會採取最後措施了。對一封個人信件可以對付過去，而對一份政治局委員署名的會議文件——特別當它以致主席的信的形式出現的時候，則需要進行公開的駁斥。有跡象表明，彭的「交代」，是由那些拘捕他的紅衛兵虛構、口授給他的，以顯得他對毛的批評比實際情況更有挑釁的味道。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過一本閱讀範圍受到一定限制的關於彭德懷問題的文件彙編，其中刊錄了毛在「意見書」上做的一個署名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批示的落款日期是 7 月 16 日。彭在他的《自述》中說，當時，事先並沒有告訴他這封信要予以公佈，當 7 月 17 日會議秘書處開始分發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標題的會議文件時，他感到震驚。在 7 月 18 日的小組會上，他曾徒勞地要求把信撤回。[158] 這些情況意味著毛讀過信，並且還直觀地感覺到彭除了在小組會上發表個人意見外，在其它場合大概也不過多地隱瞞自己的觀點；毛決意接受這場面對面的挑戰。

但是主席沒有馬上回擊。可能他有意要等待時機，看彭能得到什麼樣的支持。周小舟和 7 月 18 或 19 日到達廬山的黃克誠，講話的大膽程度和彭相近。7 月 20 日，張聞天就經濟問題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這些意見，他在準備一篇會議講話時曾和彭討論過。隨後，在

21 日，張用同樣的調子又作了 3 個小時的發言。後一次的會議發言，張事先沒有通知彭，因此元帥沒有到場聆聽。但彭知道情況後，當晚就要張把講話稿送來看看。[159] 張的這些講話，顯然沒有在會上印發。[160]

如果不瞭解張聞天講話的內容，要想推斷這些講話在多大程度上挫傷了毛是不可能的。但關鍵的問題不在於這些講話的內容，而在於講話人本身。像張聞天這樣一個謹慎的政治家，一個沒有一群明顯支持者的人，在被排除於核心領導層之外沉寂了多年以後能夠有足夠的膽量向毛公開挑戰，這必然意味著他對自己的言論會贏得普遍支持這一點抱有自信。毛面臨的危險是，彭和張的創議可能會激起更難以對付的人出來大膽講話。

因公務纏身而留在北京的外交部長陳毅，曾給張聞天打來電話，表示祝賀和鼓勵，——6 年以後，在接待一個外國代表團時，陳毅這樣回憶處於大變動時期的 1959 年的形勢：「國家的情況很緊張……許多煙囪不冒煙；工廠沒有機器；我們的錢也用完了。」[161] 難怪陳毅想通過討論來解決問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根據國內主要經濟學家們的分析，也準備了一份關於躍進問題的總結發言稿。那份由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計委及國家經委副主任薛暮橋和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為薄起草的原稿被薄拋棄了，因為他發現風向不對頭。所以，薄作了支持大躍進的講話。如果薄拿出來的是原稿，再加上他職務所具有的權威，那麼，可能會有更多中國領導人改變觀點，同意失大於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是犯了極大錯誤的看法。[162] 可以確信，財政部長李先念一度也為彭所影響。[163] 毛根據自己的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一些同志正在動搖」[164]。為了防止任何進一步的連鎖反應，主席決定立即採取行動。在張聞天馬拉松式的講話過去兩天以後，毛反擊了。

7 月 23 日上午毛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是一次卓越的辯論表演，意在招攬自己的支持者和震懾彭德懷的同情者。[165] 這個講話既掩蓋了

現實問題，又嘲弄了對現實的批評。為了使聽講者消除怨氣，主席做了自我批評，但同時也暗示自己將不會單獨「承擔責任」。這些話足以使他的合作者確信有進行自我辯護的必要，也足以告誡那些潛在的反對者，使他們意識到他們有對付反擊的艱巨任務。他呼籲團結，並隱晦地暗示：如果處於孤立，他就可能大力出擊，收起共產黨的整個攤子。

為了鼓舞自己的支持者，毛把那些批評意見痛斥為「糊塗」，並解釋說，自己已經在會議上沉默了 3 個星期，因為「他們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人們越要聽。我已經告訴同志們，我們應當頂住，硬著頭皮頂住。頂多久呢？……有的同志說這是『持久戰』。」毛同意這一點，又加上了一句更能激勵人的論斷：這樣的同志是多數；中國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166]

在論及這一點之前，毛還把持批評意見的人視為兩年前被痛斥過的「資產階級右派」。他先提起了羅隆基，一個與彭德懷有私交的資產階級右派。隨後，又提到了另一個右派人物，藉此強調確有一種隱藏的威脅存在，自己並不是在講缺乏根據的離題話。毛認為，如果大量的批評意見公佈出去，人民將會起來推翻黨。隨之而來的，「就是資產階級國家，資產階級的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也不過是誇張」。[167]毛的嚴厲冷嘲看來引起了普遍重視。他決心把批評意見看作原則問題，彭的同情者們應該當心。

毛隨後變換話題，談起當年早些時候反對「共產風」運動的事情。由於曾經再三表示自己屬於中間派，所以毛能夠相當具體地指出：問題出在縣和公社一級幹部身上，並已經很快得到了解決。[168]他毋須提醒與會者注意，對「左」傾觀點的抨擊是在自己領導下進行的。進一步說，他完全沒有必要提這件事，因為彭指責的主要是當初關於成立人民公社和發起群眾煉鋼運動的決定有問題。至於六中全會以後的糾正措施，彭談得很少，因為他缺乏切身體會。[169]

接下來是給「動搖者」以更加明確的告誡，毛認為一旦他們表現出動搖的樣子，實際上可能已經上了彭德懷的船。這一次，舊事重提，談及過去黨內的爭端，這是一個更為明顯的暗示：他打算把彭德懷列為另一條不正確「路線」的領導人。首先是大棒，然後是胡蘿蔔——呼籲團結，這對於那些動搖者來說，無論對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同事，都是離開彭德懷回到毛的懷抱的合適借口。主席提醒從事經濟計劃制定工作的人，他對他們在大躍進前由於反冒進而受到的批評，處理如何寬大。[170]這些人因其知識和經歷，一看上去就最有可能支持彭德懷。現在毛要他們報答自己。

毛站住陣腳後，隨之就談到具體問題，首先是公社食堂。奇怪的是，這個題目彭在他的意見書中沒有涉及，儘管他在西北小組會上的一次發言中扼要提到過打破私人飯鍋用以煉鋼的事。[171]毛謹慎地避免提及使用這種強制的方法逼迫農民加入集體食堂的事，他只是表示贊成自願加入食堂，轉而集中講食堂的組織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是由張聞天提出來的）。他輕鬆地承認困難，並表示即使有三分之二的集體食堂需要解散也不奇怪。然而，毛重申他對集體食堂的信心，並且嘲笑在科學院領導下進行的調查對缺乏豬肉和髮夾的表面現象的關注。「無論是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子都有錯誤。我也看過列寧的手稿改得一踏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改？」[172]

最後，毛講到核心問題：人民公社的形成，大煉鋼鐵運動和大躍進的總路線。他承認對所有這些問題負有責任。

> 一個是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建議的，我下的決心，其結果九千萬人上陣……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建議之權。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一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以後新聞記者要離開。[173]

毛提到那位運氣不好的記者表明，主席不準備單獨承擔 1958 年錯誤的責任。提到大煉鋼鐵，毛承認他負有決定性的責任，但又明確

提出這個想法是由他信任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提供給他的。[174]煉鋼運動引起了生產和運輸的脫節，毛把這種情況歸咎於自己缺少知識，也歸咎於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沒有做好工作。而且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也必須對公社化的速度和過高的農業指標分別承擔一些責任。[175]此外，通過將一些省如河南、四川、湖南、湖北、雲南、上海戴上「左傾」帽子——毛使那裏的領導會認識到他們將不得不與他站在一起，否則他們的錯誤將被攤開示眾[176]。「同志們」，毛說：「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177]

毛以一種特有的幽默的方式作了總結，他提醒他的聽眾說馬克思也有急躁的毛病。聽眾中的一個支持者隨聲附和道列寧也犯有同樣的錯誤。毛斷言政治運動不能算經濟賬，他繼續說：

> 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否會像 1927 年那樣失敗？像二萬五千里長征？大部分根據地喪失，蘇區縮小到十分之一？不能這樣講。現在失敗沒有？到會同志都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不是，是一部分失敗，多付了代價，刮了一陣共產風，全國人民受了教育。[178]

簡而言之，毛的觀點是得大於失，而彭，不管他的實際表達方式怎樣，則是失大於得。毛承認了大多數的錯誤以便使他與元帥之間的對立集中到一個評價問題上：人們應當怎樣作出判斷？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毛使他的同僚們明白，他們要在他與彭之間進行選擇，而這種選擇，可能對他們本人，當然，也將對黨具有關鍵性的政治意義。在某一時候，毛似乎準備接受會議的一致意見：「如果我犯錯誤時你們抓住了我，你們可以懲罰我。」[179]但是，在另一時候，他向彭德懷的支持者——元帥和將軍們提出了較為坦率的告誡：「如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180]在會議期間的另一場合，毛說了一段話（7 年後彭德懷還能逐字記起），——毛甚至更加威脅道：「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跟隨彭德懷走，我就去打游擊。」[181]毛的

最後通牒表明了他把彭的挑戰看得多麼嚴峻。就是在這個時候，毛似乎準備必要時就摧毀國家機關，他最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走了這條路。

但在那個時候還不需要這樣做，因為毛是當然正確的。面臨著在毛與即便是彭德懷這樣一個革命元勳之間的嚴竣的選擇，資格較老的軍人們除了倒向主席之外別無其他辦法。尤其是，在主席一邊顯然有劉少奇和周恩來總理支持【182】。將軍們已經意識到支持彭德懷意味著不僅向革命隊伍的始祖挑戰，而且向他們歷來遵從的黨和政府挑戰。這不是他們應付得了的戰役。

彭德懷的不幸在於他選擇的書面形式。文筆不是他擅長的武器，運用它做分析觀察不是他的長處。如果是彭德懷而不是張聞天，在全體會議上發表了3個小時的演說，以樸素的語言闡述了對大躍進的看法，效果可能會引人注目。左右搖擺、猶豫不決的人可能為他的個人魅力所傾倒；主席肯定得處於防禦地位，失去從容準備謹慎構思答覆回擊的機會。實際上，彭後來說，他選擇書面形式是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亂」。

結果卻是，毛作為會議主席，實際上剝奪了彭德懷回應的權利【183】毛拒絕接受彭德懷的同志間的合理批評，並報復性地決定將他排斥到權力圈子之外，彭因此大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毛公開說：「我少年中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肚子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到現在也不放棄。」【184】當彭德懷逐漸明白這是毛的最後通牒時，他以粗陋不敬的方式爆發出這樣的話：「在延安，你罵我四十天娘，現在在廬山我罵你十八天娘，你就來制止我，這不行。」【185】但是，這場戲是由比彭德懷更有權力的人導演的。帷幕落下來了。【186】當帷幕重新拉起來時，一場新戲又開演了。

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會

與毛的對立不可避免地帶給彭德懷莫大的精神壓力。他沒有食慾，很少談話。他躺在床上，枕著雙手，憂鬱地凝視著天花板。他的警衛員不清楚他的意見書和他這種表現之間的聯繫。警衛員接受了醫生的意見，認為彭生病了。但是元帥痛楚地說:「你們在檢查我什麼呀？我沒有病。如果我病了，現在沒有任何東西能醫治。」最後，彭的隨從參謀把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警衛員，警衛員感到困惑不解，為什麼彭的政治問題不能通過自我批評得到解決。為什麼不能這樣呢。

隨後彭的警衛員得到指示，他不能再隨便進入會議廳。以後連續幾天，彭德懷都參加了會議，他似乎越來越疲憊，他平常紅潤的面色變得蒼白了。晚上回來的時候，他就呆在自己的住所，不看電影，甚至放棄了晚間散步的習慣。其他元帥常常來看望他，但是現在他們不再是笑聲朗朗了。他們顯得憂心忡忡，坐下片刻就離開。彭的警衛員終於認識到形勢是多麼的嚴重。[187]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會召開了，彭德懷的命運懸而未定。

毛在 8 月 2 日主持召開了第八次全會，191 名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有 147 名出席了會議。會議日程有兩項，修改生產指標和解決「路線問題」——或曰對彭德懷和其他持不同意見者怎麼處理。[188]毛再次機敏地推敲了他的講話，他強調了他的反對派的弱點，避開了他自己見解中的弱點。

他簡要介紹了修正生產指標問題，強調這是在 4 個月前舉行的上一次全會上初步討論過的一個問題；給人的印象是這個問題一直在討論。毛現在受新近公佈的 1958 年產量數字衝擊後，不急於修改降低過高的生產指標。在上海會議上，一些人曾「建議修改這些指標，儘管大多數人不同意」。換句話說，毛對 1958 年在武昌召開的六中全會上制定的過高指標不負全部責任，同樣，堅持這些極端不切實際的目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毛把這些過高的指標說成是「自己立的菩薩自己拜，現在還得打破，打破不合實際的指標，鋼、煤、糧、棉

等」。但如果降低1959年的生產指標，同時就必須慚愧地承認1958年的產量數字是荒謬的浮誇，在毛的講話中沒有提到這一點。然而，在彭德懷的意見書中主要批評的恰恰就是由大躍進的氣氛滋生的浮誇行為。[189]

毛把話題轉到他的批評者身上，他說，他不明白他的反對派說人民由於壓力不敢講話是什麼意思（這話不盡不實）。事實上，他們不是利用廬山會議「攻擊和破壞了總路線嗎？」他進一步指責他們忽視了9個月來他主持制定的反左措施，但是他絲毫沒有提到他們對大躍進本身的批評。最後，毛繼續呼籲團結——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團結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對彭德懷和張聞天要堅持嚴肅批評和寬大處理相結合的態度；「……對人要有情，但對錯誤的東西應當是無情的，那是毒藥，要有深惡痛絕的態度」。[190]

與這次具有政治家風度的演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同一天給張聞天寫信，嘲笑他的攻擊，對張的勇氣表示懷疑，冷淡地駁回了張提出的面談的要求：

> 你幹嘛要使自己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這次你有什麼意圖？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然而一展覽，儘是假的。講完沒兩天，你就心煩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住脫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認為你是舊病復發……現在有什麼辦法呢？願借你同志之箸，為你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來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願意談，近日有些忙，請待來日。先用此信，達我悃忱。[191]

與毛在會議上的講話相比，在這封信中，他對彭德懷和張聞天向他的權威提出的挑戰更顯露出了不可容忍的憤怒。在見諸公開記載的場合[192]，毛則採取通情達理的態度，居然熱情祝賀國家計劃委員會過去的一個級別較低的官員李仲雲，勇於越過官僚主義的條條渠道，直接把一個全面的「高度中肯的」批評大躍進期間的計劃工作的意見書

送到中央委員會。[193] 然而李仲雲對毛來說不是威脅，彭德懷——儘管他後來聲明他基本上也一直是在批評計劃制訂者——卻截然相反。[194]

蘇聯的聯繫

毛在他反擊時間的選擇上是幸運的。國際事件幫助他把彭德懷的形象塗上虛假的油彩。6 月 20 日，彭德懷結束東歐之行回來後不久，蘇聯就違背了他們向中國提供核武器技術的協議。[195] 根據赫魯曉夫回憶錄的記載，就在準備裝運原子彈樣品之前，蘇聯領導人舉行了一次會議，認為：鑒於中國的「混淆是非運動」和「種種難以置信的領土要求」，必須糾正他們的思想；「我們成了他們的順從奴僕，他們想要什麼我們就得給什麼，不管他們怎樣侮辱我們」。[196] 看起來這種與當時情況不合拍的言論提前反映了赫魯曉夫在中蘇分裂時使用的語句。對中國人的好鬥性的害怕（由毛在莫斯科的講話和台灣海峽危機得出的印象），幾乎理所當然地在 1959 年違背協議的決定中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赫魯曉夫大概決定犧牲與中國的已經惡化了的關係，以求得與美國和平共處的可能性。

7 月 23 日，毛反擊彭德懷和張聞天的那一天，尼克松副總統到達莫斯科參加美國第一次在蘇聯首都舉辦的展覽的開幕式。[197] 儘管在展覽期間出現了著名的「廚房辯論」的尖刻交鋒，這次訪問仍代表了美蘇關係的突破，鞏固了已經明顯出現的緩和傾向，並預示了赫魯曉夫兩個月後對美國的遊說之行。後者的訪問，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 7 月中建議的，宣佈於 8 月 3 日，正好是在廬山中央全會開始之後。[198]

這些新情況，與尼克松 8 月 2 日從莫斯科取道華沙回國途中受到波蘭人的隆重接待聯繫在一起[199]，也許使毛和他的許多同事感到生氣。赫魯曉夫的政策在共產主義集團的全球戰略方面代表了一種不同於中國觀點的意見。在核技術領域內，它已經出賣了中國的利益。無疑，這些事件削弱了像彭德懷那樣的人的地位，因為他們堅持強調與蘇聯在軍事和外交上的合作。

但是，赫魯曉夫使毛澤東批評彭德懷和張聞天的工作更加容易進行並令人相信。7 月 18 日，在波蘭城市波兹南，蘇聯領導人強烈攻擊了關於公社的想法，聲稱 20 年代在俄國追求這種想法的人「對於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理解少得可憐，也不知道怎樣去建立共產主義」。很明顯，這種譴責也同樣適用於針對 50 年代的中國。

在由波蘭電台廣播的這個講話的文本中，關於公社的那一段被刪掉了。7 月 21 日，蘇聯和波蘭的宣傳媒介又拿出一個新的講話文本，其中包含對公社的攻擊。赫魯曉夫的攻擊打破了蘇聯領導及其新聞媒介保持了 6 個月的休戰狀態。據一個學者說，赫魯曉夫的講話的發佈方式，聽起來像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演習。[200]

大概是中國在莫斯科的大使館把赫魯曉夫的攻擊講話用電報傳回了國內。毛對這個天賜良機的反應，是在 7 月 29 日散發了 3 份與赫氏講話有關的文件，占首位的是來自紐約的台灣中央新聞社的報道。顯然，他想展示那些批評人民公社的人，是如何支持中國的敵人的。在一個簡潔的註釋中，毛嘲笑了批評者，指出中國和蘇聯在有關公社的試驗方面有很大的差異。[201]

但是毛顯然想做得更好些。毛注意到赫魯曉夫的議論可能會引起一些帶民族主義色彩的怨恨，因為經過毛前兩年的一些攻擊——如成都會議時那樣——在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心目中，蘇聯的整體形象想必已經受到了損害。不過，蘇聯仍然是「老大哥」，是共產主義集團當然的領導。更不用說蘇聯是中國主要的軍事盟友和貿易夥伴了。毛自己承認，在武漢會議上就開始對公社進行一些調整，以此來安撫蘇聯。[202] 面對蘇聯領導人——包括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和蘇聯總理——對公社的公開譴責，儘管不是直接的，中國方面總難輕易地置若罔聞。

這種考慮也許能解釋為了對付赫魯曉夫，毛為什麼在 8 月 1 日尋求中國黨內一位主要的蘇聯問題專家王稼祥的幫助。[203] 王，像張聞天一樣，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當中的一個，這些人在 30 年代初期結束了在蘇聯的訓練，回國後控制了中國共產黨。王早年就是政

治局委員，但上述政治關係嚴重地損害了他自己。遵義會議上他站在毛的一邊，為毛在會議上以及之後取得領導權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是毛多年以後承認的，但即便如此，在 1945 年毛和他的支持者控制了整個局面的黨的七大上，王稼祥仍然被降為中央候補委員。儘管毛沒有賞識他的歸順，一年以後他去蘇聯治病的時候還是為毛做了一件重要的私事。在毛的同意下，他安排毛的前妻賀子珍從伊萬諾夫斯克的精神病院中被釋放出來，並把她和她親生的女兒安置在哈爾濱。由於王有蘇聯訓練的背景，再加上他為毛做的事，所以他在 1949 年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任駐莫斯科大使。同年，他被恢復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資格。[204] 在廬山會議上，毛再次把王拉入他的一邊，並極力使張聞天處於孤立地位。張是另一個前駐莫斯科的使節，毛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赫魯曉夫的觀點進行自衛。

事實上，赫魯曉夫精確的時機選擇是起了反作用的。他攻擊公社的講話打破了六個月的休戰狀態，發表在彭德懷講話之後，張聞天講話之前，在廬山會議與會者看來這似乎不是巧合。彭和張的攻擊畢竟來得很突然，3 個人之間是否存在著密謀？難道 3 人中的兩個中國人——至少是彭德懷一人，他是出名的直言不諱——在他們不久前訪問蘇聯時向赫魯曉夫透露了他們對公社和大躍進的不滿？也許他們表示了想在一個適當的場合發言的意向？難道這就是為什麼蘇聯外交人員不顧一切地想知道廬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原因？[205] 彭幾乎肯定是無可責難的，他與外國人密謀來干預中國國內的事情似乎完全不可能。但是，元帥也許給赫轉達了毛在第二次成都會議上對人民公社的批評並陳述了他自己的意見。這些信息對赫來說就是攻擊的材料。不管彭與蘇聯領導人是否有聯繫，在廬山會議上確有足夠的理由提出懷疑。也許因為缺少證據，在譴責彭與張的決議中對合謀一事隻字不提的原因。[206]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散佈的材料說，彭在他 1959 年的蘇聯之行中與赫魯曉夫接觸時有失當之處。這至少表明毛有借口傳播對彭的懷疑，損害他的聲譽。[207]

彭德懷的孤立

對人民公社的評論所引起的國際波瀾，也許能說明彭在政治局的黨政同事為什麼無法緩和毛的反擊。廬山會議前期，在彭發出他的信以後至毛於 7 月 23 日發動他的反擊之前，劉少奇和周恩來本來完全可以進行調解，共同表明他們個人對毛的支持，並呼籲對彭不要採取不必要的過分措施。彭無疑將受到處分，但是沒有必要把他推到政治荒漠中去。對彭的批評，可作為魯莽、過時以及不針對現實的言談不加理會。

關於毛的其他的主要同事，在任的政治局常委，有兩個缺席，陳雲在大連休養沒能來參加會議。當他隨後被告知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他的反應是：「為什麼彭德懷在這個時候寫這封信？」很明顯，他立刻就意識到，在他正試圖引導經濟政策走向正軌的時候，彭德懷事件將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208】鄧小平在廬山打乒乓球時摔壞了腿，因而不得不離開廬山。【209】

其餘兩名政治局常委都是元帥。但是，不能指望林彪為彭講話。這一點林也許很清楚。毛立意使他成為彭的接班人，（接任國防部長）彭的意見書似乎加速了這個過程。【210】此外，林和彭之間長期存在不和，甚至在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就存在分歧。【211】另一個元帥是朱德，彭的朋友和棋友，他是政治局核心內部唯一一個願意為彭辯護的成員。【212】他勸解道，「如果有人想說些什麼的時候不應該懼怕『左』和『右』，讓他們說吧。如果像我們這樣的人都不說話，那麼誰還敢說話？」朱自己就批評過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但他不掌握實權。也許是由於他的反對以及其他一些元帥的努力，確保了彭所受的處罰比毛原來設想的要輕。當中央委員會關於彭以及他的「小集團」的決議通過之後，朱再次進行干預，說：「他犯了錯誤，做過自我檢查，也就足夠了，我們應該團結他。」【213】由於輕率的干預，朱也做了自我批評。據某省一位主要負責人觀察，這件事為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追加了理由。【214】

對於其他人未能像朱德這樣出來為彭說話，應作何解釋呢？[215]首先，當毛的火氣大起來的時候，估計人們是不願反對他的。毛責罵起來，冷嘲熱諷、夾槍帶棒、語言粗俗，全然不給人留情面。[216]他怒氣勃發，意圖報復，人們何苦為一個不識時務、重提舊事的頑固同事犯險呢？[217]

參加廬山會議的每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是這麼想的，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然而，我們大膽推測，對於劉少奇而言，他保持緘默則有更為具體的原因。彭德懷對毛的批評，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廬山，也是對劉的一種威脅——無論是對他個人還是對他的職位。

劉在大躍進中曾是毛親密的支持者。1958年他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確實是一個關鍵性講話，由此發動大躍進。另外，劉對發起人民公社運動持默認態度，並熱情探究集體生活的可能性。到1959年夏天劉也像彭德懷一樣瞭解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對群眾生活造成的衝擊。[218]但是任何詳細的對1958年大煉鋼鐵得不償失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劉的批評。確實，劉像毛一樣瞭解，對農村發生的災難性轉折事件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這也許正好解釋了他為什麼像毛一樣在廬山攻擊新聞界，因為新聞界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期間不負責任地報道了領導人的講話。[219]劉也許害怕會受到壓力，讓他把新近得到的國家主席的職位讓給更為中性的人物，比如黨內元老朱德或者董必武，以作為自我批評的標誌。畢竟，周恩來18個月前也曾因為類似情況，被迫放棄對外交部的領導。[220]劉在黨內的職位同樣可以想像受到了威脅。據說彭曾在一些場合擁護輪換黨的副主席職位的主張，那時的副主席（排在前面的）是劉，接下來便是周恩來、朱德、陳雲和林彪。[221]所以，這樣的情況也許不會令人感到驚訝：7月23日下午，緊接著毛的反擊性講話，劉建議把會議文件收集起來，作為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小冊子加以散發。[222]

既使劉不必被迫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彭德懷的挑戰如果成功的話，也能夠向他提出嚴重的制度方面的問題。首先，作為毛的繼承人

選，劉也許希望繼承黨的主席職務，從而在制定政策方面佔有優勢，雖然在使用這種特權時無疑會受到很多約束。但是，假如廬山會議通過了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決議，那麼，決策工作肯定得向更大範圍的領導層開門，肯定得向全體政治局開門，還有可能使中央委員會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其次，彭德懷的勝利將對黨的領導在國家結構中的合法性以及黨的凝聚力構成嚴重的威脅。元帥以及他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部下無疑會被承認：他們與中國的現實聯繫得非常緊密，是中國人民最有權威的代言人——因為他們通過應徵入伍的士兵與基層群眾保持著聯繫。根據高崗的理論，確實有可能出現派別分裂活動：在紅區黨與白區黨之間，紅區黨基本上是解放軍精英；白區黨，主要是由劉少奇領導的北方局的地方幹部構成，他們在敵後做地下工作。還有周恩來和他的部下，戰爭期間他們在重慶工作。【223】

有趣的是，劉少奇在廬山的幾個講話後來被紅衛兵揭露出來，主要是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他生氣地聲稱，他接手黨的領導的權力比彭大，再就是他支持毛關於高崗事件是理解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活動的主要線索的觀點。毛在廬山上曾口頭發問，「到底是高饒【224】聯盟還是高彭聯盟？也許人們會說是彭高聯盟？」【225】雖然劉過去偶爾也高度讚揚彭個性剛強、覺悟高以及沒有架子。但在這個關頭他的看法是：彭是高饒聯盟中「餘孽」。確實，在以後的場合，劉曾表示彭在廬山的批評並沒有錯，但又說作為高饒事件的一個參加者，他沒有權力發言。【226】在毛和劉的辯解中到底有多少真實成分現在仍無法肯定。

在確信會議沒有動搖自己的地位的情況下，劉似乎對廬山上發生的一切沒有表現出不安。在毛反擊彭以後，會議休會期間，劉曾下山去，重訪他早年——大概是 30 年以前——從事革命活動時到過的地方。他感到很高興，陪同他的江西省黨的幹部注意到了這種變化：「平時，少奇同志不喜歡多說話，這時他的話多起來了。」【227】與此相反，在休會期間，毛的私人秘書們卻默默地、悶悶不樂地在鄉村中漫步。

他們清楚毛做了什麼事。在漫步中，毛的主要秘書田家英——他的前任是陳伯達——寫了一首詩：

四面江山來眼底，
萬家憂樂到心頭。[228]

周恩來雖然過去也與彭德懷爭論過，但他不像劉少奇那樣害怕對大躍進的批評。無論周怎樣忠誠地參與推動了這場運動，他和他的主要管理經濟事務的部長們以往畢竟反對過「不顧後果的躍進」，並且期望通過這種批評從政治上得到尊重。[229]如果周不能鎮靜地看待對劉的地位的打擊的話，他也許就不是正常人了。但是毛的威望是另一回事。當廬山上的爭論更加激烈時，沒有退路的毛的反對派們，從個人意氣出發，譴責毛為「晚年的斯大林」、「獨裁和專橫」，「自負輕信，偏聽偏信」，「認為毛有點像鐵托」，沒有人能對他說話，而只有他才有資格當領導。他「堅持自己的錯誤直到萬不得已，而僅在那時他才知道他必須轉彎了，如果他轉彎，就一定是轉個一百八十度的彎」。[230]

隨著廬山會議的進行，支持彭德懷和他的同伴越來越意味著反對毛本人。對周恩來來說，自 1935 年遵義會議以後，他整個革命生涯的特點就是支持毛和他的觀點[231]；對他來說，走反毛的路，政治上看是不可思議的，在心理上也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在廬山，周維護了大煉鋼鐵運動，反駁了彭德懷的批判。[232]

這樣，劉少奇的雄心和周恩來的忠誠使毛得以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強烈譴責一個革命骨幹，一個共事了 30 多年的老戰友，以捍衛自己的地位和威望。由於受辱於彭德懷的魯莽及種種暗示，毛放棄了集體領導，這至少部分地說明認為他像斯大林那樣專橫的看法有些道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第一次任由自己武斷地使用個人的權力。由於沒有能夠加以制止[233]，劉和周為毛更大程度地濫用權力鋪平了道路，這才有了日後的文化大革命。廬山會議使延安的「圓桌」出現了裂縫，而文化大革命徹底打碎了它。

彭德懷的命運

但是，在 1959 年，個人的專權仍然是有限制的。不尋常的是，彭起初的反應是堅持己見。他有點天真、急躁，認為毛不顧多年的同志關係，甚至沒有把他找去談談，解釋一下他的信出了什麼錯。但是，在毛實施反擊的後一天，兩個沒有透露姓名的同志跟彭談了兩個小時。他們強調了那些彭已經開始明白的事情，那封信已不再是主要問題了，他應該考慮一下整個的形勢。換句話說，毛的威望比彭的命運對革命更重要，是否公正的問題似乎沒有被提到。他們勸說彭同意他們的看法，並在中央委員會裏做一個徹底的，實際上是誇大的自我批評。這樣做之後，他就不會受到敵視。當然，他的軍隊中的同事，或者說，他在黨內的許多同志將會感到難過。處分將是不可避免的。彭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把他的部下召集到一起並告訴他們，他不可能再擔任國防部長了，他將放棄他政治局委員以及副總理的職位，以便能回到家鄉去種地。他接著說，「我給主席作了三條保證：永遠不當反革命；不自殺；自食其力。」[234] 在毛看來，這三條保證中不自殺是最重要的。如果彭德懷這樣一個受人愛戴的軍事英雄被迫結束他的生命，那麼，一個憤怒和厭惡的浪潮很快席捲軍隊和黨。對毛的信譽來說，元帥的自殺將比一打意見書具有更大的衝擊力。[235] 彭還得給自己的妻子做工作。她在幾天前來到廬山度假，結果聽到這個災難性的消息，他丈夫的事業結束了。[236]

雖然八屆中央全會通過了決議，說「彭德懷領導的反黨集團」是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繼續和發展，並譴責他們長期的活動，目的在於分裂黨。不過從政治上考慮，僅僅剝奪了小集團成員的行政職務，而沒有剝奪他們黨內的職務。彭失去了國防部，但是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的頭銜。張聞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副部長職務，保留下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位。其他兩個與彭和張連在一起的小集團成員，黃克誠和周小舟，分別丟掉了總參謀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但都得以留在中央委員會內[237]。黃和周與彭的交談，使他們被劃

人這個集團，被認為是向彭、張提供了策劃密謀的可能性。黃和周的真正罪過也許在於為彭在廬山的意見提供了材料。

彭從廬山回到北京，危機過去了，他重新開始他正常的生活，他早上打太極拳，晚上散步，起居飲食和睡眠習慣逐步走上正軌。他的警衛員注意到，唯一的變化是他又開始抽煙了。

9 月 9 日，彭給毛寫了封短信，再次承認他的錯誤，並要求准許他去學習和到人民公社參加勞動。毛對信的調子感到高興，他下令把信傳達到各級黨組織，但是考慮到彭的年紀，不同意他去人民公社。學習，間或去工廠和農村轉一轉，將是彭恢復體面的辦法。[238]

最後，在 10 月份，彭離開他在紫禁城中南海的居所，搬到一所破舊的住宅吳家花園。毛澤東和劉少奇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住在中南海。吳家花園位於北京的北郊，在圓明園區域內，他在這裏度過以後的 6 年。離開前，彭交回了他的元帥制服、狐皮大衣以及他房間的裝飾品，如地毯和畫。他帶走的都是書，聲稱他將像農民那樣過簡樸的生活。他拒絕了為他配護士和總管的安排。從現在起，他要擦地板、洗衣服，補自己的衣服。他僅僅保留了自己的隨身警衛員。[239]

一開始，生活顯得有些孤獨。彭的妻子浦安修，在北京師範大學裏有較高的職位，只有在星期天她才能來看望他。他的鄰居是少數莊戶人家，他的警衛不讓這些人進來，直到彭威脅著要寫信給毛，問題才算解決。[240] 但是彭自己卻勸阻政治局的醫生傅連璋不要前來探望。彭說，「我現在的家是個是非之地，從現在起，你不要來這裏，我感謝你來看我。」傅不明所以，後來向周恩來提出疑問，一個共產黨的領導怎麼會變得那麼怪癖？據說總理含淚回答，「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是無情的，永遠不會奉承任何人。請記住，人民擁有最高的判別能力。」政治上天真無知的傅醫生顯然對這句話還是不理解。[241]

同時，彭致力於建立一個小實驗農場。他砍掉灌木，種植果樹、小麥、蔬菜和瓜類植物，深挖了水塘，並撒了魚苗，栽滿了荷花。他還養了豬、鴨和小雞。他試驗了所有報紙和電台上推薦的農業技術，

以便看一看這些誇大的宣傳是否有根據。在他的身份暴露前，他急切地向當地農民求教，以致有人問他是否來自農業研究所。

彭德懷的鄰居知道他的身份後，就常和他來往。有一個母親帶著她生病的孩子前來，顯然相信彭用手按一下就會把孩子的病治好。彭喜歡用中南海送來的影片款待他的農民朋友。在糧食短缺的「三年自然災害」(1959-1961 年) 時期【242】，彭德懷把許多匿名送來的食品分發給他的農民朋友和警衛人員。

但是彭的主要活動是學習，這對一個一直未讀過什麼書的人來說是生活方式的巨大轉變。【243】他從中南海帶來 20 箱各式書籍，一本也不願丟掉，滿滿堆置在他的新居裏。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也給他找書讀，他不時去黨校聽課。他名義上還繼續享受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的待遇，仔細地閱讀重要文件。(另外他享有參加國慶和其他正式慶祝活動的權利，但是他從來沒有參加。)【244】

至於張聞天，他比彭習慣於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只是不允許他發揮才能。8 月 18 日，張離開廬山之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告別便條，這意味著毛沒有寬容他，也沒有接見他，告訴他今後的去向。毛對那張便條的自我批評精神表示歡迎。同一天，他指示把那張便條印發給參加那次會議的全體人員。【245】次月，在一次外事工作會議上，陳毅宣稱張的態度比彭好。也許陳感到在鼓動張起來表態這件事上內心有愧。【246】由於張再三要求，他才被允許到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作一名研究人員，集中研究社會科學理論。後來張的同事都盛讚他勤勉、博學、謙遜。【247】

所謂彭德懷集團的另一個在地方工作的成員，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完全銷聲匿跡了。直到 70 年代後期粉碎「四人幫」之後，他的遭遇才被外界知曉。【248】他的職位的接替者是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但長期得利的人卻是那時還不出名的在湖南工作的華國鋒。1977 年，華國鋒成為黨的主席兼國務院總理，達到了權力的頂峰。張平化回憶：廬山會議上，在毛個人的推薦下，華國鋒被提升為湖南省委的

一個書記。[249]如果毛澤東確實關心起省裏一個比較次要的幹部的事件來了，那麼可以推測華的提升與彭德懷事件有關；或許華向毛匯報了彭德懷在韶山的動向，以及他與周小舟的來往，助了毛澤東一臂之力。毛可能原先就賞識華國鋒，因為華在任湘潭縣委書記時，就把所轄的韶山——毛澤東的故居地——修建成了全國的聖地。[250]毛在廬山會議期間採取提升華的行動，表明華的提升與彭德懷的被清洗有某種聯繫。

但在當時，華國鋒的提升只是一個次要的事情。當時還沒有跡象表明湖南省委書記這個職位將為這個可靠但平凡的官員提供繼承毛澤東、周恩來位置的跳板。[251]廬山會議後，一時最主要的政治問題是它對軍隊的影響。

廬山會議對解放軍的衝擊

一位革命英雄的被貶黜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對軍隊的處置不得不謹慎行事。的確，如果彭德懷像所說的那樣，深深地捲入了高崗事件，那他當時為什麼能逃脫嚴厲的指責呢？理由可能是他剛從朝鮮載譽而歸，譴責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員，這在政治上是不能想像的。

在劉少奇 9 月 17 日以國家主席名義正式簽發林彪取代彭德懷的命令之前，毛澤東不得不在 8 月 18 日至 9 月 12 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向高級幹部們解釋這個情況和其他高級軍事幹部的調動。[252]毛在廬山提出問題後，陳伯達在一篇文章中幫腔說：「像彭德懷這樣一個昨天的功臣，為什麼今天成為禍首？」[253]幾星期後，國防部長被罷黜。這勢必在軍隊將領中引起疑問和不滿。對此，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不得不做出回答。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總結中作了回答：彭德懷決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毛澤東引用彭德懷早在 30 年代的講話來證明他的論斷，把彭德懷當時的講話散發給

與會者，以向他們證明元帥的資產階級觀點。毛澤東指出，彭德懷信奉的是自由、平等、博愛，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不分左和右。[254] 毛澤東甚至把彭德懷與非共產黨人士孫中山比較，認為彭德懷的革命熱情不如孫中山。[255] 在會上還散發了毛澤東 1943 年的一封信，批評元帥關於民主教育的一次講話，以證實毛澤東不是在廬山才突然發現彭德懷的錯誤思想的。[256]

在總結中，彭德懷被指責為混進黨內的沒有改變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機會主義者[257]，也就是陳伯達說的，組織上入了黨而思想上沒有入黨。這些都證明給彭德懷及其支持者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是合適的。有意思的是，陳伯達也感到有必要為毛澤東缺乏度量的指責進行辯解，聲稱這樣做是為了無產階級，為了人民，為了革命的利益。[258]

像在廬山一樣，毛澤東嘲笑彭德懷對大躍進的具體批評：如抱怨女人的發卡、雨傘等商品不足。再一次提到在廬山會議前的多次會議上，彭德懷沒有暴露自己的思想。[259] 為了給廬山會議的參加者敲警鐘，毛澤東強調，要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國家，維持鐵的紀律是極其重要的。[260] 毛澤東打擊的主要目標仍然是彭與蘇聯的「聯繫」，雖然在他的講話中暗示很多，明確論及之處很少：

> 絕對不可以背叛祖國，裏通外國……我們不許中國的黨員去破壞外國的黨組織，挑起其中一部分人去反對另一部分人，同時我們也不許任何人背著黨中央去接受外國的引誘。[261]

但比上面列舉的罷免彭的種種理由更重要的是，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猛烈批判之後彭表示屈從的事實。他 9 月 9 日的悔過書前面已經提到過。毛澤東指示把這份悔過書印發所有與會者，並在上面寫下了一些表面看來寬宏大量的評論：如果彭德懷態度誠懇，在政治上不再有大的動搖，那麼他將「立地成佛」，確切地說是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僅在一個問題上彭德懷立場不變——他堅決否認存在任何陰謀「篡」黨的「軍事俱樂部」。毛澤東在給張聞天的信中最早提到了這個

俱樂部。據彭後來回憶，當時會議上對他施加壓力，要他承認這一指控，這等於逼供。有些與會者可能受到林彪的鼓動，嘲笑彭頑固，說「不要再欺騙我們了」。彭德懷發了脾氣，並且反擊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罷！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罷！」[262]

彭德懷讀了陳伯達給毛的信和9月份在黨內發行的《內部參考》上有關經濟的文章後所做的筆記表明，儘管他承認了錯誤，但他仍然確信自己在廬山會議上作的分析是正確的。10月，他嘲諷了那種用篡改國家統計局數字來證明大躍進沒有破壞國民經濟的比例或平衡的企圖，他寫道：

> 這些專家同志和陳伯達同志，我相信他們的動機都是純良的。可是，睜著眼睛硬不看事實，任性地憑主觀想像出發，帶著放大鏡去找合於自己主觀願望的材料，總想客觀事物會照著他們的主觀願望，可是它偏不聽話，它照著自己的規律運動和發展。

此時彭已經不擔心自己的評論與外交扯上關係，他的言辭甚至比在廬山時更加嚴厲。他認為人民公社的共產風導致農民的家禽牲畜大量地被宰殺；「農村的勞動生產熱情立即下降，農村人口盲目外流，造成當時社會現象混亂」；有人說，農村公社化是一個早產兒，「據我看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大煉鋼鐵運動帶來的農業大歉收所造成的破壞和損失無法估計。就其自身而言：「這次全民性的煉鐵，實際上是一個普遍性的大破壞。損傷人民元氣的破壞，要有幾年甚至十幾年才能恢復。」[263]

這些評論20多年後才公諸於世。但是，儘管彭德懷在公開場合表示承認錯誤，毛似乎也不能從別的元帥那裏獲得什麼支持。例如後來是彭德懷專案組的代理負責人的賀龍，在他受到周恩來指責之前，他都沒按中央指示發表反彭的講話。[264]至少有一個大軍區的司令員公開表示了對彭德懷遭罷免的憂慮。[265]毛只能引用一位元帥的講話——劉

伯承，劉伯承明確地說彭德懷脫胎換骨是必要的，這大概是對彭的忠告。[266]

然而，彭德懷的罷黜不是將領們心懷不忿的唯一原因。他們像老上司一樣，對劉少奇的提拔，對他有預謀的「篡取」黨的領導權表示不滿。無怪乎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的講話中充滿了辯解的口氣。他為不久前政策的改變開脫說，沒有一個領導是絕對正確或者沒有出過或左或右的偏差的[267]，制訂政策就像航行目的地是莫斯科的飛行，一會朝這個方向，而後又朝另一個方向。[268]很可能就在這個場合，劉少奇捍衛了大躍進中的領導（同時當然也捍衛了他自己的領導）：

> 過去一系列的革命運動是毛主席個人領導的。他所領導的這些運動不是沒有缺點，但如果由別人領導，可能會有更多的缺點和錯誤。可不可能呢？我自己認為是可能的。即使在毛主席領導下，也出現了一些缺點。沒有毛主席的領導，缺點錯誤是否會更多呢？[269]

劉少奇關心維護的不僅是毛的行為，而且是毛的威望。他說，長期以來，「無產階級領袖人物」的威望沒有「資產階級領袖人物」的那麼高。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領導人陳獨秀的威望沒有孫中山的威望高。甚至毛的威望也沒有蔣介石的高。[270]這就暗示40年代劉和其他人建立毛的個人威望是政治上的需要。關於這一點，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3年前就明確指出說：不再需要人為地樹立毛的威望了。[271]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似乎也同意這個觀點。他提出，不要再喊「萬歲」，再唱《東方紅》了。[272]

但是，安子文和劉少奇發言的背景是不同的。安子文是在黨的八大上為了說明為什麼要把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從黨章中刪去時提出這個問題的。這是為了使中國順應蘇聯集團的非斯大林化所採取的一個姿態。在1956年削弱毛的威望，劉本人可能是樂意的。[273]但是在1959年他有不同的想法了，他不得不向軍隊強調他不贊同對他自己的

個人崇拜。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為了說明這個觀點，他告訴與會者，與他過去支持對毛的崇拜相反，現在他贊成提高周恩來、鄧小平及彭德懷的繼承者林彪的威望。[274] 換句話說，劉少奇主張促進集體領導。他說，任何人，不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本人或是林彪，如果犯了錯誤，人們都可加以反對，這就意味著他傾向於比較開明的領導作風。[275]

但是劉少奇並不是完全處於為自己觀點進行辯解的地位。他反擊那些說他是城市知識分子帶有高崗氣味的影射。他反駁道：毛自己是個城市知識分子，卡斯特羅和當時阿爾及利亞解放鬥爭的領導人本·貝拉也是。甚至與會的官員們也有部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是要維護自己對領導權的繼承地位的：

> 一旦毛主席有別的事情要做或生了病，中央決定由我代理他的職務。我也相信我能代替他。我看不出有什麼是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勝任他的工作的理由。到這種時候，我是不會推讓的。[276]

劉的講話可能沒有使與會者信服，幸虧毛澤東、林彪是站在他的一邊。當時主要問題不是劉的陞遷，而是彭的罷黜。在這個圈子裏，林彪得起到毛的副手的作用，在解放軍中揮舞大棒，以體現他職務的晉陞。在9月11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277]，林彪堅決支持毛對彭德懷的強硬處理：

> 我們共產黨人遵循的一個原則就是通過鬥爭解決矛盾，堅持鬥爭哲學是我們黨具有朝氣和立於不敗之地的保證。[278]

林彪譴責彭德懷犯了5次路線錯誤，在個人野心的驅使下，左右搖擺，最後倒向右的一邊。（飛往莫斯科的可不是彭德懷！）林彪當面對彭德懷告誡說：「你必須下台，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這樣做對你本人對黨都是有好處的，這使你有可能改正錯誤。」林彪提出採取這種嚴厲措施的一個理由是：如果彭的右傾機會主義不被粉碎，毛澤東一旦逝世，「那麼準會出現更大的問題」[279]。這個含糊不清的論點顯然在

廬山會議上很有影響。這似乎是說，如果不讓彭德懷下台，那他就可能成為最高領導的嚴重挑戰者，至少是反對劉少奇的核心人物。當時的局勢讓劉和林結成同盟。

鑒於軍隊幹部對廬山會議的決議缺乏熱情，毫不奇怪，毛澤東和林彪感到不僅要用軍隊系統以外的人來取代總參謀長黃克誠（被指控為彭德懷的主要同謀），而且要罷免與原國防部長（彭德懷）有聯繫的一些將軍，這些人對新任國防部長的忠誠頗成問題。[280]

新任的總參謀長羅瑞卿有許多有利條件，他與彭德懷的關係不明顯，雖說在戰爭年代他們共過事，但羅瑞卿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批評過彭。[281] 多年以來，羅瑞卿在工作中與毛澤東聯繫緊密。[282] 在戰爭年代，羅瑞卿曾任野戰軍的政委，但 1949 年他就任公安部長時形成了不同的機構。他還兼任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的司令員和政委，這樣的職位給了他能力和權威，使得他能夠處理軍隊內部潛在的不滿。最後，他的經歷使他具備條件，成為加強軍隊政治教育和政治控制的理想人物，彭過去一向重視軍隊的專業化。[283]

軍隊的另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有變動，如洪學智、李達、肖克、鄧華等將軍。洪學智將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朝鮮戰爭中在彭的麾下干了同樣的工作，在黃克誠（兼）任總後勤部部長時，他任副部長，洪學智 10 月 14 日被解職。[284] 兩位國防部副部長李達將軍和肖克將軍被調到無足輕重的崗位。李達將軍調到他的老司令員賀龍元帥手下任國家體委副主任。肖克在他長征時的老戰友王震手下任農墾部副部長。李達將軍在朝鮮戰爭期間曾一度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的參謀長。肖克將軍受到冷遇可能因為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訓部部長，是彭使軍隊專業化的主要執行人之一。[285] 鄧華將軍是瀋陽軍區司令員，在朝鮮戰爭中是彭德懷兩個副司令員之一，他被調到四川，擔任一個不重要的職務。[286] 有諷刺意味的是，鄧、洪及肖諸位將軍都和林彪共過事，彭德懷在朝鮮指揮的志願軍的鄧、洪主力部隊，原來是屬於林彪的第四野戰軍的。

看來這些職務的繼承者都是經過精心選擇的。1959 年任命了 4 名新的國防部副部長。陳賡是朝鮮戰爭時的另一位副司令員，他的被提升是為了平息參加這場戰爭的老將由於彭和鄧華被罷免而流露的不滿情緒。劉亞樓已經是空軍司令員，從 20 年代起他就是林彪的親密助手，後來林彪的兒子在空軍能獲得很高職務也決非偶然之事。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雖然是林彪的湖北同鄉（譯按：許世友系河南新縣人），但與林彪沒有明顯的聯繫。第四位副部長粟裕在 1958 年台灣海峽危機之前是總參謀長，後來被黃克誠取代，恢復他的地位，目的在於暗示他上次被降職是彭德懷和黃克誠搞的陰謀，以博取這位有才能的軍事要員的感恩之情。新任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的經歷鮮為人知，但早年似在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工作過。新任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也是湖北人，但他與林彪沒有緊密的聯繫。[287]

陳賡和劉亞樓分別在 1961 年和 1965 年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前幾個月去世，但是另外 3 位——陳錫聯、邱會作和許世友都在 1969 年黨的九大上崛起，進入政治局。邱會作在 1971 年隨林彪一起倒台。陳錫聯因為早年與「四人幫」的關係，以及他在 1976 年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時所起的作用，在 1980 年倒台。許世友之後保護了鄧小平，在此書寫作時，依然是政治局委員。粟裕儘管獲得了新的頭銜，但在 60 年代早期並不大活躍，這大概是他為什麼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一個受尊敬的軍隊領導人和中央委員倖存下來的原因。

彭德懷攻擊大躍進，就為毛澤東提供了一個機會實現他經過長期考慮的計劃——把負責軍隊事務的權力交給林彪。[288] 同時，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運動，加上關於「軍事俱樂部」的謠傳，也為林彪按照自己的意圖改組軍隊高級領導層提供了理由。另外，廬山上彭德懷的發難和毛澤東的反擊為林彪提供了掩人耳目的背景，使他取代彭德懷的事情顯得比較自然，因而在他的同僚中沒有引起憎恨。

新上台的國防部長

新老國防部長之所以順利交接，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新任國防部長林彪是革命戰爭中走出的真正英雄。他可能是共產黨軍隊中最偉大的戰術天才。他出生於中國中部湖北省的一個小地主家庭，比許多老資格的同僚受過更多的教育。1925 年，在反帝鬥爭的激情中，林彪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通過這個台階，隨即又進入廣州市近郊的黃埔軍校，這是一個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支持下蔣介石訓練軍官的場所。軍官將派到軍隊中去，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從事統一大部分中國的大業。林彪 20 歲時，在蔣介石的北伐軍中任連長。1927 年國共關係破裂後，林彪是朱德的部下，他們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林彪很快成為毛澤東十分信任的人。[289]

林彪在世時，西方研究林彪的專家把他描繪為：

> 平靜、隱晦、寡言、冷峻、克制、審慎、機敏；克己很嚴，在有壓力時，常常深夜失眠，他很善於間接地從書本上、直接地從經驗中和從自己和他人的失誤中學習。他喜歡埋頭於自己的工作細節之中。凡事一經開始，便要堅持做完。同時，他顯然不是一個喜歡週圍的人公開宣揚奉承的「頭面人物」，他甘願身居幕後，願意在幕後工作，在大多數情況下，通過電話和手令傳遞自己的指示，把幹部叫到自己家中，而不去出席會議。[290]

毫無疑問，長期身體不好是林彪不大拋頭露面的另外一個原因。條件艱苦的長征損害了他的健康。1938 年春抗日戰爭時期，在山西省長城附近，他指揮了最著名的平型關戰役，幾個月後，他就負了傷，離開了前線。據說在同年晚些時候他身體已經復原，但他還是前往莫斯科去治療，在蘇聯呆了 3 年。1942 年回國後，他僅從事軍事訓練工作，或者和周恩來一起與國民黨打交道。但當內戰開始時，林彪再次出征，指揮第四野戰軍從東北一路打到中國的最南端。實際上林彪虛弱的身體很難應付緊張的軍務，1950 年，他沒有隨他的部隊一起去朝

鮮。到 1951 年年底，他的身體再度變糟，據說患了肺結核和潰瘍。直到中共八大，他才公開露面。[291]

儘管有表明林彪身體不好的以上情況，毛澤東還是選擇了林彪來掌握軍隊。有趣的是，當這個年輕的元帥建國後要在政治上直線高昇之前，1953 年，毛澤東為了預防不測，還是要林彪徹底地檢查身體。[292] 這就得出兩個必然的結論。第一，在國防部長這個位置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像林彪那樣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更確切地說，毛澤東認為林彪能對解放軍恢復政治上、方向上合乎要求的控制，林彪立刻進行了這個工作。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他勸他的同事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怎麼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呢？我向同志們建議，主要的方法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293] 次月，林彪在國慶十週年的紀念文章中又肯定了這一點：

> 軍隊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十分重要，是萬萬放鬆不得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這是我軍幾十年來在革命實踐中所證明的真理……我們的軍隊是為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軍隊……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做好，其他一切工作就都無從談起。[294]

第二，毛澤東大概認為國防部長太重要了，他甚至不惜讓一個長期的病號好歹試一試，以便完成好這個任務。眾所週知，毛澤東在他早年的革命生涯中就強調從政治上控制軍隊的重要性。[295] 他把 1935 年 1 月他接手軍隊的領導職務看作他接掌黨的領導權的起點，他利用這個位置，掌握了他名義上的上級，黨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這件事上，周恩來是他的忠實助手，周做了具體工作，使毛澤東從名義上的領袖成為真正的掌權者。[296] 彭德懷從朝鮮回國之後，由於處在重要的位置上，一直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考慮到彭德懷和毛澤東的關係，這就意味著黨的主席會感到自己不能真正地控制軍隊。可能事情的確如此。據說，彭德懷要求解散中央軍委。[297] 隨著林彪取代彭德懷，毛澤東事實上感到他又掌握了軍權。

再度發動躍進

彭德懷的失勢和軍隊領導層的改組並沒有解決大躍進帶來的經濟問題——正是這種躍進使元帥進了一言，恰恰相反，這次清洗正是經濟進一步惡化的直接原因。中國的最高領導層這時不是繼續緊縮計劃，而是認為必須重申 1958 年政策的正確性，以證明對持不同意見者實行紀律處置的合理性。儘管政府公開承認，在這些政策下，大大地誇大了統計數字，但還是要堅持執行這些政策。八中全會決議降低的生產指標計有：1958 年糧食產量的數字從 37500 萬噸減少到 25000 萬噸；棉花從 335 萬噸減少到 210 萬噸；鋼鐵從 1108 萬噸減少到 800 萬噸（估計有 308 萬噸是小土爐煉製的質量低劣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被迫相應地降低 1959 年的指標：糧食產量從 52500 萬噸減至 27500 萬噸；棉花從 500 萬噸減至 231 萬噸；鋼鐵從 1800 萬噸減至 1200 萬噸。[298]

大幅度地壓縮統計數字引起了新聞界要求以更大的步伐躍進的呼聲，這樣，使用 1958 年的老辦法也就不可避免。[299] 雖然廬山會議作出決議，要扭轉過激的偏向，但廬山發動的大規模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使幹部心有餘悸，不敢貫徹那個決議的精神。

新的躍進是毛自己在廬山發動的，在一個關於湖南恢復公共食堂的批語中他寫道：

> 不應該在困難面前低頭，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這一類新鮮事物是有深遠的社會經濟根源的，一風吹是不應該的，也是不可能的……孫中山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300]

幾天以後，在另一個文件的批示中，毛把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愷帆曾命令解散無為縣的公共食堂。[301] 在又一個批示中，他讚揚了遼寧省迅速採取的「反右傾，鼓幹勁」（即躍進精神）的部署，要其它省向遼寧學習。[302] 在會議結束之前，他指

示印發一本名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冊子。在前言中他寫道：「我們現在必須作戰，從三方面打敗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著重號為作者所加）[303]遵照毛的指示，在以後數週內，從省到縣開始了緊張的清查工作，很多右傾機會主義的高級幹部被揭露出來。[304]

8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批判右傾思想削弱生產幹勁的社論，其中引用了一段毛澤東1955年的文章[305]。隨後，公開的猛烈批判就從這個比較低的調子上開始了。以後幾天報紙發表了專題社論，指出：如果不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就不可能喚起群眾戰勝自然災害和奪取豐收的熱情。

> 還有少數幹部在克服了主觀主義的毛病和強迫命令的作風以後，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對於在大躍進中已經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組織領導生產運動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和增產技術措施，也不去積極推行，放鬆了領導。[306]

在這一階段，警覺一點的幹部都會回憶起毛澤東1955年的文章，從而意識到一個新的經濟高潮正在興起。[307]直到8月26日，當《人民日報》刊登了廬山會議決議和對周恩來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報告的報道後，中國老百姓方才知曉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至少這給當時的黨員一個信號：右傾機會主義不單是一個洩氣的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308]當然這也意味著，如幹部們對強制性的生產命令不作出反應，將嚴重威脅自己的政治前途。9月17日，單從公佈彭德懷及其同僚被解職的消息，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至於公開批判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在當時是沒有必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才進行。

下一步，反擊右傾的內容是重申大躍進的主要特點。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人民公社萬歲》的長篇社論。結尾部分公然表明：質疑人民公社這個組織形式的人是要倒楣的：

> 任憑國內外敵對勢力怎樣咒罵和破壞，任憑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怎樣指責和反對，任憑嚴重的自然災害怎樣襲擊，

人民公社都沒有垮台，我們因此也有權利說，它將永不會垮台。[309]

3天以後，報紙轉向為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唱讚歌。《人民日報》富有詩意地寫道：「現在祖國大地佈滿了各式各樣的鋼鐵廠，鐵水奔流，鋼花四濺」。[310] 9月中旬，這家報紙又反擊那種認為大躍進破壞了經濟平衡的「荒謬論點」，隨後讚揚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這種食堂是彭德懷嚴厲批評過的。[311]

但是在連篇累牘的渲染背後，也承認了一些實際情況。廬山會議決議承認，農村的大煉鋼鐵運動妨礙了糧食增產。決議還認識到，在歉收年景，不能再從農業方面調出大批勞動力；決議建議，土法生產鋼鐵的問題以後由各地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決定，產品留在原地使用，不列入國家計劃。[312]陳雲的工作沒有完全白廢。

中國領導人撰寫的紀念1959年建國十週年的文章，使報刊上讚美詩式的合唱達到了高潮，增強了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的力量。當大多數高級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對此問題多少抱超脫態度時[313]，兩個兼有省一級黨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身份的人加入了捍衛群眾性的工業運動和公社化運動的行列。曾提出群眾煉鋼運動的設想，受到毛澤東稱道的上海市領導人柯慶施，駁斥了那種脫離黨的領導、脫離政治、脫離群眾辦工業的「謬論」，說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錯誤就在於無視人民群眾在建設事業中的熱情和首創精神。他還鄭重地指出，右傾機會主義者實質上是反對黨的總路線，因為黨的總路線的出發點就是依靠人民的無窮力量。[314]

曾在廬山會議上批評過彭德懷的四川省領導人李井泉更是堅決地捍衛人民公社，他說：右傾機會主義者斷言人民公社辦早了，這完全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違背了事實；[315]解散公社食堂是「絕對錯誤的」。[316]根據中共中央1958年北戴河會議做出的決定：

我們完全有根據地設想，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內，大部分地區的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

> 民所有制，是可能辦到的。在這個任務實現以後，人民公社將進一步擔當起由社會主義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任務。[317]

這一號召的結果是：春天退給農民使用的土地，秋天又收歸集體所有了。

在柯慶施之後，廣東省第一書記陶鑄也為大躍進再度鼓氣，以激發幹部和農民因疲勞而失去了的積極性。陶鑄說：雖然是不流血的鬥爭，但在這個時期也要發揚革命精神，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場更深刻、更廣泛、更持久的鬥爭。與之相反，革命意志動搖就會躊躇，反映在有些人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信心。他嘲笑那些「穩健路線」的擁護者經受不住任何壓力：他們在革命群眾運動面前指手劃腳，不允許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一點差錯；他們有一點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望，但不準備付出一點代價；一旦遇到某些困難，他們就長歎一聲，裹足不前；在暫時缺豬肉和肥皂時，他們就否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陶鑄的文章以激勵的筆調結尾：

> 我們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一定要有像岩石一樣的堅定。想想那海岸邊的岩石吧！你看它們，有的矗立著，有的蹲伏著，有的指向青天，有的面對大海……它們曾經經歷過多少次狂風暴雨的侵襲，它們曾經忍受了多少遍驚濤駭浪的衝擊啊……但是它們屹然不動。當風雨過後，當浪濤退後，它們仍舊矗立在海邊，指向青天，面對大海……我們應該學習岩石的堅定。[318]

黨經受住了天災人禍。大躍進恢復了，問題越來越多，結果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第四編

戰敗

第十一章 中蘇分裂的出現

中印邊界之爭

1959年9月對彭德懷的清洗，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標誌。而同月晚些時候尼基塔·赫魯曉夫訪華，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9月30日，這位蘇聯總理抵達北京機場，參加中國的國慶十週年慶祝活動，正如他對前來迎接的態度冷淡的中國領導人所說的那樣，「我剛剛訪問了美國，回到莫斯科，實在地說，就是剛下飛機就換上了另一架」[1]。當著中國東道主的面，赫魯曉夫開始兜售剛剛在戴維營會談中得到最後確認的和平共處方針。也許他自認為談一談也無妨。幾年後他回憶道：

> 我不得不承認，在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時，我對北京之行完全失去熱情。我知道，對我的正式禮遇會按慣例執行，但是不能指望我會受到像1954年首次訪問北京時那樣的兄弟般的款待。我們同中國的親密關係已經失去，取而代之的是我一到達便能感覺得到的冷漠。[2]

赫魯曉夫指出中印邊境爭端是理所當然的。中國方面在翌年公開透露，他們對蘇聯全球戰略總方針的不安與日俱增。蘇聯人對中印之間不斷升級的爭吵所持的態度，正是這種戰略的一個具體表現。這種戰略深深地傷害了中國的民族感情。

在5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印關係是友好的。兩國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和周恩來曾經互訪，周恩來在新德里受到歡迎，人們高聲讚頌印度和中國的兄弟情誼。1954年，雙方簽訂了一項體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議，它為解決英國給印度遺留下來的在西藏通商及

其他權益問題掃清了道路。遺憾的是，到最後雙方都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使印度和中國西藏的邊界確定下來。[3]

雙方對東部的邊界是有爭議的，但是問題基本上是可以解決的。印度人堅持從英國人那繼承下來的由麥克馬洪線所確定的邊界。而據北京方面說，麥克馬洪線是帝國主義的殘餘物，歷屆中國政府都不承認它。但是周恩來指出，中國準備承認現實並接受現狀。周的姿態含有一種暗示，雙方應就確切的邊界線進行談判並正式簽訂協議。但是周並沒有詳細說明。在尼赫魯這邊，他寧願讓邊界線維持現狀，並且設想如果周並不急於解決這個問題，那麼就可以推想中國人接受了印度人確定的邊界。

此後，周在 1956 年對新德里的訪問中，沒能提出中印應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並簽訂協議，也許是因為尼赫魯對這個問題也保持沉默。中印邊界中麥克馬洪線部分也許會較為容易地解決，但是周預見到解決西部邊界將存在困難。兩國的版圖對這段邊界的領土主權有著不同的解釋。這時，中國方面從新疆到西藏西部的公路已建成一半，其中有 100 英里穿越了印度宣稱其具有主權的阿克塞欽地區。這條公路對中國其它地區與西藏的聯通是至關重要的。這部分是由於從四川穿山越嶺進入西藏東部的公路十分艱險。更重要的原因是，西藏康巴第一次叛亂的教訓說明，由四川入藏的公路很容易被切斷。如果周坦率承認中國正在建造這條由新疆到西藏的公路，中國需要這個有爭議的阿克塞欽地區，也許能促使尼赫魯同意放棄這個印軍邊界巡邏隊從未進入的荒涼地帶，印度對這個地帶實際上只有其版圖上的關係(但是周和尼赫魯也許同樣都認為不必去挑起雙方都認為不存在的問題)。如果尼赫魯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並開始派出軍隊去確保印度的權利，那會使正在築路的中國人感到難堪。事實是，中國出版的地圖引起了印度政府的關注，最終促使它於 1958 年 7 月向這個地區派送巡邏部隊這才發現有這樣一條公路存在，這種發現的方式使後來邊界談判困難重重，而使中印雙方都蒙受損失的邊界武裝衝突導致了談判的失敗。

尼赫魯發現這條公路後大為震驚，促使他採取了斷然的政策，在整個邊界地帶派駐了巡邏部隊。1959 年春天西藏的叛亂在印度輿論界引起的反響，以及後來達賴喇嘛逃到印度一事堅定了尼赫魯的決心。同時，中國軍隊也逼近邊界線，以切斷西藏地區叛亂者的逃亡路線。8 月 25 日，當一支印度巡邏部隊在麥克馬洪線中國一側的郎久建立哨所時，雙方軍隊相互交火，一名印度士兵被打死，另一名受傷。正是這次事件最終導致中印邊界爭端第一次公開化，並迫使蘇聯對此採取公開立場。[4]

塔斯社聲明

據中國人宣稱，9 月 6 日，蘇聯駐北京代辦聽取了中國政府對衝突事件的詳情介紹。乍一看來，蘇聯人沒有理由不接受中國方面的觀點，雖然這個觀點明顯地與中國對印度的政策的評價是聯繫在一起的，而這個評價與蘇聯目前對印度的看法並不一致。中國人宣告，是印度政府挑起了衝突以反對共產主義的中國，他們警告蘇聯不要上尼赫魯的當，「尼赫魯正在利用蘇聯向中國施加壓力」。

9 月 9 日早晨，蘇聯駐北京的代辦向中國人提交了一份有關中印邊界衝突的蘇聯塔斯社聲明的副本，此聲明擬於次日發佈[5]。這也許就是蘇聯作家在後來談到的莫斯科採取「外交和其它渠道在恰當時間表明立場」的例子[6]。聲明描繪這次事件是「令人遺憾的」，並指出，蘇聯將維持與中國（「在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偉大原則基礎上」）和印度（「遵循和平共處的設想」）的友好關係。據報道，蘇聯領導層表示相信，「兩國政府將會消除出現的誤解……」[7]

塔斯社的聲明很顯然沒有偏向任何一方，持這種騎牆態度的主要原因是再明顯不過了。實際上，聲明的前半部分並非針對事件本身，而是針對這一事件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聲明堅持認為，這次事件被一些人特別是美國人所利用，他們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企圖「阻礙緊張局勢的緩和並使事態複雜化」[8]。4 年以後，俄國人

則指責中國人抱著破壞和平共處的目的，於 1959 年挑起了同印度的武裝衝突。[9]

已故的蘇聯領導人 (赫魯曉夫) 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清楚地表明，他是懷著渴望和緊張的矛盾心情，期待著他的訪美之行的。[10] 當時蘇聯新聞報道指出，赫魯曉夫把這次訪美視為蘇聯歷史及其國際外交上的一個轉折點，是對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同美國並駕齊驅、共同裁決國際事務的公開確認。[11] 而且，他顯然意識到避免美蘇之間爆發核戰爭的重要性。1959 年夏，他對美國一些州長以及隨後對一些蘇聯公眾這樣說道：

> 我國和美國是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如果其他國家之間爆發戰爭，是可以被制止的；但是，要是戰爭在美國和我國之間爆發，那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它。它將會在巨大範圍內釀成空前的災難。[12]

像諸如中印邊界爭端之類的節外生枝的事件，是這位蘇聯領導人最不希望出現的，這會給他的美國之行帶來損害。如果莫斯科發表支持中國方面的聲明，他就會因為美國當局敵視中國而受到可以料想得到的冷遇。要是莫斯科不發表任何聲明，赫魯曉夫在每一個場合下都會遇到要他對爭端表示態度的質疑。因此，需要一個不偏向任何一方的聲明，至少在他訪美期間能夠起到搪塞作用。[13]

上述的某些原因一定得提出來，以說明蘇聯人之所以不顧中國人的勸阻，堅持要發表塔斯社的聲明。據中國方面說，(蘇聯從未公佈過有關這件事的任何詳細材料)9 日上午，他們一見到塔斯社聲明，當即表示，他們希望莫斯科對邊界爭端問題最好不要發表任何評論。當天下午，為了使蘇聯人改變初衷，中國方面把周恩來前一天致尼赫魯的信的副本交給了蘇聯臨時代辦。同一天晚上，中國方面通知蘇聯臨時代辦，他們現已發表了這封信，並且說，請蘇聯政府考慮周恩來表明的立場，應當停止發表塔斯社聲明。[14]

周發這封信的時機，可由印度9月7日發表的關於邊界爭端的白皮書得到解釋。兩國總理間的信函往來開始於尼赫魯，他於1958年12月致信周恩來；周回了信，隨後尼赫魯於1959年3月22日再次致信。印度方面的白皮書透露了這些細節，並強調這樣的事實：在發生西藏叛亂和達賴喇嘛逃往印度的事件6個月之後，周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多事的6個月似乎是一個足夠的理由，要求中國總理同印方進行更多交流。相反，《人民日報》批判了「西藏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而周繼續保持沉默。[15]然而，當時的情況表明需要作出個答覆，中國必須表現出同印度方面一樣的關注於解決邊境衝突的態度。於是便有周的信件出現以及9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召開，討論邊界衝突。不過，事情的原委也可能是這樣的：中國方面獲悉蘇聯政府正在考慮發表一個聲明，並希望通過周遲到多時的覆信阻止蘇聯發表聲明。

無論動機如何，不論周的覆信，還是隨後該信的立即發表，都沒有取得預期效果。蘇聯人不僅沒有暫停發表這個聲明，用一定時間考慮中國的請求，反而在中國方面廣播了周的覆信之後不到6小時，便於9日晚間提前發表了塔斯社聲明，既甚至沒有等到10日再發表。[16]也許他們不願意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就塔斯社聲明進行更高層次的外交交涉，這種交涉可能使蘇聯的目的暴露無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方面所能作出的唯一反應便是於9月13日送交一份照會，認為「塔斯社的聲明將中蘇對於中印邊界事件的意見分歧公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印度資產階級和美、英帝國主義會對此幸災樂禍」。[17]

赫魯曉夫的策略沒有成功。在他的美國之行中，他未能逃避有關中國政策的提問，例如參議員對他的質詢[18]，艾森豪威爾則公開否定了蘇聯總理的要求，即兩國首腦同意不討論第三國的問題[19]。不過顯然，在戴維營會談中，赫魯曉夫千方百計避免談中國。[20]但即便這樣也於事無補，在訪美結束不久，國務卿赫特聲稱，只要蘇聯自稱是共產主義集團的領導者，它就應當對中國的舉動負有一定的責任。[21]在10月底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赫魯曉夫斷然駁斥了這種說法。[22]他對

赫特的怒氣，由於回想起訪問北京時同中國領導人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發生的分歧，更增添了幾倍。他一定意識到，已經沒有能力去影響中國，更不用說像國務卿赫特暗示的那樣去約束中國了。

赫魯曉夫在北京

儘管有所預感，一貫直率的赫魯曉夫在北京還是沒有閃爍其詞。在到達當晚的國宴上，他告訴東道主們三件事：他相信艾森豪威爾想要緩和東西方緊張局勢；和平共處是列寧所贊同的；雖然共產主義集團已經很強大，也沒有必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23]——這是錯誤的：「人民決不會理解也不會支持那些認真推行這條路線的人」[24]。毛沒有公開作出反應，這在如此重要的場合，又有如此重要的貴賓的情況下是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據赫魯曉夫說，即使在隨後的個人交談中，他的確居於相對次要的位置。中國方面的主角是外交部長陳毅[25]，在關鍵的 8 月，他很可能負責處理中印邊界問題，與此同時，他的政治局同事們正在廬山聚會，因此他最瞭解情況。

爭執發生在 10 月 2 日[26]。中國方面出場的是一個強大的陣容，其中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總理、朱德元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防部部長林彪，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第二號人物彭真，陳毅，以及書記處中的「蘇聯問題專家」王稼祥。赫魯曉夫的陪同者有，蘇聯頭號理論家蘇斯洛夫，外交部部長葛羅米柯，蘇聯臨時代辦也在座[27]。據 4 年後《人民日報》提供的簡要情況，中國方面介紹了對待邊界衝突的看法，譴責印度方面的挑釁，並說，「對印度反動派一味遷就是不行的」。據說赫魯曉夫對詳細說明置若罔聞，堅持說「打死人就是錯誤的」。[28]

後來蘇聯總理對當時情況的回憶更為生動：

>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方面決定讓陳毅出來對付我。對話很快就變得激烈而緊張起來。陳毅非常粗魯。我弄不清他的粗魯究竟是一種精心策劃的政治計謀，還是一種個人性格。[29]

也許陳毅的同事們之所以選擇他作為發言人，正是因為在所有人中，他和赫魯曉夫最相近，直言不諱，說話容易衝動，因此是最適於對付這位蘇聯總理的爭強好勝的論戰風格的人選。[30]

根據赫魯曉夫對當時爭論的印象，陳毅「脫口而出」:「你們怎麼可以發表這樣一個聲明呢？」——從中流露了北京對於莫斯科在這場邊界爭端中公開保持中立態度而產生的憤懣。陳爭辯說，尼赫魯是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支持中國。赫魯曉夫回答說，尼赫魯是進步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進步人士，邊界爭端無論如何也不值得訴諸武力，尤其當邊境線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劃定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陳毅緊接著這句話提出反駁，這片領土理應屬於中國，儘管在英國統治時期曾被英國人佔有；中國需要它（顯然是為了修路）[31]。赫魯曉夫再次站在印度一邊，要求中國領導人設身處地地為尼赫魯想一想，就會明白他為什麼會很自然地認為中國佔有西藏是一種潛在威脅。這種理由很難指望他的對手接受。說到底，赫魯曉夫根本不相信中國方面對邊界衝突的說法[32]，9 個月以後，當邊界發生了更大的流血衝突時，他在布加勒斯特告訴彭真說：「我知道什麼是戰爭。既然印度死了人，這說明是中國進攻了印度。」[33]

隨著陳毅的發言，不滿蘇聯在爭端中持中立態度的一系列抗議照會，於 1959 年 12 月 10 日至 1960 年 1 月 30 日接連 6 次遞交到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手中。對此，在 1960 年 2 月 6 日的答覆中，俄國人指責中國人對印度的態度是「狹隘的民族主義」[34]。

在引退的年月裏，赫魯曉夫回憶這次爭端時這樣寫道：「我認為，毛挑起中印爭端僅僅是為了把蘇聯也拉下水。他想逼我們處於被動，除了支持他而外，別無選擇。他想由他來決定我們應該做些什麼。」[35]實際上，沒有跡象能夠證明，1959 年秋中國方面的言行可以被解釋為馬基雅維利式的（譯按：馬基雅維利，中世紀意大利政治家，主張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而赫魯曉夫的多慮卻的確表現了他的無知和猜

疑，這樣的無知和猜疑正是當時中蘇領導人之間關係的特色。這種互不信任已經逐漸侵蝕中蘇聯盟的機體。

在赫魯曉夫方面，他指責中國人好戰[36]、口是心非[37]、民族主義[38]。他自認不能理解諸如「百花齊放」和大躍進等中國國內許多政策的邏輯。[39]這類政策會引起東歐國家的共鳴，估計這是他更加擔心的事情。後來他確實回想起，為了阻止一向非常忠誠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發動本國的大躍進，他花了多大力氣。[40]

中國方面則懷疑赫魯曉夫正在出賣他們，為了蘇聯而犧牲中國的民族利益。中印邊界爭端不是唯一的問題。蘇聯對台灣的態度也激怒了中國人。在美國，赫魯曉夫未能使這個海島排除在一項關於放棄使用武力的條約之外。[41]當他在北京的時候，這位蘇聯總理私下說，台灣問題不僅能夠以軍事手段而且能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後來，蘇聯宣稱，它僅僅是在附和中國人的想法，因為他們在 1956-1957 年曾經表示願意同國民黨人再次組成統一戰線政府，並在其中給蔣介石一個高級職位。[42]

這種多少有些不坦率的解釋將 1957 年以來中國對台政策的變化[43]掩蓋了起來，而蘇聯人對這種變化是瞭如指掌的。赫魯曉夫顯然關注著台灣海峽出現的任何會給蘇美關係帶來影響的危機，因為美國堅持認為蘇聯對中國的舉動負有一定責任。據中國方面對這次私下會談的更為全面的記載（赫魯曉夫的回憶錄對此未置一詞），蘇聯總理說：

> 在國際時局中，台灣問題是一個不安定因素，這是因為美國支持的緣故，其結果是造成大戰迫在眉睫的氣氛；蘇聯的立場是要創造一切條件，以緩和國際緊張趨勢，並消除戰爭。[44]

中國的反應是堅定而明確的，實際上反應已經作出。在 10 月 1 日國慶慶典上，即赫魯曉夫同陳毅對話的前一天，國防部長林彪說：

> 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的領土、領空和領海主權的完整，必須受到尊重，中國人民以這種方法或者那種方法解放自己的領

> 土台灣和沿海島嶼、完全統一偉大祖國的願望，一定要得到實現，外國不得干涉。[45]（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中國人不準備在領土完整問題上妥協，儘管有莫斯科的請求。只要有必要，就會訴諸武力。

除了領土考慮，中國公眾對赫魯曉夫準備按照「戴維營精神」「支持」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的領導人的程度感到明顯的懷疑和憤慨。一年以後，鄧小平在共產黨領導人莫斯科高級會議上說：

> 當赫魯曉夫公開說艾森豪威爾得到美國人民的全力支持的時候，用外交禮儀的需要就難以說得過去了，或者可以說，赫魯曉夫是在不明智地美化艾森豪威爾和其他帝國主義分子。[46]

在美國之行以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赫魯曉夫在國際問題上對列寧主義的忠誠已經是大可懷疑的。

北京進行痛苦的重新估價

在其後的6個月裏，中國領導人開始研究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觀點與共產主義集團和中國全民利益的關係問題，這些觀點是赫魯曉夫在北京同中國領導人私下交換意見時提及的。在1959年的後幾個月裏，中國方面發表了一系列評論文章，使分析進一步深入。隨後又通過1960年初的一些高級會議（1月上海會議，2月廣州會議，3月杭州會議[47]），在4月列寧誕辰90週年之際，北京發表了重要的論戰文章。

1959年的後幾個月中，中國報刊評論文章強調美國軍事活動日益頻繁，它在東亞區域的軍事實力與日俱增，在老撾和東南亞條約組織國家地區佔有重要的地位。北京分析美國的戰略說，美國作出的任何一種和平姿態都是和它的所作所為相矛盾的，這種姿態不是「戰爭煙幕」，就是「侵略政策的偽裝」。美國的真正目的是填補導彈武庫不足的缺陷，鞏固它在世界範圍裏的軍事聯盟及軍事基地體系，增強其進行有限戰爭的能力。一位西方分析家評論說，中國報刊的文章似乎故意過分渲染了對中國的威脅，其實在暗示，蘇聯陣營的地位是通過衛

星的發射和第三世界的有利局勢而得到，也可能由於行動的錯誤而喪失。[48]

中國分析家們提出了兩個主要論點，第一是帝國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敵視是不可調和的：「總而言之，人們可以從鐵的事實中看出，儘管美國外交政策出現了一定的策略變化，美國的基本政策仍然建立在兩個策略上（一方面積極準備戰爭，另一方面又高喊和平口號），兩者有一個共同目的——毀滅社會主義。」第二是，與赫魯曉夫所說的相反，美國領導人大多數反對而不是贊成和平共處。[49] 更精彩的是：中國人反覆引用毛對帝國主義的評價：

> 「帝國主義是非常兇惡的。」那是說它的本性不會改變。帝國主義分子決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直至他們滅亡。[50]

如果說此刻中國人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改變還抱有幻想的話，而當10月31日赫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作正式報告時，這些幻想就被他關於和平共處政策的強有力的闡述打消了。這位蘇聯總理重申他的看法，盛行於西方世界的觀點是，目前大國間勢力均衡，這意味著必須消除戰爭的可能。他重申「為了和平相互讓步」，並宣稱這不是放棄原則，而是倣傚列寧在1918年同德國人簽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時表現出的靈活性。他提到托洛茨基冒險主義者反對這項條約時，顯然是在暗示應當把毛歸入這一類反對分子。這位蘇聯總理列舉國際關係中真正緩和的證據，顯然是要駁斥中國關於帝國主義的「煙幕」的斷言。更直接與中國有關的是，赫魯曉夫表示，蘇聯在中印邊界爭端中繼續堅持中立的立場[51]，爭端在他訪華之後又進一步加劇起來，死了更多的人。[52] 更令人吃驚的是，他還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鬥爭問題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聲明支持戴高樂總統的停火建議。他的動機顯然是要在他次年春天訪法之前改善法蘇關係的氣氛。[53] 對於一貫強烈反對戴高樂計劃的中國人來說[54]，這更是赫魯曉夫準備背叛朋友和同盟以討好西方的證據。

一個月以後，12 月 1 日在匈牙利黨的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赫魯曉夫對毛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更為直接的，但依然還是含蓄的攻擊。「如果我們變得驕傲自大，如果我們在自己的領導中犯了錯誤，如果我們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中曲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導，這些錯誤就會被共產主義的敵人所利用，就像 1956 年所發生的那樣……」這顯然又是對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攻擊。在國際問題上，赫魯曉夫一再強調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基礎上的團結的必要，「比方說，我們的鐘錶都要彼此分秒不差」，明顯地是在要求社會主義陣營的外交政策應當與莫斯科保持一致，並聽命於莫斯科。[55] 在代表大會會下，赫魯曉夫顯然更激烈地批評中國領導人[56]。

北京卻漠視赫魯曉夫對團結的呼籲。陳毅打算承認的只有一點，即認為隨著共產主義陣營在經濟上取得優勢地位，帝國主義和平地下台，這種情況為時尚遠。[57] 在 12 月同一次文化工作會議的講話裏，鄧小平號召不斷地批評蘇聯，而不是一次一般性的攻擊。[58] 中國對國際問題的公開聲明，至此更明顯地不同於蘇聯的口徑，這尤其表現在對 1960 年 1 月艾森豪威爾國情咨文的反應上。[59] 而且，中國人表示，他們根本不考慮用自己的外交政策去迎合俄國人的胃口。他們正式表示歡迎 1 月 14 日赫魯曉夫提出的全面裁軍建議，認為它證明了蘇聯愛好和平並具有對軍事力量的自信心。但是還沒過一星期，1 月 21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聽取了外交部長陳毅有關這個問題的發言之後，通過一項決議，強調「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及其代表團簽字，任何一項國際裁軍協定對中國都沒有任何約束力」。[60]

對於蘇聯來說，更加感到驚訝的可能是 1960 年 1 月中國人開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外圍組織中——如世界和平理事會和世界學生聯合會，闡明自己的觀點。[61] 此外，劉少奇表達其個人的憂慮，他看到西方試圖擴大中蘇之間的裂痕，其手法是稱中國為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力量，稱蘇聯為穩健力量。[62] 然而，只有中國方面的行動和爭論更會帶來這種效果，而不是西方的文章。還是在 1 月，中共中央在上

海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討論外交問題，大約就在這次會上，中國領導人對赫魯曉夫訪問北京以後首次發生的中蘇對抗局勢，作了認真的分析。

華沙條約組織會議

到本書寫作時為止，1960 年 2 月 4 日在莫斯科舉行華沙條約國高級首腦會談，還被神秘的氣氛籠罩著。[63] 有跡象表明，俄國人希望能夠阻止中國人與會，因此直到會議前夕才通報了開會的消息；與此同時，則以出席一次農業會議為托辭把東歐領導人召到莫斯科。無論蘇聯人如何謀劃，中國人還是獲悉了這次會議。消息可能來自阿爾巴尼亞，他們很快就成為中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盟友。中國領導人決定行使自己的權利，以「觀察員」資格與會，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接到了正式邀請。[64] 他們選擇「熟悉蘇聯的老手」組成代表團：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中共中央委員伍修權，都在蘇聯生活過若干年；代表團的第三位成員是當時中國駐蘇大使劉曉。[65]

他們是閱歷豐富的 3 人小組，在可以預料到的不利環境下，能夠很好地應付局面。[66]

這次華沙條約國會議的目的，是要支持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政策和裁軍建議。他將在未來幾個月同西方國家領導人舉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中，尤其是春天的巴黎「四巨頭」會晤以及夏天艾森豪威爾對蘇聯的回訪中提出。與會者同意他們「共同的、衷心的意願」是：美國總統的訪問「導致蘇聯和美國的關係進一步朝著友好與合作的方向發展，這是全世界和平不遭破壞的重要保證」[67]。

中國領導人派出觀察家代表團的目的，是要在這一重要會議上闡明自己的觀點，這是他們在蘇聯的東歐盟國面前闡明觀點的第一次機會。由於涉及相同的具體事件，會議的兩個文件——康生在大會上的發言（在華沙條約成員國裏根本未提及，更沒有發表）與華沙條約集

團的聲明（在中國得到發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在這年的晚些時候，論戰更多地轉向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

聲明的基調相對來說是溫和、樂觀的，而康生發言的調子則是強硬、悲觀的[68]。聲明沒有提「美帝國主義」；發言則反覆地提到這個詞。前者提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加強德國「軍國主義」，但又補充說，與會者「表示相信西德復仇主義分子的計劃不會得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現時盟國的支持」；與此相反，康生在講話中說，「加快西德軍國主義的復活」是「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康生強烈聲討的地方，在聲明裏只是譴責，而且調子低沉，缺乏義憤。

聲明援引了四段論據來證明它的樂觀態度；康生的講話迴避了其中的三條論據，而將第四條論據（赫魯曉夫的美國之行）解釋成為華盛頓被迫作出的毫無意義的姿態。[69]康生承認局勢出現了緩和的跡象，但把這種情況歸之於堅強、團結的共產主義陣營的鬥爭，這種鬥爭還得到「和平民主力量」以及極其重要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

這個聲明的主題是宣揚赫魯曉夫的整個和平共處政策的思想：核戰爭必將導致戰爭雙方的大規模毀滅，而不僅僅是帝國主義者一方。康生發言的關鍵內容是提到美國「在國際問題上採取歧視態度來對付我國」，因此中國拒絕遵循它沒有參與制訂的任何國際條約。除了曠日持久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外，華盛頓排斥北京，願意同莫斯科打交道，這是一種對共產主義集團的不同組成部分採取不同方針的政策，招致了中國人的強烈不滿。赫魯曉夫對這種政策的順應，是他在中國首都受到冷遇的主要原因。

受到冷遇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在公開場合嘲笑毛的情況與日俱增。在華沙條約國會議閉會的宴會上，據說他形容這位主席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充滿怪念頭的人，倒像一雙老式的鞋，除了擺在角落裏供人觀賞之外別無用處」。[70]

這時，莫斯科和北京在對世界問題的分析及共產主義集團的行動方針上，公開地互相對立。政策之爭日趨嚴重。然而，華沙條約國會議之後僅僅十天，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十週年紀念日裏，雙方的首都均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就像什麼事情也不曾發生[71]。在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宴會上，劉少奇提議為兩國人民的「偉大的牢不可破的親密友誼」乾杯，朱德表示中國「衷心感謝」蘇聯對他的國家的經濟發展計劃給予的幫助。然而，潛在的問題還是露出了一點苗頭，朱德提出以 1957 年莫斯科宣言作為陣營團結的基礎，而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則強調社會主義與和平密不可分以及不久前發表的旨在謀求和平共處的華沙條約國聲明的重要性。[72]

也許由於朱德是蘇聯大使館的客人，因而表現得有所節制。外交部長陳毅在中國舉行的宴會上，重申中國對全球局勢的嚴竣分析，以提請對局勢的注意[73]，然而在會下，他顯得比較理智。他暗示，如果中國擁有了核武器，就有可能達成不使用這些武器的協議。[74]

中國的孤立

似乎是在這些週年慶祝活動剛剛過去後，中共中央又舉行了關於外交問題的工作會議，這次是在廣州，估計討論了華沙條約國會議，並就如何最有效地採取對策的問題做出了決定。[75] 在隨後的一個月裏，在杭州舉行了第三次工作會議，估計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國領導人通過了論戰文章的草案或正式文本(譯按：指以「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和陸定一的報告《在列寧主義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及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等一組論戰文章)，於 4 月發表。

儘管這些論戰文章的風格充滿自信的語調，毛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仍表明，至少他的一些同事擔心中國正逐漸陷於孤立。[76] 毛的評論《關於反華問題》包含了一些想像的統計數字，以消除有些人的顧慮。中國的敵人包括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其他一些國家(相當於第

三世界）的反動派和半反動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和半修正主義分子：

> 以上三類人，估計共只佔全人類的百分之幾，例如說百分之五吧。最多不過佔百分之十。假定說，一百個人中有十個人反對我們，全世界二十七億人中，不過只有二億七千萬人反對我們。而有二十四億三千萬人是擁護我們的，或者是不反華的，或者是暫時被敵人欺騙對我們表示懷疑的。[77]

毛繼續指出，現在反華活動有一短暫的間歇，假如中國經濟搞得好，這種間歇還會延長。他以頗令人吃驚的語言引用蘇聯的例子說：「我們前面有蘇聯的經驗可遵循。在過去幾十年裏，沒有人反對蘇聯有好結果。」[78] 然而，儘管有歷史教訓，毛仍將領導中國共產黨反對蘇聯！

毛的這番話——劉亦持相同的觀點[79]——是配合中國在巴基斯坦舉辦的展覽會開幕而講的[80]。當然，由於中國當時與鄰居和近鄰的爭論，反華情緒主要存在於亞洲。毛講的間歇是北京採取緩和緊張局勢的措施的結果。

就印度來說，早在 11 月 7 日，周總理就寫了一封比以前語調友好得多的信，向尼赫魯總理提出了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建議[81]。尼最初表示拒絕，但最後還是同意了，並要求周到新德里去。2 月 26 日，中國總理接受了邀請。訪問的日期後來定在 4 月中旬。[82]

與此同時，中國迅速採取行動來消除一些其它邊界問題。1 月，北京接待了緬甸總理奈溫將軍。3 月又接待了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先生。兩次訪問都達成了邊界協定，儘管與緬甸的定界最後要由聯合委員會裁決。中緬還簽訂了一個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對尼泊爾，中國則提供 1 億盧比的援助。在同緬甸的協定簽訂後，中國報紙問道：「在中國和緬甸之間能夠出現的事情，為什麼不能夠同樣出現在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之間呢？」[83] 很明顯，這裏指的是印度。

中國在亞洲的另一個重大爭論是與印度尼西亞的糾葛，它是由雅加達政府 1959 年 5 月禁止華僑從事鄉村貿易的決定引起的。10 月印尼外交部長蘇班德里約對北京的訪問沒解決問題[84]。據當時印尼消息靈通人士透露，蘇班德里約與陳毅的會談就像這位中國外長與赫魯曉夫的會談一樣尖銳激烈，儘管有跡象表明陳理解華僑問題的歷史淵源和適應殖民統治結束東南亞國家紛紛獨立這個現實的需要。[85]不管怎樣，次月中國人就被從家裏和商店裏趕了出來，商品被沒收了。一些中國人挨了打，另一些則被關進了監獄。[86]其後重新開始的外交活動最後在 12 月導致了北京同意批准 1955 年的雙重國籍條約。同時，中國主動提出收容不再願意留在印尼的華僑；十余萬人接受了這一安排，乘中國船離開了印尼。[87]

中國在亞洲的爭論不能簡單地解釋為中國好鬥的結果，就像史料記載的那樣。然而，中國的外交行為確實表現出比較強硬的特徵，這種特徵反映了伴隨大躍進的發動而出現的總體上更為好戰的情緒。此外，中國人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批評也沒有改善他們在不結盟國家中的形象，因為鐵托與他們中很多國家的領導人建立了密切關係。1959 年底和 1960 年初北京稍許緩和的態度表明它已意識到，自萬隆會議以來由周恩來巧妙的亞洲外交取得的成果正在白白消失，而在中國即將與蘇聯對抗和繼續與美國對抗的關頭，正是可能需要朋友的時候。1959 年 12 月艾森豪威爾訪問印度和 1960 年 2 月赫魯曉夫訪問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也許在中國看來預示著反華力量之間的聯合正在形成。而任何這樣的勢態都必須防止。[88]

對於中國來說，一種方法是發展它自己與外部世界的聯繫。3 月 19 日北京舉行大規模集會慶祝中國——拉美友好協會的成立，一個月時間不到，4 月 12 日，以中國工會領導人劉長勝為主席的中非人民友好協會成立[89]，這一系列事件都不是偶然。5 月，在周恩來與尼赫魯的邊界談判無結果的情況下[90]，毛一連參加了四次會議，會見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代表團，為與第三世界國家建立政治上的良好

關係作出了建樹。毛主席向他的幾批客人強調說，共同的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只能通過團結和鬥爭才能打敗它。[91]

為了避免持續而無效的與美國的大使級會談所引起第三世界或蘇聯對中國與帝國主義鬥爭的努力的懷疑或嘲笑，中國政府調整了自己的外交活動。3 月中旬，大約在中共中央廣州會議評價華沙條約會議精神後兩個星期，兩名天主教主教，一名美國人，一名中國人在上海突然被審判。中國人龔品梅被控犯有重大叛國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他 13 名中國天主教徒也受到審判，分別被判處 5 至 20 年不等的徒刑。美國人詹姆士·愛德華·沃爾什（曾在共產主義革命後拒絕回國），被指控指導龔的「反革命叛國集團」，被判處 20 年有期徒刑[92]。沃爾什和龔關在監獄裏多年，在這個特別時刻審判他們的目的，看來只能解釋為中國在首次攻擊赫魯曉夫和平共處政策前夕需要作出一個反美姿態。這個姿態確實有效，根據一個中美會談歷史學家的說法：「華盛頓被大大激怒了，大使級會談受到嚴重的衝擊，這一事件向華盛頓提出了繼續會談是否真的有用的問題。」[93]

在列寧紀念日的進攻

中國利用 1960 年 4 月 22 日列寧誕辰 90 週年紀念日作為大規模譴責蘇聯外交政策的時機。總共有四篇文章[94]，其中《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列舉最近發生的 37 個事件證明，「儘管在戴維營會談以後，儘管在東西方最高級會談的前夜，我們看不出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有任何實質的改變，看不出美國政府和艾森豪威爾本人所執行的政策有任何實質的改變。」[95] 毫無疑問，最主要的一篇是《紅旗》雜誌刊登的題為《列寧主義萬歲》的冗長的、沒有署名的文章，因為它把爭論由具體政策提到了意識形態原則的高度。[96]

在這裏，中國終於對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倡導的新理論提出了反駁。這時中國終於感到要把毛澤東為了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

結而在 1957 年莫斯科宣言中同意了的妥協放在一邊。[97] 這些妥協主要涉及的問題是：戰爭與和平，革命或改良。

這篇肯定是由毛審定的文章[98]論證說，列寧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仍然是有效和正確的。不論是西方的帝國主義者還是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都沒有改變它們的本性；全球競爭的特點基本上沒有因為像核武器這樣的「技術進步的一些具體事例」的存在而有所改變。[99] 戰爭仍然是「剝削制度的必然產物，現代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制度。在帝國主義制度和剝削階級滅亡以前，這樣性質或那樣性質的戰爭，總還是會出現的」[100]。

從列寧起，共產主義者就主張和平共處。但經驗證明，帝國主義最終會放棄和平而轉向戰爭。正確的辦法是兩種策略的結合，「徹底揭穿帝國主義的和平欺騙」和「準備在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時候，用正義戰爭來結束帝國主義的不義戰爭」[101]。

和平共處只適用國家與國家間的相互關係，不適用於資產階級國家中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共產主義者應當參加議會鬥爭，但不應當對議會制抱有幻想，那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裝飾品。正如列寧指出的，沒有一個不經過鬥爭就自動下台的統治階級，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布爾什維克和中國的革命清楚地證明了這些論斷。「請大家根據歷史上和現在資本主義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實，想想老修正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所謂『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那一連篇的鬼話吧！」「和平過渡」，如列寧論證的，是一個「非常罕見的機會」[102]。

在引用大段列寧的話的同時還穿插著對鐵托的批評，隱藏在這個活靶子後面的是更為重要的赫魯曉夫。南斯拉夫被譴責為「無恥地把美帝國主義的頭子艾森豪威爾叫做是『消除冷戰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間和平競賽的奠定人』」。赫魯曉夫在訪問中國時曾提出過同樣的觀點。[103]

文章還隱射莫斯科同北京在印度問題上的對立態度。「社會主義國家決不許可，決不應該，也決不能夠在不是受到國外敵人侵略的情況下，使自己的軍隊越出國境」[104]，在非共產主義國家，資產階級「除了在必要時採取解散議會的辦法以外，還能夠採取公開或幕後的各種把戲，使議會中原來第一大黨的工人階級政黨變成少數派，或者使工人階級政黨縱使能夠在選舉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選票，而卻減少了議會的席位……，第二次大戰後歐洲和亞洲各國的經驗又對這一點再作了新的證明。」[105] 在這裏，中國清楚地指尼赫魯解散世界第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具有重大意義的共產黨政府——喀拉拉邦政府一事。[106]

促使發表《列寧主義萬歲》這篇文章問世的具體原因是幾年間中蘇外交政策的分歧，但它的理論綱領具有更基本和更持久的意義。中國人首次伸張了他們為共產主義陣營制定路線的權利。在那以前，中國的理論分析不是被說成是對共產主義運動理論的探討（如 1956 年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兩篇文章），便是只與中國本身有關（如 1957 年毛的矛盾問題講話）。但到這時，中國開始承擔分析時代的本質和為世界範圍的階級鬥爭得出結論的最基本的理論任務。假如不遇到挑戰，北京將取代莫斯科成為共產主義正統理論的中心，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羅馬。而這是赫魯曉夫不得不接受的挑戰。

在北京的遊說，在布加勒斯特的威嚇

對赫魯曉夫來說，不幸的是他既沒有個人威信又沒有知識權威，如果他去挑戰毛勾畫的那樣一種馬列正統理論，不能令人信服。蘇聯思想界對《列寧主義萬歲》的公開反應是微弱的，因此大概這個任務只能交由蘇聯領導中一位不很重要的人物承擔。他在紀念會上講話的唯一資格是他是列寧時代的一位老戰士。奧托·庫西寧只能求助於列寧著作中的一些話（這些話同樣能很好地被中國人運用）和列寧遺孀的回憶，她記得偉大的革命家列寧預言過「總有一天，戰爭的破壞性將變得如此巨大，反而不敢貿然發動」。[107] 蘇聯堅持核戰爭有災難性後

果的主張給庫西寧的講話一種道義力量，這是北京的強硬理論所缺少的，但蘇聯的理論家沒有為他提供使道義變為教義的理論綱領。[108]因此，他的講話大部分是為蘇聯政策特別是它對亞非洲非共產主義國家的政策作具體的辯護。蘇聯理論的匱乏，在這時又加上了赫魯曉夫外交政策受到的嚴重打擊：繼在蘇聯上空擊落美國 U-2 偵察機後，赫魯曉夫不得不放棄四國巴黎最高級會談。在北京，鄧小平稱讚了他的這種行為[109]，估計會使中國人感到高興的是：艾森豪威爾承擔 U-2 飛機的個人責任提高了美國總統而不是蘇聯主席的信譽。1960 年 5 月，赫魯曉夫看來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蒙受了損失。

中國人掌握了主動權。6 月 5 日至 9 日，在於北京召開的為共產黨控制的世界工聯理事會全體會議上，中國人以令其他共產黨代表吃驚的狂熱勁為他們的觀點進行宣傳。中國的世界工聯副主席劉長勝譴責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提出的即使帝國主義還存在戰爭危險仍能消除的觀點是幻想。[110]中國代表團召集參加世界工聯會議的共產黨代表開了一個目的在改變世界工聯政策的特別會議，在這個會上，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以明顯針對赫魯曉夫的話譴責現代修正主義[111]。繼列寧的紀念文章之後，中國在這個場合的行為，使他們失去了克里姆林宮中鷹派人物的同情，這些人同意中國對赫魯曉夫的外交政策進行批評但不準備讓出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權。[112]

在世界工聯會議的最後幾天裏，中國得到新的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他們的論點。日本共產黨和社會黨在好戰的學生支持下進行的反對延長美日安全條約的激烈示威遊行，迫使日本政府要求艾森豪威爾總統把即將到來的訪問延期。雖然新的條約被國會批准了，但岸信介首相此後不得不立即辭職。比之於議會活動，革命鬥爭的效果更令人信服。[113]從這樣的事件看，說蘇聯企圖利用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發表 40 週年作為機會向中國的極端主義發動隱蔽的進攻，是缺乏說服力的。[114]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兇猛地進行反攻。

5 月 12 日，在蘇聯領導人知道巴黎最高級會談將告失敗的前夕，曾邀請毛去莫斯科，毛拒絕了。[115] 接著在 6 月初，蘇共中央提議把預定在該月 20 日召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作為執政的共產黨在巴黎最高級會議流產之後交換對國際形勢看法的機會。中國既反對倉促開會又反對把非執政黨排除在外。兩個黨的中央都認為應該舉行所有共產黨的會議（11 月在莫斯科召開），布加勒斯特會議可以作為初步討論的時機。[116]

在羅馬尼亞黨代會開會期間，赫魯曉夫和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彭真再次陳述了人們所熟悉的蘇聯和中國關於和平、戰爭和革命的論點。[117] 在幕後，激烈的對抗正在醞釀。蘇聯代表向兄弟黨系統地介紹中蘇間的爭論，並散發了一封署名為《情況介紹》、落款時間為 6 月 21 日的長達 80 頁的信件，譴責中國的錯誤思想和不友好的行為（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和在世界工聯會上進行反蘇宣傳）。俄國人第一次試圖維護他們理論上的卓越地位，但其指責是否有權威難以估價，因為這封信的內容從未公佈。[118]

布加勒斯特大會的秘密會議 6 月 24 日開始，26 日結束。[119] 據說彭真對受蘇聯宣傳影響的各國代表上台發表的一系列反華演說吃了一驚，但他很沉著，以說理來回答。更有效的措施是，他給代表散發了另一封長達 80 頁的蘇共給中共的信件。它的「恐嚇和嚴厲」的語調與《情況介紹》信裏說理的論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破壞了後者反映出的政治家風度。

在中國採取上述措施提醒其他共產黨注意蘇共處理兄弟黨關係的做法的刺激下，赫魯曉夫上台發言。他「放棄了論證說理和審慎分析分歧的姿態，以純粹意氣用事的語言作了一次激烈冗長的演講……。」[120] 根據中國的報道，「蘇共領導人」放肆地誣蔑中國共產黨是「瘋子」，「要發動戰爭」，「把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的旗幟撿起來」，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是「純粹的民族主義」和採取「托洛茨基方式反對蘇共」（指其他地方提到的中國在世界工聯會上的活動）[121]。中國沒有提到赫魯

曉夫對毛的攻擊，他把毛說成是「忽視除自己外任何人利益，編造脫離現代世界實際的理論」的另一個斯大林；認為中國領導人已成了「極左派、極端教條主義者，真正的左傾修正主義者」[122]。赫魯曉夫也談到彭德懷事件，但明顯暗示他是因為向俄國人流露了自己對大躍進觀點而被解職的。[123]彭是一個「好朋友」，他——赫魯曉夫願意掛他的像。[124]

赫魯曉夫威嚇的舉止顯然沒有嚇倒彭真，據說他的回答比蘇聯領導人「更高雅更有力量」，根據赫魯曉夫在戴維營後和在巴黎最高級會談上截然不同的行為，彭真譴責他對帝國主義大國時熱時冷搖擺不定的態度[125]。更重要的是，彭被授權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聲明，譴責蘇共第一書記「極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行為和採取「家長式的、武斷的、專橫的態度」。

> 他在實際上把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同我們黨的關係不看成是兄弟黨的關係，而看成是父子黨的關係。在這次會談中，他企圖使用壓力使我們黨向他的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屈服。[126]

中國的聲明不同意已提出的會議的公報的一部分內容，但因為公報主張實行共產主義的團結[127]，「為了更大的利益」，像後來中國說的那樣，彭真簽了字。[128]

俄國人執意前行

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與彭真對抗後，再也不考慮更大的利益了。7月13日至16日蘇共中央召開會議，最後一天聽取了關於布加勒斯特的報告。報告人是科茲洛夫，不過赫魯曉夫沒有到會。做如此安排，目的大概是要向中國表明，蘇聯領導人團結一致反對他們——科茲洛夫是蘇共主席團中有反對西方傾向的鷹派人物——[129]和中央正式「完全批准了以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蘇共代表團活動的政治路線」。[130]月底，蘇聯理論權威蘇斯洛夫在向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黨員作關於全會報告時明確說，因為中國好鬥，今後的關係將只在國與國的基礎上維

持，假如年底世界各國黨的會議不能解決爭論，將要公開宣佈兩黨關係破裂。[131]更為直接的是，蘇共中央全會還明確地批准了主席團關於從中國撤回所有蘇聯顧問的決定。7 月 16 日，中國外交部收到了這個意見的照會（根據蘇聯[132]和中國[133]的資料），蘇聯立即採取了行動：斯大林獎金獲得者的化學家米哈伊爾·A·科羅契科（當時在遙遠的昆明的冶金和陶瓷研究所）後來報道說，他是 7 月 16 日收到召回電報的。[134]

蘇聯沒有公佈過召回決定，但中國把蘇聯照會的內容給所有將要離開的蘇聯顧問看了，信中做了解釋。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中國人不遵守蘇聯的技術意見並經常對之表示蔑視；中國人製造了蘇聯顧問無法容忍的事情，暗中監視他們，搜查他們的行裝，拆開他們的郵件；有時蘇聯專家被騷擾，甚至被毆打。因此，所有的蘇聯顧問將在 7-8 月間撤走。[135]7 月 31 日，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收到中國的答覆。[136]它逐條否定蘇聯的譴責，把它們說成是「一個就像捕風捉影一樣的奇怪而無效的行動」[137]。

蘇聯的決定看來不止使中國方面，連顧問們自己都吃了一驚。科羅契科從中國科學院得到的召回電報說，他必須立即回到他的莫斯科研究所去。這消息使還不瞭解實情的科羅契科感到迷惑，因為他在同年 6 月的第三週還收到通知能呆到 12 月。科羅契科也知道，當時在蘇聯科學院正是「淡季」，整個莫斯科在 9 月前即使打著燈籠都難找到在搞研究的科學家。[138]

科羅契科從 3 月份到達時起就意識到在中國人和他們的蘇聯顧問之間存在著緊張氣氛，這種氣氛在 1958 年他前次在華工作期間是沒有的。[139]一個月後，他和其他外國專家參加一個會議。會上，一位高級省級官員向其他幹部講解《列寧主義萬歲》，在這個科羅契科實際上一點也不懂的講演之後，每個蘇聯專家都得到了一本這篇文章的俄文本。其後，所有在華蘇聯顧問都被他們的大使問過是否手頭上有一本這個異端邪說的文件。科羅契科不把外交上的這個風波歸咎於這篇文

章的內容，「它愚蠢無益，不值一提，真正的問題是這個文件代表了中國政府首次公開提出與蘇聯不同的觀點」[140]。然而五一節仍是以通常的禮儀慶祝的。[141]

儘管有電報，科羅契科真誠地希望在離開前完成他當時手頭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親眼目睹了為實現蘇聯在華顧問人員的迅速撤離給蘇聯外交官受到的巨大壓力。在與北京的大使館連續通電話的結果仍是要執行打起背包撤離的絕對命令後，科羅契科感到不能再拖延了，在參加了他中國同事為他舉行的一個令人感動的告別會後，7 月 28 日飛到了北京。[142]

在北京，一個蘇聯外交官通知科羅契科，蘇聯政府正為他們安排了每週兩次的北京到莫斯科的加車。當時大約有 1500 名顧問和 2500 名家屬在中國，他們到 8 月底必須全部撤離。科羅契科本人則被要求不遲於 8 月 4 日或 5 日離開。他再次設法拖延，以便為中方寫一份關於中國科學的綜合報告，實際到 8 月 13 日才離開。[143]

在北京的最後幾天時間裏，科羅契科聽取了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對顧問中黨員作的關於撤退原因的解釋。大使批評了中國的國內政策——百花齊放、人民公社——但火力卻集中在他們的外交政策上——中國侵略印度的蠢事;「為了幾個小商人的利益」惡化了與印尼的關係;與南斯拉夫關係的不必要的惡化和對阿爾巴尼亞的過分友好；在第三世界人民中進行反蘇宣傳；對美國威脅分析上的自相矛盾。他特別對中國在世界工聯會上的行為表示憤怒。總而言之，在他看來，中國企圖接任世界革命的領導，儘管它對馬克思主義或革命實踐欠精通。蘇聯撤退的目的在於迫使中國人重新考慮他們的行動並可能改變他們的政策。[144]

中國沒有表現出突然改變政策的跡象，但他們一直到最後都以禮相待。科羅契科報告說他的中國同事甚至比以前還要熱情[145]，外交部長還為即將回國的顧問舉行了宴會。在宴會上，陳毅感謝顧問們的巨大幫助，希望他們回國後身體好，工作順利。契爾沃年科提醒中國別

忘了莫斯科給中國的60億盧布和派來的10000名顧問。然後，一個蘇聯代表概括地作了答詞，大意是，「我們為你們做了這麼多，可你們還不滿意。」[146]

這種感情，據科羅契科證明，沒有引起國內大多數蘇聯顧問或蘇聯科學家的共鳴。至少在這個圈子裏，撤退被認為對蘇聯利益有害。[147]原因不難理解。當時有1390名蘇聯顧問在中國工作。除了把他們撤退外，俄國還「撕毀了343個專家協定和補充協定，廢棄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148]由於撤退，很多中國的「重要設計和科學研究項目不得不停止，一些正在進行的建設項目不得不下馬，一些正在進行試驗生產的工廠和礦山不能按計劃投入生產」[149]。周恩來召開會議討論蘇聯撤走專家對海軍建設的影響[150]。根據後來情緒激動的報告，蘇聯的行動使中國的發展遭受了「巨大的損失」[151]。劉少奇大概不是唯一的對撤退表示憂慮並主張轉向西方補償損失的中國領導人[152]。但直到劉受辱死去後這個建議才被採納。

撇開對中國造成的經濟和政治上的損失不談，如果蘇聯相信他們的判斷，認為中國政策將招致災難，他們無疑應該讓自己的專家顧問按兵不動，等到預料到的那一天到來，出來收拾殘局。那時候，蘇聯的顧問們將會站在一個強有力的主動地位。現在正相反，中國人可以理直氣壯譴責他們經濟上的失敗部分是由於蘇聯撤退專家而導致。

同時，即使蘇聯關於中國人虐待他們的顧問的說法有部分事實根據——科羅契科指出，他們的確有根據[153]——這數千名蘇聯人卻是情報的獨特來源，通過他們，蘇聯政府可以瞭解中國各部門的政策，工廠的情況，邊遠地區的生活水平，科學的狀況，即關於中國總的活動情況。由於撤退他們的顧問，蘇聯人對中國的情報來源並不比任何其他外交使團多，而這時正是他們對中國人的行為感到驚恐而渴望增加而不是減少對他們的巨大鄰國的瞭解的時候。

但是，撤退有一更深的感情上和象徵上的意義。不管合作關係處理得怎樣不完善，這1萬名蘇聯顧問代表了幾年間對中國發展事業的

巨大人力資源的投入。中國對蘇聯的債務是巨大的，陳毅在為蘇聯顧問準備的最後晚餐上表示的感激是真誠的。但債務一筆勾銷，感激的心情也由於關係的中斷而蕩然無存。

也許同樣有意義的是，即使不是很明確的話，蘇聯的行動破壞了兩國政界、工業界以及知識界的精英通過在一起工作建立起來的大量人際關係，這種關係本來大大有助於兩國間的關係。另外，蘇聯人破壞了中國的精英中的親蘇力量——蘇聯培養的計劃工作者、科學家和工程師在中國政府中的骨幹地位。這些人與俄國人的特別關係不再是他們的資本，而日益成為受懷疑的原因。很多人得轉向西方。

假如蘇聯領導人在 1960 年 7 月中旬就斷定與中國完全破裂不可避免的，或者是他們願意的，那麼，撤走顧問不過是遲早的事。但是，假如蘇聯把布加勒斯特會議當作最後攤牌的場所，對北京的行為進行憤怒的反擊，以為這樣就能使北京覺醒過來，那麼，蘇聯人完全錯誤地判斷了中國人的心理。撤退的結果很明顯刺激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感情，加強了毛走自己道路的決心，使中國領導中本來也許感到毛對蘇聯太過囂張的任何成員都團結在他的旗幟下。在 8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認為，蘇聯的觀點是要中國完全否定自己的國內政策。【154】即使是國內對大躍進的反對者也很少有人會同意這樣的令人感到屈辱的要求。

由此可見，撤退專家產生的後果比關於對美國和印度政策的爭論還嚴重。政策可以改變，妥協可以達成，特別是在巴黎最高級會談失敗以後，但兩國間的人際關係不可能再恢復。1960 年發生一系列關鍵性的變化，使得重大政策爭論演化為無可彌補的裂痕，那就是中國發表《列寧主義萬歲》，挑戰蘇共的理論權威地位，以及蘇聯撤走專家從而破壞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關係。

然而，中國暫時還保持了區別輕重緩急的判斷能力。主要敵人仍然是美帝國主義，而不是修正主義，這是陳毅 1960 年 8 月 1 日在外交事務會議上講話的內容。【155】大概就是在這個場合，陳毅私下承認（中

國決不會在同年與莫斯科辯論時公開承認）；一些美國領導人意識到有緩和緊張關係的需要。[156] 陳的態度是中國當然想和平共處，但目的是利用它來消滅帝國主義，就像帝國主義希望用它來消滅社會主義一樣。[157]

莫斯科會議

9 月 10 日，中共正式對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上散發的通知書作出答覆。中國的信包括解決爭論的五項建議：蘇共和中共團結的思想基礎應是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和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共產黨國家的關係應當建立在平等、友好和國際主義的基礎上；中共和蘇共應當「充當協商、從容討論」所有有爭論的問題，「必要時」這些觀點應提交給其它黨；可能破壞團結和幫助敵人的行動應當避免。共產黨應當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一塊協商以便在 11 月莫斯科會議上產生一個把它們作為共同綱領的文件。[158] 中國拒絕了據說是蘇聯提出的把共產黨內實行的民主集中制運用到共產黨之間的建議：

> ……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究竟誰是誰非的問題不能在任何時候都以誰是多數來判斷。真理畢竟是真理，謬誤不能因為暫時的多數而變成真理，真理也不會因為暫時的少數變成謬誤。[159]

根據其它報道，正是在這封長信中，中國首次把爭論追溯到蘇共二十大。在這個會上蘇聯不經協商就否定斯大林的積極作用，提出和平過渡的理論。中國也利用這個機會透露 1956 年他們曾勸說蘇聯人不要在波蘭使用武力，但贊成其在匈牙利使用武力。這封信還向俄國人追述了在 1957 年莫斯科會議上的分歧和毛在宣言簽字前曾堅持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這封信是企圖把爭論恢復到《列寧主義萬歲》提出的基本思想原則上去，不過中間也有一段小小的插曲。赫魯曉夫曾取笑毛把美國描繪成「紙老虎」，但中國的信指出，列寧自己曾說過

「英法帝國主義是泥足巨人」。（這個論點顯然很有力，因此最後在 1962 年 12 月《真理報》不得不撰文闡明紙老虎與泥足巨人的差別！[160]）

這封信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莫斯科代表團與以蘇聯最高理論家蘇斯洛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 9 月 10 日至 22 日進行的艱苦而無效果的討論的概要。[161] 促使中國不妥協的另一個因素可能是得知赫魯曉夫 8 月間曾企圖唆使阿爾巴尼亞加入反華集團。[162] 此後，中國人很明顯先是回去了，然後又回來參加 10 月 1 日開始的二十六黨會議。這個會議的任務是為世界共產黨會議起草一個宣言，該會議將於 11 月舉行，以慶祝布爾什維克革命紀念日。

這個籌備會開到 10 月 20 日[163]。在宣言草案的一系列觀點上達到了一致，但一些重大問題仍沒有解決。[164] 中國人在阿爾巴尼亞和印度尼西亞黨的支持下反對蘇聯關於「個人崇拜」的理論，很清楚它能用來作為反對毛和它的最初目標斯大林的武器。中國在更多數黨的支持下——日本、朝鮮、印尼、越南和澳大利亞——反對在最後文件中對「分裂」活動的任何攻擊（所謂分裂活動，很清楚是指像在世界工聯會上中國宣傳他們的觀點一類的事情）。[165]

當赫魯曉夫從紐約的聯合國大會返回蘇聯時，甚至這個有限的協議也遭到了破壞。他堅持要廢除一些已經苦心擬出的協議。[166] 而當他在結束預備會議的宴會上與中國黨的總書記針鋒相對地交換意見時，[167] 氣氛則進一步惡化了。這樣，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 87 個黨的 81 位領導人在隨後的一個月雲集莫斯科時，他們所面臨的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即產生一個具有一致性的文件，前兩個參與人數不多、更適宜討論的會議未能就這個文件達成一致的意見。

中國代表團的陣容是強有力的。毛在那種使他容易丟臉[168] 的情形下傾向於小心謹慎，代表團的團長由劉少奇擔任，儘管他的許多家庭問題與蘇聯有牽扯。1960 年 10 月，劉少奇夫人的兄弟叛逃到蘇聯去了[169]。同年，劉的一個兒子劉允斌與他的蘇聯妻子離婚[170]；另一個兒子劉允若於 6 月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回國後，對中國的條件表示不

滿，說他正在與一位俄國姑娘戀愛並打算去蘇聯看望她，他甚至要求和父親同路去莫斯科。為了避免在機場發生難堪的事件，劉禁止他的家人到機場去為他送行。[171]

陪同劉前往蘇聯的人大都是在前幾年中蘇對抗中高舉中國意識形態紅旗的人。他們是鄧小平、彭真和康生。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是代表團中一個出人意料的成員，而宣傳部長陸定一是代表團中的一員則是預料之中的事。代表團的成員中還有，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廖承志，他還是北京的一位主要的「日本問題專家」。中國工會主席劉寧一。他們兩人都在國際性的共產黨外圍組織中做過大量工作。從這兒也可以看出，北京已經意識到在莫斯科需要對那些在野的共產黨，特別是來自第三世界的共產黨做大量的工作。總之，代表團成員中有 4 名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和兩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及 5 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172]

中國代表團是僅有的 5 個不由其最高領導人率領的代表團中的一個。儘管來參加會議的都是世界上的老資格的共產主義者，大多數與會的代表團還是受到了蘇聯人的懷疑，在不開會的時候，盡量把他們限制在住房以內，明顯地是為了阻止第三者討論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爭論。正如在布加勒斯特那樣，蘇聯共產黨的密使們在雙邊基礎上極力遊說那些兄弟黨的代表。[173]

所有的代表團都收到了蘇聯人散發的聲明草案的副本。草案說明了在預備會議上要達到的協議的範圍，還附有蘇聯主要的政治理論家蘇斯洛夫對一些主要分歧——特別是有關戰爭與和平、和平過渡以及個人崇拜等等條文的分歧——的評論。在會議開始前幾天，蘇聯共產黨散發了一封長達 127 頁的信，該信寫於 11 月 5 日，是對中國共產黨 9 月 10 日來信的答覆。在這封信中，蘇聯極力反駁中國人對它們總的外交政策特別是赫魯曉夫本人的攻擊。[174]

大會是在克里姆林宮的聖喬治大廳中舉行的，從 11 月 25 日起開會，其中只有星期天休會。會議從上午 10 點開到下午 2 點，兩小時休

息後，繼續開會直到晚上。會議大部分的時間被那些小國的共產黨領導人並非總是切題的發言所佔據，他們決心利用這個機會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人物面前出點風頭。[175] 總之，108 個代表團在 33 次會議上發表了演講。[176]

赫魯曉夫正式拉開了辯論的帷幕，並以克制的態度重申了蘇的立場。然後，蘇斯洛夫介紹了聲明草案，聲稱這個草案如能作為大會討論的基礎文件就是成就。但是，這種講道理的辯論氣氛很快消逝。相當多數在野的共產黨，其中大部分是來自第三世界，立即對中國共產黨的立場進行攻擊，使中國人處於明顯的不利境地，因為中國人本來把這些代表團看成是自己的支持者。[177]

據法國共產黨領導人莫里斯·多列士說，大會的主要議題關係到當今這個時代的性質，如戰爭與和平問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準則問題。[178] 11 月 14 日，在大會期間作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成員的鄧小平以嚴厲的措詞回敬了那些對他的黨的立場的攻擊。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他聲明，中國人從來沒有認為世界大戰或其它任何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認為帝國主義的存在增加了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如果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甚至是核戰爭，共產黨人有責任進行反抗。大國關於裁軍的對話令人們感到迷惑；而和平共處只能是共產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的一個方面。[179]

在談到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時，鄧再次強調了中國人的觀點，即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以印度為例，鄧爭辯道，在印度，資產階級領導人是如何傾向於滑向右翼並向帝國主義靠攏的。[180] 儘管如此，鄧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並不反對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所作出的所有決議。[181] 在談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準則問題時，鄧再次提出了曾隱含在公開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這篇文章中的挑戰；蘇聯共產黨無權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制定行為規範。鄧提問說：

以〔少數服從多數〕這樣一條組織原則為名，使自己凌駕於各國黨之上，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依據的是什麼樣的超級黨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通過了這樣的黨章？[182]

儘管鄧拚命地捍衛中國共產黨為它的觀點進行申辯的權力，中國代表團仍然強烈地表示贊同維護蘇聯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蘇聯在 1957 年的莫斯科會議上由於毛的堅持而同意扮演這個角色，但是在 1960 年的會議上，俄國人放棄了這個角色。他們也許預計中國人希望有一天接替蘇聯人扮演這個角色。[183]

鄧發言後的第二天，法國共產黨領導人多列士企圖把這種挑戰說成是分裂主義。他明確地指出，「如果搞小集團或派別，那麼就不再會有一個統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84]。中國人混淆了兩個概念：對正在討論的問題有權保留自己意見，但並不等同於「在大多數的黨反對他們的觀點後仍然散佈他們的錯誤觀點」[185]。多列士正面提出了一個給蘇聯共產黨的支持者們的難題，這就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引用列寧的話而帶出的準確判定當今時代的性質的問題。他問道，「我們當今的世界難道仍然是列寧在寫他論帝國主義的傑出著作時所面臨的世界嗎？」他的回答是一個肯定的「不」字。其理由是，列寧的時代並不存在共產黨國家；而現在，帝國主義不僅受到全面發展的蘇聯和強大的共產主義陣營的挑戰，而且面臨以前為其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國際工人運動和世界和平運動的挑戰。當今的時代不是帝國主義的時代，而是「帝國主義分崩離析的時代，是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代，是建立和加強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的時代……」：

不去關注世界發生的深刻變化而堅持列寧半個世紀前的定義，繼續認為帝國主義是決定性的力量，這就喪失了思維的現實性，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創造精神。[186]

多列士的語調中帶有一種傲慢的肯定，他知道他能夠向一個頗有威望的對手挑戰是因為他站在勝利者一邊。到那時為止他並沒有使用

誹謗的手段，但是在阿爾巴尼亞黨的領導人恩維爾·霍查在 11 月 6 日進行反蘇的謾罵之後，蘇聯的支持者們有了一個可以發洩的替代的靶子，他們對阿爾巴尼亞幾乎像對中國一樣惱火。霍查在大會開始的時候挫敗了蘇聯人想把他拉過去的企圖[187]，隨之對赫魯曉夫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譴責他欺騙和愚蠢的行為，指責蘇聯企圖利用阿爾巴尼亞的自然災害使阿爾巴尼亞的黨就範。霍查指出「當阿爾巴尼亞人民在挨餓的時候，蘇聯的老鼠卻有得吃。而蘇聯供應阿爾巴尼亞的一點糧食還得用黃金購買」[188]。霍查的講話被波蘭黨的第一書記哥穆爾卡形容為「令人作嘔的，可恥的，惡棍般的不負責任的攻擊」[189]。意大利黨的代表團領導人隆哥聲稱，「我們無法用適當的語言譴責」霍查的指責和批評，不過，我們盡力充分地譴責了阿爾巴尼亞。霍查的言行簡直是「不屑一顧的」。霍查使用了「欺騙」的手段。「對我們大家來說，阿爾巴尼亞代表的行動越是用友誼和兄弟般的情誼等等圓滑的保證加以偽裝，越是令人作嘔。他們使用的形容詞和一般措詞，人們可以想像只適用於階級敵人。」[190]

但是隆哥最關心的大概是捍衛赫魯曉夫關於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理論，因為這是意大利共產黨政策的核心所在：

> 我們的中國同志讓我們向他們證明有哪一個國家用這種方式取得了進展。我們充滿信心地回答說，我們意大利共產黨就一直以這種信念為指南，它非常適合意大利的形勢，到目前為止，它無疑取得了明顯的成功。在我們最近的兩次大會上……我們準確地確定了我們所認為的民主方式，意大利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式……一種群眾民主鬥爭的方式，通過改變政治和社會力量的關係以達到改變議會力量平衡、改變國家政治領導的目的。[191]

隆哥堅決地捍衛意大利共產黨的路線的舉動，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莫斯科所面臨的問題。一些——也許是許多——兄弟黨的代表團，對中國共產黨向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權進行挑戰感到津津有味，

這對他們來說是想做也做不到的。但是，大多數非執政的共產黨都困於國內的形勢，而那裏的形勢比較接近赫魯曉夫的分析而不是毛的觀點。贊同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以及它那滿不在乎的強硬姿態（赫魯曉夫很有技巧地塑造出中國的這一形象），將意味著在國內政治生活中自殺。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將沒有希望贏得同盟者，不管他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推理多麼純淨。

也許由於認識到爭辯的無用，鄧才在 11 月 24 日他的第二次發言中對赫魯曉夫和哥穆爾卡進行了激烈的個人攻擊。據鄧說，這位蘇聯黨的第一書記在他的大多數的發言中都間接地攻擊了毛，「他顯然不瞭解毛澤東說的是什麼，他一貫如此」【192】。鄧大概覺得不必像他在第一次發言中所作的那樣過分詳細地捍衛主席【193】。至於哥穆爾卡——他曾間接地指責中國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分裂主義者、宗派主義分子，托派分子和分裂論者【194】——鄧說，他用「他那粗俗的攻擊污辱了阿爾巴尼亞」【195】。

中國黨的總書記的第二次發言是大會的最後兩天中發生的主要事件。在長時間乏味的會議過程中，出現過一些十分激動人心的事件和沒有預料到的有趣插曲【196】。但是，會議沒有解決任何問題，這是因為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在主要觀點上都不肯讓步。問題在於，能否為了維持表面的團結而拼湊出一份妥協的文件？

當時，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在北京的毛及其同事們，相互之間在戰術問題上也許存在著分歧。當代表團召開會議討論如果蘇聯共產黨拒絕去掉大會宣言中批評中國的觀點，中國該怎麼辦的時候，劉少奇傾向於簽署最後宣言並同時發表一份解釋性聲明。毛打電報給代表團，要求他們為去掉文件中那些令人不快的內容而鬥爭【197】，只要不導致關係破裂即可。不管怎樣，甚至那些文化大革命中帶有偏見的積極分子，也沒有說代表團準備遷就蘇聯共產黨，或者毛寧願與蘇聯決裂，不願簽署宣言。

儘管中國人公開地堅持己見，他們——包括毛在內，還是傾向於認為，如果在當時那個階段以至以後幾個世紀招致分裂主義的公憤，將不利於中國人的革命事業。大會表決的結果存在分歧，但顯然中國人處於極少數地位，只有幾個黨給予他們全力支持。[198]其他代表團，特別是印度代表團向劉少奇和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逼他們作出讓步。因此，中國人表示，只要能考慮中國方面的意見，對蘇聯人一手炮製的一些條文做確實修改——主要是刪除對分裂主義的譴責，中國代表團將同意在大會結束時的會議宣言上簽字。但是，在宣言簽字的時候，劉少奇聲稱他仍然不同意其中的某些條款，即他原來提出過的有關策略問題的部分。[199]從晚些時候中國的一個報道可以看出，中國代表團不得不做出一些類似於毛 3 年前作出的讓步：在宣言中保留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評價（在大會期間，對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條文進行了修改，並對個人崇拜進行強烈譴責[200]）和對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的評價。[201]主要的分歧在於，蘇聯共產黨代表團堅持在 1960 年的宣言中對譴責個人崇拜的問題應有具體、正面的陳述，而這在 1957 年的宣言中是沒有的。[202]彭真明顯是起草委員會中主要的中國代表，他最終得到指示接受了這一條款，為文化大革命中對他、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攻擊提供了把柄。[203]當蘇聯人可能為了影射毛而堅持這一條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沒有得到主席的授權就接受他們的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毛如果責備劉和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在這個與他關係密切的問題上作出妥協的話，他就不可能去機場歡迎他們歸來，他以前從未到機場迎接過。[204]

在克里姆林宮內長達兩個星期的爭論所涉及的其它主要問題上，對蘇聯人提出的每個條文，中國人都相應地補充了附錄。[205]這意味著，各方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旨解釋宣言。犧牲了條文的一致性以及統一行動的計劃性以達成表面的休戰，它持續了不到一年。

但是此刻雙方都保持了表面的禮儀。蘇聯領導人和中國代表團成員愉快地擁抱在一起照像留念，蘇聯人微笑著，而中國人相對來說不

露聲色，不過後來證明只有中國領導人樂意讓他們的人民看到這表示兄弟般友誼的「跡象」。[206]

在宣言上簽字以後，劉少奇作了一次短期的友好訪問，到了明斯克和基輔。陳毅在 12 月 14 日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到，目前的重點是進行反對美國的鬥爭而不是與蘇聯分裂，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威望必須得到支持。[207] 在爭論已接近分裂邊緣的情況下，中國人似乎極想表明其致力於中蘇友好關係的願望。如果北京希望在以後的論戰中得到更多的盟友，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讓別人看起來要有很誠實地贊成與蘇聯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的形象，只是由於蘇聯的錯誤和攻擊，才導致對抗的出現。

回顧從 1959 年早秋開始的那段時期，就可看出許多使中蘇論戰轉變成全面分裂的主要原因。由於在中印邊界爭端中蘇聯人所採取的態度以及莫斯科對美國採取和平共處的政策而忽略了中國的利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才被激發出來。中國人由於挑戰蘇聯人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制定行為規範的權力從而激怒了蘇聯領導人。雙方都認為對方背叛了自己，對蘇聯人來說，是中國人在世界工會聯合會會議上的所作所為，損害了蘇聯；對中國人來說，是蘇聯人從中國撤走了所有的蘇聯專家。

1959 年至 1960 年中蘇論戰中有兩個因素值得特別注意，這是因為它對最終導致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那些國內事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第一個因素是赫魯曉夫的作用。他的蘇聯同事們在多數時間內似乎聽任他為所欲為[208]，所以他放肆的態度以及帶有侮辱性的談話標誌著整個蘇聯對中國的態度，以及對毛個人的態度，從而加劇了中蘇在關鍵時刻的爭吵——1959 年 9、10 月份在北京，1960 年 6 月在布加勒斯特以及 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

中國人逐漸地覺察到赫魯曉夫這個人——他的政策、態度、行為——是中蘇分歧的基本原因。據說，劉少奇在八十一黨會議閉幕時會見赫魯曉夫時甚至向他建議，他作為蘇聯領導人應退出處理中蘇問

題的第一線，以便空出餘地來改善兩黨關係。[209] 這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為什麼赫魯曉夫在 1964 年下台時，中國人會作最後一次嘗試看中蘇關係能否得到挽救。雖然到那時，北京在論戰中已譴責了整個蘇聯的制度。相當重要的是，赫魯曉夫的作用有助於人們理解為什麼早在 60 年代初毛澤東就逐漸對共產主義社會的領導的本質以及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性發生興趣。這種興趣，正像我們在以後所看到的那樣，[210] 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把論戰提到了思想意識高度。這當然使論戰升了級，並使中蘇更加難以取得一致意見。當爭論越來越激烈時，中國人就會合乎邏輯地、也是不可避免地將他們對蘇聯外交政策的實質性分析進一步擴展到對這種錯誤的根源的追尋上去。中國人把這種根源說成是蘇聯社會的墮落[211]，而這使毛思索它在中國會產生的後果。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解決問題的方案。

第十二章 大躍進的終止

劉少奇的海南研討班

1961 年初，毛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在 1960 年，由於中國領導人的主要精力集中於中蘇論戰，因而妨礙了他們對國內事務的充分注意。[1] 黨的高級領導人和宣傳工作者要為新的一輪同蘇聯人的論戰做準備，[2] 只好把重要的國內事務擱在一邊。在 1960 年，中共中央召開了 6 次會議專門討論國際事務，其他一些中央會議的主要議題大概也是如此。[3] 黨的書記處的兩位負責官員，鄧小平和彭真，從 6 月到 12 月初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參加共產黨的國際會議，其間回到北京時，他們的主要事情大概也是與同事們磋商中蘇爭論。有四分之一的政治局成員留在莫斯科參加長達 1 個月的八十一黨會議。[4]

廬山對抗所造成的氣氛，掩蓋了國內事務的矛盾。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批評產生了刺激作用，使得毛、劉和其他領導人自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特別重視對經濟情況的深入瞭解。不幸的是，正如毛、劉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後來所承認的，由於需要證明彭德懷是錯誤的，他們對經濟情況調查研究的結果未能產生更為明智的政策。[5]

1959 年 11 月，劉到海南去做一個月的療養，他希望此行能夠緩解他的肩和肘部的劇烈疼痛。這種病是在革命歲月中留下的。[6] 這時，毛曾經責成他的同事們研究經濟問題，用經濟知識武裝頭腦，以便能夠正確處理大躍進中的經濟問題。因此，劉去療養時，也隨身帶了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當時毛主席也在讀這本書[7]。劉決定在療養時順便搞一個經濟研討班，這樣他可以在無可奈何的休閒中吸取教益。陪同他和他的妻子王光美參加這個研討班的有他的秘

書、醫生、護士和警衛，還有陶鑄和其他一些負責廣東工作的重要官員。[8]

劉還為研討班請了「教授」，受劉的邀請隨他去海南的有《資本論》的譯者王學文[9]，有薛暮橋，後者是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他當時已被解除兼任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和國家統計局局長這兩個職務[10]。按照通常的推斷，薛被解除上述職務是對他的處罰，因為他在大躍進期間的統計工作中堅持專家路線[11]，也可能是他為薄一波在廬山的發言準備了一份羅列經濟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提綱[12]。正因為如此，薛被邀請特別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對薛的批判並沒有這樣解釋薛的免職，但在毛死去之後透露了一個情況：薛曾因在「內部範圍」散佈一篇關於大躍進的教訓的文章（可能是他給薄的報告）而遭到批判。薛的觀點似乎反映了陳雲的觀點，只是薛的觀點表達得更加直率。[13] 由於廬山會議之後宣佈了統計工作令人難堪的失誤，薛似乎也只有辭職，以示對國家統計局准予公佈誇大了的 1958 年產量數字承擔責任，儘管這對薛來講是不公正的。[14] 薛顯然已經受貶，如果他的錯誤是與「右傾機會主義」有牽連的政治錯誤的話，那麼劉邀請他去海南的舉動便是非同尋常的。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文化大革命所斷言的劉和薛當時是在蓄謀策劃一項反毛的經濟計劃。在當時，劉恰恰需要爭取毛對他剛剛取得的高位的支持。[15] 不過有可能的是，劉用了一個月聽取薛的觀點，這對他在大躍進結束後為擺脫嚴重經濟危機而改變路線是有益的。

研討班開始於 11 月 10 日[16]，劉以非常認真的態度對待它。劉將學習比作「逆水行舟，不進則退」[17]，並在海南每每工作到凌晨。當他發現護士在等著為他治療的時候，便建議護士按正常時間就寢，直到他準備放下書本時，再讓警衛叫醒護士。就是在治療過程中，他也還是要讀書。[18]

遺憾的是，我們所見到的有關海南研討班的材料，談的儘是劉的道德品質，而不是他的知識積累。我們獲悉，劉在 11 月 24 日度過 61

歲生日時，曾經生氣地拒絕了特地為他準備的食品和蛋糕[19]，因為黨中央作出過不許為政治局成員祝壽的決定。[20]可靠的材料表明，劉少奇在研討班上表示，不贊成解放初期在幹部中實行部分供給制。[21]與此同時，毛則仍然熱衷於這種免費的「供給制」。他認為，這種制度可以消除資產階級關於身份的憂慮，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22]

據說，薛暮橋把研討班的討論記錄分發給了孫冶方和其他經濟學家。他們計劃編寫一本顯然是基於海南會議的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書，但是這個打算落空了[23]，大概是因為毛正在發表他自己的關於蘇聯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讀書筆記。不管怎麼說，文化大革命後出自經濟學家們之手的材料表明，劉從這個時期開始強調經濟中的現實主義。[24]這可能是因為劉自這時起定期請教那些經濟學家。[25]

劉在海南停留期間，曾經寫信給黃炎培。信中講到，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經濟發展應當成為60年代的主要口號。[26]劉在信中沒有說明怎樣發展才能成功，不過他明確地期望從前的私營工商業經營者將能夠發揮重要作用。[27]

毛的經濟研究

差不多與劉在海南舉辦研討班同時，毛自己也正在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進行研究。[28]對蘇聯當前在暴力革命、和平過渡和戰爭的論點所作的尖銳批評，在毛的讀書筆記中隨處可見，這些批評後來在紀念列寧的論戰文章中予以披露。[29]讀書筆記的大部分內容反映出毛試圖擺脫這本正統的蘇聯教科書的束縛，提出自己的經濟思想，以引導同事們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中國道路是毛同他的同事們一道披荊斬棘闖出來的。

毛著重強調對蘇聯模式的不滿和與蘇聯模式的不同之處：在建國初期我們沒有管理全國經濟的經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不得不全盤照搬蘇聯的辦法，儘管我們對此從未感到完全滿意。[30]

蘇聯的經濟學觀點認為，每一個舊的經濟階段的結束和新的經濟階段的開始，都是界限分明的。針對這種僵化的、絕對的關於經濟階段的看法，毛提出了世界處於永恆的流動變化中的觀點：

> 「徹底鞏固集體農莊制度」(105頁)，「徹底鞏固」這四個字看了不舒服。任何東西的鞏固，都是相對的，……宇宙間、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斷發生、發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徹底鞏固」的。……共產主義社會可能要經過許多不同階段。能夠說，到了共產主義，就什麼都不變了，就一切都「徹底鞏固」下去了，……[31](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毛將關於發展變化的基本觀點與經濟發展相聯繫，指出：「這本教科書中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都沒有，這是不能設想的。任何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32]毛引用到他最喜歡討論的主題，堅持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可能的，但是，發展總是不平衡的：

> 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是普遍的規律。這個普遍規律難道不能適用於社會主義麼？應當說，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同樣適用這個規律。矛盾、鬥爭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計劃工作中的各種平衡，也是暫時的，過渡的，有條件的，因而是相對的。[33]

這是一種哲學基礎，在此基礎上，毛能夠鎮靜地看待大躍進進程中的起起伏伏。正如人們可能想到的那樣，毛的讀書筆記中的許多處評論，反映了廬山以後、大躍進以前的激進情緒，而在1959年上半年他還持著比較保守的觀點。中國能夠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工業化[34]，但是與此同時，毛似乎顯得對怎樣實現這一點還不甚了了。[35]在另外一段話裏，毛堅定地強調，如果我們想趕上並超過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我們就必須提出高速度前進的計劃。[36]人民公社是人民創造出來的[37]，理應加以推廣[38]。熱烈的情緒和群眾運動——「讓人民行動起

來」[39]——是極為重要的；決不能過分強調物質刺激，否則就「無法擊敗」資本主義[40]：

> 艱苦奮鬥、擴大再生產、共產主義前景——這些是我們所必須強調的，而不應該去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引導人民前進的目標不是「老婆、別墅、汽車、鋼琴、電視機」。因為這是一條服務於個人而不是服務於社會的道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若是人們只盯著腳下而無遠大理想，那就有問題了：哪裏還有革命幹勁和革命熱情呢？[41]（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毛在 1959 年春天講了一句十分謹慎的話：「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當時，毛是引用陳雲的話。[42]毛此時重新提起，卻不同於 1959 年 4 月，他附加了一句大大削弱原句份量的限制語——「而必然並非一下子就可以認識清楚的」[43]。

毫不奇怪，毛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批評蘇聯教科書沒有強調上層建築對於促成經濟和社會變化的反作用。[44]更有趣的是，毛在一次關於價值規律的討論中坦率地承認，彭德懷對群眾煉鋼運動的批評是對的——群眾煉鋼運動得不償失，從狹隘的、短期經濟的觀點來看，甚至整個大躍進都是得不償失的；「但是從整體和長遠來看，這是很值得的。因為經過大辦鋼鐵的運動，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局面打開了，……這樣，就使我們有可能大大加快我們的速度。」[45]

令人失望的是，毛沒有談到當前和長遠的政策。然而，與強調優先發展工業的蘇聯教科書不同，毛反覆申明，「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工農業並舉」。毛估計，在 1960 年度，將拿出十分之九的鋼材用於重工業、十分之一用於農業。[46]毛還強調了各省份要盡可能自力更生。[47]

毛急於提出討論的一項重要政策是如何處理人口問題。不是如何控制人口增長速度，而是如何處理全國人口中農村人口所佔比例過高的問題。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農村，相形之下，美國只有百分之十三的農村人口。必須在農村建設工業（這肯定是大躍進的一

個關鍵因素），以避免出現城市人口過度擁擠的現象。當時所面臨的政策問題是：我們是打算防止農村生活條件劣於城市呢，還是打算保持二者大體相同，或者是打算使農村生活條件略優於城市？[48] 只有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學校長、經濟學家馬寅初，在這個時候有勇氣不顧周恩來對他進行友善的規勸，公開地一再堅持中國的人口規模必須加以控制。[49] 他的憂國憂民之心卻遭到徹底批判[50]，他本人也失掉了在北大的職位。[51]

不論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有多快，毛在 1960 年 3 月杭州會議上的講話清楚地說明，儘管他的眼光放遠了一點，因而對未來的規劃也更審慎，但是他對這個國家所能達到經濟發展水平還是抱有一些幻想。他推測，到本世紀末，中國鋼產量可望達到人均 1 噸的水平。即便假定從 1960 年到 2000 年間人口毫無增長，這也意味著要達到 6.5 億噸的鋼產量，這是一個完全不現實的數字。他還期望，到 2000 年時，中國的糧食產量都能達到人均一到兩噸左右的水平。即使按照根本不可能的假定——屆時人口沒有增加，這也意味著要達到 6.5 億噸到 13 億噸的糧食產量。當時，1958 年和 1959 年所報產量已經被迫壓低，據此，毛預測的產量數字是大得令人無法理解的。[52]

有一點也許是件幸事。中蘇論戰的嚴重危機迫使主席不能日復一日地關心經濟問題。在赫魯曉夫訪問北京以後的 12 個月裏，主席發佈的唯一涉及農業政策的具體指示是一封關於養豬問題的信，此信簽發日期是 1959 年 10 月 11 日[53]。但是，毛畢竟已經勾畫了黨在廬山以後所要遵循的總的政策方針。

以農業為基礎

早在 1958 年 3 月成都會議時，毛就強調農業機械化。接著，他在 1959 年 4 月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4 年以內小解決，7 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在 1959 年至 1962 年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主要是改良農業生產工具和實行半機械

化的農業生產。每個省、地區和縣都應當建立農業生產工具研究站，設計和試驗新的農業生產工具。[54]隨後，在廬山全會上討論到發展的優先順序時，毛指示，應當把農業作為整個經濟的基礎。同時，毛力主設置農業機械部[55]，事實上這個部很快就成立起來了，毛最信任的下屬之一陳正人負責這個部的工作。[56]

10月份，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積極倡議進行農業技術革新。這個倡議固然出於對穀物和棉花需求增加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大躍進使中國從一個勞動力過剩的國家變為一個勞動力不足的國家。薄舉出河北省一個人民公社的情況為例。這個人民公社在1958年還號稱擁有18958名勞動力，但在這一年的秋天，就有2000名農民離開這個公社湧進城市的工人隊伍。此外還有2000名農民離開農業生產崗位轉入社辦工業，其中一部分人在1959年春天又返回農業生產崗位（可以推測，這是農村群眾煉鋼運動萎縮的反映），但是這個公社的勞動力仍然不足。[57]當然，這只是勞動力從農村湧向城市的一個例子。這種情況導致城市勞動人口的迅速增長。城市勞動人口在1957年為900萬，1958年增至2500萬，1959年達到2850萬。[58]

其後，一直主抓農業的領導譚震林，從另一個角度詳細闡述了同樣一個問題。全國的農業勞動人口，包括全勞力和半勞力，總共是2.3億人，相當於2億個全勞力。全國可耕地共有16億畝，按比例，一個農民剛好有8畝耕地。但是，百分之二十的勞動力要用來搞水利建設，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大約有7000萬人參加水利建設。譚還估計，有3000萬人要從事副業生產，有500萬人投入社辦工業，還有1500萬人從事福利事業。這樣算下來，真正在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勞動力是農村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五十略強，大約1億左右，即每個農民平均要種15畝地。如果再考慮到每個農民平均每年工作300天，則用於每畝耕作地的工作日為20天，用於每畝播作地的工作日只有14-15天，這個數字對於全面貫徹「八字憲法」是遠遠不夠的。[59]譚指出，

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實現農業機械化，他再次重申了毛的四、七、十年規劃。[60]

新任部長陳正人為農業機械化的三個發展階段的每一階段佈置了具體任務。陳正人首先指出了只有百分之五的耕地使用了機器這一事實。接著他說，農業機械化問題在 4 年內達到初步解決，包括農業、畜牧業很低程度上的機械化和灌溉排澇工作的「基本」機械化；隨著農業機械工業的成長壯大，全國農村有一半可耕地可望實現機械化生產；大約十年內，全國農村將基本上實現機械化，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電氣化。[61]

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的幾個月中，農業機械化政策很快得到認真研究和貫徹落實。但是直到 1960 年，才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年文章中，宣佈了更為基本的政策，即以農業為基礎，處理好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迅速發展農業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李富春這篇文章的內容是總結 1959 年的經濟成就，提出 1960 年的任務。推遲發表這項基本政策的理由，看來是考慮到緊張的幹部們正忙於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應當避免在這個時候交給他們一項新的重大政策；不過，反右傾運動看來已於 1959 年底結束，可能是因為領導層感到，1960 年的躍進由一個有利於自己的正面運動來推動，比由一個反對不同意見、因而會導致許多爭議的批判運動來推動更好。除此以外，領導層還可能想到了在推出新的經濟政策之前，最好讓幹部們有個喘息時機，以緩解浮誇的統計數字所造成的思想震盪。[62]

即使如此，李富春必須闡明以農業為基礎是一項「引人注目」的新政策。[63] 李還指出「某些同志」對這項新政策感到不舒服，他們認為迅速發展農業會削弱現今執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李用若干篇幅來論述農業增長與工業增長的互補性質，並努力消除斯大林式的正統工業化信徒所持的疑慮。[64]

李富春在他的文章中宣稱，1956 年黨的八大提出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所要完成的指標，在這個計劃的頭兩年（1958-1959 年），已經或者

超額完成，因此應當為計劃的後 3 年制定「引人矚目的具有更高水平」的新指標，但是李並未冒失地對新指標提出具體建議。李還聲稱，8 月份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制定的工業指標已經完成，例如鋼產量達到 1300 萬噸，而指標是 1200 萬噸。但是他對農業的評價與此不同，農業遭受了「數百年來不曾遇到的嚴重自然災害」，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受到影響。從李的措詞方式來看，他似乎暗示 1959 年穀物產量大概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所定指標 2.5 億噸左右，而不是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所定 2.75 億噸的指標。可是 3 個星期後公佈的官方統計數字為 2.7005 億噸，這與前述第二個指標相差不大。[65] 不過這些數字都與實際相差甚遠，這一事實將在後面幾年暴露出來。

特別要指出的是[66]，李強調要以高速度按比例的方式來完成 1960 年的躍進。[67] 但是，他的文章的標題——《迎接 1960 年的新躍進》及其文章主旨，只能促使幹部們相信，由廬山會議肯定的大躍進的工作姿態和方法將在新的一年中繼續堅持。李著重指出「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重要性，號召所有重工業部門開展「規模浩大的」基本建設，同時要求所有企業單位繼續開展反右傾鬥爭。[68]

李富春撰文重申的大躍進，在文化藝術領域也得到反響。老作家沙汀在他 1960 年發表的題為《你追我趕》這篇短篇小說裏，描述了生產隊之間為爭得每月一評的放「衛星」獎而展開的熱烈競賽。其實，此類競賽是一種導致浮誇風的制度，農民們曾對彭德懷反映他們反對這種搞法：

> 自從開展競賽以來，人們的幹勁愈來愈大，榮譽心也更強了。在月終評比這種規模較大的場合，如果哪一個管理區評比垮，有的人還特別不好受。今年春天，石門因為在評比中一下從「飛機」垮到「牛車」，鄧大娘就氣得哭過。可是龍唯靈卻充滿信心鼓勵她道：「咋興哭呵？爬起來又幹嘛！……」[69]

石門模範生產隊的黨支部書記龍唯靈的話，使人回想起 1958 年大躍進高潮：

> 他用洪亮的嗓音不斷同幹部們談著下一段的工作計劃，滿口兵家術語：「據點」、「戰線」、「集中火力」等等。他沒有打過仗，但他懂得，他們是在同大自然作鬥爭。自從大躍進以來，實際所有農村幹部，幾乎都是這樣談莊稼生產的。[70]

現實生產中的龍唯靈們得到更左的省委第一書記們的鼓勵，大躍進先鋒河南省的吳芝圃就是這樣一位省委第一書記。這些省委第一書記們要使龍唯靈們相信，人民公社要比舊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有大得多的力量，能夠「更有效地與自然災害作鬥爭、改造並征服自然」[71]。吳再度成為《紅旗》雜誌撰稿人這件事本身，就是形勢變化的一個信號。吳大概是大躍進高潮時期最為剛愎自用的省委領導，他在 1959 年中小心謹慎，避而不向黨刊投稿，或投了稿也由總編輯陳伯達擱置一邊不予刊登。而在 1960 年，他卻在黨刊上寫了兩篇文章。這是他最後的兩篇文章，因為廬山以後的時代氣氛已經不再欣賞像吳這樣的人，他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也由別人接替了。但在 1960 年 1 月 1 日，吳還能誇耀河南的集體主義成就：29.8% 的生產隊實行免費供給制；46.9% 的生產隊實行食用糧免費供給制；19.1% 的生產隊實行基本食用糧免費供給制或者說是部分食用糧免費供給制；4.2% 的生產隊實行薪金與免費供給相結合的制度。總計結果，免費供給數額佔人民公社成員全部分配總額的 40%。[72] 據稱，當時全國的平均結果是，免費供給數額只佔人民公社成員總收入的 20% 到 30%。吳芝圃想通過實現更高的免費供給額來力爭河南成為「衛星省」。[73]

吳宣稱的一個「非常典型的兩條道路鬥爭的例子」表明，像吳這樣的人在 1959 年上半年實際情況不利於激進主義時，是怎樣為自己辯護的。在吳的例子中，有個生產隊把提供勞動力和安排生產全部交由個體家庭負責。[74] 作家王汶石（音譯）在一篇故事中對當時的典型情況做了形象得多的描繪，這篇故事講的是 1959 年秋廬山會議之後在一個村子裏所發生的鬥爭：

> 在生產中，他們推行個體合同制來反對集體化運動，這導致許多公社成員重新萌發了資本主義念頭，全都去搞市場投機買賣，以期迅速富裕起來。結果，集體的農田里草都長得比莊稼還高了，也無人過問。閻祖玉及其同夥搞到這個程度還不罷休，他們還要把農具和牲畜都永久地分給各家各戶，從而在實際上瓦解人民公社。[75]

在這時，故事裏的主角開始進行成功的反擊。

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自然要為攻擊彭德懷和右傾機會主義而拍手稱快，但就是這些材料也表明，在真實生活中，河南所展開的反擊出現過火的情況。這些材料承認，在 1959 年秋季，好幹部被錯誤地指控為「犯有嚴重右傾錯誤」。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繼任者劉建勳則提出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運動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弄得人人自危，父母之間、夫妻之間都不敢講話」。[76] 根據文化大革命後一份材料的說法，那場運動使河南省人民遭受了「更加嚴重的創傷」。另一份材料提到，1960 年在信陽地區過量徵收糧食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事端[77]。劉少奇 1960 年 4 月視察河南時，曾試圖對吳芝圃及其同事灌輸現實主義，他對低估困難和極端平均主義提出警告。[78] 但從河南後來的問題來看，他的話究竟發生了多少效力是很成問題的。1961 年末陶鑄回顧這個時期時講：

> 在 1959 年 3 月之前，主席就發現，我們不能刮「共產風」，而要實現三級所有制。<u>如果我們當時這樣做了</u>，事情會和今天很不一樣，我們獲取經驗所花費的時間會短一些、付出的代價會小一些。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做？就是因為廬山會議上出了個彭德懷元帥，從那之後，反「左」運動變成了反右運動。[79]
> （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直到 1960 年的頭幾個月，儘管第二次的躍進甚囂塵上，但實際情況清楚表明，食品情況沒有改善。5 月，一位有同情心卻不乏批評態度的蘇聯科學顧問米哈伊・科羅契科的觀察是這樣的：

> 眾所週知，每個成年人每個月只能配給二兩多肉，政府動員人們自願省出這點可憐的供應給從事特別繁重的體力勞動的工人享用。大家也都知道，麵粉和米的配給份額也已經減少，在南方某些地區已經部分或全部由玉米代替大米配給。1958年在北京市場上隨處可見的糖和麵包，現在只能在高級飯店的小賣部才能買到。只有作夢才能見到充足供應的時鮮水果和蔬菜。棉製品的配給額減少了大約 50%。[80]

當時的條件困難，於是一些省一級的官員將食品作為禮品送給中央領導。例如，周恩來曾收到一些送來的魚，但他命令辦公室工作人員給那些熱心的官員打電話，批評他們的舉動。他們不該認為他這樣地位的人能享受特殊待遇和特殊權力。[81] 據報道，劉少奇也嚴格遵守中央辦公廳發放生活費的標準。[82] 那時，最高領導者每日的伙食標準是 2.40 元[83]，僅僅允許在自家種糧種菜補助。劉的秘書們在中南海內劉的辦公室和住宅旁邊種上了蔬菜，劉自己也和警衛們一起種菜豆。住在附近的朱德夫婦則因種植南瓜等而出名。[84]

雖然中國領導人個人嘗到了困難生活的滋味，仍然不能改變大躍進第三年的目標，也許春季他們認為匱乏是 1959 年的惡劣氣候造成的，而 1960 年的好運氣將能恢復 1958 年後期那短暫的好景。不管怎樣，3 月 29 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年度會議，要求糧食和棉花增產 10%，生豬增長 35%，這或許反映了前一年秋季毛所表達的意願。[85]

這次全國人大會議重新拿出擱置已久的農業十二年發展規劃上，對這個規劃給予重新肯定，並正式採納。新通過的規劃與以前相比，內容上只有一處明顯的變化，就是要加以消滅的四害之一麻雀換成了臭蟲。此舉糾正了消滅麻雀的這一災難性錯誤。消滅麻雀是 1958 年幹的事，其結果是，通常靠麻雀捕食消滅的那些害蟲繁衍成災。農業生產合作社變為人民公社，這一發生在農村的最重要的根本性變化，在最後這個版本中竟然沒有反映。所以說這個文件帶有陳舊的氣息。似乎政治局只是為了在第三個躍進年作些姿態，但是沒有人再有耐心根

據 1958-1959 年的生產指標對規劃加以修改，因為人們對那個指標的信心已經嚴重動搖。[86]

城市人民公社

城市中第二次大躍進的主要象徵是城市人民公社。1958 年在城市中進行了一些建立人民公社的嘗試，但是年底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將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事擱置起來，來自城市居民的普遍反對顯然是擱置此事的一個因素。可是由於廬山會議的結果，反對意見卻靠了邊。

城市人民公社以三種模式發展，這三種模式的區別在於其組織中心：工廠、政府機構或學校、或者是居民區。公社規模大小不等，每個公社的平均人口為 2 萬～ 3 萬人。像宣傳農村人民公社一樣，黨的宣傳工作者極力論證這種新組織的主要優越性在於產生新的勞動力，特別是由於民辦食堂和幼兒園的成立而使婦女勞動力得到解放，並得到合理使用，讓她們在小「工廠」工作，使用廢棄材料做原材料，為正規工廠生產零件，或是生產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公社還關心範圍廣泛的福利和服務事業，工資可包含免費供給部分。城市不同於農村，人民公社的界限往往與城市行政區劃不相一致，如果這種情況長期持續下去，就會引起問題。[87]

有一個方面，城市人民公社與農村人民公社的情況完全一樣：人們用抒情詩歌讚美公社解決了其成員經濟的、社會的以至個人的種種問題，甚而能夠消除婆媳之間傳統的緊張關係。在 1958 年最早建立的一批城市人民公社中，河南省省會鄭州不可避免也在其中。在一個公社裏，人們寫了 3 萬首詩歌稱頌這個新組織。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

人民公社是百花園裏的一朵鮮花；
她的芬芳飄入萬戶千家。
我們一起工作，無憂無慮心花怒放；
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歡呼：

黨是我們的好領導。
人民公社偉大堅強。[88]

鞍鋼憲法

城市的左傾表現並不僅限於人民公社，也滲入工業領域，這種情況和毛澤東有直接關係。廬山會議期間，位於東北工業省份遼寧的中國主要鋼鐵中心鞍山的幹部提出一個反對右傾的報告，倡議來一個大躍進，提出一個高的、但卻可以達到的指標。毛後來追述，中央委員會「讀到這份報告時極為高興」。在彭德懷嚴厲抨擊大躍進之後，毛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他本人肯定特別高興。這篇報告立即通過電話傳達到全國各地，以支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同時，毛指示鞍山：要全力以赴反對右派錯誤，現在正是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89]後來，仍是在這次會議上，他對遼寧省響應他這一指示的速度大加讚揚。[90]

薄一波顯然是工業新路線熱心的執行者之一，也許是想彌補他曾經的過錯——他抨擊過大躍進，險些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廬山之後，他「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他所採取的措施之一是宣佈1960年的口號：「讓我們來個開門紅」。[91]。他的口號意味著每一天每個月都要出現新成就。據說，煤炭工業由於這些政策受到不小損失，在1960年下半年產量顯著下跌，「給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困難」。[92]

鋼鐵仍舊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儘管土法煉鋼已被基本放棄，制定的計劃仍然要求鋼鐵生產增長37%。增產的方法是把「小土群」鋼鐵廠變成「小洋群」鋼鐵廠，換句話說，如果有可能，就鞏固和提高土高爐的生產水平。如無可能，則換上一些比較現代化的設備。按照冶金部長王鶴壽於1960年4月10日在全國人大上的說法，這種增產方法就像東方升起的太陽，朝氣蓬勃，前景燦爛。據他統計，1959年兩類這樣的小工廠生產出的鐵礦石佔全國總產量的一半。小型現代化

工廠為農村地區提供了 400 萬噸生鐵、鋼和鋼材，除此而外，還為比較大的工廠提供了生鐵。王列舉一個這樣的工廠所生產的鋼不僅可用於製造手推車、鎬、錘子、鐵鍬、犁和耙子，而且其品質好到足可用以製造播種機、鋸床和「土車床」這樣的機器。[93]

王鶴壽承認這些小工廠生產效率低，例如過於依靠人力勞動。有人批評小工廠不是一種長期解決問題的方法。王不同意這種批評，「成百上千」的小工廠還太小，在今後幾年裏仍有必要繼續動員群眾，建立更多的小工廠，包括現代小工廠和土小工廠。[94] 根據 1958 年的經驗和廬山會議決定，王似乎沒有考慮過再次掀起一場群眾煉鋼運動。事實上，這樣的群眾運動也沒有發生，但是王顯然在利用現在的新形式以期重新挽回聲譽：去年夏天他曾敗在陳雲手下。

王鶴壽並沒把他倡導的群眾運動限制在小鋼鐵廠的範圍，他還談到鋼鐵工業的「大洋群」原則。為了在大鋼鐵工廠貫徹「多、快、好、省」的路線，這些工廠必須作出更大努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幹勁沖天地開展群眾運動。」[95]

王的建議看來直接受到毛於 3 星期前關於鞍山今後發展問題的談話的鼓舞。鞍山市委提出一份關於工業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這份報告建議的管理制度根本不同於鞍鋼當時正在實行的傳統管理制度，即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廠的管理制度的翻版。[96] 新制度的基本原則是：加強黨的領導，政治掛帥；發動群眾；「兩參，一改，三結合」，或是說，幹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改革過時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在工作中相互協調、密切配合；進行強有力的技術革命。[97] 毛在 3 月 22 日關於新制度的評論中，[98] 把新制度命名為「鞍鋼憲法」，並歡呼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99] 他在別處寫道，要破除對於馬鋼憲法的迷信。[100]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瞄準了「走資派」，尤其是瞄準了薄一波，其理由是他壓制鞍鋼憲法，代之以（於 1961 年底頒布的）工業七十條[101]。事實上，所謂壓制鞍鋼憲法並非薄一波之過，倒是恰恰反

映了中蘇論戰對國內工作的極大影響。毛後來承認，中蘇論戰導致了對國內事務的忽視。

當毛讚揚鞍鋼憲法之後，《人民日報》準備了幾篇評論以公佈其基本原則。該報主編吳冷西沒能批准發表這些評論，因為他正忙於準備列寧誕辰日的針對莫斯科的論戰文章。6 月，在上海的一次機械工業會議上，吳向鄧小平請示如何宣傳鞍鋼憲法。鄧說這事不急，現在大家都集中精力於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鄧還作了明確的補充，他認為關於這部憲法本身還有一些問題。[102]沒有證據表明，鄧當時說的問題指的是什麼。但是，作為一個例子，如果他當時有反對工業領域群眾運動的說法，吳一定會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交代。而且事實表明，即便沒有公開推廣鞍山「模式」，黨的幹部也很清楚在其他領域貫徹其基本原則的重要性。

陶鑄稱讚了汕頭的一個化學工廠，他認為這個工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提高了工人們的政治覺悟，避免單純強調物質刺激。他強調，這個工廠的突出成績是在沒有專家幫助的情況下取得的，職工的「衝天幹勁」使他們獲得連續的技術突破。[103]包頭（中國主要鋼鐵中心之一）煉鋼廠黨委書記強調了政治掛帥和發動群眾的重要性。[104]在此前後，周恩來讚揚大慶油田在實踐中運用了鞍鋼的原則。[105]

但是，蘇聯專家於 7-8 月突然撤走和 1960 年大躍進受阻，迫使中國領導人重新估價工業政策。鞍鋼憲法顯然成為這一過程的犧牲品。沒有一篇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表明，毛在 1961 年的困難日子裏曾經為保留鞍鋼憲法而鬥爭。

托拉斯

另一項政策性建議是劉少奇 6 月 10 日在上海機械工業現場會議上提出來的。這項政策看來是蘇聯專家撤退之後提出的。[106]劉號召組織工業托拉斯。但是直到 1963-1964 年，這一建議才得到明確。[107]

文化大革命期間，劉為此遭到攻擊。但不清楚的是，當初的建議是否嚴重偏離了毛本人在當時的想法。劉的原話是：「必須組織托拉斯，綜合性工廠和聯合企業。這也是生產關係的變革。」[108] 1958 年 9 月，正值大躍進運動處於巔峰之際，毛在武漢說，像武漢鋼鐵廠這樣的大型企業應當逐漸地轉變為綜合性的聯合企業。毛覺得，武漢鋼鐵廠除了生產鋼鐵，還可以生產機器和化工產品，甚至還可以從事建築。毛顯然是把農村人民公社作為典範，進一步指出，這樣的工廠還可以辦農業、商業、教育和軍事（估計是指民兵）。[109]

前面引用過的包頭鋼鐵廠黨委書記的文章表明，他們在認真落實貫徹毛的上述指示。他及時強調在大型現代化企業中開展群眾運動的重要性，其主要目的是表明，包頭是多麼忠實地執行毛澤東早先作出的指示。[110]

毛和劉都講過綜合性公司，兩人的差別在於，前者是橫向聯合的例子，即毛式聯合企業，後者是縱向集中，更符合托拉斯的概念。托拉斯後來在 60 年代發展為對整個工業部門或者整個貿易部門實行集中管理。[111] 毛於 1958 年 9 月倡導綜合性企業，但沒有充分理由證明，縱向集中不能包含綜合性企業的外延產業；一個鋼鐵廠應當能夠經營為其提供原料的煤礦。也沒有任何充分理由證明，橫向集中比縱向集中更具有無產階級性質。最後，從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或別的材料中都找不到證據說明，當劉在 1960 年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托拉斯建議時，毛對這一建議作過批評。主席倒是可能非常支持這一建議。在 60 年代後期，他對托拉斯的看法是否有變動，將在本書的最後一卷加以研究。

培養資本家

自 1959 年末至 1960 年初，中共的農村政策和工業政策的基本趨向是左傾的，但在一個重要方面，黨表現了務實精神，有可能後來被說成具有右傾性質。這種務實體現於針對工商業者的政策之中。這些工

商業者的資本在 1956 年被贖買，他們的商號轉變為公私合營公司。[112] 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明確暗示，毛本人同意這一新路線，並且可能是新路線的發起人，而劉少奇則是主要的政策發言人，而在其後卻因此受到非難。[113]

擔負這項工作，劉少奇是一位合適的人選。人們不會忘記，劉對毛在 1957 年的開明路線所抱有的矛盾心理，人們也不會忘記他扮演的角色：同彭真一起，終止了開明路線的試驗，發動了反右運動。[114] 在資本家眼裏，毛和周恩來都試圖彌合黨與黨外人士之間的裂痕，而劉少奇則是典型的黨的高級幹部，他主要關心的是保持黨的思想意識的純潔性、保護黨的利益。對劉來說，可悲的是即使在他成為國家主席之後，他的謙虛緘默的本性使他顯得超然崇高，他在 1966 年的下台則被看作是黨內的而不是國家的事情。不過正因為他與黨外人士保持距離，因此他在 1960 年初對他們所做的承諾就更顯得可信，如果該承諾來自（比如說）周恩來，則不會如此。

鑒於前幾年的經歷，中國資產階級此時感到焦慮不安。1957 年，他們響應毛的號召對黨進行批評，結果被打成「右派」。1958 年，由於中共熱衷於動員群眾，並以此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他們事實上被拋到一邊。1959 年，他們目睹了對經濟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右派錯誤的批判，焦慮日增。與他們接觸最密切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後來說，「由於種種錯誤干擾，他們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尤其是害怕黨內整風和反右鬥爭會擴大到黨外，害怕 1957 年對資產階級右派的反擊會重演。」[115]

廬山會議後，劉試圖安撫資產階級的第一個舉動是召集最高國務會議。最高國務會議是根據憲法產生的實體，國家主席通過國務會議召集共產黨人和黨外人士一起討論重大政策問題。毛把最高國務會議作為傳遞信息的工具，向非黨人士說明黨所做出的決定，以提醒他們注意即將發生的政策變化。劉的第一次最高國務會議於 1959 年 8 月 24 日舉行，周恩來簡要介紹了對經濟計劃做出的修改和反對右傾的必要

性，劉講了國內外的基本形勢。[116]黨外人士仍然認為劉讓人捉摸不透，也摸不清毛澤東是否還具有更高的權威。因此僅僅過了3個星期，劉少奇再次召開同樣是這些人參加的特別會議，主要是對同樣議題交換意見。[117]

劉安撫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努力是他於11月29日寫信給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黃炎培。中國民主建國會是會聚商業界人士的兩大組織之一。劉在信中陳述，在以後的十年中他個人將致力於經濟發展而不是意識形態改造。除此之外，劉闡明他堅信只要商業界人士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付出主觀努力，並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多數的思想是可以得到改造的。[118]

中國共產黨不願看到「工商界」人心浮動。在毛的指引下，中共正在極力強調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119]。第二次大躍進的基本特色是，工作重心將從「土」型工業轉為現代工業，但是仍然把動員「群眾」作為基本路線。資產階級工業家和技術人員的態度，對於成功地實現這個轉變是至關重要的，必須安撫他們，拉攏他們。於是，在劉寫這封信的兩星期後，估計是在李維漢的同意下，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另一個主要的工商界人士的組織——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在北京舉行了全國代表會議。會議於1959年12月16日開幕，正式會期從12月19日至1960年2月21日，為期兩個月。在此期間，會議通過經討論而起草的一個文件。[120]

會議開始時，進行得不順利。「許多代表精神緊張，為了能夠過關，在發言時拿出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在會議上不時表明他們對黨的支持，並進行自我批評，以通過檢驗。」估計是李維漢看到這種反常情況，便建議兩個會議一起舉行，並實行「三自」、「三不」原則：自己提問題，自己分析問題和自己解決問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看到「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顧慮」，劉少奇又被請出來強調李維漢和中央統戰部傳達的信息，令他們放心。[121]

2月11日，劉少奇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要求對資本家們的工作和進步採取積極態度：在1962年取消定息之前，我們還有3年時間。在這3年之中，我們必須做好工作，採取積極的態度和措施。[122]根據另外一則報道，他說，由於資本家們正在向黨靠攏，黨也應當向他們靠得更近一點。[123]

第二天，劉接見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的常委會委員。[124]按李維漢後來的說法來看，劉這次談話的基本內容是建議互相合作：商業界人士應當「注重自我改造和為人民服務」，而國家應當「滿足工商業界的物質利益」。[125]但是事實上，劉的講話對這一點並沒作出具體的保證。

工商資本家在1956年被迫將產業參加公私合營時，給他們的甜頭是：資本是被贖買下來的，至少在1956-1962年的7年當中，他們可以領取股息。1957年整風運動期間，一些人大膽建議，股息期限應當延長為12年，但是這些要求遭到指責和批判。[126]劉在政治局的發言表明，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他對工商界人士的講話是坦率的，但是仍然暗示了重新考慮問題的可能性：

> 定息取消以後怎麼辦？我們還沒有想，工商業者現在就想了，這也難怪，因為對他們是切身問題。這個問題，毛主席有過指示，7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時可以留個尾巴。現在還是這句話。至於尾巴多大多長，我們還未研究，你們可以想想，我們也可想想，時間還來得及。……真有困難，總要解決。[127]

與股份紅利相聯繫的一個問題是工商界人士領取高額薪金。從劉的講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一些聽眾抱有希望，希望能夠提高他們的薪金，以補償他們在股息方面的損失。劉是這樣勸導他們的：「原來的高薪不減，也不好再增加。」他能做的全部保證是，將會妥善處理任何因為工作調換而造成的薪金減少。由於當時國家尚未作出退休待遇的規定，劉許諾，國家會照料所有與之合作的經營者。眼下「暫時」

的安排將短期內保持不變，即不能繼續工作的工商業界人士退離工作崗位，但卻繼續領取全部薪金。[128]

總之，劉要工商業人士相信黨：「不論老、病或有其他困難，國家都負責到底，包到底，這點請各位放心。具體辦法還要議。總之是照顧到底，不要擔心。」[129]

期待換來的結果是，工商界人士繼續改造世界觀（當然是通過溫和的方式），這樣他們可以愉快地接受社會主義。他們的個人利益必須服從集體利益；「凡事都應以最大多數人的最高利益為準則——這是一個基本要求」，這句話是劉的功利主義格言[130]。劉在聲明他個人所深信的一個信念時，是這樣講的，從長遠的觀點看，很好地照顧多數人的利益，就能夠最好地照顧到個人的利益。[131]

從劉對工商界人士的談話內容看，沒有表明中共對他們要採取新路線，人們只能推測劉少奇和李維漢的友好態度準確無誤地向工商界人士提出了保證：他們不會成為反右傾運動的目標。儘管沒有人對在1962年以後繼續發放股息作過任何保證，可是李維漢以個人身份對工商業者這樣講道：工商界人士至少可以因為終止股息而摘掉資本家的帽子。文化大革命期間，據說劉在1960年指使李起草一份於1962年摘掉資本家帽子的計劃[132]。劉顯然不曾打算勸導大批經過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加入中共。他告訴他的內弟，一位工商業家，這樣做將降低他們在國外的影響。[133]大概劉也意識到，在中國，共產黨人和資本家為了國家和自身的利益合作共事，這種國家形象比蘇聯實行鐵板一塊的一黨制國家形象，更受國際社會歡迎。

工商界人士雖然不可能得到入黨機會，但也有足夠的動力投身於一項使全國上下為之狂熱的計劃，這樣才能在這場政治談判中最大限度保障自己的利益。[134]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的領導人在外來激勵之下給毛呈上一封信，信的語句有點像向上帝祈禱的味道：

> 我們有許多缺點和錯誤，但是我們得到了堅定有力的引導和真摯的幫助。我們得以不斷地提高覺悟、增強信心，清除資

> 產階級思想、樹立社會主義思想，因此我們才能繼續進步。敬愛的毛主席，黨和您如同父母般的對待我們，黨和您如同老師一樣的教育我們。我們找不到合適的詞彙來表達對您的感激之情和對黨對您的熱愛之心……我們對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燦爛前程感到由衷的寬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天比一天完善，對我們來說，能同全國人民一道分享這一幸福是非常幸運的。我們為能生活在毛澤東時代而感到無上光榮。[135]

這封諛辭洋溢的信也許是寫信人自我寬慰的一種手段。1960年初，主席和黨也得到他們的感激。蘇聯專家撤走以後，曾經的中國資本家的專業技能變得更加重要。如果那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才向他們作出友善的姿態，其效果無疑會大為降低。

教育改革

到了大躍進的最後一年，中國實業家的憂慮與中國共產黨對他們能夠作出的諒解之間形成對照，這也暴露了中國政治生活的矛盾性。1958 年不斷高漲的狂熱症，與 1959 年上半年持續出現的現實主義交相融合，形成了 1960 年混亂、複雜的局面。這種複雜和混亂在文化領域以及經濟領域都是顯而易見的。

在教育方面，1959 年初的向右轉意味著要再度強調教育的質量。在 1959 年 1 月召開的一次馬拉松式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宣傳部長陸定一承認，由於「狂熱、魯莽和不恰當的思想方法」，在 1958 年的教育「大」發展期間犯了錯誤：「在大躍進中，我們的文化教育工作出現了什麼情況？總起來說，有了一個大的躍進；具體地說，某些方面躍進了，某些方面沒有躍進，某些方面還倒退了。」[136] 他強調教育改良而不是教育改革[137]，要提高而不是要降低[138]，要培育尖子[139]。教育部長楊秀峰在 1959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報告時說，中小學必須全力以赴地盡「最大的努力去提高基礎訓練的教學質量，以便為今後學習文化科學知識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140] 同年稍後一些時候，陸

定一對各省的文化和教育負責人說，在有些地方，寧可不辦小學，也不搞不成樣子的小學。[141]

1959 年 1-3 月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顯地引起了教育界的重新思考，進而產生了 1960 年的教育改革方案。[142] 儘管廬山會議後重新出現躍進情緒，但教學質量問題仍受到重視。陸定一和楊秀峰在向 1960 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闡述改革方案時承認，自從 1949 年以來，數學和外語的教學水平在下降。事實上，「現在中學裏所學的數學、物理、化學中，有不少都是 19 世紀的舊玩藝兒，一點也不能代表今天的科學技術。」[143] 改變這種狀況的措施也被提出了。

但是，儘管改革的支持者們在他們的發言中強調要重視質量，但改革本身卻似乎產生相反的結果。改革方案的主旨，是要把現行的中小學 12 年一貫制改為 10 年一貫制的教育體制。各地已經開始不同方式的實踐以達到此目標。北京師範大學甚至提出 9 年一貫制也是可行的。雖然學制被縮短了兩至三年，陸定一認為仍有可能提高高中畢業生的水平，以達到目前大學一年級末的水平。

建議背後的動機，反映了大躍進經濟的失調。小型工業的快速發展，農民大量湧入城市，使得中國的經濟計劃者們繼續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教育改革的目的是試圖加速在校學生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進程。陸定一坦率地談到了這種狀況：

> 我們為什麼要提倡「十年一貫制」？因為孩子們從六七歲開始上學的年齡長到十六七歲被當作全勞力的時候，需要十年的時間……現在我們高中裏所有的學生都是全勞力，所以，我們沒有力量來普及高級中學教育，否則，我們從生產戰線上抽出的勞動力就太多了。[144]

但是，如果經濟戰線要求縮短學制的學生早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話，按照道理，大部分學校就必須增加課堂教學的比例。這意味著實行 1958 年的改革之後學生從事體力勞動的時間減少了。1959 年初，小學生平均每週從事體力勞動的時間為 4 小時，初中生平均為 6 小時，

高中生為 8 小時。武漢會議退卻的結果，使得人們意識到強調體力勞動必定會影響教學質量。師生們意識到，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學習。[145]

廬山會議之後大躍進再度復活，使人們對教育界的意見被拋到九霄雲外，中國領導人對大躍進作了再次肯定。1959 年 10 月，劉少奇就期望有朝一日教育能與生產勞動緊密地結合起來，工廠能培養出大學生、教師、工程師和幹部。[146] 1960 年 2 月，陸定一談到大躍進中興辦起來的農業中學的不景氣狀況。但他認為農業中學正被教育和勞動密切結合的全日制高中所代替。[147] 陸定一和楊秀峰在向 1960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裏說，學校需要增加而不是削減體力勞動，課時減少了，可以由增加課外作業來彌補。[148]

廬山會議後的復興傾向在教育領域裏還產生了一些別的影響，它為工農子弟上大學開了方便之門。1960 年，北京大學班級裏工農子弟的成分佔 61%[149]。蘇聯化學家科羅契科邂逅了一位 16 歲的姑娘，她原先是昆明科學院的清潔工人，後來成了這個城市冶金陶瓷方面的研究人員。她的大部分時間都和男人一起工作。[150] 在當地一所師範學院裏，他看到有機化學專業的低年級所用的課本，是他們一面學習，一面自己編寫的。[151]

毛澤東主張不要搞學術獎和學位，以保證這些學生的教授不會假清高。[152] 根據科羅契科在 1960 年上半年的調查報告，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北京中國科學院一位高級研究人員忙於帶領他那個研究所的 40 個人員經營豬場。[153] 儘管呆在實驗室和辦公桌邊工作的科學家比 1958 年多了，但仍然存在一個事實，一個人的學歷和地位越高，他浪費在會議上的時間也就越多。[154] 在北京地質學院，科羅契科發現，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在星期一上午的工作時間要進行政治學習，而在過去，這種活動只安排在週末。原因之一，也許是由於他們對閒置在那裏的設備缺乏使用知識。[155] 科羅契科認為中國的科學界狀況總的說來是不妙的。[156]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鼓吹者卻歌頌 1960 年科技革命和技

術革新的浪潮。後來，他們把大躍進的 3 年稱之為「偉大的教育革命」時期[157]。

意識形態的逆流

在較為嚴肅的意識形態領域內，廬山會議後也曾一度陷入了混亂。在這方面，沒有哪一位幹部試圖去將矛盾的目標結合在同一個政策裏（像陸定一在教育界做的那樣）。相反地，不同的領導者都在追隨著不同的政策。看上去並不存在什麼大的衝突，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幹將們已各就各位，準備行動了，爭論的焦點就是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著作的態度。

政治局在八大期間對黨章中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黨的宣傳機關得到的指示是用「毛澤東著作」來代替「毛澤東思想」[158]。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作出開展學習毛的著作的決定之後再一次被提了出來，也許是為了肅清彭德懷的影響和迎接《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的出版發行。中宣部一直維護著 1956 年的主張，直到 1960 年 1 月，中宣部批發了共青團中央關於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一個文件。很明顯，這個文件是經過劉少奇和鄧小平批准的。[159] 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認為，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詞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要到處引用。[160] 事實上，這一時期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運動由於書本短缺而受到限制。因為紙張限量供應，得到優先照顧的是學校教材用紙。[161]

兩個月以後，某宣傳機關以此為題寫了一篇報告，提出要謹防把毛澤東著作庸俗化，並舉例說，有人牽強附會地將醫療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歸於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結果。[162] 同時，一位乒乓球運動員寫的一篇文章也由於同樣理由受到批評。這篇文章說學習毛澤東著作如何使其在比賽中獲勝。批評這篇文章的有譚震林等。[163]（但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受讚賞）[164]

劉少奇提醒人們不要把什麼成果都歸功於學習毛澤東著作，而且指示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樣的詞句用於對外宣傳。[165]當黨內的狂熱分子把毛澤東歡呼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世界革命的導師的時候，彭真採取了同樣降低調門的態度。他還提出，在馬克思列寧之後，無需對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和理論作進一步的研究了。[166]陸定一解釋了為什麼不能說毛澤東的思想超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因。[167]

一股逆流來自康生。1957 年前後，康生似乎接替劉少奇領導高級黨校。[168]廬山會議後，他除了在黨校組織撰寫反擊彭德懷的文章外，還不斷地強調並要求黨校以學習毛的著作來代替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169]康生在 1958 年夏季曾形容毛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頂峰。他看起來很得勢，因為黨校負責人楊獻珍當時正由於說了懷疑大躍進正確性的話而失寵。[170]

另一名毛澤東思想的主要鼓吹者是國防部長林彪。1960 年中期，他發出了一系列強調政治思想工作重要性的指示。[171]他推行毛的「三八」作風，據說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反對這麼做。[172]他竭力支持民兵，明顯地同他的前任彭德懷對著幹。[173]

不過，林彪在這個舞台上最重要的活動發生在 9 月和 10 月，即他召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時候（他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174]）。他發表了重要文章熱烈祝賀《毛澤東選集》第 4 捲出版。

軍委擴大會議從 9 月 14 日延續到 10 月 20 日，實際上是在林彪對他剛贏得的這個職位作了一年多試探之後才召開的。在這次會議上，他制定了一個試圖建設新的現代化軍隊的原則，這個過程將在本書最後一卷加以研究。根據 1960 年的情況，在這裏論述他的主要原則就夠了。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石，是「統帥，是一切工作的靈魂和保證」。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軍的生命線」。與政

治工作密不可分的有四個主要關係。首先是人與武器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林彪寫道：

> 武器和人這兩方面我們都要重視，但是更要重視人的作用。精神的原子彈，即人的思想覺悟、人的勇敢，比物質的原子彈強得多，有用得多。掌握精神原子彈，只有我們辦得到，敵人是辦不到的。因而這是我們專有的，是帝國主義無法同我們比賽的。

其次便是政治工作與其他工作的關係，只要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各項工作也便做好了。政治工作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工作與其他方面工作的關係，思想工作是關鍵；還有書本思想與活的思想的關係，書本思想是需要的，而活思想則更重要。[175]

關於林彪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講話中的情況，沒有材料表明他高度讚頌毛澤東的思想，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資料卻透露：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的思想被稱為「馬列主義在當代的頂峰」[176]。陸定一指示宣傳機關不得使用這種讚頌之辭，這個指示當時沒有公開[177]。但即使如此，也可以作如下推論：如果在解放軍中強調思想工作，那麼只能大力學習毛的著作，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對軍事並沒有多少論述。林彪對《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的評論也許已經消除了對這一點的任何疑問。該卷收錄了主席在 40 年代後期的著作，論述了同國民黨決戰最後階段的問題。

這篇文章的題目突出了這樣一個主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178] 文章回顧了國內戰爭的過程，指出在每一個轉折關頭毛澤東的戰略戰術都是正確的，並且大膽地向俄國人暗示，共產黨只有通過革命暴力，才能奪取政權。林彪提出了如下評價：這部書的出版，是「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偉大事件，因為這部書反映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中取得的勝利」。他總結說，不論是對他的高級同事，還是對蘇聯人和其他外國共產黨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

同形形色色的現代修正主義思潮作鬥爭，是我們當前的重要戰鬥任務。」[179]

意味深長的是，在北京出版的林彪文章的英譯本中，結束句中的「思想」一詞，並沒有像在文化大革命那樣予以大寫，也許是因為劉少奇發了指示，不讓在國外使用這樣的詞。但是，林彪卻舉起了毛的思想旗幟，這就在其他毛的第 4 卷評論者中引起混亂。有些評論者僅把評論限於主席的著作，其餘的人則同時評論毛的思想。[180] 這樣一來，林彪便撇開了 1956 年八大的決議（而且當年早期又重申過），並使他的同事注意到，他將把自己的命運和毛這顆巨星聯繫起來。而且這位元帥顯然得到了主席對他的作法的讚賞。

> 「四個第一」(即四種關係) 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達到了一個新的理論高度。[181]

毛林聯盟由此開始形成。

農業災害

然而，到了 1960 年秋，出現了比林彪的野心和毛的著作的正確名稱遠為緊急的事情，令中國領導人憂心忡忡。國家遭受了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農業災害，這個災難遠遠超過了 1959 年所受的災害，而且正是由於 1959 年的災害而變得更加嚴重。到了這年年底，9 億畝也就是超過半數的耕地遭災，有時連續遭災。

災害持續發生了幾個月。1960 年最嚴重的問題是旱災，春旱和夏旱影響了除西藏和新疆以外各省的 6 億畝農田。有 13 個省在春夏兩季都遭受旱災。受災最嚴重的是華北的河北、河南、山東、山西諸省，那兒 60%的農田遭受了 6 至 7 個月以上的旱災。山東受災最嚴重時，這個省的 12 條河中的 8 條乾涸，在 3 月和 6 月的 40 天內，在黃河下游可以直接涉水到對岸。

山東還受到影響了 12 個省的颱風和水災的猛烈襲擊。除山東省以外，受災最嚴重的是東北三省和其他沿海省份如廣東、福建和江蘇。遼寧東部遭受的水災是歷史上最嚴重的。

旱災不用說了，而大多數水災是由颱風造成的。颱風襲擊中國本土的次數是過去 50 年中的任何一年所沒見過的。從 6 月到 10 月受到颱風襲擊達 11 次之多，並且每次颱風都比往年持續時間長，平均在 10 小時，最長達到 20 小時。

而且大自然使出了新的招數。颱風不像往常那樣向西北方向衝擊，而是向北進攻。於是增強了它們的危害，因為這意味著它們不會受高山的阻攔，而且意味著中國西部的雨水更少。與旱災和水災俱來的，還有蟲害和農作物病害。[182]

7 月，中國領導人召開了例行的夏季工作會議，地點不在晦氣的廬山，而如同 1959 年一樣在北戴河。但基調卻大不同於前兩年，主張緊縮而非擴張的意見在盛行。就在這時，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首次提出建議，建議採取有效措施結束第二次躍進，並且提出了「調整、鞏固、提高」的方針。北戴河會議似乎沒有接受這項建議的行動，也許毛澤東還沒有準備面對另一場退卻，或者也許領導層正忙於考慮中蘇爭論問題，沒有多少時間進行經濟決策。然而，8 月底李富春向周恩來匯報時又一次提出了這個方針。這位總理肯定了這一方針，並加上「充實」二字。[183]

秋天，周恩來在國務院禮堂主持召開了一個小會。據說陳雲在這個會議上對國家經濟的困境作了出色的分析。總理完全同意這個分析。[184]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李先念開始贊同陳雲而非毛澤東了。[185]也許大約在此時，薄一波放棄了左的傾向，採取了他一貫的溫和立場。[186]但是，即使所有經濟計劃制定者的意見都一致，經濟緊縮的全套方案還必須得到毛澤東和同他一樣觀點的人的同意。這個任務交給了周恩來和李富春，其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當時，毛、劉和鄧小平專心致志地對付莫斯科會議，因此周和經濟計劃制訂者們再次獲得了對

經濟的實際控制。鄧和彭真出國期間，李富春主持書記處工作[187]。由於周恩來實際參加書記處的會議，李富春是書記處成員，因此書記處基本反映了國務院的意願。

毛澤東別無選擇，只有贊同。如同 1959 年春季一樣，他突然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拚命試圖防止躍進的愚蠢行為無限制地加劇自然災害。10 月 27 日，他簽署意見，同意受災最重的省份之一山西所採取的措施，即從工業中調 110 萬人回到農業中去，以動員盡可能多的人力來恢復農田生產。正如毛澤東所承認的那樣：

> 如果我們不迅速改變目前農業戰線勞動力太少和勞動力太弱的情況，那麼所謂「以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和「以糧食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基礎」，就會成為空話。「人是每天要吃飯的，不論辦工業，辦交通，辦教育，搞基本建設，辦任何一項事業都離不開糧食。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當忘記這個最簡單的、千真萬確的道理」。

接著下了重要指示：「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各種有效措施，抽調盡可能多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迅速改變當前勞動力不足的嚴重形勢。」[188]這一指示下達到各省黨組織，其中一件有意思的事便是批准了山西省已經貫徹了 3 個月的政策。這個例子大概說明中蘇論戰是怎樣使毛不能集中精力解決極其緊迫的國內事務。但是，它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還有多少別的省也自行其是？可能毛的通知並非一個指示，而只是一個事後的追認。

下一步就是恢復對農民的物質刺激。公社模式的集體主義浪潮再次被迫退卻。雖然毛本人在第二次成都會議上反對平均主義，並且上海和廬山全會已經批准生產大隊所有制，但廬山會議後反右傾運動鼓勵了像吳芝圃那樣的人再次捲土重來，從而增加了公社對於大隊和生產隊的權利和特權。譚震林那樣的權威人物也承認，「五風」（平均主義、命令主義、瞎指揮、浮誇、幹部特殊化）[189]的重新抬頭，造成了公社的巨大損失。[190]

9 月，毛澤東向政治局常委會的同事們發了一個便函，重新肯定他在鄭州會議的最初立場，認為大隊（不是管理區）應當是所有制和核算的基本單位。[191]這個便函批准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工作的十二條緊急指示。緊急指示於 11 月 3 日發出，它看來只是重複 1959 年整頓公社時期已經同意了的東西。如果 1959 年的形勢實際佔了上風，那麼這個指示也就無需發佈了。中共中央樂於無條件地反對一平二調，這是毛在 18 個月前在鄭州的戰鬥口號。毛的便函發出之後，可能又由於 1960 年緊張的農業形勢，土地的基本所有制轉向生產大隊，有的交給生產隊。更多的集體收入應當分配給農民。農民也應當被允許種自留地，從事副業增加收入。農村市場被准予恢復，以出賣農民的產品。適當的勞逸結合，再次成為幹部們關心的重點，男人每月有4天假期，婦女 6 天。[192]

1960 年，大躍進正式結束了。一個經濟恢復的長征開始了。經濟恢復途中遭受了更多自然的和人為的挫折。目標是將經濟恢復到允許實施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程度，這個目標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達到。到那時，大躍進的精神和方法只會成為歷史的記憶。毛澤東的第二次大膽的實驗結束了。

結論

躍進的平衡表

大躍進不是結束在一片喜慶聲中，而是結束在一陣抱怨聲中。[1] 沒有舉行集會，沒有發表講話，也沒有印發小冊子。事實上，沒有發表過任何關於結束躍進的聲明。只能從 1961 年《紅旗》雜誌新年社論中做出推斷，社論把 1958-1960 年視為大躍進取得偉大成就的 3 年。這個雜誌沒有號召一個新的躍進。而是要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指引下奮勇前進——這種看來只是語義上的變化，卻包含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轉折。[2]

沒有哪一個政府願意承認失敗。當採取一項全新的政策時，對正被放棄的政策常常是加以粉飾，聲稱這個政策取得了成功。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1961 年 1 月舉行八屆九中全會，全會結束時發表的公報列舉了一系列的成就，主要是工業部門的成就：在世界的名次表上，中國的鋼產量已從第 9 位上升到第 6 位，煤產量從第 5 位上升到第 2 位；工業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已得到了「巨大的加強」；機床庫存量是 1957 年的兩倍多；工程師和技術員的數量的增長也超過了一倍多；工業生產的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率超過 40%，是一五計劃期間增長率的兩倍多[3]——至少是這麼說的。

直到 20 年以後，中國人才發表了對大躍進的更加客觀的評價——這是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在最後一批文化大革命的幹將被清洗之後，在鄧小平第 3 次復職以及實行「實事求是」的口號之後才進行的。

躍進期間確實出現了工業的迅速增長，但這種增長花費了巨大的代價，據官方記載，重工業在 1958 年和 1960 年間，以 230%的速度增

長。單單 1958 年，由於大煉鋼鐵，在冶金工業上的投資幾乎是以往的 3 倍，對重工業的總投資是以往的兩倍多。由於資金積累率從 1957 年的 24.9%提高到 1958 年的 33.9%，重工業產值明顯地上升了 78.8%。對重工業的高額投資，導致了對輕工業和農業投資的減少。普遍的高額投資還引起了消費的下降。儘管 1958 年農業生產下降，而且資本積累率達到了 43.8%的「危險」水平，但其躍進模式在 1959 年還是保留了下來。領導層企圖「通過各種人工手段」[4] 完成鋼的指標，導致了 1960 年經濟不平衡狀況的進一步加劇，投資比例達到了 39.6% [5]，再次超過 1958 年的水平。投資政策的不合理可以從下表一中體現出來。[6]

表 1：基本建設總投資中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投資比例（%）

部門	一五計劃期間 (1953-1957) (年平均)	1958	1959	1960
農業	7.8	10.5	10.5	13.0
輕工業	5.9	7.3	5.2	4.0
重工業	46.5	57.0	56.7	55.3
冶金工業	10.14	17.68	16.13	13.16

主要受益的是鋼鐵工業，它的產量從 1957 年的 535 萬噸上升到 1960 年躍進結束時的 1800 萬噸，據一個中國分析家說，工業的高指標是通過「強化開採」(煤的產量從 1957 年的 1.3 億噸上升到 1960 年的 3.9 億噸）[7]、「粗糙馬虎的超負荷操作和製造」等方式取得的。[8] 大躍進 3 年中生產出來的大部分鋼來自「土」鋼廠和小高爐，並且必須在「外國大爐」中再熔煉一次。「由於成本太高，質量太低，這種虛假的『生產高峰』沒能持續多長時間。因此，生產必須削減，這對以鋼作為原料的機器製造工業和許多基本建設工程是一個沉重的打擊。」[9] 第二個五年計劃末期，鋼產量下降到 700 萬噸 [10]。國營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上升了 8.7%，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下降了 5.4% [11]。輕工業由於缺少資金從 1960 年起連續 3 年萎縮 [12]。在這些投資數字中，人力的比重是令人吃驚的（表 2）。[13]

表 2

(百萬)	1957	1958	1959	1960
重工業工人 *	4.5	17.5	14.18	15.72
重工業勞動者 *	5.57	35.5		
非農業人口	106.18	122.1		
城市人口	99.49	107.21		
農業勞動力	192.0	151.0		192.0**

* 大概重工業工人是指在現代化工廠中工作的人，而重工業勞動者還包括那些土法煉鋼的人。

** 譚震林在 1960 年初使用 2 億的數字；見本書第 299 頁。

勞動力發生了巨大的流動，從農村流到城鎮，從農業流到工業。這種流動在 1958 年尚未顯示出嚴重性來，因為氣候不錯，農業產量增加。但就在這一年，由於誇大收成和建立提供「免費食物」的公共食堂，產生了一種「消費狂熱」，吃光了以往兩三年積攢下來的儲備糧。況且，對那些煉鋼的人還得進行額外的糧食補助，因此，當 1959 年自然狀況惡化時，由於 1958 年減少了 20% 以上的農業勞力，使人們無法應付這種困難。1957 年，農民人均須經營 8.8 畝耕地，而 1959 年則需照料 11 畝。並且由於耕畜數量銳減——大概是在成立公社時害怕被充公而屠宰的——使耕種尤為艱難。雖然重工業確實在大躍進期間提供了兩倍於前的生產資料（拖拉機、化肥等），但也彌補不了勞動力的缺乏，因為這些生產資料「質量差，不適用或者就是廢品」。[14]

毫不奇怪，自然災害和勞動力短缺的結合就對農業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使「饑荒」盛行於 1959 年冬，特別是在 1960 年至 1961 年[15]。大躍進年份的糧食數字現在已經公佈出來了，表 3 是現在公佈的實際數字與當時公佈的數字的對比。中國方面的資料還說明，1958 年的兩億噸的數字是什麼時候算出來的。據經濟學家薛暮橋說，這個數字是在 1961 年核實的，也就是在這些糧食吃光兩年以後。[16]

很明顯的是，1956-1957 年達到的生活標準，在此之後就下降了，直到 1965 年才恢復到躍進前的水平。[17] 躍進時糧食分配數如表 4 所示。[18]

表 3：糧食產量（百萬噸）

	1957	1958	1959	1960
公佈的（不包括大豆）	185.0	250.0	270.5	—
實際的（不包括大豆）	185.0	—	—	136.2
公佈的（包括大豆）	195.05	260.05	281.55	—
實際的（包括大豆）	195.05	200.0	170.0	143.5

表 4

糧食配給	1957	1958	1959	1960
每口人（公斤）	203.0	198.0	186.5	163.5

農民受的苦特別嚴重，政府從農民那裏購買供應膨脹的城市人口的糧食，是基於上報數字而不是基於實際產量。雖然可出售的農產品占農業產量的 15% ～ 20%，但國家的徵購數字在許多年超過 20%，有些年份超過 25%，1959 年高達 28%，而這一年糧食大幅度減產。在農村，儘管勞動十分繁重，但在許多地方糧食分配只有 200 公斤左右，有些地方低到 150 公斤。「當勞動者處於半飢餓狀態時，他們怎能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呢？」[19]

1960 年，服役於解放軍中的農民子弟用氣憤的評論公開講了農民的困苦狀況：[20]

現在，村裏農民吃的甚至比過去狗吃的都差。過去狗吃糠和糧食，現在人們餓得無法勞動，豬也餓得不能動。公社社員問：「毛主席會讓我們餓死嗎？」

毛主席住在北京，他知道農民的日常生活嗎？糧食收穫了那麼多，它們都上哪去了？

是毛主席讓他們吃糖咽菜的嗎？維修中南海（毛和其他領導人住的地方）的工人每月糧食定量為 60 斤（即每年 360 公斤）。但他們還抱怨沒有氣力幹活，而農民只有蔬菜和甜菜，根本沒有糧食吃。

城市有足夠的糧食，而且供應的儘是細糧，但在鄉村，供

應的儘是粗糧……甚至家中的病人也得吃甜薯。工人吃大米白面。為什麼農村生活那麼苦？

這些僅反映廣東某縣情況的議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透露出來的：2 萬人被餓死[21]。在全國範圍內，死亡率從 1957 年的 1.08% 上升到 1960 年的 2.54%，增長了一倍。1960 年人口實際下降了 4.5%。大躍進期間全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從一千六百四十萬到二千九百五十萬不等，都是躍進的後果。[22]

中國經濟學家回顧這段可怕的歲月時，都予以激烈的抨擊。當今的經濟學界老前輩薛暮橋曾談到「巨大的浪費和比例失調」[23]。孫治方把大躍進描繪成一場「社會主義的大破壞」[24]。曾擔任過國家計委副主任的駱耕漠說，「大躍進變成了一場大躍退」。[25]

以下數字證實了上述論斷。1960 年到 1965 年間，10 萬個企業都被關閉，大約 2000 萬人——1961 年春天為 1000 萬人[26]——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幫助克服農業的災害[27]。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全部損失現在估計為 1000 億元，幾乎兩倍於一五計劃期間對基本建設的總投資（550 億元）。把一五計劃與二五計劃相比較，情況就更清楚了（表 5）：[28]

表 5：平均年增長率（%）

	一五計劃（1953—1957）	二五計劃（1958—1962）
國民收入	8.9	-3.1
工業生產（產值）	18.0	3.8
農業生產（產值）	4.5	-4.3
工業和農業（產值）	10.9	0.6

大躍進的起因何在？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用有分寸的語言評價大躍進[29]：

> 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
>
> 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

大躍進期間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同志之一譚震林說，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我們開始驕傲和不謹慎起來」；不斷強調對生產關係的改造（大概是指成立人民公社）；「過分」關注社會主義經濟的比重；不改革管理，不完善按勞分配制度。[30]

薄一波或許在大躍進期間是不情願地跟著「左」的傾向走的。他也說，毛澤東和其他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包括我本人」，變得「不謹慎、驕傲自滿和急於求成」起來。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發出成立人民公社的號召後，「由於他對形勢的不正確估計，以及過高地估計了人的主觀意志和努力的作用，一場重大的輕率行動產生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特徵的潮流在全國嚴重氾濫起來……公正地說，正是毛澤東首先號召糾正1958年犯的『左』傾錯誤」；但接下來便開了廬山會議。[31]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起初廬山會議開得很正常：

> 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

> 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 1959 年到 1961 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32]

駱耕漠指責說，1957 年和 1959 年的反右運動使黨內外人們由於害怕而只報喜不報憂——「所有統計數字和調查報告都不可靠，因為大家掩飾了農村糧食匱乏的情況」。人們一度爭論，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人民公社及其對勞動生產率和農民熱情的消極影響，還是自然災害。如果我們現在作結論，那麼就會說，「人禍」而非「天災」起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作用。[33]

在經濟方面，中國領導人為什麼如此不顧後果地傾力發展重工業呢？早在 1956 年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毛澤東本人不就強調了農業和輕工業的極端重要性並主張對它們作更多的投資嗎？1960 年，中國共產黨不是主張以農業為基礎的政策嗎？薄一波現在承認：「我們太熱衷於發展重工業了，使得其他方面經受了沉重的壓力。」[34] 也就是承認文化大革命中對自己的指責並沒有違背事實，即他在 1959 年至 1960 年間過分強調重工業。據兩位中國經濟學家說：「麻煩的是，過分重視發展重工業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的影響遠比黨的方針政策的影響更大。」[35] 雖說重工業要服務於其他的部門，但它只考慮它自己[36]。可能毛澤東絕沒有完全接受他在《論十大關係》中闡述的經濟思想，而這些思想似乎並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37]

毛澤東的作用

中國人對歷史所作的所有評價都是有根據的。這些評價真實反映了在那些黑暗年代裏平民和領導者們親身經歷的痛苦和災難。但是，1981 年 6 月，中國領導層對大躍進中的一個方面不可能完全直率地加

以評價——毛澤東的作用。甚至那些對毛澤東晚年最激烈的批評者，也不想重蹈在中國人眼裏看到的赫魯曉夫犯的非斯大林化的錯誤：揭露已故領導人太多的內幕，會使黨和黨的事業遭受危害。另外，共產黨領導層內部不同團體之間也要求互相妥協。

當然，毛澤東要負最終責任是明確的。但是，如果按照6月決議（譯按：即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說法來看，他僅僅是發動大躍進的一批人中的地位最高者。然而，任何一位不受中國政治規則所左右的人都一定會從歷史記載中得出下列結論：沒有毛澤東也就沒有躍進，沒有毛澤東也就沒有公社，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群眾性的煉鋼運動，沒有毛澤東也就沒有第二次大躍進的復興。

毛澤東或許也提倡注意客觀情況，但他企求取得震撼世界的進步的超常願望，又要求人們誇大成功。毛也許告誡人們不要超越社會主義階段，但他胸中燃燒了要立刻改造社會的烈火一般的雄心，又把他引向「五風」（譯按：即命令主義、浮誇風、平均主義、瞎指揮和「共產風」）以及公社化早期的極「左」。毛也許口頭上重視農業，但他要超過蘇聯和美國的夢想，卻使中國投入到以大煉鋼鐵為先導的群眾性工業高潮中去，因為鋼鐵是50年代衡量一個國家強大與否的國際標誌。毛澤東一方面反覆講要治病救人，另一方面卻在廬山會議上把彭德懷打倒在地，以至於重新發動大躍進，沿著錯誤的路線走向災難。對此，黨史決議（譯按：即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確予以承認。劉少奇、譚震林、薄一波和許多別的領導人都參與了上述所有活動，但是他們不像毛那樣脫離實際。

大躍進中也有可以肯定的東西。在任何發展中國家，很關鍵的一條就是，人們應當具有不做大自然的奴隸的思想。毛澤東對這個觀點是講得很透徹的，並且一直在這麼講。就像一位軍士長高喊口令，使新兵進入生氣勃勃的新世界一樣，毛澤東使他的人民充滿生氣。對於熱情高漲的基層幹部提出的目標，許多農民憑著經驗持懷疑態度，但

深信不疑的人被這樣一種觀念衝昏了頭腦：再加一把勁，他們可以衝破貧困的枷鎖。[38] 但是，大躍進的過分行為及其最終破產令人震驚，許多人不能從中恢復，轉而對經濟發展抱冷漠態度。

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幻想所打動。他們為了重新塑造中國而掀起一場革命。這位帶領他們從漫長的革命征途走向勝利的人，現在又以某種捷徑，帶領他們向烏托邦發起了衝刺。這不是遠在天邊的虛無的馬克思主義天堂，而是一個新國家——社會純潔，經濟強盛，受到各國尊重——立刻就會出現在中國的農田和工廠。駱耕漠坦率地承認，就連他這樣的經濟學家也被沖昏了頭腦：

> 當時有不少同志憂慮糧食這樣大幅度增產，如果不相當大量出口，就連大建國家儲備倉庫也難滿足要求，想用以後減少糧食耕地面積，改種經濟作物以至增添農村綠化面積來平衡。這類美好的長期遠景規劃，我個人當時也相當嚮往，現在想來是很天真的。[39]

但在當時，誰會去提醒作為神的毛說，大自然可以馴服，卻不可被踐踏；人們可以移山，卻不能創造奇跡；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裏成功，但思想革命卻需要幾個世紀。鑒於毛澤東在他的同事中擁有絕對權威（在廬山會議上，這種權威非常可怕地表現了出來），誰能說個不字——周恩來可能會說，陳雲肯定會說，彭德懷只是在大躍進發生之後才說了。總之，很少有人會這麼說。

那麼，劉少奇的態度如何呢？他謹慎而勤奮，本來應當發現這種輕率的運動是完全不妥當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他應當摒棄毛主義的唯意志論。他的形象純潔清廉，他應該躲開大躍進的浮誇和吹噓。但是，劉和毛一起制定目標，他幫著用黨來作為工具，他懂得群眾動員的方法。要逐步得到權力，與毛聯手推動經濟突破是個好辦法。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恢復曾在 1957 年整風運動期間黨所失去的威信呢？也許他或者任何一位毛的同事對大躍進產生過懷疑，但是他們大多數人又從毛主席在關鍵時刻一直正確的事實得到安慰，希望他還

會再次正確。如果說外國人，包括思想深刻的經濟學家完全不必相信但也相信了大躍進的成功[40]，那麼，為什麼作為這個美好前景的執行者就不能對它寄予厚望呢？

一些人也許記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社會的上層建築。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是書齋中的理論家，他們是外國人，決不會想像到中國會比自己的民族——德國先發生革命。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不在人世間了。而毛此時正在中國發揮他的意志，他認為意志可以改變經濟基礎（同馬克思主義觀點相左）。

當然，還有蘇聯顧問，他們確實說了個不字。但他們也是外國人，並且在中國人眼中是粗魯的和趾高氣揚的。他們發射了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但他們屠殺本國的農民，削弱自己的農業，而且他們的工業管理模式表明：他們一點也不懂得動員群眾。[41]此外，如果中國走蘇聯的路，那麼會幾乎不可避免地被指責為追隨者，而決非領導者。那樣做必定不適於任何中國領導人所追求的未來圖景，尤其在蘇聯外交政策有礙於中國利益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那麼，毛澤東本人如何呢？他也被自己的幻想所左右了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問題提得荒唐。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毛澤東已被迅速取得震撼性進步的思想牢牢地抓住。他不像劉少奇，他熱衷於動亂[42]；早些時候評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句話，集中體現了他的性格。他說：「『徹底鞏固』這四個字看了不舒服。」看來，他為自己所運用的權力所振奮。薄一波說，當毛澤東得知 2000 萬人被送回農村時，他又一次高喊：我們有 2000 萬人聽從指揮。除了中國共產黨外，有哪一個政黨能做到這一點？[43]

然而，儘管毛澤東富於幻想，但他有著靈敏的政治觸角。這是他在 1958 年秋天主動退卻的一個原因，黨的歷史決議對此加以肯定（另一個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只有毛澤東敢於決定退卻）。1959 年春天，他覺察出了危險，並指示進一步後退。

如果說他不願意放棄大躍進的話（如薄一波指出的那樣[44]），那可能是他不想去承認彭德懷的正確。然而，毛澤東已經準備好了辯護詞。1960 年 6 月，在總結十年工作時，他寫道：

> 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裏有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自由是必然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的認識過程中逐步完成的。[45]

最終，毛澤東全身而退。大躍進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國共產黨遭受的最大挫折。但在 1960 年大躍進結束時，毛並沒有像 1957 年結束大鳴大放的試驗時與劉少奇等人發生分歧那樣，和他的同事出現爭執。[46] 也許因為那些本可以利用大躍進的政治資本的人——周恩來、陳雲、李富春……從來沒有向毛澤東的個人地位和權威挑戰的意圖。

所以，毛澤東退到「第二線」去醫治他的創傷（在 1 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以後，他在 1961 年似乎很少說話），讓劉少奇和其他同事收拾殘局。[47] 對黨員們來說，一個時代的結束必定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這個新時代不那麼令人振奮，卻是一步一個腳印，雖然更加沉悶，卻更加平穩。

終於，毛澤東對他的同事為克服大躍進後的蕭條而試圖開闢自己的道路感到不快，他為自己的威望和權威的降低而惱怒。最重要的是，當中蘇論戰加劇時，他一直思慮著革命的變質問題，不斷促使他直接或間接地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來予以報復。隨之而來的政治大動亂，將是本書最後一卷研究的主題。

註釋

導言

【1】 關於中國人對大躍進影響的典型分析，參見結論。關於當時中國人對中國人口政策變遷的看法，參見劉錚、宋健等：《中國人口：問題與展望》，特別是第58～65頁。關於取消公社的提議，參見林田：《關於人民公社體制問題的探討》，載《經濟管理》1981年第1期，譯載於《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046》第L25頁。

【2】 有關1957年秋中國領導人的心情，以及對這種心情的形成原因的分析，參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的有關章節，特別是該卷的結語。(譯按：在以下各章的註釋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一律簡稱本書第1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一律簡稱本書本卷；凡作者標引的這兩卷著作的頁碼，均為英文原版本頁碼)。

【3】 上面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以下述著作或文章為基礎的：帕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1368-1968年》，尤其是該書第13～78頁；安托尼·M·唐：《農業政策及其作用》，見艾克斯坦、蓋倫林、劉大中主編的《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趨向》一書的有關部分，尤其是第466～468頁、第491～497頁；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第227頁；埃爾文：《中國歷史的模式》，尤其是該書第285～316頁；利皮特：《中國的土地改革和經濟發展》一書各有關部分。

【4】 參見艾克斯坦:《中國的經濟革命》，尤其是該書第54～59頁；安托尼·M·唐：《農業政策及其作用》的有關部分(見艾克斯坦、蓋倫森、劉大中主編的《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趨向》一書第503～505頁)。

【5】 關於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參見《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5卷第483～497頁。

第一編 衝鋒

第一章 毛澤東在莫斯科

【1】 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一直是大量研究的對象。我始終認為已經沒有必要繼續詳細加以論述。我所引用的資料來源，除註釋中已註明的外，還有布熱津斯基的《蘇聯集團：團結與分裂》、克蘭克肖的《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弗洛伊德的《毛與赫魯曉夫的對陣》和哈爾彭的《戰後世界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2】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0～341頁。

【3】 見本書第1卷第四章注16和注17。

【4】 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70～74頁。

【5】 見《人民中國》第23期(1957年12月號第5頁)；另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恩維爾·霍查對毛澤東路線的厭惡的評論:《對中國的感想》，第85～86頁。

【6】 見《彭德懷在外交領域的十大罪行》，《聯合報》1967年8月11日第4版第4欄。

【7】 赫魯曉夫在1957年5月發動了一場對蘇聯作家的反擊。關於蘇聯這一活動對毛澤東所產生的影響的論述，見本書第1卷第298頁。

【8】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71 頁。
【9】 他的報告有關部分，見《中蘇論戰之概觀 1963-1967 年》，第 44 ～ 46 頁。
【10】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65 ～ 66 頁。
【11】 同上，第 71 頁。
【12】 同上，第 106 頁。
【13】 同上，第 72 頁。毛澤東的 11 月 8 日的講話中可能提到這四個草案，見《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514 頁。
【14】 《中蘇論戰之概觀 1963-1967 年》，第 54 頁。
【15】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72、74 頁。
【16】 《中蘇論戰之概觀 1963-1967 年》，第 43 頁。
【17】 同上，第 44 頁。
【18】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239 號第 30 頁。本書第 1 卷第 41 頁引用過同樣的話。
【19】 見本書第 1 卷第 42 頁。
【20】 同上，第 299 ～ 301 頁、第 316 ～ 317 頁。
【21】 見謝蘭莉（音譯）:《共產黨中國在核時代的戰略》，第 76 ～ 83 頁。
【22】 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慶祝活動期間，舉行了兩次正式會議；一是 11 月 14-16 日召開的由執政的共產黨（除南斯拉夫外）代表參加的會議，並產生了一個宣言；另一次於 11 月 16-19 日召開，在莫斯科的 64 個黨的代表（包括南斯拉夫）參加，發表了一個和平聲明。
【23】 見《毛主席語錄》，第 80 ～ 81 頁。據說毛澤東的關於東風與西風的提法來源於一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譯按：即《紅樓夢》中的王熙鳳），見《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340 頁和《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12 頁)。
【24】 英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約翰·高蘭，引自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 1963-1967 年》，第 80 頁。
【25】 同上，第 79 ～ 81 頁。
【26】 同上，第 82 頁。
【27】 《人民中國》第 23 期 (1957 年 12 月號) 第 6 頁。
【28】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 1963-1967 年》，第 82 頁。關於他所說的對蘇聯的看法，見同上，第 83 頁。關於對法國共產主義者的看法，見費特勒：《中國——蘇聯》，第 199 頁。在 7 個月以後，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同樣明確地提出了同一理論（當時他對他的關於 29 億世界人口的估計進行了修正），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08 頁。
【29】 《蘇聯新聞》(倫敦，蘇聯大使館) 第 5493 期 (1969 年 6 月 10 日) 第 128 頁。
【30】 對俄國人的觀點的這種分析是以扎戈里亞的《中蘇衝突 (1956-1961 年)》第 155 ～ 160 頁作為根據的。
【31】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 1963-1967 年》，第 83 ～ 84 頁。
【32】 見中國政府 1963 年 8 月 15 日的聲明，引自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 1963-1967 年》，第 105 頁。
【33】 同上。根據麥克金托什的說法，俄國人的「新技術」一詞可能意為原子武器、導彈和電子戰設備。見麥克金托什：《蘇聯對美—中危機的態度》，引自哈爾波林所編《中蘇關係和軍備控制》第 206 頁。
【34】 哈爾波林：《中國和原子彈》，第 75 ～ 82 頁。
【35】 決議包括毛澤東在 1956 年 4 月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一講話當時雖未公開發表，但可以肯定俄國人已知道了講話的細節。見本書第 1 卷第 68 ～ 69 頁。
【36】 同上，第 313 ～ 314 頁。
【3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96 號，第 34 ～ 35 頁。
【38】 克萊門斯：《軍備競賽和中蘇關係》，第 17 頁。
【39】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44 號，第 27 頁。
【40】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96 號，第 34 ～ 35 頁。新華社在 10 月 30 日發表了這篇文章，但刊登在 10 月 31 日《人民日報》上。

【4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49 號，第 29 ～ 30 頁。
【42】《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45 號，第 27 頁。
【43】《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269 頁；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 1963-1967 年》，第 105 頁。
【44】吉廷斯：同上。
【45】見本書第 1 卷第 68 ～ 69 頁。
【46】引自謝蘭莉(音譯)：《共產黨中國在核時代的戰略》，第 102 頁；亦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63 號，第 48 頁。
【47】見科爾克維茲：《蘇聯軍隊和共產黨》，第 130 ～ 142 頁；倫納德：《斯大林之後的克里姆林宮》，第 253 ～ 260 頁。
【48】關於兩人之間的早期緊張關係的敘述，見本書第 1 卷第 147 頁。
【49】同上，第 67 ～ 68 頁和第 315 頁。
【50】見施瓦茨：《斯大林後的蘇聯經濟》，第 109 ～ 110 頁。施瓦茨評論說：「這是由赫魯曉夫率先發起，隨後不久中國人將此類做法稱之為『大躍進』。」
【51】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1957 年 11 月 6 日)，第 12 頁。
【52】當赫魯曉夫發出在畜產品的產量上超過美國的號召時，他說：「我們並不想用炸彈摧毀資本主義世界。如果我們能在肉、奶和黃油方面超過美國的水平，我們就是向資本主義的支柱發射了一顆重磅炸彈……我們敢於向美國挑戰，在某些極為重要的經濟領域同美國進行和平競賽……」(引自施瓦茨：《斯大林後的蘇聯經濟》，第 111 頁)。
【53】見註釋 51 的赫魯曉夫報告，第 24 頁。
【54】同上，第 22 頁。赫魯曉夫在此將美國 1956 年的這些產品的產量同蘇聯 1956 年的實際產量和 1972 年預計要達到的指標進行了比較。
【55】直到 1958 年 11 月赫魯曉夫向即將召開的蘇共二十一大提交關於七年計劃的報告時，他這個論點才予以公開。見《蘇聯新聞》第 3957 期 (1958 年 11 月 24 日)，第 167 頁。
【56】關於《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和口號(譯按：指「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的出台，見本書第 1 卷第 27 ～ 32 頁。在 1958 年 1 月的講話裏談到，《綱要》和口號出台的時候，毛還提到「促進委員會」，並指出這三者都是被 1956 年反冒進運動吹掉的(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47 頁)。從毛澤東在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分析，這個委員會不是提出 1956 年小躍進主張的某個或某些特殊組織。但他確實表明，全黨和政府要成為促進派而不是促退派的觀點。見《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492 頁。此外，在毛選的中文版中，毛在三中全會上的講話被定名為《做革命的促進派》。有關毛後來提到促進派(在成都會議上)和促進委員會(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情況，見《毛主席文選》第 83 頁和《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20 頁。我推測對《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即刻進行修改，是由於歉收而必須調整《綱要》中有關水利方面的條款，以使其能適應不久前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指示中闡述的現行政策。見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群眾性大興水利運動情況 (1957-1958 年)》第 11 章。有關《綱要》的錯誤的根據，見克拉特：《中國模式》，第 104 頁。
【57】《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490 頁。
【58】見本書第 1 卷第 312 ～ 315 頁。全會的舉棋不定大概是第二個五年計劃難以定案的原因。一個英國政治家在 1957 年 10 月訪問中國時，會見了薄一波，被告知周恩來一年前在中共八大上所提出的有關指標的細節正在研究討論之中，他明顯地感到指標的調整只會向下，見唐納利：《三月風》，第 241 頁。
【59】見本書第 1 卷第 7 章。
【60】在《人民日報》的 11 月 13 日和 19 日的社論中，分別稱為農業和工業的「高潮」。「大躍進」一詞的首次使用見 1958 年 1 月 31 日由毛澤東簽發的《工作方法六十條》(第 16 條)，見《當代背景》892 號第 4 頁，但官方並未公開使用。

第一次公開使用見 1958 年 2 月 12 日《人民日報》為全國人大的年度會議所發表的社論。

【61】《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2 卷，第 310 頁。

【6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50 頁。毛在莫斯科時與其他中央領導進行協商明顯有困難，他的主張估計是根據三中全會的決議。不清楚毛為什麼會發出這種警告，可能是他在莫斯科時，呈送他審批的一份財政部文件不令他滿意的緣故。

【63】根據薄一波後來的說法，見《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145》第 K33 頁。

【64】見《新華半月刊》，1958 年 1 號第 2 頁。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大會並致詞。不過，更具重要意義的是他在 5 個月後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認為提出趕超英國的「戰鬥號召」的是毛 (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7 頁)。但並沒有跡象表明劉少奇不贊同毛的意見，雖然他個人可能對發動這場運動的專斷形式有保留。人們得假設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大會之前，毛的高級同事們對他的首創很晚才有所知，但迅即表示贊同。宣傳機構也只在最後才瞭解到他的倡議，否則就不能理解《人民日報》在劉少奇 12 月 3 日講話時為什麼沒有強調這個重要的新目標。在 12 月 8 日李富春講話時也只粗略提及。

【65】《當代背景》483 號，第 6 頁。在次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一次內部會議上談到 15 年的目標是使煤炭達到 5 億噸 (為當時的 4 倍)，電力達到 4500 億千瓦的能力 (根據毛的說法，是當時指標的 10 倍，但實際上卻超過了 20 倍)。見《中國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12 頁。

【66】見《當代背景》483 號第 5 頁。

【67】李的目標，見同上第 10 頁。這些目標在八大上得到贊同，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集》，第 1 集，第 236 頁。

【68】見第 6 條，刊載在 1957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報》。

【69】《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集》，第 1 集，第 240 ～ 241 頁。這裏的指標是採用中國的計量單位：糧食為 5000 億斤，棉花為 4808 萬擔 (1 斤大約等於 0.67 公斤，1 擔等於 0.0492 噸)。

【70】《當代背景》483 號第 11 頁，按原來的中國計量單位是：糧食 4800 億斤，棉花為 4300 萬擔 (《人民手冊》1958 年第 26 頁)。

【7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55 頁。

【72】見克拉特在《中蘇爭端》第 37 頁的敘述。

【73】見本書第 1 卷第 315 頁「結語」注 14。

第二章 政治局委員巡視全國

【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56 頁。

【2】當劉少奇、周恩來和其他政治局成員在 12 月 12 日接見工會八大代表時，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在場 (1957 年 12 月 13 日《人民日報》)。

【3】12 月 14 日，周恩來陪同一些緬甸的高級領導人去杭州 (《人民日報》12 月 15 日)。根據《人民日報》在 12 月 17 日的一篇報道，毛澤東「在南方」會見了緬甸客人，可能是在杭州。12 月 22 日，周恩來同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陸定一 (政治局候補委員)、李雪峰 (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上海，他和上海的第一書記柯慶施一起視察了上海郊區 (《周總理的故事》第 55 ～ 58 頁)。1 月份，他在安徽 (《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第 347 ～ 348 頁)。12 月 20 日，劉少奇仍在北京，他接見了印度尼西亞和加拿大的黨的領導人，陪同他的只有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 (《人民日報》12 月 12 日)。由於眾多領導人外出，只好由具有威望但沒有實權的朱德元帥以國家元首副手的身份在一些重要的農業和財政會議上講話。除朱德外，還有 3 位擔任政治局委員的元帥沒有外出巡視：陳毅 (可能還忙著熟悉外交部的工作，他在 1958 年 2 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接替周恩來任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彭德懷和賀龍。

【4】 在北京最後一次在正式場合露面可能是在 12 月 2 日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大會上 (1957 年 12 月 3 日《人民日報》)。當緬甸副總理吳覺迎於 12 月 4 日抵達北京後，毛並未會見他，所以，毛可能在此時已離開北京。12 月 7 日，毛在一個未透露的地點會見了捷克軍事代表團。所發表的會見照片無明顯特徵，以此推測，會見不是在北京 (1957 年 12 月 8 日《人民日報》)。毛澤東第一次在杭州露面（見前注 3）是他在 12 月中旬會見吳覺迎和他的同事、(副總理) 吳巴端。再次報告毛在杭州的時間是 1 月 1 日 (1958 年 1 月 29 日《人民日報》)。1 月 3 日，他會見了由周恩來陪同的也門王子 (1958 年 1 月 4 日《人民日報》)。到 1 月 5 日，他仍在杭州 (《深切懷念羅瑞卿同志》第 121 頁)。

【5】 《當代背景》892 號，第 1 頁。

【6】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46 號，第 2～3 頁。關於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講話，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45～154 頁。

【7】 23 日，毛澤東在廣州會見了印度大使，《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01 號，第 29 頁。

【8】 毛澤東在 28 日和 30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54～159 頁。至少，毛出席了全國人大會議的開幕式（2 月 1 日）和閉幕式（2 月 11 日)，見 1958 年 2 月 2 日和 12 日《人民日報》。

【9】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61 號第 4 頁、1766 號第 1～3 頁。

【10】 3 月 5 日，毛澤東在成都視察了一家工廠，見 1958 年 4 月 7 日《四川日報》和 1958 年 4 月 11 日《人民日報》。

【11】 毛澤東在 3 月 10 日、20 日和 22 日出席了成都會議，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59～180 頁。有關他視察的報道，見 1958 年 4 月 7 日《四川日報》和 1958 年 4 月 27 日《人民日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66 號，第 3 頁。

【12】 見 1958 年 4 月 15 日《人民日報》。

【13】 4 月 2 日晚，毛澤東在武漢會見了一些波蘭領導人 (1958 年 4 月 4 日《人民日報》)。4 月 3 日，他視察了武漢的一家飯館，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79 號，第 1～4 頁。《人民日報》在 1958 年 4 月 15 日報道了毛在武漢的活動。

【14】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80～186 頁。

【15】 見 1958 年 4 月 22 日的《人民日報》，亦見《韶山紅日照千秋》，第 240、251～253 頁。

【16】 見《紅旗》1958 年第 1 期第 4 頁，1958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79 號，第 6～10 頁。4 月 30 日，毛澤東參觀了一個農業機械展覽。劉少奇、鄧小平、康生和陸定一在 4 月下旬也參觀了同一展覽 (1958 年 5 月 4 日《人民日報》)。

【17】 《人民手冊》1959 年，第 32 頁。

【18】 我們只能知道這次會議的大概日期，因為毛告訴我們這次會議是在南寧會議之前的 1 月份舉行的，見《當代背景》892 號，第 1 頁。並且，從《中國百科年鑒》(1981 年) 第 562 頁上，我們可以知道南寧會議是 1 月 11 日至 22 日召開的。毛說，在杭州會議上以及後來在南寧會議上的討論是《工作方法六十條》的基礎。在月底，他便制訂出《六十條》，見《當代背景》892 號，第 1 頁。

【19】 見 1957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報》。《綱要》修訂草案的這一條與原來的該條有所不同，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25 頁。現在僅只有吃糧食的麻雀被列為有害動物，該條不適用於城鎮和林區。

【20】 見毛澤東 1944 年 12 月 16 日為《解放日報》所寫的社論，引自《毛主席關於衛生工作的教導：1928-1966 年》、(《新人衛》翻印，人民衛生出版社，1967 年 6 月)，《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 22 號，第 5 頁。毛澤東於 1957 年6月13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512頁。

【21】 見 1957 年 11 月 30 日《四川日報》；同上，1957 年 12 月 26 日。

【22】 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07 號，第 10～12 頁，直到 1958 年 1 月 29 日，有關毛澤東視察的新聞才在《人民日報》上刊登。

【23】《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 22 號，第 11 頁。
【24】見 1958 年 1 月 16 日的《人民日報》。
【25】《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22 號，第 26 ～ 27 頁。
【26】同上，第 14 頁。
【27】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68 頁。
【28】喬治・蓋爾，曾在 1954 年陪同英國工黨代表團。
【29】威爾森：《中國一月》，第 207 頁。
【30】《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22 號，第 1 頁。這一指示的擬訂者毛澤東和《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1960 年版的有關衛生的條款，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 22 號，第 10 ～ 12 頁。
【31】見 1958 年 6 月 30 日的《人民日報》。
【32】至少，這是他在 1958 年發表的唯一的一首詩。
【33】譯文摘自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第 349 頁。譯者解釋「牛郎」是一個星座。還有另一首詩。
【34】關於醫學教育的改革，見《城市「老爺」衛生部反對「六・二六」指示的滔天罪行》(《紅醫戰報》和《八一八戰報》，1967 年 6 月 26 日)，摘自《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198 號，第 33 頁。有關發揚中醫問題，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 22 號，第 10 ～ 11 頁。
【35】蘭普頓：《大躍進時期的衛生政策》，《中國季刊》60 號 (1974 年 10-12 月) 第 668 ～ 698 頁。
【36】《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41 頁；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31 ～ 32 頁。
【37】毛澤東：《短論》，第 123 頁。
【38】見《(中國機械戰線的) 兩條道路鬥爭史》，《農業機械技術》1968 年第 9 期，摘自《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7 頁。
【39】薄一波：《崇敬與懷念——獻給黨六十週年誕辰》，《紅旗》1981 年第 13 期；《修正主義的吹鼓手》，《北京公社》1967 年 5 月 26 日，第 1 集第 3 頁。
【40】同上。
【41】見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 年》，特別是第八章：「中國與其他國家通貨膨脹的比較」。
【42】見夏：《共產黨中國的價格控制》。
【43】見本書第 1 卷第 87 ～ 88 頁。
【4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51 頁。
【45】同上，第 146 頁、151 ～ 152 頁；本書第 1 卷第 87 ～ 89 頁。
【4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48 ～ 149、151 ～ 152 頁。
【47】同上，第 149 頁。毛澤東稱政治局為「表決機器」，這一比喻含義清楚。
【48】《當代背景》892 號，第 9 ～ 10 頁。
【49】同上，第 10 頁。
【50】多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第 365 頁；亦見鮑大可：《共產主義中國的幹部、官僚主義和政治權力》，第 21 頁。
【51】多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第 517 頁。
【52】同上，第 365 頁。
【53】吳波的個人經歷的概述，見李嘉 (音譯)：《中共稅收系統》的附言第 17 ～ 18 頁。
【54】《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334 ～ 335 頁。
【5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49 頁。
【5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57 頁。這一資料來源明顯概括了毛澤東 1 月 28 日和 30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28 日講話的刪節本包括在《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第 1 ～ 3 頁，轉摘自《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10 ～ 14 頁。

【5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54 頁。這一說法首次刊登在 1958 年 6 月 1 日的理論性月刊《紅旗》第 3 頁上，摘自 1958 年 4 月所寫的一篇文章，但表述略有不同，並非出自這次講話；文件的譯文，見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 352 頁。
【58】同上，第 158 頁。高崗和饒漱石都是黨的高級幹部，高是政治局的 6 名最高成員之一，1954-1955 年期間被開除出黨。
【59】同上，第 159 頁。按《中國共產黨術語彙編》第 194 頁的說法，紅與專的名稱是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 1957 年提出來的。劉少奇在 1957 年 11 月 6 日的一次講話中強調了紅專結合的重要性，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00 頁。
【60】見本書第 1 卷第 298 頁。
【61】《懷念毛澤東同志》，第 208 ～ 213 頁。
【62】見《中國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13 ～ 14 頁。
【63】同上，第 14 頁。
【64】《當代背景》892 號，第 1 頁。
【65】同上，第 14 頁。
【66】毛澤東為《工作方法六十條》所寫的序言的時間是 1 月 31 日。這一文件顯然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在 2 月 19 日下發的（同上，第 1 頁)。2 月下旬江蘇省把這一文件發至縣委書記一級（根據 1958 年 5 月 14 日《人民日報》所刊登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一篇文章，轉摘自《當代背景》509 號第 6 頁)。但是，無法從內部資料中弄清毛的序言是為討論《六十條》的會議而寫的還是為幹部而寫的。一般說來，在南寧會議後毛為序言的「構思」和起草需要一段時間，他在南方視察期間，可能沒有時間顧及這一文件。同時，最高國務會議 1 月 28 日至 30 日召開，全國人大會議 2 月 1 日起召開。討論《六十條》的高級會議我推測是在 1 月 31 日召開的。
【67】《當代背景》892 號，第 1 頁。
【68】同上。
【69】同上，第 4 頁。「大躍進」一詞的使用似乎與水利建設有關，見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群眾性大興水利運動情況 (1957-1958 年)》，第 13 頁；亦見後面的注 99。
【70】關於 1956 年的第一個「高潮」的敘述見本書第 1 卷第 1 編。
【71】《當代背景》892 號，第 3 頁。
【72】同上，第 5 ～ 7 頁。
【73】同上，第 7 頁。
【74】《當代背景》892 號，第 7 ～ 8 頁。
【75】參見李富春在中共八大上的講話，引自本書第 1 卷第 124 頁。
【76】《當代背景》892 號，第 7 頁。
【77】同上。
【78】同上，第 2 頁。
【79】見第 8 條；同上，第 3 頁。
【80】李：《共產黨中國的統計制度》，第 71 頁。
【81】《當代背景》892 號，第 3 頁。
【82】李：《共產黨中國的統計制度》，第 72 頁。李敘述了（在第 77 頁）新的目標體系是如何被強加給國家統計局的以及如何指責舊體系是保守和消極的。
【83】1958 年 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刊登了一則關於試驗田的指示。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20 號，第 5 頁。種試驗田的運動是從湖北省的紅安縣興起的。下放幹部劃出試驗田，試圖找到更好的耕作方式，同上，第 5 ～ 12 頁。中央把這一運動作為鼓勵幹部聯繫群眾和幫助生產，實現又紅又專的方法。見 1958 年 2 月 15 日《人民日報》社論；亦見同上，第 12 ～ 15 頁。
【84】《當代背景》892 號，第 13 頁。
【85】見本書第 1 卷第 105 ～ 107、152 ～ 156 頁。

【86】 關於周在整風運動中的作用，見同上第 33 ～ 35、180 ～ 183、218 ～ 219、231 ～ 240 和 275 ～ 278 頁。
【87】《當代背景》493 號第 5 頁（李的文章）；494 號第 6 頁（薄一波的文章）。
【88】《當代背景》493 號，第 6 頁。
【89】《當代背景》494 號，第 9 頁；《新華半月刊》1958 年 5 號第 15 頁。
【90】 薄一波所說的目標見《當代背景》494 號第 15 頁。我所計算的 1957 年超過 1956 年的比例是根據薄一波的 1957 年的增產數據和《偉大的十年》第 95 頁所提供的 1956 年的數據（後一來源的數據與薄的數據並不一致。然而，我所感興趣的並不是實際產量而是薄制訂1958年目標的根據，因此，我未理會《偉大的十年》中的 1957 年的數據，儘管這些數據更為精確）。
【91】《當代背景》494 號，第 2 頁。按薄的說法，1957 年完成的主要工程比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多（同上）。
【92】《當代背景》493 號，第 11 頁。
【93】 在他的講話中有些矛盾之處，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94 頁。
【94】 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群眾性大興水利運動情況（1957-1958 年）》第 11 章（一畝等於 0.1647 英畝）。
【95】 同上，第 13 章。
【96】 見薄一波在 1958 年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講話，《當代背景》494 號，第 4 頁。
【97】 同上。李先念估計用於水利工作的投資要 60 億元（《當代背景》493 號第 12 頁），是計劃用於農業的國家投資的兩倍還多。
【98】《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第 40 ～ 41 頁。
【99】 1958 年 2 月 12 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掀起躍進的會議》。薄一波在周恩來逝世後透露，「大躍進」這一口號是由總理提出的。當毛澤東問包括周在內的一群同事，這個詞是從何處來的時，總理謙虛地保持沉默而讓其他人告訴主席（《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第 33 頁）。但是，尚不清楚是周本人提出來的還是周採納了別人的口號。1957 年 11 月 17 日，《河南日報》第二版上的一篇關於濟源縣山區的報道中使用了這一詞，該報在 1957 年 12 月 1 日的關於棉花產量的大標題中再次使用了該詞。至少在《河南日報》11 月 17 日使用該詞的一個月以前，《湖南日報》仍然使用的是 1956 年的「高潮」的口號，見 1957 年 10 月 20 日《湖南日報》關於擴大的六次全會的報道。據推測，「大躍進」一詞可能是在這兩個日期之間的某個時間裏提出的。我尚未發現其他省的報紙在這一時期內使用了該詞。當前，由於西方國家所擁有的這些報紙是不完全的，因此，不能絕對斷言該詞沒有在其他地方出現過。然而，河南省在大躍進中始終扮演開路先鋒的角色，似乎有理由假定該詞是出於河南省。亦見前注 69。

第三章 成都會議

【1】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要地》，第 96 ～ 97 頁；特里格：《中國地理》，第 76 ～ 77 頁。
【2】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時代和生平》，第 71 頁。
【3】 成都並不在中國人口最多的十二大城市之列，其人口數量甚至不及四川省的另一個大城市重慶。見《偉大的十年》，第 12 頁。
【4】 關於各省的 1957 年的人口數據，見同上，第 11 頁。關於餘糧省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見《陶鑄、趙紫陽在農村工作中追隨劉少奇的罪行材料》（《反修戰報》1967 年 7 月 8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19 號第 3 頁）。陶是中南地區的黨的第一把手。據該材料引用陶的話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誰手中有糧，誰就比別人更有力量。」亦見《令人震驚的政治迫害》、《紅色造反者》（廣州？）1968 年 1 月 4 日（《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23 號第 2 頁）。

【5】 湖南是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兩位最優秀的代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出生地。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比例，見沃勒：《中國共產主義政治人物的變更，1931-1956年》；亦見斯卡拉皮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英》第58頁。
【6】 有推測說，毛澤東將賀龍派往四川，以便同四川出生的劉伯承保持牽制平衡，見惠策恩：《中國高層軍事指揮機構：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年》，第19頁。
【7】 同上見圖表，A、C、D。
【8】 見第1卷第109、254頁。
【9】 見1957年12月5日《四川日報》。在國家的《農業發展綱要》作出修改後，四川省也發佈了該省的《農業發展綱要》修訂草案。
【10】 見古德曼:《李井泉和西南地區，1958-1966年:「土皇帝」的生活和「罪行」》，《中國季刊》1980年1-3月號，第74～75頁。
【11】 毛澤東1958年3月20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60頁。講話中所提到的用「×××」來表示的四川的領導人，肯定是指李井泉。李好像在中共八大上因四川省合作化過程的緩慢而露出窘態。據推測，毛在成都對李的評論，可能是讓李放心，不會因此而使主席失去對他的信任。
【12】 柯慶施在延安時期曾與毛澤東是同一個黨小組的成員，見何德全（音譯）:《和毛主席在一個黨小組》，《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05號，第1頁。
【13】 見1958年4月11日、12日、15日和27日的《人民日報》和1958年4月6日和7日的《四川日報》。
【14】 1958年4月15日的《人民日報》。
【15】 這些講話的時間是3月10日、20日和22日；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59～180頁。《問題與研究》1973年11月號第95～98頁轉載了3月10日的講話。該刊1973年12月號第103～112頁轉載了3月20日和22日的講話，3月22日的講話亦收入《毛主席文選》第78～83頁。在3月1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曾提到「昨天」說過的事情(《問題與研究》1973年11月號，第97頁)。但是，如果他在3月9日曾有過講話，則我們尚未見到。
【16】 《問題與研究》1973年11月號，第95～96頁。
【17】 同上，第96、98頁。
【18】 同上，第96頁。
【19】 同上。毛澤東對照搬蘇聯教育經驗的批評，後來被說成是針對劉少奇和陸定一的，見《十七年教育戰線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第41卷，932號，第27頁)。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話，則可以推測是因為劉和陸在當時是全面負責教育和宣傳工作的。但是，毛對照搬蘇聯經濟經驗的批評，則可以肯定同樣是針對周恩來的。換言之，毛對照搬蘇聯經驗的批評，似乎不能認為是對他的某些高級同僚的個人攻擊，即使他感到他們之中有些人可能走的太遠了。應當指出的是，根據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第41卷，932號所引用的所有材料都與《問題與研究》1937年11月號第96頁所刊登的毛的講話不相符合。此外，根據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所引用的材料可推測出毛對劉少奇和陸定一鼓勵倣傚蘇聯報刊的模式的做法進行了抨擊，但據我們所知劉早在1956年就嚴厲批評了蘇聯的報道方法（見本書第1卷第76頁)。
【20】 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和中國知識分子》，第26、27、46、64、78、80、92和220頁。
【21】 《問題與研究》1973年11月號，第97頁。
【22】 同上。
【23】 《人民的好總理》第3輯，第59頁。
【24】 《問題與研究》1973年11月號，第97頁。
【25】 同上。

【26】 同上，第 98 頁。
【27】 同上，第 97 頁。
【28】 見本書第 1 卷第 99～109、157～159 頁。
【29】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1 月號，第 98 頁；亦見德迪耶：《鐵托講演集》，第 331 頁。
【30】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1 月號，第 98 頁。
【31】 同上。有關毛澤東在講話中所提到的「殖民地」是指 1950 年在滿洲和新疆創辦的中蘇聯合股份公司、中蘇聯合管理的中長鐵路及中蘇聯合使用由蘇聯軍隊守衛的大連（旅順口）海軍基地的共同協定。據我所有的研究資料表明，毛的這次講話中第一次透露俄國人還要求不許第三國的國民住在這些地區。
【32】 見《劉少奇生平大事記（1899-1967 年）》，《當代背景》843 號，第 19 頁。
【33】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1 月號，第 98 頁。
【34】 同上，第 97 頁。有關高崗事件，見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的有關章節，及欣頓：《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內的「無原則爭論」》。
【35】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1 月號，第 98 頁；亦見本書第 1 卷第 316 頁。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毛曾指出《紐約時報》全文登載了他的講話全文。這有力地說明了《紐約時報》確實是通過波蘭的來源得到了這個論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並在 1957 年 6 月 13 日刊載。但《紐約時報》從未聲稱其所刊載的是全文，顯然，確實如此。因此，毛在成都所談到的全文登載，可能只就大體而言。但可以設想，透露給他的《紐約時報》全文登載的錯誤消息是為了誘使他出版一個經過修改的正式文本（見本書第 1 卷第 266～267 頁）。
【36】 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蘇中關係，1945-1970 年》，第 152 頁。
【37】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1 月號，第 97 頁。關於對這一講話的評論，見本書第 1 卷第 61～74 頁。
【38】 《關於鄧小平問題的初步綜合材料》（「徹底粉碎譚震林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逆流聯絡站」，1967 年 3 月 17 日），第 22 頁。
【39】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1 月號，第 98 頁。
【40】 參見《紐約時報》1957 年 6 月 13 日文本的摘錄在《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87～288 頁的官方文本的第 7 條的有關部分。
【41】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2 月號，第 107 頁。
【42】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85 頁。
【43】 見《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摘編》，第 17 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第 7、8、11 頁（北京：「新人大公社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1967 年 5 月）；《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轉摘自《中國大陸雜誌選》639 號第 6、8、16 頁；《東方紅戰報》第 71 期第 5 頁、第 81 期第 6 頁；《對陳丕顯第五次假檢討的批判》（《工人造反報》1968 年 2 月 10 日，轉摘自《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31 號第 6 頁）。據報道，柯慶施的口號是「整風運動會暫時結束，但是，整風的精神決不能丟掉」。劉少奇 1957 年 12 月在統戰部部長的一個會議的講話中已經預見到再次爭取資產階級的苗頭，見《徹底清除劉少奇破壞統戰、民族和宗教工作的修正主義罪行》，轉摘自《中國大陸雜誌選》645 號第 7、8、12、13 和 15 頁。
【44】 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74～76 頁。
【45】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2 月號，第 108～109 頁。
【46】 同上，第 109～110 頁。
【47】 孫冶方：《加強統計工作，改革統計體制》，《經濟管理》1981 年 2 月 15 日。
【48】 《科技革命》（1967 年 8 月），第 14～17 頁。關於陳與毛的關係，見本書第 1 卷第 17～18 頁。
【49】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2 月號，第 108、110 頁。
【50】 同上，第 111 頁。

【51】 同上，第 112 頁。唐朝的杜甫和李白都是眾所週知的中國文化領域內最偉大的古代詩人。由於杜甫對他所處時代的宮廷的尖銳批判而被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尊奉為「左派」。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領袖、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 1971 年把杜甫從「人民詩人」的地位上拉了下來。見郭的《李白與杜甫》，以及楚文江（音譯）對該書的評論（《中國季刊》1973 年第 10-12 月號，第 796～798 頁）。

【52】 見本書第 1 卷第 178～180 頁。

【53】 關於作者所稱的「百萬首新詩運動」的論述，見 S．H．陳：《一致性中的多樣化：詩和大躍進》，《中國季刊》1960 年 7-9 月號，第 1～15 頁；亦見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第 244～249 頁；福克瑪：《中國的文學理論與蘇聯的影響：1956-1960 年》第 202～208 頁。著名詩人何其芳在對河南進行考察旅行後指出：仿照農民的詩節，「我們有責任創作出幾首打油詩」：毛主席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哪怕住在深山裏也看得見它們的光亮。（譯按：按英文譯出）何也創作了一首讚頌農民詩人的詩（充分說明新詩運動影響之大，多少傑出的文學人物都投入進來）：天上星星多又多，金星是最亮的一顆；悠悠過去詩人多，李白、杜甫好詩多；而今好詩何人作？千百萬的勞動人民。（譯按：按英文譯出）這兩首詩均收入許芥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第 530 頁。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抨擊某些同志不敢對犯錯誤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批評（《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2 月號，第 109 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有人聲稱這些受批評的同志包括彭真和另外兩個負責宣傳工作的高級官員陸定一、周揚（《紅色批判報》，1967 年 6 月 16 日第 3 卷，第 2 頁）。但是，我並未發現證據能進一步證實這種說法。然而，毛對這些人的批評比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本身的批評還要嚴厲——彭和陸是由於他們對整風的態度，周揚則是因為毛所表揚的有些知識分子對他心懷不滿，見本書第 1 卷第 190～191、201、203 頁。

【54】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66 頁。

「多、快、好、省」是早在 1956 年的高潮中就為毛澤東所接受的口號，見本書第 1 卷第 30～32 頁。根據多方面的資料，周恩來在 1955 年底提出了「多、快、好」的口號並被毛所批准。後來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提出加上「省」，也為毛所接受（見《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第 33 頁；1980 年 5 月 2 日《人民日報》《李富春同志對經濟計劃工作的巨大貢獻》）。

「力爭上游」，按毛澤東的說法，是在 1958 年躍進之前提出的（《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19 頁），但我未能查到出處。這些口號中，只有「鼓足幹勁」是專為 1958 年的躍進所提出的，並且還曾對是提「鼓足」還是「鼓起」進行過討論，後來確定使用前者。「鼓起幹勁」的提法可能只是指「調動某個人的積極性」，而「鼓足幹勁」的提法則是「調動一個人的全部積極性」，增加了這一口號的氣魄。因此，毛選中了這一提法（見同上和《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17 頁）。

根據毛澤東的說法，「鼓足幹勁」和「力爭上游」這兩個口號合併在一起可能是 1958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 157 頁）。但是，在那個階段只是推出了口號，並不表明對口號的一致贊同（在元旦社論中，「大躍進」一詞的使用只是與 1956 年的經濟發展有關）。

上海市黨的第一書記柯慶施可能是第一個使用「鼓足」這一提法的，見他的 1957 年 12 月 25 日在上海黨的會議上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號召「鼓足革命的幹勁」（見 1958 年 1 月 25 日《人民日報》）。毛於 1958 年 1 月 28 日和 30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使用的是「鼓起勇氣」這一短語（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55 頁）。財政部長李先念 1958 年 2 月 1 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講話中，重複了毛的提法，插入了「革命」一詞，提出「鼓起革命幹勁」（《新華半月刊》1958 年 5 號第 12 頁）。《人民日報》為全國人大會議所發的社論中（1958 年 2 月 3 日和 12 日），簡稱為「鼓起幹勁」。可

能是在 5 個星期以後，毛才選擇了「鼓足幹勁」一詞。因為，「鼓足」一詞在後來已頗為流行。例如，可見 1958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報》的大字標題和該報同年「五一」在頭版頭條以大字標題完整地登載了這一大躍進的口號。

【55】 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66 頁。我對這段話的解釋與《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2 月號第 103 頁的解釋有所不同。這段話是以「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開始的。《問題與研究》認為:「河南提出了在四月、五月和八月產量的建議……」，這裏把「四、五、八」解釋為這一年的四月、五月和八月。然而，我認為「四、五、八」與《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中有關糧食產量的重要條款有關。在《綱要》中提出：黃河以北的低產地區的產量應把畝產從 150 斤增加到 400 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區應從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淮河以南的地區應從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見 1957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報》的《綱要》的修正草案第 2 條。

《問題與研究》認為「水利化」只是指「蓄水」，有失原意。最主要的是，該雜誌漏了一句話，即河南提出是在一年內提前完成而不是在十二年完成《綱要》的目標，因此沒有顯示出河南的雄心勃勃。

【56】 見《新華月報》1979 年 1 號第 103 頁的一篇回憶的摘錄。該文對吳在大躍進期間的行為持同情態度，說他對 1949 年以後的河南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吳的前任被貶黜後，他具體何時接掌實權這尚不清楚，見張旭成：《中國的政權和政策》，第 54 ～ 56 頁。

【5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22 號，第 1 頁。即使是在 2 月份，河南省也是在除四害運動中最有雄心的省份。

【58】 見本書第 1 卷第 86 ～ 88 頁。

【59】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66 頁；《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2 月號，第 103 ～ 104 頁。在此，毛澤東表揚了農業集體化，並把周恩來在湖南集體化運動中慌忙的做法同李井泉在四川從容不迫的步伐作了對照比較，以表明他不再堅持追求速度的立場。

【60】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66 頁。

【61】 同上，第 167 頁。

【62】 在 6 月的一次會議上，譚震林透露在成都會議上可能已經考慮了增加的問題，見他在《紅旗》1958 年第 6 期上的一篇文章。在另一次會議上，他透露在成都會議期間「左派」的目標，見《批譚戰報》1967 年 8 月 5 日第 1 卷第 2 頁。

【63】 見《關於譚震林問題的初步綜合材料（續編）》(1967 年 4 月 6 日)，第 3 頁。譚在報告裏所說的毛澤東的建議，在可以得到的毛澤東成都會議講話記錄中並沒有那麼多，不過，在毛 3 月 20 日的講話中可以明顯看到有這種指示 (《問題與研究》1973 年第 12 月號，第 103 ～ 104 頁)。

【64】 見《徹底清算中國的赫魯曉夫及其同夥破壞農業機械化的滔天罪行》，《農業機械技術》第 5 期（1967 年 8 月 5 日)，《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19 頁。

【65】 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 (1368-1968 年)》，第 56 頁。

【66】 同上，第 57 ～ 58 頁。

【67】 見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黃敬的一篇文章。(引自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第 95 ～ 96 頁)

【68】 關於對劉帶有敵意的爭論的描述，見《中國農業機械戰線的兩條路線鬥爭史》，《農業機械技術》1968 年第 9 期 (《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7 ～ 10 頁)。關於合作化運動的問題，見本書第 1 卷第 15 ～ 19 頁。

【69】 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00 頁。

【70】 關於這一錯誤的描述，見克拉特：《作為亞洲國家榜樣的蘇聯農業》，《中國季刊》1961 年 1-3 月號，第 116 ～ 130 頁；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第 91 ～ 93 頁。

【71】 《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10 頁。

【72】 這是 1957 年 3 月 12 日上交的報告。引文出處同上。

【73】 同上。

【74】 見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 年）》，第 59 ～ 60 頁。
【75】 毛澤東的家庭農場的勞動力短缺是毛與他的父親之間的爭論的原因之一。在一次秋收事變中，毛站到他父親的佃戶一邊，見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第 22 頁。
【76】 沃克：《農業生產組織》，見艾克斯坦、蓋倫森和劉大中：《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趨向》，第 405 ～ 413 頁。
【77】 《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10 頁。從這個報道中還弄不清楚康的調查是否應毛之請而進行。但是調查的目的和結果都有贊同的意思。這一報道肯定表明，農忙時節的人力短缺是支持毛論點的主要理由，同上，第 11 頁。關於康對機械化的支持，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28 頁。關於康可能與毛有密切關係的介紹，見本書第 1 卷，第 148 頁。
【78】 引自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第 96 頁。這篇文章的全文轉摘自《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20 號第 34 ～ 43 頁。黃敬於 1958 年逝世，據說他是毛澤東妻子江青的前夫，見朱浩建（音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中國季刊》1967 年 7-9 月號，第 148 ～ 149 頁。
【79】 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第 96 ～ 98 頁；黃敬：《農業機械化問題和工農業同時發展》，《學習》1958 年 1 月 18 日。(《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28 號，第 42 ～ 56 頁）
【80】 《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23 頁。
【81】 《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2 月，第 103 頁。
【82】 《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23 頁。
【83】 《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12 頁。
【84】 《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20 頁。
【85】 《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13 頁。
【86】 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第 109 頁。
【87】 同上。
【88】 施瓦茨：《斯大林後的蘇聯經濟》，第 115 ～ 116 頁。
【89】 《全國拖拉機站管理人員、專家會議總結報》，《全國農報》1958 年第 5 期。(《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47 號，第 21 頁)。
【90】 見施瓦茨《斯大林後的蘇聯經濟》第 116 ～ 118 頁中有關蘇聯取消機器拖拉機站的爭論的敘述。
【91】 《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13 頁。
【92】 同上，第 22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11 頁。在後一資料來源中，有說法稱劉擁護這一政策是口是心非，這是不可信的，他顯然考慮了所需經費的問題，見第 5 頁。
【93】 《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57 號，第 22 頁。引用的文化大革命中關於這次會議的評論（《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13 頁），似乎與當時會議報告第三部分最後一段的部分內容是一致的。但是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版本也沒有以為這次會議是一個主要的轉折點。
【94】 《中國大陸雜誌選》600 號，第 3 頁。
【95】 《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47 號，第 16 頁。
【96】 集體所有的拖拉機的數量從 1957 年的 2416 台，增加到 1958 年的 17380 台；國營農場的拖拉機數量從 10177 台增加到 16955 台；農機站所有的拖拉機數量從 12036 減少到 10995 台（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第 109 頁）。在中國所使用的拖拉機總數從 24629 台增加到 45330 台。但在後一年裏，本國生產的拖拉機尚不到 1000 台（同上，第 107 頁）。文化大革命中對譚震林不關心公社管理農業機械的指責可能是事實（《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22 頁）。
【97】 施瓦茨：《斯大林後的蘇聯經濟》，第 117 頁。
【98】 《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27 頁。
【99】 有關蘇聯權力下放的評論，見施瓦茨：《斯大林後的蘇聯經濟》，第 117 頁。

【100】《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22 頁。
【101】見本書第 1 卷，第 90 頁。
【102】《浙江日報》的社論，轉摘自《新華半月刊》1958 年 7 號，第 127 ～ 129 頁。
【103】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24 頁。
【104】劉少奇的講話摘要（為《人民日報》4 月 16 日社論提供了基本內容），見《新華半月刊》1958 年 7 號，第 126 ～ 127 頁。
【105】《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6 頁，報告裏指出，反對這種犁的其他領導人還有彭真和薄一波；另一份報告稱，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他批評過（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24 頁）。
【106】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42 頁；這一說法在正式出版講話時，被刪除（《毛澤東選集》，第 511 ～ 521 頁）。
【107】《新華半月刊》1958 年 7 號，第 126 頁。
【108】《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24 頁。在《問題與研究》1973 年第 11 月號和第 12 月號上，刊載的毛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裏，我未發現這一引文。
【109】見 1958 年 4 月 16 日《人民日報》社論。
【110】《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58 號，第 11 頁。
【111】關於 1956 年 1 月版的第 11 條的解釋，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23 頁；關於 1957 年 10 月修正版，見《當代背景》479 號第 6 頁，（第 7 條）。1958 年 5 月版沒有出版（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見本章以下內容），但是，在譚震林向會議作的報告中，以相當長的篇幅論及有關機械化條款的修訂，沒有談及犁的問題。見《當代背景》508 號，第 7 頁。《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最後文本在 1960 年 4 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被通過，此時大躍進即將結束，1958 年的異常熱情已經消退，這一文本也沒有提到犁的問題。《當代背景》616 號，第 8 頁（第 7 條）。關於這一時期對機械化和工具改革問題的詳細評論見斯噆威思：《中國農業機械化的政策》，第 93 ～ 101、109 ～ 125 頁。
【112】並不是所有的中央和省的領導人都參加了會議，見 1959 年 8 月 29 日《人民日報》社論。
【113】見 1981 年 1 月 25 日《朝日新聞》報道，轉摘自《外國廣播新聞—中國—81—049（附錄）》第 5 頁。
【114】在毛的 3 月 22 日的講話中，他讚揚了一些「反對他」的來信，那些對他的百花齊放政策提出批評的人們，他稱讚他們的直率。見《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2 月，號第 11 頁；本書第 1 卷，第 179 ～ 180 頁。鄧小平指出持有與主席這些觀點不同的看法是允許的，見《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摘編》，第 4 頁（北京：「首都紅代會人大三紅批劉鄧第一支隊」，1967 年 4 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鄧的這些言論被用來抨擊他本人，但我不相信這些言論會在當時被毛認為是犯不恭之罪，因為主席本人是讚許鄧小平的批評的（見本書第 1 卷，第 4 ～ 5 頁）。這一資料來源表明鄧的言論是在 4 月 7 日講的，但成都會議卻是在 3 月 9 日至 26 日舉行的（《中國百科年鑒》（1981），第 562 ～ 563 頁）。然而，另一資料來源註明鄧小平的這些言論是在毛澤東離開四川之前並且是毛本人在場時所講的，見《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話》（《挺進報》1967 年 6 月 14 日，第 1 卷第 1 頁）。
【115】見《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摘編》，第 4 頁。

第四章 大躍進的發動

【1】參見前面有關章節。中國共產黨的新章程是 1956 年 9 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的，這一新章程規定每年舉行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曾有過在 1957 年下半年舉行第二次會議的打算，但是，正如已經表明的，這次會議被推遲，以便毛和他的同事們先去動員幹部和群眾。八大的第二次會議最

後成為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的唯一的一次年度會議，而且，本應在八大舉行後五年舉行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直到文化大革命後的 1969 年才舉行。

【2】 見本書第 1 卷，第 184 ～ 217 頁。

【3】 同上，第 184 ～ 217 頁。

【4】 整風運動是從 1957 年 4 月 30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開始的。最高國務會議的這次會議沒有公開報道，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所做的講話，即使到現在也很少人知道。而且即使傳出來的那一點講話的內容也引起了爭論。見第 1 卷第 210、278 頁，第十五章注 53 和第十八章注 41。整風運動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開始的，但是即使這個事實也有人提出爭論，甚至《人民日報》社論也加以否認，同上，見第 212 ～ 217 頁。

【5】 關於各省黨的幹部反對主席發動整風運動的情況，見本書第 1 卷第 249 頁。

【6】 同上，第 100 ～ 105 頁。

【7】 見劉少奇：《論黨》，第 8 ～ 10 頁。

【8】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19、424 ～ 426 頁。例如，劉少奇明確指出，毛在 1955 年關於集體化的講話和 1957 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是以他個人名義發表的。此外，他在談到後一個講話時，並不把它作為一個講話而是作為一篇文章，這就強調他僅僅同意經過修訂的版本。（關於出版前對講話進行了修改的情況，見本書第 1 卷，第 261 ～ 167 頁。）

【9】 見本書第 1 卷第 26 ～ 27 頁。

【10】 同上，第 30 ～ 32 頁。

【11】 同上，第 27 ～ 29 頁。

【12】 同上，第 57 ～ 74 頁。有趣的是劉少奇指出《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為他在中共八大一次會議上的報告提供了主要內容。（《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6 頁）這可能既是為自己的報告的一種辯護，也是一種調和姿態，因為劉肯定知道毛並不喜歡他的報告中的某些觀點。

【13】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6 頁。

【14】 同上，第 425 頁。

【15】 同上，第 422 ～ 423 頁。

【16】 同上，第 422 ～ 423 頁。

【17】 同上，第 423 ～ 424 頁。

【18】 同上，第 424 頁。

【19】 同上。

【20】 同上，第 436 頁。

【21】 同上，第 436 ～ 437 頁。

【22】 同上，第 430 ～ 431 頁。

【23】 同上，第 437 頁。

【24】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95 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92 頁。

【25】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05 頁。

【26】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18 ～ 219 頁。

【27】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07 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06 頁。

【28】 參見斯圖亞特·施拉姆：《毛澤東和劉少奇：1939-1969 年》，《亞洲觀察》1972 年 4 月，第 277 ～ 278 頁。

【29】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92 ～ 95 頁。參見上第 41 頁。

【30】 參見 1949 年毛澤東的論斷：「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如果沒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理論和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的革命面貌就煥然一新了。」引自施拉姆的《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 318 ～ 319 頁。

【31】 引自劉少奇 11 月 6 日在北京慶祝十月革命 4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參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399 頁。
【32】 同上，第 424 ～ 425 頁。
【33】 同上，第 426 ～ 427 頁。
【34】 同上，第 427 頁。
【35】 同上，第 429 頁。
【36】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02、105、106 頁。
【37】 同上，第 106 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05 頁。
【38】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07 頁；參見同上，第 155 頁；鄧小平在成都，參見《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摘編》(北京:「首都紅代會人大三紅批劉鄧第一支隊」, 1967 年 4 月)，第 18～19 頁。
【39】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05 頁。
【40】 見本書第 1 卷，第 88 ～ 89 頁。有關毛澤東與周恩來、鄧小平的關係，見同上，第 7 ～ 9 頁，第一章注 36。李富春的妻子蔡暢本身就是中央委員，她還是毛澤東早年最親密的朋友蔡和森的妹妹，蔡和森在革命中去世。(見施拉姆：《毛澤東》，第 37 頁)
【41】 見本書第 1 卷，第 88 頁、315 頁。
【42】 同上，第 58 頁，第五章注 3。
【43】 同上，第 18 ～ 19 頁。
【44】 見麥克法夸爾:《論照片》，《中國季刊》1971 年 4-6 月號，第 296 ～ 297 頁。以後的通信見《中國季刊》1971 年 7-9 月號，第 552 頁。照片上有陳雲出席這次會議 (《人民畫報》)，1958 年 7 月，在劉少奇作大會發言的照片中，陳雲清晰可見。
【45】 本書第 1 卷，第 3、4 編到處可見。
【46】 1967 年 3 月 26 日《挺進報？》，第 4 版。
【47】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03 ～ 105 頁，在同一個講話中，毛澤東提出「高潮」延續到 1957 年 6 月。
【48】 見本書第 1 卷，第 315 頁。
【49】 關於劉少奇，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27 頁；關於毛澤東，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16 頁。
【50】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09 頁，同樣用了神秘的×××，所指何人，不清楚。
【51】 同上，第 113 頁。
【52】 見本書，第 1 卷，第 311 頁。意味深長的是毛澤東的提法：要注意分裂的可能。
【53】 同上，第 67 ～ 68 頁。
【54】 這 3 個法令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65 號第 1 ～ 10 頁中被譯出。《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60 ～ 69 頁。按照毛自己的說法，〔《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2 卷，第 311 頁〕八屆二中全會之後，他還在為權力下放做工作。
【55】 參見，拉迪：《中國財政管理的集權和分權》，《中國季刊》1975 年 1-3 月號，第 28 ～ 29 頁。
【56】 同上，第 29 頁。
【57】 同上，第 51 ～ 53 頁，這個數字見陳雲在中共三中全會上的講話，《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59 頁。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可能只是從講話中摘錄出來的。關於權力下放問題的廣泛討論，見舒爾曼：《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 175 ～ 178、188 ～ 219 頁。
【58】 《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58 ～ 59 頁；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94 頁。關於文化大革命中的譴責，見《北京公社》1967 年 1 月 28 日，第 2 頁。《炮轟李先念》(「北京公社第八戰鬥隊」，「中央財經學院紅代會」，1967 年 4 月)，第 31、33 頁。另一個對陳雲大躍進時候

的冗長攻擊，沒有提到他 1958 年犯的任何錯誤。《財貿紅旗》，1967 年 2 月 8 日，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72 號，第 14 頁。

【59】《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第 32 頁。

【60】不清楚為什麼譚震林不能真正地代替鄧子恢作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領導，最好的假設是毛澤東不願意把一個早先在黨內鬥爭效忠於他的人降職。本書第 1 卷第一章注 36。選擇譚震林接替鄧子恢也是很策略的，這兩個人在 30 年代曾共同工作過，譚震林可能比別人更樂意保護鄧子恢的自尊（見譚震林、鄧子恢傳，科林和克拉克的《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還必須注意到，譚震林和任何人一樣對「秋後算賬派」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在代表會上最後一次關於《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講話中，提到了這一點。《當代背景》508 號，第 2 頁。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有人說譚震林指責鄧子恢直接違背毛的農業政策。參見《關於譚震林問題的初步綜合材料》（徹底粉碎譚震林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逆流聯絡站，1967 年 3 月 17 日）。

【61】彭真可能實際上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成員。參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39 號，第 18 頁。1966 年陶鑄在成為政治局常委會的成員之前，擔任了常委會秘書長。《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32 號，第 19 頁，可能彭真在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擔任過同樣職務。

【62】這個詞最先是 60 年代中期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用來描繪英國海員罷工的領導人的。從那以後成為英國的政治詞彙，通常情況下是有諷刺意味的（因為威爾遜誇張地描繪了海員的領導人）。

【63】關於鄧，見本書第 1 卷第 140 頁。譚震林是毛澤東早年的追隨者，參加了 1927 年的秋收起義，後來又隨毛澤東上井岡山。

【64】同上，第 146 頁。

【65】《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詩文選》，第 70 頁。

【66】張萬山（音譯）：《共產黨中國的國務院：結構和功能分析：1954-1965 年》，第 57 頁。

【67】同上，第 68 頁。

【68】同上，第 33 頁。

【69】見拉迪：《中國財政管理集權和分權》，第 56 頁。

【70】本書第 1 卷，第 18 章。

【71】見麥克法夸爾：《論照片》，在這裏我認為把烏蘭夫涵蓋進來隱含著緩和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姿態。

【72】見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中國季刊》1960 年 7-9 月號，第 17 頁。

【73】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一個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講話中提出：在浙江，個人之間的權力爭奪已結束。浙江的第一書記江華戰勝了省長沙文漢，毛澤東曾反問：是江華獨裁，還是沙文漢獨裁。（《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1 月號，第 97 頁）這樣的問話有損於勝利者江華的形象。但是，毛澤東接著說，在另外 7 個省也發生了同樣的問題，除了兩個省外，其他 5 個省都在大會上宣佈了他們清洗的結果。（文件參見《當代背景》487 號）

【74】被清洗者的罪名是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參見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第 22 ～ 30 頁。在青島，毛澤東指責了這些錯誤。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285 ～ 289 頁。

【75】《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14 頁。

【76】同上，第 121 頁。毛澤東暗示不要懲罰古大存、馮白駒，廣東省的這些高級幹部被指責犯了地方主義錯誤（參見《人民手冊》1959 年，第 16 頁；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第 23 ～ 24 頁）。如果事情像我在本書第 1 卷中分析的那樣：毛對廣東省第一書記陶鑄沒有好感，毛會保護當地批評陶鑄的古大存和馮白駒，如果這兩個人與前年陶鑄辭去廣東省長職務多少相關的話，尤其如此。廣東是毛在成都會議上列出的有權力之爭的省份。

潘漢年是上海市的負責人，1955 年 7 月，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參見他的傳記，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1957-1958 年省級幹部的清洗與他

的案件毫無關係，因此絕對不可能而同時得到複查。在會議公報列舉的複查案件中，沒有提到他的名字。如果討論了他的問題，就他的重要身份而言，一定會提到的，在這裏很可能是毛澤東把潘漢年與潘復生搞混了，後者是河南省委書記。在會議後期，毛提到潘 ×× 是一個犯錯誤的人，允許他改正，(《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15 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文化大革命之後，在毛指定傳播的著作中，隱去名字或部分地隱去名字都是為了保全那些當時毛提到時犯了錯誤，而到文章出版時又恢復了職務的人的顏面。潘復生可能屬於這類情況。他從省級職務上被罷免後，一度銷聲匿跡，直到 1962 年又出任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1969 年編輯毛澤東文選時，他從候補中央委員擢升為九大的正式中央委員。

不清楚為什麼毛為潘復生辯解，尤其是在讚揚他的繼任吳芝圃的時候（參見毛澤東言論集《大海航行靠舵手》第 24 頁）。但在關於潘復生案件的文件中，提到 1957 年夏末潘復生敢當面欺騙毛主席。(《當代背景》515 號，第 2 頁）這表明毛在參觀河南時，曾讚揚過潘復生。毛只是在河南代表團的強烈要求下，才勉強同意清洗潘復生。在全國代表會議之後，儘管潘復生事實上已經放棄了工作，在北京呆了 10 個月，但是河南省還是迅速地將他撤換（同上）（關於潘復生的動向，河南的官方材料說，他休了很久病假，1957 年春看到有了掀風作浪的機會，於是返回河南。也可能是毛為了發動整風運動，迫切希望得到省級幹部的支持，鼓勵潘復生返回這個位置）。

在代表會議上，毛可能被迫把潘復生和廣東的馮白駒、古大存列入搞分裂的名單，但他即使這樣做了，後來也把他們的名字從名單中刪去了。(《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14 頁)。，包括這 3 個人在內的八名被撤職人員在代表會議的公報中依然被稱為同志。毛的願望部分地得到尊重。有趣的是，毛不是在代表會上，而是在只有代表團團長參加的人數有限的會議上提出他寬厚的推薦名單，這可能是他想先看一看他們的反應，再作最後的決定。參見張旭成：《中國的政權和政策》，第 40 ～ 44 頁。

【77】 本書第 1 卷，第 66 ～ 74 頁。

【78】 同上，第 69 頁。

【79】 引自謝蘭莉（音譯）：《共產黨中國在核時代的戰略》，第 109 ～ 110 頁。

【80】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86 號，第 6 頁。

【81】 同上。

【82】 福特：《現代武器和中蘇關係的破裂》，《中國季刊》1964 年 4-6 月號，第 162 頁。兩天以後，發表了蘇中兩國簽署的技術合作計劃。這件事大概使毛澤東相信了蘇聯幫助發展核技術、裝備解放軍的保證。

【83】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19 號，第 26 ～ 31 頁。

【84】 本書第 1 卷，第 242 頁。

【8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19 號，第 26 頁；《新華半月刊》1958 年 6 號，第 116 頁。

【86】 1958 年 2 月 23 日《人民日報》。

【87】 1940 年著名的百團大戰也是一個有爭議的事件。在 1967 年以前一直沒有公開譴責彭德懷違背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戰略（《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212 頁。）但是查閱這一時期的文件表明對他的譴責是有原因的，並不是通過回顧歷史來破壞彭德懷的名譽。

毛澤東在 1938 年 11 月 6 日的一篇文章中把抗日戰爭分為三個階段：防禦、相持、反攻；在相持階段游擊戰是主要的作戰形式，正規戰是輔助形式。(《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229 頁）1939 年 10 月 10 日，他寫到相持階段已經到來，只有日本方面或國民黨方面能打破這種局面，同時，共產黨應該利用這一時機準備反攻（同上，第 297 ～ 299 頁）。發動百團大戰之前他最後寫了幾篇文章，1940 年 3 月 11 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現階段是戰略相持，僅在 5 個月之後，共產黨就投入 115 個團（譯按：實際為 105 個團），40 萬軍隊對日本進行大規模的進攻，這一進攻雖然有相當大的初期效果，但最後使共

產黨遭到日方的猛烈反攻，到 1941 年，八路軍減到 35 萬人。（參見約翰遜：《農民的民族主義和共產黨政權》，第 215 頁；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 303 頁）關於 30-40 年代毛澤東軍事理論在貫徹中遇到阻力問題，參見惠策恩：《中國高層軍事指揮機構》第 1 章。

【88】 在一個和周恩來會談的報告中證實：毛對彭德懷和林彪懷有反感。參見《美國的對外關係，1949 年》，第 8 卷，第 359 頁。

【89】 關於林彪地位的上升，以及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的疏遠，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142～143 頁，第 146～148 頁，第十一章注 29，和本卷的第一章。在本書第 1 卷中，我提出，鑒於與劉少奇的一系列分歧，毛可能在內心深處認為林彪和鄧小平是更合適的繼承人候選人。

【90】 軍事委員會基本沒有活動，關於這一時期的評論，參見鮑威爾：《軍事委員會和黨對中國軍隊的控制》，《亞洲觀察》1963 年 7 月，第 349～350 頁。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 282～285 頁。

【91】 《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76 頁。

【92】 我們不能絕對地肯定這時林彪是軍委委員，雖然這種可能性很大。現在有一些傳記說他在 1951 年成為軍委成員（見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到 1961 年，除朱德、外交部長陳毅和被罷黜的彭德懷外所有的元帥都是軍委委員（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 287 頁），這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推論，1958 年也是這種情況。根據另一個資料，陳毅是名義上的軍委委員，但他不參加會議，《中國大陸雜誌選》637 號，第 38 頁。

【93】 1935 年毛澤東接手負責軍隊，周恩來任副主席，（《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地圖選》，第 22 頁）到 1949 年以後，周恩來似乎放棄了這個職務。尚不清楚在 1958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是僅以黨的總書記的身份發言或者還兼有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如果他還兼任後一個職務，這就進一步證明他與毛關係密切。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140～145 頁；《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的最後一部分第 25 頁。關於軍事委員會的組成參見鮑威爾：《軍事委員會和黨對中國軍隊的控制》第 350 頁，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 286～287、310 頁。資料出自《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224 頁。

【94】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00 號，第 5～10 頁，劉少奇和林彪的聯繫參見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中的劉少奇傳。

【95】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15～21 頁。

【96】 這個題目的權威著作是喬菲的《黨與軍隊：中國軍隊幹部的職業化和政治控制：1949-1964 年》。其後的研究主要依靠這本專著。

【97】 同上，第 57～72、121～129 頁。

【98】 同上，第 72～80、106～119 頁。

【99】 同上，第 133～138 頁。這些新幹部的另一特點是他們和他們家庭享有特權，脫離百姓。1957 年晚些時候，黨已經採取了抑制特權的步驟。（同上，第 80～84，129～133 頁）毛澤東強調在解放軍中要講求平等的例子，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328～329 頁。

【100】 例如，彭德懷曾建議從 1956 年的黨章中刪去有關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本書第 1 卷第 100～102 頁。

【101】 從他的講話中抽出一部分，改寫為《裁軍問題文獻（1945-1959 年）》第 2 部分，第 967～968 頁。根據杜勒斯透露，美國人清楚地注意到這個暗示。（《美國對外政策：當代文獻，1958 年》，第 1306 頁）

【102】 《裁軍問題文獻（1945-1959 年）》第 2 部分，第 978～980 頁。

【103】 同上，第 981 頁，參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53 號，第 45 頁。

【104】 同上，第 982 頁。

【105】 《美國對外政策：當代文獻，1958 年》，第 1304 頁。

【106】 《裁軍問題文獻（1945-1958 年）》第二部分，第 985 頁。

【107】參見同上，第 1003～1004 頁，4 月 22 日的信；同上，第 1038 頁，5 月 9 日的信。「出人意料地」是喬治·奎斯特在《核時代的外交：最初的二十五年》中的評論，第 182 頁。
【108】《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53 號，第 43 頁；謝蘭莉（音譯）：《共產黨中國在核時代的戰略》，第 107 頁；福特：《現代武器和中蘇關係的破裂》第 165 頁中暗示這 10 天內中國沒有作出答覆具有某種意義。情況可能如此；中國人可能要使自己相信，美國的答覆將是否定的；但是應該注意的是：直到 4 月 21 日英國首相的答覆才抵達莫斯科。
【109】東西方專家在 7、8 兩月會晤後，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大，因為他們提出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初看起來表明在核查禁止試驗的新形式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見奎斯特：《核時代的外交：最初的二十五年》。
【110】謝蘭莉（音譯）：《共產黨中國在核時代的戰略》，第 107～108 頁；梅納特：《北京和莫斯科》，第 304 頁。赫魯曉夫的信 5 月 10 日上午才提交華盛頓。如果陳毅不是事先被告知，他不可能知道其大概內容。
【11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00 號，第 1～10 頁。
【112】引自他 8 月 2 日的文章，參見福特:《現代武器和中蘇關係的破裂》，第 16 頁。
【113】陳志讓主編：《毛澤東論文集》，文選及書目第 84 頁。
【114】《當代背景》514 號，第 1～4 頁。
【115】同上，第 6 頁。
【116】現在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這就是劉亞樓，因為《人民日報》的照片說明，沒有登出毛澤東兩位陪同者的名字，也很少有劉亞樓的其他照片可作比較。照片上的第三個人幾乎肯定是吳法憲（空軍的政委，繼劉亞樓之後成為司令員）。
【117】這一部分主要引自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172～199 頁。
【118】我不同意扎戈里亞的觀點：這一重要遺漏暗示中國人已經決定在 1958 年夏末在台灣海峽冒險。
【119】《當代背景》492 號，第 2 頁。
【120】同上，第 7 頁。
【121】參見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178～180 頁。
【122】同上，第 180 頁。
【123】1958 年 2 月 2 日《光明日報》；同上，第 181 頁。
【124】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183 頁。
【125】同上，第 187～188 頁。
【126】同上，第 183 頁。
【127】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315 頁。
【128】《紅旗》1958 年第 1 期，第 11～18 頁。
【129】黨的宣傳工作者是後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為左派首領的王力，和彭真的助手姚溱，外交部官員是副部長喬冠華，喬從前當過記者，長期給周恩來當助手。70 年代中期被提升為外交部部長，「四人幫」垮台後去職，直到 1981 年才重新露面，關於于兆力的身份，參見《王力是誰？》，見《野戰報》第 12～13 期（1968 年 3 月），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58 號第 9 頁。
【130】見哈爾彭：《戰後世界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6 章。
【13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72 號，第 42 頁。
【132】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參見哈爾彭：《戰後世界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9 章；馬特蘇摩托·什戈哈魯：《日本與中國》，載哈爾彭：《對華政策》，第 132～134 頁；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第 376～377 頁。
【133】哈爾彭：《戰後世界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6 章。
【134】科林與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
【135】哈爾彭：《戰後世界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8 章。參見 1959 年 11 月 19 日《紐約時報》，該報報道了蘇班德里約博士遭到粗暴對待的事件，但沒有提到陳毅要對此事負責。
【136】轉引自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第 170 頁。

【137】參見拉爾：《共產黨中國怎樣打交道》第 84 ～ 89 頁。
【138】《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07 號，第 1 ～ 3 頁。
【139】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陳毅和周恩來等一批年輕的中國人赴法勤工儉學，據說在那裏陳毅和他的四川老鄉鄧小平建立了友誼。1926 年，陳毅加入了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參謀班子。國共合作破裂後，陳毅是第一批到井岡山聚集在毛澤東旗幟下的人之一。此後，在 40 年代，劉少奇曾任陳毅所率部隊的政委。（參見科林與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惠策恩：《中國高層軍事指揮機構》，第 36 ～ 37 頁，第四章；黃震遐：《中共軍人志》，第 365 ～ 371 頁。
【140】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12 頁。
【141】《我們永遠懷念周恩來總理》，第 192 頁；《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第 20、47 頁；《人民的好總理》，第 379；《北京週報》1958 年第 18 期，第 12 ～ 14 頁。
【142】《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詩詞選讀》，第 136 ～ 137 頁。
【143】1956 年 11 月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講話時，明顯地流露出他對延安精神的懷念。

第五章 人民公社的興起

【1】參閱 1958 年 12 月 19 日毛在八屆六中全會（武昌會議）上的講話，當時他說直到 8 月「才發現」公社問題（《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第 1 卷，第 140 頁），而在彭德懷批評人民公社以後，1959 年 8 月 29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見《當代背景》590 號，第 23 頁）強調了 1958 年 8 月以前人民公社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發展。關於這個方面，參閱《中國大陸雜誌摘要》210 號，第 13 ～ 16 頁。
【2】參閱 1957 年 10 月 13 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136 頁；《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487 頁；《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 5 卷，第 504 頁。
【3】參閱施拉恩：《中國農業的發展，1950-1959 年》，第 30 頁，表 26。關於水利運動的規模，參閱奧克森伯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群眾性大興水利運動情況 (1957-1958 年)》，第 13 章。有趣的是，一年前周總理向一個來訪的印度高級農業代表團表示懷疑高級社的活力，他提到他曾指示對這樣一個高級社進行調查，調查報告結果說它經營良好，因為「那裏有一個聯合水利工程把人們團結起來了」。儘管有這個令人鼓舞的報告，但周對高級社仍保留「嚴重的懷疑」。被調查的那個社有 3 萬人口，在 1958 年那時候，這是一個規模適當的公社。參閱《印度農業計劃與技術代表團訪華報告》，第 25 ～ 26 頁。
【4】《新華半月刊》1957 年 19 號，第 135 ～ 138 頁；沃克：《農業生產組織》，載艾克斯坦、蓋倫森與劉大中編《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趨向》第 439 頁。沃克指出（見注 22），遲至 1957 年 12 月，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仍主張初級社保留十年。
【5】參閱 1959 年 8 月 29 日《人民日報》社論《人民公社萬歲》。英譯文見《當代背景》590 號，第 23 頁。毛後來聲稱，早在 1956 年河南省就建起了公共食堂，參閱《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37 頁。
【6】《當代背景》590 號，第 23 頁。
【7】《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廣州，1981 年版），第 2 卷，第 345 頁。
【8】《當代背景》590 號，第 23 頁。
【9】同上，參閱 1958 年 8 月 11 日《人民日報》所載譚震林關於夏糧豐收的文章，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34 號，第 21 頁。陶鑄後來宣稱 1958 年 4 月廣東省 8 個農業生產社和 2 個手工生產合作社聯合成立了一個人民公社，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39 號，第 2 頁。
【10】《紅旗》1958 年第 3 期，第 10 頁。

【11】 同上，1958 年第 4 期，第 8 頁。

【12】 我在這裏認為，如果在《紅旗》第 3 期陳伯達的文章付印前毛談到過這些問題的話，那陳將會在文章中引用毛的話。因為《紅旗》是半月刊，所以這似乎有理由認為，7 月 1 日那期《紅旗》不會早於 6 月 23 日以前付印，也就是不會早於前一期和這一期中間。毛的保證可能是在 6 月 23 日至 6 月 30 日之間的某個時候作出的。(6 月 20 日至 23 日曾有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工資制度，但有材料表明毛沒有參加。參閱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15 ～ 116 頁)

是陳伯達提出公社的設想，這在文革中陳倒台後得到進一步的證實。1971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報》對他進行批判 (雖沒有提他的名字，但文中所用的材料清楚表明，批判的對象就是他)，說他在 1958 年對公社提出了過於誇大的理論根據。把人民公社的想法歸到他身上，無疑會貶低人民公社，但與陳有密切關係的各種材料使人們有理由認為，陳促成了公社的出現，特別是當我們想到，他是第一個支持公社的政治局委員。

毛在 1959 年 7 月 23 日的廬山會議上表示成立人民公社不是他的意見，參閱《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41 頁。毛逝世後對陳伯達在這個時期的左傾主義的批判，參閱盧葦：《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存在「左」和冒的問題嗎 ?》，載《新華月報》(文摘版)1980 年 2 號，第 49 ～ 50 頁。

【13】 參閱朱力和田階惲：《人民公社內幕》，第 9 頁。

【14】 參閱紀文順：《中共人民公社理想的來源》，載《太平洋海岸語言學》第 2 卷 (1967 年 4 月版)，第 62 ～ 78 頁。陳伯達曾在毛身邊工作過 20 年 (參閱本書第 1 卷第一章注 25)，他當然意識到毛對康有為的讚賞。

【15】 參見譚震林的文章 (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34 號，第 21 頁) 和毛在《紅旗》1958 年第 1 期第 4 頁的按語。沒有材料表明是《紅旗》的這篇關於合作社的文章 (同上，第 4 ～ 10 頁) 提出建立公社的主張，它僅一般地舉例說明艱苦奮鬥、積極主動、團結一致的重要性。《北京週報》1958 年第 19 期第 5 頁的文章說毛在 6 月底會見了農業社的領導人。

【16】 在陳伯達文章中所引用的從「應該逐步地」到「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段話 (見《紅旗》1958 年第 4 期，第 8 頁)，譚震林的文章也同樣引用了。這些話大概出自毛。毛還發表了更長的一段話，見《科技革命》1967 年 7 月號，第 21 頁。《北京週報》1958 年第 19 期，關於毛與農業生產社領導說話的報道，並未表明主席提到了「公社」這個詞。

【17】 《紅旗》1958 年第 3 期，第 17 頁。

【18】 同上，第 12 頁。

【19】 《新華半月刊》1958 年 15 號，第 114 頁。參閱羅伊 · 霍夫希茲：《中共的農業管理》，載《中國季刊》1962 年 7-9 月號，第 154 頁。這個為期 8 天的會議在 7 月 14 日結束。

【20】 毛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讚揚了河南省長葛縣的深耕，但他清楚地表明，他沒有到過那裏，僅是看到了有關的材料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03、123 頁)。

【21】 中國報刊報道這一段毛的行程是：4 日在河北 (《人民日報》8 月 11 日)，6-8 日在河南 (同上，8 月 12 日)，9 日在山東 (同上，8 月 13 日)，10-13 日在天津 (同上，8 月 16 日)，在 13 日乘汽車從天津返回北京途中，參觀了北京郊區的農業生產社。七里營公社的社長後來對一位印度人口學家說，七里營公社是在毛參觀後的第二天即 7 月 20 日成立的。參閱錢德拉—塞卡爾：《今日共產黨中國》，第 53 頁。

【22】 1958 年 8 月 12 日《人民日報》。據《工人日報》的報道，毛和吳芝圃在談話中都使用了「合作」這個詞。這個報道的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47 號，第 5 頁。正如毛在《紅旗》1958 年第 1 期所介紹的那樣，七里營農業生產合作社雖不屬他參觀的同一個縣，但也在同一個地區。關於毛參觀河北的情況，見《北京週報》1958 年第 31 期，第 21 ～ 22 頁。

【23】 1958年8月3日《人民日報》，開頭的第一句是：「還是辦人民公社好」。
【24】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41頁。參閱本書本卷第十章。大躍進期間，中國報刊經常引用毛的語錄——「人民公社好」。不清楚的是，這句話究竟是毛在和譚啟龍談話時說的，還是像毛所聲稱的那樣，是在他和記者談話時說的。這句話作為8月18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的標題首次發表。
【25】 正是這篇報道激發我寫下了關於公社的第一篇電訊稿，此稿載於倫敦1958年8月21日《每日電訊》。
【26】 參閱有關7月12日晚毛在從天津到濟南的火車上與學生談話的報道，見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29號，第5頁。
【27】 1967年6月8日《北京日報》第5版。
【28】 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報》。
【29】 我推測這些文章的發表是為了影響會議的氣氛，因為，雖然文章於8月份發表在中共的主要刊物上，但它們涉及到華東農業協作會議和夏糧的收成。這些都是6、7月間的事，按理是應該幾星期前報道的。參閱譚震林：《爭取在兩三年內做到豐衣足食》，《紅旗》1958年第6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44號，第1～7頁；《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作者同上，載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34號，第15～21頁。事實上，關於譚在華東會議上講話的詳細報道已出現在1958年6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
【30】 《批譚戰報》1967年8月5日第2版。譚對他早年生活的回憶，參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362號，第7～11頁。
【31】 參閱本書本卷第四章注60。
【32】 參閱羅伊·霍夫希茲：《中共的農業管理》，《中國季刊》1962年7-9月號，第150～155頁。譚出席了1958年7月在河南召開的黨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吳芝圃的前任潘復生被正式免去省委第一書記職務（同上，第154頁）；參閱本書本卷第四章注76。
【33】 參閱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中關於譚的傳略，該書闡明了這個問題。
【34】 同上。
【35】 惠策恩：《中國高層指揮機構：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年》，第204頁。
【36】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1968-1969年季號》），第41頁。這段話讀起來有點奇特，因為毛講話時似乎先對譚說些什麼，然後再向其他聽眾談論譚。這段話引自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37】 《譚震林的黑幫言論》，《紅旗》（是一份紅衛兵小報，不是黨中央的刊物），1967年3月21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78號，第33頁（我曾對譯文進行整理）。此文可見《八·八戰報》1967年3月29日第8版，以及《關於譚震林問題的初步綜合材料》第35～36頁。這是在陝西西安幹部大會上的講話。這次會議召開的時間不是在11月11日（據後一份材料），就是在12月（據同上書「續集」1967年4月6日）。對這個講話的評論，參閱1967年3月15日《進軍報》第3版。
【38】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34號，第21頁。
【39】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39號，第2頁。
【40】 《關於譚震林問題的初步綜合材料》（續集），第14頁注115。關於毛的講話，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15號，第1頁。
【41】 參閱《鄧小平罪行調查報告》，《紅衛兵》1967年第2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590號，第13頁。沒有人指出鄧詳細闡明他的共產主義理想的確切日期，但這份材料說明，這估計是在他兩次到貴州遵義參觀中的一次。而且他的講話的基本精神也表明，這很可能是在他第一次到遵義參觀（1958年11月）時說的，而不是第二次（1965年11月）。
【42】 參閱例如：《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報》）；關於農業問題的五項指示（同上，1958年9月11日）；關於半工半

讀的指示(同上，1958年9月20日)；關於幹部每年要有一個月的時間參加體力勞動的決定(同上，1958年9月30日)。

【43】 指彭德懷。參閱《彭德懷的幾個問題》，見《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英譯文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第77卷第668號第8～9頁。
【44】 參閱北戴河會議公報，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46號，第1頁。
【4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53號，第1～2頁。
【46】 霍夫希茲：《中共的農業管理》，見《中國季刊》1962年7-9月號，第142～146頁。
【4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53號，第2頁。
【48】 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報》。
【49】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53號，第1～2頁。
【50】 參閱沃克：《中國的農業計劃》，第23～41頁，特別是第41頁。
【51】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53號，第3～4頁。
【52】 同上，第4頁。
【53】 參閱本書本卷第31頁。
【54】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41～42頁。
【55】 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期間。參閱吳冷西的材料，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62號，第7頁。
【56】 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29號，第5頁。這是早在7月12日劉少奇在天津到濟南的火車上談話的報道。
【57】 引自1958年8月4日《光明日報》關於他在7月中參觀山東的報道。《新華半月刊》1958年16號第39～40頁刊登了這篇報道。參閱9月中，他到河南參觀的報道。在河南參觀期間，他倡議對兒童實行全托，發展小學寄宿學校，以強調社會教育，而不是家庭教養。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11號，第12頁。這說明為什麼文革中的材料有理由指責劉在大躍進期間的某些過頭言論。參閱《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35～36頁。
【58】 本書第1卷第59頁。
【59】 雖然據報道某些地區遭到了百年不遇的黃河水災，但夏糧豐收似乎是沒有疑問的。參閱《周總理的故事》，第66～69頁；《人民的好總理》(1977年版)，第202、307頁。
【60】 1956年1月，早在農業集體化實際完成以前，毛就正確地宣告農業集體化的勝利，並著手制訂發動第一次躍進的計劃(參閱本書第1卷第2627頁)。與此同時，他錯誤地宣佈了(像他後來承認的那樣)社會主義的勝利，並著手準備改善國內的政治氣氛(同上，第15～16、33～38、160～164頁)。
【61】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243頁。
【62】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46號，第1頁。
【63】 同上。
【64】 《資料選編》，第230頁。
【65】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39頁。參閱《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145》，第K33頁，在這裏，薄一波證實毛在北戴河會議之前就提出了1070萬噸鋼的指標。
【66】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46號，第1頁。有趣的是，北戴河的海風似乎經常使政治局對增加鋼產量產生樂觀的看法。1955年夏天在北戴河制定了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鋼產量達到1500萬噸的指標，但在一年後召開的中共八大上，被減為1000到1200萬噸。《毛澤東思想雜集》第1卷，第80頁。
【67】 柳隨年：《搞好國民經濟綜合平衡需要研究的一些問題》，見《新華月報》(文摘版)1980年5號第17頁。
【68】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39、41、42～43頁。
【69】 同上，第38頁，關於大躍進給運輸系統造成影響的簡短說明，參閱吳元黎：《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空間》，第130、187、194、206、289頁。
【70】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38頁、40頁。

【71】《打倒「三反」分子、大叛徒和工交戰線的惡霸薄一波》，1967 年 2 月 15 日《東方紅》，英譯文見《當代背景》878 號，第 6 頁；《薄一波的四十條罪行》，《紅衛兵報》第 8 期（1967 年 2 月 22 日），英譯文出處同上，第 16 頁。
【7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28、230、240 頁。
【73】同上，第 264 頁。
【74】同上，第 252 頁。
【75】同上，第 240 頁。
【76】同上，第 264 頁。
【77】同上，第 240 頁。
【78】同上，第 235 頁。
【79】同上，第 24、34 頁。令人感興趣的是，當《毛澤東選集》隨後幾卷陸續出版的時候，他的這種過於樂觀的預言是否還會在他的講話中保留下來。《毛澤東選集》第 5 卷出版的時候（參見同上書，第 216 頁），我們在這裏引用的這個預言在一處（第 24 頁）被刪去了。而在別的情況下，這個預言和講話的其餘部分都沒有再發表。
【80】以鄧小平為首的書記處也受到當時氣氛的影響，在北戴河會議後不久決定修建十座大型建築物、擴大天安門廣場，以紀念革命勝利十週年；見《緬懷劉仁同志》，第 204～205 頁。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分別座落在天安門廣場兩側，它們是這次大規模建築項目的兩個最主要的標誌。這些工程都在 1959 年 10 月 1 日之前竣工，在 10 個月內就建成了！周恩來決定不必再為國務院蓋新的辦公大樓。《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第 21 頁。

第六章 高潮

【1】1967 年 6 月 14 日《進軍報》第 3 頁。7 月 15 日鄧小平在全國統戰會議上講話。7 月 11 日他在這個會議上講話中有關對外政策的內容，見《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摘編》，第 49～50 頁。
【2】關於中東危機的情況，參閱巴拉克勞斯：《國際事務概覽，1956-1958 年》第八章。
【3】同上。
【4】這一段是根據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195～199 頁的分析。
【5】《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27 號，第 28 頁。
【6】同上，第 26 頁。
【7】在 1958 年 11 月 30 日。參閱《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35 頁。毛解釋了為什麼即使中國毫無動作，西方也害怕中國潛在影響的原因。在這裏，毛還嘲笑了西方那種認為赫魯曉夫因中國方面的壓力而放棄美蘇首腦會談計劃的說法。毛提到四大國首腦會談是失言（當時所謂東西方首腦一般指的就是四大國），還是向黨員暗示他不贊成蘇聯推舉印度也作為第五方參加會談，這就不清楚了。看起來不可能的是，毛會在這樣一個場合降低中國壓力的影響，以便人們聽信他的講話。
【8】引自巴拉克勞斯：《國際事務概覽，（1956-1958 年）》。
【9】引自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203～205 頁。
【10】參閱 1962 年毛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432 頁；《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88 頁），以及赫魯曉夫的回憶，（《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258～261 頁）。
【11】《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258 頁。無論是赫魯曉夫的回憶還是毛的講話，都沒有十分清楚地指出蘇聯第一次提出這個要求是在什麼時候。西方一些分析家曾認為這是在 1958 年 4 月，但他們的材料來源，是英國廣播公司收聽到的一位中國官員 1964 年在日本就此問題發表的談話（《世界廣播概要》第 5 編：遠東，1488 號 A2/1 頁）。這個談話沒有提到任何月份。使人們得出「4 月」這個結論的，除了兩位分析家模糊的回憶以外，最可能的來源似乎是一位

現已去世的英國外交官。「4 月」這個說法可能是對的，但鑒於中國方面的強烈反應及其在莫斯科引起的驚慌，蘇聯領導人看來不可能拖了至少 4 個月以後才飛往北京。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拖了 4 個月才去北京，那麼最符合毛和赫魯曉夫的說法的解釋是，建立長波電台的提議是 4 月份提出的，而建立「聯合艦隊」的主張直至 7-8 月中蘇會談時才提出來。

【12】 同上。

【13】 同上，第 290 頁。

【14】 同上，第 258 ～ 259 頁。赫魯曉夫的訪問使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空中通訊中斷了 3 天。見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105 頁。

【15】 《赫魯曉夫回憶錄》，第 259 頁。

【16】 同上，第 259 ～ 260 頁。

【17】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88 頁。

【18】 《世界廣播概要》第 5 編：遠東，1488 號 A2/1 頁。

【19】 參閱本卷，第 64 頁。

【20】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58 年），第 1 卷，第 135 頁。

【21】 《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261 頁。赫魯曉夫的回憶錄在談到他與毛的會談詳細經過時，沒有提到台灣海峽問題，但卻在另外一處說，「在 1958 年」，中國要求蘇聯提供軍事援助以對付國民黨。艾倫·惠廷拒不相信毛關於中蘇首腦會談沒有提及台灣問題的說法，但對赫魯曉夫回憶錄中實際上承認了這一點也不作評論。參閱他寫的《金門 1958 年，毛的失算》，《中國季刊》1975 年 6 月號，第 269 頁。

【22】 謝爾莉：《共產黨中國在核時代的戰略》，第 71 ～ 72 頁，格里菲思：《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224 ～ 225 頁。

【23】 1958 年 8 月 3 日《紐約時報》；1958 年 8 月 9 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24】 《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261 ～ 262 頁。

【25】 同上，第 260 ～ 261 頁。

【26】 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201、209 頁。

【27】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38 頁。扎戈里亞在他的書中對中國發動炮擊金門的一系列原因進行了卓越的研究。他列舉了 7 點，其中一些是重複的（見扎戈里亞所著書，第 206 ～ 208 頁）。某些原因很可能在政治局中進行過討論，但我認為這種分析過分估計了政治首腦，特別是毛綜合分析全面得失的能力。主席可能採取更為簡單的辦法：為了一個原因，提出一個具體任務。如果他的同僚和追隨者認為有必要得到一個更細緻的理由來使他們信服，那就得靠他們自己去摸索了。

【28】 欣頓認為，這天正是締結蘇德條約的紀念日，選擇這一天是為提醒蘇聯人別忘了同帝國主義妥協的危險性。見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第 266 ～ 267 頁。

【29】 扎戈里亞指出：大多數的分析家都同意沒有發動登陸作戰的企圖。炮轟是在颱風季節到來前不久開始的，這時進行登陸作戰將會遇到嚴重的困難。此外，進行登陸作戰所必需的裝備也從來沒有集中起來。見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206 頁。

【30】 美國國務院發表了 8 月 28 日中國廣播的文本，8 月 29 日《泰晤士報》也刊載了這份文本。

【31】 杜勒斯的這段話見麥克法夸爾：《中美關係，1949-1971 年》，第 159 頁。

【32】 有關封鎖的報道，參閱下列記者所寫的電訊：弗蘭克·羅伯遜，載《每日電訊》9 月 3 日；漢森·鮑德溫，載《紐約時報》9 月 5 日；格雷·麥克格列高，載《紐約時報》9 月 6 日。9 月 5 日美聯社的一則報道（見《紐約先驅論壇報》歐洲版 9 月 6-7 日）說到，「不斷有未經證實的」報道說美國第七艦隊不久將開始為國民黨的運輸船護航。羅伯特·弗蘭克林則說（見《觀察家》9 月 7 日），美國早已準備好護航船隻，但國民黨至今仍未接受。

【33】 文本見麥克法夸爾：《中美關係（1949-1971 年）》，第 159 ～ 162 頁。

【34】 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為了向黨外高級官員通報政治局已經作出的各項決定及其經濟計劃。有些不尋常的是，會議開幕的公報列舉了參加者的名單，這大概是要在危機時刻顯示出一副國家團結的形象。
【3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33 頁。
【36】 同上，第 236 ～ 237 頁。
【37】 這次訪問直到最近才由葛羅米柯當時的隨從，現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中國問題專家賈丕才透露給西方。參閱鮑大可:《北京與亞洲的權力平衡：1958 年的金門危機——中蘇關係》，載《共產主義問題》1976 年 7-8 月號，第 38 ～ 39 頁。
【38】 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9-1961 年)》，第 211 ～ 213 頁；約翰·K·托馬斯:《聯盟的限度：1958 年的金門危機》，載加特霍夫編《中蘇軍事關係》，第 124 ～ 127、131 ～ 132 頁。另一種相反的意見則認為蘇聯實際上完全按中國要求做了。參閱摩爾頓·H·哈爾波林和鄒讜：《1958 年的金門危機》，載哈爾波林編：《中蘇關係和軍備控制》，第 265 ～ 303 頁。
【39】《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36 頁。
【40】 參閱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213 ～ 214 頁。
【4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38 ～ 240 頁，有關赫魯曉夫的引文在第 240 頁。
【42】 引自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蘇中關係，1945-1970 年》，第 155 頁。
【43】 引自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92 頁。
【44】 危機進一步發展的情況，參閱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托馬斯：《聯盟的限度》；哈爾波林與鄒讜：《1958 年的金門危機》。
【45】 參閱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217 ～ 221 頁。
【46】《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25 頁。
【47】 1959 年 9 月彭德懷被免職後，粟裕擔任國防部副部長。這可能使人認為他曾被彭免職，因為當彭拒絕與毛合作的時候他卻執行了毛的指示。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粟認為解放軍遭受恥辱是政治糾紛的結果，表達了他的不滿。關於彭拒絕與毛合作的說法，參閱《人民的好總理》(1977 年)，第 197 頁。
【48】《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31 頁。
【49】 同上，第 237、255 頁。
【50】「全民皆兵」的口號最先出現在 9 月 13 日《人民日報》，該報當天還報道說，這個運動已在幾天前就開始了。然而，在毛到當地視察並作指示以後，8 月河北徐水把武器發給了公社社員（《當代背景》520 號，第 1 頁)。一個英國作家目擊了成都的一次反美集會，參閱沃拉斯頓:《中國的早晨》，第 107 ～ 110 頁。
【51】《當代背景》530 號，第 20 頁。
【52】 同上，第 12 頁。
【53】 同上，第 7 頁。
【54】 同上，第 3 頁。
【55】 同上，第 6 頁。
【56】 錢德拉—塞卡爾：《今日共產黨中國》，第 51 ～ 52 頁（著重點是我加的)。
【5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37 頁。
【58】 參閱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 209 ～ 215 頁。
【59】 參閱吉廷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271 頁。更詳細的論述參閱 T·A·夏：《隱喻、神話、儀式和人民公社》，第 1 ～ 15 頁。
【60】 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 211 ～ 212 頁。
【61】 同上，第 211 頁。
【62】 引自喬菲：《黨與軍隊》，第 90 頁。
【63】 同上，第 87 ～ 91 頁。
【64】《當代背景》538 號，第 2 頁。雖然在大躍進期間，全國各地都開辦了公共食堂，但一些省在當年初就已經開始這項實驗了。參閱前引書第 5 ～ 6 頁。

【65】 1958 年 11 月 10 日《人民日報》；同上，第 20 ～ 30 頁。錢德拉—塞卡爾教授在他所寫的《今日共產黨中國》第 56 頁引用中國報刊上的一首詩，以說明公共食堂伙食壞到什麼程度：

休息鐘聲響，
我們進飯堂。
吃了一口飯，
沙子滿牙床。
品嚐蔬菜味，
青草菜裏藏。
放下一雙筷，
又去耕作忙。

【66】 引自 A·V·謝爾曼：《人民公社》；及赫德遜：《中國的人民公社》，第 36 頁。
【67】 田生:《從人民公社展望共產主義》,《政治學習》1958 年第 10 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51 號，第 8 頁。
【68】 據李先念透露，在北戴河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過公共食堂問題，參閱《北京週報》1958 年第 37 期，第 13 頁。關於柯慶施是這個提議的發起人，參閱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53 頁。
【69】 《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5 號，第 26 頁。
【70】 謝爾曼：《人民公社》，第 36 ～ 38 頁。
【71】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67 號，第 3 頁。7 年後發出文化大革命第一陣衝擊波的姚文元，也認為這種制度會鼓勵懶人。參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00 號，第 2 ～ 5 頁。
【72】 參閱陸仲贊（音譯）:《華國鋒對毛澤東評價的漏洞》,《爭鳴》（香港）1980 年第 35 期，第 25 ～ 31 頁。
【73】 參閱本書第 1 卷，第 86 ～ 90 頁及本卷第 2 章。
【74】 《北京週報》1958 年第 37 期第 13 頁。
【75】 《中國青年報》1958 年 10 月 25 日，英譯文見《當代背景》540 號，第 11 頁。
【76】 同上，第 9 ～ 10 頁。
【77】 錢德拉—塞卡爾：《今日共產黨中國》，第 55、57 頁。
【78】 《紅衛兵》1967 年第 2 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590 號，第 13 頁。
【79】 錢德拉—塞卡爾：《今日共產黨中國》，第 55 ～ 56 頁。
【80】 沃拉斯頓：《中國的早晨》，第 48 頁，劉少奇在江蘇視察期間，參觀了一個正在建設中的新村莊，他奇怪為什麼房子的後牆上沒有開通氣的窗戶。當地的黨委書記立即就這個建築上的問題作出決定，並增添窗戶（《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11 號，第 4 頁）。
【81】 錢德拉—塞卡爾：《今日共產黨中國》，第 51 頁。有關譚震林對這個問題的評論，參閱本卷第 84 頁。
【82】 英譯文見《北京週報》1958 年第 38 期，第 6 頁。關於王的身份，參閱本書本卷第四章注 129。
【83】 參閱吳冷西的說明，英譯文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2 卷，第 4 期，第 74 頁。
【84】 《當代背景》537 號，第 2 頁。
【85】 同上，第 3 頁。
【86】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48 頁;《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233 頁。《關於供給制的意見》，原文沒有提供日期，但文章的調子表明是在 1958 年，而不是像《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中所提出的那樣在 1960 年形成的。這可能摘自毛在北戴河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但更有可能是毛私下的談話，也許是對柯慶施、張春橋和他在上海的其他支持者的談話。如果毛在北戴河或黨內某些重要場合發表過這些觀點，那似乎不可能有這麼多人敢給張春橋潑冷水。
【87】 關於這個序言是毛寫的，參閱《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4頁。

【88】 同上，第 17 ～ 24 頁。
【89】 參閱查爾斯·霍夫曼：《中共的物質刺激政策》，載《中國季刊》1964 年 1-3 月號，第 101 ～ 103 頁；珀金斯：《共產黨中國的市場控制和計劃》，第 150 ～ 151 頁。關於由張春橋發起的爭論的其他文章，參閱《當代背景》537 號，第 8 ～ 17、33 ～ 37 頁。其中的一篇文章透露，1958 年初，一些計件工人所得工資是他們的基本工資的兩倍，由此引起他們同計時工人的矛盾；同上，第 5 頁。
【90】 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企圖把毛的半工半讀的指示說成是普遍適用的。這個企圖表現在斷章取義地引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有關條文的一句話上。參閱《劉少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例》（廣州：「學習毛主席著作辦公室」，「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革命委員會」，1967 年 5 月編印），第 7 頁。指示中的不同之處（「可以」和「應該」）是因為農業學校的師生理應在校辦農場參加體力勞動。
【91】 《當代背景》892 號，第 12 頁；毛的無標題文集第 37 頁。
【92】 本書第 1 卷第 197 頁。
【93】 參閱陳道元等:《替「兩種教育制度」恢復名譽》，《新華文摘》1980 年第 6 期，第 198 頁。
【94】 羅伯特·D·巴恩森：《中共的農業中學》，見《中國季刊》1961 年 10-12 月號，第 111 頁（注 7）。這些數字是從陸定一寫於 1959 年 3 月 14 日的一封公開信中透露出來的，這封信在這所農業中學成立一週年時發表（同上）。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巨大差距，充分說明許多適齡青年失學的情況。
【95】 《新華文摘》1980 年 6 號，第 198 頁第一行。
【96】 引自 5 月 7 日講話的內容，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53 號，第 29 ～ 30 頁；以及《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3 頁。引自 5 月 30 日講話的內容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53 號，第 22 ～ 23、29 頁；《前十七年教育戰線兩條道路鬥爭大事年表》，英譯文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 932 號，第 30 頁；《體育戰線》（1967 年 5 月 6 日）第 3 頁；《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4 頁；《劉少奇材料彙編》（第 1 輯，1967 年 4 月天津），第 127 ～ 128、131 ～ 132 頁。（《劉少奇材料彙編》，第 127 ～ 132 頁也收入了 1958 年及其以後在其他場合談到這個問題的有關言論。）半工半讀問題也許在 1958 年 4 月和 6 月召開的兩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進行過討論，我們對這兩次會議的議程可能瞭解得不夠全面（參閱利伯瑟所著書，第 109 頁，116 頁）。當然，在 6 月份召開的那次會議上，陸定一轉達了劉 5 月 30 日講話的基本內容（《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言論摘編》（北京：「首都批判反動學術『權威』聯合委員會」，1967 年 5 月），第 10 期第 10 頁；第 80 期第 80 頁；第 86 期第 19 頁）。
【97】 《中國大陸雜誌選》653 號，第 22 頁。
【98】 同上，第 29 ～ 30 頁。
【99】 《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4 頁。
【100】《新華文摘》1980 年 6 號，第 199 頁。
【101】 關於農業中學早期的發展情況，參閱巴林森：《農業中學》，第 107 ～ 108 頁。關於書記處會議的情況，參閱利伯瑟所著書，第 108 頁。
【102】 巴林森：《農業中學》，第 111 ～ 112、115 ～ 117 頁。據該書說，「公社似乎急需『初級農業技術人員』。陸定一在 1960 年 2 月《人民教育》發表文章說，為完成實現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的任務，中國需要 184 萬名農機操作人員和 44 萬名『農業技術幹部』。他們要能夠駕駛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維修電動排灌設備，在當地的化肥廠和農藥廠中完成技術性工作，當測量員、獸醫助理、圖書管理員，能夠在公社的農場和工廠中做類似的初級技術工作。」（同上，第 112 頁）至於這些農業中學畢業生的技能，巴林森引用一位全國人大代表的話說，他們書本知識不夠，但在生產勞動中是很出色的（同上，第 118 頁）。
【103】 同上，第 112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653 號，第 23 頁。

【104】巴林森：《農業中學》，第 110 頁。
【105】參閱本書第 1 卷，第 217 頁有關劉負責新聞和宣傳口的情況。正如宣傳口負責人陸定一的活動所證實的那樣，宣傳口包括了教育。然而，劉在青年團中央會議上的講話，更多地表明了個人的而不僅僅是黨的責任，見《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3 頁（這個材料說，劉的講話是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但引文本身說明這是在與青年團開會時講的）。幾年後，周恩來聲稱，甚至身為總理的他，也無法阻止陸定一控制教育部，參閱《首長講話集》第 4 輯，（北京清華大學衛東戰鬥兵團，1966 年 11 月）第 68 頁。
【106】《當代背景》892 號，第 12 頁；毛的無標題文集，第 37 頁。
【107】參閱《兩條道路鬥爭大事年表》，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932 號，第 30 頁；以及《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00 號，第 2 頁。這種制度被叫做「雙軌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批判劉少奇在天津關於半工半讀的講話是反對毛的，無視毛對武漢和江西的共產主義大學的指示，並說劉因自己的講話而聲稱是半工半讀的倡導者。參閱《當代背景》834 號，第 17 頁；《劉少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例》，第 7 頁；《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3 頁。

意味深長的是，既沒有直接引述劉少奇在天津講話的內容，也沒有提供講話的日期。遺憾的是，同一時期的資料也沒有表明劉在天津什麼時候說了些什麼。但我們知道 1958 年 7 月 12 日劉在天津上了火車，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這正是劉在天津視察時期（《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29 號，第 1 頁）。如果是這樣，那就不能指責劉無視毛的指示。因為當時主席還沒有發表這些指示。毛在 9 月 12 日參觀武漢大學（《當代背景》891 號，第 31 頁），而他對江西共產主義大學作指示的時間是 1961 年（同上，第 36 頁），雖然周恩來曾說過，毛在 1959 年給江西共產主義大學寫過信，並決定不發表這封信（《首長講話集》，第 68 頁）。

除了造反派不願意直接引用劉在天津的講話之外，另有證據確實表明，劉沒有對抗毛的路線。我們可以更有把握地斷言，造反派引述的 1964 年劉的評論並不能證實劉聲稱他的天津講話有在這方面的倡導意義。事實上，劉甚至沒有提到他在天津的講話說了些什麼內容，而僅僅對當時天津市群眾熱情的高漲作了評論（《劉少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例》，第 7 頁）。
【108】聯合指示見《新華半月刊》1958 年 19 號，第 1 ～ 4 頁。指示中提到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不是公社這個事實證明，這個指示是在北戴河會議前起草的（同上，第 2、3 頁）。〔這個指示和陸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載《紅旗》1958 年第 7 期；《當代背景》516 號）在指示中名稱沒有修改，或者是因為形勢的發展迅猛，或是因為複雜的審批過程〕。指示對兩種教育制度的支持，參閱《新華半月刊》1958 年 19 號，第 3 頁。指示贊成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例子，參閱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932 號，第 29 頁。
【109】關於文化大革命批判的矛盾性的一個例子是，當譴責劉少奇和陸定一時，毛在 1958 年對舊教育政策的批評被認為是反對劉、陸而受到讚揚〔《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932 號，第 27 頁〕，而劉和陸所作的同樣的批評則被認為是反毛言論被批判（同上，作第 30 頁；《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第 4 頁，注 10）。
【110】關於毛，參閱本書第 108 頁；關於劉，參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00 號，第 21 頁；關於鄧小平，參閱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08 頁；關於陸定一，參閱《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見美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932 號，第 30 頁。
【111】《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第 19 頁，注 19。
【112】《毛主席教育語錄》，第 20 頁（兩條）。
【113】《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41 ～ 242 頁。

【114】《毛主席關於教育革命的指示（1934-1966 年）》，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19 號，第 31 頁。參閱關於毛在湖北、安徽參觀學校的報道，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06 號，第 1 ～ 10 頁。
【115】1967 年 6 月 8 日《北京日報》第 5 版。
【116】《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63 號，第 3 頁。
【117】同上，1867 號，第 3 頁。
【118】關於根據一些簡短的、孤立的引語來批判陸定一的文章，參閱《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932 號，第 30 頁。陸關於 1957 年他試圖提出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說法（《當代背景》516 號，第 8 頁）表明，他領導的中宣部甚至在 1958 年 1 月毛再次運用他的權威之前就提出了這項政策。如果是這樣，陸可能是想使他自己避免任何落後於形勢的指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當周恩來被迫批判陸定一的教育路線時，他也不能從陸的話裏挑出什麼毛病，而不得不聲稱，只有到那時才可能看出陸的講話中別有用心，而在當時是看不出來的。參閱《首長講話集》，第 67 頁。
【119】參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00 號，第 2 頁；陸定一講話的日期沒有指明，但在 1958 年是不言而喻的。
【120】《新華半月刊》1958 年 19 號，第 3 頁。
【121】參閱唐納德·J·芒羅：《中共的平均主義理想和教育現實》，載林德貝克編：《中國：一個革命社會的管理》。
【122】《砸爛武漢大學的「三家村」黑幫，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1966 年 7 月 11 日《羊城晚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747 號，第 8 頁。
【123】《打倒三反分子張再萬（音譯）》，《紅色造反報》（拉薩）1967 年 9 月 9 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31 號，第 21 頁。
【124】沃拉斯頓：《中國的早晨》，第 91 ～ 92 頁。
【125】同上，第 87 頁。
【126】同上，第 90 頁。
【127】《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62 號，第 16 ～ 17 頁。
【128】同上，1887 號，第 18 ～ 21 頁。
【129】《中國大陸報雜誌選》653 號，第 30 頁。
【130】《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詩文選》，第 68 頁。
【131】《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第 287 頁。
【132】同上，第 287 ～ 288 頁。
【133】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57 號，第 16 ～ 18 頁。
【134】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55 號，第 4 ～ 8、22 ～ 24 頁。
【135】《資料選編》，第 232 頁。
【136】《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55 號，第 41 頁。
【137】《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39、41 頁。
【138】《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英譯文見美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77 卷，668 號，第 8 ～ 9 頁。
【139】《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55 號，第 14 頁。
【140】《北京週報》1958 年第 40 期，第 6 頁。早在 7 月，劉少奇就提倡業餘煉鋼。
【141】《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第 361 ～ 362 頁。據說 9 月 20 日早上週剛開完一個通宵會議，沒有休息，就趕來了。這個日期說明，甚至早在 10 月 4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之前，可能在進行試驗的基礎上，一些群眾被動員起來了。北京大學學生參加煉鋼運動必須得到國務院的批准，這似乎在 9 月 16 日下達了。（同上）
【142】《北京週報》1958 年第 34 期，第 3 頁。
【143】沃拉斯頓：《中國的早晨》，第 115 頁。大躍進期間，一個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逃兵在山東省的一間造紙廠工作。他對煉鋼運動作了更有偏見的「內部」報道，參閱卡諾：《毛和中國》，第 101 ～ 102 頁。

【144】沃拉斯頓：《中國的早晨》，第 118 頁。在看完《第十二夜》的演出後，周恩來建議上海的一個劇團上演反映當前鬥爭的戲劇。參閱《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第 519 ～ 520 頁。
【145】《文革風雲》1967 年第 9 期，第 28 頁。
【146】《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60 號，第 6 ～ 8 頁。
【147】10 月中旬在河北視察期間，鄧提倡把土法煉鐵變成洋法煉鐵，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63 號，第 4 頁。
【148】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77 卷，668 號，第 8 頁。
【149】《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30 號，第 17 ～ 20 頁。

第二篇 撤退

第七章 武漢退卻

【1】 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82 頁。科羅契科在 1961 年訪問加拿大時叛逃，雖然他看到並批評大躍進的過失，但總的說來，他是同情中國人的。
【2】 陶魯笳（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論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的新發展》，見 1958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報》。譯文見《當代背景》509 號，第 23 頁。
【3】 《輝煌的十年》，第 318 頁。
【4】 儘管 1958 年工業勞動力增加了 3 倍，但有勞動保險的工人、職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只增加了 20%，即從 1150 萬增加到 1380 萬（比 1956 年至 1957 年之間的增長數少得多），而享受公費醫療的人數只增加了 5%，即從 660 萬增加到 690 萬（《輝煌的十年》，第 218 ～ 219 頁）。有關四川省醫療系統運行的報告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95 號，第 28 ～ 29 頁。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和一些基層幹部，因為採用並發展合同制勞動力而受到批判，這些人在福利待遇方面存在不滿，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國家要提供大量資金擔負臨時工的費用是困難的。見《劉少奇關於固定工和合同工制度的有關指示》，載《中國大陸雜誌選》616 號，第 21 ～ 30 頁。實際上，與張春橋企圖廢除計件工資相比，劉少奇不應受到更多的譴責（見本書本卷第 6 章）。文化大革命以後，黃正身寫了一篇為劉和合同工制度辯護的文章《實行「兩種勞動制度」是復辟資本主義嗎？》，載《新華日報》（文摘版）1980 年 5 號，第 26 ～ 27 頁。
【5】 關於四川的情況，見李大章：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1959 年 6 月 24 日《四川日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09 號，第 26 頁。河南的情況見吳芝圃：《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載《紅旗》1960 年第 1 期，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97 號，第 2 頁。
【6】 關於 1958 年在農業方面損失的工作日，見陳正人：《加速農業的技術改造》，載《紅旗》1960 年第 4 期，第 4 ～ 10 頁。根據譚震林：《關於實現我國農業機械化的若干問題》（《紅旗》1960 年第 6 期，第 4 頁）一文提供的數字，我計算了一下，相當於只有 1/3 的工作日用於農業生產。譚計算用於農業的勞動日總數是 600 億個，其中 50% 是用在水利、林業、副食品、農作物、漁業等方面。
【7】 《當代背景》509 號，第 24 頁。
【8】 見瑪瑞恩·R·拉色：《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中國農業》，載《中國大陸經濟概覽》第 1 卷，第 201 頁。
【9】 河北的口號是「向河南學習，超過河南」，見河北省長劉子厚的報告，其譯文登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49 號，第 11 頁。相互攀比對廣東省負責人的影響，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23 號，第 3 頁。
【10】 《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97 號，第 2 ～ 3 頁。

【11】 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86 號，第 17～18 頁。
【12】《人民日報》社論，1958 年 10 月 9 日，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75 號，第 1～3 頁。也見 10 月 12 日《人民日報》的社論，該社論甚至認為收成可能要比預期的還要好，所以，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13】 1958 年 11 月 9 日《人民日報》社論，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98 號，第 12 頁。
【14】《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13 號，第 6～7 頁。
【15】 參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29 號，第 4 頁，及《當代背景》834 號，第 18 頁。
【16】《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698 號，第 14 頁，在廣東省，由於缺少休息致使兒童中流行麻疹，參見《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你》第 3 集，第 36 頁。
【17】《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2 卷，第 284 頁。
【18】 見山東省副省長晁哲甫在省人代會上的報告，1959 年 5 月 22 日，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60 號，第 36 頁。
【19】 見安徽省第一書記曾希聖的工作報告《在總路線的旗幟下繼續前進》，載 1959 年 2 月 12 日《安徽日報》，譯文登在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 (華盛頓)，2005—N 號，第 8 頁。
【20】 見李大章省長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59 年 6 月 24 日《四川日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09 號，第 21 頁。
【21】《薄一波的四十條罪狀》，《紅衛兵報》第 8 期 (1967 年 2 月 22 日)，譯文載於《當代背景》878 號，第 16 頁。
【22】 見本書本卷結語。
【23】 李大章估計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20%～30%;《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09 號，第 26 頁，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談到了這一情況。他不覺得這種說法言過其實，但認為不太嚴肅。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40 頁。
【24】 見李仲明：《共產黨中國的統計系統》，第 69～188 頁及前文第 31～32 頁。
【25】 李仲明：《共產黨中國的統計系統》，第 93～94 頁。幹部們的相互攀比要歸因於毛澤東，見本書本卷第 43 頁。
【26】「鄧小平的檔案材料」，《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7 號，第 12 頁。
【27】 另兩部分是漢口和漢陽，有關這次會議的總結性敘述見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23～127 頁。
【28】《毛澤東思想選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34～135 頁。
【29】 同上，第 140、147 頁，在 147 頁上有一處印刷錯誤 (中文原文是：《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68 頁)，在這裏毛澤東建議發表的糧產數字是 7.3 億斤 (不是 7.5 億斤)(譯按：原文如比)；在同一頁其他地方出現的數字證明這是不對的，此點已被該文的另一篇譯文所證實，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223 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48 頁。毛澤東講話的日期，《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中是 12 月 19 日，這也有誤，這次講話剛好是在全體會議結束以後，正確的日期可能是 12 月 9 日，這是在目錄中標出的。
【30】 1958 年 10 月 24 日《人民日報》。
【31】《當代背景》479 號，第 5 頁，第 4 條。
【32】《當代背景》892 號，第 2 頁，第 3 條。
【33】《當代背景》508 號，第 7 頁。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原文在 1958 年沒有發表，可能因為這個綱要在大躍進的情況下已經過時了！
【34】《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798 號，第 14 號。
【35】 1958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報》，第 3 版和第 4 版。
【36】《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15 號，第 14 頁；《新華半月刊》1958 年 15 號，第 113、114 頁。
【37】《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34 號，第 16 頁。

【38】 1958年9月11日《人民日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57號，第1～13頁。即使是現在，這5項措施的順序看起來也不是神聖不可動搖的，在頒布的這些指導措施的順序上，水利被正確地放於首位，但施肥卻被不正確地放在深耕之上，居第二位。
【39】 1958年10月6日《人民日報》。
【40】 1958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這次會議的時間是從10月10日到18日。這8條措施被說成是毛澤東提出的。在同一天，報紙還發表了河南省委一位高級幹部的文章，提到了7條措施，將防治病蟲害刪掉了。
【41】 同上。
【42】 參見上條及1958年11月10日和12日《人民日報》。後者報道了從10月27日開始到11月4-5日結束的3個農村工作會議(西北，東北，南方及西南各省)；由於每個會議決不可能同時召開並一致制定出農業憲法的定稿，所以有理由推斷這些會議是在農業憲法定稿後召開的。農業憲法是在10月18日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以後琢磨出來的。宣傳媒介造成混亂的另一個例子，(見本章注40)在1958年第35期《北京週報》第4頁報道西安會議的文章中亦可見到。該報道是在10月28日發表的，當時第二批多省農村工作會議正開始召開，文章提到了農業憲法，但只列出北戴河提出的5條。也見《北京週報》同期，第8、10～11頁。
【43】 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第78～80頁。
【44】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年)第1卷，第103～104頁。
【45】 看來，毛澤東有對模範單位和個人表示信任的嗜好。例如，他曾請湖北勞動模範孔木聲到他家中作客。孔在1963年受到指責，但從文化大革命中的攻擊來看，他的農業小組所宣佈的產量是真是假，這一點還不清楚。見《揪出政治扒手王任重》，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9號，第38～40頁。
【46】 見譚震林：《爭取在兩三年內做到豐衣足食》，《紅旗》1958年第6期，第10～11頁；及《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44號，第5頁。
【47】 《中國大陸報刊選》1857號，第7頁。
【48】 聯合研究：《共產黨中國》1958，第74頁。
【49】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年)第1卷，第144頁。毛把「三三制」的創造歸功於人民，但10月24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卻說這一方法是毛澤東提出的。
【50】 見山西省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山西經驗的討論，1958年12月8日《山西日報》，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46號，第8頁，也見新華社1958年12月27日對基本農田制創造者山西的報道，《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20號，第17～18頁。
【51】 有關會議的報道見10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及對高產田的讚揚；也見1958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北京週報》1958年第35期第8～10頁。
【52】 1958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
【53】 1958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社論。
【54】 1958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
【5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12號，第8～9頁。
【56】 同上，第6頁；1958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
【5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12號，第11頁；1958年11月12日《人民日報》。
【58】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93號，第22～23頁；及1920號，第17頁。
【59】 同上，1893號，第23頁。
【60】 同上，1903號，第23頁。
【61】 同上。
【62】 這些統計數字是依據《共產黨中國各省農業統計》第1～2、30、50、60、139、159、179～180頁上的各省統計數字得出的。武漢全體會議批准把耕作地的畝數減少2/3，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496頁。譯文中使用的詞是「播種」，但根據上下文顯然意思是「耕地」。

【63】 見《中國農業年鑒》(1980)，第 34 頁。
【64】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33、134 頁。
【65】 恩紹尼·M·唐：《農業的政策和成就》，載依克斯蒂·蓋侖捨和劉編著的《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趨勢》，第 497 頁。
【66】 見毛對安徽取得的成績的讚揚，載《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42 頁。
【67】 陸仲讚：《華國鋒對毛澤東評價的漏洞》，《爭鳴》(香港)1980 年第 35 期，譯文載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 (華盛頓)，76 卷，736 號，第 20 頁。
【68】 《輝煌的十年》，第 121 頁。
【69】 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 (華盛頓)，76 卷，736 號，第 20 頁。
【70】 對譚震林這一時期活動的批判，大多集中於他在西安和山東的講話，見《批譚戰報》1967 年 8 月 5 日，第 4 頁。他在西安講話的原文表明了他的這一講話是在 10 月份各省農村工作會議發表的 (見前文第 123 頁)，而不是在 11 月或 12 月陝西西安幹部會議上講的，他在會上概述了他對共產主義的展望 (見前文第 84 頁)。據說譚震林在 9 月份曾推廣使用未經試驗的繩拉——拖拉機 (《譚震林破壞反對農業機械化的罪行必須清算》，《農業機械技術》第 6 期，1968 年 6 月 8 日，譯文登在《中國大陸雜誌選》624 號，第 4 頁)。在同一月份裏，毛澤東也曾提倡推廣同一工具。(《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874 號，第 4 頁)
【71】 第一次鄭州會議是在 11 月中旬召開的，《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31 頁。
【72】 對劉少奇的批判見《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5 頁；《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3 頁；及《劉少奇生活中大事編年史 (1899-1967 年)》。譯文見《當代背景》834 號，第 17 頁。《劉修的傳記補遺》，聯合研究出版中心檔案 (華盛頓)41 卷，858 號，第 188 頁。在此文中，鄧小平也受到批判，還宣稱毛在給農村幹部們的信中，介紹了一種更為合理的政策。但直到 1959 年 4 月，才公佈 (見《當代背景》891 號，第 34～35 頁，此處記載的日期是 1959 年 11 月，這是不對的)。有關這一重要信件原文的討論，見本卷第 170～171 頁。
【73】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47 頁。
【74】 見本書本卷第 89～90 頁。
【75】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41，144～145，210 頁。這裏提到的鋼產量 3000 萬～4000 萬噸的目標 (第 141 頁) 是 1960 年的還是 1961 年的不清楚。毛澤東說「在三年以內」，但這可能是指包括大躍進的 3 年在內 (即到 1960 年)，也可能是指從他講話的時候起的 3 年之內 (即到 1961 年)。
【76】 同上，第 133 頁。
【77】 同上，第 210 頁。
【78】 同上，第 145～146 頁。
【79】 同上，第 134 頁；唐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第 253、258～259 頁。在 1959 年 -1960 年，煤的運輸佔了鐵路運輸總容量的 40%。
【80】 見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23～124 頁，他列出了根本沒參加或只是部分地參加了鄭州會議的領導人名單。
【81】 見習仲勳的敘述，載《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 (1979)，第 18～19 頁。
【82】 見本書本卷第 10 章。
【83】 見王震等：《回憶與繼承——懷念王稼祥同志》，《新華月報》1981 年 2 號，第 61 頁。
【84】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33、139 頁。楊一辰在 5 月份的代表大會上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1958 年 2 月，楊一辰的城市服務部改名為第二商業部，而陳雲的商業部改名為第一商業部。在 9 月份，這兩個部合併為商業部，程子華是部長。在 1958 年 11 月，陳雲成為新建立的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的主任，而楊一辰調到遙遠的青海，承擔了一個不重要的職務。

直到 1962 年 -1963 年楊才在中國的心臟地帶河北再次露面，成為河北省副省長。見唐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第 518 ～ 519 頁，而楊一辰的傳記見科林與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

【85】《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33 頁。

【86】同上，第 138 頁。

【87】同上，第 133、139 頁。

【88】根據《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274 ～ 275 頁記載，周恩來在「大躍進開始後」，帶著中國鋼鐵工業的問題飛抵莫斯科求援。蘇聯派了一位國家計委副主席、副總理蘇斯楊柯，去中國實地調查。「幾週以後」他向赫魯曉夫匯報說：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有經驗的煉鋼工人被派往農村，留下鋼廠由他們當中的生手管理。赫魯曉夫的追述給人這樣一個印象，即周恩來 1958 年某時的訪問，完全是由於鋼鐵生產的危機導致的一次緊急訪問。中國總理這次到莫斯科的秘密行動，意在鋼鐵生產方面尋求援助，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但蘇聯總理的回憶似乎可能過於渲染了。蘇斯楊柯在 1959 年 6 月中旬對中國進行了為期 9 天的公開訪問 (1959 年 6 月 11 日和 20 日《真理報》;《北京週報》1959 年第 26 期，第 22 頁)。如果這次訪問是赫魯曉夫提到的那一次，那麼它更像是周恩來參加 1959 年 1 月 2 日蘇聯召開的二十一次黨代表大會時安排的。如果是這樣，那麼這次訪問準備時間之長以及訪問時間相對的短暫就不能證實赫魯曉夫的緊急援助建議。(赫魯曉夫還詳細描述了蘇斯楊柯在通往中國的長途列車上是怎樣地喝酒。據報作為官方訪問，他來去應該都乘飛機。) 同年下半年，蘇斯楊柯同其他人迎接了中國一個重要代表團，該團由很多同工業有關的副部長組成。見 1959 年 9 月 11 日《真理報》。

【89】《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 (1979)，第 6 頁；對這次訪問的當時報道，還見《新華半月刊》1958 年 24 號，第 19 頁。

【90】《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31 頁。也見段君毅等《少奇同志，河南人民懷念你！》，載 1980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報》。

【91】《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9 年) 第 1 卷，第 28 頁。

【92】同上，第 132 頁。

【93】同上，第 131 頁。

【94】同上，第 132 頁。

【95】李銳:《懷念田家英》，《新華月報》(文摘版)1980 年，第 4 期，第 172 頁;「鄧力群同志關於學習《決議》的輔導講話」，1981 年 7 月 11 日《中國青年報》，譯文見《國際廣播新聞—中國—81—143》，第 K17 頁。

【96】《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77 頁。

【97】《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85 ～ 187, 242 頁；安子文:《把我們的黨建設好——紀念劉少奇同志》，1980 年 5 月 8 日《人民日報》。

【98】《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42 ～ 143 頁。

【99】《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92 ～ 495 頁。

【100】《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38 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57 頁。

【101】《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92 頁。

【102】英國廣播公司：《世界廣播概要，第 5 部分：遠東》5990 號，第 BII/1 頁。

【103】《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42 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61 頁。

【104】扎戈里亞：《中蘇衝突 (1956-1961 年)》，第 109 ～ 133 頁。此書就蘇聯對人民公社的反應和中國人宣佈的理論開展了廣泛的討論。扎戈里亞指出，在北戴河會議決議形成之後但在它發表之前，蘇聯共產黨於 1958 年 9 月 5 日召開了一次特別代表大會。這樣看來，好像在決議發表前，蘇聯已經知道了這一決議的一些內容。

【105】《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摘編》(北京：「北京紅代會人大三紅批劉鄧第一支隊」1967 年 4 月)，第 47 頁。

【106】關於毛澤東宣佈退居二線一事，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87 ～ 488 頁。
【107】最後這兩段大部分是根據分析寫的，除了特別指出的地方以外，引自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128 ～ 132 頁。
【108】同上，第 133 頁。
【109】《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90 頁。
【110】同上，第 492 頁。
【111】同上，第 502 頁。
【112】《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29 頁；毛澤東究竟在 1958 年還是 1959 年作關於斯大林的評論，說法不一。參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29、191 頁。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一書第 29 ～ 30 頁證實了毛澤東在鄭州會議開始時的一次講話中談到這一問題。
【113】同上，第 130 頁。關於斯大林給經濟學家的答覆，見《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 93 ～ 104 頁。有關斯大林這一論著的政治背景的簡介見倫納德：《斯大林之後的克里姆林宮》，第 36 ～ 39 頁。儘管毛澤東批評斯大林，但他要求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們繼續讀蘇聯這位前領導人的著作，以及其它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見《大海航行靠舵手》，第 33 ～ 34 頁；《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234 ～ 235 頁。
【114】《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摘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新人大公社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1967 年 5 月），第 40 頁。這番評論就像這本書所提示的那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用來反對彭真的，但把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放在一邊，而去譴責或證明彭真是追隨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分子完全是沒有道理的。彭真還因在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創刊號上寫的序言中的一些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 (1958 年 11 月 25 日《前線》)，但細看一下這個序言，並沒有看出這個序言有反對毛澤東或大躍進的目的。該文的第二句話宣稱毛澤東思想將成為刊物的指南。(整段文章的原文見 1958 年 11 月 26 日《人民日報》) 關於批判文章見《〈前線〉創刊號上的序言是修正主義的宣言書》，載 1966 年 5 月 29 日《羊城晚報》，譯文登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711 號，第 4 ～ 8 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1967 年 6 月 10 日）譯文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639 號，第 7 ～ 8 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摘編》，第 34 頁；《搗毀「三家村」的黑後台》，1967 年 6 月 18 日《光明日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77 號，第 12 ～ 13 頁。
【115】見本書第 1 卷，第 61 ～ 63 頁；及前文第 3 章。
【116】《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147 頁。
【117】關於新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的報道，見《北京週報》1958 年第 35 期，第 18 頁。可能教程的編撰者應早先鄧小平提出的要求，要提供一套關於毛的「豐富的」經濟思想的理論體系，見 1967 年 6 月 14 日《進軍報》，第 2 頁。
【118】《賀龍在登山運動方面的罪行》，1967 年 2 月 9 日《體育戰線》，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75 號第 19 頁。賀龍在 1959 年 9 月成為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他曾在 1958 年主持了中國登山協會的籌備會議。
【119】扎戈里亞：《中蘇衝突 (1956-1961 年)》，第 99、126 頁。
【120】《北京週報》，1959 年第 7 期，第 12 頁。有關周在蘇共二十一大上的講話中關於人民公社的論述，見弗洛伊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陣》，第 260 頁。周在武漢會議後，訪問河北的一個人民公社時，表示支持敬老院和幼兒園，見《崢嶸歲月》，第 22 ～ 25 頁。
【12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32 號，第 22 ～ 25 頁。

第八章 毛澤東轉右

【1】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502 頁。
【2】 《人民手冊》(1959) 第 44 頁。關於這段譯文的簡短討論，見 T·A·夏：《從術語和語義的變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卻》，第 24 頁。
【3】 見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30～138 頁；《彭德懷自述》，第 299 頁。利伯瑟認為（第 131 頁），毛談論的北京會議像是 1 月 12-26 日舉行的各省委農村工作部負責人參加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但這似乎靠不住。毛談及的北京會議像是指 1959 年 7-8 月廬山會議前的幾次會議中的一次。在廬山會議上，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批評者們表示了他們的懷疑(《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95 頁；第 2 卷，第 311 頁)。但是，國防部長彭德懷和其他 3 個廬山會議上的主要批評者沒有理由要參加像農村工作部長們這樣相對低級幹部的會議，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出席了這次的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高級官員僅有譚震林、鄧子恢、陳正人，他們負責全國的農村工作。因此，北京會議大概是另一次政治局會議。我已考證出這次會議的日期是 27 日，因為根據毛的講話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79 頁)，在那天透徹地討論了人民公社的管理問題。這可能也是毛澤東在 7 年後稱之為持續了不到一天的那次會議。(《當代背景》891 號，第 71 頁)，毛對這次會是不滿意的。
【4】 關於武漢會議後的情況，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38 號，第 6～17 頁；1945 號，第 7～16 頁。
【5】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41 頁。
【6】 T·A·夏：《從術語和語義的變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卻》，第 25 頁。
【7】 同上，第 29～35 頁；又見同前作者《隱喻、神化、儀式和人民公社》，第 3～15 頁。「三化」的正式譯文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見《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501 頁)；「三化」的中文見《人民手冊》(1959)，第 44 頁。
【8】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501 頁。
【9】 夏：《從術語和語義的變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卻》，第 34～35 頁。
【10】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38 號，第 6～7 頁。
【11】 同上，第 12、14 頁；1945 號，第 13、14、16 頁。
【12】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38 號，第 7、11、14 頁。
【13】 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38 號，第 6～17 頁中的舉例；1945 號，第 7～16 頁也可見到。
【14】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65 號，第 11 頁。
【15】 沃克：《來自人民公社的信》，第 16 頁。
【16】 同上，第 18 頁。
【17】 同上，第 18～19 頁。
【18】 同上，第 39 頁。
【19】 同上，第 17 頁。
【20】 同上，第 18 頁。
【21】 同上，第 20 頁。
【22】 同上，第 23 頁。
【23】 同上，第 34 頁。
【24】 同上，第 38 頁。
【25】 同上，第 30 頁。
【26】 同上，第 36～37 頁。
【27】 同上，第 41 頁。
【28】 同上，第 42 頁。
【29】 同上。
【30】 同上，第 19 頁。

【31】 薛光軍：《乾坤浩氣存——深切懷念陶鑄同志》,《紅旗》1979年第1期。其譯文載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73卷，74號，第83頁。
【32】 見1959年1月13日《文匯報》（香港）登載的陶鑄的講話，其譯文登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39號，第9～10頁;《北京週報》1959年第9期，第6～9頁。
【33】 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13號，第8～9頁。
【34】 沃澤爾：《共產主義下的廣東》，第258頁。有關趙的年齡以及其他詳細背景，見《趙紫陽的經歷》，載1967年10月13日《野戰報》，其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85號，第13頁。
【35】 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71號，第26～40頁。
【36】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第39、41頁。
【3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71號，第33頁。
【38】 同上，第27～28、29頁。
【39】 同上，第33頁。
【40】 同上，第32、33頁。
【41】 徐聞縣紅聯:《一起驚人的政治迫害事件》，載1968年1月4日《紅色造反者》，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23號，第1～11頁。
【42】 同上，第11頁。
【43】 同上，第4頁。
【44】 同上，第4～5頁。
【45】 同上，第5頁。這個文化大革命中的敘述，言外之意是說，沒有隱瞞糧食；在那時，毛並不相信這一點。
【46】 同上，第5～7頁。
【47】 同上，第7頁。
【48】 同上，第6頁。在廣東，趙紫陽擬定了一個揭露隱藏糧食50億斤～60億斤的指標。1958年公佈的糧食產量是620億斤。參閱《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74號，第32頁。
【49】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23號，第11頁；也見第6頁，證明趙紫陽認為隱瞞糧食的問題遍及全省。
【50】 《新華半月刊》1959年第8期，第33頁。江蘇省委書記劉順元在1月29日全省黨代會上的工作報告中，當談到「一盤棋」方針時也提到反對本位主義，但他沒有將它同隱瞞糧食問題聯繫在一起。見《新華半月刊》1959年第7期，第20～21頁。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在1月24日全省黨代會上的工作報告中，激烈抨擊本位主義，但他關心的只是該省委高層領導中長期存在的政治問題。見1959年2月7日《大眾日報》。
【51】 《紅旗》1959年第5期（3月1日出版），第25～29頁。
【52】 同上，第26頁。河南省黨報在一篇關於「一盤棋」方針的社論中，強調了類似的利益從屬原則，該文說，生產隊必須服從於公社，公社必須服從於縣，縣必須服從於省和國家(1959年2月13日《河南日報》)。
【53】 《紅旗》1959年第5期。
【54】 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報》。
【55】 同上。
【56】 《紅旗》1959年第4期，第9～12頁。
【57】 同上，第12頁。鄧小平和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2月20日該市委工業會議上讚揚了上海的這一方針，進一步體現出這一政策的重要性。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72號，第17～18頁。儘管有高級領導支持，這一方針的落實仍是困難的。當時有這樣一個插曲，在上海舉辦的全國商品交易會上，廣州市代表團的負責人公開拒絕廣州市生產的日用產品在廣州市以外出售，除非他苛刻的交易條件能被接受。見「打倒廣東財貿系統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28號，第19～20號。
【58】 《彭德懷自述》，第299頁。

【59】《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39、47 頁。
【60】《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78 頁;在《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57 頁上這段譯文中「一盎司」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兩」,等於 50 克。有關採取的緊急措施,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33 號,第 2 ~ 12 頁。
【6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39 頁。毛深夜工作的習慣可在下面的一個例子中得到反映。1959 年 1 月 28 日凌晨 4 點鐘毛還在給原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基層幹部寫信,見《毛澤東同志八十五誕辰紀念文選》,第 204 ~ 205 頁。
【6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60 頁。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對這次持續不到 1 天的會議表示不滿(同上,第 45 頁;《當代背景》891 號,第 71 頁),但在當時他似乎是滿意的。
【63】《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71 ~ 279 頁;《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51 ~ 158 頁。雖然這個講話標明的日期是 2 月 2 日,但毛講話的原文卻說:「現在是 2 月 1 日」。不管怎樣,結合上下文來看(毛事實上沒說「今天」),毛只不過是強調一個新的月份已經開始,而不是說講話當時的實際日期。
【6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60 頁。關於這個公社的報告,見呂鴻賓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半月刊》1959 年第 11 號,第 87 ~ 88 頁;《北京週報》1959 年第 20 期,第 9 ~ 10 頁)。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從 2 月 13 日到 23 日在農村視察,見《大眾日報》,1959 年 5 月 6 日。
【6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3 ~ 7 頁。這篇講話的題目所涉及的地區,像「新、洛、許、信」,我認為是指新鄉、洛陽、許昌、信陽。
【66】《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51 頁。
【67】同上,第 153 頁。這兩條消息以 1959 年 2 月 10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傳播給廣大讀者。事實上,省一級的黨組織已經忙於積肥運動了。見《大眾日報》,1959 年 2 月日。
【68】《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53 頁。
【69】同上,第 154 頁。
【70】同上,第 156 頁。
【71】同上,第 157 頁。
【72】同上。
【73】同上,第 158 頁。
【7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4 ~ 5 頁。
【75】同上,第 39 頁。
【76】同上,第 8 ~ 49 頁。
【77】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33 頁。
【78】《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6、17、25、36 頁。
【79】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六十週年》,載《紅旗》1981 年第 13 期,其譯文見《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145》第 K34 頁。
【80】《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0、20 頁。
【81】同上,第 47 頁。
【82】同上,第 40 頁;也見第 18、39、42 頁。
【83】同上,第 34、36、39、40、41、44 頁;在第 19 頁,這個短語的最後部分也可讀作「三收款」,也見第 10 頁。《中國共產黨術語彙編》第 229 頁,指出,這一短語是首次使用的。(《彙編》所指的是毛對會議的短得多的講話稿,已被收入《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79 ~ 288 頁)。這個口號後來被林彪採用的情況,見多梅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第 68 ~ 69 頁。
【8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9 頁。
【85】同上,第 44 頁。
【86】同上,第 34、39 頁。
【87】同上,第 36 頁。

【88】 同上，第 40 頁。
【89】 同上，第 22 頁。
【90】 同上，第 21 頁。
【91】 同上，第 9 頁。早些時候，毛從另一角度對農村的本位主義進行了抨擊。見本書第 1 卷，第 293 ～ 294 頁。
【92】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59 頁。
【93】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4、22 ～ 23 頁。
【94】 同上，第 21 頁；及第 11 頁。
【95】 同上，第 23、36、38、45 頁。有關王國藩農業合作社的描述，見毛主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 13 ～ 14、16 ～ 26 頁。英譯本第 24 ～ 25、67 ～ 81 頁。
【96】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9 頁。
【97】 同上，第 14 頁。有關河南對這一問題的考慮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965 號，第 15 頁。
【98】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55 ～ 456 頁;《人民手冊》(1959 年)，第 33 頁。
【99】 大衛·克魯克和伊沙貝爾·克魯克:《楊儀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第 38 ～ 39 頁。
【100】同上，第 42 ～ 43 頁。
【101】同上，第 43 頁。
【10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41 頁。
【103】同上，第 19 頁。
【104】同上，第 6、14、22、29 頁。
【105】同上，第 40 頁。
【106】同上，第 15、40 頁。
【107】同上，第 40 頁。對勞動力盲目流向城市的問題，毛只是順便地提了一下，鄭州會議並沒有討論這個問題，見同上，第 48 頁。
【108】同上，第 15 頁。
【109】同上，第 6、11、12、15、21 ～ 22、23 ～ 24、31 ～ 32、41 頁。
【110】同上，第 11 頁。
【111】同上，第 41 頁。
【112】有關張之洞在中國早期現代化方案中的作用，見鄧嗣禹和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響應》，第 164 ～ 174、195 ～ 207 頁。
【113】《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5 頁。
【114】同上。
【115】同上，第 32 頁。
【116】同上。
【117】同上，第 15、21、24、32、41 頁。
【118】同上，第 15、24 頁。
【119】同上，第 21 頁。
【120】同上，第 14 頁。
【121】同上，第 41 頁。
【122】同上，第 10、11 頁。
【123】同上，第 44、45 頁。
【124】同上，第 10 頁。
【125】同上，第 44 頁。有關王安石變法的簡述，見賴肖爾和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第 206 ～ 208 頁。
【12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9 頁及第 10 頁。
【127】同上，第 34 頁。
【128】同上，第 42 頁。
【129】《當代背景》562 號，第 7 頁。
【130】大衛·克魯克和伊貝爾·克魯克：《楊儀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第 57 頁。

【131】《當代背景》562 號，第 3～4 頁。
【13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1 頁。
【133】同上，第 26 頁。
【134】同上，第 44 頁。對斯大林的其他批評性評論，見同上，第 5、48～49 頁。
【135】見范索德：《如何統治俄國》，第 530～532 頁。
【13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26 頁。
【137】同上，第 18 頁；也見第 21 頁。
【138】同上，第 16 頁。
【139】同上。
【140】同上，第 10、11、18、21、26、41、47 頁。
【141】同上，第 21、29、38 頁。
【142】同上，第 26、45 頁。
【143】同上，第 38 頁。
【144】同上，第 9、26、45 頁。
【145】同上。
【146】同上，第 4 頁。
【147】同上，第 47 頁。關於基層幹部們的特殊煩惱，見同上，第 36～37 頁。
【148】同上，第 29 頁。毛還指出，在公社以上幹部（公社及地區級）中存在這樣的情況，即在上級和基層群眾出現對抗時，一些幹部保持中立或處於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見同上，第 26 頁。
【149】同上，第 39 頁；毛的話是：「民心不安，軍心也就不安。」
【150】同上。
【151】同上，第 48 頁。
【152】同上，第 41 頁。
【153】同上，第 27 頁。毛把秦王朝的壽命說得略短（公元前 221- 前 206 年），同時把隋王朝的壽命說得略長 (公元 589-618 年)。
【154】同上，第 9 頁。
【155】同上，第 36 頁。
【156】同上，第 11、13 頁。
【157】同上，第 13、38、45 頁。
【158】同上，第 27 頁。
【159】同上，第 13、16、26、31、38 頁。
【160】同上，第 13 頁。
【161】同上，第 42 頁。
【162】同上，第 41 頁。
【163】同上，第 35、36、441 頁。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部長陳毅曾因為 1959 年 4 月告誡《詩刊》雜誌不要變成通俗詩的刊物而受到批判。見《東方紅戰報》第 91 期，1967 年 6 月 15 日。看起來像是毛選擇了陳毅（本身就是詩人，曾出版了一本詩集，見《陳毅詩詞選集》）去轉達他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發表的這些具體意見。
【16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40 頁。
【165】同上，第 22 頁。
【166】同上，第 12 頁；也見第 9 頁。
【167】同上，第 12、20、28、30～31、37 頁。
【168】在某個場合，毛指出，在這 15 年期間，要包括生產隊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的過渡階段，同上，第 49 頁。在另一次講話中，他還指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可能需要 20 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並且要加上隊向公社過渡的階段；同上，第 20 頁。毛的含糊的說法是可以理解的。
【169】見本書本卷第 131 頁。
【170】《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9、30～31、37 頁。
【171】同上，第 26 頁。

【172】同上，第 22 頁。
【173】同上，第 23 頁。
【174】同上，第 22 頁。
【175】同上，第 10 頁。
【176】同上，第 22 頁。
【177】大衛·克魯克和伊貝爾·克魯克：《楊儀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第 59 頁。
【178】《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8、13～14、45 頁。較早一點的更不明確的分析，見第 6 頁。
【179】同上，第 10 頁。
【180】同上，第 16、24、26、33、36、45 頁。積累與消費的確切關係至少可以用三種方法計算。見福建省經濟計劃委員會農業辦公室：《人民公社積累和消費的計算方法初探》，載《計劃與統計》第 5 期（1959 年 3 月）。其譯文載《中國大陸雜誌選》173 號，第 44～45 頁，其中引證的一個例子，也許是福建公社中的典型，根據這一計算方法，其消費在 51.65%～72.61% 之間變動。福建的分析和毛提到的河南數字的統計方法之間的主要區別是，毛顯然沒有把福利消費計算在消費之內。
【18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35 頁。
【182】同上，第 30、35、45 頁。
【183】同上，第 24、31 頁。在這時，毛對綜合平衡的強調，見柳隨年：《搞好國民經濟綜合平衡需要研究的一些問題》，載《新華月報》(文摘版)1980 年 5 號，第 16 頁。
【18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0 頁。
【185】同上，第 24 頁。
【186】同上，第 36 頁。
【187】同上，第 39 頁。
【188】同上，第 40 頁。毛對安徽政策的總結是簡略的，但意思似乎是清楚的。
【189】同上，第 39～40 頁。
【190】同上，第 39 頁。也見他早些時候對河南省委幹部們的講話，同上，第 114～115 頁。
【191】趙紫陽：《共產黨人的高尚品德》，載 1979 年 3 月 23 日《人民日報》，轉載於《新華月報》1979 年 4 號，第 56～57 頁。趙繼續列舉了陶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看起來他跳過了 1959-1961 年發生的一些事件，因為這些措施直到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之後才被採納。那時陶鑄講話的原文（見《新華半月刊》1959 年 13 號，第 1～6 頁）包括承認廣東省委的錯誤，但沒有自我批評，沒有承認頭腦發熱，也沒有提反對隱藏糧食的錯誤。也許最值得注意的是，陶鑄在文章的某一段間接地針對瞞產問題指出，主觀和偏見能衝擊壓倒現場調查的結論（同上，第 5～6 頁）。
【192】毛澤東：《對蘇聯經濟學的評論》，第 123 頁。
【193】這篇文章還被收入陶鑄本人的文章選集，書名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1962 年第一次出版)。
【194】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載《中國建設》(增刊)，1967 年 11 月，第 17～18 頁。
【195】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建議和非議》，第 84～85 頁。
【196】我引用的譯文出自雷格：《四書》，第 588 頁。有趣的是，姚文元沒有試圖暗示，陶的引文是想吸引他的讀者去注意前面那句話：「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197】《新華月報》，1979 年 4 號，第 57～58 頁。
【198】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第 17 頁。
【199】同上。
【200】這個暗示見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85 頁。
【201】見本書本卷第 10 章。

【202】《紅旗》從 1958 年第 1 期到 1965 年底，即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在省級高級官員中，只有上海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柯慶施與陶鑄相等，有發表過 5 篇文章的記錄（山西的陶魯笳發表 4 篇；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湖北的王任重各有 3 篇）。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1959 年陶鑄有 6 篇文章或講話被《新華半月刊》轉載，與之相比，曾希聖是 5 篇，柯慶施和內蒙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夫各有 4 篇。而且，沒有幾個省委第一書記能像陶鑄那樣吸引黨的一批高級領導人參加1959年2月召開的廣東省的黨代會，諸如：國家副主席朱德元帥、政治局常委林彪、中央委員葉劍英元帥、農墾部部長王震及中央候補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等人（1959 年 3 月 1 日《南方日報》）。也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7 號，第 17 頁，關於黨的高級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廣東之行。

【203】見本書第 1 卷，特別是第 3 編和第 4 編。

【204】姚文元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中指出，在陶鑄的文章發表不久，彭德懷就在廬山發動了批判，但姚沒有試圖說明進一步的關係。

第九章 劉主席

【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45 頁。

【2】同上，第 104 ～ 106 頁；《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64 ～ 165 頁，在這裏「觀潮派」和「算賬派」被譯做「觀看者」和「算賬者」。

【3】《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65 頁。

【4】同上，第 168 ～ 169 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08 ～ 109 頁；《彭德懷自述》，第 299 ～ 300 頁。

【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35 頁。

【6】同上，第 106 ～ 107 頁；《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66 ～ 167 頁。

【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50 頁。

【8】同上，第 263 頁；也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7 ～ 18、406 ～ 407 頁。

【9】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35 頁。

【10】《北京週報》，1958 年第 18 期，第 13 頁。

【11】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11 頁。

【12】同上，第 13 頁。

【13】陳雲：《當前基本建設工作中的幾個重大問題》，載《紅旗》1959 年第 5 期，第 1 ～ 16 頁，收入《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70 ～ 92 頁。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166 號，第 1 ～ 15 頁，其摘要載《北京週報》1959 年第 10 期，第 6 ～ 8 頁。

【14】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78 ～ 79 頁。

【15】《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70 ～ 73 頁。

【16】同上，第 74 ～ 76 頁；本書第 1 卷，第 63 ～ 66 頁。

【17】《北京週報》，1958 年第 6 期，第 9 ～ 11 頁。

【18】《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第 77 ～ 89 頁。

【19】同上，第 94 頁。有關毛在延安採用這一口號的情況，見康普頓：《毛的中國》，第 65 頁，有關陳那時對此做的重要附加說明，見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104 頁。這個詞今天在中國已經十分常見。

【20】有關陳雲的原文，見《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84 頁；有關毛澤東的原文，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 294 頁；有關同一來源的正式中譯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25 頁。這一概念來自《反杜林論》，而且整段話的意思就像是對大躍進的理論作肯定的評價：「黑格爾第一個正確地敘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必然只是在它沒有被瞭解的時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

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這無論對外部自然界的規律，或對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的規律來說，都是一樣的。這兩類規律，我們最多只能在觀念中而不能在現實中把它們互相分開。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於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那種能力。……因此，自由是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摘自《馬克思主義手冊》的譯文，第 255 頁）

【21】《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93 頁。
【22】《北京週報》1959 年第 35 期，第 14 頁。
【23】《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93～94 頁。有意義的是，陳的數字只代表已宣佈和計劃產量的百分比中的一小部分，若按此百分比計算，豬肉的產量在 1958 年是 1.8 億斤，而 1959 年則應是 2.8 億斤。（見《北京週報》1959 年第 17 期，第 18 頁）。
【24】《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94 頁。
【25】同上，第 94～95 頁。
【26】見本卷第 10 章。
【2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244 頁。
【28】《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85～486 頁。
【29】《人民手冊》（1959 年），第 45 頁。
【30】見周恩來的講話（《當代背景》559 號，第 7 頁）及李富春的講話（《當代背景》562 號，第 10 頁）。
【31】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37 頁。
【32】《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97、102 頁。
【33】同上，第 97 頁。
【34】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116 頁。
【35】同上，《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98 頁。陳雲就此問題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劉少奇出席了會議；從信的內容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毛沒有參加。。
【36】見本書本卷第 2 章。
【37】《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98 頁。
【38】同上，第 97～98 頁。
【39】同上，第 99 頁。
【40】同上，第 100、102、106 頁。
【41】同上，第 101 頁。
【42】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83～84 頁。
【43】《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104、106 頁。在大躍進期間，毛可能忽視了陳雲，陳雲權威的下降是可以想像的，即使在他專門負責的商業領域裏也不例外。見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107 頁。
【44】肯尼斯·利伯瑟曾提示我說：可能只有這封信的確是交到毛那裏了，而且看起來陳在他的信中是不會缺少有力的證據的，不然就會冒被駁回的風險。而主席是否看了這封信，則是另外一回事。
【45】《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106～107 頁。
【4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244 頁。毛在 6 月份提出的議案進一步證實，5 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此議案未被通過。
【47】《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1979 年），第 19 頁。
【48】見本書本卷第 10 章。
【49】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116 頁。
【50】《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97 頁。
【51】《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70 頁。
【52】同上，第 170～171 頁。
【53】同上，第 171 頁。

【54】 同上，第 172 頁。
【55】 安炳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 45 頁。
【56】 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54～55 頁。
【57】 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35～138 頁；《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廣東，1981 年），第 2 卷，第 351 頁；《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2 卷，第 242 頁。
【58】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51～53、第 58～62 頁；《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75～181 頁。比較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的講話和會議後連續發表的 16 篇文章，可以看出前者是後者的基調；上海全體會議，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提出的「三三制」；《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第 2 卷，第 351 頁。
【59】 鄧小平在 1958 年冬天認為，西藏暴亂是三種可能性之中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受到批評。見《省直紅旗》1968 年 1 月，第 4 頁。亦見《西藏的叛亂是怎樣發生的》，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86 號，第 6～12 頁。
【60】 關於這個論題有一篇值得重視的文章，見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界》；約瑟夫·弗萊徹：《19 世紀亞洲的大清國》及《全盛期的大清國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制度》，載《中國近代史》第 10 卷，「清朝末期（1800-1911 年）」第一部分，第 35～106、351～408 頁。關於西藏的叛亂，見帕特森：《叛亂中的西藏》，莫拉斯：《西藏叛亂》；洪德興：《西藏，1950-1967 年》；金斯伯格及馬瑟斯：《共產黨中國和西藏》。有關中國共產黨對全國少數民族的政策總的考察，見德雷爾：《中國的四千萬少數民族》。
【61】 毛在此時退居二線的消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證實的，見《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4 頁。
【62】 更全面的討論見本書第 1 卷第 105～107、152～156 頁。
【63】 同上，第 154～155 頁。
【64】 同上，第 155 頁。
【65】 《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72 頁。
【66】 同上，第 277 頁。
【67】 同上，第 227、272～273 頁。
【68】 同上，第 227 頁。
【69】 同上，第 40 頁。
【70】 同上，第 228 頁。資料中沒有直接說明他通宵達旦工作與八大會議相關，但接下來的證據顯示很有可能是那個時候。
【71】 同上，第 277 頁。
【72】 同上，第 175、228 頁。
【73】 同上，第 273 頁。
【74】 厄尼斯特·杰·西蒙斯：《有組織的作家（1934-1946 年）》；海渥德與壘伯茲：《蘇聯的文學與革命，1917-1962 年》第 85 頁。
【75】 《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12 頁。
【77】 當然，這段描述最初是指羅伯斯庇爾。
【77】 很顯然，劉的親眷及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組成了劉的支部。
【78】 《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31、276 頁。
【79】 同上，第 231～232 頁。《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78 頁。關於禮品問題，據說劉只有兩次超出了慣例，見《當代背景》834 號，第 21 頁。
【80】 《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11～213 頁。
【81】 同上，第 204～206、263～364 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傳說，劉在土改時曾向他的地主成分的家庭成員透露過土地改革的計劃，但看起來更像是他的家庭成員問他一些有關土改的問題，他並沒有讓他的家庭成員逃避土改運動。見《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劉少奇罪行錄》，譯文登在《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23～30 頁。劉的大家族中只有一個成員曾贊成他參加革命，見劉愛琴：《女兒的懷念》，第 17 頁。

【82】《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33、264 ～ 265 頁；《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81 頁。
【83】《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65 頁。
【84】同上，第 269 頁；劉愛琴：《女兒的懷念》，第 52 頁。
【85】劉愛琴：《女兒的懷念》，第 58 頁。
【86】《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69 頁。
【87】劉愛琴：《女兒的懷念》書中處處可見，但尤以第 63 ～ 72 頁最多。
【88】《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80 頁。根據此書記載，劉的慢性胃病史可追溯到他在安源的年代。
【89】同上，第 381 頁。
【90】《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65 頁。
【91】同上，第 209 ～ 210、230、274 ～ 275 頁；《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79 頁。
【92】《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26、254 ～ 256、270 ～ 272 頁。
【93】元帥之間的那種親密情誼，見本書本卷第 10 卷；同國務院幹部之間的友誼，見本書本卷第 12 章。
【94】《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2 頁；也見《美國對外關係，1949 年》，第 8 卷，第 359 頁。
【95】《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32 頁。
【96】《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詩文選》，第 21 頁。羅是在打倒「四人幫」以後、為劉少奇恢復名譽以前發表這篇文章的。
【97】《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32 頁；《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12 頁。
【98】《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74 ～ 175、242 ～ 243、277 頁；《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73 頁。但劉肯定地表示，他決沒有干擾過毛！
【99】《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81 頁。
【100】關於劉提出黨員是黨的「工具」的理論，見同上，第 171 頁及《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73 號，第 16 頁。有關劉具有自我批評精神，見安子文：《把我們的黨建設好——紀念劉少奇同志》，載 1980 年 5 月 8 日《人民日報》，及李維漢：《劉少奇同志對統一戰線工作的指導》，載 1980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報》。劉與毛、周的進一步比較，見本書第 1 卷，第 3 ～ 9 頁。
【101】李伯釗：《卓絕的貢獻，學習的模範》，載 1980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報》。劉似乎在毛之前也指示過要人們研究中國的醫藥學，見《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57 頁。此外，劉無論在什麼地方，在所有重大問題上，都盡可能地向毛請示，同上，第 121 ～ 122 頁。
【102】1967 年 5 月 13 日《新聞戰線》，第 4 頁，合訂本 1；也見《新聞戰線上大的政治鬥爭》，同上，1967 年 6 月 30 日，其譯文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3 號，第 32 頁。有關周恩來的文章，見 1967 年 9 月 13 日《各地通訊》第 4 期，第 1 頁。其譯文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81 號，第 2 頁。有關從照片變化看中國政治情況方面的重要性，見麥克法夸爾：《論照片》。
【103】小冊子《新時代的狂熱》，譯文登在《中國大陸雜誌選》603 號，第 30 頁。
【104】實際上，任何 35 歲以上的人都是有資格的。《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3 頁；《朱德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 13 頁。
【105】王酊：《彭德懷問題選輯》，第 394 頁。
【106】《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37 頁。
【107】《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81 頁。
【108】《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37 頁；王酊：《彭德懷問題選輯》，第 394 頁。
【109】本書第 1 卷，第 100 ～ 102、147 ～ 148 頁。
【110】王酊：《彭德懷問題選輯》，第 394 頁。
【111】見劉瀾濤的文章。劉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在文章中，他宣稱「右傾機會主義者」（如：彭德懷和他的同夥）對於個人的作用和集體領導之間的協調關係一點都不懂；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03 頁。但不只是彭德懷一個人感覺到，劉的擢升是不能解決保證集體領導的問題的，見來自另一

位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的評論文章;《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摘編》,第 2 頁。

【112】本書第 1 卷,第 100、136 ~ 138 頁。

【113】同上,第 334 ~ 335 頁,第三章注 59。對高崗專案更精闢的討論,見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第 166 ~ 210 頁。

【114】《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41 頁。

【115】賀龍在 1959 年參觀紀念南昌起義(此事件後來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日)的展覽時,所說的話可能代表了大多數解放軍元帥和將軍們的特有態度。賀說,八一起義我在政治上依靠黨,而黨依靠我的軍隊。(《文革風雲》1967 年第 8 期,第 34 頁)。據說賀龍早先說過,1954 年廢除舊的軍區制度,是因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害怕解放軍造反。《中國大陸雜誌選》27 號,第 29 頁。

【116】《各地通訊》第 4 期,第 1 頁,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81 號,第 2 頁;也見 1967 年 4 月 18 日《井岡山》,其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46 號,第 2 頁。有關劉少奇對彭有些生氣的反應,見穆迪:《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政策》,第 142 頁。

【117】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第 412 頁。

【118】分析這一事件有關的問題之一是,提供證據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報,這些小報的目的是要證明劉少奇同彭德懷之間的勾結,而不是他們的衝突。周恩來在此問題上迴避,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46 號,第 2 頁。

【119】見本書本卷第 51 ~ 55 頁。

【120】引自小冊子《新時代的狂熱》,譯文在《中國大陸雜誌選》602 號,第 10 頁。

【121】見《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證選輯》中舉例,譯文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651 號,第 32 ~ 36 頁。

【122】見《看劉少奇醜惡嘴臉!》一文中的舉例,載 1967 年 1 月《井岡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62 號,第 7 頁。《打倒最大的叛徒集團頭子——劉少奇》,載 1867 年 3 月 8 日《紅旗》,第 5 頁。《徹底粉碎劉少奇的叛徒集團》,載 1967 年 3 月 13 日《春雷》,譯文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51 號,第 1 ~ 6 頁。

【123】例如在穆迪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政策》第 26 頁中,提到的彭真「集團」。有關彭真同劉的親密關係,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51 號,第 38 頁。

【124】《資料選編》,第 232 頁。1959 年夏天,毛訪問韶山期間,再次強調教育革命的重要性,但也表示贊成學生要服從老師,見《韶山紅日照千秋》,第 263 頁。

【125】《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1978 年),第 404 ~ 405 頁。這一事件估計是發生在周 12 月 7 日返回北京以後。(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26 頁)

【126】《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言論摘編》(北京:首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聯絡委員會,1967 年 5 月),第 17 頁,第 75 ~ 76 條。也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18 號,第 15 ~ 16 頁。

【127】《新華月報》1980 年 8 號,第 144 ~ 145 頁。在 1959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向教育家們說,要在 1958 年已取得的成績基礎上,對教育工作進行調整。以鞏固和提高教育工作的水平,見《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1978),第 349 頁。

【128】周恩來:《關於文藝工作的三次講話》,第 1 ~ 5 頁。

【129】《科技革命》1967 年 8 月,第 2 期,第 20 ~ 23 頁。

【130】《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39 號,第 12 頁。

【131】1967 年 7 月 21 日《遼聯戰報》,第 3 頁,合訂本 1;1967 年 5 月 25 日《摧舊戰報》,第 2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639 號,第 6 頁;也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19 號,第 59、75 頁。1959 年 1 月份,一位資歷較深的統戰官員徐冰,曾宣佈「五不變」政策,以使商人和知識分子放心。這五不變是:定息、高薪、學銜、政治安排、教育改造(見《新華月報》1980 年第 4 期,第 52 ~ 53 頁)。

【132】《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集)，(北京：北京化工學院「毛澤東思想宣傳員」，1967 年 4 月 10 日)，第 62～63 頁。

附錄一：正名：人民公社名稱的混亂

【1】 韋利：《孔子的論語》，第 171 頁。
【2】 同上，第 21～22 頁；顧立雅：《孔夫子其人其事》，第 240 頁。
【3】 賴肖爾和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第 70 頁。
【4】 參見本書本卷第 214 頁。
【5】 隨後的大部分討論基於夏的富有啟發的分析，參見《從術語和語義的變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卻》，第 29～35 頁。但是，當夏寫作的時候，手頭沒有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可惜他生前沒能讀到其中語義混亂的進一步證據。
【6】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455～456 頁；《人民手冊》(1959 年)，第 33 頁。
【7】 夏：《從術語和語義的變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卻》，第 36 頁。
【8】 《人民手冊》(1959 年)，第 43 頁。
【9】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501 頁。
【10】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9 頁。
【11】 同上，第 13 頁；在第 10 頁，同樣提到四級，儘管「小」已明顯地在無意中被取消。
【12】 參見大衛·克魯克和伊莎貝爾·克魯克：《楊儀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第 39～40、196、227 頁。
【13】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40、47 頁。
【14】【15】 同上，第 18、107 頁。
【16】 沃克：《中國農業規劃》，第 18～19 頁；達特：《中國的農村人民公社》，第 35 頁。
【17】 夏：《從術語和語義的變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卻》，第 37～38 頁。
【18】 同上。由於他意識到有沒有修飾「生產隊」的形容詞關係重要，夏認為，在廬山會議上，在「生產隊」前沒有使用限定形容詞，這表明當時就出現了公社地位的衰落，而根據我們手頭的材料，那個衰落在鄭州開始。
【19】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500 頁；《人民手冊》(1959 年)，第 43 頁；夏：《從術語和語義的變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卻》，第 36 頁。
【20】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第 500 頁。
【21】 夏：《從術語和語義的變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卻》，第 37～38 頁。
【22】 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15、22、23、29、32 頁。

第三編 搏鬥

第十章 廬山的激烈交鋒

【1】 《韶山紅日照千秋》，第 241 頁。關於毛澤東到達時間的報道有許多差異，這本身並不重要。但是，它反映了官方機構對於這個節日細節紀錄的粗枝大葉。一些衛兵和安排毛在湖南各種參觀活動的接待人員在一篇文章中說，到達時間是下午 5 點 44 分。但是，在採訪毛澤東故鄉韶山紀念館全體人員的報道中，毛到達的時間是下午 4 點，見《毛澤東同志八十五誕辰紀念文選》第 266 頁。後一篇報道文章準備在《韶山紅日照千秋》上發表的時候，編輯一定注意到了這個差誤，就把時間改成「5 點以後」(第 266 頁)。還有一篇文章，把到達時間更富有詩意地說成是黃昏，見《難忘的記憶》第 5 頁。所有關於訪問的報道都帶有敬意，這可能是所要表達的正常感情。

【2】 在長沙，毛澤東在湖南省游泳隊員的陪同下游湘江（《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46、264～265頁），並且視察了一個學校（同上，第261～263頁）。這本書還包括了關於毛的汽車司機對訪問的簡要印象的記載（第287～289頁）。
【3】 《難忘的記憶》，第5頁。對羅瑞卿的回憶指出，他作為公安部部長，把保證毛的安全當作自己的職責，參見《深切懷念羅瑞卿同志》第205頁。羅瑞卿曾對他與毛的關係有足夠的信心，以致他在公安學院對學生說，他們能夠懷疑任何人講的話，甚至毛澤東的話也不例外。參見《羅瑞卿罪該萬死》，載《井岡山》和《廣東文藝戰報》1967年9月5日，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46號，第2頁。
【4】 《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42頁。關於這樣一次重要的訪問，不尋常的是，沒有出現毛澤東當時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的報道，儘管1958年12月周曾陪同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在湖南視察（參見《橫刀立馬彭將軍》）。周可能和毛在一起，但是，當《韶山紅日照千秋》1978年出版的時候，周是否平反還不像羅瑞卿的那樣有保證。如果周由於有正當的但又難於解釋的理由不能陪同毛，那麼，在毛的陪同人員中有湖北第一書記王任重就容易理解了，參見《逮捕政治扒手王任重》，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9號，第1～2頁。
【5】 當時，周立波的報告文學沒有公開發表，估計是因為此後不久毛澤東和彭德懷在現場估計湖南實際情況時的對立觀點，給主席重返韶山老家之行帶來緊張而不是歡樂的氣氛，當周立波的報告文學在1966年最後公開發表的時候，他已開始陷入困境，一方面是因為他提到了毛的第一位夫人楊開慧，從而冒犯了當時的夫人江青，另一方面無疑是因為羅瑞卿當時也受到清洗。見《難忘的記憶》第1～4頁。
【6】 《難忘的記憶》，第5頁。
【7】 《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41頁。毛的汽車司機表示，在同一個晚上，毛還參觀了一個學校（同上，第287頁）。但這個回憶與另一些報道的矛盾在於，那些報道沒有提及25號晚上毛做了什麼事。
【8】 同上，第247頁。
【9】同上，第244～245頁。
【10】 同上，第242頁。
【11】 《我們在毛主席身邊》，第200～201頁。
【12】 《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42頁。這五種作風是：共產作風；自以為是的作風；盲目作風；命令主義和特權作風（同上）。
【13】 見《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第141頁。
【14】 根據周立波的記事（《難忘的記憶》，第6頁），毛的母親和父親死於同一年，分別是53歲和49歲。但另一篇有關這次回鄉的報道卻說他們享年52歲和50歲（《毛澤東同志八十五誕辰紀念文選》，第265頁）。
【15】 關於劉少奇，參見《懷念劉少奇同志》，第343、358頁。關於周恩來，參見《我們永遠懷念周恩來總理》，第20、164～165頁；《周總理的故事》，第138頁。關於彭德懷，參見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49頁。1956年的黨章取消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並未對群眾中對毛的迷信產生多大影響。
【16】 《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70頁；《難忘的記憶》，第10～11頁。
【17】 《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70～271頁。關於這一次理應細心報道的訪問中，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差異是，周立波說在吃中飯以前，毛參觀了水庫，見《難忘的記憶》，第11頁。
【18】 這似乎曾經是毛的路線，見《難忘的記憶》，第11頁。
【19】 同上；《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72～273頁。
【20】 《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43頁。
【21】 同上，第274～275頁。
【22】 同上，第243頁。
【23】 《回到韶山》，根據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第350頁。這次參觀訪問以後，鑒於毛離開韶山後取得的巨大成就，王任重還寫了一首詩暗示他不贊成在訪問

中的傷感氣氛，參見《逮捕政治扒手王任重》，載《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9號，第2頁。

【24】《難忘的記憶》，第9～10頁。雖然，毛去看雙親的墓，最有可能的時間似乎是6月27日晨，但也可能是26日，因為這個資料表明，他從墓邊到了學校。但是，周立波還說毛在韶山呆了兩天而不是一個晚上(同上，第11頁)，這可能就是他的報道引起混亂的原因。另外兩篇較為詳細、不那麼隨意的報道一致認為，6月25日和26日，毛在韶山(《韶山紅山照千秋》，第242～243、275頁)。但由於毛的汽車司機斷言毛在6月28日才離開韶山，帶來了新的混亂(同上，第288頁)! 在這樣主要的事件上人們又一次被報道中的矛盾弄得莫名其妙。毛澤東拜謁父母墳地的日期是複雜的，因為關於毛回韶山的兩篇最好的資料之一沒有提到這件事，另一篇也只籠統含糊地提了一下(同上，第273頁)。

【25】《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73～274頁；《難忘的記憶》，第11頁。

【26】《韶山紅日照千秋》，第243～244、288頁。

【27】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第351頁。

【28】羅斯·門羅：《廬山：中國詩人和政治家的平靜撤退》，載《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國際版週刊1977年8月1日。

【29】李鋭：《懷念田家英》，載《新華月報》(文摘版)1980年4號，第172～173頁。田是毛多年的主要私人秘書；李鋭曾撰寫關於毛早年生活的書(《毛澤東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動》)，是田的助手之一。

【30】《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年)第1卷，第182頁。

【31】同上，第184頁。

【32】參見本書第1卷，第86～91頁。

【33】《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年)第1卷，第182～183頁。

【33】同上，第183頁。

【35】1967年2月15日《財貿紅旗》，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77號，第9頁。

【36】李鋭:《懷念田家英》，載《新華月報》(文摘版)1980年4號，第172～173頁。

【37】《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年)第1卷，第182頁。

【38】參見李富春80誕辰的紀念文章：《李富春同志對經濟計劃工作的巨大貢獻》，載1980年5月22日《人民日報》。

【39】參見本書第1卷，第146～148頁。其中提到了毛的大兒子毛岸英在朝鮮戰爭中犧牲的情況。更詳細的報道，見秦成林(音譯)：《毛岸英》，第148～157頁。其中披露，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犧牲後，沒人敢告訴主席，直到兩個月後彭德懷回國向他匯報戰況時才提到這件事。據報，彭當時說：「我們沒有照顧好他。」(第156頁)但是，自然沒有提到毛是否為這件事責備了彭。關於毛的第一位夫人楊開慧所生的3個兒子的悲慘命運，參見《難忘的記憶》，第124頁。關於20年代和30年代毛和彭之間存在的問題的討論，參見約翰·E·魯:《處在反對派地位的毛澤東，1927-1935年》，第115、205頁；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的崛起》，第173～174、176頁。

【40】這是彭30年代的副手之一龔楚的看法，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年》，第1頁。關於在朝鮮戰爭的艱苦時期彭體格的健壯，參見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14～15頁。

【41】《横馬立馬彭將軍》，第20～21、53～54、69頁以下。

【42】參見彭的自傳片斷，載《新華月報》(文摘版)1980年3號，第72頁；另見《横刀立馬彭將軍》，第6頁。

【43】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年》，第728頁。

【44】關於龔楚對於彭德懷軍事才能的評價，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年》，第2頁。中國的共產黨人通常把劉伯承元帥看作最偉大的戰略家，把林彪元帥看作最偉大的戰術家。關於彭不畏炮火的例子，見《横刀立馬彭將軍》，第13～14頁。毛寫給彭的詩，見同上，第13頁。根據這篇文章，彭把「唯我彭大

將軍」改成了「唯我英勇紅軍」。關於這首詩的大概日期，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3 頁。關於毛對彭軍事才能的讚揚和批評，參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2 卷，第 341、345 頁。

【45】 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49 ～ 51 頁。

【46】《橫刀立馬彭將軍》，第 19 頁。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月，從長時間的昏迷中清醒的時候，他又一次顯示了他罵人的習慣。見陳雲浩：《彭總的臨終遺言》，載《新華文摘》1981 年 1 號，第 169 頁。

【47】《橫刀立馬彭將軍》，第 17 ～ 18 頁。

【48】《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81 頁。

【49】《橫刀立馬彭將軍》，第 148 頁。這是一個奇怪的報道 (第 148 ～ 152 頁)，要知道該書出版於 1979 年 12 月。沒有跡象表明，(到那時為止，) 彭對於看到的東西，心中產生了不安情緒。這是他的警衛員在回憶中提出來的。

【50】 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69 頁。

【51】 同上，第 69 ～ 70 頁。

【52】 同上，第 70 ～ 71 頁。

【53】 同上，第 71 頁。

【54】《彭德懷自述》，第 265 頁。彭德懷表示，他只參加了兩次鄭州會議中的一次。由於他談論那次會議的召開是在談論武昌中央會議和中央全會之前，因此，我估計他參加的是第一次鄭州會議；當時，的確開始批評「共產風」。彭只出席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最後一天 (11 月 10 日) 的會，可能因為他在甘肅出差。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囚禁狀態下的一份交待中，彭說：「在去鄭州的火車上，我們開了一個反對『共產風』的會」(《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20 頁)，這就是說，在甘肅之行的基礎上，元帥曾召開了一個他的全體隨員參加的會議。這個情況可能屬實，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篡改了彭的交待，他原來說的是在從鄭州出來的火車上由毛澤東召集了會議。

根據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4 年》(第 125 ～ 126 頁)，武昌中央會議和中央全會從 1958 年 11 月 21 日到 12 月 10 日召開，而 11 月 21-24 日和 12 月 1-6 日，彭在北京。另請參見《彭大將軍回故鄉》，載《新華月報》(文摘版) 1979 年 4 號，第 144 頁。(「彭大將軍」的稱呼出自毛澤東讚揚彭德懷的那首詩。)

【55】《彭大將軍回故鄉》，見《新華月報》(文摘版) 1979 年 4 號，第 144 頁。

【56】 同上；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72 頁。

【57】《新華月報》(文摘版) 1979 年 4 號，第 245 頁。

【58】 同上。

【59】 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72 頁。

【60】 同上，第 73 頁。

【61】 同上，第 72 頁。

【62】《新華月報》(文摘版) 1979 年 4 號，第 145 頁。

【63】 同上。

【64】 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73 頁。

【65】《新華月報》(文摘版) 1979 年 4 號，第 145 頁。

【66】 同上，第 144 頁。

【67】 同上，第 145 頁。

【68】 同上，第 144 頁。

【69】 同上。在兩篇關於彭訪問敬老院的報道中，沒有大的矛盾，但語氣十分有趣地不同。彭的警衛員把農民描繪為信任而迷惑的樣子；《中國青年》的記者 (他的報道在《新華月報》(文摘版) 1979 年 4 號上轉載) 則把他們的表情描述為憤怒而坦率。

【70】《新華月報》(文摘版) 1979 年 4 號，第 145 頁。

【71】 同上，第 146 頁。

【72】 同上，第 145 頁。

【73】 同上，第146頁。
【74】 同上；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74頁。
【75】 《新華月報》(文摘版)1979年4號，第145頁；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73、74頁。
【76】 《新華月報》(文摘版)1979年4號，第146頁。
【77】 《彭德懷案件，1959-1968年》，第120頁。在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人們看到彭在北京許多正式場合出現，這些活動即便不能使他完全不到會，他也只能參加幾天的會議。
【78】 《彭德懷案件，1959-1968年》，第266～267頁；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75頁；《彭德懷案件，1959-1968年》，第38頁。彭企圖勸總參謀長黃克誠代他出席會議，但沒有成功。
【79】 參見《1959年匪區自然災害情況調查》，第7～8頁。
【80】 同上，第9～14頁。關於官方對廣東水災的報道，包括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對水災的估計，參見1959年6月21日、23日、25日和27日以及7月1日《人民日報》。關於陶鑄當時糟糕的身體狀況，參見趙紫陽：《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品質》，載《新華月報》(文摘版)1979年4號，第58頁。
【81】 參見例如1959年6月12日和27日《人民日報》的有關報道。
【82】 同上，1959年7月7日社論。
【83】 《1959年匪區自然災害情況調查》，第4～7頁。
【84】 當60年代一些秘密的軍事刊物流傳到西方時，這個情況才被透露出來。參見陳吉士：《中國紅軍的政治鬥爭》，第15～19、209、213頁。
【85】 《彭德懷自述》，第266～267頁；《彭德懷案件，1959-1968年》，第37頁。
【86】 參見沃克：《中國的飢餓》，第19、33頁。
【87】 同上，第28、41頁。這些數字非常低，幾乎是不可相信的。也許寫信的人誇大了他們遭受的困苦，以便獲得同情。
【88】 同上，第26、39頁。一位城市居民來信談到每月定量為12斤，同上，第21頁。
【90】 同上，第26、28、29頁。
【91】 廬山會議的重要性，在於發動人們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並作深入的分析。參見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第9章；喬菲：《兩次全會之間：中國領導層的內部鬥爭，1952-1962年》，第8～22頁；張旭成：《中國的政權和政策》，第110～119頁；安炳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38～44頁；穆迪：《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政策》，第139～146頁。
【92】 《彭德懷案件，1959-1968年》，第4頁。
【93】 同上，第2頁。這句話似乎是對本書本卷第197頁所引對敬老院居民情況的追述的呼應，對彭德懷警衛員回憶的準確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94】 同上，第394頁。
【95】 同上，第2、3、4頁。
【96】 同上，第1、2、3、5頁。
【97】 同上，第2頁。
【98】 同上，第2～3頁。
【99】 同上，第1頁。毛比彭德懷更多地視察了全國的鄉村，這一點值得注意。主席也許認為元帥的評論是以一種表面膚淺的瞭解作基礎的。但話又說回來，鄉村裏沒人在同毛談話時能像跟其他任何領導人談話那樣直言不諱。參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和中國知識分子》一書第108頁所引一位中國人的話。那位中國人認為毛進行的實地調查是沒有用處的。
【100】《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44～45頁。
【101】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75～76頁。
【102】《彭德懷案件，1959-1968年》，第36頁；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267～268頁。

【103】張聞天曾經翻譯過英國人、俄國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寫的著作。他早年是郭沫若的朋友，郭沫若是 1949 年以後中國文化界的泰斗。參見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第 61 ～ 67 頁。

【104】這一概述的許多資料出自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和《懷念張聞天同志》，第 32 ～ 34、104 ～ 106 頁，但許多解釋是我自己作出的。我在本書第 1 卷第 140 頁裏指出，毛在遵義會議上得到了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但這後一則資料表明，他的地位沒有那麼早就正式確定。

【105】《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420 頁；《懷念張聞天同志》，第 106 ～ 108 頁。泰偉斯指出，在「華沙條約」準備締結的過程中，彭、張兩人曾合作過（《中國政治及清洗》，第 389 頁）。

【106】張於 4 月 23 日飛往莫斯科（《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01 號，第 43 頁）。彭於 4 月 24 日飛抵莫斯科（《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02 號，第 35 頁）。兩人在 4 月 24 日晚繼續飛向華沙（《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02 號，第 35 頁;2004 號，第 40 頁），我認為他們一定是乘坐同一架飛機。中國駐波蘭大使 4 月 27 日為彭德懷率領的軍事代表團設宴，彭是宴會的上賓。出席宴會的還有作為觀察員參加華沙條約國外交部部長會議的中國代表張聞天也在場（《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04 號，第 39 頁）。第二天晚上，彭作為客人參加波蘭為華沙條約外交部部長舉行的宴會（《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05 號，第 48 頁）。但是，兩人不可能有許多其他機會在波蘭首都見面，因為彭 4 月 25 日至 27 日訪問了什切青、格丁尼亞和格但斯克，又於 4 月 29 日上午離開波蘭去東德訪問（《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05 號，第 42 頁）。

【107】《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420 頁。

【108】張聞天與留蘇集團中地位最高者王明的最後分裂，據毛澤東說，似乎是在七大上。但在廬山會議上，這位主席指責張在七大時沒有真正地轉變立場。參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62 頁，毛在這裏用張以前一度使用的別名洛甫稱呼他。

【109】《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36 頁。在往後幾年裏，彭承認自己的記憶力衰退，對他與張聞天的關係作了更溫和、更慎重的敘述，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268 ～ 269 頁。

【110】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75 頁。

【111】參見《吳晗和〈海瑞罷官〉》，第 2、137 頁。豪瓦德·J·威克斯勒用「不屈的道德家和無畏的諫諍者」來形容魏征（參見《劍橋中國史》第 3 卷第 3 部分，第 197 頁），這個形容也非常適用於海瑞。上海工作會議的準確日期尚不清楚，但現在聽說會議從 1959 年 3 月 25 日一直開到 4 月 4 日，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300 頁。

【112】《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76 頁。

【113】同上。關於岳飛的簡述，參見賀凱：《中華帝國的過去》，第 276 ～ 277 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死後，岳飛這一榜樣被用來反對毛。1980年9月11日，一位作者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明顯針對這位已故的主席。作者提出，殺害岳飛的真正兇手，是中國歷史學家一般痛罵的官吏（秦檜）的幕後人，也就是當時的皇帝趙構。「過去，我沒有認識到為什麼秦檜敢於以莫須有罪名殺害像岳飛這樣的高級將領。後來，我認識到，秦檜之所以能夠為所欲為，正是由於得到了趙構的支持。」換句話說，在林彪和「四人幫」背後，站著毛主席。岳飛可以代表任何文化大革命的犧牲者。但由於岳飛是一位將軍，也許這篇文章的作者想為之說話的人就是彭德懷，儘管「四人幫」與他的免職毫無關係。但不管作者指的是誰，他在文章的結尾給人們這樣一個清晰的提示——應該公開地講毛的責任：「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裏，不應當有什麼忌諱。我們必須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告訴學生和青年說，趙構和秦檜都是殺害岳飛的兇手。我們必須讓趙構跪在岳飛墓前。」（參見吳兆（音譯）:《我們應當也讓趙構跪下》，譯載於《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0—195》，第 9 ～ 10 頁。

【114】參見1967年6月8日《北京新文藝》，第2頁第1欄。關於周揚在上海推動學習海瑞活動的話，參見1967年5月24日《紅色批判者》第4頁第4欄。關於這個劇的3位作者，參見托馬斯·S·費捨爾：《〈好戲一曲〉：再論吳晗和海瑞》，第29～30頁（這篇論文，於1974年12月1日提交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的加利福尼亞地區研討班。關於周信芳的詳細介紹，參見香港聯合研究院編：《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1卷，第166～167頁。根據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說法，《海瑞上疏》的主要作者是徐叔文（音譯），參見《深入批判〈海瑞罷官〉和〈謝瑤環〉》，載1966年3月10日《戲曲報》，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528號，第49頁。費捨爾認為（見《〈好戲一曲〉：再論吳晗和海瑞》），第三位作者是陶雄（音譯），他是上海京劇院的負責人（見香港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2卷，第606頁）。

賀凱在追述歷史上海瑞上疏的情況時，是這樣記述的：「在一次朝賀明世宗（嘉靖，1521-1567年）的場合裏，海瑞來到皇宮門口，遞上一個指責嘉靖皇帝一些不良行為的奏折。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海瑞不得離去。太監對皇帝說，『不用擔心，陛下，他已經跟他家人訣過別了，隨身帶來了他的棺材，等在門口！』世宗聽後大吃一驚，寬恕了海瑞的犯上行為。」（《中華帝國的過去》，第306頁）。關於海瑞生平的完整敘述，參見傅路特、房兆楹：《明史人物傳記辭典》(1368-1644年）第1卷第474～479頁有關詞條。關於另一個有趣的敘述，參見黃仁安：《1587年：沒有功績的一年》中有關海瑞在湖安（音譯）的章節。

【115】托馬斯·S·費捨爾：《〈好戲一曲〉：再論吳晗和海瑞》，第28頁。

【116】《吳晗和〈海瑞罷官〉》，第2頁。

【117】對吳晗經歷的敘述，主要參考包華德：《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第3冊，第425～430頁吳晗傳記部分；另請參見普西：《吳晗：借古諷今》，第1～7頁。我用「locust tree」來代替「ash」，作為更正確的翻譯。

【118】關於統一戰線的解釋，參見萊曼·P·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共歷史上的統一戰線》；另參見本書第1卷第48～50頁。

【119】托馬斯S·費捨爾：《〈好戲一曲〉：再論吳晗和海瑞》，第9～10頁。根據包華德：《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第3冊第427頁的說法，吳晗在1949-1958年間似乎只發表過兩篇有新意的歷史文章。

【120】參見本書第1卷，第271～272、276、277～278頁。普西談到吳晗在反右運動期間的一篇講話時認為，這是「一篇我所見過的沒有吳晗影子的吳晗作品」(《吳晗：借古諷今》，第11頁）。關於吳晗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期，參見《吳晗和〈海瑞罷官〉》，第137頁。

【121】有關曹操事跡的簡述，參見賀凱：《中國歷史上的皇帝》，第132～134頁；關於女皇武則天，參見特威切特主編：《劍橋中國史》第3卷第1部分第5、6兩章。郭沫若率先對這幾位歷史人物作了重新評價。

【122】托馬斯·S·費捨爾：《〈好戲一曲〉：再論吳晗和海瑞》，第18～19頁。

【123】普西：《吳晗：借古諷今》，第15～17頁。

【124】引自施拉姆：《毛澤東的本色，談話和書信，1956-1971年》，第237頁。文化大革命中有代表性的一種說法，是強調彭德懷廬山上的行動與吳晗對海瑞的研究之間有陰險的配合，參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698號，第5頁。

【125】《吳晗和〈海瑞罷官〉》，第2、137頁。我不認為毛當時鼓勵人們做傚海瑞和魏征的情況是在毛死後編造的，以便對吳晗作死後的肯定。在文化大革命的資料《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彭真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中，可以得到毛在海瑞事件源起中所起作用的最切近的證據，這份資料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640號第5頁。據這個小冊子所載，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在1966年1月批判吳晗的高潮時，曾查閱他寫的筆記，並對一個同事說：「1959年舉行上海會議時，主席採取了肯定海瑞這個歷史人物的態度。」但是，這並不表明毛帶頭談論這個話題，小冊子編者的話暗示劉仁在說謊（他們可能相信情況就是這樣）。

【126】《吳晗和〈海瑞罷官〉》，第 2、137 頁。在上一條註釋中引證的文化大革命資料裏，還提到吳晗稱受到「領導同志」的鼓勵寫海瑞的情況（《中國大陸雜誌選》640 號，第 5 頁），但再次暗示劉仁所說的都是謊話。
【127】當吳晗此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彭真無論在首都政府中還是在黨的領導機關裏，都是他的上級。
【128】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33 ～ 35 頁。
【129】《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第 5 頁。關於毛的詩，參見黃曼（音譯）翻譯的《毛澤東詩詞》第 50 ～ 53 頁。關於總理仔細聽取毛的指示的其他情節，在對周的回憶書籍中，隨處可見，參見例如《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第 457 ～ 458 頁。
【130】施拉姆：《毛澤東》，第 48 頁。
【131】參見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第 359 ～ 360 頁。
【132】《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176 ～ 178 頁。
【133】普西：《吳晗：借古諷今》，第 9 頁。
【134】同上，第 15 ～ 16 頁。
【135】文化大革命中有這樣一種說法，即：彭德懷說，他不得不向海瑞學習。參見穆迪：《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政策》，第 143 頁。但胡喬木實際上沒有說過在廬山會議上提出海瑞名字的人是右傾機會主義者這樣的話。關於胡喬木的作用，參見 1967 年 6 月 8 日《北京新文藝》第 2 頁第 1 欄。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份資料指出，胡喬木負有鼓勵吳晗寫作海瑞作品的一系列責任。因此，胡可能就是那位神秘的「領導同志」。但是，那份資料並不令人信服，而且沒有準確地說明吳晗的兩個最重要的海瑞劇本之一的寫作時間（《當代背景》874 號，第 42 頁）。況且，如果說胡是那位被懷疑的「領導同志」，那麼，似乎無法解釋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用它更明確地攻擊胡的事實，也無法解釋文化大革命後的文章沒有承認這一情況的事實。關於吳晗文章的完成日期，參見吳晗：《燈下集》第 168 頁。關於吳晗的其他作品，參見費捨爾：《〈好戲一曲〉：再論吳晗和海瑞》第 19 ～ 20、25 ～ 26 頁。
【136】關於相反的觀點，參見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建議和非議》，第 33 ～ 34 頁。
【137】費捨爾認為，至少有 4 部關於海瑞的戲在吳晗的劇本寫出之前完成，見費捨爾：《〈好戲一曲〉：再論吳晗和海瑞》，第 29 ～ 30 頁。
【138】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75 頁；《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269 ～ 271 頁。
【139】《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4、120 頁。
【140】同上，第 36 ～ 37 頁。
【141】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76 頁。
【142】《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7 頁。
【143】同上。
【144】同上，第 8 ～ 9 頁。
【145】同上，第 121 頁。
【146】同上，第 9 頁。
【147】同上，第 121 頁。毛的評論證明，在這個方面，「克里姆林宮學」是分析中國政治的正當方法，參見本書第 1 卷「對書目和方法的說明」，以及麥克法夸爾：《論照片》。有關彭德懷的否認和他的意見書的最新文本，參見《彭德懷案件，1958-1969 年》，第 268、283 頁。
【148】《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9 ～ 10 頁。
【149】同上，第 10 頁。
【150】參見：《吳冷西的交代》，載《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2 卷第 4 期，第 75 ～ 76 頁，《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267 頁。
【151】《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1 頁。
【152】同上，第 130 ～ 131 頁。

【153】同上，第 11 頁。在他對廬山會議的出色分析（筆者相當贊同這種分析）中提示說（《中國政治及清洗》，第 412 頁）：彭德懷和與他同一觀點的批評者是想讓毛澤東同意他們的意見，而不是要發動對他的正面攻擊。這當然是彭德懷為自己辯白的最佳理由，他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麼想的。但是，由於毛原已考慮過類似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的問題，也已經開始對公社進行深入的改革，又由於陳雲已在控制大躍進方面採取了措施，因此，如果為了說服主席而對前 18 個月的政策進行全面的、根本的批評，就是不必要的舉動，因此也無法取信於毛。

【154】《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1、400 頁。

【155】參見吐克主編的《列寧選集》，第 559 頁。

【156】《橫刀立馬彭將軍》，第 9 ～ 10 頁。

【157】彭認為，這是使主席特別惱怒的措詞之一，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21 頁。

【158】毛的批示的準確文字是：「印發各同志參考」，參見《光輝的歷史文獻》(1967 年 9 月版)，第 43 頁。這個出版物的最後一頁以及它的資料（規格），表明了它的半秘密性質。關於彭德懷的交代和紅衛兵對他的抨擊之間的明顯相似，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4、120 ～ 121 頁；關於彭後來的解釋，參見該書第 276 頁。

【159】似乎沒什麼疑問的是，從彭德懷在八屆八中全會講話的中文本來看，張聞天作了兩次講話。但可以想像，中文本說的其中的一次講話日期是錯誤的，事實上他只作了一次講話，而且彭事先也不知道這篇講話的內容。然而當他談到它時，發現它反映了兩人已經討論過的問題。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420 ～ 421 頁。另參見《懷念張聞天同志》，第 35、108 頁。關於周小舟和黃克誠是否講了話的問題，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269 ～ 270 頁。

【160】按彭的說法，張只送來這次講話的一個大綱。彭讀後就拿回去了。所以，可能只有一份抄本，同上書，第 421 頁。

【161】《文革風雲》1967 年第 10 期第 12 頁，1967 年第 5 期第 23 頁。

【162】參見《打倒「三反」分子、大叛徒、工交戰線上的大惡霸薄一波》，1967 年 2 月 15 日《東方紅》，譯載於《當代背景》878 號第 7 頁；《反革命分子薄一波犯下的十大罪行》，1967 年 1 月 1 日《井岡山》，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62 號，第 14 頁。齊衛東：《深挖 30 年代的經濟黑線及其後台老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載《衛東》，1967 年 6 月 15 日，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7 號，第 13 頁。對薄公平而論，他從 7 月 11-16 日不在北京也許意味著，他在毛發動反擊之前返回廬山，並沒有時間來完成其發言的初稿，參見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41 頁。

【163】《炮轟李先念》（北京：「紅代會」、中央財經學院，1967 年 4 月），第 25、33 頁。兩位學者引證了《中國新聞分析》（香港）761 號第 4 頁上的話（多梅斯：《中國的國內政策》，第 112 頁；迪特默：《劉少奇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第 40 頁），暗示廬山會議進行了兩次表決。這也許是事實——雖然沒有證據表明中共領導集團確實是這樣作出決定的——，但《中國新聞分析》引用的紅衛兵資料既沒有證實也沒有否定這個情況，它僅僅引了李先念的話：「第一天，我同意彭德懷的觀點，但第二天我就反對他的觀點了。」

【164】《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33 頁。

【165】《劉鄧是農業戰線的修正主義頭子》一文中提到毛在上午講話這一事實，見 1967 年 6 月 2 日《科技戰報》第 8 頁第 3 欄。

【166】《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27 ～ 29 頁。

【167】同上，第 28、35 頁。有關 1957 年反右運動的討論，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4 編。關於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的提議，參見上書第 273、275 ～ 276 頁。羅隆基的好朋友浦熙修是一位記者，她像羅一樣在反右運動中受到攻擊。彭德懷的夫

人浦安修同她是姐妹。參見上書，第 225、262～263 頁。浦熙修被禁止做記者工作，後來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1970 年 60 歲時死於癌症（參見辛波：《能幹的女將浦熙修》，載《新華日報》（文摘版）1980 年 12 號，第 181 頁。）

【168】《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29～33 頁。關於毛要求做一個中間派的情況，參見第 37、38、39、40 頁。

【169】《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3、8 頁。

【170】《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33～36 頁。

【171】《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2 頁。

【172】《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37～38 頁。

【173】同上，第 41 頁。

【174】同上，第 39、41、42～43 頁。關於柯慶施在百花齊放時期對毛的支持，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200、281～282、290～292 頁。

【175】《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38、40、41、42 頁。我認為「農業部的 ×××」（姓名被紅衛兵編者所刪去）就是農業部長廖魯言。至於這一段中被刪去的其餘兩個姓名，卻不那麼容易猜測。

【176】同上，第 37 頁。鑒於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由於與彭德懷串通而下台，毛點出這個省也許是失言。或許他想攻擊周小舟，說他沒有根據地批判左傾主義，因為毛本人是明顯的左傾主義。

【177】同上，第 43 頁。

【178】同上，第 42 頁。這個翻譯說是 26000 里，而原始資料卻說是 25000 里。

【179】同上，第 40 頁；另參見第 33 頁。

【180】《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第 9 頁。《中國的法律和政府》對這個重要段落的翻譯，照我的判斷來看，並沒有領會原文的要旨。毛是在一個幾乎離題的段落裏作出這種評論的，但其旨意是非常清楚的。

【181】《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26 頁。這段話似乎像是附在彭的意見書後的一段評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毛的反擊就具有更深遠的意義並廣泛流傳。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彭對這一需加澄清的段落的回憶，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21 頁。張旭成在《中國的政權和政策》第 117 頁中說，據報道，人民解放軍的許多高級官員贊同彭的信。這個說法是以兩位避難者的報告為根據的。張在惠策恩主編的《70 年代中國的軍隊與政治權力》中他撰寫的那一章裏說，「人民解放軍的大批軍官在支持彭的行動的備忘錄上簽名」，但沒有說明資料來源。

【182】有一個證據表明，從八屆八中全會後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重要作用。照片上毛澤東的兩側只有劉和周，而不像一般情況下那樣，還有其他政治局常委。雖然陳雲和鄧小平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朱德和林彪元帥卻是參加了的。我的假設是，朱受排斥是由於他在全會上維護了彭，但如果通過讓林彪登台一起照相的辦法來孤立他，又是不明智的，那樣會進一步引起朱德的對抗情緒。不過，在看來像是經過了充分加工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下的林彪，而看不到朱德。參見 1959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報》以及麥克法夸爾:《論照片》一書。

毛在一段講話中指出，在大躍進期間，周是同他站在一起的。參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38 頁。毛的這段講話在文化大革命中公佈出來時，黨的其他許多領導人的名字，特別是受批判的人的名字，顯然被抹去了，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編者對毛講話的內容做的手腳。其中被抹去的一個名字（例如上書第 42 頁）很可能就是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生氣地同劉互相攻擊的情況表明，這位國家主席當時是同黨的主席站在一邊的，參見本書第九章。

【183】毛在他講話中，通過強調他用了那麼長時間硬著頭皮聽對他的批評，來證明自己已做到了仁至義盡，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27～28、

33 頁。關於彭如何解釋他沒有選擇在全會上講話的原因，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275 頁。

【184】《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9 頁。

【185】同上，第 205、480 頁。起作用的字被精心地刪除了，但刪改過的正文的總的意思還是一清二楚的。毛講他忍耐了 20 天 (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36 頁)，這和彭後來說的 18 天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可能毛是指從彭在西北組第一次發難 (7 月 3 日) 到毛自己講話當天 (7 月 23 日) 這段時間。如果彭的話是準確的，那麼他講這些話一定是在 7 月 21 日。但我們知道，彭沒有參加那天的全體會議，因為他沒去聽張聞天的講話 (參見本書第 217 頁)。因此，我的想法是，在激烈爭論的時刻，彭隨便地說了一個數字。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時提到，在延安，他曾受到 40 天的批評，也許當時同他與毛在軍事問題上的分歧有關 (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33 ～ 34 頁)。毛後來暗示，那次長時間的批評會議正是在 1945 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前召開的，主要涉及百團大戰中彭德懷的行為〔參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2 卷，第 345 頁〕。

【186】這次工作會議閉幕的準確日期是 7 月 30 日。毛在一次講話中說，「現在會議很快就要休會」，但又補充說，最好還是開到月底結束 (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36 頁)。毛在接著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的講話中，對中央工作會議作了如下追述 :「第一，開了 9 天小會，接著我們召開大會，最後通過決議」(同上，第 61 頁，我對譯文稍微作了點修改)。這段話提示，小組會也許是在 7 月 2 日開始 (這天毛澤東發出了會議開始後的第 2 條指示，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82 ～ 184 頁〕，直到 7 月 10 日中午才結束 (10 日上午，彭德懷在西北組會議上作了最後一次發言)。7 月 10 日，毛澤東作了一次講話，可能對他所聽到的各小組會議上提出的批評意見做出了初步反應。這個講話也許是緊接著小組會議召開的大會的開幕詞，因而可以假定中央工作會議的大會是在 10 日下午開始的 (參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44 頁)。我認為，大會上的爭論是由毛 7 月 23 日的講話結束的。此後，討論也許集中在解決彭的問題上 (即通過什麼樣的決議來處理他) 而非集中在大躍進的有關問題方面。這種討論為與會者提供了匆忙轉而擁護毛澤東的觀點的機會。也許毛讓他的秘書起草了一篇東西，指控彭德懷過去所犯的錯誤，政治局常委會議於 8 月 1 日批准了這個指控性的文件，見《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廣州，1981 年) 第 2 冊，第 353 頁。

【187】景希珍 :《在彭總身邊》，第 77 頁。

【188】《光輝的歷史文獻》，第 12 頁。如果將毛在會議開始時宣佈的與會人數與會議結束時官方公報所說的人數相比較，就會發現全會結束之前似乎又來了兩名中央委員，參見利伯瑟 :《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45 頁。此外，這些資料表明，14 或 15 名非中央委員也列席這次全會。同樣清楚的是，一些沒有參加前一個會議的中央委員，在全會上出現了，參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61 頁。

【189】關於彭對浮誇的批評，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0 ～ 11 頁。關於毛的講話，參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60 頁。當然，不可能是毛講話的全文。

【190】《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60 ～ 63 頁。

【191】同上，第 54 ～ 55 頁。

【192】沒有證據說明毛致張聞天的信被作為會議文件散發。

【193】《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47 ～ 49 頁。

【194】關於彭的否認，參見《光輝的歷史文獻》，第 46 頁。

【195】《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77 頁。》

【196】《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268 ～ 270 頁。

【197】有關尼克松的訪問和爭論，參見尼克松《六個關頭》第 243 ～ 281 頁中有關內容。關於赫魯曉夫的訪問和辯論。參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364 ～ 367 頁。
【198】有關這次訪問的宣佈——實際可視為互訪，但艾森豪威爾的回訪沒有進行——，參見《總統公報》「D·D·艾森豪威爾，1959 年」第 560 ～ 564 頁。艾森豪威爾在新聞發佈會上只是說，他為兩國首腦互通信件開了頭，因此才有七月早期赫魯曉夫的訪美。赫魯曉夫說，邀請信是由蘇聯第一副總理庫茨洛夫訪美回國時帶回來的（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368 ～ 369 頁）；庫茨洛夫是 7 月 13 日離開美國回蘇聯的（《國家公報》第 XL1 卷第 1049 號〈1959 年 8 月 3 日〉第 157 ～ 158 頁）。
【199】尼克松：《六個關頭》，第 284 ～ 287 頁。
【200】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134 ～ 135 頁。《人民日報》沒有刊登這個攻擊性講話。
【201】《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52 頁。
【202】參見本書本卷第 132 頁。
【203】《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53 頁。
【204】關於王在遵義會議上的舉動、毛對此的肯定和王對主席的前妻的安排，參見王震等：《懷念與繼承——回憶王稼祥同志》，譯載於《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038》，第 10 ～ 11 頁。（還有一些問題，如，賀子珍當時是否呆在可以稱之為精神病院的地方，顯然她現在住在上海）。是在遵義會議上，王和周恩來一起，成為掌握軍隊的小組中毛的兩名副手。以這個小組為基礎，毛挫敗了總書記張聞天，最後成為黨的主席，這就使後來王被毛疏遠變得更令人費解。有關王稼祥生平的其他資料，參見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第 895 ～ 900 頁「王稼祥」條。
【205】《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180 頁。
【206】同上，第 39 ～ 44 頁，文化大革命期間才發佈的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這一文本，被正式稱為「摘要」。可以想像，還有關於彭與赫魯曉夫之間聯繫的內容沒有公佈。但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互相敵對的時代裏，這樣的內容如果有的話，就沒有理由不予公佈。
【207】例子參見同上書第 180 頁。1960 年 6 月布加勒斯特黨代表大會上，正進行熱烈爭辯的時候，據說赫魯曉夫指責中國將彭德懷遣去勞動營，因為彭在致蘇聯共產黨的一封信中敢於批評人民公社政策（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09 頁）。不管關於赫魯曉夫這個講話的報道多麼準確，那封信如果真有的話，不能想像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對這種行為會不加抨擊。也許這位蘇聯領導人企圖在中國共產黨內部製造混亂，他對出席羅馬尼亞代表大會的兄弟黨代表說，中國共產黨內部有反叛集團，它準備也願意更合理地與蘇聯共產黨打交道。
【208】《打倒反對毛主席的老手陳雲》，載 1967 年 2 月 15 日《財貿紅旗》，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77 號，第 9 頁。到 1959 年 6 月，省級領導人還在貫徹「全國一盤棋」的政策。這一政策是陳雲的口號，目的是恢復國民經濟的平衡和有序。參見 6 月 7 日栗又文作的吉林省政府工作報告，載 1959 年 6 月 10 日《吉林日報》，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82 號，第 32 頁。
【209】參見廣東省「上山下鄉青年『夫妻』戰鬥隊」複製的《鄧小平自白書》第 4 頁。我推測，這個事故是在廬山發生的，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則材料說，鄧「以腿有病為借口退出了」（《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205 頁），暗示他參加了工作會議，但在全會召開前離開了。關於鄧對因貪圖同時做好一切事情而引起的問題所表示的理解，參見 1967 年 6 月 14 日《進軍報》第 2 頁第 3 欄。
【210】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146 ～ 148 頁和本卷第 65 頁。
【211】根據來自周恩來，參見《美國的對外關係，1949 年》第 8 卷：《遠東：中國》，第 359 頁。另參見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68 頁。
【212】關於朱德和彭德懷之間的關係，參見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66 ～ 67 頁。

【213】《朱德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 2 集 (北京 :「首都徹底批判朱德聯絡站」, 1967 年 4 月 15 日), 第 13 頁, 有關朱對公共食堂的評論, 參見 1967 年 1 月 23 日《新北大》第 3 頁第 2 欄。關於朱認為公社建立太早的說法, 參見 1967 年 2 月 11 日《東方紅》, 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72 號, 第 22 頁。
【214】參見《揭露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 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3 號, 第 10 頁。李琦當時是山西省太原市委第一書記 (同上, 見第 1 頁)。
【215】由於彭德懷在文化大革命的黑名單中佔據了極顯眼的位置, 因此我覺得, 不管是誰, 只要他對彭在廬山會議上的舉動說過略表同情的話, 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就會揪住他不放。我發現朱德是唯一真正為彭辯護的人。沒去廬山開會的外交部長陳毅, 是彭德懷回到北京後的第一位登門拜訪者。但是, 他似乎不贊成彭蠻幹, 並勸他將來講話時要緩和一些。參見景希珍 :《在彭總身邊》, 第 67 ～ 68 頁。
【216】除了毛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和他給張聞天的信外, 還有陳毅對毛的脾氣的評論有助於說明問題, 參見《文革風雲》1967 年第 9 期第 28 頁, 和埃德加·斯諾 :《紅星照耀下的中國》, 第 84 頁。
【217】這種情況不僅限於在中國。我的妻子愛米莉·麥克法夸爾曾經問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國大黨的一位成員 (有獨立立場的印度政治家) : 他當時為什麼不批評英·甘地夫人的緊急法案 ? 他帶著毫無戒備的坦率態度回答說,「就我來說, 是因為害怕 !」
【218】即使農民非常緊張, 不敢對劉講事實, 劉也可以通過他家的服務人員瞭解實情。例如, 他的孩子們的一個保姆 1959 年夏天從家鄉返回時, 對他的妻子王光美講了農村糧食短缺的問題和其他一些疾苦情況。參見《紅旗飄飄》第 20 輯, 第 280 ～ 281 頁。
【219】《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2 卷第 4 期, 第 76 ～ 77 頁。
【220】參見本書第 1 卷, 第 312 頁。
【221】《打倒老牌反革命分子彭德懷》, 載《新北大》第 3 頁第 2 欄。
【222】1967 年 6 月 2 日《科技戰報》, 第 8 頁第 3 欄。
【223】參見本書第 1 卷第四章注 59。
【224】饒漱石據說是高崗的主要同謀, 1954 年被清洗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要職。在此之前, 他是華東局第一把手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參見科林和克拉克 :《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 1921-1965 年)》, 第 408 ～ 411 頁。
【225】1967 年 8 月 9 日《新北大》, 第 3 頁第 3 欄。另參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 第 74 頁。
【226】關於劉認為彭作為高饒事件的一個參加者, 他沒有權力發言, 參見《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 第 36 頁。關於劉把彭說成是高崗饒漱石聯盟的漏網分子一事, 參見《反黨篡軍頭子彭德懷罪行記錄》, 載 1967 年 8 月 1 日《井岡山》第 6 頁第 4 欄。按照這個材料的說法, 毛曾批評劉沒有充分強調彭在高崗事件中的作用。關於劉對彭堅強性格的高度評價, 參見劉的警衛員的文章 :《在劉少奇同志身邊》,《紅旗飄飄》第 20 集, 第 243 ～ 244 頁。
【227】方志純 :《難忘的一天》, 1980 年 5 月 6 日《人民日報》。
【228】李銳 :《懷念田家英》,《新華月報》(文摘版)1980 年 4 號第 173 頁。作詩的插曲很有傳統意味。這 4 個人來到一個亭子旁, 亭子裏有一塊刻有王陽明一首詩的大石頭。當他們注意到刻在亭柱上的只有上聯, 沒有下聯時, 就催促田對出一個下聯, 為了題寫下聯, 他把李銳從地上拾起的燒焦的松枝作為筆。
【229】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86 ～ 91、312 ～ 315 頁。關於周與彭德懷的爭論, 參見《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 第 205 ～ 206、231 ～ 235 頁。
【230】《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 第 19 頁。這些批評意見被毛引用於他 8 月 15 日 (幾乎在全會結束時) 的便條或講話中。毛沒有更早一些引用這些批評意見的事實表明, 它們也許是由直言不諱的彭在全會期間提出來的。

另一種可能性是，考慮到爭論的策略，毛直到他確信可以勝利時，才準備引用這些批評的要點，甚至準備進行嘲弄。

【231】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7 ～ 9 頁。從某種意義上看，周似乎也把他自己視為毛的個人副手和一名老資格的同事。例如，在廬山會議期間，他感到必須對保證毛的住所不太熱負起個人責任來（《人民的好總理》，第 396 頁）。

【232】《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第 288 頁。

【233】毛澤東去世後中國人在評價廬山會議的重要性時，把它看作中國共產黨的行為規範的一個逆轉點。安子文認為，1959 年以後，中國共產黨離開了民主集中制（《人民日報》1980 年 5 月 8 日）。北京市委黨校理論調查組認為，廬山會議後中國的政治生活呈現出一種反常狀態（《新華文摘》1981 年 3 號第 71 頁第 1 欄）。至於西方對這一問題的敏銳分析，參見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第 436 ～ 440 頁。

【234】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78 頁。彭德懷的自我批評，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31 ～ 38 頁；關於他如何寫自我批評，見《彭德懷自述》，第 276 ～ 278 頁。

【235】相比之下，高崗的自殺也許使許多人感到懷疑，但為此擔憂的人可能並沒有多少。有關高崗事件的討論，參見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第 166 ～ 210 頁。張聞天的秘書怕他在廬山會議期間服用過量的安眠藥，就把藥拿開了，見《懷念張聞天同志》，第 108 頁。

【236】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108 頁。

【237】中共中央關於「反黨集團」的決議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發表出來，而且只是一個「摘要」。這份決議包含在《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39 ～ 44 頁中。戴維·A·查理斯指出，黃克誠和周小舟曾在一起工作過，那是在 50 年代初黃克誠任湖南省委書記之時，參見《彭德懷元帥的撤職》，載《中國季刊》1961 年 10-12 月號，第 69 頁。

【238】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81 頁。彭的「意見書」的全文和毛對它的評論，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87 ～ 188 頁。

【239】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81 ～ 82、84 頁。雖然呆在彭的身邊有潛在的政治危險，但彭的警衛員似乎認為在彭身處逆境之時不能拋棄他。他唯一的擔心是，會像彭一樣必須離開人民解放軍，但元帥能夠保證他繼續在軍隊工作。關於彭搬家的日期，參見《新華文摘》1981 年 5 號，第 174 ～ 175 頁。

圓明園曾經是意大利「巴羅克建築藝術的樣品」，是在 18 世紀由乾隆皇帝的耶穌會顧問設計的。1860 年，英法聯軍先行搶劫，然後將其焚燬。關於圓明園今天面貌的簡介，參見波拿維亞：《中國人》，第 84 頁。另參見配文圖片「圓明園」，《中國畫報》1981 年第 5 期，第 36 ～ 43 頁。高牆圍起來的一個院子以前是圓明園的一部分，可能是吳家花園，彭德懷就被關在那裏。

【240】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84、91 頁。

【241】賀誠：《傅連暲同志——從一個基督教徒到一名卓越的共產主義者》，載 1981 年 3 月 6 日《人民日報》，譯載於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77 卷 968 號，第 15 頁。英譯文提到周恩來「含淚的眼睛」，我想這不是由於他感到喜悅或好笑。

【242】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82、86 ～ 90、91 ～ 92、94 ～ 95 頁。但彭德懷與衛兵保持距離以「避嫌」！見該書第 93 頁。

【243】關於彭較早期的閱讀習慣，或者他根本缺少這種習慣的情況，參見《彭德懷檔案》，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7 號，第 22 頁。另有一種說法更令人同情，即，在革命年代裏，彭只有片刻閒暇工夫能用來讀讀小冊子，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2 頁。

【244】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106 ～ 107、109 頁。除了給彭送政府文件外，中共中央還派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作彼此間聯絡官員，參見《橫刀立馬彭將軍》，第 71 頁。1960 年 5 月 29 日，彭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新華社消息），

成為林伯渠治喪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林去世前，是彭在政治局中的同伴。但除此之外，在廬山會議後他完全受到冷落。

【245】《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86 頁。

【246】《東方紅戰報》第 80 號 (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6 頁。(這個材料錯誤地將會議的年份說成是 1957 年。)

【247】孫冶方等：《嚴謹的治學態度》，載《新華月報》1967 年 8 號第 18 頁；《徹底懷疑和打倒重要的反黨分子張聞天》，載 1967 年 5 月 31 日《進軍報》，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94 號，第 32 頁。按照另一種說法，張被指派研究蘇聯經濟學家利別爾曼的理論，這位學者試圖把利潤作為衡量效益的尺度，參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尚昆罪行錄》，載 1967 年 6 月 23 日《東方紅報》第 3 頁第 1 欄。

【248】《新華月報》1979 年 5 號，第 63 ～ 64 頁。

【249】參見《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第 17 頁。另參見《華主席在太陽升起的地方》，第 73 頁，和《華主席在湖南》，第 5 頁。對比這些材料來源表明，這時已定出強調華與毛之間聯繫的標準提法。雖說毛是唯一有權選定繼承者的人，但這並不意味著標準提法是一種委託。這些著作發表時，還沒有給彭德懷平反。

【250】《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第 136 ～ 142 頁，特別是第 141 頁。

【251】關於華國鋒早期經歷的介紹，參見歐邁格和塞重云：《華國鋒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的歲月，1949-1966 年：政治通才的造就》，載《中國季刊》1977 年 1-3 月號，第 3 ～ 51 頁。關於華的經歷，有一些被加以神化，但還有用，參見本書本卷第 249 所引證的著作。

【252】軍委會議的準確日期難以肯定。彭德懷說會議從 8 月末持續到 9 月初，但另一份材料說會期延長到 10 月。參見《彭德懷自述》，第 278 頁；《新華文摘》1981 年 3 號，第 70 頁。關於劉少奇的指示，參見《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第 47 頁。

【253】《光輝的歷史文獻》(1967 年 9 月)，第 22 頁。這是一篇文章而非講話的情況已在上引書第 47 ～ 48 頁中得到證明。上引書還記錄了彭德懷對陳伯達的分析的憤怒反應。關於毛對這個問題的解釋，參見《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第 21 頁。

【254】參見《光輝的歷史文獻》(1967 年 9 月)，第 49 ～ 56 頁中關於彭早期的冒犯行為。關於毛對這些行為的抨擊，參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79 ～ 80 頁。

【255】《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83 ～ 84 頁。

【256】同上，第 7 ～ 9 頁。陳伯達以更長的篇幅批評彭德懷 1949 年以前的觀點，參見《光輝的歷史文獻》(1967 年 9 月)，第 23 ～ 28 頁。

【257】《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80 ～ 81 頁。

【258】《光輝的歷史文獻》(1967 年 9 月)，第 22 ～ 30 頁。

【259】《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81 ～ 82 頁。

【260】同上，第 82 ～ 83 頁。

【261】同上，第 84 頁。

【262】《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 第 1 卷，第 187 頁。《彭德懷自述》，第 278 ～ 279 頁。

【263】《彭德懷的一篇札記》，載《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譯載於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 (華盛頓) 第 77 卷第 668 號，第 6 ～ 10 頁。

【264】關於這個調查委員會，參見《反黨篡軍分子賀龍的滔天罪行》，載 1967 年 1 月 28 日《體育戰線》，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12 號第 12 頁。有關賀龍不願批判彭德懷的情況，參見《賀龍檔案》，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7 號，第 27 頁。

【265】這是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將軍，參見《二鋼紅旗》(武漢)第38期(1967年8月22日)。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即1967年夏天，陳將軍被捲入「武漢事件」之中，參見菲利浦·布利基漢姆：《1967年毛的文化大革命：奪取權力的鬥爭》，載《中國季刊》1968年4-6月號，第24～27頁。
【266】《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82頁。
【267】這個說法被許多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所引用，參見例如《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證選編》，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651號，第20頁。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只利用了這篇講話中的幾段話，也許是因為講話的其餘部分與紅衛兵的觀點相柢觸。然而，我相信可以推斷出劉這個講話的(真正)意圖。
【268】同前一個註釋中談到的情況一樣，這個引語也出現在許多地方，如參見《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36頁。
【269】引自《劉少奇的反動講話》，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5號，第21頁。另一種可能性是，這些話是劉少奇8月24日或者更早的時候在廬山主持第一次最高國務會議時講的。
【270】同上，第3頁。
【271】本書第1卷，第108頁。
【272】例如參見《毛澤東思想照妖鏡下的兩個赫魯曉夫》，1967年5月15日《斗批改》，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2號，第18頁。這一材料如同登載了這句話的其他材料一樣認為，劉的話是8月17日在廬山會議上講的。由於廬山全會是8月16日結束的，所以人們一定會推想，這是紅衛兵編的材料中又一個日期錯誤的例子。
【273】本書第1卷，第100～104頁。
【274】有些紅衛兵材料為了明顯的政治原因，只引用了劉贊成提高鄧小平的威望的話，例如參見《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34頁。但至少在一個材料裏，周恩來和林彪兩人的名字也被提到，參見《新時代的狂人》，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603號，第18、24頁。(在第18頁裏，林彪和×××被提到了；在第24頁裏，林彪和周恩來兩人的名字都被提到，但沒有指明講話的場合。我推測，第18頁中的×××就是周恩來，第24頁所沒有註明的講話場合，估計就是這次軍委會議。)
【275】《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5號，第4頁。
【276】同上，第3頁。劉少奇在人民解放軍中威信不夠高的問題，可從下列情況看出：一個月後，人民解放軍一位宣傳方面的負責人要求其同事更公開地宣傳劉在革命時期的作用，以及他對軍事勝利做出的貢獻。參見《反革命兩面派趙易亞的滔天罪行》，載1967年9月21日《新人大》，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21號，第32頁。
【277】關於林彪講話的時間，參見《中共中央文件》1974年第1號，第10頁。
【278】《劉少奇在其黑書〈論修養〉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說明》，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592號，第21頁。
【279】《林副主席關於彭德懷的談話(摘要)》，載1967年11月25日《革命造反報》，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18號，第19～20頁。
【280】直到1962年才正式撤銷黃克誠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51號，第34頁；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307頁)。1977年8月1日，即人民解放軍建軍50週年時為黃克誠平了反(見《自由中國週刊》1977年8月8日》)。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黃克誠擔任這個委員會的(常務)書記。
【281】參見《羅瑞卿檔案》，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7號第48～49頁。
【282】參見本書本卷第187頁和《深切懷念羅瑞卿同志》第170～172、199～201頁。
【283】關於羅瑞卿的生平，參見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年》，第642～645頁。

【284】參見戴維·A·查理斯:《彭德懷元帥的受貶》，載《中國季刊》1961年10-12月號，第73頁。
【285】參見上書和科林與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年》中關於他們兩人的詞條，第233～236、524～526頁。
【286】參見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年》，第826～828頁。由於彭德懷事件而導致鄧華被撤職的情況，直到後來鄧去世之後才得到證實，參見《新華月報》1980年7號，第49～50頁。
【287】參見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年》第103～104頁(「陳錫聯」)、113～116頁(「陳賡」)、359～361頁(「許世友」)、632頁(「劉亞樓」)、774～778頁(「粟裕」)。以及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1卷第158頁(「邱會作」)。
【288】參見本書第1卷第146～148頁和本卷第65頁。有人認為(J·D·西蒙:《彭德懷：年表重考》，載《中國季刊》1969年1-3月號，第120～138頁)，在彭德懷出國訪問期間，1959年5月和6月上半月已逐步削減這位國防部部長的權力，所以他在廬山會議上的被貶黜，實際上在會前就是既成事實。(1957年秋朱可夫元帥出國時職務被撤銷，與彭德懷的情形類似)但是，這個觀點太看重對人民解放軍和安全部門職權移交的時機和動機的猜測。例如，6月中旬被看作鄧華被解職的時間，但註釋286中引用的新證據說明，他被撤職，是因為出現了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事件，即在廬山會議之後。無疑，毛很長時間以來就打算撤掉彭，所以，總的說來，把廬山會議看作一舉完成這個目標的天賜良機，比把它看作為達到這個目標而精心導演的兩個月人事變動過程的頂點，似乎更加符合事實。
【289】關於30年代毛的「集團」及其政治意義的概略論述，參見本書第1卷第142～143頁。關於林彪生平的許多細節描寫，均根據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年》，第559～567頁。
【290】羅賓遜：《林彪的政治軍事生涯》第2部分(1950-1971年)，第148頁。
【291】同上，第154～156頁；以及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年》。這些材料在林彪是否去過朝鮮的問題上說法不一致。我所請教的中國人說，他沒有去過朝鮮。有些中文書籍暗示，朝鮮戰爭爆發時林彪稱病不出，那只是借口而已。參見《橫刀立馬彭將軍》，第123頁，以及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第77卷第968號，第16頁。
【292】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第77卷第968號，第16頁。
【293】1967年5月25日《紅色宣傳兵》，第3頁第4欄。
【294】《輝煌的十年》，第74頁。
【295】《毛主席語錄》，第198～199頁。
【296】本書第1卷，第8頁。
【297】《彭德懷檔案》，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7號，第24頁。沒有證據來支持這個說法，但彭德懷似乎有可能對黨指揮槍的原則很不滿。據彭的警衛員說，他拜訪了許多元帥(見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66～68頁)；也許這位國防部長認為他們才是可以與之共商軍機大計的更適宜的人物。
【298】參見《當代背景》589號，第2、6頁。
【299】參見如《當代背景》588號中的許多地方;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社論，譯載於《當代背景》589號，第11～15頁；《當代背景》590號全部內容。
【300】《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1卷第4期，第64～65頁。
【301】同上，第67頁。
【302】同上，第69頁。
【303】同上，第72頁。
【304】同上，第81頁。
【305】《克服右傾情緒，厲行增產節約》，載1959年8月6日《人民日報》，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74號，第4頁。戴維·A·查理斯首先指出反對右傾的逐

漸升級的方式，參見《彭德懷元帥的受貶》(《中國季刊》1961 年 10-12 月號，第 69 頁)。
【306】《戰勝災害，力爭豐收》，載 1959 年 8 月 7 日《人民日報》，引語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76 號，第 22 頁。
【307】關於 1955 年背景的討論，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26 ～ 27 頁。
【308】戴維·A·查理斯：《彭德懷元帥的受貶》(《中國季刊》1961 年 10-12 月號，第 69 ～ 70 頁)。菲利浦·伯利德哈姆深刻地指出，講求實際的周發起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批評，會大大增強這種批評的影響。
【309】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90 號，第 17 頁。約爾根·多梅斯認為，廬山會議在人民公社問題上開始退卻，參見其著作《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社會政策，1949-1979 年》第 44 ～ 45 頁。而我相信，公社的退卻是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和會後開始的，參見林田：《關於人民公社體制問題的探討》，載《經濟管理》1981 年第 1 期，譯載於《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048》，第 L20 ～ 21 頁。
【310】《人民日報》社論:《「得不償失」論可以休矣》; 引語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91 號，第 1 頁。另參見新華社發的吳其康(音譯)的報道：《中國的小高爐》(1959 年 9 月 4 日)，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94 號，第 2 頁。
【311】1959 年 9 月 17 日《人民日報》社論:《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譯按：原文有誤。這不是《人民日報》社論，而是《人民日報》轉載的《紅旗》1959 年第 18 期的社論)，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05 號，第 9 ～ 11 頁；及 1959 年 9 月 22 日《人民日報》社論：《公共食堂前途無量》，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2105 號，第 12 ～ 17 頁。
【312】《當代背景》589 號，第 2 頁。
【313】參見《輝煌的十年》第 1 ～ 66、90 ～ 104 頁。
【314】同上，第 192 ～ 193 頁。
【315】同上，第 217 頁。關於李井泉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批判，參見《猛烈批判四川的「赫魯曉夫」》(貴陽地區服務站，1967 年 6 月 17 日)，譯載於《國外廣播新聞》(1967 年 6 月 20 日)；《綦江地區形勢》，第 ddd17 頁。
【316】《輝煌的十年》，第 223 頁。
【317】同上，第 237 頁。
【318】陶鑄論革命堅定性的文章最早發表在廣東的一個雜誌上，(譯按：在《上游》1959 年第 16 期上刊登)，1959 年 9 月 2 日的《人民日報》予以轉載。這篇文章的英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03 號，第 1 ～ 4 頁。8 年後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姚文元將此文抨擊為反革命文章！參見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1967 年 11 月《中國建設》(增刊)，第 12 頁。有關自留地重新歸集體所有的例子，參見《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 年)，第 144 頁。

第四編 戰敗

第十一章 中蘇分裂的出現

【1】 引自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58 頁。
【2】 《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263 頁。
【3】 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第 76 ～ 80 頁。以下三個段落的敘述，在很大程度上依據該書第 67 ～ 134 頁的內容。
【4】 印度發現中國的道路橫跨阿克塞欽，兩國總理隨後相互通信，但雙方都未對外公佈。同上，見第 116 頁。
【5】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114 頁。
【6】 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蘇中關係，1945-1970 年》，第 157 頁。
【7】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327 頁。

【8】 同上。
【9】 同上，第 112 頁。
【10】《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368 ～ 375 頁。
【11】 參見老練的觀察家埃德沃爾特·克蘭克肖對蘇聯情況的分析：《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84 ～ 85 頁。
【12】 引自同上書，第 85 頁。
【13】 按赫魯曉夫對塔斯社聲明的發表時間的錯誤回憶（故意的？），表明這個聲明是在他去美國訪問以後才發表的。同上，見第 307 頁。
【14】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114 頁。9 月 8 日晚，周的信交給了印度駐北京的大使；尼赫魯於 9 月 9 日晚收到這封信（見《政治家》〈加爾各答〉，9 月 10 日）。9 月 9 日格林威治時間 10 時 20 分，即北京時間下午 6 時 20 分，新德里時間下午 3 時 50 分，中國用英語（顯然這是第一次）向歐洲廣播了這封信。見《國外廣播新聞—遠東—126》第 AAA1 頁。假使《政治家》的報道是正確的，那似乎意味著歐洲人在尼赫魯先生有機會讀信以前，就獲悉了此信的內容。
【15】 1959 年 5 月 6 日《人民日報》，譯載於《當代背景》第 570 號，第 2 ～ 16 頁。
【16】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周的信是在格林威治時間 10：20 播送的，塔斯社的聲明是在格林威治時間 16：00 播送的（《國外廣播新聞——蘇聯和東歐——177》〈1959 年〉第 BB1 頁）。
【17】 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蘇中關係，1945-1970 年》，第 158 頁。這一引語沒加註釋，但可能來自中國給莫斯科的一份照會，因為北京當時實際上沒有發表公開聲明。
【18】 1959 年 9 月 17 日《紐約時報》。
【19】《總統公報》「D．D．艾森豪威爾，1959 年」，第 670—671 頁。
【20】 同上，第 697 頁。
【21】 1959 年 10 月 7 日《紐約時報》。
【22】 1959 年 11 月 1 日《紐約時報》。
【23】 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58 頁。
【24】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332 頁。
【25】《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308 頁。
【26】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114 頁。
【27】 1959 年 10 月 3 日《人民日報》。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沒有出席（幾個月後他在中蘇論戰中起重大作用），可能是由於他的腿有了毛病，不過他的確參加了 10 月 1 日的國慶檢閱。或許他當時正陪伴在京參加慶祝活動的其他重要人物。
【28】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114 ～ 115 頁。
【29】《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308 頁。
【30】 與赫魯曉夫打過交道的人對他的辯論技能的評論，參見尼克松《六個關頭》第 250 ～ 271 頁。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同紅衛兵的激烈對抗中，陳毅的性格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例子參見《陳毅講話集》，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636 號，第 28 頁。
【31】《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308 ～ 309 頁。如果赫魯曉夫的報告是正確的，那就不清楚陳毅在談到英國佔領問題時，是否只是指英國人通過繪製地圖「奪取」了麥克馬洪線劃出的地段或者阿克塞欽，參見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第 26 ～ 36 頁。
【32】《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308 頁。
【33】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115 頁。
【34】 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從赫魯曉夫到柯西金》，第 46 頁。
【35】《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311 頁。
【36】 同上，第 255、260 ～ 261 頁。
【37】 同上，第 269 ～ 270 頁。
【38】 同上，第 283 頁。

【39】 同上，第 271 ～ 275 頁。
【40】 同上，第 275 ～ 278 頁。有關保加利亞「躍進」的討論，參見利利阿那·布里斯比《保加利亞：沒有公社的躍進》，載《中國季刊》1960 年 7-9 月號，第 80 ～ 84 頁。有關對東德、匈牙利和波蘭對當時中國發展情況的反應的評論，參見馬汀·艾斯林：《東德：北京——潘科軸心？》，塔馬斯·阿克澤爾：《匈牙利：南京傳來的喜訊》，里奧波爾德·拉波茨：《波蘭：躍進的斜路》，以及同上赫魯曉夫著作第 85 ～ 103 頁。
【41】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117 頁。
【42】 同上，第 118 ～ 119 頁。即使在北京的公開場合中，赫魯曉夫也不提通過和平途徑或武力方式解放台灣，只是重申需要取消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佔據的席位，參見 A·M·哈爾彭：《共產主義中國與和平共處》，載《中國季刊》1960 年 7-9 月號，第 18 頁。
【43】 參見本書第 1 卷，第 316 ～ 317 頁。
【44】 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118 頁。
【45】 1959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報》。
【46】 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87 頁。
【47】 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55 ～ 157 頁。
【48】 哈爾彭：《共產主義中國》，第 18 ～ 20 頁。
【49】 引自上書第 20 ～ 21 頁。
【50】 引自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244 頁。
【51】 同上，第 281 ～ 283 頁。
【52】 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第 110 ～ 111 頁。
【53】 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270 ～ 272 頁。
【54】 同上，第 273 頁。
【55】 同上，第 284 ～ 286 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個紅衛兵出版物聲稱，參加匈牙利黨代表大會的中國代表譚震林贊成赫魯曉夫關於世界形勢的觀點。事實上，譚對赫魯曉夫的和平動議只表示了通常的中國禮貌，而且，在「但是」之後，他說了更多的話，即說明由於美帝國主義的行動，這些動議將是無法實現的，參見《關於譚震林問題的初步綜合材料（速記）》第 114 號第 13 ～ 14 頁中的引語，《新華半月刊》1959 年 24 號第 149 ～ 150 頁的全部文字。
【56】 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91 頁。
【57】 見陳毅 1959 年 12 月 27 日在一個文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參見《東方紅戰報》第 45 期（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4 頁。陳毅也承認，赫魯曉夫在一些事情上可能是對的（同上，見第 40 期）。
【58】 《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摘編》（「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批劉鄧第一支隊」，1967 年 4 月），第 60 頁。
【59】 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288 ～ 290 頁；哈爾彭：《共產主義中國與和平共處》，載《中國季刊》1960 年 7-9 月號，第 21 頁。
【60】 引自《當代背景》619 號第 6 頁。另參見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290 ～ 292 頁；哈爾彭:《共產主義中國與和平共處》，載《中國季刊》1960 年 7-9 月號，第 21 頁。
【61】 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91 頁。
【62】 《劉少奇材料彙編》（第 1 集），第 112 頁。當時劉正在同他妻兄王光英的家人談話。
【63】 關於這個謎的簡略論述，參見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58 ～ 59 頁。
【64】 參見上書。另外，關於中國人宣佈中國代表團離開的背景，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92 號，第 44 頁。
【65】 30 年代康生在莫斯科度過了大約 4 年時光，伍修權從 1926 年到 1931 年也生活在莫斯科。參見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關於他們的條目。

【66】 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指控伍修權在參加華沙條約會議時未能報告赫魯曉夫對毛的謾罵，見 1967 年 4 月 13 日《紅衛戰報》第 4 頁第 2 欄。如果赫魯曉夫的謾罵是包含在他的講話中——據說這些話是「公開的」——，那就弄不清為什麼要進行這種指控，因為這種指控也許同樣可以針對紅衛兵崇拜的英雄之一康生。
【67】 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64 頁。
【68】 下面三個句子中的分析均以上書第 59 ～ 61 頁的內容為依據；宣言的正文和康生的講話也都包含在這本書中，見第 63 ～ 77 頁。
【69】 其他三則條目為：創建一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的永久性聯合國委員會；簽署關於和平使用南極的 1959 年東西方協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停止進行核試驗（同上書，見第 60 頁）。
【70】 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從赫魯曉夫到柯西金》，第 46 頁。
【71】 關於所有儀式、消息等的完整報道，載《當代背景》613 號。
【72】 同上，第 21（劉少奇的祝酒詞）、23 ～ 24（朱德的講話）、25 ～ 27 頁（契爾沃年科的講話）。
【73】 同上，第 11 ～ 12 頁。
【74】 《文革風雲》1967 年第 9 期第 42 頁。陳毅這個講話的日期以及和他對話的人的身份，都找不到材料核實，但陳的談話內容表明，對方是一個蘇聯人。
【75】 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55 ～ 156 頁。
【76】 同上，第 156 ～ 157 頁。這個材料雖沒有證實毛這番話是在杭州會議講的，但時間和背景卻表明他很可能在杭州會議上講了這樣的話。
【77】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226 頁。
【78】 同上，第 227 頁。
【79】 《劉少奇材料彙編》（第 1 集），第 112 頁。
【80】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226 頁。
【81】 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第 135 頁～ 142 頁。
【82】 同上，第 137、139 ～ 151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209 號，第 30 ～ 31 頁。
【83】 《季度要事與文獻》，《中國季刊》1960 年 4-6 月號，第 90 頁。據說，周恩來曾經親自研究過中緬邊境，見《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136》，第 K5 頁。
【84】 阿諾德·C·布拉克曼：《馬來地區與中國》，見 A·M·哈爾彭主編的《對華政策：來自六大洲的看法》，第 277 ～ 278 頁。
【85】 見《文革風雲》1967 年第 9 號，第 279 頁。
【86】 阿諾德·C·布拉克曼：《馬來地區與中國》，見哈爾彭上書第 278 ～ 279 頁。中國方面有關這些事件的報道，見《當代背景》605 號。
【87】 阿諾德·C·布拉克曼：《馬來地區與中國》，見哈爾彭上書第 279 頁。
【88】 進一步的探討，見哈爾彭：《中國共產黨人對中立主義的方針》，載《中國季刊》1961 年 1-3 月號，第 90 ～ 115 頁。
【89】 《季度要事與文獻》，《中國季刊》1960 年 4-6 月號，第 93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224 號，第 35 ～ 40 頁；2228 號，第 40 ～ 48 頁；2245 號，第 40 ～ 44 頁。
【90】 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第 155 ～ 169 頁。
【91】 毛澤東主席同亞、非、拉美友好人士的幾次談話，見《紅旗》1960 年第 10 期。
【92】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223 號，第 1 ～ 5 頁。
【93】 楊格：《與中國共產黨人的談判》，第 227 頁。
【94】 《列寧主義萬歲》，載《紅旗》1960 年第 8 期，譯載於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82 ～ 112 頁。《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人民日報》編輯部 1960 年 4 月 22 日。于兆力：《帝國主義——現代戰爭的策源地——與人民保衛和平的鬥爭道路》，載《紅旗》1960 年第 7 期，譯載於《北京週報》1960 年第 15 期。陸定一在列寧誕辰紀念大會上的報告，載《北京週報》1960 年第 17 期。
【95】 引自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82 頁。

【96】 這裏對《列寧主義萬歲》的分析，是以《中蘇論戰》中的譯文為依據的，見該書第 78 ～ 81 頁。
【97】 同上，見第 7 ～ 8 頁。
【98】 起草人之一是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吳冷西。見吳的自述，載《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2 卷第 4 期第 77 頁。
【99】 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90 頁。
【100】同上，第 98 頁。
【101】同上，第 96 ～ 98 頁。
【102】同上，第 99 ～ 110 頁。
【103】同上，第 99 頁。
【104】同上，第 100 頁。
【105】同上，第 107 頁。
【106】對喀拉拉邦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探討，見哈里森：《印度：最危險的幾十年》，第 193 ～ 199 頁。
【107】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119 頁。
【108】以下這段話是庫西寧對核武器理論的創新：「為了戰爭目的發明的新式武器卻開始對和平產生有利的影響，這就是軍事工程發展的辯證法。」（同上書，第 119 頁）
【109】《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摘編》，第 49 頁。
【110】見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320 ～ 325 頁。事件的過程，見《當代背景》620 號和 621 號。官方對劉長勝講話的報道，見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123 ～ 126 頁。
【111】見毛里斯·索爾茲在 11 月莫斯科會議上的發言，載達林主編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多極化：文獻記錄，1961-1963 年》，第 842 ～ 843 頁。
【112】見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從赫魯曉夫到柯西金》，第 104 ～ 105 頁。
【113】事情的梗概，見《紐約時報》索引，1960 年，第 523 ～ 527 頁。
【114】見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127 ～ 131 頁摘錄的兩篇文章。
【115】《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496 頁。並見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從赫魯曉夫到柯西金》，第 48 頁。作者標出的日期為 5 月 11 日。
【116】《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79 ～ 80 頁。
【117】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132 ～ 140 頁。
【118】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97 ～ 103 頁。其中有對此信內容的極有用處的長篇敘述。但是由於沒有原文，很難判斷其價值。
【119】《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80 頁。據克蘭克肖的《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這次秘密會議開始於 6 月 25 日，見該書 104 頁。
【120】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04 ～ 106 頁。
【121】《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80 頁。有關中國代表在世界工聯會議上的「托派」行為，見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09 頁。
【122】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07 頁。也許正是在這個場合下，赫魯曉夫斷言，中國的經濟困難應直接歸咎於毛的專斷作風和個人崇拜，見《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摘編》第 3 頁。赫魯曉夫對毛的這番抨擊沒有註明日期，然而是彭真轉達了這番話這一事實，就足以證實它是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說的。
【123】查爾斯：《罷免彭德懷元帥》，載《中國季刊》1961 年 10-12 月號，第 75 頁。
【124】《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4 頁。此處沒有註明赫魯曉夫說出讚揚彭德懷的那番話的時間。但是，這樣一種具有挑釁意味的言辭是與其他一些有關他在布加勒斯特的活動的報道相吻合的，雖然，也不排除他在 9 個月之前的北京之行中講這番話的可能。
【125】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09 頁。我只找到了一份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彭真在布加勒斯特的言行的材料，其中說他在申辯反駁時表現得消

極、遲鈍，但從所有其他的跡象看，這種說法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見《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7 頁。
【126】《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109 ～ 110 頁。
【127】同上，第 111 ～ 112 頁。
【128】同上，第 81 頁。
【129】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從赫魯曉夫到柯西金》，第 79 ～ 80 頁。
【130】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第 327 頁。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從赫魯曉夫到柯西金》，第 110 ～ 111 頁。
【131】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從赫魯曉夫到柯西金》，第 103 ～ 104 頁。
【132】鮑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蘇中關係》，第 212 頁。蘇聯人也查禁了中國人在莫斯科發行的《友誼》雜誌，借口是它經常發表傾向性很強的社論。同上，見第 186 頁。
【133】《中國百科年鑒》1981 年，第 563 頁。
【134】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65 頁。
【135】同上，第 177 ～ 178 頁。
【136】鮑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蘇中關係》，第 212 頁。科羅契科的回憶是，中方照會的日期為 7 月 23 日至 26 日之間，見《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178 頁。
【137】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178 頁。
【138】同上，第 164 ～ 165 頁。
【139】同上，第 122 ～ 123、105 ～ 112、154 ～ 156、159 頁。
【140】同上，第 146 ～ 148 頁。
【141】同上，第 152 ～ 154 頁。
【142】同上，第 165 ～ 169 頁。
【143】同上，第 171 ～ 176、180 ～ 181、190 頁。
【144】同上，第 181 ～ 187 頁。科羅契科尖刻地評論道，契爾沃年科的全部抱怨中隱藏著的不滿，是中國再也不做莫斯科的馴服工具。同上，見第 186 頁。中國人對撤走專家一事立即作出反應，停止派代表團出席 8 月 9 日至 16 日在莫斯科舉行的東方學專家大會。見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第二十五屆國際東方學專家大會》，載《中國季刊》1960 年 10-12 月號，第 114 ～ 116 頁。
【145】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188 ～ 190 頁。
【146】同上，第 187 ～ 188 頁。
【147】同上，第 179 ～ 187 頁。科羅契科的個人觀點並不具有代表性。他對蘇聯的制度不抱什麼幻想，在結束了中國的專家生活之後便在加拿大尋求政治避難。因此，他未必會像許多蘇聯人那樣對同北京論戰抱有民族情緒。不過，他的著作的主題說明，他是如實地轉述了他的那些科學家同事們的看法。
【148】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139 頁。
【149】同上，第 140 頁。
【150】《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第 245 ～ 246、249 頁。另見《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文選》，第 82 頁。
【151】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第 140 頁。
【152】見《兩條路線鬥爭史》，載《農業機械技術》1968 年第 9 期，譯載於《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25 頁。《劉少奇生平大事》（1899-1967 年），見《當代背景》834 號，第 211 頁。
【153】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178 ～ 179 頁。
【154】《八・一三紅衛兵》，1967 年 4 月 7 日第 4 版，第 3 ～ 4 欄。
【155】《東方紅戰報》第 36 號（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3 版。
【156】《文革風雲》1967 年第 9 期，第 38 頁。據說，劉少奇在某一年的年初對一個外國代表團說，美國的目的不是戰爭，而是要佔領中間地帶，見《外事紅旗》1967 年 6 月 14 日第 2 版第 2 欄。
【157】《文革風雲》1967 年第 9 期，第 42 頁，該評論的落款日期為 7 月 30 日。
【158】《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84、113 ～ 114 頁。

【159】同上，第 337 頁。
【160】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13～114 頁。
【161】《中國百科年鑒》1981 年，第 563 頁。
【162】威廉·E·格里菲思：《1960 年 11 月莫斯科會議：初步的重組》，載《中國季刊》1962 年 7-9 月號，第 47 頁。
【163】鮑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蘇中關係》，第 186～187 頁。參加草案起草會議的各黨的情況，見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15 頁。
【164】《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84～85 頁。格里菲思：《1960 年 11 月莫斯科會議：初步的重組》（《中國季刊》1962 年 7-9 月號第 40 頁）。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16～117 頁。
【165】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20 頁。
【166】《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85 頁。
【167】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17 頁。
【168】格里菲思：《1960 年 11 月莫斯科會議：初步重組》（《中國季刊》1962 年 7-9 月號第 48 頁）。文章提到，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陶里亞蒂沒有出席會議是由於他小心翼翼，不願捲入這種「危機四伏的國際會議」。
【169】關於劉少奇夫人的妹夫張凡（音譯）叛國的詳細情況至今仍不很清楚。張凡是 1952 年同王光萍（音譯）結婚的，1955 年到蘇聯留學。1960 年他在那裏「背叛」了他的國家。到了 1962 年，儘管北京提出了正式抗議，蘇聯當局還是拒絕遣送張凡和其他中國留學生，理由是他們已經要求政治避難。見《從張凡的叛國立場看劉少奇的背叛嘴臉》，載《千鈞棒》1967 年 4 月第 2 期，譯載於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第 41 卷第 858 號第 78～82 頁。
【170】《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8 頁。據另一份材料說，首先是劉的兒子和其妻子在 1959 年分居了，這是中蘇關係緊張的直接結果，見《劉少奇生平大事記》，載《當代背景》834 號，第 19 頁。劉的這個兒子劉允斌是劉的前妻所生，她在 30 年代被殺害了。為了安全起見，允斌和他的弟弟、妹妹被送往蘇聯。1957 年回國時，他大約 32 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死。見劉愛琴：《女兒的懷念》一節對她哥哥的追述，該書第 18、24、66、92 頁。
【171】《吶喊戰報》1968 年 2 月號，譯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140 號，第 4～5 頁。劉允斌的弟弟劉允若未能完成學業就回國了，也許他日益增長的對蘇聯的感情被北京察覺了，因此決定召他回國，以免這位國家元首的兒子在兩個共產黨大國公開分裂時站到錯誤的方面去，而且，不管怎麼說允若也一直是他父親關切的對象。同上，見第 5～15 頁。另見《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27～138 頁；《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63～371 頁，劉本人在莫斯科留學時的情況，見該書第 83～89 頁。
【172】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157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376 號，第 27～32 頁；2377 號，第 38～40 頁。
【173】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18 頁。
【174】同上，第 119～121 頁。
【175】同上，第 122 頁。
【176】同上，第 118 頁。
【177】同上，第 123～124 頁。
【178】格里菲思：《1960 年 11 月莫斯科會議：初步的重組》，載《中國季刊》1962 年 7-9 月號，第 40 頁。
【179】同上，第 43～44 頁。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25～126 頁。
【180】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 126～127 頁。
【181】《徹底清算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中央統戰部『紅色聯絡站』和『東方紅公社』資料組」編，1967 年 2 月 4 日，第 7 頁。這份材料並不說明鄧的那番話是在兩次講話中的哪一次講的，只說明他在會議中講了什麼話。另一份材料則說，在 11 月 14 日的發言裏，鄧提倡在階級鬥爭

中搞人道主義，見《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摘編》，第16頁。

【182】《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338頁。書中不認為這段話是鄧講的，而認為是中共代表團的意見。但是從另一些地方引的鄧關於同一主題的一段言論（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128～129頁；格里菲思:《1960年11月莫斯科會議：初步的重組》，《中國季刊》1962年7-9月號，第44頁）與這段引文完全相同，證實了這段話確實出自鄧的發言。

【183】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年）》，第346～347頁，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128～129頁。這年9月末，陳毅對外國友人說，只有蘇聯能夠領導這個陣營，見《東方紅戰報》第39號（1967年6月15日）第3版。

【184】達林主編：《國際共產主義的多極化：文獻記錄，1961-1963年》，第841頁。在該書830頁上提到了索爾茲發言的日期。

【185】同上，第842頁。

【186】同上，第832頁。

【187】格里菲思：《1960年11月莫斯科會議：初步的重組》，見《中國季刊》1962年7-9月號，第46頁。

【188】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131～132頁。

【189】同上，第113頁。

【190】達林主編：《國際共產主義多極化：文獻記錄，1961-1963年》，第848～850頁。

【191】同上，第855頁。

【192】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133頁。

【193】同上，第128頁。

【194】同上，第132～133頁。

【195】同上，第133頁。

【196】這次大會的一位參加者告訴我，就在彭真對赫魯曉夫猛烈抨擊的時候，出現了一個令人發笑的插曲。彭真與赫魯曉夫面對面而坐。彭的翻譯，一位中國人用同樣激昂的語氣把彭的那篇檄文譯成俄語。於是，赫魯曉夫用不尋常的柔和語氣請求彭不要讓他的翻譯對著他（赫魯曉夫）大聲喊叫。

【197】見吳冷西的檢討，載《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8頁。

【198】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第134頁。其中說中國共產黨只得到阿爾巴尼亞、緬甸、馬來亞和澳大利亞黨的支持。吉廷斯在《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年》第146頁提到：「亞洲黨（除印度）都傾向中國方面，不過印度尼西亞、北朝鮮和北越代表團不同程度地表現了中立的立場，不過略有親華傾向。」

【199】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174頁。

【200】見本書第1卷第4章，該章論述了蘇共二十大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關於1957年毛在莫斯科的讓步，見該書第1章。

【201】中國承認他們已被迫接受這些觀點，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87～88頁。

【202】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202頁。

【203】《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4期，第78頁。

【204】《當代背景》34號，第19頁。

【205】中國方面在聲明的最後修正本中所說的「勝利」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86～87頁。關於外界對（共產黨陣營的）平衡在莫斯科被打破一事的評論，見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174～176頁（上述聲明本身也被收錄在該書第177～205頁中），格里菲思:《1960年11月莫斯科會議》，第54～56頁，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年）》，第343～369頁，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年》，第145～146頁。

【206】表現中蘇友誼的照片共 6 頁曾在中國雜誌《人民畫報》1961 年第 1 期上刊登，並在《中國季刊》1961 年 1-3 月號轉載。照片上有赫魯曉夫、科佐羅夫、蘇斯洛夫、米高揚、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人。
【207】《東方紅戰報》第 37 號（1967 年 6 月 15 日）第 3 版，第 41 號第 4 版。這些引文的第二段認為，陳毅講話的時間應當是 8 月 4 日，而不是 12 月 14 日。除非在這一前一後的日期中召開過兩次完全相同的會議，是後者的可能性才比較大。
【208】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從赫魯曉夫到柯西金》，第 105 頁。
【209】《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2 卷第 4 期，第 78 ～ 79 頁。
【210】見將要出版的本書第 3 卷。
【211】《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415 ～ 480 頁。

第十二章 大躍進的終止

【1】 《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238 頁。
【2】 例如《鞍鋼憲法》，見吳冷西的材料，《中國法律和政府》第 2 卷，第 4 號，第 77 ～ 78 頁。
【3】 見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第 154 ～ 164 頁。
【4】 彭德懷和張聞天因為受到批鬥，在政治局裏已經徒有其名。除他們之外，政治局還有 24 名正式及候補成員。
【5】 見毛在九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 2 卷，第 238 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轉載於《中國建設》，1967 年 11 月號第 8 頁；《看陶鑄的醜惡面目》，見《紅衛報》第 3 期（1967 年 1 月 22 日）；《陶鑄對高級知識分子的講話》，見《貴陽八・三一》1968 年 2-3 月。
【6】 《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82 ～ 183 頁。關於劉少奇的病痛，使他不得不服用安眠藥片入睡，見上書第 214、247 ～ 251 頁。劉是中央高級領導中第一位視察海南的人，同上書，第 239 ～ 240 頁。1959 年周恩來也病了，在醫院養病，見《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第 520 頁。
【7】 《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82 頁。毛對蘇聯這篇文章的看法，見該書第 295 ～ 298 頁。
【8】 《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82 ～ 183 頁；薛暮橋：《懷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劉少奇同志》，載《紅旗》1980 年第 10 期，第 9 頁；《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75 頁。
【9】 聯合研究院：《中國共產黨名人錄》第 2 卷，第 676 頁。
【10】 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第 372 頁。1960 年 12 月，薛暮橋重新就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同時免去國家經委副主任職務；同上。
【11】 李卓敏：《中國的工業發展，1958-1963 年》，《中國季刊》1964 年 1-3 月號，第 36 頁。
【12】 見本書本卷，第 218 頁。
【13】 見《徹底拔掉經濟界的黑旗——薛暮橋》，載《進軍報》1967 年 3 月 11 日，文化大革命版本。毛去世後對薛的經歷的說明，見邱健：《一位經濟學家的治學之路——記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載 1981 年 2 月 12 日《光明日報》。薛的觀點和陳雲的觀點的比較，見多羅西・丁・索林格：《中國通過打破舊格局實現經濟改革：右派的思想來自何處?》，載《亞洲概覽》1981 年 9 月號，第 947 ～ 960 頁。
【14】 支持這一假定的是如下事實：薛離開中國統計局看來不是為了更多地安排順從的統計員而進行大規模人事調整的結果。薛由他的一位副手賈启允接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批判。見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1 卷，第 130 頁。

【15】《深挖三十年代的經濟黑線及其後台老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載 1967 年 6 月 15 日《衛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6 號，第 27 頁。
【16】《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83 頁。這個日期不準確，可能是由於劉在 1959 年 11 月間的活動不清楚。據報道，13 日那天他在上海，見 1980 年 5 月 17 日《解放日報》，第 2 版。如果這個消息是準確的話，劉去海南大約就是在此之後。看來他不會僅僅為了視察一個工廠，就中斷休假，遠途北上上海。劉從 10 月 26 日起到 12 月 10 日一直沒有公開露面。
【17】《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75 頁。
【18】《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47～249 頁。劉被說服為他的病痛作特別鍛煉，同上，第 250～251 頁。他還要求每週看一次牙，給他治療的是他的保健醫生，同上，第 248 頁。
【19】《劉少奇同志永垂不朽》，第 30 頁。
【20】《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08～209 頁。
【21】同上，第 183 頁。
【22】《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233 頁。
【23】《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206 號，第 27 頁。
【24】宮曉集：《管理經濟必須尊重客觀規律》，載《經濟管理》1980 年第 4 期，第 7～8 頁。
【25】孫冶方：《重視理論，發揚民主，尊重科學》，載《經濟研究》1980 年第 4 期，第 7～8 頁。
【26】見本書本卷，第 180 頁。
【27】《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集，第 62～63 頁。
【28】毛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評論，注有不同的日期。在《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版上是 1960 年，見第 167 頁；而在 1969 年版上是 1961-1962 年，見第 319 頁。在這些版本裏有幾處提法說明，1960 年應當是評論完成的時間。以下幾段節自這些版本的英譯本，毛澤東：《蘇聯經濟學評論》，在第 52 頁，提到上海解放十年了，即 1949-1959 年；在第 77 頁，毛說，我們提出工農業並舉，到現在已經 4 年了，這一定是指從其《論十大關係》講話算起的 4 年，即 1956-1959 年；在同一頁上，將 1959 年和「今年」支援農業的鋼材總數作了比較，「今年」這個詞無疑是指 1960 年；在 90 頁，提到「這兩年的年終躍進獎」，顯然是指 1958 年和 1959 年；在 91 頁，毛談到鐵的生產情況「拿 1959 年來說」，這是他所瞭解的生產數字的最後一年；在 99 頁，毛在提到資金積累率時，又同樣引用了 1959 年這個大躍進最後一年的數字；在 122 頁，毛談到，這兩年我們做到 3 個「大試驗」，顯然是指大躍進的 1958-1959 年。

此外，還有一些提法又表明評論完成於 1960 年之前，寫作的開始時間應在 1959 年底。在 35 頁，毛說「1960 年將是生產大發展的一年」；在 88 頁，他提到「去年大辦鋼鐵」，這個「去年」肯定是指 1958 年；在 96 頁，他談到河南省「1959 年和 1960 年以後的計劃」，這表明說這番話時 1959 年還沒有結束；在 117 頁，他說「從 1960 年起，十三年中還要緊張地勞動」(即五年計劃的最後 3 年，1960-1962 年，以及後兩個五年計劃)，這表明他是在 1960 年以前，至少也是 1960 年剛剛來臨時說的。

最後，很難想像，在毛寫作評論的時候，如果蘇聯專家已經開始撤離，毛還會通篇以樂觀態度來談論中國工業發展的前景，也不可能在評論中沒有提起這一事件。根據這些情況，他的評論肯定應當完成於 1960 年 7 月中旬之前，或者更早一些。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中譯本出版於 1959 年 1 月，見李雲的評論文章，《紅旗》1959 年第 15 期，第 36～41 頁。載《中國大陸雜誌選》183 號，第 13～19 頁。
【29】例見毛澤東：《對蘇聯經濟學的評論》，第 37、28～39、40～42、48～50、105 頁。

【30】 同上，第 122 頁。又見第 48、90、94 ～ 95、97 ～ 98、100 ～ 101、107 頁。
【31】 同上，第 55 ～ 56、57 ～ 58 頁。
【32】 同上，第 80 頁。
【33】 同上，第 81 ～ 82 頁。
【34】 同上，第 126 頁。
【35】 同上，第 52 ～ 53 頁。
【36】 同上，第 87 頁。
【37】 同上，第 119 頁。
【38】 同上，第 93 ～ 94 頁。
【39】 同上，第 95 ～ 96 頁；又見第 79 頁。
【40】 同上，第 79 頁。
【41】 同上，第 112 頁；又見第 67、70、82 ～ 86、98 ～ 99 頁。
【42】 同上，第 75 頁。
【43】 參見同上，又見《毛澤東思想雜集》第 1 卷，第 172 頁。
【44】 毛：《對蘇聯經濟學的評論》，第 51、55、66 頁。
【45】 同上，第 88 頁。
【46】 同上，第 97 ～ 99 頁。
【47】 同上，第 102 ～ 104 頁。
【48】 同上，第 126 ～ 127 頁。
【49】 馬寅初：《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載《新建設》第 11 號，1959 年 12 月 7 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95 號，第 43 頁。馬的文章的最後一段所說的「一位好朋友」，根據當時的情況，很可能是指周恩來。又見馬寅初《重申我的請求》，載《新建設》第 1 號（1960 年 1 月 7 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摘要》，201 號，第 15 頁。
【50】 見不同文章的英譯文，《中國大陸雜誌摘要》201 號，第 1 ～ 10、16 ～ 19 頁；同前書，208 號，第 1 ～ 14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213 號，第 24 ～ 36 頁；同前書，214 號，第 1 ～ 10 號。
【51】 馬的北京大學校長職務任期十年，到 1960 年 3 月 28 日結束，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244 號，第 1 頁。又見《新華月報》1979 年 9 月號，第 71 頁。
【52】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252 頁；同前（1969 年），第 319 頁
【53】 《當代背景》891 號，第 32 ～ 33 頁。
【54】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171 頁。
【55】 譚震林：《關於實現我國農業機械化的若干問題》，載《紅旗》1960 年第 6 期，第 3 頁。
【56】 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1 卷，第 77 頁。在 1955 年合作化運動中陳正人對毛的重要性，見本書第 1 卷，第 18 頁。
【57】 薄一波：《為加速實現農業技術改造的偉大任務而奮鬥》，載《紅旗》1959 年第 20 期，第 24 ～ 25 頁。據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說，薄認為毛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的說法是「不完全的」，見《徹底清算中國的赫魯曉夫在農業機械化方面的滔天罪行》，載《農業機械技術》第 5 期（1967 年 8 月 8 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10 號，第 18 頁。然而，在薄的這篇文章裏沒有任何反毛的跡象；而且毛也認為，沒有他提出的「八字憲法」，機械化就是不完全的。
【58】 見本書本卷，第 149 頁；許辛學：《又是大躍進的高速度，又是有計劃的按比例》，載《紅旗》1960 年第 3 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摘要》203 號，第 2 頁。
【59】 譚震林：《關於實現我國農業機械化的若干問題》，載《紅旗》1960 年第 6 期，第 4 頁。
【60】 同上，第 3 頁。
【61】 陳正人：《加速農業的技術改造》，載《紅旗》1960 年第 4 期，第 6 頁。

【62】 李富春：《迎接一九六零年的新躍進》，載 1960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72 號，第 2 ～ 11 頁。「右傾機會主義」一詞在 1960 年多數中央及各省領導人的文章裏已經很少見了。李富春等代之以「右傾」這個詞，同上，第 2 頁。他在 1960 年全國人代會的報告裏，回顧 1959 年的情況時提到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隨後沒有再提，見《當代背景》615 號，第 7 頁。
【63】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72 號，第 7 ～ 8 頁。
【64】 同上書，第 6 ～ 7 頁。
【65】 同上書，第 2 ～ 3 頁。1960 年 3 月 31 日《人民日報》(《當代背景》615 號，第 39 頁)，據報道，對第二個五年計劃後 3 年的補充計劃正在準備之中，但是沒有提出。1959 年計劃執行情況公報，發表於 1960 年 1 月 21 日。
【66】 見本書第 1 卷，第 124 頁。
【67】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72 號，第 3 頁。
【68】 同上書，第 10 ～ 11 頁。
【69】 英譯文見許芥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第 515 頁。
【70】 同上書，第 513 頁。
【71】 吳芝圃：《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載《紅旗》1960 年第 1 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97 號，第 1 頁。
【72】 同上，第 3 頁。
【73】 據劉少奇說，「人民公社是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引自吉群義的文章，《紅旗》1960 年第 5 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摘要》210 號，第 19 頁。這兩個數字可能是不可比的，因為吳的百分比不會包括自留地的收入，而吉的統計數字卻很可能包括。不過，這種比較依然是適當的，因為來自自留地的收入很快就被擠掉了，這是廬山會議以後普遍出現的現象。
【74】 吳芝圃：《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載《紅旗》1960 年第 1 期，《中國大陸雜誌摘要》197 號，第 5 頁。
【75】 王汶石（音譯）：《生產隊的新領導》，英譯文見許芥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第 481 頁。
【76】 《劉建勳的罪惡事實——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反革命兩面派》，1967 年 3 月 12 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32 號，第 16 頁。文化大革命中，吳芝圃和劉建勳都斷然否認是走資派。
【77】 《少奇同志，河南人民懷念你》，載 1980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報》第 2 版；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55 頁。
【78】 1980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報》，第 2 版。
【79】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200 號，第 9 頁。
【80】 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159 頁。
【81】 《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第 3 集，第 85 頁；《人民的好總理》第 2 輯，第 442 頁。
【82】 《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202 頁。
【83】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惡史——從解放後天津之行看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真面目》，載《八·一三紅衛兵》1967 年 5 月 13 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588 號，第 19 頁。
【84】 《紅旗飄飄》第 20 輯，第 196 ～ 197 頁。劉少奇在 1960 年上半年視察了幾個省份。文革期間有人說他生活腐敗（《中國大陸雜誌選》，第 19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 22 號，第 23 頁）。這類指責都是捏造的，以敗壞他生活樸素的聲譽。當然，一種情況是會有的：地方負責人為了表示對來賓的重視而設宴洗塵，而劉也覺得很難簡單地拒絕出席這類宴會。劉視察的部分情況，見「劉（少奇）和王（光美）視察張家口」，1967 年 5 月 15 日《斗批改》，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 22 號，第 23 頁（山西，4 月）；《少奇同志，河南人懷念您》，載 1980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報》(河南，4 月)；《劉少奇、鄧小平、李井泉在成都工具廠的罪行》，載 1967 年 7 月 25 日《二七戰報》(四

川，5 月)；《少奇同志，上海工人懷念您》，載 1980 年 5 月 17 日《解放日報》(上海，5 月)。

【85】 見李富春在全國人代會上的講話，《當代背景》615 號，第 14 頁。

【86】 見新版本，譚震林對它的說明，及《人民日報》後來發表的社論，《當代背景》616 號。

【87】 D. E. T. 盧亞德：《城市公社》，見《中國季刊》1960 年 7-9 月號，第 74 ～ 79 頁。

【88】 引自《紅旗——一個城市人民公社》，載《中國建設》1960 年 7 月號，又載《中國大陸雜誌選》218 號，第 35 頁。這篇文章充分表明宣傳鼓動者們企圖在城市重新造成在 1958 年盛夏時農村曾經出現的那種氣氛。

【89】 1967 年 7 月 21 日《遼聯戰報》，第 3 版；《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230 頁。

【90】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1 卷，第 4 期，第 69 頁。

【91】 《對薄一波的四十個質問》，載 1967 年 2 月 22 日《紅衛兵報》，英譯文見《當代背景》878 號，第 16 頁；我曾修改過這個譯文。

【92】 《打倒「三反」分子、大叛徒薄一波，揭發他在工交戰線的嚴重問題!》，載 1967 年 2 月 15 日《東方紅》，英譯文見《當代背景》878 號，第 7 頁。這些紅衛兵攻擊薄的目的，是把 1960 年冒進造成的經濟衰退的責任從毛澤東身上轉嫁到薄一波身上。但無容置疑的是，薄刻意緊跟廬山會議之後的風向——為求自保。

【93】 見在全國人代會上他的發言，英譯本見《當代背景》618 號，第 12 ～ 15 頁。

【94】 同上，第 16 ～ 18 頁。

【95】 同上，第 17 頁。王鶴壽在鋼的問題上繼續「左傾」，使他本人也身受其害。這次講話以後，他就很少露面（科林、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

【96】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249 頁；《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230 頁，這裏蘇聯鋼鐵工廠被錯誤地冠之以「馬克思」，而不是本來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

【97】 《中國新聞界聲討修正主義經濟路線》，見新華社，1967 年 8 月 25 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12 號，第 17 頁；《砸爛修正主義的黑綱領「工業七十條」》，載 1967 年 6 月 28 日《郵電戰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210 號，第 27 頁。

【98】 毛講話的準確日期見《北京週報》1970 年第 16 期，第 3 頁。

【99】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 第 249 頁。

【100】 毛：《對蘇聯經濟的評論》，第 124 頁。

【101】 例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7 號，第 27 ～ 31 頁。據說地質部並不重視該憲法，該部黨組書記說：「這是鞍山鋼鐵公司的事，跟我們的地質隊毫無關係。」不過，估計這更反映了該部缺少工廠，而不是這位黨委書記的修正主義。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何長工的七條罪狀》，載 1967 年 5 月 11 日《科技紅旗》，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186 號，第 27 頁。

【102】 《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 2 卷，第 4 號，第 77 頁。這次會議是關於機械工業的專門會議，見注 106。

【103】 陶鑄：《關於領導廠礦企業的幾個問題》，載《紅旗》1960 年第 12 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18 號，第 7 ～ 12 頁。

【104】 陳守中：《包頭鋼鐵公司的多種經營》，載《紅旗》1960 年第 17 期，第 34 ～ 35 頁。

【105】 《我們永遠懷念周總理》，第 13 ～ 14 頁。

【106】 一些材料反映了這次會議的特徵，例如可見《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6 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黑話錄》，1967 年 4 月 16 日《進軍報》，英譯文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889 號，第 60 頁。我盡可能找到劉講話的日期，只有後一個材料標出了這個日期。我估計，這次會議就是 6

月召開的鄧小平和吳冷西在會上討論《鞍鋼憲法》的上海會議，因為這次會議也同工業管理有關。很可能是研究外交工作的5月上海會議（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年》，第159頁）一直開到6月，一些與會者決定召開一次關於工業問題的現場會議，因為他們正好是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現場會議即在工廠、公社或其他組織召開的會議，這個單位取得了成績或出了某種事故，在那裏展開討論以便為其他單位提供經驗或教訓）。

【107】《必須清算譚震林破壞農業機械化的罪行》，載《農業機械技術》1958年第6期，英譯本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24號，第6頁；《揭露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大陰謀》，載1967年4月29日《文匯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87號，第7頁。1963年，劉似乎再次提出托拉斯問題，並在1964年開始進行試驗。

【108】《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36頁。

【109】陳守中引用了毛關於「綜合性的聯合企業」的指示，見《紅旗》1960年第17期，第31頁。

【110】同上，第31頁。

【111】《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87號，第8～10頁。

【112】本書第1卷，第19～25頁。

【113】見《劉少奇在人民商業中心推行對資改造的投降主義路線的罪行》，1967年6月，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19號，第50、52頁。在50頁，有兩處提到毛。第一處，提到毛主席對處理資本家的指示。第二處說，「他們恣意歪曲毛主席的偉大指示，在處理同資本家的關係時，只講『寬』不談『嚴』……」（引文中的「他們」指的是按劉的意見行事的天津負責幹部）。這段話無意中透露了毛也說過「寬」。而且在中共和資本家的關係上劉也並不是沒有談到存在的問題。第二段話引自中共天津市委準備的關於處理資本家的報告。這個報告有這樣一段話：「聽了李經理指導性的發言，王經理的新設想，以及黨和主席的意見，工商界人士都感到無限高興。」（著重號是我加的）這裏再次提到主席，即毛，這是關鍵。要是他對這項方針表示反對，或是保持緘默，這些天津資本家的歡樂就是有限的了！

【114】見本書第1卷，第3編和第4編，特別是第285、289頁。

【115】李維漢:《劉少奇同志對統戰工作的指導》，載1980年5月10日《人民日報》，英譯文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75卷，872號，第43頁。

【116】《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086號，第1～2頁。

【117】同上書，2100號，第1～2頁。主題的唯一不同是另加特赦罪犯的論述，以慶祝革命勝利十週年。

【118】《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4集，第62～63頁。

【119】見《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年），第1卷，第229頁；《高教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載《教學批判》1967年第2期，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18號，第16頁。

【120】見新華社報道，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213號，第1頁。

【121】李維漢：《劉少奇同志對統一戰線工作的指導》，載1980年5月10日《人民日報》。

【122】同上。

【123】1967年4月21日《八・八戰報》，第8版。這個材料標明政治局會議召開於1月。也許有一個1月份開始的會議延期至2月，也可能是這個材料有錯誤。

【124】李維漢:《劉少奇同志對統戰工作的指導》，載1980年5月10日《人民日報》。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次接見的日期據說是2月2日，有時又說是2月20日。這次講話的文本見《劉少奇選集》第4集，第71～74頁；《劉少奇資料彙編》第1集，第114～118頁。

【125】李維漢:《劉少奇同志對統戰工作的指導》，載1980年5月10日《人民日報》。

【126】見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第197～200頁。

【127】《劉少奇選集》第4集，第71頁。

【128】同上。
【129】同上，第 72 頁。
【130】同上，第 72、74 頁。
【131】同上，第 72～73 頁。幾天前，劉在同王光美的哥哥一家談話時，闡明了相同的方針；見《劉少奇資料彙編》第 1 集，第 110～111 頁。這無疑是劉個人哲學的一個基本信條，以劉對個人經歷的總結為依據。見本書第 1 卷，第 5～6 頁。
【132】1967 年 4 月 21 日《八・八戰報》，第 4 版。
【133】《劉少奇資料彙編》第 1 集，第 111 頁。
【134】見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工作計劃，《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213 號，第 4～12 頁；在天津的活動，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19 號，第 47～59 頁。
【135】《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213 號，第 3 頁。
【136】《過去十七年教育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載 1967 年 5 月 6 日《教育革命》，英譯文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932 號，第 31 頁。
【137】《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言論》，北京：首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聯合委員會，1967 年 5 月，第 17 頁。
【138】同上，第 21 頁。
【139】同上，第 20 頁。
【140】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932 號，第 32 頁。
【141】《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言論》，第 21 頁。
【142】羅伯特・D・巴林德森在《1960 年的教育改革》一文裏提供了進一步的論述，見《中國季刊》1960 年 10-12 月號，第 55～56 頁。
【143】引自同上，第 60 頁。
【144】引自同上，第 59 頁。
【145】同上，第 56 頁。
【146】《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6 頁。
【147】《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言論》，第 20 頁。
【148】巴林德森：《1960 年的教育改革》，載《中國季刊》1960 年 10-12 月號，第 58 頁。陸定一和楊秀峰在 1960 年全國人代會上的發言，英譯文見《當代背景》623 號，第 1～19 頁。
【149】1966 年 8 月 16 日《中國青年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772 號，第 11～12 頁。
【150】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130～131 頁。
【151】同上書，第 138 頁。
【152】1967 年 6 月 20 日《全無敵》，第 2 版。
【153】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 153 頁。
【154】同上書，第 135 頁。
【155】同上書，第 157～158 頁。
【156】同上書，第 176 頁。
【157】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932 號，第 26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18 號，第 16 頁。
【158】本書第 1 卷，第 100～101、105 頁。
【159】《他們多麼惡毒》，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 號，第 3 頁；又見 1967 年 3 月 26 日《進軍報》，第 4 版。
【160】《胡耀邦反毛澤東思想罪行錄》，載 1967 年 6 月 1 日《青年戰線》，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94 號，第 30 頁。
【161】《劉少奇在文化藝術方面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載 1967 年 5 月 10 日《紅色宣傳兵》，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5 號，第 34 頁。
【162】1967 年 6 月 26 日《全無敵》，第 2 版。
【163】1967 年 8 月 5 日《批譚戰報》，第 2 版。

【164】莊家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載 1966 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707 號，第 6～9 頁。
【165】1967 年 6 月 14 日《外事紅旗》，第 4 版。
【166】《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1967 年 6 月 10 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文選》639 號，第 1～2 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摘編》1967 年 5 月，第 4 頁；《清算以彭真為首的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載 1967 年 4 月 20 日《井岡山》、《進軍報》，英譯文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41 卷，858 號，第 94 頁。又見 1967 年 4 月 22 日《新北大》，第 4 版；1967 年 5 月 27 日《北京工人》，第 4 版；1967 年 6 月 10 日《北京》，第 8 版。
【167】《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言論》，第 2、3 頁。
【168】楊獻珍：《黨校建設的鼓舞者和指導者——懷念少奇同志》，載《紅旗》1980 年第 7 期，第 21 頁。這篇文章沒有點康生的名，只是代之以「理論權威」的稱呼，因為他還沒有被公開否定。
【169】同上，第 22 頁。又見《紅旗》1980 年第 18 期，第 23 頁。
【170】《三反分子劉少奇罪惡史》，第 37 頁。1959 年 12 月，楊獻珍作自我批評時，說到他的錯誤意見基本上是從彭真及其他人那裏聽來的；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39 號，第 9 頁。康生 1958 年的講話，見《四十年來關於毛澤東思想的一些提法》，載《紅旗》1981 年第 2 期，英譯文見《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030》第 L13 頁。
【171】見 1967 年 6 月 15 日《東方紅戰報》，第 5 版;1967 年 5 月 22 日《科技戰報》，第 6 版;《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33 號，第 8 頁，注 34;《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 18 號，第 16 頁。
【172】《反革命兩面派趙易亞的滔天罪行》，載 1967 年 9 月 21 日《新人大》，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21 號，第 31 頁。「三八作風」，見吉庭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 102 頁。
【173】見他在全國民兵工作會議閉幕式的講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252 號，第 16～18 頁。
【174】《中國大陸雜誌選》602 號，第 8 頁。
【175】新華社，1960 年 10 月 8 日，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358 號，第 1～3 頁。
【176】《徹底清算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第 2 頁。
【177】《陸定一個人簡歷》，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 27 號，第 45 頁。文化大革命中，廣泛流傳一種奇怪的說法，陸定一的夫人曾給林彪家寫過匿名信。這個說法的可靠性和它的政治影響難以估定。見《揭發清算陸定一和他的夫人——反革命分子嚴慰冰折磨林彪同志和他的家庭的反革命罪行》，載 1967 年 1 月 18 日《戰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卷)165 號，第 12 頁。
【178】這篇文章被譯成英文，見《北京週報》1960 年第 41 期，第 6—15 頁。
【179】同上，第 15 頁。
【180】有關《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的這些文章，英譯文見《當代背景》643 號，641 頁。正式版本見 1960 年 8 月 14 日李維漢對民主黨派的講話，英譯文見《當代背景》639 號，第 9～21 頁。
【181】《大比武是羅瑞卿篡軍反黨陰謀的大暴露》，載 1967 年 8 月 28 日《人民日報》，英譯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22 號，第 2 頁。
【182】新華社的報道見 1960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報》，轉載於《人民手冊》(1961) 第 273 頁。
【183】顧卓新等:《李富春同志對經濟計劃工作的重大貢獻》，載 1980 年 5 月 22 日《人民日報》。
【184】《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第 19 頁。
【185】1967 年 5 月 26 日《北京公社》，第 3 版。
【186】1967 年 7 月 12 日《遼聯戰報》，第 4 版。

【187】《人民的好總理》第 3 輯，第 19 頁;《經濟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6—7 頁；《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詩文選》，第 70 頁。
【188】《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232 頁。
【189】見難民報告《聯合研究院院刊》第 28 卷，第 198 ～ 200 頁。
【190】《關於譚震林問題的初步綜合材料》，1967 年 4 月 6 日，第 8 頁。
【191】林田 :《關於人民公社體制問題的探討》，載《經濟管理》1981 年第 1 期，英譯文見《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048》，第 L20 ～ 21 頁。
【192】這個指示從未公佈過，但已傳入香港和台灣，例見《聯合研究院院刊》第 28 卷，第 200 ～ 201 頁。林田 :《關於人民公社體制問題的探討》，似乎確信這十二條指示將「小隊」定為基本核算單位，不過這並非事實。

結語

【1】 「這是世界毀滅的方式，不是一片喜慶，而是一片哀怨。」見 T.S. 埃利奧特 :《空虛的人們》。
【2】 《本季度大事與文獻》，載《中國季刊》1961 年 4-6 月號，第 183 頁。
【3】 《當代背景》644 號，第 1 頁。
【4】 楊堅白、李學曾 :《論我國農輕重關係的歷史經驗》，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3 期。(譯按 : 此處原期號、頁碼均有誤。頁碼略去，下同。)
【5】 劉國光、王向明 :《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比例關係問題的探討》，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4 期，第 23 頁。
【6】 楊堅白、李學曾 :《論我國農輕重關係的歷史經驗》，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3 期。
【7】 《經濟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4 頁。
【8】 劉國光、王向明 :《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比例關係問題的探討》，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4 期，第 26 頁。
【9】 駱耕漠 :《關於我國計劃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曲折過程的分析》，載《經濟研究》1981 年第 2 期，英譯文見聯合出版研究中心檔案（華盛頓），77 卷，793 號，第 9 頁（我對句法作了改動)。
【10】 馮寶興、萬欣、張大簡:《在一定時期內優先發展輕工業的客觀必然性》，載《經濟研究》1980 年第 1 期，第 20 頁。
【11】 劉國光、王向明 :《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比例關係問題的探討》，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4 期，第 29 頁。
【12】 楊堅白、李學曾 :《論我國農輕重關係的歷史經驗》，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3 期。
【13】 這些數字是根據同上第 195、196 頁上的數字合計的。(譯按: 此處頁碼有誤。)
【14】 同上，第 196 頁 ; 駱耕漠 :《關於我國計劃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曲折過程的分析》，載《經濟研究》1981 年第 2 期，第 7 頁。
【15】 駱耕漠 :《關於我國計劃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曲折過程的分析》，載《經濟研究》1981 年第 2 期。
【16】 輯自 K.R. 沃克 :《中國糧食生產戰略 : 評趙岡的研究論文》，載《中國季刊》1980 年 4-6 月號，第 342 ～ 343 頁 ; 趙岡 :《中國觀察家的嘗試》，載《中國季刊》1980 年 1-3 月號，第 102 頁 ;《中國農業年鑒》1980 年，第 34 頁。又見薛暮橋 :《當前我國經濟的若干問題》，第 14 頁。
【17】 《經濟研究》1980 年第 1 期，第 24 ～ 25 頁。
【18】 楊堅白、李學曾 :《論我國農輕重關係的歷史經驗》，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3 期。
【19】 同上，第 207 頁。
【20】 下面的話引自陳吉士 :《中國紅軍的政治鬥爭》，第 13 頁。戰士們也許會得到錯誤的信息，但是在對危機的政治影響作估計時，他們的直覺和事實情況相去不遠。

【21】《中國大陸雜誌選》578 號，第 28 頁。
【22】《經濟管理》1981 年第 2 期，第 3 頁；《人口理論概述》（河南，1981 年），第 83 頁；我非常感謝艾爾德提供的對人口下降情況的估計。
【23】薛暮橋:《在第一次中日經濟理論交流會上的講話》，英譯文見《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123》，第 K5 頁。
【24】孫冶方的講話，英譯文見《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143》第 K12 頁。
【25】駱耕漠：《關於我國計劃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曲折過程的分析》，載《經濟研究》1981 年第 2 期。
【26】陳吉士：《中國紅軍的政治鬥爭》，第 459 頁。
【27】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的六十週年》，載《紅旗》1981 年第 13 期，英譯文見《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145》，第 K34 頁。
【28】估計的損失，見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25 頁；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資金投資額，見《北京週報》1959 年第 16 期，第 28 頁；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比較，見《經濟研究》1980 年第 1 期，第 24～25 頁。
【29】《北京週報》第 27 期，第 19 頁。
【30】譚震林:《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乘勝前進——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載《紅旗》1981 年第 13 期，英譯文見《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147》，第 K15 頁。
【31】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六十週年》，載《紅旗》1981 年第 13 期。
【32】《北京週報》第 27 期，第 19 頁。
【33】駱耕漠：《關於我國計劃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曲折過程的分析》，載《經濟研究》1981 年第 2 期。
【34】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六十週年》，載《紅旗》1981 年第 13 期。
【35】楊堅白、李學曾：《論我國農輕重關係的歷史經驗》，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 3 期。
【36】《新華月報》（文摘版）1980 年 2 號，第 66～69 頁。
【37】見回憶賈拓夫的文章，他在 1956 年是輕工業部長。見《新華月報》1980 年 7 號，第 60 頁。
【38】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76～77 頁。
【39】駱耕漠：《關於我國計劃經濟的形成及其發展的曲折過程的分析》，載《經濟研究》1981 年第 2 期。
【40】他們沒有留下姓名。
【41】這一點在毛：《對蘇聯經濟學的評論》，第 121～122、124 頁裏有所暗示。
【42】見理查德 .H. 所羅門：《毛的革命和中國政治文化》。
【43】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六十週年》，載《紅旗》1981 年第 13 期。
【44】同上。
【45】《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 卷，第 231 頁。
【46】見本書第 1 卷，第 270～292 頁。
【47】薄一波:《崇敬和懷念——獻給黨誕生六十週年》，載《紅旗》1981 年第 13 期。

關於書目的說明

我在本書第一卷的「對書目和方法的說明」中指出，本卷的基本的原始資料由兩類組成：當時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中國人對事件的觀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資料，其主要目的是醜化被罷官的領導人的形象，因此使用起來要特別當心。

自從毛去世以及 1976 年秋「四人幫」倒台以來，又出現了第三種類型的資料，即否定文化大革命、還原被文化大革命鼓吹者們歪曲了的記載的資料。這類資料也有偏頗，但是在下面要提到的種種條件的限制下，看來沒有出現像紅衛兵小報那樣失實的內容。這類資料有多種形式。最早的形式是高度神化了的主要是回憶毛和周恩來的文集。即使是這些資料也包含著重要的見解和有價值的內容。

1978 年 12 月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後，鄧小平成為後毛澤東時代領導層裏的主要人物。這時期再版了更豐富、更有價值的材料。人們開始作出更加堅定更加徹底的努力，為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公正迫害的黨的幹部恢復名譽。鑒於一些幹部現已故去，便採取了文章或文集的形式，雖然這些文章或文集再次出現了神化的傾向。但提供了比早些時候有關毛和周的書中更多的信息。在有的書裏，披露了迄今為止鮮為人知的講話和文章。某些內容只限於國內流傳，不過副本最後還是傳到了西方。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學家解放了思想，著手極其詳細地清算過去的錯誤，他們的分析大多涉及大躍進。因此，當你要瞭解一本近幾年在中國出版的書有多少價值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轉過書的背面，看一看它是否出版於 1978 年 12 月以後。

估價文化大革命後材料的政治份量的另一個重要日期是 1980 年 5 月，在這個月，劉少奇終於恢復了名譽。在此之前，在為其他領導人恢復名譽的書裏還有可能提到劉少奇，對其形象的醜化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相類似。1980 年 5 月以後，原則上有可能將所有的材料重新翻案。下一個階段將要等到有可能公開發表涉及像林彪那樣的文化大革命的鼓吹者的資料；對他們就像現在對毛澤東的評價一樣：他們對革命有過很大貢獻，但也犯過很大錯誤。還有，重要會議的官方記錄也還沒有公開。

這些新資料能起什麼作用呢？對任何一個全盤接受文化大革命期間提供的歷史資料的人來說，這些資料顯然具有顛覆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文化大革命的鼓吹者勾畫出來的非曲即直、非黑即白的簡單化形象恢復其本來面目。這種對人物的簡單刻畫，甚至被那些本來對受害者懷有同情的人所接受。在本書第一卷的導言裏，我斷定在 1956—1965 年這一時期，中國領導層的相互關係是錯綜複雜的。這些新資料將使這種複雜性更加突出，但是有助於對這種複雜性的描述。

書目

編註：由於外文人名及地名的漢語譯文在華語界無法統一和規範化，使用參考書目時請參照英文原文。

A

安炳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西雅圖：華盛頓大學，1976 年。

《美國外交政策：當代文獻，1958 年》華盛頓：國務院，1962 年。

斯特芬·安多爾斯：《中國的工業革命：政策，計劃及管理，1949 年至當代》倫敦：馬丁、羅伯遜公司，1977 年。

B

鮑大可：《共產黨中國的幹部、政府機構和政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7 年。

大衛·波拿維亞：《中國人》紐約：里賓科特和克羅維爾公司，1980 年。

包華德：《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第 1 ～ 4 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7-1971 年。

O·B·鮑里索夫和 B·J·科洛斯科夫：《蘇中關係，1945-1970 年》布魯明頓：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75 年。

澤畢戈紐·K·布熱津斯基：《蘇聯集團：團結與分裂》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增訂版，1967 年。

C

S·錢德拉—塞卡爾：《今日共產黨中國》倫敦：亞洲出版社，1961 年。

張旭成：《中國的政權和政策》大學公園：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出版社，1975。

張萬山（音譯）：《共產黨中國的國務院：結構和功能分析，1954-1965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趙岡：《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1970 年。

陳志讓：《毛和中國革命》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5 年。

陳志讓主編：《毛論文集：文選及書目》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70 年。

《陳毅詩詞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

陳雲（主要資料來源）：《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年。

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年。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要地》紐約：普拉格公司，1963 年。

秦成林（音）：《毛岸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中國共產黨人物辭典》台北：國際關係學院，1970 年。

周恩來（主要資料來源）：《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
《崢嶸歲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 年。
周恩來：《關於文藝工作的三篇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
《周恩來總理八十誕辰紀念詩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

《周總理的故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 年。
《人民的好總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人民的好總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2 輯），1979 年（第 3 輯）。
《我們永遠懷念周恩來總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 年。

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3 年。

《朱德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北京：「首都徹底批判朱德聯絡站」，1967 年 4 月 15 日。

鍾仲烏（音）：《毛主義與發展：中國工業管理政策》耶魯：耶魯大學出版社，1980 年。

《中國農業年鑒》（1980 年）北京：農業出版社，1980 年。

沃爾特 · C · 克萊門斯：《軍備競賽和中蘇關係》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68 年。

《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文件及分析》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2 年。

《共產黨中國，1958 年》香港：友聯研究所，1959 年。

博伊德 · 康普頓：《毛的中國：黨的整風文獻，1942-1944 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52 年。

埃德沃爾特 · 克蘭克肖：《新的冷戰：莫斯科與北京》哈蒙斯沃斯：企鵝圖書出版公司，1963 年。

顧立雅：《孔夫子其人其事》倫敦：羅特雷茲和凱根 · 保羅公司，1951 年。

大衛 · 克魯克和伊沙貝爾 · 克魯克：《楊儀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倫敦：羅特勒基和凱根 · 保羅公司，1959 年。

D

亞歷山大 · 達林主編：《國際共產主義的多極化：文獻記錄，1961-1963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3 年。

維拉迪米爾 · 德迪耶：《鐵托講演集》倫敦：威登菲爾德和尼科爾遜公司，1953 年。

洛厄爾 · 迪特默：《劉少奇和中國文化大革命》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4 年。

《裁軍問題文獻（1945-1959 年）》，第 2 部分，1957-1959 年華盛頓：國務院，1960 年。

約爾根 · 多梅斯：《中國的國內政策》紐約：普拉格公司，1973 年。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社會政策，1949-1979 年》倫敦：C · 赫斯特公司，1980 年。

德斯蒙得 · 唐納利：《三月風》倫敦：科林斯公司，1959 年。

奧德里 · 多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倫敦：艾倫與昂溫公司，1967 年。

瓊 · 特烏菲爾 · 德雷爾：《中國的四千萬少數民族》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76 年。

G · 達特：《中國的農村人民公社》倫敦：亞洲出版社，1967 年。

E

亞歷山大 · 艾克斯坦：《中國的經濟革命》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 年。

亞歷山大 · 艾克斯坦、沃爾特 · 蓋倫森、劉大中主編：《共產黨中國的經濟趨向》芝加哥：奧爾丁公司，1968 年。

羅伯特 · S · 埃利根特：《毛的偉大革命》倫敦：威登菲爾德和尼科爾遜公司，1971 年。

F

馬克 · 埃爾文：《中國歷史的模式》倫敦：伊瑞 · 梅瑟恩公司，1973 年。

梅樂·范索德：《如何統治俄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修訂版，1963 年。
費正清：《劍橋中國史》第 10 卷：《晚清，1800-1911》第 1 部分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8 年。
法蘭克沃·費日多：《中國—蘇聯，霸權的終結：共產主義運動重大分歧的由來，1949-1957 年）》巴黎：普朗公司，1964 年。
大衛·弗洛伊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陣》紐約：普拉格公司，1964 年。
D·W·福克瑪：《中國的文學理論與蘇聯的影響，1956-1960 年》海牙：摩頓公司，1965 年。
《美國的對外關係，1949 年》第 8 卷：《遠東：中國》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刷局，1978 年。

G

喬治·加勒：《中國沒有蒼蠅》倫敦：艾倫和昂溫公司，1955 年。
雷蒙德·L·加特霍夫主編：《中蘇軍事關係》紐約：普拉格公司，1966 年。
喬治·金斯伯格、馬瑟斯·邁克爾：《共產黨中國和西藏：起初的十二年》海牙：馬蒂繆斯·內伊霍夫公司，1964 年。
約翰·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8 年。
——《中蘇論戰之概觀，1963-1967 年》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8 年。
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建議和非議》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81 年。
——《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7 年。
傅路特、房兆楹：《明史人物傳記辭典》（1368-1644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兩卷本，1976 年。
塞繆爾·B·格里菲思：《中國人民解放軍》紐約：麥克戈雷山外交關係委員會，1967 年。

H

摩爾頓·哈爾波林：《中國和原子彈》倫敦：帕·麥爾公司，1965 年。
摩爾頓·哈爾波林主編：《中蘇關係和軍備控制》馬薩諸塞州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7 年。
A·M·哈爾彭：《戰後世界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出版，手稿存外交關係委員會，紐約。
A·M·哈爾彭主編：《對華政策》紐約：麥克戈雷山外交關係委員會，1965 年。
《漢英時事英語詞彙》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年。
《馬克思主義手冊》A 類紐約：蘭頓出版社，1935 年。
塞利格·S·哈里森：《印度：最危險的幾十年》。
哈羅德·C·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66 年。
——《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內的「無原則爭論」》華盛頓：美國新聞署—IS—98—55，1955 年 7 月。
恩維爾·霍查：《對中國的感想》地拉那：「8 Nëntori」出版社，1979 年。
羅納德·夏：《共產黨中國的價格控制》紐約：太平洋學會，1953 年。
T·A·夏：《從術語和語義的變化看人民公社在退卻》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64 年。
——《隱喻、神話、儀式和人民公社》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61 年。
謝爾莉（音）：《共產黨中國在核時代的戰略》新澤西：恩格爾伍德，普林梯斯—霍爾公司，1962 年。
許芥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布魯明頓：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80 年。

《華主席在湖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

《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

《懷念張聞天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黃震遐：《中共軍人志》香港：當代歷史研究所，1975 年。

黃仁宇：《1587 年：沒有功績的一年》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81 年。

查爾斯 · O · 賀凱：《中華帝國的過去》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5 年。

G · F · 赫德遜：《中國的人民公社》倫敦：蘇聯觀察，1960 年。

G·F· 赫德遜、理查德· 羅文泰爾、羅德里克· 麥克法夸爾（馬若德）:《中蘇論戰》紐約：普拉格公司，1961 年。

雷亞 · 洪德興主編：《西藏為自由而戰》孟買：東方朗曼公司，1960 年。

I

《1959 年匪區自然災害情況調查》台灣：「國防部」情報局，1959 年 9 月。

印度政府糧食和農業部：《印度農業計劃和技術代表團訪華報告》新德里：印度政府出版社，1956 年。

J

埃麗斯 · 喬菲：《兩次全會之間：中國領導層的內部鬥爭，1952-1962 年》安阿伯：密執安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75 年。

——《黨與軍隊：中國軍隊幹部的職業化和政治控制（1949-1964 年）》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1965 年。

查爾梅斯· 約翰遜:《農民的民族主義和共產黨政權》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2 年。

美國國會經濟共同委員會：《大陸中國經濟概要》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刷局，1967 年。

K

斯坦雷 · 卡諾：《毛和中國》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72 年。

N · S · 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倫敦：德烏茲公司，1974 年。

——《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1957 年 11 月 6 日）倫敦：蘇聯新聞，1957 年。

沃納 · 克拉特主編：《中國模式》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現代亞洲研究所），1965 年。

唐納德 W· 科林、安尼 B· 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1921-1965 年》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 年。

米哈伊爾 · A · 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蒙特利爾：國際出版商代理人，1964 年。

荷曼 · 科爾克維茲：《蘇聯軍隊和共產黨》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7 年。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 年。

郭華倫主編:《中國共產黨術語彙編》台北：國立誠旗（音）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1978 年。

L

亞瑟 · 拉爾：《共產黨中國怎樣打交道》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8 年。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詩詞選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年。

歐文 · 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界》波士頓：比亞康出版社，1962 年。

詹姆士 · 雷格：《四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60 年。

沃爾夫岡 · 倫納德：《斯大林之後的克里姆林宮》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2 年。

李嘉（音）:《中共稅收系統》香港：聯合研究院，1969 年。

肯尼斯·利伯瑟：《中國的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75 年》利皮特，紐約：國際文理出版社，1976 年。

威克特·D·利皮特：《中國的土地改革和經濟發展》利皮特，紐約：國際藝術與科學出版社，1974 年。

劉少奇（主要資料來源）:《劉少奇選集，1945-1957 年》和《劉少奇選集，1958-1967 年》香港：聯合研究院，1969 年和 1968 年。

《打倒劉少奇——反革命分子劉少奇的一生》北京：北京市第四醫院「井岡山戰鬥隊」，1967 年 5 月。英譯文見《當代背景》834 號。

《懷念劉少奇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紅旗飄飄》第 20 輯北京：1980 年。

劉愛琴：《女兒的懷念》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未註明出版地「只爭朝夕戰鬥隊」和「我自巋然不動戰鬥隊」，1967 年 5 月 30 日。

《劉少奇材料彙編》（第 1 集）天津：1967 年 4 月。

《劉少奇同志永垂不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

《三反分子劉少奇罪史》北京：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換新天』紅衛兵代表大會」，1967 年 5 月。

《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證選編》天津：「誓與劉鄧陶血戰到底聯絡站」，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色造反團」，1967 年 4 月。英譯文見《中國大陸雜誌選》651 ～ 653 號。

《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第 4 集北京：北京化工學院「毛澤東思想宣傳員」，1967 年 4 月 10 日。

劉錚、宋健等：《中國人口：問題與展望》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1 年。

M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紐約：普拉格公司，1960 年。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 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 年》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為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和共產主義事務研究所出版，1974 年。

——《中美關係（1949-1971 年）》紐約：普拉格公司；牛頓·阿伯特，德文郡：大衛和查爾斯公司共同受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委託出版，1972 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年。

毛澤東（主要資料來源）一些補充條目，包括英譯本和內容的詳細說明，可以查閱本書第 1 卷第 409 ～ 411 頁。——作者註：李銳:《毛澤東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年。

《毛主席教育語錄》北京：北京電機學校「『東方紅公社』紅代會」,1967 年 7 月。

《毛主席論文藝語錄》，未註明日期上海：上海戲劇學院「革命路」編輯部。

《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北京：北京電影製片廠「革命造反聯絡總部」，1967 年 7 月。

《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未註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毛主席文選》未註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毛主席語錄》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1966 年第 2 版。

毛澤東：《對蘇聯經濟的評論》紐約：每月評論社，1977 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 ～ 4 卷,1960 年；第 5 卷,1977 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外文出版社，第 1 ～ 4 卷,1960 年；第 5 卷,1977 年。

《毛澤東思想萬歲！》未註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毛澤東思想萬歲》未註明出版者，1967 年。
《毛澤東思想萬歲》未註明出版者，1969 年。
《毛澤東同志八十五誕辰紀念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
《毛澤東：未名文集》未註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毛澤東思想雜集》（1949—1968 年），第 1、2 卷華盛頓：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中心，61269—1 號，61269—2 號，1974 年。
《毛澤東主席語錄》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 年。
《韶山紅日照千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年。
《大海航行靠舵手》未註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最高指示》未註明出版者和出版日期。
《資料選編》未註明出版者，1967 年 1 月。
《我們在毛主席身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N·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倫敦：凱普公司，1970 年。

克勞斯·梅納特：《北京和莫斯科》倫敦：威登菲爾德和尼科爾遜公司，1963 年。

《緬懷劉仁同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年。

彼得·R·穆迪：《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漢姆頓，康涅狄格：舒·斯特林出版社，1973 年。

法朗克·莫拉斯：《西藏叛亂》紐約：麥克米倫公司，1960 年。

N

《難忘的記憶》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79 年。

理查德·M·尼克松：《六個關頭》紐約：雙日公司，1969 年。

O

歐邁格：《共產黨中國的政策制定：群眾性大興水利運動情況（1957-1958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未出版。

P

喬治·N·帕特森：《叛亂中的西藏》倫敦：費伯公司，1960 年。

彭德懷（主要資料來源）：《彭德懷案件，1959-1968 年》香港：聯合研究院，1968 年。
景希珍：《在彭總身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年。
《紀念彭德懷同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
《橫刀立馬彭將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王酊（音）：《彭德懷問題選輯》香港：明報社，1969 年。

德懷特·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938-1968 年》芝加哥：奧爾丁公司，1969 年。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 年。

《共產黨中國分省農業統計》埃薩卡，紐約：中國經濟問題委員會，SSRC，1969 年。

《總統公報》「D·D·艾森豪威爾，1959 年」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刷局，1960 年。

詹姆士·R·普西：《吳晗：借古諷今》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1969 年。

白魯恂：《毛澤東：突出的領袖》紐約：基礎書店，1976 年。

——《中國政治之靈魂》馬薩諸塞州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8 年。

Q

喬治·H·奎斯特：《核時代的外交：最初的二十五年》紐約：杜奈倫公司，1970 年。

R

埃德溫·O·賴肖爾、費正清：(譯按：本書第一卷中文本譯為費爾班克)。《東亞：偉大的傳統》倫敦：艾倫和昂溫公司。

托馬斯·W·羅賓遜：《林彪的政治和軍事生涯》第2部分，1950-1971年聖摩尼卡：蘭德合作研究所，1971年8月。

約翰·E·魯：《處在反對派地位的毛澤東，1927-1935年》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6年。

S

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1972年。

施拉姆：《毛澤東》哈蒙斯沃斯企鵝圖書出版公司，修訂版，1967年。

—— 《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哈蒙斯沃斯：企鵝圖書出版公司，修訂版，1969年。

施拉姆主編：《毛澤東的本色：談話和書信，1956-1971年》哈蒙斯沃斯：企鵝圖書出版公司，1974年。

彼得·施拉恩：《中國農業的發展，1950-1959年》厄本納：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1969年。

法朗茲·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工作》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修訂版，1968年。

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的崛起》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51年。

哈里·施瓦茨：《斯大林後的蘇聯經濟》倫敦：戈蘭茲公司，1965年。

馬克·塞爾登：《中華人民共和國》紐約：每月評論社，1979年。

《深切懷念羅瑞卿同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78年。

阿格尼斯·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時代和生平》紐約：每月評論社，1956年。

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倫敦：戈紗茲公司，1937年。

約瑟夫·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英文版)，1952年。

本尼迪克特·斯塔威思：《中國農業機械化的政策》埃薩卡：科奈爾大學出版社，1978年。

T

陶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4年。

米歇爾·塔特：《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從赫魯曉夫到柯西金》紐約：威金公司，1970年。

泰偉斯：《中國政治及清洗》利皮特，紐約：M·E·沙帕公司，1979年。

《輝煌的十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

《偉大的十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

《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北京：「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中國人民大學紅色批劉鄧三隊第一支隊」。

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響應》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54年。

《西藏，1950-1967年》香港：聯合研究院，1968年。

T·R·特里格：《中國地理》倫敦：倫敦大學出版社，1965年。

羅伯特·C·吐克主編：《列寧選集》紐約：諾爾頓公司，1975年。

丹尼斯·特威切特主編：《劍橋中國史》第3卷：《中國隋朝和唐朝，589-906年》第1部分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9年。

W

亞瑟·韋利：《孔子的論語》倫敦：艾倫和昂溫公司，1945年。

肯尼思·R·沃克：《中國農業規劃：社會主義成分與私有成分 (1956-1962 年)》倫敦：卡斯公司，1965 年。
理查德·L·沃克：《中國的飢餓》紐約：新領導者出版社，未註明日期。
——《來自人民公社的信》紐約：新領導者出版社，1959 年。
威廉·W·惠策恩：《中國高層軍事指揮機構：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 年》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73 年。
威廉·W·惠策恩主編:《七十年代中國的軍隊與政治權力》紐約: 普拉格公司，1972 年。
《共產黨中國名人錄》香港：聯合研究院，修訂版，2 卷書，1969 年。
J·T·威爾森：《中國一月》紐約：赫爾一王公司，1959 年。
尼古拉斯·沃拉斯頓：《中國的早晨》倫敦：卡伯公司，1960 年。
黃曼 (音) 譯：《毛澤東詩詞》香港：東方地平線出版社，1960 年。
吳晗：《燈下集》北京：三聯書店，1979 年。
《吳晗和〈海瑞罷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
吳元黎：《共產黨中國的空間經濟》紐約：普拉格公司，1967 年。

Z

唐納德·S·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 年)》普林斯頓: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2 年。